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编辑出版: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2卷1期
2026年1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舒波	袁臣辉	郝澳茹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2025 年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发展报告——以年度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出版质量与学术生态观察 -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 1-6

文化与文学研究

- 中国时间观的跨文化演变 - 丁晓倩 - 7-10
中国早期木构建筑形制与技术演变探析 - 毛晓旭 - 11-13
论 1941—1948 年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 - 单立阳 - 14-22
受事主语“V 起来”句的文本体裁考察 - 顾彬楠 - 23-28
从昆德拉到戴维·洛奇看“复调理论”的不同侧面 - 鄢靖雯 - 29-33
孟子关于国政的道德论争 - 沈奕昊 - 34-40

教育理论与实践

- 体能训练影响运动员赛场表现的作用路径研究 - 万贵宇 - 41-44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多模态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与实现路径 - 刘丽, 孙思洁, 山明织 - 45-50
高职院校“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重维度 - 王浩 - 51-54
具身认知视域下城市儿童科普空间建设研究 - 高雯吴钰 - 55-60
文化两创背景下博物馆研学旅行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 陈矿, 杨艳玉 - 61-64
大学生感知的人工智能焦虑与就业压力的关系: 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 沙成成, 王林 - 65-68
运动与正念的交叉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 Web of Science 的可视化分析 - 杜皓名, 唐 觅 - 69-75
四川省中考体育改革: 价值重塑、现实困囿与纾解路径 - 杨司涵, 杨成, 周楠 - 76-79
父母参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研究 - 蔡贵群 - 80-85
高校音乐厅的美育职能: 挑战与实现路径 - 吴在昊 - 86-89
重构知识, 时空交汇——广州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特色案例构建 -
纪泽泉, 杨舒晴, 王玉青, 施雯 - 90-93
基于“双循环驱动”理念对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质量及保障措施改进研究 - 张敏 - 94-98
AI 赋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路径探究 - 刘峻利, 金岚 - 99-103
基于 PERMA 理论的高校心理育人路径研究 - 刘楷文、方媛、周芷木 - 104-1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策略探究 - 代浩美, 岳瑞玲 - 108-112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技术采纳行为研究现状及启示 - 李远航、王丽萍 - 113-119

社会与治理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价值内涵的同异及其启示 - 廖一鸣, 王琳琳 - 120-125

文化治理视角下城市市集空间重构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苏州双塔市集为例 - 张梦月 - 126-130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里海——伏尔加河流域渔业工人卫生医疗体系的探讨 - 龚嘉乐 - 131-135

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 李中华 - 136-139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指导下当代青年工作的实践路径探析 - 宋美祺 - 140-14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双重逻辑 - 王飘怡 - 147-151

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推民族复兴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遵循 - 王凡, 段嘉莹 - 152-155

长征红色文化场馆的记忆建构——以贵阳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为例 - 罗竞腾、窦文博、徐英杰 - 156-159

消防救援外骨骼助力装备发展与应用研究 - 张小飞, 李渊, 于晟伟 - 160-163

经济与管理研究

“浆板热”的时代动因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 李中华 - 164-167

香港期货交易所人民币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基于 VECM 模型 - 冯鹏龙, 张菡 - 168-172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的系统分析 - 陶彦岑, 张文馨, 桂于婧, 陈颖洁 - 173-179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 - 李宝硕, 薛珂, 石琳, 汪敏翼, 刘栩 - 180-189

ESG 表现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影响研究 - 黄逍遥 - 190-195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三大机制的研究 - 聂曼琪 - 196-202

越权代表与公司担保的规范与法理研究评述 - 任奎均 - 203-207

传媒与艺术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影视制作实践教学的路径探索与实践创新 - 钟文豪 - 208-210

从流量红利到产业深耕: AI 漫剧对传统动画行业的长期影响与未来趋势 - 张鹏菲, 张晴, 侯心如 - 211-215

线性材料在纤维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力探索 - 陈嘉欣 - 216-218

从文化自信到制度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艺术政策逻辑 - 宋詹杰 - 219-222

从创作主体性到审美独特性: AI 绘画无法替代人类绘画的双重维度 - 张 晴, 侯心如, 张鹏菲 - 223-227

墨韵新生: 传统水墨动画在新媒体艺术语境下的教学解构与实践重构 - 杜智雪、张蕊 - 228-232

AI 辅助平面设计人机协同创作模式研究: 协作机制与效率优化策略 - 侯心如, 张鹏菲, 张 晴 - 233-236

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的数字化品牌传播策略研究 - 廖珣玥 - 237-242

低碳语境下天然纤维的工艺创新与当代艺术实践 - 赵中怡 - 243-246

从“长叙事”到“微瞬间”: 短视频时代纪录片的美学重构与叙事转向 - 叶伟 - 247-249

2025 年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发展报告 ——以年度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出版质量与学术生态观察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摘要：2025 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共发表论文 564 篇，整体呈现出数量增长、领域拓展与主题聚焦现实的综合特征。年度研究主要展现出四个方面的趋势：教育研究持续高热、文化研究稳步深化、技术与人文交叉融合明显、社会应用导向显著增强。全年论文来自 399 所高校与科研机构，跨校合作论文 95 篇，占比 16.8%，显示出学术联合与区域协同的积极发展态势。基金支持论文 159 篇，占总量的 28.19%，反映出科研资助体系在推动研究质量与成果多样化中的关键作用。总体来看，期刊学术生态呈现出“多元参与、协同创新、稳中提质”的良好格局。与此同时，稿件质量方面仍存在一定改进空间，主要体现在投稿规范不统一、研究深度不足、图文呈现欠佳与引用格式不规范等问题。未来，期刊将进一步强化学术规范引导，鼓励跨学科研究与图文并重的表达方式，持续提升刊物的学术影响力与出版质量。

关键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年度数据；学术发展；基金支持；跨校合作；投稿规范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9

2025 年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创刊的第一年。这一年对本刊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期刊正式诞生。《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华语学术群体的专业刊物，《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角，鼓励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致力于为学术界与社会实践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创新、转化与应用。创刊以来，期刊秉持“开放、学术、创新、共享”的办刊理念，坚持高标准的学术审稿机制与国际化的编辑方针，在推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交流方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以下为本刊 2025 年度发展概况与学术生态分析报告。

一、年度总体概况

2025 年本刊共发表论文 564 篇（见图 1），整体呈现出数量稳中有升、领域多元拓展、主题聚焦现实的学术特征。从总体分布看，研究类型更加丰富，跨学科特征更加显著。综合分析数据与文章题目，可以归纳出四个年度特征：（1）教育研究持续高热；（2）文化研究稳步深化；（3）技术与人文交叉趋势明显；（4）社会应用与现实议题导向增强。

（一）教育研究持续高热

教育类研究依然是 2025 年学术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占据全年发表总量的 31.2%。从小学到高等教育、从心理健康到思政课程、从教学模式到教师发展，文章广泛涉及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各个层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AI 赋能教学、混合式教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主题频繁出现，反映出教育领域正从传统课堂研究迈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与人本化相结合的多维研究格局。这类研究不仅体现了教育学界的理论自觉，也折射出国家教育现代

化战略的落地进程。

（二）文化研究稳步深化

2025 年文化与文学研究继续保持学术厚度与思想深度。一方面，传统文化研究在现代视域下获得再阐释，如对儒家思想、红色文化、地方民俗及艺术形态的当代重构研究；另一方面，跨文化比较与文化传播议题持续升温，如“时间观念”“复调文学理论”“文化政策逻辑”等研究反映出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再思考。总体而言，文化研究正从单纯的“传统守护”向“创新转化”转型，显示出当代中国学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创造性表达能力。

（三）技术与人文交叉趋势明显

2025 年论文题目中“AI”“数字”“智能”“可视化”“新媒体”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显著上升，表明技术赋能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趋势。尤其是在影视制作、平面设计、艺术创作与教育教学等领域，人工智能的介入正推动传统人文学科的创新实践。AI 绘画、智能教育平台、数字普惠金融等议题不仅改变了研究对象，也重塑了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这种“技术-人文”双向融合的研究趋势，体现出中国学术界在应对数字文明时代挑战中的积极探索与理论自觉。

（四）社会应用与现实议题导向增强

2025 年的学术成果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宏观社会变迁与公共政策出发，关注现实问题与社会治理议题。例如，城市空间重构、体育教育改革、青少年心理、绿色发展、文化治理等问题均被纳入学术讨论。部分论文以数据模型、案例研究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提升了研究的实证性与政策参考价值。这种面向现实、贴近社会实践的研究取向，标志着学术研究正在由“理论积累型”向“应用服务型”转型，进一步凸显了学术成果的社会责任感与公共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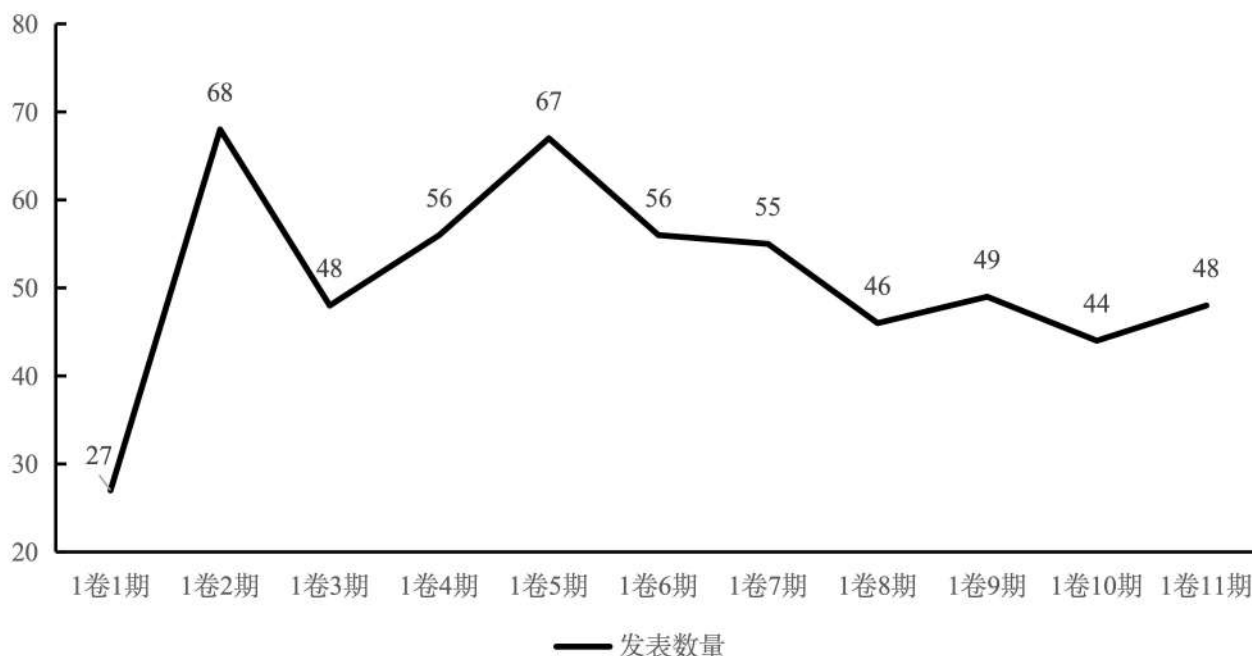


图 1 2025 年全年文章发表数量统计

二、院校与合作分布特征

2025 年，本刊共刊载来自 399 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术成果，覆盖全国高等院校及部分科研院所，学术来

源广泛且分布均衡¹。从数据整体分析来看，当年文章在院校分布、区域结构、合作模式、学术生态等方面呈现出多层次的发展特征。通过对 564 篇论文的统计与归纳，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显著特征：（1）院校来源覆盖广泛，科研参与主体多元；（2）跨校合作比例稳步上升，学术联合趋势增强；（3）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地方高校研究活力显现；（4）科研组织生态趋于开放，合作模式日益多样化。

（一）院校来源覆盖广泛，科研参与主体多元

2025 年度共有 399 所不同院校或科研单位参与论文发表，显示出本刊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持续提升。从单位性质看，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艺术类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等均有稳定贡献²，体现出学术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趋势（见图 2）。除传统研究型高校外，不少地方高校与应用型院校也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其研究主题更具实践性与区域性。例如，地方师范院校在教育研究中展现出强劲的研究产出，而艺术与传媒类院校则在 AI 艺术与创意教育等新兴议题中表现突出。这种多元参与格局，说明学术创新已从“精英型研究”逐步向“普遍性研究”扩散，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学术生态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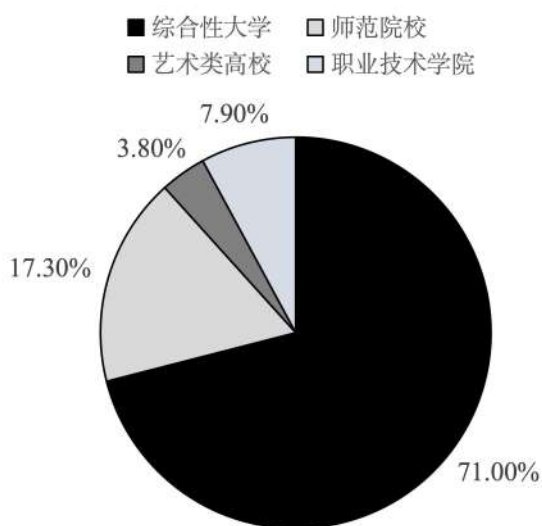


图 2 单位性质来源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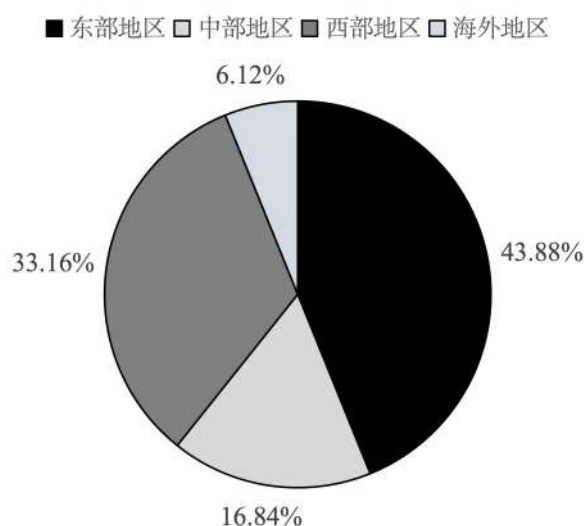


图 3 单位地区来源分析

（二）跨校合作比例稳步上升，学术联合趋势增强

2025 年共有 95 篇跨校合作论文，占全年发表总量的约 16.8%，较往年呈稳步上升趋势。数据显示，部分研究团队在社会治理、文化传播、AI 赋能教育等跨学科主题中形成了高质量的合作网络。例如，一些研究由“地方高校 + 科研院所”或“内地高校 + 港澳机构”联合完成，充分体现了学术合作的多区域协同特征。跨校合作不仅有助于资源共享与方法互补，也促进了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成果的综合性和。从整体趋势看，学术合作正逐渐由“个人化研究”向“团队化研究”过渡，合作主体从同领域学者扩展至跨领域群体，显示出中国学术体系在组织结构与研究范式上的双重优化。

¹ 以下分析基于对全年 564 篇论文作者单位信息的统计整理，相关分析均以第一署名单位为统计依据。

² 院校说明：师范院校是指单位名称中包含“师范”；艺术类高校是指单位名称中包含“艺术 / 美术 / 音乐 / 戏剧”；职业技术学院是指单位名称中包含“职业 / 技师”；综合性大学是指其余以“大学 / 学院”为主体、且不属于以上三类者。

（三）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地方高校研究活力显现

从地域维度观察，2025 年论文来源呈现出区域均衡化发展的明显特征（见图 3）。东部地区高校依旧保持较高的科研产出，但中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学术活跃度显著提升³。特别是在文化遗产、地方教育创新、区域经济发展等方向，地方院校的研究成果日益突出。例如，新疆、贵州、广西、海南等地的高校在本年度均有多篇文章发表，研究内容贴近区域实际，体现了地方高校将“服务地方”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独特路径。区域分布结构的优化，说明科研资源配置正趋向均衡，全国学术生态正在由“中心辐射型”向“多极共生型”格局转变。

（四）科研组织生态开放化，合作模式多样化

从合作形式来看，2025 年的学术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开放化与多样化特征。一方面，传统的校际合作开始延伸至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政府部门，形成了“产学研政”协同的复合型研究模式。另一方面，不少跨领域论文结合了教育、管理、艺术、人工智能等多学科视角，构建出更加开放的研究网络。这种多元合作模式不仅提升了研究的社会关联度，也增强了学术成果的转化潜力。特别是在数字人文、文化治理与教育技术等新兴领域中，合作已成为创新的关键驱动力。可以预见，随着数字科研平台与信息共享机制的完善，未来的学术合作将更加灵活、智能与国际化。

三、基金支持与科研资助状况

根据对 2025 年全年发表的 564 篇论文统计结果显示（见图 4），其中共有 159 篇获得各类基金项目支持，占比 28.19%。从整体情况看，本年度基金资助论文数量占比稳定，说明科研经费在学术成果产出中仍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基金支持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教育研究、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经济管理及艺术创作等方向，反映出研究主题与国家 and 地方重点学科领域保持一致。从表格数据观察，基金来源覆盖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科研项目及高校自设基金等多种层级，显示出资助结构的多元性。同时，部分基金论文作者单位具有联合署名特征，说明基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校科研协作与团队合作研究的形成。总体而言，2025 年基金支持状况表现为“数量稳定、覆盖广泛、方向集中、作用突出”，科研资助体系在推动研究质量提升与成果多样化方面继续发挥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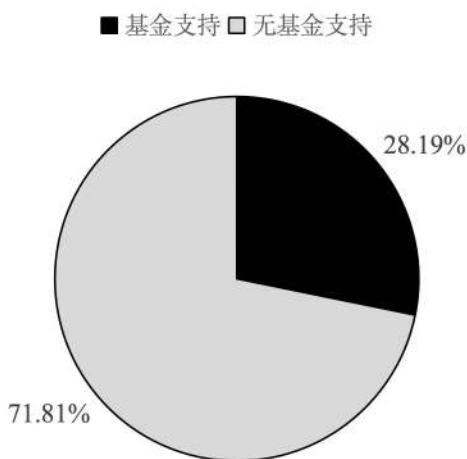


图 4 基金支持分析

³ 作者单位的区域划分依据高校所在地进行统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海外地区包括港澳台地区及国外高校。

四、研究与投稿中的普遍问题

（一）投稿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 2025 年度稿件整体情况来看，部分作者在投稿环节仍未严格按照期刊的模板与规范要求撰写与排版⁴。常见问题包括：题目层级混乱、摘要与关键词格式不一致、表格缺少编号说明、引文注释标注不统一等。这些细节问题虽不影响研究内容本身，但在学术出版流程中会增加编辑整理的工作量，也影响论文的整体呈现质量。建议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投稿须知，严格依照期刊提供的排版模板进行排版与格式校对，确保论文在形式上符合学术出版规范，从而提升审稿效率与学术形象。

（二）研究深度与理论建构仍显不足

从已发表与退修稿件的整体情况看，不少研究主题虽紧扣现实问题，但研究深度与理论分析仍有待加强。部分论文在论证过程中存在理论支撑不足、数据样本有限、逻辑链条不够完整的问题，尤其在教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仍存在“经验性描述较多、系统性分析不足”的倾向。建议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理论框架的建构与方法论的严谨性，强化数据支撑与比较分析，提高研究的学术厚度与逻辑完整性，使成果更具科学性和启发意义。

（三）学术表达形式单一，图文呈现需优化

从稿件内容观察，部分论文仍以文字叙述为主，缺乏图表、模型等可视化内容。特别是在实证类研究中，数据结果与分析过程未能充分以图形或模型形式展示，导致研究的表达效果和直观性不足。学术论文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载体，更应是信息结构化的呈现。建议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合理使用表格、图示、流程图或模型结构等形式，使论文更具条理性和可读性，实现图文并茂的表达效果，从而提升论文的传播力与学术影响力。

（四）文献引用需更加规范与系统

在参考文献与引文标注方面，部分论文存在格式不统一、来源信息不完整、参考文献年份偏旧、英文文献比例不足等问题，个别稿件甚至出现引用缺失或引用错误的情况。学术引用的规范性直接体现研究的严谨程度与诚信意识。建议作者严格遵守学术引用标准，如 GB/T7714 或 APA 等国际规范格式，确保文献来源清晰、格式统一、内容准确。同时应适当增加近五年的高质量参考文献，提高研究的前沿性与时代性，使学术成果更好地融入国内外研究语境。

五、总结与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2025 年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创刊后的首个完整出版年度，在论文数量、研究主题、作者结构与学术生态等方面均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总体态势。全年共发表论文 564 篇，研究议题覆盖教育、文化、社会治理、技术与人文交叉等多个重要领域，显示出期刊在服务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综合承载能力。从院校与区域分布来看，作者来源广泛，既涵盖综合性大学与师范院校等传统学术主体，也逐步吸纳艺术类高校、职业技术院校及地方高校参与，学术参与结构趋于多元；区域分布方面，东中西部及海外高校均有稳定贡献，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辐射范围初步显现。

从学术生态特征看，跨校合作论文比例稳步提升，基金支持论文数量保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表明学术研究正逐步由个体化探索向团队化、项目化方向发展。同时，技术与人文融合、研究议题现实化与应用化等趋势愈发明显，反映出学界对社会现实问题与时代议题的积极回应。总体而言，2025 年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的学术运行状态呈现出“基础稳固、结构多元、协同增强、质量提升空间并存”的阶段性特征。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当前发展中仍存在的不足。部分稿件在研究深度、理论建构、学术规范

⁴ 模版参见官网主页 (<https://ac.wisvora.com/index.php/rwshkx>) 中“下载模版”板块。

与表达形式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说明期刊在作者引导、学术规范培训及质量把关机制方面仍需持续加强。这些问题既是创刊初期阶段性发展的客观表现，也为期刊未来的改进方向提供了明确指引。

展望未来，《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将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学术规范意识与质量导向，持续优化审稿与编辑流程，引导作者提升研究深度与表达质量；同时，期刊将积极鼓励跨学科研究与跨区域合作，关注技术变革背景下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新问题、新方法与新范式，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与学术边界。在此基础上，期刊也将稳步推进国际化发展进程，加强与海外及港澳台学术界的交流互动，逐步提升在全球华语学术体系中的可见度与影响力。通过持续的制度完善与学术积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有望在未来形成更加成熟、开放且富有活力的学术平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稳定而长远的发展贡献力量。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JHSS (2025)

— An Observation of Publishing Quality and Academic Ecology Based on Annual Data Analysis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2025,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ublished a total of 564 articles, demonstrating an overall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quantitative growth, disciplinary expansion, and a strong orientation toward real-world issues. The annual research output reveals four major trends: the sustained prominen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steady deepening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increasingly evident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and a marked strengthening of socially oriented and applied research. Contributions during the year originated from 399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mong them, 95 articles were co-authored across institutions, accounting for 16.8% of the total, indicating a positive trend toward academic collabor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addition, 159 articles (28.19%) received support from various funding programs, underscoring the crucial role of research funding in enhancing research quality and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cademic outputs. Overall, the journal's academic ecosystem in 2025 exhibited a favorable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steady quality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remains room for further enhancement in manuscript quality,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inconsistencies in submission standards, insufficient research depth, suboptimal visual presentation, and non-standardized citation formats. Looking ahead, the journal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guidance on academic norms, encourag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promote balanced text-and-visual presentation, with the aim of further enhancing its academic influence and publishing quality.

Keywords: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nual data; acade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funding; inter-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submission standards

中国时间观的跨文化演变

丁晓倩¹

(1.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 时间观念作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本文从跨文化视角出发, 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研究, 探讨中国时间观念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变迁过程, 并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动因及相关现象。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时间观念的发展历程。接着, 深入剖析了时间观念变迁带来的社会影响。最后, 提出了缓解相关问题的解决路径。研究发现, 时间观念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也深刻体现了战争、革命、科技等因素带来的跨文化影响, 对于中国时间观念具有塑造作用。本文旨在为理解现代社会中时间观念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也为应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挑战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 中国时间观; 跨文化; 传统时间观; 现代时间观; 后现代时间观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48

一、引言

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双重推动下, 时间观念作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许天敏(2022)从时间观念的变化与演进上再现了社会文化交往的差异, 强调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时间管理方式的多样性及其对社会互动的影响。卢春龙和孟瑞霞(2023)则深入分析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时间观的变迁过程, 并揭示了中国式现代时间观的独特生成路径及其特征, 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观念转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此外, 王永明(2024)等学者提出了构建新教学时间观的方向, 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 进一步凸显了时间观念在教育领域的关键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 新一代的时间观正逐渐从传统的、以农业和家庭为中心的时间安排, 向更加注重效率和个人发展的现代时间观转变。尽管诸多学者已从中国自身出发, 探讨了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对时间观的影响, 但鲜有研究系统性地分析跨文化因素对时间观改变的具体影响。

因此, 本文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 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研究, 探讨中国时间观的转变, 并深入分析这些变化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动因及其产生的相关现象。本研究旨在为理解现代社会中时间观念的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并为现代中国人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提供支持。

二、中国时间观念的变迁与发展

时至今日, 中国社会至少经历了三种形态的时间观念, 或者说出现了三种形态时间观念并置的情形: 传统时间观、现代时间观、后现代时间观。这三种时间观念相互交织, 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特征, 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延续与转型。

(一) 自然时间积淀的传统时间观

中国是一个由农耕经济发展起来的国家, 在悠久的封建王朝和传统农业社会, 中国人一直奉行的是传统时间观, 在晚清之前一直如此。农业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地制宜、适时而种”的耕作规律, 孕育了循环式的传统时间观。一段时间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而更多的是一个新的循环, 循环往复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时间中最为显著的特征。这样的社会往往呈现出静止的状态, 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稳定的空间里, 社会变化的速度非常缓慢,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亦是如此。并且, 传统时间观更多强调了人与时间之间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在这种时间观念指导之下, 人们更倾向于按照自然时序来安排自己的活动,

作者简介: 丁晓倩(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使之适合时机,不会为了时间的自然流逝而感到焦虑,强调在不缓不急中体验时间。

与循环时间观相对的则是线性时间观,其为技术社会的典型代表。芒福德(2010)曾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近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科技发达,与他们所持的工业时间观有关。这种观念呈现出线性的时间过程和时间感知,时间在钟表嘀嗒声中一去不复返。在技术社会里,时间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进步的象征,谁控制了时间,走在时间的前列,谁就能在现代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在传统时间观下一个人生活的经验时间与期望时间高度重合。一个人成年以后,几乎就可以根据他的生活经验来预判他所期望的未来。换言之,一个人成年以后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未来、看清楚自己未来的样子。经验时间与期望时间的高度重合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二) 理性与进步并存的现代时间观

从清朝开始,中国的传统时间观日益受到挑战,现代时间观开始由西方传入,萌芽,成长并得以确立。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击垮了天朝上国的尊严,一批洋务派大臣开始睁眼看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当然也包括天文地理知识。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把西方的时间观以及基本理念引入中国。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了中华民国,其标志着中国全面接收西方达尔文式的进步时间观。时间制度随之改变,阳历战胜了阴历、公元纪年战胜了帝王纪年,现代西方时间观在中国取得胜利。

在现代时间观之下,经验时间与期望时间开始出现分离,也就是说,经验的时间与期望的未来出现偏差。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个人主义意识开始崛起,个人可以规划自己的未来,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理性的个体可以规划自己的未来。经验时间与期望时间之间呈现出一种线性关系,经验时间可以逐步积累为期望的实现。换言之,今天的努力会为未来美好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种进步主义的理性话语主导了个体的理性规划。

由此观之,在现代时间观之下,个体的人生观是进步主义的、积极的人生观。积极的人生观就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信心,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进步主义的心态同时也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的人生可以进行理性规划,通过理性的设计规划,人生的目标可以逐步实现,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三) 碎片化与不确定性交织的后现代时间观

在全球化的社会转型之下,各国的时间观念正朝着融合态势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加速了马克思所言“全球市场”的实现。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将世界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连,也对世界文化观念进行了再度整合。进入21世纪后,中国现代时间观的一大特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加速,进而推动了人们时间观念的加速演进。

然而,时间加速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后现代时间观应运而生。在后现代时间观中,时间出现了碎片化,经验时间与期望时间不仅出现了背离,而且几乎失去了联系。这种时间观念的变化使得个体的人生观往往是去时间化的,人们试图在传统时间观中寻找安慰和确定性。例如,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宗教节日和传统节日的时间意义,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

跨文化元素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中逐渐接受和适应了其他文化的时间观念。例如,在跨国企业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需要协调不同时区的工作时间,这种跨文化的时间协调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时间观念。另一方面,一些文化产品通过跨文化传播,将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融入其中。例如,韩国的“韩流”文化在全球传播过程中,融入了西方流行文化的时间节奏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时间观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总体而言,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时间观念的融合与碰撞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化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断探索和适应。

三、中国时间观念的变迁与发展

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和体验。交融与个人的时间节奏变成了一种趋向于速度性的时间关系,中西时间观念在技术的协同下,成为一种以“速度”为诉求的即时表达。在追求效率和速度的过程中,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阵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时间观念冲突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西方线性时间观强调效率与目标导向,而东方循环时间观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全球化和技术融合的大背景下,这两种时间观念既相互碰撞又彼此调适,带来了深层次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一方面,“内卷”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现代人在加速社会中面临的竞争压力和意义迷失;另一方面,“躺平”作为一种反叛式的回应,则揭示了部分群体对过度加速的抗拒和对自我价值的重新思考。

（一）现代时间观下的“竞争困局”

现代时间观强调时间的线性、效率和进步，这种观念在工业化过程中被强化，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的基础。工业化以来对生产流程的不断革新，其本质都是围绕对时间的有效利用。效率至上主义为不断汲取时间提供了思想动力，时间被赋予了价值，并且以货币的形式来衡量，时间就是金钱，成为精心安排和系统计算的对象。

倒计时的盛行是加速社会的彰显。哈特穆特·罗萨（2018）认为“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的逻辑，以及推动力”。罗萨进一步将现代社会的本质定义为“加速社会”，认为加速是产生新异化的原因。而今，我们处于各种倒计时设定的不能落后的高度警觉状态（如各种考试倒计时、各种工作任务倒计时、各种工程项目倒计时等），即便我们根本看不到具象的倒计时装置的存在。更为可怕的是，倒计时一旦启动，连加速度本身都在加速，每个人在拼命奔跑中会不自觉地“竞速”，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要稍微喘口气，就感觉已经落后，倒计时就像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我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本该是自由追逐梦想的年龄，青年人却在无形中被逼迫着追赶倒计时设定的各种目标，以免错失各种机会和任何有价值的可能。

这种观念通过跨国企业、教育交流以及信息技术的传播逐渐渗透到非西方社会，包括中国。企业和组织往往追求最大化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这可能促使员工加班加点完成任务，形成类似996工作制的现象（所谓“996工作制”，是指员工每天早9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是一种违反现行劳动保障法的工作制度）。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提高了产出，但实际上可能导致边际效益递减，进而引发内卷职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许多人选择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强度，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机会。然而，当大多数人都采取这种策略时，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即所谓的“内卷”。同时，当人们过度关注短期目标和即时成果，可能会使人们忽视长期的职业规划和个人成长。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自我提升和发展，反而陷入无休止的竞争。内卷化的恶性循环由此往复相生，他们成为“被掏空的人”。

综上所述，虽然现代时间观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成为内卷现象的推手之一。要缓解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寻找更加平衡的生活与工作模式，重视个人健康与发展，同时倡导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二）后现代时间观下的“缓慢转向”

后现代时间观则试图解构现代时间观带来的线性叙事，强调时间的碎片化、多元化和非确定性。时间不再被视为连贯、有序的流程，而是被技术（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切割为瞬间的“当下”，强调即时性而非长期积累。同时，拒绝将时间标准化为“效率工具”（如打卡、KPI），批判资本主义将时间异化为商品（“时间就是金钱”）。此外，人们逐渐承认不同文化、群体对时间的差异化感知（如“慢生活”与“快节奏”并存）。但由于这种很大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一部分年轻人向传统时间观回归，在传统时间观中寻求安慰，认为只有传统时间观能够带来安全感。

在这一背景下，“躺平”现象产生，其可以看作是个体对这种线性进步模式的否定，认为无需一味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一现象最早可能起源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经济泡沫破裂后，长时间的经济停滞导致出现“低欲望社会”现象，许多年轻人表现出不结婚、不买房、不生育，缺乏工作和生活激情的态度。在中国，21世纪初，随着经济发展和竞争加剧，部分年轻人开始选择“躺平”的生活方式，以应对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激烈的社会竞争。此外，英国有“尼特族”（NEET），美国有“归巢族”（Boomerang Kids）。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年轻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无奈，以及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和反抗。然而，躺平虽是对高压社会的消极抵抗，但并未改变资本对时间的控制逻辑。例如，低薪兼职或“灵活就业”可能使躺平者陷入更不稳定的时间剥削。此外，后现代时间观强调个体对时间的多元诠释，但躺平作为个体选择，难以撼动社会整体的时间制度（如教育竞争、职场文化）。

由此，后现代时间观为理解躺平现象提供了理论框架，而躺平则成为后现代时间批判的现实注脚。在高度加速的社会中，未来的出路或许在于注重集体行动，文化创新，技术批判重构个体与时间的关系。人们不再仅仅停留在个人层面的“躺平”，而是开始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时间改革，比如缩短工作时长、保障休息权利等。同时将“慢哲学”与“可持续生活”理念相结合，倡导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找到平衡，让生活更有质量、更从容。这样，我们才能在高效与自由之间找到和谐共存的方式。

四、结语

中国时间观的跨文化演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调适和创新。本研究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时间观念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分析了现代与后现代时间观下所产生的社会阵痛。研究发现，中国时间观念经历了从传统时间观到现代时间观，再到后现代时间观的转型过程。这一变迁不

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加速，也揭示了战争、革命、科技等因素带来的跨文化影响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塑造作用。这一过程中，也见证了时间观念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内卷”现象和“躺平”态度的兴起。

尽管本研究试图全面探讨中国时间观念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但仍存在不足。首先，数据存在局限性。本研究主要依赖文献分析和理论探讨，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无法深入量化时间观念变迁的具体影响。未来研究可结合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获取更丰富的实证资料。其次，跨文化对比深度不足。虽然本文涉及跨文化因素，但在具体案例分析上仍显不足，未能充分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下时间观念差异对社会互动的深层次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时间观念演变，进行更为细致的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 [1] Mumford L.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2] Tilly, C.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 廉思. 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劳动审视[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 (07): 29.
- [4] 卢春龙, 孟瑞霞. 中国式现代时间观的生成及其特征[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3, (05): 58-67+125.
- [5] 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或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6] 王永明, 亓玉慧, 王禧婷. 时间变革: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教学时间观[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 (05): 7-11.
- [7]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8] 许天敏. 再度融合与出发: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西时间观念与社会变迁[J]. 东南传播, 2021, (08): 43-45.
- [9] 曾剑平, 廖晓明. 时间观与民族文化——中美时间观比较研究[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03): 30-35.
- [10] 张吉. 中西方文化差异中的时间概念解读[J]. 东南学术, 2012, (02): 267-274.

The cross-cultural evolution of China's concept of time

Ding Xiaoqian¹

¹*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concept of tim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time concepts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and then to post-moder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It also analyzes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motivations behind it as well as related phenomena. The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time concepts. Then, it deeply analyzes the social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time. Finally, it proposes solutions to alleviate related problem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ime not only reflects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foundly embodies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 brought about by factors such as wars, revolutions, and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shaping effect on China's time concepts.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ime in modern society and offe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ddressing social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Keywords: China's concept of time; cross-cultur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ime; modern concept of time; post-modern concept of time

中国早期木构建筑形制与技术演变探析

毛晓旭¹

(1.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中国木结构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其形成的建筑文化也始终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本文主要研究了从原始社会到商周时期中国木构建筑的发展演变, 以及这一时期木构建筑的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木构建筑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程, 以及木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木构建筑; 原始社会; 夏商周时期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49

引言

中国古代建筑占据着世界建筑史上重要的位置, 而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代表物木构建筑, 其中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古代传统木构建筑从原始时期的巢居、穴居到现代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木构建筑, 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随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发展逐步完善至今。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重要发展时期, 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逐步成长走向成熟的阶段。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木构建筑的演变与特点, 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原始社会木构建筑构建

(一) 原始社会木结构建筑的起源

中国木构建筑历史悠久, 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等条件有所不同, 各地域的木构建筑所发展的情况也不一致。古代原始社会的居住方式主要分为两种: 巢居以及穴居。

黄河流域黄土地带的穴居及其以后的发展是中国土木混合结构建筑的主要渊源。由于北方雨水较少, 人们可以直接生活在泥土中, 于是就有了穴居。穴居的发展脉络大致分为: 穴居一半穴居—地面建筑—台面建筑。另一种则是长江流域水网地带的巢居, 这一地区为沼泽地带, 气候温暖潮湿, 所以巢居以特有的优越性成为这类地区的主要建筑, 巢居大致可分为单树巢, 多树巢和干阑式建筑三个阶段, 采用先进的榫卯结构, 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建筑遗址, 这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用榫卯技术搭建的木构架房屋, 距今约六七千年。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木构建筑在结构、材料及功能上都有简单和原始的特征, 而其正是中国建筑的开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 中国的木构建筑逐渐演变成复杂多元的建筑形式, 成为中国建筑发展的基础。木头作为建筑材料, 因取材方便、装饰容易而受到原始居民的青睐。虽然后来西方转向石材建筑方向发展, 东方继续向木材建筑方向发展, 东西方的主体建筑材料出现了分化, 但是木是建筑材料发展的根本源头^[1]。

(二) 原始社会木构建筑的类型及特点

原始社会时期, 中国的木构建筑已发展出多种类型, 反映了当时人们适应自然环境和生活需求的能力。其中最常见的包括棚屋、简支榫卯结构建筑和排屋。中国古代木建筑在随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比较鲜明的自身特色^[2]。

棚屋是最早的居住形式之一, 构造简单实用。人们用木材搭成骨架, 外层覆盖树皮、草或兽皮, 形成遮风挡雨的空间。棚屋多为长方形或圆形, 搭建方便, 适合临时居住或迁徙生活, 体现了早期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智慧。同时, 以在木材上凿出凸起的“榫”和凹槽的“卯”相结合, 以保持建筑物的稳定性的简支榫卯技术也是那时的

重大技术进步,不用钉子、金属工具,只需石器、骨器就能制造完成。从榫卯种类可分的榫卯类型可以看出,那时木匠的技艺较高,如燕尾榫、梁头榫等。榫卯是中国古代建筑木构架的主要连接方式。因其不同方向开有卯口与各个方向的榫相咬合,所以受力均匀,具有高强度的稳定性^[3]。

南方因受潮湿气候的影响,民居建设也更为有趣,例如浙江河姆渡遗址中的“干栏式建筑”。他们在房屋建设上架上木桩,上面铺设房屋,地面为悬空状态,并且周边没有墙壁,仅有柱子支撑起房屋,整个房屋可以通风,达到防潮效果。这也表明其“巢居”特征明显,且房屋中发现了大量的榫卯木件,制作上虽然十分简单,但是工艺较为精湛,并出现了防水企口榫设计。

(三)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木构建筑的功能与用途

在原始社会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中,木构建筑就是满足早期人类居住、遮蔽风雨功能的产物,是顺应自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智慧的体现。以朴质的材料和智慧的设计满足早期人类居住生活的需要。

木构建筑能够居住的功能之外,它也是保护族人的一种“堡垒”,居住地选在山脚或是林木之间,将粗糙的木材围栏护在房子周围或在外侧挖凿水沟以抵挡野兽。雨水过大或洪水肆虐时,牢固的木结构房舍无疑是躲避灾害的“安全屋”,河姆渡出土的木构件榫卯技术使得房屋更为牢固,任是风雨再猛,它也不会轻易倒塌,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建筑的寿命。

二、夏商周时期木构建筑

(一) 夏商周时期木构建筑的特点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形成与演变的重要阶段,其特点既反映出早期建筑技术的原始性,又展现出礼制文化与工程智慧的初步结合。这一时期的建筑虽受材料与工具限制,但通过不断实践,逐渐确立了以夯土台基、木构架与茅草屋顶为核心的基本构造体系,为后世中国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夏朝：木构建筑的初步探索

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王朝,早期木作技术不成熟但已出现早期木作技术的萌芽。夏代代表宫室建筑多为“夯土台基+木骨泥墙”,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木结构台基宫室建筑。夯土台基多采用分层夯实泥土为高台建筑基础,一方面可加强建筑地基稳固,另一方面也可借此抬升房屋本身高度来增强建筑的气势同时便于保持房内干燥。墙体结构多以为木柱为竖向结构骨架支撑,木柱之间以芦苇或树枝编织篱笆,表面草拌泥形成围护结构,即“木骨泥墙”,围护结构多具有承重与划分空间的作用,但不防水,且抗风抗震性能较差。屋顶推测为四坡式或两坡式,以木椽为骨架,覆茅草、稻草,有“茅茨土阶”的描述作为对当时建筑的形象概括,夏朝建筑大体上就是这种朴素的形象。传统建筑外形最具特色的特征便是屋顶形态,其构成核心则是内部构架。在样式丰富多样的传统屋顶形态中,抬梁式和穿斗式是最为基本的两种屋架类型^[4]。

2、商代：木构技术的实用化发展

商代建筑在新石器时代的土木结构基础上发展而来,更加适合当时的生产活动实际使用,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比如安阳殷墟的宫殿宗庙建筑扩大了土木建筑的规模,单间木构建筑柱网尺寸可达十几米。商代木构建筑柱网布局进一步规范,甚至部分大型宫殿木构建筑出现了双重柱网结构,其中的柱网形式是在两重结构外圈木柱做承重立柱,内侧小木柱做支撑檐柱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可以隔断下层土地对木构构件的潮气侵蚀,能有效地提高木构件的使用寿命。屋顶屋面部分,推测商代木构建筑已有斜梁、横梁组合型的屋架系统,用斜向的立木延长屋面的长度,增加了屋顶的进深,但仍没有发现成熟的、类似后世屋顶屋架的三角形屋架。此外,在商周的木构建筑方面,常见的夯土墙以及由土坯等筑成的木骨泥墙仍然是主要的墙体构件,但是在建筑的墙面部分有涂抹白色粉刷,并绘制黑白、红、绿色的图案花纹,从而区分身份和社会地位。

3、西周：礼制规范下的建筑体系化

西周时期,木构建筑技术趋于系统化,同时受到礼制文化的深刻影响。陕西周原遗址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典型代表,其平面呈规整的矩形院落,以门塾、前堂、后室为中轴线,两侧配以厢房,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这种封闭式院落布局成为后世中国合院建筑的源头。木构架技术方面,西周建筑已明确区分承重柱与装饰性构件,柱间使用横向的枋木加强连接,梁柱交接处可能采用榫卯锥形,结构整体性显著增强。屋顶技术取得关键突破,西周中期开始使用陶瓦,周原遗址出土的板瓦与筒瓦多用于屋顶檐口,与茅草混合铺设,既改善防水性能,又通过瓦的灰色与茅草的黄色形成色彩对比,强化建筑等级标识。

(二) 原始社会到商周时期木构建筑的演变与特点

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时期,中国木构建筑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原始社会,人们主

要利用天然的木材建造简单的房屋，如巢居和干栏式房屋。这些房屋的结构简单，主要用木柱和木梁作为支撑，用茅草和树皮作为屋顶原料。

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时代的进步，到了夏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木质的建筑逐渐增多，并且结构越来越复杂化，人们开始出现榫卯结构这种木结构建筑的方式，使房屋更加牢固，更加耐用。人们开始使用瓦当以及砖瓦，使房屋更加防水、保温。

在这一阶段的木构建筑主要是为满足人们的基本居住需要而设立的，所以其设计理念偏重于实用性与功能性，结构形式比较简单，建筑材料比较节约，整体上具有简单、实用、朴素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木构建筑方面的技能越来越成熟，建筑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从最开始的单层结构到后来的多层建筑如商代建筑中的高台式结构，可以看得出木构建筑技术由简到繁的演变。

结语

中国木构建筑从原始社会到商周时期的演进历程，不仅是建筑技术的革新史，更是一部镌刻中华文明基因的早期发展史。这一阶段的木构建筑以独特的创造力和适应性，构建起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核心框架，并在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与自然认知的互动中，完成了从生存工具到文明载体的蜕变。中国传统建筑最基本的哲学内涵是“天人合一”，其中蕴含的辩证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起点，树立了“和谐”的意境观[5]。原始先民以木为媒，在顺应自然中创造出独特的生存空间；夏商周三代则以礼为纲，将建筑形制与社会秩序相融合，奠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内核。这一时期的木构技术虽显质朴，却在榫卯工艺、空间布局与材料应用中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为后世建筑体系的成熟提供了基因密码。

木构建筑的演变过程，实则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理性的缩影。其背后蕴藏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因地制宜的生态观与尊卑有序的礼制观，这些文化基因至今仍流淌在中国建筑的血液中。当代建筑实践中，对传统木构智慧的再发现与创新性转化，不仅是文化自信的彰显，更是应对现代建筑困境的重要启示。

站在历史的维度回望，原始社会至夏商周的木构建筑遗产，恰似一株深植于华夏土壤的古老乔木，其根系滋养着千年文明，枝干孕育出东方建筑的独特风骨。对这段建筑史的重构与解读，不仅是对过往的致敬，更是为未来建筑文化的生长寻找可持续的养分。

参考文献:

- [1] 张超,陈彦百.木结构建筑的样式演变[J].山西建筑,2017,43(26):32-34.
- [2] 孔黎明,宋辉.建筑信息模型在中国古代木建筑学习中的应用探索[J].建筑与文化,2008(08):84-85.
- [3] 伍冰,耿晓杰.基于构成主义思想的榫卯结构创新设计探索[J].家具,2015,36(04):51-54,61.
- [4] 范雪峰.云南地方传统民居屋顶的体系构成及其特征[D].昆明理工大学.2005.
- [5] 刘月.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4-9+29.

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Form and Technology of Early Chinese Wooden Architecture

Mao Xiaoxu¹

¹ 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wooden structures have a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formed by them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wooden architecture from the primitive society to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oden architecture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wooden architecture in this period,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wooden architecture in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Keywords: Wooden architecture; Primitive society;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论 1941—1948 年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

单立阳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要: 1941—1948 年间, “边政学”兴起, 民国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的宗旨展开了广泛讨论。时人普遍认同边疆教育应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为根基, 并承认其特殊性, 主张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推动融合。其核心理念是通过教育提高边疆民众的文化水准和国家认同, 形成可动员的国防力量, 并以此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然而, 这种统一导向常带有汉族中心主义色彩, 导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化倾向。部分学者反思应在差异中求统一, 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这一思想交锋折射出民国时期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多元与一体之间的深层张力。

关键词: 边疆教育宗旨; 抗战建国; 中华民族

基金项目: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资助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国边政学研究”(ZL-C2515)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0

近代以来, 边疆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核心词汇。在民国后期(1941-1948年)兴起的“边政学”中, 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围绕“边疆”的各个方面展开了充分而又极具现实感的讨论, 其中对“边疆教育”展开的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一隅, 而是将其视为“对内有关乎文化之交融、民族之团结, 对外有关乎国防之建设、国际关系之调协”^{[1]10}的重要工作, “并非仅限于学校门墙以内之教育, 而是社会改造之教育”^{[1]62}。当前学界对这一时期边疆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涉及到边疆教育政策之演变、边疆教育实践个案、边疆教育代表人物等, 而对边疆教育宗旨的探讨却未见深入, 仅有杨思机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分析了宗旨之演化, 故本文在前人基础上, 探寻这一时期民国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认识, 以期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复杂生成历史的认识。

一、何为“边疆教育宗旨”: 普遍、特殊与过渡

民国知识分子在围绕“边疆教育”展开讨论时, 都需要考虑到一个基本问题, 即在边疆和内地“相去悬殊”的前提下, 如何确立其教育宗旨。是时, 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从事边疆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内地教育有很大不同, 如西尊所言: “我国边疆, 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惜因地处边陲, 交通不便, 且民族复杂, 语言各殊, 人民生活简陋, 笃守宗教, 与外界极少往来, 且历受政治经济之阻力, 以致教育文化一落千丈”^{[1]43}, 吴鼎也指出“边疆以地处边陲, 民族互口, 语言文字均与内地不同, 教育之推进, 确较内地为困难”^{[2]63}。

但是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并不建立在这种特殊性之上, 而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个民族的文化”^{[1]93}这一基础之上。也就是说, 边疆教育只能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教育之成分进行讨论, 其宗旨也自然与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保持一致。1929年,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中华民国之教育, 根据三民主义, 以充实人民生活, 扶植社会生存, 发展利民生计, 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

作者简介: 单立阳(1998—), 男, 汉族, 江苏徐州人,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通讯作者: 单立阳

独立,民权普遍,民族发展以促进世界于大同。”^{[3]100-101}1931年教育部制定颁布的《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也将“依遵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力谋边疆教育之普及与发展”^{[4]830}列为边疆教育的首要目标。王裕凯认为“站在中国民族立场,论民族教育,当然要根据三民主义与政府所颁布的教育宗旨。”^{[5]42}徐益棠在《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一文中强调“故边疆教育之普通的原则,只有一个,此即中央政府所厘定之‘教育宗旨’是也。凡我胞民,均无例外,边民同种,亦须准此。”^{[1]106}曾紫绶在引用了大段清末姚锡光关于“今日定蒙古教育,莫良于蒙古同化之一法”的论述后,指出“今日之情况,尚与昔年无别”,并进一步主张“夫国家办理边疆教育,既与内地同视,则内地国民教育国族教育之宗旨,亦应适用于边疆,俾有所循,以趋正轨,其不适者,应纠正之”^{[1]155-156}刘曼卿也主张“边疆教育要求改进,也必须要‘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以期民族独立,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的教育宗旨去做为改进的根据。”^{[6]143}

在强调边疆教育宗旨与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具有一致性的同时,众多知识分子也认识到边疆教育的特殊性,一是强调其与内地教育的不同,然这种不同主要建立在边疆与内地之不同环境的基础上,并非从边疆教育自身属性出发进行的阐发,如刘守宜指出“少数民族教育和非少数民族教育的分别,好像是多余的。可是,边地环境特殊,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和内地相差很远,又不可不作特别的措施。忽略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等于抹煞少数民族的独立人格。我们并不存心冒犯,别具用心的罪名。然而客观的事实并不允许我们把少数民族教育和普通教育混为一谈。”^{[7]85}二则从“边疆教育”的内在属性出发进行的阐释,如朱家骅。他在思考这一问题时,首先是“将‘边疆教育’中的‘边疆’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边疆教育与一般教育之区别。他指出‘文化的边疆,为教育的对象’,而‘文化的边疆,系指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而言’,具体包括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高山族等‘使用特殊之语文’之族群集中的地域。”^{[1]2-3}朱家骅强调,“边疆教育……与常轨的普通教育不同。普通教育,系一种文化的传授、改进与创造,其文化内容为一元的。边疆教育除保存及传授各族之固有文化或地域文化之外,并须灌输民族国家所需的统一文化与现代文化,其文化的内容为二元的,如何使二元文化同时传授而不相冲突,如何使二元文化趋于一元而创造国族文化之最高型式,则应确守下述两大原则——谋适应,求交融。”^{[1]3-4}也就是说,“边疆教育”的特殊性绝不仅仅在于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教师师资、教学方式等操作层面,更重要地是在于边疆教育面临的对象是一种异域文化,需要解决将这种异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起来的问题,亦即朱家骅所说的“从以异为起点,以求同为终点。求同,非任何一个民族之个别目的,而为整个国族一致之要求”^{[1]4}。凌纯生也强调,边疆教育和普通教育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使“边疆文化国族化”,“对边疆民族予以国家教育,使边民接受现代的文化,同时又能保存其固有的文化”^{[8]62}。

在此基础上,朱家骅还提出了边疆教育的过渡性问题。在《论边疆教育》的结尾,他提出“边疆教育又为不断推进之过程,终极目的,在巩固地理的边疆,改进政治的边疆,融合文化的边疆。目的达成,能事已尽,三十年后,中国将不复有边教之设施乎?”^{[1]11}时任贵州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也对边疆教育的过渡性有所阐发,他在《边疆教育之今后》一文中畅想道:“边疆教育是适应时代与环境需要而兴起的过渡的教育设施。我们希望经过短时期的努力以后,全国国民个个都受同样的教育,整个国家文化水准全面的升高、使得今日努力倡导的边疆教育成为教育史上的一页,边疆教育一词成为过去的名词。”^{[1]178}

二、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内涵认知

在认定“边疆教育宗旨”是“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在边疆地区的具体展开后,民国知识分子围绕着宗旨的具体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杨思机指出“‘边疆教育’作为新的教育类型,承担教育普及和民族融合两重使命”

^{[9]142}，并以时间为序梳理了“民族融合”这一宗旨内涵在不同时期的流变，但是并未进一步展开对宗旨的系统讨论。通过细致解读边疆教育相关文本，会发现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认识始终围绕着“抗战建国”四个字予以展开。具体而言，“抗战”层面，或者说“国防”层面，即以边疆教育加强国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建国”层面即以边疆教育融合多元民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立现代国家。同时人所普遍认同的“抗战与建国并行”一致，知识分子并未将边疆教育的宗旨完全割裂开来，同时对其宗旨的相关讨论中大多隐含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和文明等级论色彩。

（一）“国防”视角下的边疆教育宗旨

早在“九一八”之前，知识分子就提出了发展边疆教育以巩固国防事业。萧剑秋曾提出“筹边十六策”，将教育视为“万事之祖”，“是故文字不同，学之必能贯彻；言语各别，学之亦渐相通，推而极之，大可罗万有而贯三才，小亦可变性情而改气质。”^{[10]46}“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纷起效尤，对于领土之侵略，更明目张胆，不复有顾忌。法占九岛，英窥班洪，既喉南疆独立，又助藏军内犯，一时山雨欲来，风云变色”^[11]。可以说，每个边疆地区都面临民族问题和国防问题，同时两大问题又通过若干环节紧密联系，教育在其中便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对于边疆教育如何与国防产生联系，知识分子的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路径：一是认为教育乃边疆问题的重要一环，边疆问题是国防问题的核心甚至等同于国防问题；二是引入“精神国防”一词作为二者的连接点。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国防”宗旨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抗日。卫惠林在《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一书中分析了边疆问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我们整个边疆皆破碎零落，包含着内政上之弱点与国际间的纠纷，且其住在各民族多未能与内地人民精诚团结。此种事实关系于此次对日抗战之成败，极为明显。”^{[12]23}接着，卫氏指出“欲解决此等边疆问题，完成团结御侮之神圣使命，有两个根本的途径，即普遍的推行民族教育和彻底刷新边疆政治，此二者有密切之关联，惟边疆政治之刷新，必须借民族教育之推行为其前导，为其依据，因为边疆政治制度容有种种障碍不易一时革除者，但民族教育则有以民族战争的神圣要求下迅速推行。”^{[12]24}王一影在对“边民教育巡回施教”进行解读时，强调巡回施教应“以激发边民抗战情绪，提高边民文化水准，养成边民拥护政府服从领袖的概念，暨宣扬总理的遗教及阐扬抗战建国国策为宗旨”^{[1]130}，并提出了10条边民教育巡回施教之要点，其中6条直接关涉“抗战建国”。亦有人大倡“若欲挽救危亡，抵抗强暴，首须巩固边疆，致力于经济之建设，政治之革新，交通之开辟，而尤应注重于教育之发展。教育之效力，虽不若经济政治方面之显著迅速，然而唤起边疆民族奋发图存之精神，实为巩固边疆之基本工作也。”^[13]担任重庆职业学校校长的陆叔昂撰文讨论西南边疆的教育问题时也指出“为求抗战胜利，急宜建设西南，为谋复兴中华民族，更宜建设西南。……教育为建设一切的基本工作，离开教育，就谈不到建设。”^{[14]32}

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将“精神国防”作为连接起边疆教育与国防的桥梁。所谓“精神国防”乃国民政府在精神文化领域所做的抗战宣传，试图提升国人自信心和精神力量以抵御外侮。既然是引导民众抗战精神之发展，因而教育就显得极为重要。黄熙庚主张“边疆教育须以建国信仰为施教中心……对于边疆数千万同胞，无论其精神与物质的生活，均应提高其标准和内地各省一样，所以培养其爱国思想与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使其了解国民应尽之责任，俾能贡献其所有人力物力，共同从事于建国大业，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与国防最前线的任务。”^{[1]115}刘刚甫提出“对于边地一切事业，欲使之向上发展，而对于边民教育，更不能不设法亟为实施推进，俾得达到精神国防之完成”，“欲建设国防，对于边民教育，实不可忽视之要件”^{[15]61}。西尊提出“边疆教育亦应依据抗战纲领为基本教育方针……应注意国民道德之陶冶，民族意识之促进以坚定其抗战之决心，使我全国朝野团结，致

在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领导之下共赴抗建之重责。”^{[1]56}于教育部边疆教育司任职的骆美奂也强调“边疆教育知识建设边疆工作当中的一种工作”，“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边疆建设，就是国防建设，而国防建设，不外乎国防的精神建设，和国防的物质建设两种。两种工作，都需要边疆教育来担负重要的部分，完成主要的使命”^[16]。张廷休提出“内边的边疆教育，首在建立国防的‘精神堡垒’。国无边则亡，故救国必先救边，春秋大义，厥在严夷夏之防，中国数千年来兴废继绝，端赖此义不泯。”^{[1]102}萧文哲系统论述了边疆民族与精神国防之间的关系，指出“今日中日的战争，不仅是政府与政府战，而且是民族与民族战。在这样大的战争中，更要使每个国民振奋精神……从自私自利的怕死心理，改造为救国救民的勇敢心理，造成全国国民皆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下，集中意志，团结力量。……尤其是于动员内地民族的国民精神外，更要动员边疆民族的精神，造成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普遍发展”^{[17]61}。

抗战结束后，然建国任务更巨，时人所言“应知建国的工作，比抗战艰难百倍，务宜集中力量，以求建国事业的开展”^[18]。因而边疆教育绝不因抗战结束而结束，相关人士在讨论中也多对边疆教育之于国防的重要意义有进一步强调。高长柱指出“不善筹边，致使边亡，无边亡国者，即边亡而国防失，国防失则国随之亡矣。是筹边与国防，关系至为密切，故谓筹边即建设国防，无不可也。”^{[19]4}而无论如何筹边，都“必先启迪其民识，推进其文化，改良其政治，增益其建设与生产，务要边疆与中原有同等之发展”^{[19]3}。《华北日报》曾发表社论强调发展边疆教育“不但国力将因而增强，即国防亦可借此巩固，真正强大统一的中华民国，实际就奠基于此”^[20]。曾广铭分析宁属及雷马屏峨边民教育时承认“边教与边防之关系尤为密切”，并进一步分析了边民教育如何在巩固国防方面的功用，不外乎以边教推进民族团结，将边民打造为“国家的干城，国防的生力军”。^{[21]1-2}姚蒸民在分析新疆问题时也强调其国防意义，强化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治理和新疆地区的国防，必须要促进其“现代化”，其关键就在于以教育普及推动“边疆内地化”：“要知边疆较内地为落后，非使‘边疆内地化’，实无法防止外人之侵略，而边疆内地化之主要动力，乃在于教育之普及。”^[22]

总之，无论是战前、战中和战后，知识分子关注边疆教育绝非停留在教育层面，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提升边疆民众的文化素养，增强国家认同感，进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能够为中央政府所使用的国防力量。

（二）“建国”视角下的边疆教育宗旨

辛亥革命后，革命人士很快放弃了以“汉地十八省”为范围的“小中国”的想法，转向了立宪派提出的“五族共和”说。随着边疆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深入，“五族共和”逐渐为“中华民族”取代。尽管在对“中华民族”一词进行概念的、历史的解读时，不同学者往往意见不一。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在试图以边疆教育确立“中华民族”的政治属性，使中华民族理论“负担起民族主义时代论证‘大一统’正当性的重任”^{[23]104}，如徐益棠所言“我辈治边疆教育者，当努力设法消灭各民族隔阂之成见，而为大中华民族唯一单元之团结。”^{[1]110-111}

边疆教育之所以能够推动现代国家之建设，主要在于其两大功用，一是提升民智进而涉及国家建设发展之各个层面。如朱家骅所言，“边疆教育……终极目的，在巩固地理的边疆，改进政治的边疆，融合文化的边疆”^{[1]11}。众多知识分子在讨论中也多将边疆教育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相联系。梁瓯第提出，“作为治边方略之一环的军事、政治、经济。必须和教育连系起来，同时并进，兼容并包才能收事功之效。”^{[1]18}孔祥熙更是在边疆教育会议上提出“边疆建设必须以文化教育的心理建设为起点”，“必须加强教育的文化的实施，启导民智，发扬民德，然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心理建设，才能够成功”^[24]。又如抗战结束后，曹树勋

指出的“边疆教育为边疆建设之一环，边疆同胞自治能力之培养，经济生活之改善，文化水准之提高，必以其人民具备足够之知识为前提，是必先借手于教育，故边疆教育，尤为边疆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之一环”^[25]。郭有守亦指出“改善边民生活，提高文化水准，培养边民国家民族至上之观念，使于中华民族有极强之意志，于政府有极坚信之信仰，进而促进政治经济之发展，充分发挥边民治人力与物力，以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效……胥教育是赖矣。”^[26]

二是有助于“一个民族”之建设。是时，知识分子普遍乐观地相信边疆教育的发展无疑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王一影认为“实施边民教育，是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基本事业，并且是促进中华民族内各部族文化之统一及文化水准之提高的唯一方法”^[1]¹⁴³。高长柱强调实施积极主动的边民教育，“则种族虽各有不同，感情必终趋一致，以历久之无猜，自一道以同化，无免离德离心之患，而有同文同轨之盛。”^[19]⁴

如何通过边疆教育将语言习俗各异的多民族融合为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和政治认同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主要给出了两种选择方式，一是进行同化教育，二是融各家之长以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

就同化教育而言，它与所谓的“同源论”“中华民族宗族论”有着密切关系。“同源论”的出现是学界政界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兴起的理论，其极端形式即为“中华民族宗族论”，其核心在于主张汉藏蒙回等等民族从生物学上来说有着共同的祖先，乃是一个民族，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影响出现了分化。这个理论不仅有国民政府的背书，而且也俘获了一批知识分子“如罗家伦的《新民族观》、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等民族学与民族史著作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释蒋介石的中华民族观，甚至在非汉人士中，很多人也公开认同并阐发这一观点”^[27]¹⁸³。黄熙庚在阐释发展边疆教育以扶植边民自治之目标时，提出“从历史上证明中华民族在最初即见一混合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是有其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统，共同创造的文化；汉人和边民的差异，也只是文化程度的不同。”^[1]¹¹⁶曾任贵州大学校长的回族知识分子张廷休也对所谓“同源说”深表认同，更是直接提出了“中国没有少数民族问题”，认为“汉族的汉，只是一个朝代的代称……现在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其原因完全是政治的习惯的……今所谓夷苗等人，自然是构成整个汉民族的极重要的分子，他们与汉族的关系最为密切，溯其源流可说是同一的民族”^[1]⁷⁶⁻⁷⁷。

不可否认，“同源论”“中华民族宗族论”在国家危机的状态下自有一定价值，它是政府和民间“面对国族沦亡的危局……有意跳脱‘民族之下有民族’这种在逻辑上难圆其说、在政治上自我设限的窠臼；借由否认包括汉族在内各族群的‘民族’身份，塑造有益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整体身份”^[27]¹⁸³的基本方式，但如此一来容易使原本力求提升少数民族现代化水平的边疆教育陷入到“同化论”中，如西尊提出“应尽量推动同化工作。边疆文化落后，兴办教育不但课程内容予以改进以适合抗建及边疆之需要，而于生活习惯暨不良风俗亦应在施教时设法运用，使之同化，尤其苗夷及其他蒙回藏等族尤为急需”^[1]⁵⁷。王一影提出“我们要做施教工作……切实推行新生活运动，转移风气，达到‘夷兵国军化，夷人汉化’的目的。”^[1]¹⁴²由抗战后从政的人类学者陈国钧起草的贵州地区边教实施方案亦直接提出“就地筹款逐年增设苗夷小学校普及至全省各苗夷居住县份，以达到完全同化于汉族，是即苗夷教育完成时期。”^[1]²³⁸

当然，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认同“同化教育”，坚持民族平等的左翼知识分子自不例外，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多次批评过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即便是倾向国民党甚至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知识分子也有相当一部分坚持在边疆教育中尊重少数民族的独立性，否定“同化”或“汉化”说，提出融各家之长以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其中尤以梁瓿第的论述最为系统。在《边疆教育导论》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边疆人民内地人民不是殖民者群与原住民群的对立，而是一种兄弟般的友爱关系”，因而绝对不应该将同化视为实施边疆教育的前提，并指出“人

为的同化……不外是殖民政策之一种……以削足适履的手段，强人所难，决非我国实施边疆教育的基本方略。”^[12-21]在分析贵州苗民教育时，他又提出边民教育应该坚持“同异并施”和“同中有异”，即坚持教育宗旨上的“绝对的一元性”，“边疆教育的实施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定方针，依照中山先生民族平等之原则，由教育力量力图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28]59}。

陈定閔认为中国境内存在着多元文化模式，而边疆民族文化固然有些落后，但是其中蕴含了一定的能量，“我们似乎可以再来一次中国民族文化内在的大交流。以往中国内地人总因为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总抱着一种优越的感觉，以为我们是开化最初的，这个大大的错误，遂形成中国文化走上尽头，今后我们首先应摆掉这偏见，努力吸收边疆文化，尤其要吸收边疆文化的精神，告诉你，我们的文化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值得夸耀的，只有来一次大综合，再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否则只有一任其凋谢下去。”^[29]曹树勋提出“利用教育的力量，改进各宗族之文化、并撷取各种族文化之精华，汇总为中华民族文化，以达文化统整国族融合之境地。”^{[30]88-89}卫惠林则进一步提出了“统一与同化政策必须修正”的口号，认为“对文化政策应一方面不伤害其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交流，以促成其现代化”^{[31]11}。

三、边疆教育宗旨与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历史交汇

民国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的思考绝非是一种空想。一方面，他们提出诸多建议试图影响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的边疆教育政策，另一方面，他们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努力在边疆地区践行其教育理念，将边疆教育宗旨从文字转化为现实。对这群投身于边疆研究和边疆教育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边疆教育绝非仅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化制度安排，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政治工程。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不仅反映了边疆教育本身的复杂性，也充分揭示出民国时期的中国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困境。

（一）追求统一和同一：边疆教育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王珂在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行分析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法是从国家到民族，即按照国家的规模形成民族；而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法则是从民族到国家，即按照民族的规模形成国家。”^{[32]215}相较于传统中国的夷夏之防，在面对已经在中国大地出现近百年的内忧外患交织、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出现危机、国家领土不断被外力侵犯与蚕食的局势，民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力图使“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国公民的共同身份认同，进而形成一股合力以“认中国为其唯一之国家，而不为帝国主义者之谰言所动。”^[33]

胡耐安在对边疆教育问题进行分析时，就特别强调了“一”，他指出：“我中华民国为一整个中华民国，其居处于中华民国国土以内之各民族，早已凝结为一整个之中华民族。……医病医愚，为今日边疆教育之先务。病愈愚治，渐次而及其贫其私，夫然后我中华民族之础石，于以定矣。”^{[34]23}因此，边疆教育的核心就在于塑造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同一，维护中华民国之统一，亦即1939年全国教育会通过之《推进边疆教育方案》中提出的“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35]131}前文提及，朱家骅提出边疆教育“从以异为起点，以求同为终点”，“使二元文化趋于一元而创造国族文化之最高型式”，表明了他对以边疆教育推动民族同一和国家统一的充分自信。在朱家骅这里，各民族文化均有其长处和缺点，“吾人对于国内各族文化之交融，首要在弃其糟粕，撷其精华，将各族文化之优长部分，融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则百川朝海，必能蔚为大观。”^{[1]5}时人对这一观点也多有认同，著名民族学家岑家梧在研究西南民族时就提出“欲言民族之融化，当供其与内地汉人，加速融化，期以汇合各族文化之精华，构成一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新文化”^[36]。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过程，更是一种文化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的形成机制，并由此培

养出坚定信仰三民主义、忠诚于国家政权与中华民族整体的现代国民。

（二）去差异化：边疆教育中的汉族中心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

从知识分子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时人对统一国家之渴望。然而，在传统汉族中心思维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情况下，对“一”的强调极容易滑向对多元的否定和对汉化的认同，即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去差异化”。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在论述边疆教育时倾向于借助消除民族差异，以“宗族”取而代之实现团结的目标。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观念之下，否定多元民族和“民族自决论”自然也就登上台前。《东南日报》发表文章将承认多元民族视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否定中华民族的存在，肯定汉、满、蒙、回、藏、苗等‘族’的存在，是敌人一贯的分化阴谋，它利用了‘民族自决’这一美名，煽动各‘族’独立建国，以便将中国裔割为若干日本的傀儡国。”“我们要否定中华民族之外，还有所谓汉、满、蒙、回、藏、苗等‘族’的存在！”^[37]

在此宗旨和目标的指导下，当时提出的诸多边疆教育方案无疑会侧重对“统一”的强调，如统一语言、统一文字甚至是统一服装。如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提出“边地学校上课时期，教师授课应随通例，一律操国语，教师之不能操国语者，分别抽训或调免。……凡学生国文国语成绩不及格者，纵令他科优越，亦不得升级，学校并须利用寒暑假，设法予以特殊之补习机会”以及禁止使用苗文等^{[38]164}。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状态下，此种方式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进而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抵御外辱提供了支撑，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容易造成边疆民族在文化认同上的反弹，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稳定与和谐的重要隐忧。

（三）控制与冲突：边疆教育中的政府权力与地方间冲突

边疆教育是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机制，它试图借助国家意志的名义控制地方社会并对其进行知识、制度与价值观的重塑。然而，边疆地区所具有的强烈地方性文化传统与复杂的族群结构，使得国家教育项目很难“原封不动”地复制内地经验。这种现实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如何在保证国家标准的前提下，提升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的适应性。

正如前文指出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在坚持国家统一教育宗旨的基础上，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习俗与文化，努力实现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三民主义教育原则的在地化。在国民政府的官方教育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要在国家统一的教育宗旨之下尊重边疆民族的习惯风俗等，不应照搬内地的标准。然而在具体操作中依然会出现冲突，最典型便是“政府官员没有协调好国语、国文教育与民族语言文字教育之间的关系”^{[39]143}。周辉福亦检讨称在边疆地区贸然试行和内地一致的国语国文教育，而不考虑边地的特殊性，那么很容易导致边疆青年“以学习困难而视为畏途，甚或根本不愿入学，反致阻碍正常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不过是教育的工具，并非教育的目的，故权衡轻重，斟酌得宜，对国语教育之推行，实无强迫的必要，至少在国民教育阶段中，应不必强迫学习，可任边生自由选择。”^{[38]208}

不论这种尊重是手段性质还是目的性质，至少是提出了“尊重”。这也就意味着，建基于这样一种边疆教育宗旨之上的边疆教育目标，就不再是借助国家权力控制地方，抹平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实现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间的共存，进而实现全体国民在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统一。因而，边疆教育不再是单向度的国家教化，而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制度性空间。这种立场实际上接近于现代国家理念中“多元一体”的治理原则，即国家既要在制度与政治上实现统一，也必须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种理念尽管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却为后世民族政策的反思与修正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四、结论

边疆教育宗旨的确立和内涵建设,是民国知识分子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努力。回望 1941-1948 年间针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可以清晰地看出近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眼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及在民族国家构建统一认同过程中发生的思想碰撞。在当时国家尚未完全独立、疆域尚未完全整合的背景下,知识分子通过讨论已经规定好的“教育宗旨”试图填补国家认同的空白,实现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的过渡。

民国时期围绕边疆教育宗旨的讨论既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注脚,也是一个持续问题的起点。它不仅为今日民族政策与教育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在不断提醒着“民族国家”框架下多元与一体之关系的复杂性。直至今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新形势下,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实现文化多样性与国家认同的共建,并为世界处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提供给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

参考文献:

- [1]汪洪亮.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合肥:黄山书社,2010.
- [2]吴鼎.边疆教育之现状及今后推进方法[J].边政公论,1941,01(09).
-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1、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5]王裕凯.教育论丛[M].贵阳:熙明印书馆,1944.
- [6]刘曼卿.边疆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7]刘守宜.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D].武汉:国立武汉大学,1940.
- [8]凌纯生.中国边疆文化(下)[J].边政公论,1942,01(11/12).
- [9]杨思机.从“五族共和化”到“中华民族化”:民国时期“边疆教育”的民族交融宗旨解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05).
- [10]萧剑秋.筹边纪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 [11]凌纯生等.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M].南京:中正书局,1939.
- [12]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M].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
- [13]实施边疆教育计划两要点[N].东南日报,1935-08-08(02).
- [14]陆叔昂.西南新建设中的教育问题[J].西南导报,1938,01(01).
- [15]刘刚甫.救亡与筹边[M].汉口:光明印刷商店,1938.
- [16]边疆教育与国防[N].时事新报,1944-01-19(2).
- [17]萧文哲.边疆民族与国民精神总动员[J].精神动员,1940,02.
- [18]李国俊.以开国的革命精神扫除建国的障碍——为庆祝中华民国成立暨三十五周年元旦而作[N].中山日报,1946-01-01(11).
- [19]高长柱.边疆问题论文集[M].南京:中正书局,1948.
- [20]发展边疆教育的重要[N].华北日报,1946-10-28(2).
- [21]曾广铭.宁属及雷马屏峨边民教育的三大使命[J].边事研究,1938,06(06).
- [22]姚蒸民.如何经营新疆(续)[N].时事新报,1946-03-22(03).
- [23]曹为.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J].思想战线,2018,44(05).
- [24]边疆教育会议闭幕 孔副院长出席致训[N].时事新报,1944-01-16(02).
- [25]曹树勋.论边疆教育[J].中央边报,1946,05.

- [26]四川省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川省边地教育实施.成都:四川省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1.
- [27]吴启讷.中华民族宗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M]//黄自进、潘光哲.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 第一册: 领袖的淬炼.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 [28]梁瓿第.贵州的苗民教育[J].边政公论,1944,03(02).
- [29]陈定阔.中国文化的危机[N].中央日报,1948-01-10(05).
- [30]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M].上海:中正书局,1945.
- [31]卫惠林.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J].边政公论,1947,06(03).
- [32]王柯.民族与国家: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33]姚蒸民.如何经营新疆 (续) [N].时事新报,1946-03-22(03).
- [34]胡耐安.从事边疆教育之一拟议[J].中山半月刊,1939,01(08).
- [35]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M].无,1947.
- [36]岑家梧.关于贵州民族之研究[N].前锋报,1948-11-02(02).
- [37]“西南民族问题的检讨” [N].东南日报,1940-06-20(01).
-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 2)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39]张建中.中国近代边疆教育史论 (1901—1949) [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On Intellectuals' Debates over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Frontier

Education(1941 – 1948)

Shan Liyang

(Sichu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China)

Abstract: Between 1941 and 1948, with the rise of “frontier governance studies” (bianzheng xu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ngaged in extensive debates over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frontier education. Most contemporaries agreed that frontier education should be grounded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le acknowledging its distinctive circumstances and advocating ethnic integration on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minority cultures. At its core, this vision sought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tandard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frontier populations through education, thereby forging a mobilizable forc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However, this unifying orientation often carried strong Han-centric overtones, leading to assimilationist tendencies toward minority cultures. Some scholars reflected on the need to seek unity within diversity, aiming to build a “pluralistic yet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This intellectual exchange reveals the deep tension between diversity and unity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the Republican era.

Keyword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Frontier Education; War of Resistance and Nation-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

受事主语“V起来”句的文本体裁考察

顾彬楠¹

(1.东洋大学, 日本 东京 1128606)

摘要: 以往关于汉语属性叙述被动句的研究多聚焦于带被动标记“被”的一类, 而对不带被动标记“被”的属性叙述被动句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为更全面地刻画汉语属性叙述被动句这一句群, 有必要界定无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的范畴, 并探明两类(标记型与无标记型)在语义与语用特征上的差异。本文首先以受事主语“V起来”句为例, 对该句式进行了考察, 并将其界定为无标记属性叙述被动的一个下位句式。然后, 基于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 对该句式进行检索与量化统计, 考察其在不同文本体裁中的分布。最后, 本文比较了两类属性叙述被动句在文本体裁分布上的差异, 并探讨了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 属性叙述被动; 受事主语“V起来”句; 文本体裁; BCC 语料库; 分布差异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1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的“NP + V 起来 + VP²”句根据主语 NP 在语义上充当施事还是受事,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受事充当主语的一类“NP (受事) + V 起来 + VP”句(以下简称“V 起来”句)。在该句式中, 句末的 VP 通常用于描写受事主语 NP 的某种属性。例如:

(1)这个熊好可爱, 摸起来好舒服啊! (微博 BCC)

(2)昨夜的怒火在此刻回想起来显得十分虚假。(余华《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BCC)

(3)松花砚的硬度是其他砚石的两倍, 加工起来十分不易。(《新华社 2003 年 9 月份新闻报道》 CCL)

以上“V 起来”句的主语在语义上都是动词的宾语(即受事主语), 而谓语动词均不带显性的被动标记。位于句末的 VP 则描写了受事主语在“V 起来”表示的动作行为之下所呈现的状态, 或者说话人的主观感受, 并且我们可以从 VP 中读出主语的某种属性。例如, 例(1)中主语“这个熊”是动词“摸”在语义上的受事, VP“好舒服”描述的是说话人(未编码)的主观感受, 同时也唤起了我们对受事主语“这个熊”的“柔软、蓬松、手感好”等属性的联想。

不少研究指出, 例(1)~(3)的受事主语“V 起来”句是一类用来表达主语属性的句式(如 Sung1994; 何文忠 2005, 2007; Han2007 等)。在该句式中, 说话人将视角置于受事, 这一点与被动句相似; 同时, 动词并未采取被动形式, 而仍以主动形式出现, 这又与主动句存在共通之处。此类兼具主动句形态与被动句意义特征的“V 起来”句也被称作“中动句”(曹宏 2004, 2005; 周晓岩·高腾 2007; 余光武·司惠文 2008; 熊学亮·付岩 2013; 付岩 2020; 顾彬楠 2022 等)。另一方面, 若从形式标记来区分, 受事主语句一般可分为带被动标记(“被”“叫”“让”)与不带被动标记(“意义上的被动句”)两类, 因此也有研究将受事主语的“V 起来”句与不带标记的受事主语句, 即意义上的被动句视为同类(Ting 2006; 高秀雪 2011)。

本文聚焦于“对受事主语属性的描写”这一特征, 从叙述类型的角度将“V 起来”句界定为属性叙述被动句。

作者简介: 顾彬楠(1991—),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汉语教育。

² 在该句式中, 用于描写主语属性的句末成分, 除可以由形容词短语充当以外, 也可如例(2)“显得十分虚假”那样由动词短语充当。为行文简明, 本文不再在形容词短语与动词短语作进一步区分, 统一将“V 起来”之后的成分记作 VP。

以往关于汉语属性叙述被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有标记的类型（带被动标记“被”），而对无标记的类型（不带被动标记）的讨论则相对不足。为更为全面地刻画汉语属性叙述被动句，我们有必要：（i）明确哪些句式可归入无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的范畴；（ii）阐明有标记与无标记两类属性叙述被动在语义与语用特征上的差异。围绕以上问题，本文首先从叙述类型的角度，对汉语受事主语句进行再分类；其次，以受事主语“V起来”句为例，考察其在不同文本体裁中的分布；最后，本文试图比较两类属性叙述被动句在使用分布上的差异，并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2 叙述类型视角下的汉语被动句

叙述²可以分为两种性质迥异的类型：事件叙述与属性叙述。益冈（1987）指出，在考察被动句时，有必要区分“事件叙述被动句”与“属性叙述被动句”。前者描述的是在特定时空中发生或存在的事件，如“太郎が兄にしかられた（太郎被哥哥批评了）”；后者则描述受事对象的性质或特征，如“この雑誌は10代の若者によく読まれている（这本杂志常被十几岁的年轻人阅读）”。就汉语而言，李艺（2017：111）认为：不涉及受影响性或物理性作用，而是就主格项的属性加以陈述的被动句，可视为汉语的属性叙述被动句。李（2017）讨论的是带被动标记“被”的类型，例如：

(4) 连环画通常被人们称为“小儿科”，在教学中常常得不到重视。（《科技文献》BCC）

(5) 由于自然原因，通向西藏的道路，被人们称为“天路”，视为畏途。（《科技文献》BCC）

(6) 每期200多份的《科普拾萃》被大家争相阅读。（《福建日报》BCC）

根据先行研究的分析，属性叙述被动句是围绕主格名词短语的属性展开叙述的，谓词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并不对主格项（受事对象）产生具体的物理影响。例如，例（4）和例（5）中的“称为”表达的是人们的评价与态度，并不会对受事主语“连环画”、“道路”产生实际的影响。例（6）中的“阅读”虽表述具体动作行为，但句子旨在呈现“被争相阅读”这一具有现象性与习惯性的状态，因此该句的事件性较弱，亦非对主语“《科普拾萃》”的直接物理性影响。

本文将先行研究中指出的带被动标记“被”的一类视为有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与此相对，例（1）～（3）所示的“V起来”句不带被动标记，因而可将其视为无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由此，受事主语的“V起来”句作为无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与有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共同构成了汉语属性叙述被动句的完整体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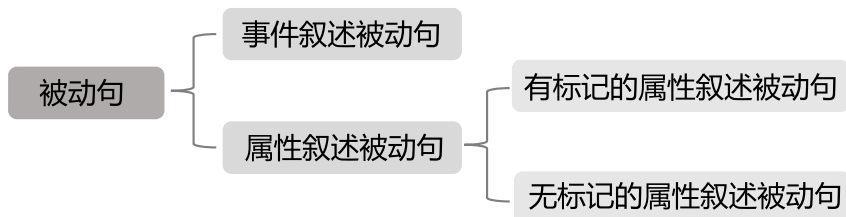


图1 叙述类型视角下的汉语被动句

尽管两类属性叙述被动句都用于表达受事主语的属性，但二者的使用场合与文本体裁呈现出差异。李（2017）指出，带“被”的属性叙述被动句多作为书面语使用，因此像“叫”、“让”这种常用于口语的被动标记一般不能用于此类句式中，如：

(7) 狗又称犬，历来被（*叫/让）人们所喜爱。（《福建日报》BCC）

(8) 笔记本电脑越来越被（*叫/让）人们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品。（《科技文献》BCC）

由于属性叙述被动句的典型语义是非个别、反复性或习惯性的叙述，因此施事多为非特定或不显现，该类句式表达的是不依赖特定时空的恒常性属性。据李（2017：111）所述，即便在口语场合出现，有标记的属性叙述

² 关于“叙述”的定义，本文遵循益冈（1987）的定义。益冈（1987：20）将“叙述”界定为：“以现实世界为对象，对某个事物加以概念化的行为”。

被动句也多限于报道、解说、演讲等正式语境，而日常会话中较少使用。

与此不同，受事主语“V起来”句除可如例（3）那样用于说明主语的材料、性质之外，作为描写主语属性的句式，也常频繁出现在例（1）所示的日常会话中。为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差异，本文将基于BCC（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收集这种无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V起来”句的用例，考察其出现的文本体裁类型，并进一步比较“有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和“无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的分布差异，探讨其成因。

3 受事主语“V起来”句的文本体裁分布

基于BCC（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在设定检索条件“v起来 a”的情况下，共获得5427条用例。我们从中随机抽取500例作为样本，并剔除不符合本文所界定的受事主语“V起来”句的用例（分别对应以下三类情形），对最终得到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

（一）主语NP为施事的用例

“V起来”句亦存在施事充当主语的情形。此类句式描写的是施事在动作行为下所呈现的状态。由于与受事主语“V起来”句在形式上相同，以往研究中也有学者主张将二者归为同一构式（张德岁2011）。而蔡淑美（2012：14）则认为，尽管两类构式相关，但二者在各构成成分的语义指向³与语法特征⁴上存在差异，应视为同形异构（homographic）。鉴于本文聚焦于受事为主语的“V起来”句，凡如例（9）、例（10）所示主语为施事的用例均予以删除。

（9）她笑起来真的好迷人。（唐瑄《傲气少主妙千金》BCC）

（10）她身上散发着河边潮湿的气息，走动起来轻得像片羽毛。（王朔《痴人》BCC）

（二）“V起来+VP”作定语的用例

当“V起来+VP”充当名词性成分的定语时，其结构与本文讨论的“NP（受事）+V起来+VP”不同，因而我们将凡如例（11）、例（12）所示之例一并剔除。

（11）这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琐碎的问题。（《科技文献》BCC）

（12）有个女演员叫陈妍希，然后……就觉得是个笑起来可爱至极的女生。（微博BCC）

（三）“V起来”语义虚化的用例

本文考察对象中的“V起来”不涉及语义虚化。凡“V起来”已虚化，即动词不表达本义，仅表达说话人态度或者推测的例子，如例（13）、例（14），均从数据中删除。

（13）他——我这一位旧友——和我已经有七八年不见了，说起来实在话也很长。（郁达夫《杨梅烧酒》BCC）

（14）算起来还是我亲自教他打高尔夫的。（毛姆《刀锋》BCC）

上述例句在形式上与受事主语“V起来”句同形，但其中动词“说”、“算”并不表达真实发生的动作行为“说话”和“计算”，即这两个动词已失去实义，仅承载语气或推断功能，故需与本文讨论的“V起来”句加以区分。

³ 在受事主语“V起来”句中，各成分的语义指向可分为下列三类：

（i）VP指向主语NP

例：会场的巨型圆桌看起来像个足球场。

（ii）VP指向“V起来”（即指向由“V起来”表达的动作行为）

例：这个案件调查起来非常困难。

（iii）VP指向未编码的施事

例：看起来容易的事儿，有时做起来才会发现其实很吃力。

另一方面，在施事主语的“V起来”句中，各成分之间的语义指向基本只有一种，即“V起来”与VP共同指向主语NP。

⁴ 蔡淑美（2012：15）认为，施事主语的“V起来”句主要描写具体事件、活动，叙述的是特定而具体的活动过程，因此并不表达施事主语的属性。

剔除上述三类情形后，有效样本为 237 例。其文本体裁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事主语“V 起来”句的文本体裁分布

文本类型	用例数量	用例占比
微博	101	43%
新闻、科学文献	90	38%
文学作品	46	19%

其中，该句式在新闻和科学文献中的分布详情如表 2 所示。

表 2 受事主语“V 起来”句在新闻、科学文献中的分布详情

文本类型	用例数量	用例占比
《科技文献》	37	41%
《人民日报》	25	28%
《文汇报》	12	13%
《福建日报》	15	17%
《都市快讯》	1	1%

在 237 例有效数据中，微博所占比例最高（43%）。除例（15）这类说明主语材料、性质的用法以外，像例（16）和例（17）这类日常会话中描写主语属性的用法也很常见（关于“V 起来”在会话体中高频使用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节详述）。

（15）鞋带是针织、塑料制成的，系起来轻松方便。（微博 BCC）

（16）“这个熊好可爱，摸起来好舒服啊！”（再引）

（17）“玫瑰奶茶喝起来有种幸福的感觉，好好喝。”（微博 BCC）

此外，“V 起来”句在解释性较强的科学文献（例 18）、新闻报道（例 19）以及描写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例 20）中亦有显著分布，三者合计约 57%。

（18）两个核桃握在手里，稍微用劲儿一捏，皮破出且桃仁完整，此核桃吃起来甜脆香嫩。

（《科技文献》BCC）

（19）1992 年我们着手兴建外向型工业加工区，这是个新事，办起来困难很多。（《人民日报》BCC）

（20）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

（钱钟书《围城》BCC）

综上所述，“V 起来”句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新闻报道等描写性、解释性强的语境中，作为对主语属性进行描写的句式，也广泛用于日常会话中。

4 两类属性叙述被动文在使用情境上的差异

结合上一节的考察结果，我们可将受事主语“V 起来”句界定为无标记的属性叙述被动句，并将其与有标记的属性叙述被动句视为一种平行结构。两类句式在使用情境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有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多见于书面语，对受事对象的评述较为客观；而受事主语“V 起来”句既见于书面语，也常见于日常会话，其表达的评价往往带有较强的说话人的主观色彩。两类句式在使用情况上的差异，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类属性叙述被动文在文本体裁上的差异

差异	有标记的属性叙述被动句	无标记的属性叙述被动句
使用文体	书面语	书面语、口语
文本体裁	新闻报道、演讲	微博、新闻报道、文学作品
主观性	相对客观	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如表3所示,两类属性叙述被动句在描写主语属性时所体现的主观性程度不同。对此,本文援引 Langacker (1991) 提出的“识解 (construal)”概念加以说明。“识解”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从说话人的认知活动出发,用以解释语言结构呈现多样性的原因,并揭示人类认识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按照 池上 (2011) 的划分,“识解”可分为主观识解 (subjective construal) 与客观识解 (objective construal): 前者指说话人将自身置于欲言说的事件之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来体验描述事件;后者指说话人将自身置于事件之外,以旁观者、观察者的立场对事件作客观化的描述。

如第2节所述,有标记的属性叙述被动句常用于表述非个别、反复、习惯性的事件,施事多为非特定的人。尽管施事被压制,但通过被动标记“被”,我们仍可推知施事的存在。在此框架下,说话人仿佛立于事件之外,以旁观者视角对包含施事在内的整个事件加以相对客观的描述。与之相反,无标记的属性叙述被动句“V起来”句不与“被”共现,其主语不仅在意义上充当受事,还起到诱发事件发生的作用⁵。在“V起来”句中,施事被完全压制而不予编码,且该“施事”往往是总称性的(并非特定个人)。因此,“V起来”句整体获得一种总称性解读,即“V起来”句表达的主语属性对“任何人”(包括说话人)都是一样的。此时,说话人实际上将自己与句中未编码的施事同一化,置身事件之中,以更主观的方式观察与评述事件。

除此之外,“V起来”句所体现的主观性还与VP成分的性质相关。该句式所描写的主语属性,既包括主语本来具备的固有属性,也包括通过语境突显的临时属性。由于VP用于对主语属性进行描写与评价,因而常由状态形容词短语或带评价色彩的动词性表达充当。例如:

(21) 把鱼放在油里炸,炸到金黄就好了,吃起来脆脆的。(《菜谱锦集》CCL)

(22) 大腿摸起来冰凉,身上没有一个地方不出汗。(微博 BCC)

(23) 照片上冥王星看起来像一个足球。(《1996年人民日报》CCL)

(24) 写作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运用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微博 BCC)

关于状态形容词,朱德熙(1956)指出:形容词的复杂形式所表示的属性,往往与一种量化观念或说话人对该属性的主观估价相关。例(21)和例(22)中的“脆脆的”、“冰凉”分别表达了“脆”“冷”的程度之高,可读出评价的主观性;例(23)和例(24)中的“像一个足球”、“是非常困难的”亦是对主语属性的评断:前者为由“像”引导的比喻句,后者为表达言者判断和立场的“是……的”句,均体现出较强的主观性。

5 结语

本文将受事主语的“V起来”句界定为无标记的属性叙述被动句的一个亚型,考察了其文本体裁的分布状况,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与有标记的属性叙述被动句在使用分布与主观性上的差异及成因。本文虽聚焦于“V起来”句,但与属性叙述相关的其他无标记被动句(如受事型“V得”句、主谓谓语句、供用句等)在形式、语义及属性表述机制方面的独有特征,仍有待系统性地探讨。为更全面地建构“属性叙述被动句”的理论框架,后续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无标记属性叙述被动句的范畴内可涵摄的构式范围,细化有标记和无标记两类在语义与语用维度的对比指标,并在分类化与体系化的视角下推动整体整合。

参考文献:

- [1] Sung, Kuo-ming. Case Assignment under Incorporatio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94.
- [2] 何文忠. 中动结构的界定[J]. 外语教学, 2005(4): 9-14.

⁵ “V起来”句在以往的研究中普遍被视作典型的中动句,该句式表达的是受事主语在某种动作行为下显现出某种属性。中动句是中动语态的句法表现形式之一,中动语态也被称作“反身态”,表示某一行为与行为的主体具有密切关系:或行为涉及主语本身,或行为因主语而发(威雨村 1993)。中动语态的这一特征在“V起来”句上表现为:受事主语所具有的属性促使了事件的发生。在“V起来”句中,主语不仅是谓动词意义上的宾语,也是整个句子所表达的属性的主体,同时该受事主语所具备的某种“属性”是造成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顾彬楠 2021:40)。换句话说,受事主语“V起来”句的成立与主语的属性密切相关。例如,

- [3] 何文忠. 中动构句选择限制的认知阐释[J]. 外语研究, 2007(1):6-11.
- [4] Han Jingqua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D].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 [5] 曹宏. 中动句对动词形容词的选择限制及理据[J]. 语言科学, 2004, 3(1):11-28.
- [6] 曹宏. 中动句的语用特点及教学建议[J]. 汉语学习, 2005(5):61-67.
- [7] 周晓岩, 高腾. 最简方案下的中间结构生成分析[J].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07(1):51-55.
- [8] 余光武, 司惠文. 汉语中间结构的界定——兼论“NP+V-起来+AP”句式的分化[J]. 语言研究, 2008(1):69-78.
- [9] 熊学亮, 付岩. 英汉中动句的及物性探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3):3-12.
- [10] 付岩. 句式语法视域下的汉语中动结构[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11] 顧彬楠. 中間構文“NP(対象)+VC+VP”の位置づけ—「評価義」の考察から—[J]. 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 2022a (24):32-46.
- [12] 顧彬楠. 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中間構文の文法化—共時的な視点から—[J]. 現代中国語研究 2022b(24):76-88.
- [13] Ting, Jen.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Pre Syntactic Approach Concentric[J]. Studies in Linguistics, 2006, 32(1):89-117.
- [14] 高秀雪. 再谈汉语中动结构的界定[J]. 现代语文, 2011(4):112-116.
- [15] 益岡隆志. 命題の文法——日本語文法序説[M]. くろしお出版, 1987.
- [16] 李藝. 現代中国語の“被”受動文——日中対照研究からのアプローチ——[J]. 神戸外大論叢, 2017(2):65-93.
- [17] 张德岁. “VP+AP”结构与中动句关系考察[J]. 汉语学习, 2011(5):27-34.
- [18] 蔡淑美. 汉语广义中动式的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D].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2.
- [19] 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0] 池上嘉彦. 日本語と主観性・主体性[A]. 主観性と主体性, 2011:49-67.
- [21] 池上嘉彦. 日本語におけるく好まれる言い回し>としてのく主観的把握>[J]. 人工知能学会誌 2011, 26(4):317-322.
- [22] 朱德熙.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A]. 语言研究, 1956(1):83-104.
- [23] 戚雨村等. 语言学百科辞典[Z].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3.
- [24] 顧彬楠. 中国語における中間構文の主語に関する考察—動作主性を中心に—[J]. 漢語与漢語教学研究, 2021 (12):37-47.

A study on the Text Genres of the Patient-as-the-Subject constructions “V qilai”

Binnan GU¹

¹ Toyo University, Tokyo 1128606, Japan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Chinese attribute-descriptive passive constructions have concentrated mainly on the marked type formed with the passive marker *bei* (被), while the unmarked type—passive-like sentences without an overt passive marker—has received comparatively far less attention.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is phenomenon, it is necessary to delineate which constructions can be included under the category of unmarked attribute-descriptive passives, and to clarify how the two types of attribute-descriptive passive differ in their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roperties. We first identify the patient-as-the-subject construction “V qilai” as a subtype of the unmarked attribute-descriptive passive. Using the BLCU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inese Corpus (BCC), we collect and quantify the usage of this construction and examine the text genres in which it occurs. Finally, we compare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of the two types and explore the reasons underlying their differences.

Keywords: Chinese attribute-descriptive passive construction; patient-as-the-subject construction “V qilai”; text genres

从昆德拉到戴维·洛奇看“复调理论”的不同侧面

鄢靖雯¹

(1.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 昆德拉与戴维·洛奇, 作为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和批评家, 共同展现了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热切关注。两者在相同的内在肌理下, 通过各自独特的理论参照框架与个人创作实践, 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展开了富有深度的对话与互动。昆德拉以其个人的音乐化创作手法, 巧妙地将批评与创作融为一体, 从而实现了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创新性诠释与拓展; 而戴维·洛奇则聚焦于“对话性”, 深入探讨了创作与批评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文学批评与文化创作之间存在显著鸿沟的时代背景下, 昆德拉和戴维·洛奇通过批评与创作的双重实践, 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理论支点, 丰富了复调小说理论的学术内涵, 探索小说的根本精神。

关键词: 复调; 文学理论; 昆德拉; 戴维·洛奇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2

在结构主义理论的时代背景下, 研究焦点已从单一文本的特性分析转向了对更为普遍、共性特征的探讨, 这些共性特征包括符号的编码机制、社会习俗以及规则体系。这一转变淡化了作者的个人创造能力, 强调了读者在阐释文本意义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文学批评逐渐走向专业化、学理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创作者与批评家之间的疏离。米兰·昆德拉和戴维·洛奇拥有小说家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 成功地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融入到自身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 从而架起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桥梁。同时, 根据不同的理论借鉴和启示, 为自己的小说创作设立“自我”的特质, 昆德拉以“复调性思维”扩大“复调”的含义, 对小说创作进行技术性的革新, 戴维·洛奇则通过发展复调小说理论, 使用“对话性思维”破除批评与创作的鸿沟。二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将巴赫金的小说诗学融入到创作与批评之中。

戴维·洛奇自上世纪80年代起, 深入研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1981年首次发表了一篇详尽论述巴赫金小说理论的论文, 之后持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汇编成册, 出版了名为《巴赫金之后》的著作, 可以看出戴维·洛奇对巴赫金理论的认同和推崇; 昆德拉则是通过对布罗赫作品的剖析发现了小说叙事中的独特节奏与多声部特质, 他将这一发现提炼并命名为“复调小说”并将这种复调意味发展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 进一步丰富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在昆德拉的文学创作中, 他巧妙地运用了多样化的复调手法, 这些手法不仅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共同营造出一个内在和谐、相互激发的宏大复调景象。这种景象不仅体现了作品内部的深度与广度, 更通过不同复调形式的交织, 形成了一种丰富而统一的艺术表达。同时,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中也全面阐述自己的“复调小说”创作原则, 进一步彰显了昆德拉独特的文学风格与创作理念, 形成文学创作的大复调观。^[1]

两位学者的实践表明, 复调理论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法, 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同时, 复调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 他们的作品和论著不仅丰富了文学理论领域, 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启示。因此, 研究米兰·昆德拉和戴维·洛奇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复调理论的内涵和价值, 还能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新的思路 and 方向。

一、复调

(一) 从音乐到小说

复调音乐是一种多声部音乐结构, 它建立在横向思维基础上, 通过将具有独立意义的多层旋律线按照对位法

作者简介: 鄢靖雯(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理论。

则加以纵向结合而构成。^[2]从复调音乐的历史脉络中来看,其源于宗教礼仪并吸收赞美歌与民歌的特点汇集而成,复调音乐最初的形态被称作奥尔加农,其形成正是基于圣咏作为固定旋律的运用。继奥尔加农之后,西方音乐史上涌现了多样化的复调音乐形式,包括克劳苏拉、经文歌、赋格以及复调幻想曲等。复调小说理论源于巴赫金,他从音乐学中借用“复调”这一术语,来精准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独特诗学风貌。这一理论旨在强调其小说结构的多重性和对话性,进而与传统独白型小说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从“复调音乐”到“复调小说”的演变,并非指的是音乐直接移植到小说中,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并不直接运用音乐艺术的音符作为叙述的媒介,其根本工具依旧是语词,通过仿效音乐艺术的属性,在小说内容的深度和形式的呈现上,追求一种与音乐相媲美的美学效应。

复调小说根据对音乐本体和音乐形式的不同效仿,又被分为对话模式与音乐模式,对话模式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为代表,强调人物之间、人物与作者之间应当存在着合理、平等的对话关系,核心观念则是“意识”的独立性;音乐模式从形式上直接模仿了复调音乐,以昆德拉的创作为代表,这种模式的存在不仅通过昆德拉的文学创作实践得以展现,更在作家的自我阐释和剖析中得以深化和扩展。^[3]而这两种模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创作者的小说观,引领复调小说理论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二) 巴赫金复调理论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建立在其诗学核心词“对话”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民间文化》这两部作品的探讨,揭示了复调小说的文化起源、文学传统的继承、历史发展中的演变以及其基本特性。巴赫金在深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强调了一个显著特征,即作品中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所呈现的独特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与欧洲传统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赫金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将小说划分为两大截然不同的文体类别:独白小说与复调小说。

在传统的独白体小说中,作者占据主导地位,而主人公则成为被描述的客体。主人公的所有行为与思考均受限于作者的观察视野,整部小说的构建完全遵循作者的预设与安排。巴赫金阐释道:“小说的形象体系根植于作者的世界观之中,而这个世界对于主人公而言,是一个外在且客观的存在。为了构建这样一个世界,包括其中的多元观点与最终评价,一个稳定且外在的作者立场及其观察视野是必不可少的。”^[4]在这种小说模式下,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被牢牢地嵌入到作者的意识框架之中。这意味着主人公的意识形态完全由作者来定义和描绘,它无法从内部突破作者设定的意识界限。巴赫金将这类小说命名为“独白型小说”,并指出欧洲众多小说均归属于此类别。巴赫金还深入探讨了独白体小说中的对话现象。他认为,这种对话在统一的结论下呈现出一种静默的形态,即虽然存在对话的元素,但这些元素最终都服务于一个统一的、由作者设定的结论。

总的来说,巴赫金复调理论有以下特征:首先,从作者层面上看,强调作者与主人公独立、平等的关系;其次,从语言角度分析,对话是表现意识的载体,所以对话原则在复调小说不可或缺;最后,从形象塑造层面看,主人公形象塑造的重心应落脚于思想。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是将复调音乐作为一种现象来类比复调小说,指出文本结构的多元化和意识的独立性,其理论核心落脚于文本内部,与音乐本身及读者大众仍旧保持一定距离。

二、昆德拉的复调思维

(一) 文体的“复调”

昆德拉在其批评实践中,为“复调小说”赋予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他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进行技术层面的深入剖析,揭示出了这部小说中的三条故事线,这三条线索各自独立,足以构成三部完整的小说。然而,在布洛赫的创作中,昆德拉看到更为多元的小说表现,小说中出现了五种不同的类别,包括小说、短篇小说、报道、诗歌、随笔,共同构成了复调小说的复杂纹理。昆德拉进一步提出“小说对位法”,他所理解的“小说对位法”是一种哲学、叙述和梦幻的和谐统一。这种对位法包含两个核心原则:首先是各条线索之间的平等性,它们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每个故事线都承载着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是整体的不可分割性,这些看似独立的故事线在作者的巧妙编织下,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

昆德拉的作品和批评实践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通过新的叙事策略,他成功地将沉思、故事与想象熔铸于一炉,超越了传统文体间的界限,其作品交织了论文的严谨、小说的叙事、自传的坦诚、历史的厚重以及幻想的无垠,创造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综合性散文”。昆德拉对“复调”的诠释,并非与巴赫金对“多声部”的解读完全一致。从隐性层面来说,昆德拉并非简单地将“复调”视为“不同声音各自不同地演绎同一主题”;从

小说显性结构的维度审视,其目的并非呈现为多主题、多线索交织的复合结构或模式。他所提出的不同文类在一部小说中的共存,不仅是对布罗赫思想的归纳与总结,更是其小说创作中的一大创新,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前人的概念框架。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框架,展现了更为复杂和多维的叙事手法,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二) 音乐化的个人创作

在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与理论阐述中,音乐不仅被频繁地用作案例进行剖析,更成为了他作品创作的灵感源泉。在《小说的艺术》中探讨复调时昆德拉提出“将小说比作音乐并非毫无意义”^[5]可见,昆德拉将音乐融入小说创作,同时文字也成为了他表达音乐情感、追求音乐境界的另一种方式。在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中,除了直接提到音乐本体以外,复调音乐的模式也直接构成他的小说文本。“昆德拉力图使小说全方位地具备音乐的外观,如旋律、节奏、变奏、速度等。”^[6]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均衡的线索布局共同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具体而言,第一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托马斯的生活轨迹,而第二章和第四章则深入剖析了特丽莎的内心世界。此外,第三章和第六章则讲述了弗兰兹与萨宾娜之间的故事,故事线索在第七章中得以交汇和升华,围绕“轻”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小说中的对位法不仅体现在各章节之间的结构布局上,更深入到每个章节的内部构造之中。特别是在第六章中,这种对位法的运用达到了高潮。这一章节不仅包含了关于斯大林儿子的历史片段、对神学的深入思考,还涉及了亚洲某次政治事件的描述,以及弗兰兹在曼谷的悲剧性死亡和托马斯在波西米亚的安葬。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在“媚俗”这一主题的统领下,被巧妙地串联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内容和深层意义。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叙事作为传统小说的核心因素,不仅承载了思想的基础,更成为形式的主旋律。哲学则深入小说的内核,揭示了其精神本质和价值追求。诗歌则赋予了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邃的精神意蕴,而音乐则作为小说的结构性策略,巧妙地串联起其他元素,使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

无论是的多样化文体还是音乐化的个人创作,都成为了昆德拉复调思想的组成部分,所展现的音乐化特征,不仅凸显了其独特的叙事手法,更成为了其小说技法 and 美学追求的重要标志。昆德拉的“复调”理论拓展了小说这一文体的表现范围,使小说承载更多的审美、思想内容。从表达内容看,昆德拉将音乐体验与音乐模式注入到小说文本和结构中,从学术层面上看,文本创作与对自我创作的批评实践在昆德拉的笔下一直和谐共存,“伟大的复调作品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各生物的均衡,没有哪一部分处于支配地位,也没有哪一部分仅仅作为陪衬。”在昆德拉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他巧妙地将小说、哲学、音乐与诗歌四大艺术领域进行了深度融合与交织,共同构筑了一部多维度的交响乐。这种交融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不同质素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相互对话、相互渗透,在解构的过程中实现新的重构,米兰·昆德拉既是复调理论的延续者,又是复调思维的实践者。

三、戴维·洛奇的对话原则

(一) 对话性思维

在巴赫金的理论兴起之前,戴维·洛奇已然展现出一种初步的对话性思维方式。在阐述其小说创作理念时,他明确指出,他的作品根植于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两种价值观的交锋与碰撞,以及职业等领域的矛盾冲突。分享个人的文学理论观点时,戴维·洛奇坦言自己并非坚定信仰某一学说的信徒,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接纳并体验了不同思想的激荡与碰撞,他坚信每一种理论都蕴含着其独特的真理价值。在吸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后,戴维·洛奇提出了新的复调观点,即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创作复调小说,打破了传统作家对话语权的垄断,使得文本内部的其他声音得以更为生动和戏剧性地相互交织。在戴维·洛奇的对话小说中“互文性的意义显然在于形成两个或多个主体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关乎,社会现实,关乎人文价值的话题。”^[7]在运用巴赫金理论进行作品分析时,他指出尽管劳伦斯在其小说中坚持使用权威叙事者来构建故事框架并与读者沟通,但洛奇认为,语言风格和语域的多样性并非复调小说的核心要素。^[8]复调小说的真正精髓在于作品中并置的、对立的对话角度,这些角度间的互动和冲突构成了文本的深层结构和独特魅力。

戴维·洛奇在自己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对上述的复调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运用,在其批评著作《小说的艺术》的《以不同口吻讲述》这一章中,以概述小说与时代的适配性入手,分析语体风格,多声部的杂烩与集中,描写出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戴维·洛奇认为对话是小说表现生活的核心。他认为复调理论的核心在于其对话性和多元性,这种对话性体现在作品内部不同声音、观点和立场的共存与交锋,这些声音并非孤立的,而是相

互交织影响,共同构建出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文本世界。这种对话性不仅体现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中,也体现在作品的整体结构和叙事策略上,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多声部、多层次的复调效果。

戴维·洛奇小说创作观集中体现在他对语言的重视中,由于受到新批评理论与雅各布森的影响,前期戴维·洛奇在分析小说的过程中,采用隐喻和转喻理论进行语言文体学的深入剖析与分类,将小说的研究焦点聚焦于语言文体学的视角。其核心观点在于将小说研究的复杂性问题,简化为语言层面上的探讨,强调小说语言的单一性。戴维·洛奇主张对于小说的解析和探讨,应当首先从小说的语言构成出发,通过细致的语言分析,深入揭示其内在的思想,并在1966年推出首个理论著作《小说的语言》,详尽地阐释小说语言的分析方法。在吸收巴赫金理论后,戴维·洛奇反思所依托的理论本身,所出版的《小说的艺术》以及《巴赫金之后》改变了对语言和对话的单一化看法,对巴赫金的小说话语类型分类进行阐释,认为双向的话语是巴赫金最有价值的观点,因为所包含的是所有的话语,指涉现实世界中的某人某物,也指涉另一个说话人的语言行为。^[9]从洛奇本人的理论变迁来看,巴赫金诗学的独特魅力与强大生命力,其背后的“对话”与“争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洛奇在巴赫金的影响下,不仅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对话,更深入地与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对话,特别是对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反思,认识到了先前理论不足。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也是洛奇在巴赫金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独特“对话思维”。与他人的对话,犹如巴赫金所描述的“所写人物的对话”,而与自我的对话,则更进一步,迈向了巴赫金所提及的“双声话语”的境界,即一种内在的、深度的自我对话与反思。

(二) 创作与批评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处于两级,二者的关系总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并非单纯的寄生或依附,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生状态。^[10]在这一共生过程中,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彼此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时常会遭遇作家和文本的抵制与挑战。具体而言,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评价,其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文学创作所提供的多样化资源和广阔空间,文学创作也在文学批评的反馈和指导下,不断寻求创新和突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对文学批评持有一定的警惕和抵制态度,因为他们担心批评的介入会破坏他们创作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文本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和封闭性,对外部批评的介入持有一定的排斥态度。这种抵制和排斥,使得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

戴维·洛奇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见解从他的著作中可知,他主张文学理论应当回归其本质,即文学本身,并强调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互动与对话。这种互动不仅有助于批评家更深入地理解作品,还能为作家提供有价值的反馈,促进文学创作的改变。同时,文学理论不应被学术界束之高阁,与普通读者隔绝,它应该与读者大众建立和谐的对话关系,使文学理论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成为公众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桥梁。

为了践行这一理念,戴维·洛奇在90年代撰写了《小说的艺术》一书,旨在向大众普及文学理论。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们可以明显觉察到标题之间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开头”、“书名”、“章节”、“叙事结构”和“结尾”等标题相互衔接,构成了文本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进一步观察,诸如“象征”、“动机”、“视角”、“讽喻”和“互文性”等主题,具有深入研究的潜力,足以构成学术论文的核心内容。然而,考虑到这部作品旨在吸引广大读者,提升他们对散文小说的理解和欣赏能力,并展示新的阅读可能性,因此其表达方式未采用学术论文的严谨和深奥。在探讨某些议题时,戴维·洛奇融入自己的作品片段和写作体验,将批评理论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正如洛奇所言,“若缺乏适当的工具,发动机便无法拆解”,他同样运用了一系列概念和术语,追溯其词源,梳理其历史脉络,并引入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为讨论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深度。在这部作品中,洛奇将读者与学者的对话、批评与创作的对话展现的淋漓尽致。

戴维·洛奇属于学院派的小说创作者,凭借其对文学研究的独特敏锐度,在自己的创作中巧妙地融入了大量批评性话语,在其对话性小说理论体系中,深化了对话性的美学理念。将对话这个概念从文本内部解脱出来,拓展至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建构了小说创作与批评、大众与学术界、读者与作者,乃至各类文学理论流派之间一种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互动对话机制。

通过探讨昆德拉与戴维·洛奇两位作家对巴赫金复调理论借鉴与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如何通过不同的侧面与各自独特的视角与巴赫金的理论进行对话,并将之相互融合,从而共同描绘出一个全景式的复调理论图景。

首先,从第一层复调理论的外壳来看,昆德拉与戴维·洛奇均在小说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上,对小说本身的革新进行了实验与探索。昆德拉通过将自己的理论思考融入创作之中,成功地实现了个人化的“复调书写”,他不

仅是一个创作者，更是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出现，用个人经验填补了创作与批评之间的鸿沟。而戴维·洛奇则通过哲理性的思考，提炼出了“对话性原则”，将这一原则作为复调理论的中心，进一步丰富了复调理论的内涵。

其次，转向第二层复调理论的核心。从小说文本内部的问题杂糅和个人的“音乐化”创作，再到以批评实践强调创作和读者的关系，昆德拉与戴维·洛奇都侧重于小说美学的多元主义。二者都在不断拓展小说新的疆界，探索一种可以使小说保持持续生命力的方法。不同的文体、话语、思想在小说领域中互动，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展开自由的对话活动，多重话语的交织以及多样的创作方式，让文学艺术更加多元，同时文学所能表达的内容更为丰富。

最后，第三层则是复调理论的精神。昆德拉与戴维·洛奇站在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文本与创作这一中介，构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文视野。他们围绕创作者、文本、小说以及各类问题之间的讨论，构建了一个复调精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本与作者、创作与批评、理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式阐发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特有的复调思维和思想对话。这种复调精神不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与批评的实践中，更体现在他们对于文学、艺术以及人类社会的深刻思考中。

参考文献：

- [1]李凤亮.大复调：理论与创作——论米兰·昆德拉对复调小说的承继与发展[J].国外文学,1995(03):63-73.
- [2]于苏贤.复调音乐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5.
- [3]王钦峰.复调小说的两种模式——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一个补充[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02):23-29.
- [4][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1.
- [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83.
- [6]王钦峰.复调小说的两种模式——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一个补充[J].湛江师范学院报,2000(02):23-29.
- [7]罗贻荣.戴维·洛奇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J].外国文学研究,2022,44(03):47-58.
- [8]范莎.实践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大卫·洛奇《追随巴赫金》评介[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06):40-49.
- [9]王翠.戴维·洛奇文学批评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7.
- [10]宋艳芳.寄生、共生还是对抗?——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系转变及当代英国“学院小说”[J].当代外国文学,2006(02):96-104.

From Kundera to David Lodg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 of Polyphony

Yan Jingwen¹

¹*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handong, Qingdao 266000, China*

Abstract: Kundera and David Lodge, as highly regarded novelists and critics, jointly demonstrated a keen interest in Bach Jin's theory of polyphonic novels. Both have engaged in a profound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with Bakhtin's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through their uniqu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rameworks and personal creative practices, under the same internal texture. Kundera cleverly integrated criticism and creation through his personal musical creation technique, thus achieving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expansion of Bakhtin's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David Lodge, on the other hand, focuses on "dialogic" and delves in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on and criticism. In the context of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creation, Kundera and David Lodge enriched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of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and explored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novels through the dual practice of criticism and creation, using Bakhtin's polyphonic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ulcrum.

Keywords: Polyphony; Literary theory; Kundera; David Lodge

孟子关于国政的道德论争

沈奕昊

(澳门大学, 中国 澳门 999078)

摘要: 本文试从《孟子》原文出发, 探求孟子的议述中关于国政的部分, 从而发现其中基于道德的国政治理主张。本文认为, 孟子以“义”和“利”的概念为单独的构成物, 并以道德言说中以民众的恒产为道德培养的前提, 这类的主张折射出孟子的道德体系在情境之下的实益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国政治理中反映为一种基于民本的道德判准, 构建了一种折回式的政治合法性路径, 但对于丘民又维持了一种赋予式的治理逻辑。同时, 孟子的道德主张包含了“孝悌”的道德始由和“仁义”的道德核心, 成为一种依从于道德自觉的道德体系。孟子的道德体系和政治主张相互交媾从而发展为一个庞大、完整又循环的言说体系和论证链条。

关键词: 孟子; 道德; 国政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3

《孟子》中记述了孟子本人对于人事的各类议谈, 其中不乏关于国政的道德论争。孟子曾言: “诸侯之宝三: 土地, 人民, 政事。” [1]378 从而在自身面对诸侯时的议谈中将国政置于其核心位置。而孟子关于国政的诸多议论, 又在其自一而终的道德理念的基础之上。孟子关于国政的芜杂论证, 难以与其自身的道德议谈疏离; 也因此, 以其本身的道德理念的构建方式为依据, 是解释其国政治理理念的权宜做法。本文旨在从孟子本人的道德理念出发, 梳理其关于自身道德理念的构建方式, 从而诠释其关于国政的商谈态度。

一、义利分构的道德主张和道德的实益主义倾向

孟子追随孔子的仁政主张在自己的学说中贯彻了对于仁义的诉求, 但对于与之相关的“利”, 孟子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模糊的态度。相较于仁义而言, 孟子较少对“利”直接发表看法。《孟子》全文计“仁”一百四十九字, 义一百零一字, 而利仅三十六字, 其中又不乏众多的别意假字, 可以说孟子对于利的观点抒发寥寥。孟子有过对于“利”的直接批评, 从而在具体的语境下将“利”置于“义”和“善”的反面, 譬如:

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1]1

又: 孟子曰: “鸡鸣而起, 孳孳为善者, 舜之徒也。鸡鸣而起, 孳孳为利者, 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 无他, 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尽心章句上》) [1]348

前者将诸侯的夺利斥为仁义之反面, 后者则以道德性的“善”为标识物驳斥了人生对于“利”的错误追求。但此二处中对于“利”的诠释都必须依靠道德性的“善”和“义”的概念的对立去完成, 而“利”的释义也依附于“善”和“义”的释义之上。可以说, 孟子先界定了为政以仁义、为人以善的道德准则, 次之才确立了作为其对立面的“利”的概念加以批判, 而“利”的概念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对于“善”和“义”的逆向标识。

但这样的释义在《孟子》全文中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譬如孟子曾云:

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 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孟子·尽心章句下》) [1]367

又: 杨子取为我, 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为也。墨子兼爱, 摩顶放踵利天下, 为之。子莫执中, 执中为近之, 执中无权, 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 为其贼道也, 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尽心章句下》) [1]349

前者将财货富足 (“周于利”) 视为在饥荒的年份得以保全的条件, 而将德行的高洁视为混沌的世间得以维持正直的条件, 从而将“周于利”和“周于德”分别视为能在“凶年”和“邪世”间得以维持自身的前提, 并将二者置于对等的地位之上。而后者更是直接提出了在两种“利天下”之间的“执中”做法, 希冀凭借这种“执中”而非“执一”的态度避免对于道德的贬损 (“贼道”)。在此二则的语境中, “利”作为一种可以实现的追求和可以维持的状态不仅从

作者简介: 沈奕昊(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

通讯作者: 沈奕昊

“义”的道德对立面中解脱出来，相反成为了一种对于“道”的促进。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在其议论中并不天然持有对于“利”的完全厌弃，而是凭借不同的语境抒发不同的概念，以满足其对于不同议论场景的需求。也正因此，《孟子》中的“义”和“利”不能视为一种完全的对立物，而是孟子在不同的讨论场域中分别阐述的构成品。“义”始终处于孟子进行道德舒张的主轴，而“利”则间歇性地充当孟子加以沿用和提及的次轴。当孟子需要一个对于“义”的反向标识时往往沿用“利”之名假以批驳，而当孟子抒发其自身的道德理念时又时常恢复“利”的地位。正是这种模糊的语义态度致使“利”在《孟子》中兼扩了不同的语义，而这也间接地关系到孟子在自身道德理念中的实益倾向。

试举一例：当孟子在劝说宋桎将以仁义而非利去说秦楚时，尝言：“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章句下》）[1]310

此处孟子便假借“利”的概念充当了“仁义”的对立面。而之于个人，孟子并不反对对于财货的正当索取，如：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章句下》）[1]268

又：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章句上》）[1]335

又：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孟子·告子章句下》）[1]312

可见对于赠与的财货，士人及至平民毋需讳及求利而过分的推诿，只需遵循相应的利益，“求之有道”即可。当这种个体层面对于“利”在“义”和“道”的规范之下的有选择性的悦纳扩张为国政方面的主张，便成为孟子对于国君应当尽力维持国民不仅“周于利”而且“周于德”的希求。孟子将对平民的财货寄予和物资保全视为德育教化和推行仁政的前提。而平民对于国君的归顺则被孟子视为庶民财货充盈的结果。孟子曾云：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1]18

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章句上》）[1]217-218

当孟子将“恒产”言说为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前提之时，孟子的道德主张便不再被剥离为一种单纯的道德治理，而是与君国产业和财货分配相联系，从而构成了以规制产业为先导，以道德培育为后续的国政治理。换言之，其治理逻辑并不简单基于其对于仁义的秉信，而是具有强烈的实益主义倾向。孟子不以仁义为道德，而是以恒产之下的仁义为道德。对于士人而言，这样的道德规范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于恒产而长久的存在，而针对士人的道德准则也较庶民而言更为严苛。当然即使如此，孟子依旧为士人收敛诸侯财货而辩驳。而对平民而言，孟子在全书中都几乎没有阐述育以仁义的具体措施，而对国君的建议也多是归置产业而已。这一则是因为孟子对于平民的道德自觉有所秉信，及对国政之下的道德治理依旧坚持着一种赋予式的态度（将在后文论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1]202；二则是因为孟子对于平民的仁义诉求无以财货的缺失而存在。

在此基础上，孟子曾提出以下的治国之策：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章句上》）[1]346

又：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章句上》）[1]18

也正因此，孟子在具体的治国举措中时常言及规制土地、置办学校这样具体的措施。孟子曾云：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1]128 在孟子看来田制规范是庶民基本衣食保障，也是置办教育和践行仁义的基础。孟子的论争难于脱离基础物质准则而存在，而孟子对于财货和田产的珍视也赋予其主张以充裕的实益色彩。由此，“利”虽然依旧时常被视为是“义”的对立物，但以其在不同的语境下时常摇摆的充沛语义，构成为孟子对于国政的完整的道德论说的必要环节。而当我们分别阐释“义”、“利”之时，才能在孟子实益色彩浓厚的道德主张中把握二者在语义场中各自舒展的广延性可能。在《孟子》中“义”“利”并非对立式的结构而是各自的构成物，这也就是孟子的道德论争中义利分构的状态。

孟子实益化的道德主张使其在国政治理中的天平重心由国君向平民倾斜，但纵然孟子切实关注民生，孟子依旧坚持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赋予式的道德治理，这是后一节将以论述的内容。

二、民本的道德判准和赋予式的道德治理

《孟子》中贯彻了孟子关于民本的一贯主张，并且在多则语段中得到了体现。孟子关于民本的最直接的表述

出自于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公章句下》)[1]369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1]181

由此二则,我们发现孟子将自天下以至于身的社会框架具象为一个自上而下层层依属、自下而上层层归附的梯级结构,天下赖于国家而兴存,国家赖于家而兴存,国家又赖于身而兴存。同时,得身者成家,得家者成国,得国者成天下。这是之于社会层面的判别,却并非人事的判别。因为在前一则中孟子认为丘民是天子的地位的直接来源,而诸侯乃至大夫则仰赖天子而得其位。也因此,纵然在梯级框架之下,丘民之生计和喜悦依旧可以直接对天子产生影响,而天子正因为直接受政于民而务以丘民之怨怒为己任,无以推责于诸侯乃至大夫。然而,正因为天子是丘民直接受政的主体,而诸侯乃至大夫都必须受政于天子,于是丘民之怨怒也对诸侯和大夫产生影响。诸侯无以不行仁政,大夫无以不行仁事,唯以天子受政于丘民而已。这样,丘民喜怒便影响整个官属阶层。

当丘民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对天子乃至诸侯的为政产生影响的时候,难以依托直接的方式。而对此孟子则常常假借“天”之名义加以劝谏国君并以此为辩驳。譬如: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章句上》)[1]185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章句上》)[1]241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万章章句上》)[1]244

以此,天子以至于诸侯的权力源于上天的赋予,而上天“以行与事示之”,凭借丘民的喜乐怨怒加以显露,从而构建起上天与丘民之间的相关性,并以此作为限制天子和诸侯的环节。天子受政于天,也即天子受政于民。而天子和诸侯等保有的权力是向上的举荐,在孟子的构想中这是以垒叠式层层请命于天的过程,而举荐作为一种天赋神权与世俗权力的沟通,在这一几乎垄断式的过程中得到了兼顾。对于权力的发生,世俗的权力保有者应当通过一定的流程向上举荐,而天又以民的怨怒加以展示和回馈,由此孟子便通过一个折返的箭头构建了神赋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交流的途径,从而既兼顾了世俗权力的主张,又维护了天子受政于民这一民本的核心概念的合法性来源。孟子假借天的名义维护了民本的思想。

当仅仅探究于世俗事务时,孟子也往往不言天而以丘民的喜怒作为判别依据,强调国君的悦民义务: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1]34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章句下》)[1]47

由民本为出发点构建的整个权力循环获取和定向赋予的结构不仅是社会结构性的主张,而且基于相对强硬的道德基础。天子直接受政于民,也正因此而受到更为严苛的道德准则的对待: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章句下》)[1]219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章句上》)[1]180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章句上》)[1]196

孟子强调国君的道德准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累进式的道德阶梯。天子因为受政于民,受命于天,因此需要遵循最高的道德准则,因为天子的仁政及行为规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天下规范。而诸侯受政于天子,也同样需要维持较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丘民因为无有受政,缺乏道德的直接功用,因此需要先维持一定的产业收入,才能发展恒心。孟子将各层次世俗权力与道德标准加以必要关联,从而使道德不仅成为一种向优向善的主张,而且成为一种世俗权力的保有者所必须践行的必要义务以及行为准则。在孟子的学说和理念中,仁政,不仅是推政以仁,而且是非仁不政。施行仁政才能维持天子乃至诸侯的合法性权力的持久来源,而不行仁政,丘民之怨怒和天意则可能对天子乃至诸侯的地位产生破坏性的动摇。是举一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1]42

对于诸侯而言，如果不能治四境之内，自己的地位便可能被舍弃。因此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支撑了以民本为核心的权力体系的构建方法。国君施行仁政不仅是道义的需要而且是维持权利的需要。但对于道德准则无以过高的君主，孟子便强调了处于丘民和官属阶层之间的士人的教化作用。孟子曾多次言及士人应对国君予以正确的教化，从而推行仁义，明晓贤良。士人阶层游离于道德阶梯之外，从而补济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章句上》）[1]80

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1]129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孟子·告子章句下》）[1]314

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章句下》）[1]322

在孟子的学说中，士人以善道匡扶礼制以规范君主的行为，从而换取君主的食禄，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君主应当以相应的完备的礼节加以对待。因为代表了道德扶济者的士人君子完全是仁义的散播者和权力的匡扶者，唯有接受他们的觐见从而推进仁政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有自身的世俗权力。也因此，士人可以凭借自身借助丘民的言行举止对天意加以言说，从而僭越君主的权力来源。为了在这种僭越式的权力言说中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孟子特别强调了士人君子 and 国君之间的礼仪。他曾云：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1]262 正因为士人君子游离于孟子自身构建并推广的道德阶梯之外，所以，士人君子面见国君时虽然仍旧处于相对的低位，但可以遵循相对平等的交互礼仪。这是孟子的道德体系付诸实际的一个侧影。

对于诸侯国君而言，作为社会道德补济者的道德言说是补济式的、僭越式的，但对于广大的丘民来说，这样的道德言说伴随着国君的国政推行，完全是赋予式的。尽管丘民掌握了天意，可以利用自己的言行反映天意，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有直接干预国政的权力，相反，一种合乎仁义的国政需要积极排除丘民的直接参与：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章句上》）[1]175

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章句上》）[1]339

对于广大丘民而言，仁义和德政并不是来自自身的直接干预的结果，而是少数居于高位的贤者和国君赋予的结果。道德标准的意涵来自于士人君子言说，而仁政的具体践行则来自于国君具体施策。丘民素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行为 and 喜好反应天意，但以天意干涉国君和诸侯的行为则必须假借天意。至于丘民则无有干预国政的直接能力和直接地位。孟子认为，一旦推行仁政，广大的百姓就会“心悦而诚服也”[1]79，从而“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1]185 并最终达到“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1]51 的效果。孟子主张难以超越为诸侯所言的局限，从而使广大民众依旧处于被治理的客体地位之下。丘民以自己的言行回馈天意，天使天子乃至诸侯依次受政，天子、诸侯推行仁政德治以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并接受主张道德的士人君子的道德游说，从而遵循一种自下而上的道德诉求日益严苛的累进式的道德阶梯，并最终通过一种赋予式的道德治理还政于民。相互扣合严密无疏。

所幸孟子在强调道德言说需要由士人君子完成的同时，并未割裂士人与丘民之间的联系。孟子云：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1]68。孟子在构建具体的道德意涵时遵循了一种近乎于天赋的道德自觉，并且额外强调孝的作用。此前通常将此归咎为性善论，这并不是准确的说法。

三、孝先的道德始由和风险之下的道德自觉

孟子将孝的概念置于道德体系的首要位置。孟子的孝作为一种发散式的美德，通常伴随着“悌”这一次一级的规范构成“孝悌”概念，作为道德的始由。其余道德概念受到“孝悌”的统领，乃至可以视为“孝悌”发散的结果。“孝悌”作为一种原初的良善美德不仅发散出其余的美德，而且往往与圣人之道直接联系。圣人之道就是孝悌之道，而圣人创制古制，承袭天意，难以忤逆，因此圣人之道就是当时之道，在这一递进的言说链条中，以“孝悌”为始由的道德便是当时应当遵循的规范。而“孝悌”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可以僭越世俗性的道德准则，乃至以其意涵约束圣人行为。孟子也往往假借圣人之名诠释“孝悌”。“孝悌”可以颂赞圣人，而圣人也可以诠释“孝悌”，“孝悌”之义承圣人之名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普遍道德，构成多元一体的道德逻辑：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

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章句上》）[1]200

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章句上》）[1]228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下》）[1]305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章句上》）[1]237

古者棺槨无度，中古棺七寸，槨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悦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章句下》）[1]105

这种孝的始由的直接来源是对父母的归顺，而这种归顺与圣人的言行紧密联结从而产生了难以动摇的效力。因为对圣人之道之反击将被诠释为一种对三代的政制的怀疑，而三代的政制素以清明著称。纵使三代有昏君桀纣，也因其个人品行堕落所至，违背了天意；至于天意，则凭借牢靠的道德自觉而成为一种可以由“孝悌”为始由、以“仁义”为注脚的道德规训。正是这种道德规训约制了圣人，从而拱卫了三代的政治清明。由此，孟子承袭孔子的儒学在恢复古制和崇尚道德的逻辑链条上形成了相互保卫的循环。而作为道德始由的孝则几乎是一种不依着于他物的独立构建的道德概念。或言之，孟子推崇的道德体系选定了孝作为其余道德的发散起点，因此孝的概念难以依附其他概念而存在，从而必须成为一种独立的构建。这种构建也因此在不受拘束的状况下呈现出匪夷所思的冒犯性和僭越性。譬如上文材料所言，舜之兄父是史载有名的败兄恶父，可孟子仍旧在语段中多次以舜“终身慕父母”为孝，反言之“彼（象，舜兄）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1]233，可见孟子推崇的孝是一种形式性的表现，并不以父母的言行和品德高下而有所改变。或言之，孟子推崇的孝的概念是一种立足于社会之上的他者概念，可以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超越一些个体性的差异。而这种孝的概念在某些情形下是可以僭越于天下之上的，并且不避讳财货的合理取用（亦道德之实益之体现），孟子由此直接提出了“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前文提及，孟子的道德体系和政治主张处于相互保卫的循环链条之下，所以当“孝”的概念被诠释为一种对于父母的形式性的归顺之时，这种家长制的结构也可以引申为在社会层面对于国君的形式性的归顺。纵使孟子认为国君应受一定的道德约束，但对于丘民而言，依旧尊崇一种赋予式的道德治理逻辑。因此当孝父和尊君发生联系时，就实现了道德体系和政治主张的合流。而对于其他对此不加以认同的学派，孟子便诬为伪学：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1]168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章句上》）[1]178

此二则证以孟子之道德体系与政治主张之合流。后世之西晋也以此推崇“以孝治天下”，惟忠君是尔。

对于孟子认为的孝的概念的具体意涵，此处也可作一简短的说明。孟子曾两次列举他以为的不孝之举：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章句上》）[1]199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孟子·离娄章句下》）[1]221

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则中的无后照原本解，非绝嗣也，只是不顺于父母，没有履行相应的告知的仪礼而已。参后一则，不孝五类中也没有绝嗣一则。

然而，纵使，孟子时常提及天意，但孟子绝不以天赋来保卫圣人，而是以道德来护卫之。孟子消弭了圣人和凡人在人格上的差异，只是以单纯的道德品质来加以衡定。诸如以下的表述见于《孟子》：

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章句下》）[1]224

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章句上》）[1]288

在摒弃对于圣人的超越常人的天赋异质的表述之后，孟子便寻求一种独特的方式将道德体系发扬为一种普遍性的范式。他认为一切的道德概念，包括其中的始由“孝悌”和核心“仁义”都可以在所有人的道德自觉中找到根源。而这种根源多半是与生俱来的，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的先验和天赋的成分。诸如此类的主张通常仅以性善论为名，但孟子绝非以善称性，而是以性为善。即孟子并不把人的本性当成是善的，而是认为人的本性中感知到的成分本身具有其合理的成分，而这些部分可以以善的名义加以推行。这是一种纯粹的先验式的道德主张，并且孟子以其雄辩的说辞使之与“孝悌”之义相结合，从而使超脱和僭越式的“孝悌”概念也得到了一定的阐述和证明。

至于“仁义”也依附在这种超然的道德自觉的感知基础之下，从而成为以人为本的一种诠释性的道德。孟子在其道德学说中隐含了这一道德主张，也表达了将道德的起始点回归于人本身的朴素夙愿。是文以证：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1]87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1]187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章句上》）[1]280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章句上》）[1]300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章句上》）[1]334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章句上》）[1]286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章句下》）[1]370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章句下》）[1]380

引从上文可知，“善”、“仁”、“礼”、“义”、“智”等象征美好的道德概念既是上天的赋予（“天爵”），也是可以诠释于人的一种广泛而普遍且实益的道德主张。在这种道德自觉的强调中，孟子的提出的“善”、“仁”等概念成为一种悬置的道德客体对天和人产生双向的补济。其既可受哺于天，又出实于人，成为一种带有明显的实益色彩的道德伦理观念。当然，在天人合一的指引之下，这种客体化但又实益化的道德概念的存在不过是在本就十分牢靠的天人感应的二者中间又多控制了一条锁链。

既然众多的道德概念来源于人们最初的道德感知，并且这种朴素性的感知完全可以具有很高的层次，达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层次，那么孟子认为的来自士人君子的道德言说便是一种对于原有的道德概念的浇灌和护卫，当然也是一种将此类朴素的道德自觉向孝父侍君的社会性方向的引领。孟子曾云：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1]302。以孟子自身为代表的士人君子便力求将这种朴素性的道德自觉加以引导和改造从而使之成仁。由此便成就为诸如以下几则的一些具体性的社会规范：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1]218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章句上》）[1]341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章句下》）[1]375

这样广泛的依从于朴素的道德自觉的观念当然存留有风险，譬如一种将道德自主裁量权交付于民众、并且寄望于民众对于道德切实感知可以导向良善的期望，多半会因为纷繁复杂的道德堕距而失损。而孟子的主张中不仅包含有可以经验的直觉性内容，也依旧存留有大量的超越乃至僭越式的道德内容，而这些无从被直接感知的内容多半会催生出纷争。譬如孟子本人就曾多次面对这种道德例外化的诘难，但孟子多以雄辩化解难题：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章句下》）[1]303

孟子对于部分问题尚且采用一种灵动的情境主义主张，则其将道德意涵置构于道德自觉之上的学说则必然要在纷繁多元的道德感知中承担过度风险。孟子提出“权变”的概念加以调和，也是一种中庸的态度。

但对于丘民而言，纵使孟子将部分的道德感知的主体交还给他们，他们也依旧畏惧于被包装之下、与政治主张相互交媾的道德体系，所以孟子主张的普遍化的道德感知最终也只能沦为一种符号化的感知结果，而并非一种可以随意掺杂的经验结构，而是被孟子假言而用以诠释自身以“孝悌”为始由并与政治主张相互媾和的循环链条而已。这便是以“孝”为先验和始由的道德体系衍生的道德自觉和以道德自觉拱卫的“孝悌”始由。

四、结语

本文试梳理孟子在《孟子》中呈现的道德体系和国政治理逻辑。在孟子的学说中，“仁义”和“利”的概念

都是单独的构成而并不处于始终的对立状态，而孟子在道德言说中以民众的恒产为道德培养的前提，这折射出孟子论述在情境之下的实益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国政治理中反映为对诸侯乃至国君的道德期待和政治合法性的强力，构建为一个自丘民反映天意、又以天意赋予天子乃至诸侯世俗权力合法性的折返式的权力想象路径。然而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这种构建式的道德逻辑与国政治理相结合之后，依旧维持为一种赋予式的道德治理逻辑，并没有改变民众被治理的客体地位。而民众所保有的朴素道德感知被诠释为道德直觉的主张，从而在添置了“孝悌”的道德始由和“仁义”的道德核心之后，成为一种起码在形式上推崇“良善”的道德体系，并以此发挥既护卫圣人又约制圣人的双重作用。这在与世俗权力的想象机制发生结合后成为一种完整的忠君孝父、推崇礼制的政治主张。孟子的道德体系和政治主张相互交媾，从而发展为一个庞大、完整又循环的言说体系和论证链条。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 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2] 朱熹著; 金良年校笺.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3]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4] 张学智. 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几种形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5-14.
- [5] 庞朴. 试析仁义内外之辨[J].文史哲,2006,(05):28-30.
- [6] 陈来. 孟子的德性论[J].哲学研究,2010,(05):38-48+127-128.
- [7] 韩东屏. 论道德困境[J].哲学动态,2011,(11):24-29.
- [8] 吴震. 中国思想史上的“圣人”概念[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5(04):13-25.
- [9] 龙涌霖. 志·气: 孟子的行动哲学——以“知言养气”章为中心的探讨[J].中国哲学史,2025,(06):5-19.
- [10] 荆雨. 从主观的“意见”到客观的“理义”——戴震之理的政治哲学内涵及其当代意蕴[J].中国哲学史,2025,(06):88-98.
- [11] 高瑞杰. 从尊贤到从兄: 论思孟学派德性伦理的内向化展开[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7(06):23-32.
- [12] 苟东锋. 重估“仁义”:论儒学的标识性“概念”[J].哲学研究,2025,(12):43-56+169-170.

Mencius' Moral Controversies on State Governance

Shen Yihao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xt of Menciu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courses concerning state governance in Mencius' arguments, so as to identify his propositions on morally grounded state administration. It is argued that Mencius regards the concepts of Righteousness (yi) and Benefit (li) as independent categories, and advocates that the people's stable means of livelihood should serve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moral cultivation in ethical discourses. Such propositions reflect a pragmatist tendency embedded in Mencius' moral system within specific contexts. In the realm of state governance, this pragmatist tendency manifests itself as a people-centered moral criterion, which constructs a reflexive path to political legitimacy, while maintaining a paternalistic governance logic toward the common people. Meanwhile, Mencius' moral propositions take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xiaoti) as the origin of morality and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renyi) as its core, thus forming a moral system that relies on moral consciousness. Mencius' moral system and political propositions intertwine with each other, evolving into a comprehensive, coherent and cyclical discursive system and argumentative framework.

Keywords: Mencius; Morality; State Governance

体能训练影响运动员赛场表现的作用路径研究

万贵宇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600)

摘要: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 系统梳理与整合了国内外关于体能训练影响运动员赛场运动表现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 现代体能训练已发展为一个融合运动生理学、生物力学与心理学的科学体系。其对运动表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路径: 在生理与生物力学层面, 通过优化神经肌肉控制与能量代谢, 提升力量使用效率与动作经济性; 在运动损伤预防层面, 通过强化核心肌群及改善发力模式, 增强关节稳定性, 显著降低损伤风险; 在技战术与心理层面, 卓越的体能储备为复杂技战术的执行提供了坚实基础, 并能有效增强运动员的比赛专注度与心理稳定性。本文评述了该领域的研究共识, 同时指出未来需在专项化训练模型的精细化、长效性健康效益及高新技术应用等方面深化探索, 以期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体能训练; 运动表现; 研究进展; 述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5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竞技体育水平日益精进的当下, 运动员的赛场运动表现已成为决定比赛胜负的核心, 同时也是运动科学领域研究的焦点。运动表现作为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综合体现, 不仅取决于娴熟的技战术, 更以卓越的体能为基础支撑。根据《运动训练学》的经典界定, 运动表现是运动员在比赛或训练中所展现的竞技水平, 涵盖了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与智能等多个维度。其中, 体能作为通过力量、速度、耐力、协调、柔韧及灵敏等素质表现出来的基本运动能力, 构成了运动员施展和发挥一切技战术的先决条件与物质基础。随着运动人体科学的飞速发展, 现代体能训练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纯追求身体素质提升的范畴, 演进为一个融合了运动生理学、生物力学、营养学与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科学体系。一套科学合理的体能训练方案, 不仅旨在短期内优化运动员的竞技状态, 更着眼于其长远的职业生涯管理与运动损伤预防。然而, 在实践中, 体能训练的价值仍时常被简化为“增强体力”, 其对于优化动作模式、提升能量利用效率、强化心理稳定性以及构建损伤预防体系等多维度的深刻影响, 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梳理与充分认知。

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体能训练

体能是通过力量、速度、耐力、协调、柔韧、灵敏等运动素质表现出来的人体基本的运动能力, 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体能训练通常是通过对人类身体躯干的肌肉群进行练习, 包含腹直肌、腹斜肌、下背肌和竖脊肌, 肌群主要源于其连接人体上下结构, 是传递力量、借力打力的重要部位, 同时还把控着人体的平衡能力^[1]。随着运动人体科学的继续发展, 体能训练策略的制定将身体状况、运动生理、心理素质、运动技能等多方面因素融合在内, 打造出一套全方位、科学合理的训练体系。

作者简介: 万贵宇(2002—),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

1.2.2 运动表现

运动表现是运动员在特定竞赛或训练情境下,其内在竞技能力(包括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与智能)通过外在行为实现的、可被观察与评价的综合输出。它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整合的结果,不仅反映了运动员长期训练的积累,也受到即时生理、心理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对运动表现的追求,本质上是对这一复杂系统进行优化与调控的过程。

2 现代体能训练的理论演进与核心范式

2.1 体能训练的理论演进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体能训练理论经历了一场从外部引介到自主创新的深刻演进。在理论引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4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我国开始系统引入欧美体能训练体系,通过译介《高水平竞技体能训练》等专著,初步建立起对功能训练等现代概念的认识。进入学习消化阶段(2004-2008年),以北京奥运备战为契机,通过与美国体能协会(NSCA)的合作及CSCS认证体系的引入,我国实现了从单一抗阻训练向科学化、多样化训练模式的转型。至吸收应用阶段(2008-2012年),本土学者在消化国际理论基础上,出版了《体能训练概论》等奠基性著作,提出“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等本土化理念,形成了以核心力量、动作模式为核心的新范式。2012年至今的蓬勃创新阶段,体能训练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发展态势,建立了自主体能教练认证体系,其应用范畴从竞技体育拓展至全民健康、青少年体质、老年康复等多元领域,实现了从“服务竞技”到“赋能全民”的范式升华,构建了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体能训练体系。

2.2 体能训练的核心范式

现代体能训练已构建起以科学化、个体化与专项化深度融合为核心的全新范式。这一范式的确立,标志着训练实践从经验主导迈向科学引领的系统性变革。科学化是这一体系的根基,其核心在于将运动生理学、生物力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整合应用于训练实践,形成全方位的科学训练体系。在这一框架下,训练过程强调对负荷的精确控制与定量监控,例如通过PASm-12等结构化方案严格规划训练量与强度,以实现运动表现优化、疲劳管理与损伤预防的协同目标^[4]。个体化则是提升训练精准度的关键,它要求彻底摒弃“一刀切”模式,转而根据运动员的身体状况、恢复能力及心理特征,打造项目化、个性化的训练标准,以实现体能储备的精准提升^{[2][3]}。而专项化作为连接基础体能与赛场表现的桥梁,则聚焦于运动专项的能量代谢特点与技术动作特征,通过优化专项动作模式与发力效率,使训练效果精准转化为竞技表现的有效提升^[5]。例如,在篮球运动员的训练中,针对其变向、起跳等专项技术,强化髋、膝、踝的协同发力与稳定性训练,这既提升了运动表现,又通过改善力量传递效率显著降低了运动损伤风险^[6]。这三大维度相互支撑、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现代体能训练的完整体系,不仅为运动员竞技表现的提升提供了系统支持,更通过“康复体能一体化”等理念^[5]为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延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体能训练影响运动表现的作用路径研究综析

3.1 生理与生物力学路径

现代体能训练通过生理与生物力学路径对运动表现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机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在生理层面,训练诱导的神经肌肉适应性是提升运动效率的核心。通过系统性抗阻与爆发力训练,中枢神经系统优化了运动单位募集模式和放电频率^[8],促进肌纤维同步收缩,从而显著提升力量生成速率和动作反应速度。这种神经适应与肌原纤维增生共同作用,不仅增强了基础力量素质,更通过改善肌肉间协调性实现了发力效率的优化^[5]。同时,能量代谢系统的适应性改变为持续高强度运动提供了保障:无氧训练提升了磷酸原系统和糖酵解系统的输

输出功率,而有氧训练则通过增加线粒体密度和毛细血管化改善了耐力表现,这种代谢能力的全面发展为运动员应对不同强度比赛需求奠定了生理基础。在生物力学层面,体能训练通过优化动力链功能直接提升了动作经济性。核心肌群作为连接上下肢的力学枢纽,其稳定性训练增强了躯干刚度,确保了力量在闭合动力链中的高效传递,减少了能量泄漏^[6]。功能性训练则针对专项技术动作的生物力学特征,通过改善关节排列和发力时序,优化了动作模式^[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热点集中在"拉长-缩短周期"的力学机制上,通过增强肌腱刚度和利用弹性势能,显著提升了跑步经济性和弹跳效率^[11]。而在损伤预防方面,生物力学矫正训练通过平衡肌力发展、改善关节对位,有效纠正了异常发力模式,降低了过度使用性损伤的风险^[6]。这些生理与生物力学适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体能训练提升运动表现的实证基础,也为个性化训练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3.2 技战术与心理支持路径

体能训练通过技战术与心理支持路径对运动表现产生关键性影响,这一机制已成为现代竞技训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战术支撑层面,体能素质构成了技术执行与战术实现的物质基础。优异的体能状态使运动员能够在比赛关键时刻稳定完成高难度技术动作,如在篮球比赛的第四节仍能保持标准的投篮姿势与爆发性的突破能力^[3]。专项化的体能训练通过模拟比赛中的能量代谢特征,显著提升了运动员的战术执行能力,使全场紧逼防守或快速反击等高强度战术得以有效实施。动作模式的优化训练则直接提升了技术动作的经济性与稳定性,研究表明通过改善动力链传递效率,运动员能够以更低的能量消耗完成更具威胁性的技术动作。在心理支持层面,身体能力的增强通过"身体-心理"联动机制显著提升了运动员的竞技信心与心理韧性。运动员在感知到自身身体能力的提升后,往往在比赛中表现出更强的决策果断性与风险承受能力^[8]。系统的体能训练还通过提高运动员的疲劳耐受阈值,增强了其在困难局面下的心理稳定性,这一点在持久对抗性项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训练强调的"康复体能一体化"理念不仅关注生理功能的恢复,更注重在康复过程中建立运动员的心理韧性,形成良性的心理建设循环^[5]。此外,通过规律训练所培养的坚韧品质与应对身体不适的经验,使运动员在面临比赛压力时能够更好地调节焦虑情绪,避免因过度紧张导致的动作僵硬与决策失误^[9]。这些技战术与心理层面的积极影响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体能训练提升运动表现的完整路径,也为构建更具综合性的训练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4. 讨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揭示了体能训练通过生理生物力学、技战术及心理支持等多维路径对运动员赛场表现产生的综合影响。这些发现不仅印证了体能训练作为竞技能力基础的重要地位,更深化了对其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多数研究集中于短期训练效果评估,缺乏对运动员整个职业生涯的长期追踪;其次,针对不同运动项目的专项化体能训练模型尚待完善,个性化方案的制定仍较多依赖经验;此外,对青少年、老年及特殊人群的体能训练研究仍较为薄弱。基于以上分析,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深化:一是加强体能训练的长期效应研究,建立贯穿运动员生涯发展的训练监控与评估体系;二是深化专项体能训练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构建个性化训练模型;三是拓展体能训练的应用范畴,特别是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老年运动康养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四是推进"体医融合"模式,探索体能训练在慢性病预防和康复领域的实践路径。

5. 结论

综上所述,现代体能训练已发展成为集科学化、个体化与专项化于一体的综合性训练体系。通过优化神经肌肉控制、增强能量代谢效率、改善动力链功能等生理生物力学路径,体能训练直接提升了运动员的动作效率与竞技能力;通过夯实技战术执行基础、优化专项动作模式,确保了比赛环境下技术水平的稳定发挥;同时,通过增强运动员的心理韧性、提升疲劳耐受性,为高水平竞技表现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支持。这些多维路径相互关联、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体能训练影响运动表现的完整机制。因此,在训练实践中应树立系统化思维,将体能训练与

技战术训练、心理训练有机整合,从而全面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水平,延长运动寿命,推动竞技体育训练科学化水平的持续提升。

参考文献:

- [1] 高炳宏.我国现代体能训练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J].体育学研究,2019,2(02):73-81
- [2] 袁飞.竞技体育体能训练策略探赜[J].当代体育科技,2024,14(03):14-16.
- [3] 彭国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备战巴黎奥运会的举措及启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4,58(04):82-88.
- [4] Baba D, Mijaica R, Nechita F, Balint L.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nnual Physical Training Plan for Masters +45 Women Half Marathon Athletes: A Guideline Model for Good Practices for Programming Effort Volume and Intensity. *Sports (Basel)*. 2024 Sep 14;12(9):256.
- [5] 闫琪,赵鹏,于涛,等.体能视角下的“康复体能一体化”训练理念[J].体育科学,2023,43(11):3-14+39.
- [6] 刘波,田德林,张福生.体能训练对预防高校篮球运动损伤的作用[J].体育世界,2024,(01):125-127.
- [7] 李福林.体育训练中运动员的膳食营养需求探索[J].食品与机械,2024,40(07):246.
- [8] 曾仁杰,周珂,姒刚彦,等.内感受对运动表现的影响:发生机制与潜在路径[J].中国体育科技,2024,60(02):21-27.
- [9] 马正越.过度紧张对业余篮球运动员运动表现的影响[J].医用生物力学,2024,39(S1):504.
- [10] Olsson F L , Glandorf L H , Black F J , et al. A Multi-Sample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e Burnout and Sport Performance. [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24, 76: 102747.
- [11] 刘藤升,黄明哲.膝关节功能强化训练对运动员运动表现提升的影响[J].医用生物力学,2024,39(03):560.
- [12] 李卫,阙怡琳,石煜,等.体能训练前沿理念与实践创新——第二届中国国际体能大会综述[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03):114-128.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view on the Impact of Physical Training on Athlete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Guiyu Wan¹

¹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6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and integrat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impact of physical training on athlete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Studies indicate that modern physical training has evolved into a scientific system integrating exercise physiology, biomechanics, and psychology. Its positive effects on sports performance are primarily manifested through three pathways: at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mechanical level, by optimizing neuromuscular control and energy metabolism, it enhances strength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movement economy; at the sports injury prevention level, by strengthening core muscles and improving force generation patterns, it enhances joint stability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s injury risks; at the technical-tactical and psychological level, superior physical conditioning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xecuting complex techniques and tactics, while effectively improving athletes' competition focus and mental stabilit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consensus in this field and points out the need for future exploration in areas such as the refinement of event-specific training models, long-term health benefi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Advances in Research ;Critical Review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多模态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 与实现路径

刘丽¹ 孙思洁¹ 山明织²

(1.常州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22; 2.济宁市嘉祥县实验小学, 山东 济宁 272400)

摘要:在素质教育改革持续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课程体系的政策背景下,传统以语言为主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难以满足当代小学生的认知与情感发展需求。本文基于多模态教学理论,结合小学生心理发展特点,构建了以“四维五阶”为核心的多模态教学模式。该模式围绕“素养导向、主题内容、教学过程、多元评价”四个维度,设计了“情境创设—信息输入—互动建构—实践迁移—评价反馈”五阶循环教学流程,旨在通过视觉、听觉、动觉等多模态资源的协同运用,促进学生在心理认知、情感体验与行为实践上的整合发展。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从制度建设、课堂实施到技术赋能的系统化实现路径,为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创新与课程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小学心理健康;多模态教学;四维五阶;核心素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常州工院校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小学心理辅导》产教融合示范课(CJRHKC2023-19);202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一般项目“多主体协同视角下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的解析与重构”(2023SJYB1296);2025年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教联体的“三元思维”校园欺凌防治模式构建”(C/2025/01/83)和校级高层次人才启动项目“生态视角下青少年毒品预防研究”项目(项目编号:YN22160)资助。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6

一、引言

在素质教育改革持续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课程体系的政策背景下,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正处于从传统教学模式向多模态教学模式体系转型的关键阶段。当代小学生作为典型的“数字原生代”,成长于多媒体环境中,自然适应通过视觉、听觉、动觉等多通道接收信息的方式。这种多模态的认知偏好,不仅源于其日常生活经验,更体现了认知心理学中多感官整合对知识建构的促进作用。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模式创新直接影响学生心理品质的养成,并关乎素质教育整体成效的实现。当代儿童心理发展显现出认知方式多元化与情感表达数字化等特征,传统以语言模态为主的教学模式已难以充分满足其需求^①。实证研究显示,相比单一言语交流的传统方式,融入虚拟现实、交互游戏及多感官刺激的学习环境,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②。这种转变根植于多模态理论,该理论强调符号系统间的交互能增强意义建构的深度与广度。基于此,本研究借鉴多模态理论,结合小学生心理发展规律与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构建“四维五阶”多模态教学模式。该模式将视觉符号、听觉刺激、体感交互等多种模态融入课程设计与实施,旨在为数字化时代小学心理辅导课程的开发与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二、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教学模式改革的现实诉求与理论需求

作者简介:刘丽(1989—),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问题青少年教育与矫正;

孙思洁(1993—),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儿童发展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山明织(1990—),女,本科,中小学一级教师,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通讯作者:孙思洁

基础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与挑战。2021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相关部署,教育部印发《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明确将心理健康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强调通过教学方式创新实现以预防为导向的发展性目标。这一政策导向与多模态教学模式所倡导的“全通道学习”理念高度一致,该理念强调整合视觉符号、体态动作、数字交互等多重符号资源,以促进全面感知,这为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相较于其他学科,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程具有的情感化和个体化特征,需融合多模态模式,以“儿童情绪认知与调节”模块为例,fMRI脑成像研究显示,儿童情绪调节过程依赖于前额叶皮层、杏仁核等多个脑区的动态协同,而多感官刺激能够有效激活镜像神经元系统,促进情绪相关神经回路的可塑性发展,此研究结论为多模态教学模式应用于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当前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仍存在忽略了小学生心理发展的整体性和体验性特征的且运用传统的单向灌输,过度依赖语言符号传递和道德说教的教学模式。这种“离身”的教学模式,仅仅将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简化为知识传授,忽略了能力素养和价值观核心的教育,也往往难以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学生即便从认知上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难以将其内化为日常行为。因而,基于以上研究困境,本研究基于多模态理论构建“认知-情感-行为”多模态教学模式,也为人工智能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一) 多模态教学模式理论基础与内涵界定

多模态教学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社会符号学。该理论认为,意义生成并非局限于语言符号,而是依赖图像、声音、动作等多重符号资源的互动协作^①。在此基础上,Kress与Van Leeuwen进一步研究提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其突破了仅关注语言符号的意义建构的局限性,更多聚焦于探讨了人类如何通过多种模态进行意义传递^②。这一视角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促使教育者重新思考教学过程中多模态的协同效应。邓百雄博士在多模态课堂互动研究中发现,学生通过视觉、听觉、动觉等多种符号资源共同建构心理知识、情感体验和行为模式,不仅有效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理念,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知识,能力和素养,也再次揭示了多模态教学的“1+1>2”效应。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教学模式,以主题教学为框架,依据教育内容与学生心理特征,系统融合视觉、听觉、动觉等多感知通道,营造沉浸式学习情境。该模式旨在通过多通道互动,帮助学生自主构建心理知识,培育积极心理品质,并塑造健全人格。它并非媒介工具的随意叠加,而是依托学习科学与心理机制,实现外部刺激与内部过程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该模式体现四个核心特征^③:首先,体验性与具身性。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剧等身体参与活动,促进学生对抽象心理学相关概念的具身认知,使理解根植于感官体验。其次,沉浸性与情境性。借助VR、AR等技术,构建逼真教育情境,链接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激发全身心投入与认知加工。再次,互动性与主体性。建立师生、生生及人机间的多向交流,提升课堂趣味与个性化,激发学生主动求助与自我探究。最后,个性化与精准性。该模式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超越知识灌输,成为联结认知、情感与行为的纽带,通过多感官输入深化学生对心理健康的理解、应用与迁移。

三、小学生心理健康“四维五阶”多模态教学模式设计

本研究基于多模态教学理论,设计了以核心素养目标为引领、以整合性主题内容为统领、以五阶循环教学过程为核心、以多元持续评价为保障的“四维五阶”多模态教学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多通道符号互动,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

(一) 重构素养导向,实现知行合一的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是教学模式的灵魂,决定了内容选择、过程实施和评价方式。本模式的目标设定,立足于心理健康教育核心素养,追求认知、能力与素养,三层目标的有机整合与内在一致,具体如下:1.认知目标:理解心理健康知识,构建自我认知图式。该目标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环节,通过多模态教学,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心理知识结构,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促进对抽象概念的具身理解。例如,在“情绪”模块中,可运用面部表情的视觉辨识、情绪音乐的听觉欣赏以及动作表演的动觉实践等方式,引导学生塑造立体的情绪认知网络,将抽象的“情

绪”概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心理图式。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应用心理知识和技能，掌握解决心理障碍问题的能力。该目标关注心理知识向实践技能的转化，侧重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有效应对实际心理困境、提升心理积极品质的能力。通过多模态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掌握情绪调节、压力应对、人际交往等心理积极品质技能，从而实现“知”到“行”的跨越。3.素养目标：浸润积极心理品质，奠定健全人格。该目标是心理健康教育的终极追求，着眼于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浸润，培养学生积极的情绪特质、坚韧的意志品质与健全的人格。多模态教学模式通过情感浸润而非道德灌输，引导学生形成乐观、坚韧、感恩等积极心理品质。在小学阶段，这一目标应具体化为培养学生对自我和他人基本的尊重与接纳，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

（二）深耕核心主题，重构三大内容模块

教学内容作为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实质载体，其组织形式与设计逻辑直接决定了教学成效。本研究构建的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教学模式，在内容组织上秉持“遵循生活化、系列化原则，并以精准匹配为准则设计学习内容。首先，以发展性主题为导向，构建“学习心理与成长性思维”、“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与沟通合作”三大内模块。“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模块主要帮助孩子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学会与情绪做朋友。“人际交往与沟通合作”模块主要培养孩子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学会沟通、分享与解决冲突。“学习心理与成长性思维”模块内容主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学习和挑战，培养积极乐观、坚韧的心理品质。

其次，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设计，应紧密贴合不同学段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及核心心理发展任务，形成纵向衔接、螺旋上升的主题模块。例如，低年级可围绕“自我认知初探”、“情绪觉察与管理”等基础主题展开；中年级可侧重“同伴关系建构”与“学习策略启蒙”；高年级则逐步深入至“青春期心理适应”与“压力应对策略”等复杂主题。通过此种环环相扣、逐级深化的主题序列，确保教育内容既贴合学生实际，又具备连续性与发展性。

最后，依据主题实现匹配的多模态教学模式。不同板块内容，其对于不同类型多模态类需求存在差异化，因而，在教学设计中，需基于主题特性与学生认知特点，进行模态的精细化择取与整合；不同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有其独特特性，应根据内容特点和学生年龄特征，精准配置最适宜的模态内容。对于情感共鸣类主题，如感恩教育，可侧重音乐、画面等听觉和视觉模态，营造情感氛围；对于行为训练类主题，如情绪管理，可侧重角色扮演、手势操等动觉模态，促进身体记忆；对于认知理解类主题，如脑科学知识，可侧重动画、图解等视觉模态，化抽象为具体。此设计目的为基于主题特质的精准配置，超越模态的简单堆砌，追求模态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间的高度协同，从而最大化发挥多模态教学的“协同增效”作用。

依据教学内容，构建配套的教学资源库。多模态教学资源开发并非一味崇尚高科技，而是注重数字化与传统资源的有机融合^⑥。一方面，可借助VR、AR、AI等技术营造沉浸式学习情境，促进学生的具身认知；另一方面，应重视艺术治疗、沙盘游戏及团体辅导等非数字化手段，以丰富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教师应引导学生共同创生学习资源，如制作心理健康主题的短视频、心理剧、联想故事等。最后，探索“数字人+教师辅导”模式，在此过程强调融入角色扮演与艺术疗愈等元素，此外应针对不同学段制定匹配内容，为数字化资源建设提供实践借鉴^⑦。

（三）重塑五阶循环，强调深度体验的教学过程

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本研究基于多模态教学理论，构建了注重深度体验与意义建构的“五阶循环”教学过程模型。该模型旨在通过环环相扣、螺旋上升，引导学生在多元符号互动中实现心理认知、情感与行为的统一发展。

第一，多模态情境创设，引发情感共鸣。该阶段通过多种模态资源的整合运用，营造真实或拟真情境，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认知冲突，从而唤起内在学习动机。该阶段旨在通过多种模态资源的协同运用，创设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境，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和认知冲突，激发学习动机。第二，多通道信息输入，促进全方位感知与信息提取。该阶段强调视觉、听觉、动觉等多通道，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立体感知与深度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多通道信息输入不是信息的简单叠加，遵循认知规律进行有机融合。这种多通道输入策略，源于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个体感知差异性以优化知识内化^⑧。第三，多形式互动方式，实现个人意义建构与集体智慧生成。该阶

段作为核心环节,借助师生对话、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及人机互动等多元活动方式,引导学生建构个人意义并生成集体智慧。教师需设计多层次、多样化的互动活动,促进学生通过协商、分享深化理解,促从而促进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第四,多场景实践迁移,推动知识技能向行为习惯转化。该阶段旨在建构多样化的学习场景,促进学生将心理知识和技能迁移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些场景设计包括课堂模拟场景、校园真实场景和家庭社会场景。例如,在掌握情绪调节策略后,可引导学生在课堂模拟挫折应对情境、课外参与情绪管理活动,并在家庭中尝试化解人际矛盾。第五,多角度评价反馈,促进元认知能力与自我成长。该阶段是通过多元角度的评价反馈机制,提升学生元认知能力发展,进而实现自我监控与持续进步。在此过程应整合形成性总结性评价,从评价方式包括,教师评价、同伴互评、家长反馈及学生自评等并兼顾量化数据与质性描述的多维度的反馈机制。

(四) 重设多元主体,构建综合考查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作为课程改革与实施的保障机制,不仅决定了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还直接推动教学实践的优化与创新。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教学模式超越传统,构建多主体、多方式与多维度聚焦于一体的评价体系。首先,确立多元评价主体。该主体涵盖教师、学生、同伴及家长。教师评价侧重于学生基本知识概念体系、心理辅导技能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自评旨在培养其自我反思意识与元认知能力,促进内在成长;同伴互评有助于培养共情能力和社交技能,体现了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互动学习的重要性^⑨;家长评价则聚焦学生在家庭情境中的心理、行为变化。综合评价体现的构建不仅增强了评价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还促进教育共同体的形成。其次,实现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应优先采用表现性评价和档案袋评价等动态方式。表现性评价通过审视学生在真实或模拟场景中的行为,衡量心理技能运用。档案袋评价致力于系统收集、记录学生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各类心理作品(如日记、艺术作品、剧目视频),以动态轨迹展示成长过程,提供针对性指导。最后,拓展评价内容的多维层面。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内容应从对静态知识的记忆,转向对动态发展的心理积极品质和行为培养。具体而言,心理健康教育评价应从知识记忆转向心理品质与行为培养,具体包括情绪管理能力、人际交往技能、自我效能感、韧性等心理资本的提升,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行为变化,如主动寻求帮助、运用压力管理策略等,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四、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教学模式实现路径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实施,需依托制度建设、课堂教学与技术赋能的协同机制,形成系统化、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一) 完善制度建设与资源保障体系

完善与实施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教学,首先,完善相关制度,建立校本化多模态课程资源平台。学校应以国家教育政策为依据,结合学生心理发展实际,开发校本特色的心理健康课程纲要,系统规划各年级学习目标、主题模块、内容框架、实施流程与评价机制,同步开发配套的多模态教学资源形成“1大纲+32课时教案+16个典型教学案例+N类拓展资源”的完整教学课程资源。此外,该资源平台建设需注重差异化,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心理需求,提供适应性多模态资源。其次,打造支持多模态学习的“线上+线下”智慧心理健康教育空间。学校可充分利用现有场地与设施,构建虚实融合的心理健康教育空间。线下空间包括团体活动区、个体咨询区、VR体验区及艺术表达区等,旨在提供沉浸式体验环境;线上空间则可开发虚拟心理平台,集成在线测评、AI辅助咨询及数字资源库等功能。最后,开展教师多模态教学素养专项提升计划。教师作为多模态教学实施的核心主体,其素养直接影响模式的效能。学校应组织工作坊、案例研讨、课堂观摩等系统性培训,提升教师的多模态资源开发能力、课堂组织能力及评价能力。

(二) 优化课堂教学实施与构建协同支持机制

为优化课堂教学,首先,深化“五阶循环”,开展主题式多模态课例研究。课堂教学实施应遵循“五阶循环”流程,并开展深入的案例研究。教研组应发挥集体智慧,组织教师围绕“情绪管理”、“同伴交往”、“生命教育”等核心主题,开发系列化的典型多模态教学课例。此过程应遵循“集体备课—课堂观察—多模态数据采集—反思改进”

的循环教研路径。在集体备课阶段,重点研讨各教学阶段模态配置的学理依据与预期效能;在课堂观察阶段,除传统听课记录外,可引入视频分析、话语分析等技术,精准捕捉师生在多模态互动中的行为细节与意义生成过程;在反思改进阶段,则基于观察数据与学生反馈,对模态使用的适切性、协同性及深层教育意涵进行批判性审视。其次,构建家校社联动的多模态心理健康实践活动体系。心理健康教育不囿于课堂,而需扩展至家校社,形成学校主导、家庭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多模态、立体化实践体系。学校承担课程设计与统筹各类心理实践活动,使其与课堂教学内容形成呼应和延伸。例如,可定期举办“心理嘉年华”、“情绪涂鸦墙”、“心理戏剧工作坊”、“心灵音乐会”等体验项目。在家庭层面,学校可开设“家长心理课堂”、开发线上家长指导微课、“亲子心理游戏工作坊”等向家长传递科学的育儿理念与方法,营造健康和谐的家庭心理环境。在社会层面,学校宜联动社区资源,邀请心理专家、艺术家及社工进校,或引导学生走访心理服务中心、美术馆与剧院,利用丰富文化元素拓展教育模态与场景,最终构筑课堂、家庭与社会互融的育人场域。最后,立足以课例为核心的校本教研,驱动教学模式的迭代优化。学校应确立以课例为中心的校本教研机制,通过课例剖析、教学反思及行动探究,逐步精进多模态教学实践。同时,教研组定期归纳课例研究成果,形成《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配置指南》、《多模态教学课例集》及《多模态教学效果观察工具》等本土化资源。这种“实践-研究-反思-提炼-再实践”的循环上升路径,确保了多模态教学模式能够始终保有其时代适应性与实践生命力,在不断解决真实教学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持续性的迭代与优化,最终稳步提升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质量与效能。

(三) 强化技术赋能与构建支持性心理健康教育生态

多模态教学模式实施强调技术赋能,因而,合理运用教育技术工具,提升模态呈现与交互效能。技术赋能是多模态教学的重要支持,但应遵循“适度”和“有效”原则。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条件,合理运用 VR、AR、AI 等教育技术工具,提升模态呈现和交互的效果。如:可申请“人工智能+小学生心理辅导与咨询”项目,融合 AI 心理伙伴“小星”的智能对话,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供随时倾诉、获得即时回应的低压力情绪宣泄窗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小学阶段的技术应用尤需注重其“适龄性”与“引导性”。技术工具的设计与使用场景,应符合小学生的认知水平与情感需求,界面应友好,交互应简单,内容应积极。其次,营造支持性校园文化,构筑多模态教学的隐性课程。多模态教学的有效实施,需以包容、接纳及积极的校园心理文化为依托,通过环境布置、制度设计、活动开展等多种途径,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氛围。在环境布局上,可设置温馨的“心理角”、陈列学生心理主题艺术作品,并在公共区域布置积极心理暗示的标语与图像,从而通过视觉符号传递隐性支持信号。在制度规范上,应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并将心理健康理念融入校规班纪,从规范层面体现对每位学生心理成长的关爱。在活动开展方面,可充分借鉴高校及社会机构的成熟经验,以“寓教于乐”为核心理念,设计多元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文化活动。最后,建立学生心理成长数字画像,实现个性化干预与支持。基于多模态教学以“发展性”与“教育性”为理念,是实现团体与个别协同指导的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可以整合学生的学业数据、行为数据、心理测评数据等多源信息,形成全面的心理成长档案。此外,构建“通识观测、专识评测、持识监测”的三级识别体系,实现对学生心理状态识别与干预。与此同时,必须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规范与伦理审查机制,确保技术应用始终在安全、合规的轨道上运行,服务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一根本宗旨。

五、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多模态教学理论,系统整合了视觉、听觉、动觉等多种符号资源,构建了以“四维五阶”为核心的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多模态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多模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为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从“知”到“行”的转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未来多模态教学模式的深入发展仍存在部分不足:其一,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多模态教学中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其二,加强教师多模态教学素养的系统培养,提高教师在资源开发、课堂组织与多模态资源应用等专业能力;其三,健全家校社协同机制,拓展多模态教学模式实践场域,进而形成课堂内外、线上线下联动的全人教育生态。

参考文献

- [1] Wang, P., Ganushchak, L., Welie, C., & van Steensel, R. (2024). The dynamic nature of emotions in language learning context: Theory, method, and analysi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36(4), 105.
- [2] 赵秀凤,吴雨昕. 多模态教学法与体认语言学的互鉴融合 [J]. 中国外语, 2025, 22 (04): 4-10+22.
- [3] 范冰冰,李战子. AIGC 辅助的多模态话语教学路径研究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5, 8 (02): 47-57.
- [4] Ledin, P., & Machin, D. (2019). Doing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with multimodality: from metafunctions to materialit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6(5), 497-513.
- [5] 童慧,杨彦军. 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智慧课堂教学互动研究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2, 43 (03): 60-68.
- [6] 刘定一,刘会霞,乔保军,等. 基于知识图谱的多模态教学资源跨域推荐方法研究 [J].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55 (03): 262-270.
- [7] 桂丹妮,张帆,王益文. 人工智能赋能心理健康服务:突破与挑战 [J]. 心理学探新, 2025, 45 (05): 387-395.
- [8] 邳庭瑾. 多元智能理论与个性化教育:诠释、悖离与超越 [J]. 上海教育科研, 2013, (04): 5-9.
- [9] 王颖. 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 (12): 180-183.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Interdisciplinary Multimodal Teaching Mod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Liu Li¹, Sijie Sun¹, Mingzhi Shan

¹*school of Education,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of Jiangsu;* ²*school of Jiaxiang County Practical Primary School, Jining of Shandong)*

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backdrop of continuously deepening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reforms and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to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system, the traditional language-dominated approach 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inadequate in addressing 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needs of contemporar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draws on multimodal teaching theory and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rait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develop a multimodal teaching model, which is structured around the core framework of "Four Dimensions and Five Stages". Center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mpetency orientation, thematic content, teaching process, and multi-faceted evaluation, this model designs a five-stage cyclical teaching process (context creation - information input -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 practical transfer - evaluation feedback), which is operationalized through the orchestrated use of visual, auditory, kinesthetic, and other multi-modal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This study further delineates a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path that span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classroom practice,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reby laying a soli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roundwork for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ls and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in primary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ultimodal teaching theory; Four Dimensions and Five Stages; core competencies

高职院校“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重维度

王浩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 将“四史”教育深度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基于高职教育类型特征, 从价值之维、问题之维、实践之维三个层面, 系统探讨“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学理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 推动“四史”教育在高职思政课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助力学生成长为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关键词: 高职院校; “四史”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基金项目: 本文系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校级项目“高职院校‘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24SK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7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学习, 特别是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的学习教育, 作出了一系列深刻论述, 为在全社会特别是教育领域开展“四史”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高职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使命。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将“四史”教育有机融入高职思政课, 不仅是贯彻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 更是引导高职学生坚定职业理想、锤炼职业技能、矢志技能报国的内在需要。本文从价值、问题、实践三重维度, 对高职院校“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进行学理分析和路径探讨, 旨在为增强此项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提供参考。

一、价值之维: “四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的必然逻辑与时代意蕴

深刻理解“四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核心价值, 是推动此项工作的逻辑起点和动力源泉。这不仅是宏观政治要求在高职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更源于其对高职学生成长成才独特的育人功能。

(一) 筑牢信仰之基: 从历史必然性中坚定职业方向与政治立场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发挥着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意识形态的重任, 更需要帮助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正确职业价值观念”^[1]。对于高职学生而言, 学习“四史”能够帮助他们超越对历史事件的碎片化认知, 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脉络。特别是通过学习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关于经济建设、工业体系构建、科技自立自强的辉煌篇章, 学生能够深切体会到国家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例如, 从“一五”计划时期的156项重点工程到当今的“新基建”、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 无不凝聚着技术技能人才的智慧与汗水。这种历史认知, 能使高职学生将个人所学的专业技能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 深刻认识到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在国家现代化蓝图中的坐标与价值, 从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二) 涵养精神之源: 从历史人物与事件中汲取工匠精神与职业伦理

“四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鲜活素材。将这些内容融入思政课, 能够引导学生在历史的回望中感受中国精神的厚重底蕴。例如, 针对康复、养老等专业, 可以讲述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白手起家的历程, 以及吴孟超院士、“人民好医生”华益慰等模范人物“医者仁心”的

作者简介: 王 浩(1998—), 女,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王 浩

职业操守；针对数字媒体、融媒体技术等专业，可以分析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通过有机融入，使“四史”教育不再是遥远的历史叙事，而是与学生的职业技能锤炼、职业素养提升息息相关的精神滋养，有助于他们将红色基因与工匠之魂融于一体。

（三）强化担当之责：从历史经验与智慧中激发奋进之力与创新勇气

“四史”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克服艰难险阻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与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2]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未来的职业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技术攻关、工艺改进、市场竞争等都可能遇到困难。学习“四史”，就是要学习党在逆境中奋起、在困难中成长的智慧与勇气。通过学习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突破技术封锁的历史，可以激励工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在实训中勇于探索，敢于解决复杂技术问题；通过学习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可以鼓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的学生在项目创作中大胆创新，拥抱新技术、新业态。将“四史”学习中汲取的智慧与力量，转化为在产教融合平台、在真实职业场景中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是实现从历史认知到实践担当的关键一跃，也是“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最终落脚点。

二、问题之维：“四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的现实挑战与深层症结

在推进“四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的实际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亟需客观审视与深入剖析。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教学主体、客体、内容、方法与评价等多个环节。

（一）学生层面：历史认知“基础弱”与学习“兴趣低”的双重挑战

高职学生来源多样，部分学生人文社科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对“四史”的宏观历史脉络、关键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缺乏系统性、连贯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基础的不足，容易导致其在接触相对宏大的历史叙事时产生畏难情绪和疏离感。与此同时，高职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认知特点更倾向于直观、形象、动手操作式的学习方式，他们对与专业技能直接相关的实习实训兴趣更加浓厚。部分学生把“是否与专业相关”、“是否对就业有用”作为衡量课程价值的标准，容易产生“四史”内容“虚无缥缈”、“与未来工作关系不大”的片面认知，从而导致学习动机不足、内在驱动力欠缺。因此，如何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感同身受的内容，这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

（二）教师层面：理论“融合能力”与“教学资源”的双重短缺

思政课教师是“四史”教育融入的主导者，但部分教师自身对“四史”的理解尚停留在知识点罗列或片段化叙事层面，不能完全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来把握“四史”的内在联系与理论精髓。在尝试将历史内容与职业知识进行结合时，难以找到两者之间的共鸣点，使得教学内容在融合过程中显得不够自然顺畅，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此外，部分院校缺乏专门针对高职教育、具有鲜明“职业味”的“四史”教学案例库、实践教学指南等资源，教师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自行搜集、筛选、加工素材，增加了备课难度，影响教学效果。

（三）内容层面：与职业的“贴合度”及呈现方式的“时代感”有待加强

当前教学内容与高职教育强调应用性、实践性的特征贴合度不够，仍需系统性、深层次地挖掘和梳理“四史”中与工业发展、技术变革、劳动模范、工匠精神等密切相关的可用素材。例如，在讲述新中国史时，若能更多融入我国机械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在阐释改革开放史时，更加生动展现技术标准升级与管理模式创新对劳动者素养提出的新要求，可以使“四史”教育更好地赋能学生的专业认知与职业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创新教学形式。当前Z世代学生习惯于数字阅读、视觉表达与互动体验，如何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更主动地契合他们的学习特点，增强内容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从而全面提升教学成效，也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四）方法层面：教学“实践性”与学习“体验性”协同不足

“实践育人是高职院校重要的育人理念，是高职思政课引航铸魂工作的出发点、价值践行的着力点和人才培养的落脚点。”^[3]然而，当前部分高校的教学实施仍较多依赖于课堂理论讲授，实践环节的设计与融入尚显薄弱，未能充分形成“知行合一”的育人路径。例如，在组织革命场馆参观等实践活动中，若缺乏前置的知识铺垫和后期的反思总结，容易使学生的学习停留于表层认知，难以实现价值内化与精神升华。另外，在将“四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特有的实习实训、产教融合等环节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学生在专业实践与职业情境中缺乏对“四

史”精神的情境化体悟，从而影响其从历史认知、价值认同再到行为自觉的有效转化。因此，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四史”学习与专业教育在实践层面的深度融合，以增强育人实效。

（五）评价层面：育人“效果评估”与教学“反馈机制”有待构建

针对“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实际效果，现有的考核评价方式大多侧重于对学生关于历史事件、时间、人物等知识点的记忆和考查，这种单一的评价模式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精神塑造、行为表现等方面的变化和提升。同时，对于“四史”学习是否有效强化了学生的家国情怀、职业信念及工匠精神等深层次育人目标，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和评价指标。因此，高校要着力构建一个融合过程性、表现性与发展性的多元评价体系，将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展现出的素养纳入评估范围，从而为教学改进提供更精准、有力的支撑。

三、实践之维：“四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的路径探索与系统构建

基于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高职院校需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和生源特点，以“职业”为主轴，进行系统性、创新性的教学改革，搭建好“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有效路径。

（一）内容创新：构建具有“职业味”和“时代感”的教学资源体系

系统开发与专业群相匹配的分层分类“四史”教学案例库。由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及行业专家共同组建教研团队，围绕“四史”主线，深入挖掘与各专业领域紧密关联的历史素材。例如，面向技术制造类专业的学生，重点梳理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历程，以及“两弹一星”、交通铁路网、C919大飞机等重大科技工程的突破轨迹，阐释其中蕴含的自主创新精神与工匠文化。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内容表现力。“依托数字化技术推动高职思政教育转型发展，能够改变灌输式思政育人理念”^[4]，各院校应积极运用VR、AR、高清影像等新媒体技术，开发“四史”数字博物馆及历史场景还原体验等新型教学资源。通过技术赋能，使抽象的历史脉络和理论内容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认知对象，增强“四史”教育的表现力、感染力和时代适应性，从而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化学生对“四史”的理解与认同。

（二）能力提升：打造“善融合、懂职业”的复合型教师队伍

深化师资培训与学术支撑，夯实教师的融合底气。一方面，通过定期举办高质量的“四史”专题研修班、理论前沿学术沙龙等，邀请党史专家、社科理论学者深入解读历史脉络与理论精髓，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的史学素养与理论深度。同时，主动邀请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工匠大师、技术能手走进校园，使教师的教学素材更具时代性与感染力。另一方面，应设立专项课题与激励措施，支持教师开展“四史”教育与高职特有课程深度融合的项目研究，着力探索“四史”内容与不同专业学生认知特点、职业发展需求的结合点，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案例库，真正实现“以研促教、研教相长”。

建立跨学科协同备课机制，打通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可组建跨界学习共同体引导学、帮助学、促进学。”^[5]为实现“四史”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同向同行，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积极推动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结成“育人共同体”。通过建立制度化的联合备课、互相听课及教学反思机制，双方教师共同挖掘、梳理与整合专业课程体系中蕴含的“四史”元素、工匠精神、创新故事等思政素材。如思政课教师可与机电专业教师结对，在讲授“改革开放史”时，共同设计以“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挑战与新时代青年使命”为主题的专题研讨，引导学生在专业背景下深刻理解国家发展历程，自觉将个人技能报国与时代使命相连。

（三）方法优化：构建“知行合一、体验内生”的教学模式

拓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场域，实现情境浸润。“坚持按照课程化、活动化、立体化的要求，着力推进‘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6]，高职院校可推动“四史”教育实践教学与现有实习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型企业资源进行系统性对接，在选择和建设实践基地时，应优先考虑具有红色历史底蕴或能够代表新时代发展成就的先进企业、工业园区、创新园区。在此类真实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场域中，组织学生开展“沉浸式”学习，并邀请企业导师、劳模工匠结合企业发展史与个人奋斗史，现场讲授“微党课”、“微思政课”，将宏大的历史叙事具象为可感知、可触摸的鲜活故事，使学生在情境浸润中深刻感悟“四史”。

推行跨专业项目式学习，促进主动建构。围绕“四史”学习主题，设计一系列跨学科、成果导向的综合实践项目，以学生为中心，引导他们综合运用所学专业技能，在主动探究、团队协作与成果创造中深化对“四史”的理解，让“四史”学习教育入耳、入脑、入心。如可整合机电、康复、数媒等多个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传承红色基因，服务时代新貌”的主题项目：机电专业学生负责调研老工业基地的变迁或复原具有历史意义的机械装置；康复专业学生则在此基础上，组织关爱老英雄、老党员的志愿服务，传承红色医德；数媒专业学生团队全程跟拍

记录,并利用专业技能将整个调研与服务过程,创作成富有感染力的纪录片、动画或公益海报。学生可以通过这种跨专业协作的方式,实现从知识技能的“使用者”向时代故事的“讲述者”和价值精神“践行者”的转变。

(四) 评价改革:建立“多元观测、综合测评”的效果评估机制

构建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四史”教育应突破传统单一的知识考核模式,构建涵盖知识理解、能力发展、价值塑造与行为养成的多维评价体系。在具体实施中,应着重考察学生对“四史”发展脉络的把握程度,特别是在专业实践环节中展现出的历史思维与职业素养。比如在装备制造类专业实习中,应通过观察学生操作精密设备时所秉持的态度,评价其是否内化了我国工业发展历程中积淀的工匠精神;在高铁实习中,通过考察学生的服务意识与职业操守,评估其对劳动模范精神的传承情况。

建立多元评价机制。注重过程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利用,编订‘四史’教育学习档案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7],将“四史”学习成效的观测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过程。记录学生在课程讨论、实践报告、项目创作等环节中展现的历史认知与价值取向;采用答题、访谈等形式了解学生对“铁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红色基因的理解程度;通过企业导师评价,考察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表现出的职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教师可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与策略,构建起“教学—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持续提升“四史”教育的育人效果。

将“四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且需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高职教师必须立足于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和人才培养目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学习教育重要论述为根本指引,在内容上突出“职业味”,在方法上强化“体验性”,在主体上提升“融合力”,在评价上注重“综合性”,才能引导学生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锤炼工匠精神,最终成长为德技并修、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高职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夏天添,黄东,王慧,等.高职思政课厚植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理论探索及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7):88-95.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
- [3] 李丽娜,武智.高职思政课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2,(11):85-89.
- [4] 刘君梅.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范式的构建——评《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J].高教探索,2025,(05):2.
- [5] 罗珍.高职思政课教师的素养要求及提升路径[J].思想政治课教学,2023,(03):86-89.
- [6] 李正兴,陈惠萍.“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路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4(06):11-16.
- [7] 戴海容.精准思政视角下新时代高职院校“四史”教育路径论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01):72-74.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grating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ang Hao

(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ifang, Shandong)

Abstract: Deeply integrating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and cultivate new era talents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Based on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and path innovations of integrating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value, problem and practice, and promotes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of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elp students grow into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具身认知视域下城市儿童科普空间建设研究

高雯吴钰

(常州工学院, 江苏常州, 213032)

摘要: 身体是儿童认识和理解世界最本能的方式。具身认知认为知觉的主体是身体, 身体的感知觉和动作体验决定了意识和认知的最终结果。本文结合具身认知理论, 探讨了城市儿童科普空间的建设现状、需求分析及建设策略。通过对常州市现有儿童科普空间的调研, 发现当前空间设计在空间主题、展品更新及互动参与方面仍有不足。并进一步从儿童的感知经验、互动参与及信息传递需求出发, 提出了具身认知视域下的空间设计策略, 旨在为城市儿童科普空间的科学教育和设计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具身认知; 儿童; 科普空间; 互动展示

基金项目: 常州工学院产教融示范合课程建设“科学实验”(编号 CJRHKC2023-2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8

引言

科学教育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 公民科学素质快速提高。2023年5月,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旨在适应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需要, 为中小學生提供更加优质的科学教育, 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当前我国科学教育还存在着基础总体薄弱、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现象。大部分地区科学教育资源尚未有效整合, 存在社区资源统筹支撑性不足、科学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科学实践教育实施程度较低等问题。因此, 如何利用好现有基础资源, “孵化”儿童科学精神与创新素质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意见》中强调, 要用好社会大课堂, 做实科学教育。博物馆、科技馆、青少年宫是儿童校外学习科学知识、科学原理的重要场所, 也是激发他们的科学兴趣、培养探索精神的有利资源。然而, 高密度的城市环境、标准化的游乐设施以及日益减少的自然接触,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认知发展和探索天性构成了挑战。大部分面向儿童的科普展示空间以各种立体科普装置为主, 展品讲解通常辅之以文字影像, 专业性强、趣味性少。传统的科普教育模式, 如以静态展板和抽象概念为主的博物馆或科技馆, 这类体验形式更偏向于让儿童被动接受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 往往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更无法满足他们通过身体感知和动手实践来理解世界的本能需求。

身体是儿童认识和理解世界最本能的方式。具身认知认为知觉的主体是身体, 身体的感知觉和动作体验决定了意识和认知的最终结果。儿童认知的过程需要将儿童具身经验与情景环境产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面向儿童的科普教育空间, 若能将展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与情景与儿童的具身行为联系起来, 尊重儿童本能的无意识学习行为, 对新时代加强科学教育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具身认知理论概述

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 是建立在对传统哲学中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基础上的, 一种强调认知过程与身体及其互动环境之间紧密联系的理论。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 身体和灵魂是对立的, 身体感官的体验被视为束缚灵魂的障碍, 灵魂的纯洁和理性被认为是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唯一途径。^[1]然而, 从19世纪开始, 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身体在哲学中的地位。费尔巴哈将身体视为感性哲学的基础, 强调身体是自我本质的一部分。马克思则认为, 身体既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 二者密不可分, 只有在二者协同作用下, 认识活

作者简介: 高雯吴钰(1995—),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学前融合教育、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

通讯作者: 高雯吴钰

动才能发生。^[2]海德格尔提出的“此在”概念强调了身体的能动性，认为人的认知活动建立在身体的基础上。梅洛-庞蒂则从知觉现象学出发，认为身体是表达现象和现实性的场所，世界与身体紧密相连，身体是个体认识世界的基础。^[3]

在认知科学领域，具身认知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皮亚杰认为，认知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动态构建的，身体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多罗希提出的具身认知阶段则认为，具身性是认知活动的基础，个体在世界中的具身实践构成了意义和行动的来源。^{[4][5]}

总的来说，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依赖于身体的结构、运动和体验，认知过程与身体不可分离，情境性和系统性是其重要特征。认知不仅是大脑的活动，而是由大脑、身体和环境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身体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发挥因果作用，还作为认知过程的核心要素。在此背景下，将具身认知理论融入城市儿童空间设计，成为提升儿童学习体验与效果的关键突破口，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设计儿童科普空间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

二、儿童科普空间中的具身意蕴

“儿童科普空间”是指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科学知识展示与互动学习场所。^[6]通过结合科学与趣味的展示内容和互动方式，旨在培养儿童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在儿童科普空间的设计与实践，具身理论扮演着重要角色。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在认知、思维和实践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身体不仅是认知的载体，更是知识生成与创造的关键媒介。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具身认知理论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国外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具身体验能够显著增强学习效果，尤其是在科学教育领域；而国内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了具身认知理论在教学设计中的应用，如互动式教学和游戏化学习等。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具身认知理论中的核心特征，如涉身性、情境性和生成性，能够有效促进儿童的科学认知与创造力的发展。^[7]

（一）身体感知是科学探究的认知基础

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指出：“儿童通过自身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构造了自己的心智状态。”可以说，身体就是儿童科学探究的起点。儿童通过身体的感官，如视觉、听觉、触觉等，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这种通过身体感知获取的信息是科学探究的第一步，为儿童的认知构建提供了原始数据。例如，在植物科普展览中，儿童可以通过触摸不同质地的叶片、闻嗅花朵的香味、观察植物的颜色变化，直观地感知植物的多样性。相比于单纯的文字或图片，身体感知带来的直接体验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儿童的好奇心，促使他们进一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科学原理。

（二）身体经验是思维发展的重要基石

儿童的身体经验不仅仅是对世界的感知，更是他们思维发展的重要基石。通过身体的互动和探索，儿童逐渐积累起对外部世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身体感知还促使儿童提出许多科学问题，并推动他们进行深入探究。例如，美国儿童哲学家马修斯在其著作《哲学与幼童》中记录了许多基于身体经验而产生的科学问题，如“为什么物体在飞机起飞时会变小？”、“为什么我有两个眼睛却看不见两个爸爸？”等^[8]。这些问题不仅体现了儿童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更反映了他们围绕着身体经验而进行的科学思考。

不仅如此，儿童通过身体活动，如动手操作、实验演示、情景模拟等所获得的经验，能够帮助他们将抽象的科学概念具体化，使之更易于理解和内化。例如力学实验中，儿童通过亲手搭建结构物、施加不同的力，能够直观地理解力与结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这种通过身体经验获得的理解，比单纯依赖书本知识更为深刻且持久。身体经验不仅帮助儿童将复杂的科学原理具体化，还能够增强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三）身体行动是科学创造的表现方式

科学创造不仅仅依赖于理论知识的积累，更需要通过身体行动来实现。身体行动为儿童提供了将想法转化为现实的途径，是科学创造不可或缺的实践方式。在儿童科普空间中，身体行动往往以动手实践、实验操作、模型制作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活动不仅锻炼了儿童的动手能力，更培养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例如，机器人编程工作坊中，儿童通过编写程序、组装零件、调试机器人，能够亲身体验从概念设计到实际操作的全过程。这种身体行动不仅巩固了儿童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还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和改进，逐步培养出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此外，身体行动中的失败与尝试也是科学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教会儿童如何应对挑战、反思问题，并最终在不断的实践中实现创新与突破。

综上所述，儿童科普空间中的具身意蕴体现在身体感知、身体经验和身体行动三个方面。通过强调身体在科学认知、思维发展和创造实践中的重要性，儿童科普空间能够更全面地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具身认知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儿童在科普空间中探索科学、理解世界、创造未来的核心动力。

三、城市儿童科普空间中的具身困难

近年来，常州市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2024年4月30日，常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常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条例》，旨在优化儿童成长环境，保护儿童身心健康，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当前，常州市儿童科普空间主要集中在科技馆、博物馆和各区、镇设立的儿童教育基地等场所，这些空间承担了儿童科学知识普及的重要任务。然而，尽管这些场所设施相对完善，但在主题设置、展品更新和互动体验方面仍存在不足。

（一）空间主题单一性

截至2025年初，常州市7个区共有群众艺术馆（文化馆）8座、博物馆30座以及64座尚未备案登记的展馆，其中涵盖了国有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名人纪念馆、村史馆、私人收藏家展馆等各类型场馆。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展馆为历史文化类展馆，科学探索类场所较少。大部分展馆的展品主题较为单一，展览内容重复性增加，难以持续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和兴趣。传统的展馆设计建设的过程中，在目标上更侧重于儿童知识内容的传递和科学技能的普及，很少关注儿童个体感受与情境的链接，实际上脱离了身体感知以及与情景的联系，处于假性身体参与层面，身体仍然处于缺席地位。儿童作为好奇心旺盛且易于受到新鲜事物吸引的群体，对内容的重复表现出迅速的厌倦情绪，这使得科普空间难以保持对其的长期吸引力。

（二）展品更新滞后性

部分场所展品的更新频率较低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许多科普展品却未能及时更新，无法反映最新的科学进展和技术创新。这种滞后的展品更新不仅降低了科普空间的教育价值，也削弱了其作为教育资源的时效性。展品缺乏更新与创新，会导致儿童无法获得与时俱进的科学知识，从而限制了其科学素养的提升。

此外，部分展品缺乏创新，未能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为儿童提供新鲜的体验。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场馆已开始尝试引入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以增加展品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但由于技术成本和操作复杂度，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仍然有限。

（三）互动参与局限性

互动性与参与度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尽管近年来增加了一些电子互动装置，但整体上，许多科普空间依然偏向于传统展览模式，互动性较弱，儿童的参与感较低。这种情况导致教育效果有限，儿童无法通过互动深入理解科学概念。以常州市某科技馆为例，该馆的互动装置多为简单的按钮操作，缺乏挑战性和趣味性，未能充分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现有的科普空间多为成人设计，缺乏对儿童空间尺度和行为特征的充分考量。儿童在参观过程中往往感到不适或难以充分参与，身体感知和探索行为未能在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某些展厅的展品高度设置较高，儿童需仰视或跳跃才能看到展品，导致观展体验不佳。此外，空间布局的单一性也限制了儿童在科普空间中的自由探索和互动。

四、儿童科普空间建设需求分析

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空间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相应地对空间的需求也表现出独特的特征。因此，在儿童科普空间设计过程中，年龄因素是重点考量的因素之一。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可以系统地归纳出儿童在科普空间使用上的各类需求（见图1）。

（一）空间感知需求

空间的造型设计应结合儿童的身体经验，将他们熟悉的二维图形转化为具有趣味性和吸引力的展示造型。这种基于经验的具象化设计不仅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还可以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方式，使科普内容更加生动有趣，鼓励儿童主动融入展示空间，形成一种亲切而放松的展览氛围。展示空间的尺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儿童的身体尺寸和视觉特点。由于儿童的身高和视线高度不同于成年人，且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点。例如，儿童的身高范围通常在 75 厘米至 165 厘米之间，视线高度在 60 厘米至 150 厘米之间。同时，研究表明，低龄儿童的视觉范围较成年人更为有限，因此，空间设计需要适应这些视觉与身体特征，以确保儿童能够轻松感知和探索空间。

除此之外，感官体验在儿童对展示空间的理解和互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在参观展览时，不仅依赖视觉和听觉，更可能通过触摸、嗅闻来获取信息。心理学研究指出，当信息通过视觉和听觉同时传递时，人们可以记住内容的 50%；而当五感同时参与时，记忆率可高达 90%。因此，展览空间的设计应结合多种感官体验，创造出既具科学教育意义又充满趣味性的展示环境。例如，可以在展览中加入模拟自然环境的元素，如风、雨、雷电等，让儿童在体验自然现象的同时，学习相应的科学原理，让儿童能够通过全身心的感知与互动，更深刻地理解科普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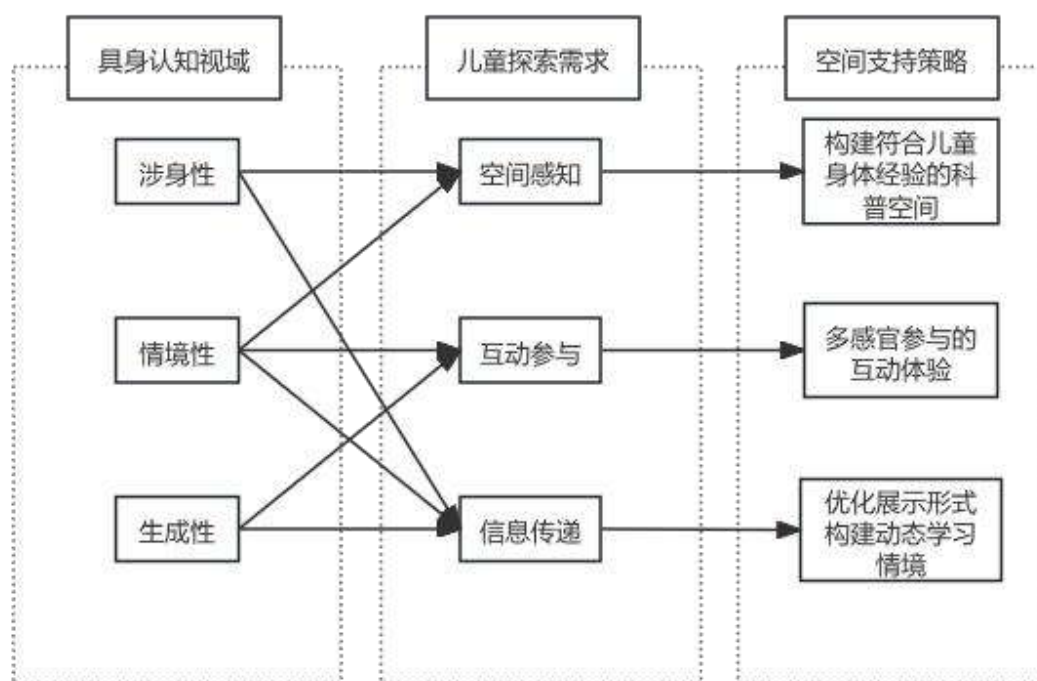


图1 具身认知视域下儿童科普空间探索需求与支持策略

（二）互动参与需求

具身理论强调具身学习的生成性特征，通过身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信息交换和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从而构成完整的个体认知体验。生成性体验只能在动态变化的空间中实现。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强调躯体活动对儿童心智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提出“做中学”，突出儿童的认识发展是无法与实践活动相脱节的。因此，在设计科学探究共同体时，应当构建一个能够支持生成性和互动参与的学习空间。这样的空间不仅要允许儿童在特定的探究情境中进行自由探索，还应将学习本身真正还给儿童，让他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增强体验和感受。科普空间设计应满足儿童的探索行为和社交需求。例如，设置能够激发儿童动手操作的互动展项，如实验台、模拟装置等，通过任务式互动引导儿童在实践中学习科学原理。同时，应预留适合儿童群体互动的空间，鼓励他们与同伴共同探索与讨论。这种设计不仅鼓励了儿童在与他人进行身体协作时产生新的学习与创造，还能够在互动中激发他们对知识的深度探究与创新思维的发展。

（三）信息传达需求

科普空间中展示内容的选择和传达方式应充分考虑儿童的理解能力。具因此展品的选择、展示形式的安排以及展示环境的构建都需要精心设计，以适应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具身认知理论认为，知识的传递不仅仅是符号和语言的传达，还应结合情境和体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指出，儿童的大脑发育和认知能力在不同年龄段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科普展览的设计应当灵活调整，以满足这些阶段性需求。

前运算阶段（2-7岁）的幼儿感性认知能力逐渐增强，展览设计可以通过更加丰富的视觉形象和生动的场景设置，引导儿童进行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和初步的逻辑思维训练。对于具体运算阶段（7-11岁）的儿童，展览设计应重点放在具象逻辑的教育上，通过具体的物理操作、实验演示和互动活动，帮助儿童建立起初步的科学理解和逻辑推理能力。至于形式运算阶段（12~15岁）的青少年，随着认知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展览设计可以更多地采用抽象和概念化的展示方式，以激发青少年对科学原理和复杂理论的兴趣与理解。

五、具身认知视域下城市儿童科普空间建设策略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持续互动而生成的，这意味着儿童在学习和探索过程中，其身体感知和经验起着关键作用。城市儿童科普空间的建设策略应充分考虑儿童的身体感知和经验，强调互动性和动态生成性，支持感官整合与运动学习，构建适合儿童认知发展的学习环境。基于此，科普空间的设计应围绕这一理念，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设策略。

第一，构建符合儿童身体经验的科普空间。在空间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儿童的身体感知特征。设计时可通过空间造型、感官体验和尺度控制，为儿童提供一个适合其身体和认知发展的环境。例如，通过形象化的空间设计，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如将宇宙、动植物等科学主题融入空间结构，使儿童在探索空间时感受科学的魅力；同时，通过结合光影、声音、触感等多种感官体验，将运动与听觉反馈联系起来，增强展示的沉浸感，促进儿童的感官整合能力。在设计展览内容时，可以为幼儿提供低矮的展示台和更加容易触及的互动装置，以适应其身高和视角。空间中的通道和动线应宽敞且安全，允许儿童自由活动并探索环境，避免因空间局限而影响其体验和学习过程。

第二，强化互动性展示内容，构建多感官参与的互动体验以提升儿童的学习效果。互动装置是实现具身学习的核心媒介。设计应从单纯的按钮式交互，转向调动全身参与的深度互动。设计过程中应注重互动展项的创新，增强儿童在展示空间中的参与感。例如，设计具有挑战性的互动任务，提供大量可由儿童亲手移动、组合、搭建的“可移动与可重构”的物理装置，如不同尺寸的齿轮、管道、杠杆、滑轮组等，激发儿童的动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通过互动式任务让儿童在参与中学到科学知识；同时，应设置适合儿童集体活动的展示项目，如团队游戏、合作实验等，增强儿童的社交能力和合作意识，从而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展览内容可以通过动态的展示形式，如触摸屏、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通过全身的动作和手势与多媒体内容进行交互，身体本身成为了学习的接口，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沉浸感，使儿童能够通过身体的直接参与来感知科学现象。

第三，优化展示形式，构建动态学习情境，使知识传达更具吸引力和教育性。具身认知不仅关乎个体，也发生在社会互动中。因此在具身认知视域下，意义的传达应结合情境和体验。科普空间应设计为一种开放且可变的环境，使儿童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进行探索。可以在科普空间中设置团队挑战活动或合作实验项目，鼓励儿童在与同伴的合作中分享知识和经验，培养其社交技能和团队合作精神。这种通过互动与合作形成的学习体验，不仅有助于儿童更好地理解科学概念，还能有助于增强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

结语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已成为绝大多数儿童成长与学习的主要环境。从“儿童友好城市”到“儿童友好社区”再到“儿童友好型公共空间”，高密度的城市环境、标准化的游乐设施以及日益减少的自然接触，对儿童的身心健康、认知发展和探索天性构成了新的挑战。具身认知理论为城市儿童科普空间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强大而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要求我们从“为儿童设计”转向“与儿童的身体一同设计”。将空间视为一个动态的、可互动的、认知性的学习伙伴，而非静态的知识容器。未来的城市儿童科普空间将不再是孤立的建筑，而是渗透到城市肌理中的分布式学习网络。在具身认知视域下，儿童科普空间的设计不仅应关注其外在形式，更应深入融合儿童的身体感知、行为互动和意义传达。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丰富互动展项以及创新展示方式，提升儿童在科普空间中的学习体验和认知效果。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具身认知理论在儿童教育设计中的应用,探究技术融合与科普空间建设的新路径。同时考虑不同城市的文化背景和儿童的特定需求,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普空间设计策略,为提升城市儿童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在行走、奔跑和嬉戏中,用整个身体去感知和理解科学,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具备创新和协作能力的下一代公民。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 柏拉图著.斐多: 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M]. 杨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著. 知觉现象学 [M] 姜志辉,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4] Paul Dourish. Where the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s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 [5] 高振宇, 濮琳. 具身认知视域下儿童哲学学习空间的重构[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25(06): 85-96. DOI: 10.13763/j.cnki.jhebnue.2023.06.012.
- [6] 熊建文, 汪静瑶, 林皎皎.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儿童科普展示空间设计研究[J]. 工业设计, 2022, (02): 94-96.
- [7] 艾兴, 曹雨柔. 现象学视角下的学习再认识[J]. 教学研究, 2022, 45(2): 10-14.
- [8] [美] 加雷斯·B. 马修斯著. 哲学与幼童 [M]. 陈国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Children'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p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Gao Wenwuyu

(Normal school,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body is the most instinctive way for children to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the world. Embodied cognition holds that the subject of perception is the body, and the sensory and motor experiences of the body determine the final outcomes of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status, demand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urban children'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pace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existing children'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paces in Changzhou C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patial design still has deficiencies in terms of spatial themes, exhibition update, and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starting from children's needs for sensory experience,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 paper proposes spatial desig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cience education and design of urban children'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paces.

Keywords: embodied cognition; childre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paces; interactive display

文化两创背景下博物馆研学旅行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陈 矿¹ 杨艳玉¹

(1.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 在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传播创新的“文化两创”战略背景下, 博物馆作为承载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其研学旅行已成为连接文化传承与实践教育的核心纽带, 同时也是实现美育功能、培育公众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博物馆研学旅行的发展现状, 分析其在文化两创中的独特价值, 剖析当前存在的资源转化不足、课程适配性差等问题, 从资源深度开发、课程体系创新、协同机制构建等维度, 探索博物馆研学旅行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关键词: 文化两创; 博物馆; 研学旅行; 教育创新

基金项目: 四川研学旅行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文化两创视域下博物馆研学旅行研究”(项目编号: YX24-12); 巴蜀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数智时代成都城市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策略”(项目编号: 2025YB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59

一、文化两创视域下博物馆研学旅行的核心价值

文化两创战略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而博物馆研学旅行恰好搭建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桥梁, 更成为落实美育教育、培育公众审美素养与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 其价值维度体现在文化、教育、社会三个层面的深度融合, 同时兼具审美培育的独特意义。

(一) 文化传承价值: 实现传统文化活态转化

博物馆研学旅行打破了传统博物馆“静态展示”的局限, 通过情境复原、互动体验等方式让文物活起来,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抽象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体验。如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通过数字化技术复原商代生活场景, 观众不仅能沉浸式感受商代的社会风貌, 还能从青铜器的纹饰、甲骨的文字形态中感知古代审美意趣, 这种活态传承模式既保留了文化遗产的核心内涵, 又通过当代视角的解读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力, 契合文化两创中“创造性转化”的核心要求, 同时让观众在文化体验中完成对传统美学的直观感知与深度认同。此外, 博物馆研学旅行还能通过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 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例如在青铜器研学中, 结合范铸法的工艺讲解与器物的造型美学分析, 让学生既了解古代科技水平, 又体会传统工艺的审美智慧, 这种文化与审美的双重传递, 让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再局限于知识记忆, 而是成为审美体验与文化认同的深度融合过程。

(二) 教育创新价值: 构建知行合一育人模式

博物馆研学旅行以“观、思、行”的闭环链路, 弥补了传统学校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短板, 构建了跨学科、体验式的全人教育体系, 也为博物馆美育提供了“理性认知与感性体验结合”的实施路径。通过将历史、艺术、科学、技术等多领域知识融入研学过程, 学生在接触文物、参与实践中打破学科壁垒, 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 这与博物馆美育的跨学科融合教育模式一脉相承。

黑龙江省博物馆“相约龙博”研学项目, 将馆藏文物与语文、美术、科学等教材内容有机结合, 在讲解金源文化文物时, 既引导学生分析器物的艺术造型与色彩美学, 又结合历史背景探讨其文化寓意, 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深化知识理解, 同时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南京博物院的南博美育课程也为博物馆研学提供了借鉴, 其将文物鉴赏与艺术创作相结合, 通过艺术史的顺序串联研学内容, 让学生在感受艺术之美的同时, 对地域历史文化形成系

作者简介: 陈 矿(1980—),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美育;

杨艳玉(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影视编导、影视教育。

统性认知, 彰显了文化两创背景下教育创新与美育融合的实践路径。

(三) 社会融合价值: 搭建多元协同文化传播平台

博物馆研学旅行通过整合馆、校、社、企等多方资源, 形成了协同育人的文化传播网络, 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多元创新, 同时也让博物馆美育突破场馆边界, 成为面向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联动区内外博物馆推出“行走的广西博物馆”活动, 构建了区域性文化传播矩阵, 不仅将壮族铜鼓、绣球制作等非遗技艺融入研学课程, 还通过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 让公众在体验非遗技艺的过程中感受民族美学的独特魅力。该活动还联合当地文旅企业设计研学专线, 串联博物馆与非遗传承基地、民俗村寨, 让研学体验从场馆延伸至文化原生地, 高校民俗学专家则全程参与课程设计, 为公众解读非遗技艺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审美源流。

这种多元协同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更通过公众参与激发了文化创新的内生动力, 践行了文化两创中创新性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时, 博物馆研学还面向特殊教育人群设计适配性美育课程, 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研学模式, 让美育资源惠及更多群体, 真正实现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走下云端、走进基层的社会价值。

二、当前博物馆研学旅行发展的现实困境

尽管博物馆研学旅行在文化两创中具有重要价值, 但在实践推进中仍面临诸多瓶颈, 制约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除资源转化、课程设计与协同机制的传统问题外, 美育功能的挖掘与数字化应用也存在明显短板。

(一) 资源转化浮于表面, 文化内涵挖掘不足

多数博物馆研学仍停留在“参观+讲解”的浅层模式, 对展品背后的历史逻辑、文化内涵与科技原理挖掘不够深入, 更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内涵。在青铜器专题研学中, 多数机构仅介绍展品的时代与用途, 却忽视范铸法与当时生产力的关联, 也未分析器物的造型、纹饰所体现的审美特征; 自然类博物馆缺乏标本与生态系统的串联讲解, 同时忽略了自然标本的形态美学与生态审美教育, 导致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与美育价值未能充分释放。

此外, 场馆空间利用率低的问题也加剧了资源转化的浅层化, 即便部分博物馆开设了互动体验区, 也多是拓印、拼图等浅层活动, 未能将体验项目与知识探究、审美培育深度结合。例如在拓印体验后, 未设计“甲骨文、金文、小篆的字形美学变化”探讨环节, 使得体验仅停留在娱乐层面, 未能实现文化知识 with 审美能力的双重提升。

(二) 课程设计适配性差, 缺乏分层创新意识

当前博物馆研学课程存在严重的同质化与错位问题, 未能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进行分层设计, 且与学校教育体系衔接薄弱, 同时缺乏针对审美素养与文化认同的评价机制。部分研学活动出现“小学讲理论、中学玩游戏”的不合理现象, 且未结合中小学课程标准开发内容, 导致知识断裂, 难以满足文化两创对创新能力与文化素养培育的要求。

从美育视角来看, 研学课程既未针对不同年龄段设计差异化的审美体验内容, 也未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考查学生的审美感知力、文化认同度。例如开展丝绸之路研学活动时, 若仅介绍古代兵器而脱离课程标准中的历史与艺术知识点, 不仅造成知识衔接的断裂, 也无法引导学生从丝路文物的艺术风格中感受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审美魅力。多数研学活动以完成参观为目标, 既不能考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也无法反向驱动课程在美育与文化传承层面的优化。

(三) 协同机制松散低效, 多方力量未能整合

馆校合作多为一次性参观, 缺乏前期需求调研与后期跟踪服务, 研学项目未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计划。同时, 多数博物馆未能有效整合文旅机构、专业志愿者、高校专家等社会力量, 而美育领域的专业人才的缺失, 也使得研学课程的审美培育环节难以落地, 既懂文博知识又具备美育教学能力的复合型导师稀缺, 无法将文物的审美价值转化为适配不同学段的研学内容。

中小型博物馆受资金、人才限制, 更难以开发高质量研学产品, 导致区域间、馆际间发展失衡, 出现“大馆超负荷、小馆资源闲置”的马太效应。此外, 数字化技术在研学中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 未能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 也未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不同受众定制个性化的美育研学内容, 部分博物馆即便引入数字化设备, 也仅用于展品展示, 未与研学课程的互动环节深度融合, 制约了博物馆研学在文化两创背景下的创新发展。

三、文化两创背景下博物馆研学旅行的创新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需以文化两创战略为引领,结合博物馆美育功能的挖掘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从资源开发、课程设计、协同机制、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博物馆研学旅行的高质量发展体系。

(一) 深化资源转化,挖掘文化核心内涵

以“四位一体”解读路径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科技、文化与艺术价值,打破单一信息传递模式,将审美培育融入资源转化的全过程。自然类博物馆可建立微观观测实验室,让学生通过观察植物标本细胞结构探索生态规律,同时引导学生从植物的形态、色彩中感知自然之美,分析不同环境下植物形态的审美适应性;历史类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体验坊,让学生在清洗铜锈、拼合碎块的过程中了解文物保护知识,同时结合文物的修复过程探讨传统工艺的审美标准与当代修复的美学原则。

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发主题资源时,需融入地域美学元素,如黑龙江省博物馆围绕赫哲文化、金源文化打造特色课程,在讲解赫哲族鱼皮画时,既介绍其制作工艺的文化内涵,又分析鱼皮画的图案、色彩所体现的渔猎文化审美特征,让地域文化成为研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成为美育的鲜活载体。此外,还需优化场馆空间功能,打造复合型应用空间,如在拓印体验区增设汉字形态美学对比研讨环节,让实践操作与审美探究深度结合,实现文化资源向教育资源与美育资源的双重转化。

(二) 优化课程设计,构建分层创新体系

按照不同学段认知特点设计差异化课程,形成“小学趣味化、初中实践性、高中研究性、成人项目式”的分层体系,并将美育目标融入各学段课程设计中。小学阶段开展情境化游戏教学,通过角色扮演、拼图游戏等形式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以故宫屋脊走兽为主题的研学活动里,让学生通过情景剧演绎理解走兽的文化寓意,同时引导他们观察走兽的造型比例、色彩搭配与纹饰细节,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传统建筑的美学特质;初中阶段以问题驱动跨学科探究,在丝绸之路主题研学中,让学生分组设计古代贸易路线并分析可行性,同时引导他们搜集不同地域的丝路文物资料,对比器物在造型、纹饰上的风格差异,探究背后不同文明的审美取向;高中阶段引入课题研究,在敦煌研学中围绕丝路精神展开研讨,结合莫高窟壁画的线条运用、色彩搭配与构图方式,分析东西方文化交融在艺术层面的审美表现;大学及成人阶段则开展项目式实战学习,鼓励参与者以博物馆文物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为灵感进行艺术创作,部分研学项目还会联动非遗传承人开展指导,让创作者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锻炼创新思维,提升审美表达的深度与广度。

同时,编制《博物馆研学课程与中小学课标衔接对应手册》,明确研学内容对应的课本知识点与美育目标,同时建立“评价—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从小组报告的逻辑性和完成任务创新性考查探究能力,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了解学生对文化的认同度和审美感知力的变化情况。评价过程中还会引入博物馆研学导师、学生互评等多元主体,除了书面调研,还会通过课后座谈的形式收集学生的真实体验与建议,将这些反馈分类整理后,联合学校教师与文博领域专家共同研讨课程优化方向,以此不断调整课程内容与实施形式,让课程既紧密贴合学校教育体系的要求,又能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美育培育的双重目标。

(三) 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研学品牌

首先,开展地域文化资源普查与梳理。博物馆联合地方文旅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组建专项调研团队,不仅查阅地方史志、非遗档案等文献资料,还实地走访非遗传承地、历史文化遗址与民俗村落,系统挖掘本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非遗技艺等特色资源。调研过程中会对收集到的资源进行分类归档,按照教育适配性、文化独特性、体验可操作性等维度进行评估,筛选出具有代表性、教育性、创新性的文化元素。其次,设计地域特色鲜明的研学课程与活动。将地域文化元素深度融入课程设计的各个环节,从知识讲解到实践体验层层渗透,形成“地域文化+跨学科探究”的课程模式。例如西南地区博物馆结合彝族刺绣技艺,设计融合美术纹样分析、民族历史探究的研学课程,让学生在刺绣实践中理解民族文化的审美内涵;西北博物馆依托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文化,打造包含历史地理考察、壁画艺术临摹的跨学科研学活动。最后,加强地域研学品牌的宣传与推广。通过举办地域文化研学节、博物馆研学成果展等线下活动,集中展示研学课程的实践成果与地域文化魅力;同时将博物馆研学与地方特色旅游线路深度结合,比如把中原古都的博物馆研学与周边古城遗址游览串联起来,还可联合地方媒体推出研学主题短视频,通过真实的研学体验故事扩大品牌影响力,让地域文化真正成为文化两创的鲜活载体。

四、结语

在文化两创战略指引下,博物馆研学旅行是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教育模式革新的关键纽带,更是挖掘博物馆

美育功能、培育公众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载体。本文通过剖析其在文化、教育、社会层面的价值与现实困境,从资源开发、课程创新、品牌打造等维度提出发展路径,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体实践思路。未来,需持续深化馆校社协同,加大对中小博物馆的资源与人才扶持,以数字化赋能打破边界,让研学旅行既扎根文化根脉,又契合时代需求。

参考文献:

- [1]唐郦薇.以跨学科思维创新博物馆研学课程[J].纪念馆研究,2025.
- [2]张玉艳.博物馆推动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J].南宁博物馆文集,2024.
- [3]裴媛媛.论博物馆提升休闲教育文化新质生产力:逻辑、形势与策略[J].文化艺术研究,2025.
- [4]何东蕾.基于协同育人理念的博物馆教育:认知、现状与策略[J].中国校外教育,2025.
- [5]王宜梁.博物馆美育的特质与教学路径[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4.
- [6]张韶明,张乾元.教育视角下的遗址博物馆展示叙事研究——以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为例[J].装饰,2024.
- [7]宋炯,朱雯文.集群化发展模式下的博物馆教研融合之路[J].中国博物馆,2024.
- [8]林源源.博物馆教育功能拓展及其体系化建设[J].南京社会科学,2024.
- [9]杜欢欢,曹旭斌.文旅融合背景下馆校协同育人路径——以平凉市博物馆为例[J].旅游纵览,2025.
- [10]杨艳梅.新时代博物馆研学品牌的创新与实践——以殷墟博物馆“商传千年铸未来”研学品牌为例[J].安阳工学院学报,2025.

Innovative Path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Museum Study Tou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Chen Kuang¹, Yang Yanyu²

¹ College of Chinese & ASEAN Arts,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 Creations" strateg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novation, museums, as important carriers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ve seen their study Tours become the core link connect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ublic cultural confidence. This article,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museum study Tours, analyzes their unique value i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dissects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and poor course adaptability, and explor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museum study Tour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depth resource development,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Keywords: Cultural dual creation; Museum; Study tou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大学生感知的人工智能焦虑与就业压力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沙成成¹ 王 林¹

(1.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4)

摘 要: 研究探讨了大学生人工智能焦虑与就业压力的时间序列关系。对 185 名高职大学生两波次的数据收集, 构建了大学生人工智能焦虑与就业压力交叉滞后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AI 焦虑本身具有显著的时间稳定性, 并且对就业压力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而就业压力虽然具有显著的时间稳定性, 但对 AI 焦虑不具备显著的时间效应。

关键词: 高职大学生; AI 焦虑; 就业压力; 交叉滞后模型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广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课题“广西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 AI 焦虑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影响及对策研究”(GXRS2025056); 2025 年度广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课题“数据要素市场化背景下广西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GXRS2025161); 2024 年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引进科研专项 (GXSTKYZX20240603)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0

一、引言

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社会运行方式和劳动就业结构。AI 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效率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 也带来了职业不确定性和技能适应压力, 尤其在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面对不断加速的技术迭代, 部分大学生产生了知识不足、能力落后及职业被替代的担忧, 从而形成了“AI 焦虑”^[2]。与此同时, 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不断增加, 现在大学生就业环境本身具有高度竞争性, 再加上岗位要求的不断提高, 就业压力在不断上升。在就业环境不断内卷的情况下, AI 焦虑可能与就业压力交互影响, 并对大学生的就业信心与求职准备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 AI 焦虑在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 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员工, 较少关注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3]。而大学生处于大学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身份过渡的重要阶段, 对于技术变革的感知具有敏感性。大学生既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又要面临未来职业选择, 因此更容易受到 AI 技术发展带来的情绪影响。此外, 横断面数据难以揭示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之间的因果方向, 难以判断两个变量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形成循环效应, 导致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无法采取针对性的心理与就业支持措施。因此, 本研究采用两波纵向数据与交叉滞后模型, 系统探讨 AI 焦虑与大学生就业压力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通过识别关键影响路径, 为高校开展就业指导提供科学依据, 也为理解大学生在技术变革时代的心理适应机制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由 Bandura 提出, 是解释外界缓解与心理变化机制的重要理论。该理论强调外部环境因素、个体内部认知因素以及行为结果三者之间并非单向影响, 而是存在持续互动的“三元交互决定论 (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4]。外界环境会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绪体验, 而个体的认知与情绪又会进一步引发其行为反应, 行为结果反过来影响个体对环境的感知方式。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技术变革作为重要的外界环境变量, 会影响个体对职业未来、能力契合度和技术要求的评估, 从而引发焦虑、担忧等心理问题。

作者简介: 沙成成(1995—),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 AI 教育赋能;

王 林(1981—),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通讯作者: 王 林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将 AI 带来的技术变革视为大学生面临的外部刺激,将 AI 焦虑视为个体内部的心理认知,将就业压力作为其行为结果的具体表现。理论上,技术环境的变化会首先影响大学生对自身能力和未来就业的担忧,引发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同时,就业压力作为对外界竞争与自我能力判断的一种行为反应,也可能反向影响个体对技术的感知与风险评估,进一步加深 AI 焦虑。基于此,分析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作用与时间延迟效应,为交叉滞后模型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

(二)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的关系研究

AI 技术的快速扩张正在显著改变就业市场结构,使大学生面临技术要求提升、岗位结构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进而引发了不同程度的 AI 焦虑^[5]。已有研究指出, AI 焦虑通常表现为对技术能力不匹配工作的担忧、对未来岗位被替代的恐惧以及对未来职业无法有效适应的怀疑^[6]。这种焦虑不仅是一种情绪体验,也是一种认知过程,会影响个体对就业环境的主观判断。例如,感知到的 AI 技术威胁越强,大学生越容易形成“竞争加剧”“能力不足”的认知,从而强化就业压力的感知。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AI 焦虑可能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情绪路径上,焦虑会降低个体的情绪稳定性,提高应激水平,使其在面对就业任务时更容易产生紧张、不安等情绪反应。认知路径上,焦虑会削弱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使其在面对就业任务时更容易低估自身能力,放大外界竞争威胁。行为路径上,焦虑可能降低求职主动性和职业探索行为,从而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风险。整体来看,技术变革带来的 AI 焦虑更可能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观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从动态视角检验二者关系。

基于现有研究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认为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即 AI 焦虑可能导致就业压力升高,而较高的就业压力也可能反向加深个体对 AI 风险的感知。因此,本研究采用交叉滞后设计,以更清晰地识别二者的时间性影响路径,提出以下假设,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假设 1: 大学生的 AI 焦虑在时间上正向预测其后续就业压力。

假设 2: 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在时间上正向预测其后续 AI 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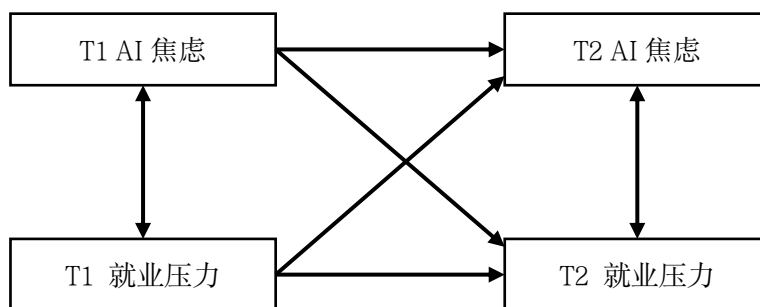


图 1 大学生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交叉滞后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广西某高职院校 2023 级 185 名学生进行两个时段的调查。在 T1 时段收集了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相关的感知数据,为了获取学生感知的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的变化,时隔 4 个月,在 T2 时段进行了第二次收集,两次共收集 370 份数据样本。185 名学生全部来自大三年级,其中男生 72 名,女生 113 名;年龄分布在 20-22 岁之间。

(二) 调查工具

所有量表均使用 5 点计分法。问卷调查的第一部分包括调研的一般问题,主要有性别及年龄,第二部分包括核心问题,即大学生感知的 AI 焦虑水平和就业压力水平。AI 焦虑量表改编自 Wang 和 Wang^[2]编制的 AI 焦虑量表,该量表共 11 个题项, T1 时段 AI 焦虑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76, T2 时段 AI 焦虑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8。高职学生就业压力量表改编自潘莉莉和李宝珠^[7]编制的大学生就业压力量表,共计 5 个题项, T1 时段就业压力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72, T2 时段就业压力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84。

(三)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2.0 软件和 AMOS 24.0 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检验不同时段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显著,判断模型是否符合交叉滞后分析条件。其次,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交叉滞后模型的结构稳健性。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交叉滞后模型进行结果检验。

四、结果

（一）相关性分析

高职院校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同时性变量与继时性变量之间的关系均显著。并且 T1 时段的 AI 焦虑自相关系数明显小于与 T2 时段 AI 焦虑的相关系数，T1 时段 AI 焦虑与 T1 时段就业压力的相关系数也明显小于与 T2 时段的就业压力相关系数。表明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也存在继时性相关关系，符合交叉滞后分析条件。

表 1 大学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的相关分析

变量	T1 AI 焦虑	T1 就业压力	T2 AI 焦虑	T2 就业压力
T1 AI 焦虑	1			
T1 就业压力	.268**	1		
T2 AI 焦虑	.684**	.205**	1	
T2 就业压力	.512**	.654**	.346**	1

注：** $p < 0.01$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交叉滞后模型的结构稳健性，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度指数为： $\chi^2=300.088$ ， $df=165$ ， $\chi^2/df=1.819$ ， $CFI=0.978$ ， $TLI=0.975$ ， $SRMR=0.318$ ， $RMSEA=0.067$ 。以上指标均满足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度标准，因此，表明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的交叉滞后模型结构良好。

（三）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交叉滞后分析

以大学生感知的两个时间点的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数据构建的交叉滞后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第一次测量的 AI 焦虑显著影响第二次测量的就业压力（ $\beta=0.357$ ， $p < 0.001$ ），而第一次测量的就业压力对第二次测量的 AI 焦虑不显著（ $\beta=0.024$ ， $p=0.671$ ），由此证明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大学生感知的就业压力会因为 AI 焦虑所产生并提高。因此，假设 1“大学生的 AI 焦虑在时间上正向预测其后续就业压力”成立，假设 2“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在时间上正向预测其后续 AI 焦虑”不成立。

表 2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交叉滞后分析结果

路径	标准化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SE	P
T2 AI 焦虑 $\leftarrow$ T1 AI 焦虑	0.691	0.654	0.059	***
T2 就业压力 $\leftarrow$ T1 AI 焦虑	0.357	0.337	0.051	***
T2 AI 焦虑 $\leftarrow$ T1 就业压力	0.024	0.024	0.057	0.671
T2 就业压力 $\leftarrow$ T1 就业压力	0.566	0.563	0.055	***

注：*** $p < 0.001$

五、结论

（一）主要发现

研究采用交叉滞后模型探讨了大学生感知的 AI 焦虑与就业压力之间的时间序列关系。首先，AI 焦虑对就业压力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即 T1 时段的 AI 焦虑能够正向预测 T2 时段的就业压力，说明 AI 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替代担忧，会持续作用于大学生的就业认知，从而在后续阶段加重其就业压力。其次，AI 焦虑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稳定性，即 T1 时段的 AI 焦虑显著影响 T2 时段的 AI 焦虑，表明 AI 焦虑是一种持续性的心理状态，难以在短期内自然消退。第三，就业压力虽具有时间稳定性，但其对 AI 焦虑的滞后影响并不显著，即 T1 时段的就业压力不能预测 T2 时段的 AI 焦虑。这说明大学生对 AI 的担忧并非源于一般性的就业压力，可能是直接受到技术变革环境的影响。总体来看，AI 焦虑是影响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前置变量，并具有独立且持续的心理效应，其影响机制具有方向性和时间稳定性。

（二）建议

基于两轮的时间滞后数据收集与交叉滞后模型分析，为 AI 时代下大学生就业指导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 强化大学生的 AI 素养教育，降低持续性 AI 焦虑

研究结果显示 AI 焦虑具有显著的时间稳定性，这意味着学生一旦形成负向情绪体验，其认知偏差与担忧会在时间上不断累积。因此，高校应系统性强化 AI 素养教育，将 AI 基础课程与 AI 技术应用等纳入课程体系之中，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 AI 发展现状，并在真实技术使用情境中获得技术控制感^[8]。除了开设 AI 基础课程，还需提供可持续的训练资源，如 AI 学习平台、产业专家讲座等，从而减轻因信息差与能力不确定性引发的焦虑，并帮助学生发展面向 AI 时代的技术适应能力。

2. 提升学生的职业适应资源，缓解 AI 焦虑向就业压力的传递效应

研究发现 AI 焦虑会显著预测未来的就业压力，高校应关注学生在职业准备阶段的心理认知过程。例如，通

过生涯发展课程、就业技能训练营、简历面试辅导等方式提升学生应对就业竞争的能力感。通过专业教师、行业导师、企业实践等渠道,帮助学生理解 AI 技术对行业的真实影响,避免因错误认知而夸大 AI 带来的就业焦虑。同时,应引导学生认识技术变革带来的新的职业机会,使其能够在不确定的未来求职环境中保持积极的就业心态。

3. 建立持续化的心理支持体系,阻断 AI 焦虑的长期固化

AI 焦虑的具有显著的时间稳定性,这意味着学生的情绪体验并非短期波动,而可能成为影响学习、就业决策和心理健康的重要长期因素^[9]。因此,高校应构建多层次的心理支持体系,包括心理咨询服务、团体辅导项目、压力管理课程,以及面向 AI 焦虑的专项辅导模块。同时,可结合心理测评进行阶段性监测,提前预防 AI 技术变革带来的心理问题,帮助学生在技术变革中处理不确定性、增强压力调控能力,防止焦虑不断累积导致的就业压力。例如,定期组织辅导员对其指导班级学生进行心里问卷测评,定期监控学生学习压力水平,防止由于压力所引发的后续心里问题。

4. 构建教师支持与环境支持的协同机制,营造积极的技术学习氛围

教师是学生 AI 学习体验的关键影响者,应通过积极反馈与能力引导帮助学生建立技术学习自信^[10]。教师可在课堂中引入案例教学、问题导向任务,强化学生在技术学习中的参与度与掌控感。同时,高校也应优化 AI 学习环境,如提供在线 AI 教学资源、技术资源库等,让学生在学习情境中进行积极探索与实践,提前感受 AI 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通过教师支持与制度环境支持的协同作用,帮助学生减轻对 AI 的负向感受,形成积极、开放的技术学习氛围,从而进一步缓解源于 AI 焦虑的就业担忧。

参考文献:

- [1] 周桂凤,李琳.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就业挑战及对策[J].华章,2023,(05):96-98.
- [2] WANG Y-Y, WANG Y-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xiety scale: An initial application in predicting motivated learning behavior[J].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022,30(4), 619-634.
- [3] TENG R, ZHOU S, ZHENG W, 等.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wareness and work withdrawal: evaluating chained mediation through negative work-related rumina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24, 36(7): 2311-2326.
- [4] BANDURA A. Human agency: The rhetoric and the re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46(2), 157-162.
- [5] 沈黎勇,袁晶,魏菁娜.被动焦虑还是主动适应: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大学生就业心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5,(10):110-119+36.
- [6] TSCHANG F T, ALMIRALL 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ugmenting Automation: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1, 35(4): 642-659.
- [7] 潘莉莉,李宝珠.大学生就业压力量表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健康教育,2023,39(6):539-543,575.
- [8] 顾鑫.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的引导路径研究[J].中国就业,2024,(12):84-85.
- [9] 方曦,马汉阳.人工智能学习对大学生群体“技术焦虑”的影响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06):77-83.
- [10] 刘天元,晏静露.智能变革中的不安:青年群体 AI 焦虑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J].中国青年研究,2025,(02):52-6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ed AI Anxiety and Employment Pressure: A Cross-lagged Analysis

Chengcheng Sha¹, Lin Wang¹

¹ Gu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Guangxi, Liuzhou 54500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ime-series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xiety and employment pressure. By collecting data from 185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wo waves, a cross-lagged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AI anxiety and employment pressure was constructe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AI anxiety itself has significant time stability and has a significant time effect on employment pressure. However, although employment pressure has significant time stability, it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time effect on AI anxiety.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I anxiety; Employment pressure; Cross-lagged model

运动与正念的交叉研究热点与趋势 ——基于 Web of Science 的可视化分析

杜皓名¹ 唐 觅²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2.西华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 目的: 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系统梳理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 揭示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为该领域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进行相关文献检索, 经筛选后获得有效文献 236 篇, 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文献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研究热点集中于运动表现提升与心理健康干预; 期刊分布以《运动与锻炼心理学》(Psychol Sport Exerc, 138 篇)、《运动心理学》(Sport Psychol, 110 篇) 为成果核心发表阵地; 香港浸会大学与姒刚彦团队贡献突出。结论: 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展现出持续深化发展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潜力, 未来研究将更加关注干预技术的智能化、测量工具的本土化以及长期效果的追踪。

关键词: 运动; 正念;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1

前言

正念 (Mindfulness) 起源于东方禅宗思想, 强调以接纳的态度觉察当下所发生的一切, 并对注意进行有意识地控制^[1], Kabat-Zinn 将正念描述为“有目的、有意识、不加评判地对当下每一时刻的觉察”^[2]。心理能力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 在过去 40 年间, 运动心理训练的主要技术和方法大多源于心理技能训练 (psychological skills training, PST) 范式^[3]。而近年来, 正念正逐渐成为运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目前, 正念在运动领域的研究面较为广泛; 在运动表现方面, 正念训练能够有效提高篮球运动员投篮命中率^[4]; 在训练方法方面, Kaufman 等^[5]发展了针对运动员的正念运动表现提升训练 (MSPE); Baltzell 和 Akhtar^[6]开发设计出了运动正念冥想 (MMTS) 训练; 姒刚彦等^[7]结合对东方传统文化思想的理解与感悟, 开发了专门针对中国运动员的正念-接受-觉悟-投入 (MAIC) 训练^[8-9]。在测量工具方面, 可采用“五维度正念问卷 (FFMQ)”、“运动员正念问卷”等工具来测量运动员的正念水平。为了能够全面系统地厘清该交叉领域的发展现状; 本文通过知识图谱技术对该领域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 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进行梳理和预测, 以期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通过检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 检索式为 TS=“Mindfulness”AND TS=“Sports”, 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和“Review Article”, 共检索到 249 篇文献, 经过人工筛选, 剔除无作者信息、会议摘要和不相关文献 13 篇, 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236 篇。文献纳入时间范围从 2009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5 月 15 日, 搜索日期为 2025 年 5 月 15 日。

1.2 研究方法

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筛选后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选择算法 Pathfinder-Net-work (PFNET) 绘制知识图谱, 得出运动与正念交叉领域的相关研究热点, 在此基础上对图谱进行解读与分析, 总结正念在运动领域应用的脉络演化与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 杜皓名(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运动心理学;

唐 觅(1984—),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质健康。

通讯作者: 唐 觅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趋势分析

如图 1 所示, 2009—2025 年间该领域文献数量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自 2009 年以来, 正念应用于运动领域的研究逐渐兴起, 但起初的发文量相对较低, 2009-2010 年每年仅发文 1 篇。2011 年起, 发文量开始稳步上升, 表明该领域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虽然 2013 年等个别年份出现波动, 但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2016 年后增速尤为显著, 从 7 篇 (2016 年) 激增至 38 篇 (2022 年), 达到峰值。这一快速增长反映了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已获得广泛认可, 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尽管 2023 年发文量略有回落, 但 2024 年即出现回升, 表明该领域发展态势总体稳定。

综上所述, 2009-2025 年间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呈现指数级增长。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和领域的拓展, 该方向有望保持学术活力, 为相关学科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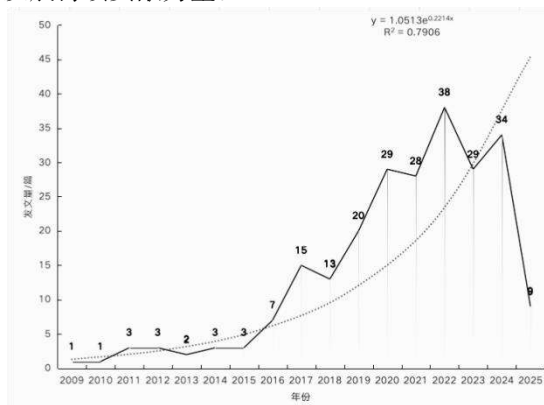


图 1 发文量趋势图

2.2 期刊与文献被引分析

2.2.1 期刊分析

通过 cite space 分析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的期刊, 共有 464 种期刊。发文量 ≥ 3 篇的共有 248 种期刊, 位居前 3 的期刊分别是“PSYCHOL SPORT EXERC” (《运动与锻炼心理学》, 138 篇)、“SPORT PSYCHOL” (《运动心理学》, 110 篇)、“MINDFULNESS” (《正念》, 108 篇)。“J SPORT EXERCISE PSY”期刊的 Sigma 值 (中介中心性) 为 1.2, 爆发值为 4.68, 高于其他期刊, 代表该期刊在连接不同研究领域或推动研究前沿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从发文时间来看, 这些期刊的共现频次在 2009 年至 2018 年期间均有分布, 且部分期刊如“PSYCHOL SPORT EXERC”和“SPORT PSYCHOL”在整个时间段内都保持了较高的发文量, 这表明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领域, 吸引了众多期刊和学者的关注。

这些期刊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临床运动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PSYCHOL SPORT EXERC”等期刊在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具有显著的高共现频次, 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平台。部分期刊如“J SPORT EXERCISE PSY”在连接不同研究领域或推动研究前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其 Sigma 值较高, 显示出独特的学术影响力。

(图 2)



图 2 期刊共现图

2.2.2 文献被引分析

图 3 所示, 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被引文献共 496 篇, ≥ 3 篇被引文献共 73 篇。从发文频次 (Freq) 来看, 排名第一的文献由 Bühlmyer L 在 2017 年发表于《SPORTS MED》, 该文献的高频次被引说明其在运动与正念

交叉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该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或研究方法。其中,《Effects of Mindfulness Practice on Performance-Relevant Parameter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in Sports: A Meta-Analytical Review》探讨了正念练习对 15 岁以上运动员生理和心理表现指标及运动表现结果的影响[10]。Noetel M 在 2019 年发表于《INT REV SPORT EXER P》的文献《Mindfulness and acceptance approaches to sporting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系统综述探讨了正念和接纳方法对运动表现的提升作用[11],这些方法可能有助于优化注意力、认知和情绪的相互作用,从而提高运动表现。突发值(Burst)反映了文献在某一时间段内被引频次的突然增长。Sappington R 与 Longshore K 合作的论文《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Efficacy o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for Enhanced Athletic Performance》回顾了基于正念的干预措施对运动表现提升的有效性,分析了相关研究,旨在为运动心理学领域提供关于正念干预的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12]。Gardner FL 发表于《CAN PSYCHOL》的文献《Mindfulness and acceptance models in sport psychology: A decade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tific advancements》[13]对正念和接纳模型在运动心理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探讨了这些模型在提升运动表现和促进整体福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展。Gardner FL 的文献在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的共被引网络中处于较为核心的位置,起到了连接不同研究方向或研究群体的桥梁作用。从发表平均年份来看,这些高影响力文献主要集中在 2012 - 2020 年,说明这一时期是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较为活跃的阶段,众多重要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涌现,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从来源期刊分析,文献分布在《SPORTS MED》《INT REV SPORT EXER P》《MINDFULNESS》等多个期刊,表明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涉及运动科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专业期刊。2012 - 2020 年是该领域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高影响力文献分布在多个跨学科期刊,体现了该领域的跨学科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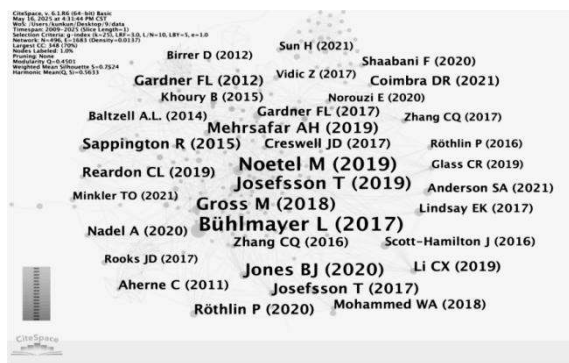


图3 被引文献共现图

2.3 机构、作者分析

2.3.1 机构分析

对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文献所涉及机构进行统计,共有 249 个机构参与,其中发文量 ≥ 3 篇的机构 19 个。Hong Kong Baptist Univ、Univ Putra Malaysia (香港浸会大学、马来西亚普特拉大学)等机构发文频次较高,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力量。Karlstad Univ (卡尔斯塔德大学)等机构虽然发文数量不是最多,但与其他机构的共现联系紧密,在学术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Univ Wisconsin 等机构在该领域有一定的关联性且具有发展潜力,未来有望为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做出更大贡献。(图 4)



图4 机构共现图

2.3.2 作者分析

在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共有 300 名作者参与,发文量 ≥ 3 篇的核心作者 7 人。Bernier, Marjorie 和 Chung, Pak-Kwong 以 4 篇的发文量位居首位(表 1),显示出较强的研究持续性。Si, Gangyan、Zhang, Chun-Qing 等作者发文 3 篇,Degree 值达 7,表明他们在学术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Borkoles, Erika、Watson, Andrew 等作者

发文 2 篇，虽然活跃度相对较低，但仍是该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作者的 Burst 值均为 0.00，表明研究热度发展平稳，未出现明显的爆发式增长。从网络特征来看，Centrality 值和 PageRank 值普遍偏低，反映出该领域学术网络结构较为分散，研究力量分布均衡，不存在少数核心作者主导的局面。这种分布特征可能有利于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发展，但也提示需要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图 5）



图 5 作者共现图

表 1 发文量作者统计表

序号	发文作者	发文量	年份
1	Bernier, Marjorie	4	2014
2	Chung, Pak-Kwong	4	2016
3	Si, Gangyan	3	2016
4	Zhang, Chun-Qing	3	2016
5	Crocker, Peter R E	3	2013
6	Bertollo, Maurizio	3	2012
7	Ajilchi, Bit	3	2019
8	Borkoles, Erika	2	2015
9	Watson, Andrew	2	2024
10	Brenner, Joel S	2	2023

2.4 关键词分析

2.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 cite space 对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分析，选取词频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进行分析，从频次 (Freq) 维度来看，“sport”（运动）以 68 次的高频出现，其次是“mindfulness”（正念）55 次，“performance”（表现）频次为 49 次，说明运动表现以及正念对运动表现的影响是该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研究者们致力于探究正念如何作用于运动表现的提升或变化。值得注意的是，“intervention”在 2020-2021 年出现研究热点 (Burst=1.04)，这可能反映了疫情期间对心理干预措施的迫切需求；而“flow”在 2016-2017 年研究热度骤升 (Burst=2.21)，揭示了研究者对运动中心流体验的关注。

“mindfulness”具有最高的中心性 (0.37)，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处于核心枢纽地位，连接着多个研究方向。虽然“sport”的中心性 (0.15) 相对较低，但其高频次仍使其成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这种分布特征表明，正念研究在运动科学领域的渗透已形成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格局，同时保持着以运动表现为核心的研究主线。研究热点的时序变化也体现了该领域对社会需求和学术前沿的快速响应能力。（图 6）



图6 关键词共现图

2.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图7）显示（ $Q=0.4501$ ， $S=0.7524$ ），该领域形成了9个具有显著性和高信度的研究集群。其中，#0 Athlete burnout（运动员倦怠）是规模最大的聚类，主要探讨运动员心理健康及正念在饮食、身体意象方面的应用。其他重要聚类包括：#1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认知行为疗法）聚焦正念干预与压力管理；#2 psychological skills（心理技能）关注心理韧性、幸福感及其中介机制；#3 military（军事领域）探索正念在特殊群体中的压力管理应用；#4 flow（心流体验）研究运动表现提升与青少年发展。#5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接受与承诺疗法）重点考察 ACT 与正念训练的整合干预对有氧运动表现和心理灵活性的影响。

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运动员心理健康、心理技能提升、特殊群体应用、运动表现提升等，研究领域广泛且不断拓展。不同集群在不同年份呈现出不同的研究重点，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动态发展，从早期的心理干预和压力管理，到后续的心理技能、数字化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在2020-2021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如心理模型、数字化、心理疲劳等，预示着该领域未来可能朝着更加深入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图7 关键词聚类图

2.4.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图8所示的CiteSpace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关键词突现图，展示了2009至2025年间突现强度前15的关键词，反映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动态演变。2012年，“depression”（抑郁）和“mechanism”（机制）开始突现，表明研究聚焦于运动与正念对抑郁的影响及其结合机制。2013年，“health”（健康）和“model”（模型）突现，研究拓展至运动与正念对健康的影响及相关理论模型构建。“flow”（心流）在2014年突现，并于2016至2017年持续受关注，体现该时期对运动心流体验及正念与心流关系研究的增多。2015年，“enhancement”（提升）、“risk factor”（风险因素）和“sport psychology”（运动心理学）突现，显示研究深入至运动与正念结合对能力提升、潜在风险的探讨，及其在运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拓展。“follow up”（随访）在2016年突现，反映研究开始重视长期效果追踪。“model”在2016至2017年、部分关键词如“depression”在2016至2019年持续突现，体现相关研究的延续性。2018年，“stress reduction”（压力减轻）突现，显示当时对运动与正念减轻压力功效的研究热度上升。2019年，“scale”

(量表)、“skill”(技能)和“efficacy”(功效)突现,研究开始注重测量工具开发、相关技能探索及功效深入评估。“mental toughness”(心理韧性)在2021年突现,该概念在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中受重视。2023年,“therapy”(治疗)突现,预示运动与正念结合在治疗领域的应用成为新研究热点。

2009至2025年间,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热点不断演变,从早期关注机制、健康影响,逐步拓展深化至心流、压力减轻、量表开发等方面。部分关键词如“depression”、“model”等持续突现,体现相关研究的延续性和重要性;“scale”等词的高强度突现则突显特定时期的研究焦点。2023年“therapy”的突现预示运动与正念结合在治疗领域的应用将成为未来研究新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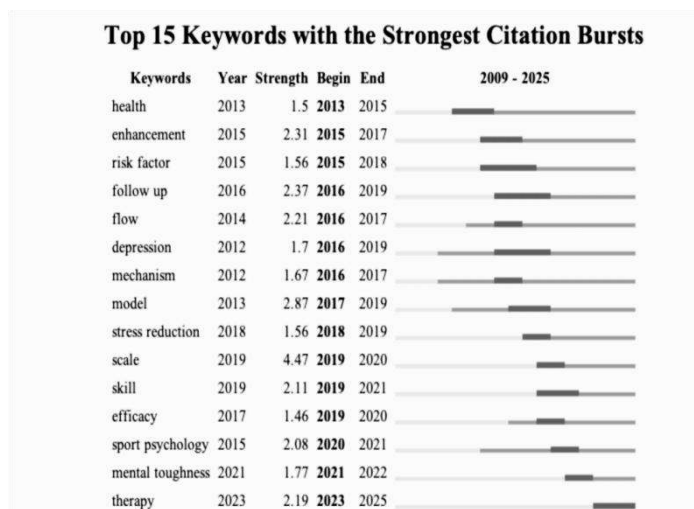


图8 关键词突显图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目前,提升运动表现是贯穿该领域的核心议题。大量研究聚焦于探究正念训练(如MSPE、MMTS、MAIC等专门化方案)如何优化运动员的注意力控制、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技能表现(如投篮命中率)和整体竞技水平。运动员心理健康干预是该领域另一大研究热点,包括利用正念干预应对运动员倦怠,缓解训练和竞赛压力,管理抑郁情绪(早期热点并持续关注),以及增强心理韧性。此外,干预方法的开发、验证与整合是推动该领域实践的关键。包括评估和完善现有的正念训练方案(如MAIC、MSPE),探索正念与认知行为疗法(CBT)、接受与承诺疗法(ACT)等传统心理干预方法的整合效果。未来研究将会更加关注长期效果的追踪以及数字化应用的探索。这些趋势不仅彰显了该领域的发展潜力,更通过揭示关键研究方向,持续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创新。

3.2 展望

根据关键词共现、聚类及突现分析,未来,运动与正念交叉领域的研究趋势可能包括:(1)干预技术的智能化,推动沉浸式训练工具(VR)的研发与应用;(2)长期效果的追踪,考察正念训练对运动员整个职业生涯跨度的影响,弥补现有短期干预研究的不足;(3)测量工具的本土化,未来将聚焦于修订西方量表(如FFMQ)以纳入文化特异性指标(如东方“觉悟”维度),并建立适用于中国运动员的常模数据库。

3.3 局限

本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技术,系统梳理了运动与正念交叉研究领域的热点演进与未来趋势。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可视化分析依赖于选定数据库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大多数研究使用Web of Science、Scopus或PubMed等大型学术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并不能全面覆盖所有相关文献,尤其是非英语文献、会议论文覆盖较少。这种文献选择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在研究热点和趋势的识别上存在偏差,尤其是在正念和体育运动这一跨学科领域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可能使部分有价值的研究未被充分纳入分析。最后,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效应。由于学术研究从发表到被引用需要一定时间,部分新兴的研究领域或热点可能尚未得到足够的学术引用,从而在分析中被忽略。

参考文献:

- [1] Ferguson E. Personality is of central concern to understand health: toward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health psychology[J]. Health Psychology Review, 2013, 7(sup1): S32-S70.

- [2] Kabat-Zinn J. An outpatient program in behavioral medicine for chronic pain patient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preliminary results[J].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1982, 4(1): 33-47.
- [3] 黄志剑, 苏宁. 正念在竞技运动领域的应用——几种主流正念训练方法综述[J].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17, 36(08): 740-747.
- [4] 范菁菁. 正念—接受—觉悟—投入训练对 15-17 岁女子篮球运动员投篮命中率和注意力的影响研究[D]. 上海体育学院, 2023.
- [5] Kaufman K A, Glass C R, Arnkoff D B. Evaluation of Mindful Sport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MSPE): A new approach to promote flow in athletes[J]. Journal of 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 2009, 3(4): 334-356.
- [6] Baltzell A, Akhtar V L. Mindfulness meditation training for sport (MMTS) intervention: Impact of MMTS with division I female athletes[J]. The Journal of Happiness & Well-Being, 2014, 2(2): 160-173.
- [7] 姒刚彦. 追求“最佳”还是强调“应对”——对理想竞技表现的重新定义及心理训练范式变革[J]. 体育科学, 2006, (10): 43-48+53.
- [8] 姒刚彦, 张鸽子, 苏宁, 等. 中国运动员正念训练方案的思想来源及内容设计[J].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14, 33(01): 58-63.
- [9] 姒刚彦. 运动员正念训练手册[M]. 2014,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 [10] Bühlmayer L, Birrer D, Röthlin P, et al. Effects of mindfulness practice on performance-relevant parameter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in sports: A meta-analytical review[J]. Sports medicine, 2017, 47: 2309-2321.
- [11] Noetel M, Ciarrochi J, Van Zanden B, et al. Mindfulness and acceptance approaches to sporting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2019, 12(1): 139-175.
- [12] Sappington R, Longshore K.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efficacy o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for enhanced athletic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 2015, 9(3): 232-262.
- [13] Gardner F L, Moore Z E. Mindfulness and acceptance models in sport psychology: A decade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tific advancements[J].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 Canadienne, 2012, 53(4): 309.

Hotspots and Trend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Sports and Mindfulness: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Du Haoming¹, Tang Mi²

¹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00, China

² Xihua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map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and reveal research hotspot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sports and mindfulness through bibliometric method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studies. Methods: Relevant literature was retriev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yielding 236 valid articles after screening. CiteSpace software was employed for visual analysis. Results: Publications demonstrated exponential growth; Research hotspots converged on sports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and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Core publishing venues included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 Sport Exerc, 138 articles) and Sport Psychologist (Sport Psychol, 110 articl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Si Gangyan's team made prominent contributions. Conclus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omain exhibits sustained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potential. Future studies should prioritize developing intelligent intervention technologies, advancing localization of measurement tools, and implementing longitudinal efficacy tracking.

Keywords: Sport; Mindfulness;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四川省中考体育改革：价值重塑、现实困囿与纾解路径

杨司涵¹ 杨成¹ 周楠¹

(1.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本研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为指导,立足“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聚焦体育中考在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完善学校体育工作中的关键作用。体育中考作为国家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成效直接关系到“以考促改”“以考促练”“以考促学”政策目标的实现,对深化“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研究以四川省体育中考改革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与专家访谈法,在系统梳理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从价值导向、现实困囿与实施路径三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研究发现,随着体育中考改革的持续推进,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考试目标与新课标核心素养要求存在偏差,内容设置与学生实际运动需求脱节,评分标准的科学性与公平性有待提升,应试化倾向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对此,本文提出纾解方案:一是构建“过程+结果”双轨评价体系,破除应试化倾向;二是完善考试机制,加快标准化与科学化进程;三是设计“固定+动态”双模测试实施方案,破解考练固化困局。通过多维路径破解改革困局,以期四川省中考体育改革的深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体育中考; 改革; 困囿; 路径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四川省体育中考技能项目结构化考核的内容设计与实验研究”(项目编号: CJF2402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3

1. 中考体育的价值重塑

通过政策溯源、理论框架与实践机制三个维度,揭示其如何突破传统体育考试范式,实现从“应试导向”向“素养育人”的转型。通过剖析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的互动逻辑,阐明价值重塑的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为后文分析现实困囿与纾解策略奠定基础。

1.1 教育价值: 五育并举, 协同育人

四川省中考体育改革以“五育并举”为根本遵循,将体育教育从传统的“体能与技能训练”提升至“全人教育”高度,通过价值重塑实现德、智、体、美、劳的深度融合。一方面,体育中考改革通过多元化项目测试(如篮球、足球、羽毛球等)与过程性评价机制,不仅强化学生体质健康与运动技能,更注重培养团队协作、规则意识与抗挫能力等德育目标。另一方面,《四川省中考体育改革实施方案(2022年)》明确将“体育文化理解”“健康生活方式”纳入考核维度,推动体育教育与智育(健康知识)、美育(运动审美)、劳育(坚韧品质)的协同发展。从协同育人视角看,四川省改革构建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体育教育生态。学校通过课程整合强化体育的学科渗透力,如将长跑训练与地理学科中的“区域地理考察”结合;家庭层面,改革要求家长参与学生日常锻炼监督,并通过“体育家庭作业”制度促进亲子互动;社会层面,依托社区体育场馆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资源,形成“课后锻炼打卡”社会化评价机制。这种多维协同模式,不仅打破传统体育教育的封闭性,更使体育成为贯通五育、联结家校社的核心纽带,为“健康中国”战略下的育人体系创新提供实践范本。

作者简介: 杨司涵(1998-),男,硕士,研究方向学校体育;

杨成(1974-),男,硕士,教授,研究方向学校体育学;

周楠(1998-),男,硕士,研究方向学校体育学。

1.2 社会价值：多元共识与价值效能协同

社会价值具有保障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作用，凡能满足社会主体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具有或能产生社会意义的事物、对象都具有社会价值。四川省中考体育改革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与公共价值-政策效能双维驱动，实现了体育教育从“个体应试”向“社会健康治理”的功能跃迁。一方面，改革以《“健康四川 2030”规划纲要》为政策依托，通过“家校社体育责任共担”制度（如家长监督锻炼打卡、社区提供免费场馆资源），凝聚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四维主体的价值共识，破解传统体育教育中“学校单兵作战”的困局。例如，绵阳市试点通过“体育积分银行”平台，将学生日常锻炼数据与社区公益活动挂钩，家长参与率达 72%，社区体育设施利用率提升 35%，显著强化了体育教育的公共属性。在价值效能协同层面，四川省改革以“公平优先、效率并重”为核心逻辑，平衡社会公平与资源配置效率。针对城乡资源差异，四川省推出“乡土体育项目替代考核”（如踢毽子、跳绳替代足球测试），并通过财政专项拨款缩小城乡生均体育经费差距（2023 年城乡差距从 1:2.5 降至 1:1.8）。同时，改革将体育测试与社会资源联动，例如成都市将中考足球测试成绩优异者纳入青少年足球联赛人才库，既提升个体发展动能，又激活社会体育资源存量。这种“公共价值引领、工具效能驱动”的模式，使体育中考成为社会健康治理的枢纽节点，为教育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创新提供范式参考。此外，改革通过智能技术赋能强化效能转化。例如，引入运动手环和健康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学生体质变化并反馈至学校与家庭，形成动态调整的个性化锻炼方案。此类技术手段不仅提升政策执行效率，还推动体育教育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实现资源精准配置与效果量化评估。综上，四川省中考体育改革通过凝聚多元共识、优化资源配置及技术创新，构建了兼具公平性与效率性的社会协同网络，为全国体教融合与社会健康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四川经验”。

2 四川省中考体育改革的现实困囿

中考体育改革确立了强化考试占比、提高分数比重及丰富考核项目等核心路径，并在政策实施中持续深化这一改革脉络。随着实践推进，阶段性成效逐步显现：体育科目正式成为升学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教学价值得到显著提升，考核维度由单一技能向综合素质拓展。然而，改革策略的深化与中考制度稳定性之间的内在张力逐渐显现，具体表现为：考试权重与分值的提升空间存在客观上限，考核内容的扩展边界受制于教育评价体系的整体承载力。随着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其边际效益呈现递减趋势，特别是当体育考试强化措施突破临界阈值后，不仅难以持续激发教学改进动能，反而可能因过度强化应试导向导致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异化，使得改革初衷与实施效果产生背离，对学生的正向激励效应逐渐减弱。

2.1 四川省体育中考改革现状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总结本地推行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以来的成功经验，按照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体育考试的内容、方法和形式，体育考试成绩要以不低于 30 分的分值计入中考升学总分。同时，在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中，要将学生日常体育成绩、体质健康状况、参与体育活动的表现作为重要评价内容。四川省全面推行体育中考的 23 年以来，各市州出台了不同的体育中考政策或实施方案：（1）成都市考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和中长跑（男子 1000 米，女子 800 米）三项，总分 50 分，评价标准和考试办法也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向社会公开。去年成都市又出台了新的体育中考方案：将体育考试分为统一考试和过程性评价（即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年度考评成绩）两部分组成，分值也从原来的 50 分提高到了 60 分，其中统一考试 50 分，过程性评价占 10 分。内容上也由单一身体素质测评发展成身体素质+运动技能（即篮球：考运球上篮，排球：考 40 秒对墙自垫球个数，足球：考绕杆运球），本办法从 2019 年 9 月新入学年级学生开始实施。（2）近几年，绵阳市体育中考 80 分，按照“身体素质+运动技能”思路，考试内容按“必考+选择性必考+自选”的模式进行；（3）南充体育中考采用“3+1”，为 3 个必考项目+1 个选考项目，分值为 60 分；（4）攀枝花已经宣布 2021 年体育中考分数将达到 100 分（2020 年为 80 分）；（5）内江市和阿坝州体育中考均为 30 分。从各市州体育中考的实施情况来看，四川省各市州体育中考政策在不断改进，体育中考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教育主管部门和老百姓也越来越重视。

2.2 四川省体育中考：功利化与应试化问题仍然严峻

考试内容和评价办法、评分标准等核心信息都是提前一至三年就向社会公开，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卷考试”。导致初中体育课和大课间体育活动、甚至是课外体育锻炼就都只教中考考试内容，学生也只练考试内容。。据实

地调研发现成都市“新中考”出来后，如排球项目就只教“排球的对墙垫球”，不会教发球、传球、扣球、拦网等技术，更不会教战术，也不会组织排球比赛，这样学生学了三年的排球依然不会打排球。即使教了学生也不会认真学和练，因为，发球、传球、比赛都不是考试内容。篮球、足球等项目亦然。学生、家长、体育教师和学校这种唯分数观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门学科占升学总分的比例还是蛮高的，为了升学也只有弃其他项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的全面发展于不顾了，初中体育最终彻底沦为了“应试体育”。

2.3 四川省体育中考：考试项目的公平性争议

部分体育项目因学生体质差异引发公平性质疑。例如，引体向上对体重较大的男生难度较高，而女生两头起相对容易满分，家长呼吁增加项目选择灵活性。评分标准是否科学（如是否应“达到良好即满分”）也成为争议焦点，需平衡考试压力与锻炼初衷。此外，体质特异学生免试所得分数比率过高，免试条件过低。例如，成都市目前的面试政策是可以全部免试也可以免试单项，且在某单项考试开考前仍可以申请免试，免试成绩为满分的70%。

2.4 四川省体育中考：政策执行中的适应性挑战

尽管四川省多地要求“每天校内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并推出中考体育分值提升至100分的政策，但部分学校面临师资不足、课程安排压力等问题。例如，遂宁市要求600人以上学校成立校队、开设7种以上运动项目，这对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构成挑战。此外，疫情后学生体能恢复问题也考验政策灵活性，如绵阳曾取消中长跑项目以缓解健康风险。

3. 四川省体育中考改革：纾解路径

中考体育改革作为深化素质教育、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举措，需在评价体系、项目设计、资源整合及制度保障等方面突破传统模式。结合多地改革实践与政策逻辑，其突破路径可归纳为以下四大方向。

3.1 构建“过程+结果”双轨评价体系，破除应试化倾向

传统体育中考以终结性测试为主，导致突击训练、忽视日常锻炼等问题。当前改革通过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测试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机制，将学生日常参与度、体质提升幅度、技能发展水平等纳入考核范畴。例如，哈尔滨市将体育总分80分拆分为日常考核（30分）与统一测试（50分），其中日常考核覆盖七至九年级的课堂表现与年度体质健康测试，动态追踪学生成长轨迹。济南市则通过“过程性评价30分+统一测试30分”的结构，细化出勤率、技能测试等指标，避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此类改革通过分层赋权、动态追踪，推动评价从“结果导向”转向“成长导向”，真正关注学生体质健康的长期发展。

3.2 完善考试机制,加快标准化与科学化进程

研制与课程目标深度匹配的考试大纲，明确体能、技能、健康行为等核心素养的考核框架，并依托“固定模块+动态调整”的测试项目设计，将必测项目（如耐力跑、立定跳远）与年度随机抽取的选测项目（如球类、传统武术、新兴运动）相结合，既保障基础体能考核的稳定性，又通过项目轮换打破“考什么练什么”的僵化模式。同时，借助智能计时、AI评分等技术手段规范考试流程，建立省级专家命题、第三方机构监督、全程影像存档的标准化管理体系，提升考试公信力。在录取机制中，推行“基础分+拓展分”分层赋分制度，对体质达标学生给予基础分值，对参与体育竞赛或体质进步显著者叠加奖励分，并针对城乡差异实施“保底加分”政策，缩小资源分配差距。通过课程衔接、动态考核、技术赋能与差异化录取的立体化设计，推动体育考试从“分数竞争”转向“健康育人”，为深化素质教育提供制度支撑。

3.3 设计“固定+动态”双模测试实施方案，破解考练固化困局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结合各地体育中考发展实际，综合全国各地试点经验，科学利用区块链和信息技术、大数据平台等进行过程+结果的考核评价方式，重点从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情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三个层面进行评测，突出对学生体能+技能的测评。在分值设置上，严格依据教育部提出的中考计分分值将体育上升到与语数外同等的地位；在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方面，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主要考察学生体育课出勤率、校园体育活动参加率、校外体育锻炼与竞赛参与情况；在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方面将力量和耐力类项

目作为必测项目,突出对学生体能的考评,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体育锻炼;在运动技能类项目测试上,参考《“体育艺术 2+1 项目”体育技能标准》和《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标准》,制定我省体育中考考试评价参考标准,采用选项制方式突出对学生运动技能的评定,以体育中考政策带动体育教学深化改革。在测评工具上,研制线上体育动作捕捉技术,结合手机 APP 方式,研发具有高科技含量、实时传输、便捷性高的测评技术装备。

参考文献:

- [1] 胡小清,唐炎.新时期体育中考的功能审视、现存问题及消解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09):67-75.
- [2] 孙民康,张一民,孙有平.中考体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两难博弈[J].中国考试,2021(11):26-34.
- [3] 聂真新,刘坚,高飞.中考体育改革:源流、价值与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09):76-85.
- 杨长久.回顾与展望:体育中考 20 年研究评述[J].浙江体育科学,2020,42(01):55-62.
- [4] 杨长久.回顾与展望:体育中考 20 年研究评述[J].浙江体育科学,2020,42(01):55-62.
- [5] 马蕊,王恒.河南省体育中考制度改革溯源[J].青少年体育,2019(05):129-131+137.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Value Reconfiguration, Practical Constraints and Alleviation Paths

Yang Sihan¹ Yang Cheng¹ Zhou Nan¹

¹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Guided by the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Deepening Educational Teaching Reform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key role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enhancing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and improving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ork,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Health Firs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form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licy goals of "improving through examination", "training through examination", and "learning through examination", and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This study takes the reform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entry point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xpert interview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form practice, it conducts in-depth discussions from three dimensions: value orientation,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s the reform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 a series of deep-seated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there is a deviation between the examination goals and the core literacy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content setting is disconnected from students' actual sports needs, the scientificity and fairness of the scoring standards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exam-oriented tendency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reversed. In response to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solutions: first, to establish a dual-track evaluation system of "process + result" to break the exam-oriented tendency; second, to improve the examination mechanism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ation and scientificization; third, to design a dual-mode test implementation plan of "fixed + dynamic" to break the rigid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situation. By exploring multiple paths to break the reform deadlock,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epening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in Sichuan Province.

Key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Constraints; Pathways

父母参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研究

蔡贵群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家庭教育在学生学业成就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其中父母参与尤为重要。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其参与形式和程度在不同家庭中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 是父母参与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的核心问题。研究基于 CEPS (2013-2014) 基线数据, 将父母参与划分为资源提供、行为监督等六个维度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并非所有形式的父母参与都能促进学业发展。学业期望与情感支持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而行为监督与时间投入则呈现负向影响。基于分析结果, 启示父母可以通过传递积极期望和提供情感支持来营造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 同时避免过度监督与干预, 以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 从而更有效地支持其学业成长。

关键词: 父母参与; 家庭教育; 学业成绩; 相关性分析; 回归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4

一、父母参与的不同维度对初中生学业成绩存在差异化影响

近些年来, 家庭教育研究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在当代教育环境中, 家庭因素对学生的学业成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要体现为父母参与, 即父母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直接帮助或为其提供身体活动的机会和动力^[1]。

在教育经济学中, 经典教育生产函数理论从家庭投入与产出的视角分析, 认为个人的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与父母教育行为的投入有关^[2]。不仅如此, 父母参与的形式和程度在不同家庭中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我国对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就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 父母的参与不仅影响学生的学术成就, 还可能对学生的情感发展和终身学习态度产生深远影响。从父母参与的整体概念上, 已有学者得到结论, 父母的参与与子女的学业成绩呈现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父母参与度越高, 子女的学业成绩越好^[3]。父母参与的具体方式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如父母投入时间参与亲子阅读、亲子活动和亲子交流能够显著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4], 对儿童的行为监督, 如检查学生作业和指导学生功课通常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5], 学业期望、严格的学业要求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6], 父母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支持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进而促进其学业发展^[7]。在身体影响上, 有研究发现父母参与可以促进孩子的身体活动, 让儿童模仿家长的行为, 父母榜样的作用在儿童成长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8], 父母参与在儿童的心理成长中起到了引导作用, 不仅能促进其身体活动和学习积极性, 也对其情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中, 父母参与的定义和实践方式存在多样性, 包括对孩子的时间投入、学业期望、情感支持、参与学校活动等多种形式。正因如此, 父母参与的操作性定义多样, 在实证分析中必须明确界定其具体维度, 才能有效辨析其与学业成绩的关联, 以便提出更准确的建议^[9]。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 检验父母参与的不同维度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差异化影响, 以识别更为有效的家

作者简介: 蔡贵群 (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通讯作者: 蔡贵群

庭教育实践方式。基于对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研究力求为家长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可操作的循证建议,从而在家庭层面更精准地支持学生的学业发展。

二、分析工具、数据以及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 学年)”基线调查数据。该调查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 28 个县(区)、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的 19487 名 7 年级和 9 年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针对学生、家长、班主任、任课教师以及学校领导分别设计了 5 套问卷,旨在全面收集与教育过程相关的不同层次的基础数据,包括地方教育政策、学校课程结构、师生关系、学生朋辈关系、家庭环境、家庭教育过程、亲子关系、家校关系等等,进而考查学生的学习机会、学习动机、努力程度以及发展过程。

基于已有数据,本次研究将选取学生问卷中与父母参与相关的变量进行分析,对其中选定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删除处理,处理之后有效样本数量为 15600。

(二) 变量

1. 自变量: 父母参与

父母参与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涵盖了父母在孩子教育和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和活动。本次研究将父母参与区分为 6 个维度,分别为资源提供、行为监督、沟通交流、时间投入、学业期望和情感支持。

资源提供:在 CEPS 学生问卷中,从家庭所提供的物质支持作为父母对孩子的资源提供。其中包含的题目包括“家里是否有独立的书桌”(取值 1~2,有为 1,没有为 2)、“家里的书多吗”(取值 1~5,很少为 1,很多为 5)、“家里有没有网络和电脑”(取值 0~2,都没有为 0,有电脑无网络为 1,都有为 2)。在数据处理时,将“是否有独立书桌”的赋值进行了重新编码(没有为 1,有为 2)。三个题目所测的值进行相加,即为学生在家庭中所获得的资源提供,值的区间为 2~9。赋值越高表示资源越完整。

行为监督:在 CEPS 学生问卷中关于行为监督的问题包括父母是否督促学习和父母对于日常生活的事情管的严不严,督促学习从“从未”到“几乎每天”赋值 1~4,父母对于日常管教事件包括作业考试、在校表现、每日上学、每天几点回家、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时间上的管理,每个小题“从不严”到“管的很严”赋值 1~3,两个题的总得分相加得到行为监督的取值,范围为 10~32,相加得分越高表示父母管教的越严格。

沟通交流:在 CEPS 学生问卷中,设有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程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父母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问题上,讨论问题包括“学校发生的事”、“你与朋友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情”、“你的心事和烦恼”五个小问题,其中还区分了分别与爸爸或妈妈的讨论频率,从“从不”到“经常”分别赋值 1~3,相加总得分取值范围为 10~30,分值越高表示与父母沟通频率越高。

时间投入:在 CEPS 学生问卷中,将父母与孩子一起吃晚饭、读书、看电视、做运动、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等、外出看电影表演等六个小题作为父母对孩子的时间投入题,每件事发生的频次从“从未”到“每周一次以上”分别赋值 1~6,而后将小题相加得到时间投入的分值,从 6~36,分值越高表示时间投入的越多。

学业期望:为了测量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期望,本次选择 CEPS 学生问卷中的“父母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要求”作为学业期望的测量题目,从“班上前五”到“没有特别要求”分别赋值 1~4。由于之前的题目都是从“没有”逐渐递增,所以在处理数据时将 1~4 的值进行了重新编码。即“没有特别要求”赋值为 1,“班上前五”赋值为 4,要求越高赋值越高。

情感支持:本次选择将 CEPS 学生问卷里的“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是否有信心”作为衡量情感支持的题目,从“根本没有信心”到“很有信心”分别赋值 1~4,分值越高表示父母对孩子的未来越有信心,情感支持程度更高。

2.因变量:学业成绩

本次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 学年)”基线调查数据中的学生期中成绩作为因变量,考察父母参与对其影响。在数据处理时,分别将语文、数学、英语成绩的缺失值和输入错误值(输入的单科得分大于单科总分 150)进行了删除,随后将三科成绩标准化处理(均值 70,标准差 10),最后将三科成绩相加得到期中成绩的总分。

(三) 研究工具及方法

使用 SPSS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首先对选定变量进行预处理,包括删除缺失值、调整部分题项的赋值方向以及将维度相同的题目得分加总以生成维度总分。随后,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样本的基本特征及核心变量的整体趋势进行初步分析。再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探究父母参与程度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及其强度。最后运用回归分析模型进一步检验并阐释父母参与相关变量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具体影响路径与效应。

其中,皮尔逊相关系数是用于量化两个连续变量之间线性关系强度与方向的经典统计指标,其数值介于-1 到 1 之间,当系数接近 1 表示完全正相关,-1 表示完全负相关,而系数趋近于 0 则意味着两变量间缺乏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该系数通过计算变量间的平均差异乘积来量化相关性,在社会科学及教育研究等领域被广泛应用于初步探测变量间的潜在联系。

回归分析中,回归系数是用于量化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大小与方向的统计指标,非标准化系数表示自变量每增加 1 个原始单位,因变量平均变化的原始分数。标准化系数表示自变量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因变量平均变化的标准差。若系数为正,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呈同向变化关系;若系数为负,则表示两者呈反向变化关系。这些系数通过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进行估计,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因果或预测关系,并评估各预测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分析前,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和容差(Tolerance)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诊断。通常,若 VIF 值小于 10 且容差大于 0.1,则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除此以外,还需要关注 R^2 结果。 R^2 用于测量所构建的模型对因变量变化程度的整体解释比例, R^2 值为 0-1 之间,越接近于 1 表示解释能力越强。

三、父母参与不同维度的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分析的结果

根据 CEPS 数据,表 1 为父母参与的各个维度上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 1 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期中成绩总分	15600	120.58	284.19	210.00	26.76	716.33
资源提供	15600	2.00	9.00	6.40	1.95	3.80
行为监督	15600	10.00	32.00	23.26	4.31	18.54
沟通交流	15600	10.00	30.00	20.29	5.10	25.98
时间投入	15600	6.00	36.00	22.00	6.57	43.19
学业期望	15600	1.00	4.00	2.87	0.89	0.80
情感支持	15600	1.00	4.00	3.16	0.70	0.49
有效个案数	15600					

从描述统计的结果中可以看到父母参与各个维度的情况。在资源提供 ($M=6.34$)、行为监督 ($M=23.26$) 和情感支持 ($M=3.16$) 上父母参与的平均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沟通交流 ($M=20.29$)、时间投入 ($M=22.00$)、学业期望 ($M=2.87$) 上处于中等水平。这表明,父母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更侧重于提供物质资源、监督学习行为以及给予情感支持。相比之下,在亲子沟通与时间投入方面,父母的参与程度相对有限,这反映出部分家庭对日

常陪伴与深度互动的重视程度可能不足。

(二) 父母参与各个维度与学生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表 2 为学生的期中成绩与父母参与各个维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表明，期中成绩与资源提供 ($r=0.287$)、行为监督 ($r=0.048$)、沟通交流 ($r=0.169$)、时间投入 ($r=0.137$)、学业期望 ($r=0.344$) 及情感支持 ($r=0.249$) 均存在统计显著的相关性 ($p<0.05$)。

表 2 各维度相关性

变量	期中成绩总分	资源提供	行为监督	沟通交流	时间投入	学业期望	情感支持
期中成绩总分	1						
资源提供	0.287**	1					
行为监督	0.048**	0.197**	1				
沟通交流	0.169**	0.247**	0.396**	1			
时间投入	0.137**	0.448**	0.349**	0.449**	1		
学业期望	0.344**	0.074**	0.166**	0.130**	0.071**	1	
情感支持	0.249**	0.251**	0.196**	0.352**	0.300**	0.198**	1

**在 0.01 级别，相关性显著。

其中总成绩与行为监督的相关系数最低，说明行为监督对于学业成绩的影响最小，而学业期望的系数最高，说明父母的期望很容易对儿童的学业成绩造成影响。

(三) 回归分析—父母参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为检验资源提供、行为监督、沟通交流、时间投入、学业期望及情感支持等自变量对因变量（期中成绩总分）的影响，本研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 3 回归分析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Beta	t		容差	VIF
资源提供	3.396	0.110	0.247	30.817	0.000	0.783	1.277
行为监督	-0.595	0.050	-0.096	-11.999	0.000	0.793	1.261
沟通交流	0.397	0.045	0.076	8.848	0.000	0.691	1.447
时间投入	-0.141	0.036	-0.035	-3.908	0.000	0.647	1.545
学业期望	9.244	0.219	0.308	42.125	0.000	0.942	1.062
情感支持	4.915	0.301	0.129	16.349	0.000	0.816	1.226

a. 因变量：期中成绩总分

b. 自变量：资源提供、行为监督、沟通交流、时间投入、学业期望、情感支持

$R=0.461$, $R^2=0.213$, 调整后 $R^2=0.212$, $F=701.435$

如表 3 所示，模型中所有自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10，容差均大于 0.1，因此可判定该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这一结果意味着各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性较好，其回归系数的估计是稳定且可靠的，为后续准确解释各维度父母参与对学业成绩的独立影响提供了统计依据。

模型的 R^2 值为 0.213，表明研究中所纳入的六个父母参与维度共同解释了学生期中成绩总变异量的 21.3%。这一解释力水平符合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普遍预期，因为学生的学业成就是一个受多系统共同影响的复杂结果。除

家庭中父母的行为参与外,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如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学校教学质量、同伴关系以及学生个体特质等诸多因素均对其产生重要作用。

根据表 3 的回归分析结果, 父母参与的六个维度对学业成绩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p<0.05$)。学业期望 ($B=9.244$, $\beta=0.308$, $p<0.001$) 和资源提供 ($B=3.396$, $\beta=0.247$, $p<0.001$) 对学业成绩具有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情感支持 ($B=4.915$, $\beta=0.129$, $p<0.001$) 与沟通交流 ($B=0.397$, $\beta=0.076$, $p<0.001$) 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然而, 行为监督 ($B=-0.595$, $\beta=-0.096$, $p<0.001$) 和时间投入 ($B=-0.141$, $\beta=-0.035$, $p<0.001$) 则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总体而言, 研究发现父母参与的不同维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说明参与的质量与方式是关键, 并非所有形式的参与均会带来积极的学习结果。

四、讨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将父母参与分为了六个维度来验证父母参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分别进行了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学习能够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证明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积极的家庭支持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学业期望和与学生的成绩存在最高的相关性, 而行为监督的相关性最低。学生可能更可能从父母的期望中获得学业成功, 而行为监督产生的影响比较小。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父母较高的学业期望与情感支持对子女学业成绩具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 父母较高的学业期望能够促使子女设定更高的学习目标, 并提升其学习积极性与投入程度。然而, 父母应注意使期望与子女的实际能力相匹配, 避免因期望过高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压力。另一方面, 父母的情感支持有助于保障子女的心理健康, 增强其自信心, 从而提升其面对学业困难的能力。

在研究中还发现行为监督和时间投入对学业成绩产生的是负向的影响, 也就是说行为监督和时间投入的越多孩子的成绩可能会提高不明显,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父母过多的投入对儿童心理产生了负担, 或者让儿童失去了自主的机会, 所以父母需要给予孩子适当的空间, 适当的给予陪伴, 更多的进行沟通交流, 而不是强制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 有效的陪伴方式能对青少年自我的教育期望产生直接影响, 驱动学生谋求学业上的成功^[10]。家长还需要在教育过程中选择适合的教育方式。

(二) 针对父母参与的建议

1. 重视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中的三元交互决定论, 环境、行为、人三者之间互为因果, 每两者之间都具有双向的互动和决定关系^[11]。在家庭场域中, 父母的参与方式与情感反馈构成关键的心理环境, 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自我认知与行为动机。父母在学业参与中若过度强调结果与控制 (如以物质奖励为导向、进行不当比较), 可能使儿童将自我价值过度绑定于外部评价, 从而诱发焦虑、降低学习自主性, 并对心理健康造成潜在压力。

因此, 父母在参与子女学业过程中, 应将维护与促进儿童心理健康置于重要位置。具体而言, 应注重情感支持与过程鼓励, 帮助儿童建立基于努力与成长的自我评价体系; 在设定期望与提供资源时, 重视其合理性与适应性, 避免因脱离实际或过度比较而增加儿童的心理负担。在此基础上, 引导儿童形成理性的成就观与物质观, 实质上构成对心理健康的积极维护——它有助于儿童在多元评价环境中保持稳定的自我认知与内在动力。

2. 采用多种方式参与儿童成长

父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地参与孩子的学业, 以促进其学业成绩的提升。在认知与期望层面, 应设定清晰合理的学业目标, 传递积极期望并培养成长型思维; 在行为与过程层面, 需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源, 指导时间管理与学习方法, 同时鼓励自主探索并参与适度的学校活动; 在情感与支持层面, 要重视通过积极沟通、情感陪伴和进步认可来营造支持性家庭氛围, 并持续关注子女的心理状态。关键在于把握参与的“度”, 在提供支持与尊重自主之间寻求平衡, 避免因过度干预或物质攀比而抑制子女的内在动机与发展空间。

3. 培养儿童的成长型思维

过度介入与安排可能挤占学生的自主空间,使其将学习感知为一项外部强加的任务,从而可能抑制其内在动机并增加心理负担。为化解这一困境,父母可将培养子女的成长型思维作为优化参与方式的关键转向。成长型思维强调能力可通过努力发展,其核心在于将关注点从外在监督与控制转向对内在过程与策略的支持^[12]。父母应减少对学习时长与细节的刻板监控,转而通过过程性反馈(如肯定其面对难题的坚持)、建设性对话(如将“错误”重构为“发现调整机会”)等方式,帮助子女建立对学习的自主掌控感与责任感。这实质上是将参与的重心从“管理行为”提升至“塑造心态”,在为子女创造必要心理空间的同时,引导其形成积极、自主的学习者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 [1] 国汐如,蔡珊,党佳佳,等.父母参与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影响的 Meta 分析[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23,24(09):941-948.
- [2] 李佳丽,薛海平.父母参与、课外补习和中学生学业成绩[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02):15-22.
- [3] 范勇.父母参与和子女学业成绩关系的元分析[J].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21,43(03):56-64.
- [4] 陈荣荣.“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浙江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监测项目的数据分析.”教育测量与评价,2020,(10):36-47.
- [5] 孟凡蕊.“父母学业参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研究.”教育进展,2023,(13):2816.
- [6] 鲁长风,高佳,闵慧祖,等.父母参与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考试,2021,(12):85-94.
- [7] 李明,尚新华,方晓义,等.从父母教育卷入到学业成就:自主支持与自主学习力的链式中介[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38(06):839-847.
- [8] 国汐如,蔡珊,党佳佳,等.父母参与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影响的 Meta 分析[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23,24(09):941-948.
- [9] FAN X, CHEN M.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1, 13(1): 1-22.
- [10] 彭正秀,姚继军,周世科.父母陪伴方式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省域内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基础教育,2022,19(01):32-42+62.
- [11] 李晓侠.关于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综述[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87-89.
- [12] 吴弦.父母教育卷入对小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成长型思维的中介作用[J].当代教育论坛,2021,(02):75-88.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EPS Data

Guiquan Cai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which parental involve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children's first teachers, the forms and degree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vary significantly across different families. How these differences affect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the core issue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Based on the baseline data from CEPS (2013-2014), the research divides parental involvement into six dimensions, including resource provision and behavior supervision,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t all form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Academic expectations and emotional suppor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while behavior supervision and time investment show negative effect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parents can create a good family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by conveying positive expectations and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 while avoiding excessive supervision and intervention to reduc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burden, thereby more effectively supporting their academic growth.

Keywords: parental involvement; family education; academic performa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高校音乐厅的美育职能：挑战与实现路径

吴在昊

(西华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00)

摘要: 高校音乐厅是高等教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担负着高校美育教育的主要职能。素质教育了塑造学生艺术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然而, 许多高校的音乐厅受限于资源, 资金和设施, 无法完全发挥教育职能。本文探讨了存在的诸多挑战, 比如设施缺乏, 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以及师资力量短缺之类情况。此外, 本文针对上述的这些困难, 提出了融合课程与艺术演出、更新艺术活动形式、扩展外部受众、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改良经营方式、拓展资金来源等解决办法, 为改善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文化素养, 促使艺术教育和社会文化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见解

关键词: 高等教育; 音乐厅; 美育职能; 艺术教育; 审美素养

基金项目: 四川艺术基金 2025 年度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5

一、引言

高校音乐厅是高等教育文化建设的基石之一, 其在美育教育以及文化传承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观念认为音乐厅只是个举办演出的地方, 现代的美育教育赋予了其塑造学生艺术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形态。一些重点高校和艺术类院校已经建起了现代化的音乐厅及文化艺术中心, 但是由于资金、资源和经营等方面的限制, 部分高校的音乐厅规模较小, 甚至缺乏专业的演出设备。截止截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 中国高等学校共计 3167 所。并非所有学校都配备专门的音乐厅, 许多高校使用报告厅代替音乐厅的功能。此外, 各校音乐厅的数量和功能差异较大。例如, 部分高校把音乐厅当作思政教育的场所, 经由文化活动传达爱国主义情怀, 塑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此, 音乐厅的美育功能目前尚未被充分讨论, 怎样加强音乐厅的教育意义并应对资源短缺的状况, 已然成为高校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考验。

二、高校音乐厅的教育职能

高校音乐厅在高校教育中担负着多重职能。根据《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2020) 》的指导^[1], 高校音乐厅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成为美育的重要载体。国家政策明确指出, 高校应通过艺术活动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音乐厅借助高水平的艺术演出, 为学生提供艺术体验, 帮助他们提升审美能力, 最终达成“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教育目标。

第一, 审美教育功能。高校音乐厅通过组织音乐会、歌剧、交响乐等活动,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艺术体验, 促进艺术修养和审美素养的提升。音乐厅是塑造学生审美能力与艺术修养的重要场所, 凭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形式, 助力学生拓宽审美范围并改善审美认识。

第二, 情感教育功能。音乐具备很强的情感表现力, 可以引发学生内心产生共鸣, 各类艺术活动可以让学生领略到情感的丰富性, 进而加强他们情感表达及认知的能力, 这样的情感教育真正地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人际互动当中, 从而推动其社会适应能力得到优化。

第三, 文化传承功能。高校音乐厅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责任, 通过组织民族音乐、传统戏曲等活动,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and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跨文化艺术活动有益于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扩大学生的视野, 塑造跨文化欣赏素养。

第四, 社会责任感培养功能。根据“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的要求, 经由举办公益演出, 开展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 可以促使学生在艺术创作和社会服务过程中提升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以及承担社会

作者简介: 吴在昊(1992—),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 吴在昊

责任的意思。

三、高校音乐厅的美育职能面临的挑战

（一）资源瓶颈限制音乐厅功能

高校音乐厅面临的资源和设施限制影响了其美育职能的发挥。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全国有91.82%的学校达到了音乐器材配备标准^[2]。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高校的音乐厅都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许多高校当前依然面临设施老化、设备不足或缺乏先进的技术支持等问题，从而限制了其教育功能。部分学校虽然拥有音乐厅，但因缺乏现代化的音响设备、灯光和排练设施，这些空间未能最大化的发挥其作用。福建省《艺术质量监测结果报告》指出，不同学校的艺术设施设备配备存在显著差异^[3]。我国高校在美育资源配置上存在“资源短缺、分布不均、利用率低”的问题，这加剧了艺术设施的利用困境^[4]。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校校园文化设施对外开放的比例仅为12%^[5]，这意味着大部分艺术设施，特别是音乐厅，并未有效服务于学生的日常艺术体验。资源和设施的不足直接影响了音乐厅的多功能性及学生参与的机会，从而限制了其在审美教育中的作用。

（二）激发学生艺术热情的挑战

学生的参与度是音乐厅美育职能能否充分实现的关键。尽管许多高校都组织了丰富的艺术活动，但学生的主动参与度和活动频次却显得不足。虽然大多数学生认可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但实际在参与率、主动性以及活动体验上却存在较大差距^[6]。学生通常仅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演出，缺乏更多参与的机会。此外，设施的高空置率也进一步表明，学生使用这些资源的频率偏低，这在音乐厅中尤为明显。因为音乐厅的活动多以“观看”为主，学生参与组织或互动体验的机会相对较少，进而影响了美育效果的深度与持久性。因此，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促使其从“观看者”转变为“参与者”，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三）音乐厅与时代的距离

目前，许多高校音乐厅的教学内容和演出形式未能与新时代学生需求接轨。目前的艺术课程多侧重传统经典和基础技能的培养，忽视了与现代多元化、跨学科艺术形式的融合^[7]。传统的古典音乐演出和课堂教学方式未必能够吸引对新兴艺术形式感兴趣的学生，导致艺术教育内容在时代背景下产生“脱节”。例如，一些音乐厅的活动过于“教条主义”，缺乏新媒体艺术、互动性或沉浸式体验等形式的结合，学生在活动中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较为不足。现代学生对跨学科、跨文化艺术形式的需求日益增加，音乐厅的教育功能要紧跟时代发展，创新艺术活动形式，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互动性，才能有效推动审美教育目标的实现。

（四）师资短缺拖慢音乐厅发展

师资力量的不足是当前许多高校音乐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水平的美育教学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创新教育理念的教师。许多高校在艺术教育领域的专职美育教师供给不足，直接影响了艺术活动的组织与教学质量^[8]。部分学校的教师虽具备演奏和音乐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但缺乏组织跨学科活动和带领学生进行创作体验的能力。这导致学生的艺术体验仅限于欣赏层面，而非全方位的参与与创作，影响了音乐厅教育职能的全面落实。

四、高校音乐厅美育职能的实现路径

高校音乐需要通过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多元化的文化活动及有效的观众培养机制，确保美育功能的全面实现。为了真正实现高校音乐厅的美育职能，必须从以下方面采取具体且可行的措施：

（一）融合课程与艺术演出，提升教育效果

高校音乐厅应与学校的教学课程，尤其是艺术类和素质教育课程，紧密结合。这种结合能够帮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艺术素养。为此，音乐厅可以在演出前后组织学术讲座和座谈会，邀请艺术家和学者与学生互动，分享创作背景、演出技巧及文化背景。以此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艺术作品的内涵，也提升他们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音乐厅也可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针对不同学科的学生定制相关的艺术演出。一方面，对于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组织大师班、公开课或教学演出，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对于非艺术类学生，可以策划更具普及性的音乐会，如经典音乐赏析或民间音乐演出，帮助学生拓宽艺术视野，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和文化修养。

（二）创新艺术活动形式，拓展美育影响力

音乐厅应突破传统音乐会形式，关注观众的多元需求，创新活动内容和表现形式。艺术教育应激发学生和观众的创造力与参与感。音乐厅可以尝试跨学科合作，将舞蹈、戏剧、文学等艺术形式融入演出中。例如，可以策划“音乐与舞蹈的对话”项目，通过音乐与舞蹈的结合，打破传统演出模式，这将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艺术创作的多样性。音乐厅还可与文学、哲学等学科联合举办讲座和艺术演出的融合活动，通过跨学科的合作，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提升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种跨文化、跨学科的艺术展示，音乐厅的美育职能得以全面扩展，艺术成为连接学生、社会、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思想的桥梁。

（三）拓展外部受众，推动艺术普及

音乐厅的美育职能应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通过组织多样化的艺术活动，推动艺术的普及，提升公众文化素养。高校音乐厅可以定期办公益音乐会，为社区居民、低收入群体及特殊群体提供优惠或免费的演出机会。借此，音乐厅能够触及更多观众，并帮助他们感受艺术的魅力。此外，音乐厅还应与社会福利机构合作，为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群体提供特别的艺术节目，传递社会关怀。与此同时，音乐厅应加强与周边文化机构的合作，联合举办巡回演出和文化活动，增强其社会影响力。通过与地方文化中心、博物馆等机构的合作，举办“文化之夜”等活动，音乐厅能够吸引不同领域的观众参与，推动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此外，音乐厅还可以利用线上平台，通过直播、网络讲座等形式，突破地域限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四）加强宣传推广，提升观众参与度

精准的宣传策略和有效的观众互动机制有助于增强参与度和扩大影响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音乐厅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学校官网及微信公众号等现代传播渠道，及时发布活动预告和演出亮点，吸引观众的关注。通过图片、视频、访谈等多媒体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并利用社交媒体的互动功能，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自我表达。音乐厅还可以与学生社团合作，利用学生的社交网络扩大宣传，形成口碑效应。设立“学生推广大使”项目，激励学生在社交平台上转发活动信息，从而进一步扩大受众面。此外，音乐厅还可设置学生志愿者项目，让学生参与到活动的策划、排练和现场服务中，通过实践提升他们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和对艺术活动的理解。结合线上与线下活动以推动美育职能的全面实现。

（五）优化管理模式，提升运营效率

音乐厅的管理体系直接影响美育职能的实现。除了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学校还应鼓励学生参与日常管理，推动管理模式创新。学生的参与能够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激发对艺术活动的兴趣，并培养责任感与团队协作精神。学生志愿者岗位的设立，让学生参与策划、场地布置、观众接待等环节，积累管理经验。通过这一方式，学生不仅能提升沟通和协作能力，还能深化他们对音乐厅的归属感。此外，学校应定期组织管理人员的培训，提升其在艺术策划、观众服务等方面的专业能力，确保音乐厅活动的顺利进行。为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学校还可引入第三方艺术管理专家，帮助优化管理流程，提升策划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

（六）拓宽资金渠道，保障可持续发展

作为非营利性艺术场所，高校音乐厅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依赖学校财政拨款”转向“多样化的资金渠道”。音乐厅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举办赞助性质的音乐会，争取商业资本的支持。音乐厅还可以设立艺术基金或奖学金，吸引社会捐赠，鼓励校友和文化企业的参与。这些资金的投入将为音乐厅的运营提供保障，增强其艺术教育功能。音乐厅还可以开设音乐培训班、文化讲座等附加服务，拓宽收入来源，提升艺术活动的可持续性。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争取文化扶持资金，参与政府主办的文化艺术项目，音乐厅可以减轻运营压力，提升其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五、结论

高校音乐厅是艺术表演的场所，也是学生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厅的美育职能在提升学生艺术修养和文化素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音乐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艺术体验，帮助他们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力。教师和管理人员应重视音乐厅在美育中的作用，结合现代艺术元素，扩展音乐教育的内容，激发学生的艺术兴趣。通过将音乐厅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组织实践活动，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得以提升，从而充分发挥音乐厅在美育教育中的作用。

致谢

感谢所有为四川艺术基金 2025 年度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西南剧院运营管理人才研修班”顺利开班的领导、

专家和同仁们。特别感谢西南剧院运营管理人才研修班项目总负责人王义平董事长、班主任刘雅菲老师等领导的支持和指导。同时,也要感谢四川音乐学院和成都城市音乐厅的组织和支持,使得本次研修班得以顺利启动。此外,感谢小组成员杨雯璃、张陇渝、刘倩、张天禹、曹永杰的辛勤工作和合作。

参考文献:

- [1] 张倩.对初中生美术审美感知能力培养的研究 ——基于《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D].沈阳师范大学,2023.
- [2] 国家统计局. 201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 [EB/OL]. [2018-07-19].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807/t20180719_343508.html
- [3] 福建省教育厅. 艺术质量监测结果报告 (社会公开版) [EB/OL]. [2022-11]. <https://jyt.fujian.gov.cn/xxgk/zywj/202211/W020221115571433417625.pdf> jyt.fujian.gov.cn
- [4] 陶然,潘梓萌.美育视域下高校戏剧美育的教学困境及"破局"路径探析——以华中科技大学戏剧团为例[J].艺术教育, 2025(3):212-215.
- [5]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督导室. 大会发言材料汇编 [EB/OL]. [2021-06-26]. https://hdzx.bjhd.gov.cn/2019/tzgg/201906/P020190626764063585449.doc?utm_source
- [6] 吴鹏,李英.中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现状调查研究——基于大学生的课程实践体验[J].한중언어문화연구, 2021, 59: 327-348.
- [7] 张璐.新文科背景下高校音乐课程体系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 2022(23):60-62.
- [8] 张盼.高校美育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 2010(8):4.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 of University Concert Halls: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Wu Zaihao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music halls are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the cultural frame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assuming a central role in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in universities. Quality education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rtistic literacy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However, many university music halls face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resources, funding, and infrastructure, hindering their ability to fully fulfill their educational potentia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cluding inadequate facilities, low student engagement, and a shortage of qualified teaching staff. Furthermore, it offers solutions to mitigate these challenges, such as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with artistic performances, revitalizing artistic activities, expanding external audiences, enhancing publicity, improv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diversifying funding source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enhance students' overall and cultural literacy, while foste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rts education and cultural progress.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Concert halls;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s; Arts education; Aesthetic literacy

重构知识，时空交汇

——广州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特色案例构建

纪泽泉¹，杨舒晴¹，王玉青²，施 雯³

(1.广州医科大学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510182；2.广州医科大学 药学院，广东 广州，511436；3.广州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511436)

摘 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驱动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改革的核心方向。本文以广州医科大学为典型案例，系统探究其以“重构知识，时空交汇”为核心理念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研究深入分析了广医通过“智慧平台建设、课程体系重构、多元评价创新”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有效破解了成人学生的工学矛盾、实现了教学过程的同质化管理、并显著提升了学习成效与人才培养质量。本研究不仅剖析了其应对“教学管理思路陈旧、评价体系单一、工学矛盾突出”等行业痼疾的创新策略，还重点阐述了其如何通过强化教师团队“评价、指导、共生”的新角色，以及构建“线上+线下”多元评价体系来保障教学质量。广州医科大学的实践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模式，为同类院校提供了深化继续教育综合改革的“广医经验”，对推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综合改革；学业评价；智慧教育平台；广州医科大学

基金项目：2024 年度广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特色案例构建——以广州医科大学为例”；2024 年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高等继续教育领域）培育建设名单“药学继续教育‘五融合五重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与实践”；2024 年度广东省学习型社会建设（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五融合五重塑’的药学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JXJYGC2024G337）；2025 年度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继续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数字赋能全科医学继续教育‘医教研防’融合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5-0741ZA）；广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项目（项目编号：089046）；2024 年度广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五融合五重塑’的药学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24 年度广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实时反馈策略在网络继续教育过程性综合能力评价的应用研究”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6

一、引言：迈向教育数字化转型新阶段

随着“终身学习”与“技能社会”理念的持续深化，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其质量提升与模式转型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才战略的推进与教育公平的实现。传统继续教育模式长期受限于固定时空，普遍面临“工学矛盾”突出、教学资源分散、过程监管薄弱以及质量声誉受损等结构性挑战。对于医学类成人学生而言，这一群体社会角色多元、学习时间高度碎片化、学习动机实用导向明确，同时更面临技能实践要求高、专业理论更新迅速等独特压力。在教育部系列改革政策的引导下，利用信息技术深化教学模式创新、规范教学管理、强化内涵建设，已成为继续教

作者简介：纪泽泉（1966—）：广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杨舒晴（1994—）：广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综合科科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王玉青（1989—）：广州医科大学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施 雯（1993—）：广州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通讯作者：杨舒晴

育高质量发展的明确方向。

在此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Blended Learning）凭借其融合线上灵活学习与线下深度互动的双重优势，被广泛视为破解继续教育现实困境的关键路径。然而，成功的混合式教学并非线上与线下形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涵盖教育理念、技术支撑、管理机制与评价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其核心在于回应两大根本问题：一是如何真正“以学生为中心”重塑教学流程，二是如何通过科学的评价机制保障并持续引领教学质量。

广州医科大学立足医学教育特色，自2020年起前瞻布局、系统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学校以“重构知识，时空交汇”为核心理念，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改革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效，已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医学继续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展现出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广泛的推广意义。

二、改革框架：核心支柱与特色路径

广州医科大学的改革是一项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框架可概括为“一个理念、三大支柱”。该设计精准聚焦并致力于解决传统成人教育长期存在的痛点与难点。

（一）核心理念：知识重构与时空融合

“知识重构”指对教学内容进行数字化、模块化与任务化再造，使其精准适配成人学习者碎片化学习与自主探究的内在需求；“时空交汇”则旨在打破传统教学的物理时空限制，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线上自主探究与线下集中互动的高效融合，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智慧教育新生态。此理念深刻回应了成人学习者“时间灵活、空间流动、学习碎片化”的典型特征，旨在推动教学模式从“以教师讲授、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自主学习、线上资源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

（二）第一支柱：智能基座——夯实平台与资源根基

学校将一体化智能学习平台定位为改革的“数字基座”。该平台不仅是资源的存储库，更是管理的驾驶舱与数据的分析中心。

1. 高标准资源建设：聘请高水平教师团队，系统化开发了包含精讲视频、课件、教学大纲、章节测验在内的标准化数字课程资源库。视频制作精良、形式多样，旨在激发学习兴趣，从源头上确保了教学资源的高质量与标准化，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中“照本宣科”、“内容拓展不足”或直接使用未筛选网络资料等问题。

2. 智能化过程管理：平台具备学习行为自动追踪与分析功能，可真实记录登录时长、视频观看进度、测验完成情况等数据，有效杜绝“挂机刷课”，为过程性评价提供了客观、公正的依据，从技术上保障了教学质量同质化。这套管理机制充分关注对成人学习者“学习过程”的精细化管理，通过动态反馈与监控，实现了对学习过程的精准把控。

（三）第二支柱：教学革命——确立“以学为中心”新范式

改革的核心在于推动教学实现从“教师灌输”到“学生探求”的根本性范式转变。

1. 线上环节：自主探究与知识内化：线上学习侧重于知识的传递与初步内化。学生在清晰的学习任务单和章节自测题引导下，自主控制学习进度，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建构。教师团队在此过程中扮演“引导者”角色，通过平台答疑与讨论区互动，及时解决学生自学难题，激励其自觉学习。

2. 线下环节：深度融通与能力升华：线下教学（学时占比不低于20%）被设计为精华互动环节。教师侧重于梳理知识体系、串讲重难点、组织案例研讨与深度答疑，旨在促进知识的内化、迁移与应用，有效弥补了线上学习在情感交流与高阶思维能力培养上的不足。该环节充分发挥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着力破解理论难点与实践瓶颈，并通过研讨会、专题报告等创新形式，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四）第三支柱：评价引领——守护人才培养质量生命线

广州医科大学深刻发挥“评价指挥棒”的导向作用，构建了一套多元化、过程性、高权重的形成性评价体系，此为保障改革成功的关键。该体系有力破解了传统评价中“唯结果论”、“缺乏过程监管”、“指标单一”的积弊。

1. 科学化权重设计：根据课程性质（如学位课与非学位课），差异化设定考核权重，将过程性考核比例大幅提升至30%-60%，以此强力引导学生注重日常学习积累，摒弃期末突击倾向。

2.多维度评价构成：平时成绩由三部分科学构成：①网络学习分（占30%，由平台自动生成，考核学习时长与任务点完成度）；②课程互动分（占10%，含测验、作业、讨论区表现，由教师评定，考核思维贡献与参与深度）；③学习表现分（占10%-20%，由班主任评定，考核综合学习表现）。此设计全面评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互动参与度及综合学习素养。

3.技术化考核保障：在期末线上考试中全面引入人脸识别、全程录像监控、屏幕抓拍等防作弊技术，以“技防”替代“人防”，严把考试出口关，有力捍卫了学历证书的含金量与社会公信力。

4.闭环化反馈机制：学校还注重利用平台大数据，对学生的学习轨迹、满意度及知识难点进行综合分析，并将结果反馈于教学改进，形成了“评价—反馈—改进”的质量闭环，持续推动教学优化。

三、成效与前瞻：价值启示与未来展望

（一）实践成果：多维成效显著

自改革全面实施以来，广州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多个维度取得显著成效：

1.教学质量与满意度同步提升：“线上系统学+线下重点导”的教学模式有效实现了与线下课堂的“实质等效”。2023-2024学年，主要专业课程平均通过率较改革前（2022年）提升约15个百分点；学生教学满意度调查优秀率从78%上升至95%。

2.学生学习能力普遍增强：任务驱动与过程考核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其自主学习、时间管理及信息素养得到系统性锻炼。超过80%的学生反馈，混合式教学模式显著缓解了工学矛盾。

3.人才质量与社会认可度持续攀升：学校专升本学士学位授予率连续三年稳步增长，2024年达到92%。毕业生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与较强的实践能力，受到用人单位广泛好评，学校已成为广东省医药卫生行业在职人员深造的首选院校之一。

4.形成“广医经验”示范范式：学校构建的“平台+课程+评价”系统性改革方案，成功解决了师资角色转型、管理机制更新、评价体系重构等核心问题，为全国继续教育，特别是实践性强的医学领域，提供了一套经过实践检验、可复制推广的成熟范式。

（二）经验启示：从实践到范式

广州医科大学的成功实践表明，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四大支柱：技术是利器，设计是灵魂，评价是关键，制度是保障。其核心启示在于，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避免零敲碎打的局部调整。具体经验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理念先行：必须牢固树立“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与管理理念，将服务学生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宗旨。

2.角色转型：必须推动教师从传统的“知识讲授者”向“学习评价者、过程指导者、课程共建者”综合角色转变。

3.机制创新：必须构建与混合式教学相匹配的、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展望未来，可在以下方向持续深化探索：

1.深化学习分析：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习行为轨迹进行深度挖掘，实现精准的学情预警、个性化资源推送与自适应学习路径规划。

2.探索人工智能应用：引入AI助教承担智能答疑、作业批改等任务，减轻教师重复性劳动，提升教学辅导效率。

3.破解实践教学远程化难题：重点依托虚拟仿真（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在医学实验、临床技能操作等环节实现远程化、沉浸式教学，达成“手脑并用”的培养目标。

4.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深化与医疗卫生单位的合作，将真实项目与典型案例融入教学，强化成人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最终实现“学以致用”的培养宗旨。

四、结语

广州医科大学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领域开展的混合式教学改革，是一次立足时代需求、回应现实关切的系统性创新。改革以“重构知识，时空交汇”为核心理念，通过系统构建智能化学习环境、全面创新教学组织形态、科学重塑学业评价体系，成功探索出一条高质量、有特色、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这一实践不仅有效破解了传统成人教育的多重困境，更生动诠释了继续教育在数字时代的内涵重塑与价值升华，充分证明了其完全能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品牌。

该案例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既为同类院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操作的实践范本，也为推动构建方式更灵活、资源更丰富、学习更便捷的中国特色终身学习体系，贡献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广医智慧”与“广医方案”，展现出广泛的示范效应与推广前景。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厅〔2022〕2号）
[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19〕8号）

Restructuring Knowledge, Integrating Time and Space:

Construction of a Characteristic Case Study on the Reform of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 Higher Academic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 Zequan; Yang Shuqing; Wang Yuqing; Shi Wen

(1. School of General Practice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182; 2. School of Pharmacy,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36; 3.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36)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drivers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academic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 online-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has become a central focus of reform. This study takes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MU) as a typical case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its blended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guided by the core philosophy of "reconstructing knowledge and integrating time-space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GMU's three-pronged systematic reform—encompassing intelligent platform development, curriculum system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diversified evaluation—which effectively resolves the work-study conflicts of adult learners, achieves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substantially improves learning outcome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Beyond examining GMU's innovative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long-standing challenge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including outdated teaching management paradigms, a single-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minent work-study contradictions—this study highlights how the reform redefines the teaching team's roles in evaluation, guidance, and symbiotic collaboration and constructs a multi-modal online-offline evaluation framework to safeguard teaching quality. The GMU practice has yielded a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characteristic model, offering a "GMU model" for peer institutions to advance comprehensive continuing education reforms, while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constructing a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 system serving all citizens.

Keywords: Higher Academic Continuing Education; Blended Teaching Mode; Comprehensive Teaching Reform; Academic Assessment;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基于“双循环驱动”理念对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质量 及保障措施改进研究

张敏¹

(1.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 针对江苏省职业教育供给滞后于产业智能化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以及现行质量保障体系中专业更新慢、过程监控缺失、校企评价形式化且缺乏改进闭环等问题, 本文引入全面质量管理 (TQC) 与 PDCA 循环理论, 构建了“双循环驱动”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表明, 该模型实现了“目标导向—过程监控—动态反馈—精准优化”的闭环管理。通过在模型外层确立了“岗课赛证”融通与多方协同治理的宏观架构, 内层通过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并修正薄弱环节, 确保各环节质量螺旋式上升。本研究提出的“双循环驱动”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管理模式中过程监控缺位与改进机制断裂的难题, 它不仅为提升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质量提供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保障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效能, 更通过构建“政-校-企”多元联动与数据共享生态, 为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及长三角职教一体化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范式与理论支持。

关键词: 职业教育; TQC; PDCA 循环; 教学质量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重点课题) (JS/2023/ZD0207-03533)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7

江苏省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高地与创新试验田, 其发展历程与质量变革具有显著的典型性与前瞻性。自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实施以来, 江苏省率先构建了“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根据《江苏省2024年统计年鉴》^[1]数据显示, 全省现有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90所、中职学校337所, 年均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超过60万人, 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在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 职业教育质量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具体表现为三个维度的深层挑战:

江苏省2023年发布的《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面实现智能化改造, 这导致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发生根本性转变。据省工信厅调研数据显示, 智能制造领域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达34.7%, 而传统机械加工类岗位需求下降21%。反观职业院校专业设置, 仍有28%的专业未建立动态调整机制^[2], 课程内容更新周期平均长达3.5年, 严重滞后于企业技术迭代速度。这种供需错位直接导致毕业生专业对口率从2018年的76%下降至2022年的68%, 暴露出人才培养目标与产业实际需求的显著脱节。

当前江苏省职业院校普遍采用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首先, 质量评价过度依赖教育行政部门的合格评估与技能抽测, 占考核权重的62%, 而反映学生长期发展潜力的指标 (如岗位迁移能力、创新素养) 仅占8%^[3]。其次, 过程性质量控制流于表面, 73%的院校仍采用“教案检查+听课记录”的传统监管方式^[4], 缺乏对教学全流程的数据化追踪。更值得关注的是, 校企双元评价机制形同虚设, 仅15%的企业深度参与课程标准制定, 多数校企合作停留在“协议签署”层面, 未能形成实质性的质量共建机制。这些问题的本质, 是传统质量管理模式难以适应职业教育复杂系统的动态演变。现行质量保障措施多聚焦于结果控制, 缺乏对“招生—培养—就业”全链条的系统设计, 更未形成“发现问题—分析归因—改进优化”的闭环机制。因此, 引入全面质量管理 (TQC) 与 PDCA 循环的整合模型, 构建覆盖全过程、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体系, 已成为破解江苏职业教育质量困境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关乎百万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效能, 更是支撑江苏省实现“制造强省”向“智造强省”战略跃升的关键性制度创新, 见图1所示。

作者简介: 张敏 (1981-), 女, 硕士、讲师。研究方向: 教育教学质量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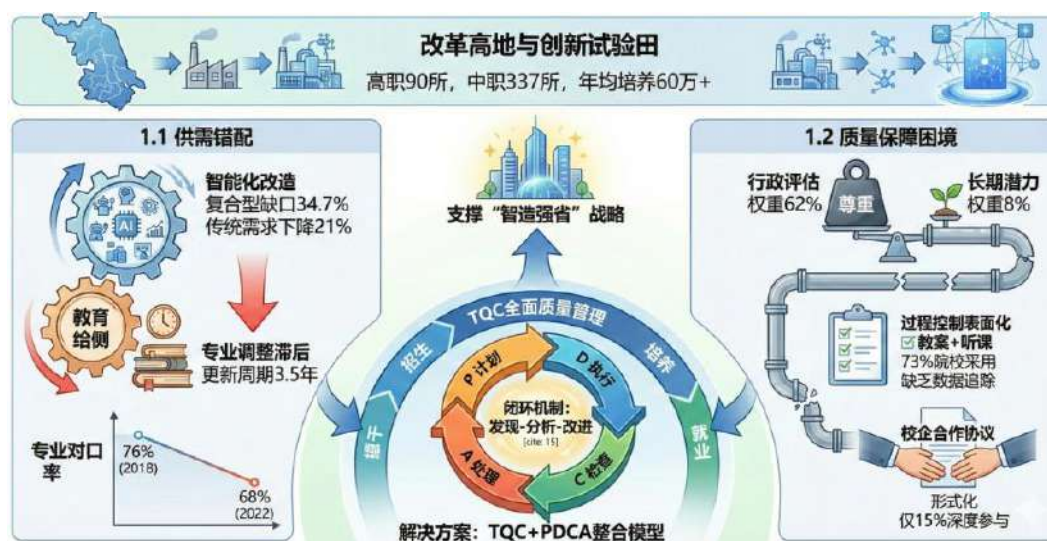


图1 江苏职业教育面临的表格和 TQC 机制嵌入机遇

Fig.1 Dual-cycle-drive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model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1 TQC+PDCA 理念的核心内涵

1.1 TQC+PDCA 理念基本内涵

TQC (Total Quality Control, 全面质量管理) 与 PDCA (Plan-Do-Check-Act, 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是现代质量管理的两大经典理念。TQC 强调全过程、全员、全方位参与质量管理, 注重系统性和协同性^[5]; PDCA 则是一种循环优化模型, 通过不断循环“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的四个阶段, 实现持续改进。两者结合构建“双循环”机制, 既有宏观质量战略的统筹, 又有微观操作层面的精细控制, 见图1所示。

在高职院校中, TQC 理念体现为“招生—培养—就业”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控制。比如在招生环节, 学校不再仅凭分数录取学生, 而是引入职业适应性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等手段, 提升生源质量; 在培养环节, 通过构建“岗课赛证”融通的课程体系、推进校企合作项目教学等手段实现课程与行业需求对接; 在就业环节, 依托毕业生就业跟踪反馈, 不断优化教学内容与专业结构, 实现闭环管理。PDCA 则被嵌入各个环节, 实现动态调优。如某高职院校在电子商务专业建设中, 计划阶段 (Plan) 设定 90% 的学生需获得“1+X”认证; 执行阶段 (Do) 开设专项培训课程; 检查阶段 (Check) 通过阶段性测试评估学习效果; 处理阶段 (Act) 根据反馈增设实训课和企业导师讲座, 不断完善教学体系^[6]。

1.2 TQC 理论框架: 构建质量管理的系统性根基

全面质量管理 (TQC) 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三全原则”, TQC 体系的构建, 本质上是对职业教育治理维度的系统性重塑。这一重塑首先体现在责任主体的多元化拓展上, 即打破单一行政管理的边界, 将教师、学生、企业导师及家长纳入质量责任共同体, 通过企业骨干参与课标制定、学生代表加入反馈机制等路径, 形成质量共建的协同网络^[7]。在此基础上, 管理视域需向“输入—过程—输出”的全链条延伸, 实现从招生源头的适配性评估到就业跟踪的纵向贯通, 特别是通过“课前诊断—课中监测—课后评价”建立起全过程的标准化闭环。更为关键的是, 质量保障必须超越显性指标的局限, 深入到课程设计、师资素养、实训条件及校园文化等隐性要素的整合优化中, 如通过大幅提升实训设备利用率来同步增强学生实操技能与企业满意度, 从而实现从单点控制向全要素协同提升的根本转变。

1.3 PDCA 循环机制: 驱动质量改进的动态引擎

PDCA 循环机制通过构建从数据策划到制度沉淀的动态闭环来驱动质量持续改进。在计划阶段, 目标的设定需基于产业数据的精准分析, 例如南通某职业院校针对区域造船产业人才缺口, 将“船舶焊接技术合格率”提升至 95% 作为年度核心指标, 并细化为 12 项具体行动计划以确立清晰的质量导向。执行阶段则聚焦于过程性的质量干预, 苏州某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在实训环节引入包含“示范、模拟、实操、纠偏、复盘”的五步法结构化流程, 成功使技能习得偏差率降低了 34%。为确保改进的精准性, 检查阶段需构建多维评价体系, 扬州某高职院校开发的“教学质量雷达图”涵盖了教学设计、学生参与度、技能达标率及企业反馈四个加权维度, 有效识别了教

学薄弱环节,实现了“问题—改进—固化”的知识螺旋上升,见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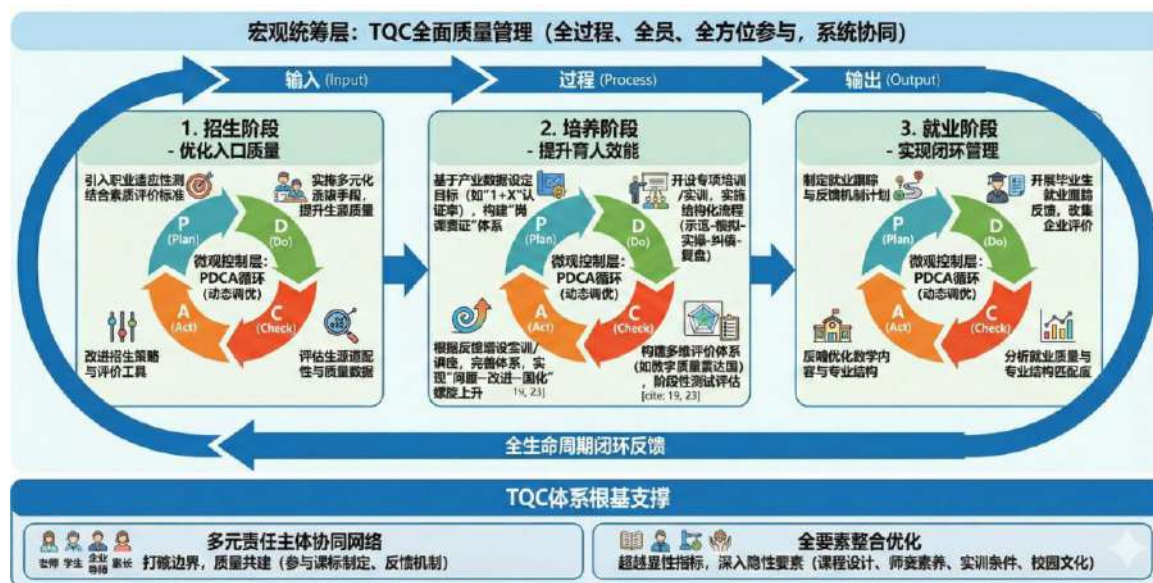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双循环驱动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模型

Fig.2 Dual-cycle-drive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model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2 江苏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目标定位模糊：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脱节

2023 年全省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1650”产业体系的匹配度仅为 72%^[8-10]。23%的院校未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导致人才培养滞后于技术变革。例如,常州某高职院校的“智能控制技术”专业仍以传统 PLC 教学为主,未纳入工业互联网协议等新内容,毕业生难以满足本地智能制造企业需求。这种脱节源于产教协同机制的缺失—仅 34%的院校建立常态化产业人才需求预测机制。

2.2 过程监控缺位：数据驱动的精化管理不足

当前教学质量评价仍以期末试卷和职业技能鉴定为主,过程性考核仅占 15%。关键教学环节存在监测盲区。例如课堂教学中 62%的院校未对教师课堂提问的认知层级进行分类统计;实训教学中 78%的实训基地缺乏设备使用频次、故障率等运行数据记录;校企合作企业导师到位率严重缺失,无法量化评估产教融合实效。

2.2 改进机制僵化：闭环管理链条断裂

学生整体正向反馈薄弱,“单兵作战”现象严重,期末考试成绩已不足反应课堂教师授课质量;尽管大多职业院校教务处将质量整治工作提到头号工作中,由于学苗质量普遍不高,工作往往落在政策层面,学生深入人心的彻改很难到位;虽各有教学质量管理办法,但省内高职院校仍各自为战。好的经验分享度不够,成果转化借鉴难以插入孵化,导致成果只是昙花一现。

3 TQC+PDCA 融合模型构建

3.1 双循环驱动模型总体构架

3.1.1 外层循环（TQC）：覆盖“招生-培养-就业”全过程

基于 TQC 的全过程质量监控体系构建了一个贯穿“招生—培养—就业”的闭环生态,见图2所示。在入口端,通过建立科学的招生评价模型,采取职业适应性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及企业面试等多维手段,落实“德技并重”的选拔标准,并依据生源特征与就业数据的关联分析,动态调整专业布局以实现供需精准对接。进入培养环节,重点在于深化“岗课赛证”融通与“双导师制”的实施,利用校企一体化实训平台引入真实项目,确保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的高度契合;同时,依托常态化的教学诊断机制,整合学生评教、专家督导等多方视角,持续修正教学路径。最终在出口端,借由“一生一策”职业发展档案与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体系,精准把脉市场反馈与

用人单位满意度,将就业数据转化为教学改革的决策依据,从而实现从人才输出到培养方案优化的逆向反哺与质量螺旋上升。

3.1.2 内层循环 (PDCA): 各环节嵌入动态优化机制

(1) 招生环节 PDCA 实践

Plan (计划): 制定精准化招生目标和策略,明确生源质量控制指标,如技能证书持有率、生源结构合理性等。**Do (执行):** 实施多样化招生宣传手段,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生咨询与选拔活动。**Check (检查):** 对招生结果进行质量分析,聚焦录取学生技能水平、地域结构、职业兴趣等关键维度。**Act (处理):** 针对偏差进行策略修正,如调整宣传重心、优化选拔工具、提高录取门槛等。

(2) 培养环节 PDCA 实践

Plan: 依据职业标准与企业需求,设计课程地图和能力目标,如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企业项目参与度等。**Do:** 推进“项目化+模块化”教学,落实“1+X”证书制度,推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Check:** 通过阶段性考核、技能竞赛、项目成果等评估教学效果。**Act:** 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增加仿真实训模块、强化新技术新业态课程等。

(3) 就业环节 PDCA 实践

设定就业率、岗位匹配度等目标,制定企业拓展与岗位开发计划;组织专场招聘、实习实践活动,强化与用人单位的深度合作;分析就业数据,识别未就业学生特征与主要问题,如技能与岗位不匹配;开展“回炉再训”,丰富职业咨询服务,修正合作企业名单,实现就业服务动态优化。

3.2 双循环融合的协同机制

双循环融合体系的有效落地,离不开从数据底层到治理顶层的全方位协同支撑,见图3所示。首先,数据一体化是驱动体系运转的核心引擎,必须建立覆盖“招生—培养—就业”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平台,通过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动态分析,为TQC的全过程监控与PDCA的动态调优提供精准的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体系的稳健运行需要组织与制度的双重护航:一方面需设立专门的质量保障机构,通过定期质量复盘与年度计划制定,强化管理的统筹执行力;另一方面要完善涵盖选拔、评价、实训及反馈等各环节的标准规范,确保“双循环”运行有章可循。最终,这种内部治理架构需向外延伸,构建起“政—校—企”多元联动的共治生态,确立以学校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政府为支持的协同机制,从而形成内有数据与制度支撑、外有多方合力保障的质量治理新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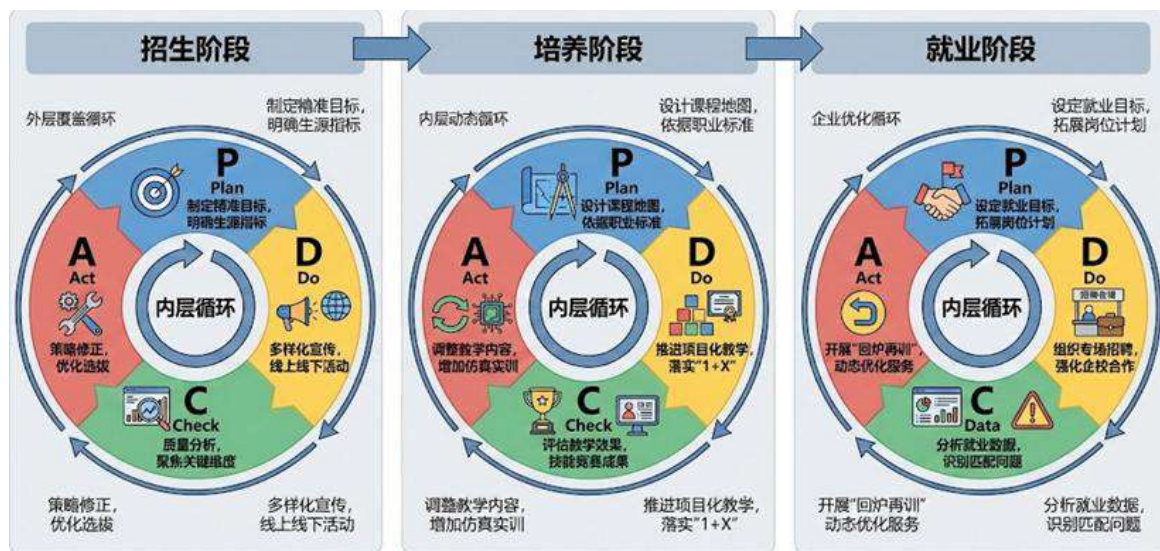


图3 双循环驱动模型：外层覆盖全过程，内层嵌入动态循环机制

Fig.3 Dual-cycle driven model: outer layer covers the entire process, inner layer embeds dynamic cycle mechanism

4 结论

文中提出的“双循环驱动”质量保障体系,实现了“目标导向-过程监控-动态反馈-精准优化”的闭环管理机制。通过TQC的全面覆盖与PDCA的动态调控,构建起目标清晰、流程严密、反馈有力的质量保障系统,为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江苏省职业院校,建议进一步引入智能化监测工具,构建“政-校-企-生”四方联动的数据共享生态,将就业市场动态、企业技术需求实时映射至教学改革中。同时,需完善质量评价的多元维度,纳入“技能创新力”“职业适应性”等指标,并探索跨区域协同机制,推动“双循环”模式在长三角职教一体化中的示范应用,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范式。

参考文献:

- [1] 何春月,赵立平.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5,(11):65-68.
- [2] 沈璐,胡新岗,桂文龙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职业教育研究,2025(04):12-17.
- [3] 徐佩文.高职院校战略发展与教学质量诊改互动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24(25):85-88.
- [4] 殷雨时.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现状的纠偏与对策[J].科技风,2017(03):35.
- [5] 殷雨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提升措施策略分析[J].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18(06):43-46.
- [6] 张某.全面质量管理(TQC)在职业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21(06):12-16.
- [7] 刘某某.基于PDCA循环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实践[J].机械职业教育,2023(11):33-37.
- [8] 赵某.“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4(01):88-94.
- [9] 孙某某.1+X证书制度试点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J].江苏高教,2022(05):102-106.
- [10] 沈璐,胡新岗,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职业教育研究,2025(04):12-17.
- [11] 徐佩文.高职院校战略发展与教学质量诊改互动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24(25):85-88.
- [12] 何春月,赵立平.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5(11):65-68.

A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Quality Assurance Measur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Dual Circulation Drive” Concept

Min Zhang¹

¹*Ya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Business School, Yangzhou City, Jiangsu, 225127, China*

Abstract: Address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where vocational education supply lags behind industrial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issues within the current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such as slow program updates, lack of process monitoring, and formalistic school-enterprise evaluations without improvement loop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otal Quality Control (TQC) and PDCA cycle theory to construct a “dual-cycle driven”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Research indicates this model achieves closed-loop management through a “goal-oriented—process monitoring—dynamic feedback—precise optimization” cycle. By establishing an outer layer macro-framework integrating “job-course-competition-certification” alignment and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while utilizing data analysis within the inner layer to precisely identify and rectify weaknesses, it ensures a spiral-upward quality enhancement across all stages. The proposed dual-cycle driven system effectively resolves the challenges of inadequate process monitoring and fragmented improvement mechanism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ls. It not only provides a systematic solution for enhancing teaching quality in Jiangsu's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ensuring the cultivation of high-caliber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 but also establishes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involving government,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his ecosystem facilitates data sharing, offering replicable institutional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QC; PDCA cycle; teaching quality

AI 赋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路径探究

刘峻利¹ 金 岚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

摘 要: 研究聚焦于 AI 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的策略, 通过结合政策要求与实际教学案例, 深入分析了当前教学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阐释了 AI 在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增强学生文化自信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提出了构建文化基因知识图谱、丰富教学形式、提升教师教学素养三大教学策略。同时, 结合具体教学示例, 展示了 AI 在高中英语教学各环节的应用实践, 证实了其在促进传统文化融入教学、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显著效果, 为高中英语教学创新提供了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 AI; 传统文化; 高中英语教学; 教学策略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8

一、引言

当下, 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多元化交织, 国际竞争的深层较量愈发凸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这对人才的跨文化素养与民族文化根基提出了双重要求。在此背景下, 教育领域正经历从知识本位到素养导向的深刻转型, 如何让青年一代在理解世界的同时坚守文化根脉, 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AI 的迅猛发展为这一课题的破解提供了新可能。从 ChatGPT 到文心一言, 这类技术凭借智能生成、个性化交互等特性, 正重塑知识传递与文化传播的方式——它不仅能快速整合多元信息, 更能通过场景化模拟, 让抽象的文化内容以更鲜活的形态呈现给学习者。与此同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沉淀的精神瑰宝, 其蕴含的哲学智慧、道德准则与审美情趣, 并非僵化的历史符号, 而是能为当代青年提供精神滋养的活态资源, 尤其在培育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策层面早已对此作出回应。2021 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明确将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视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 在高中阶段特别强调要通过与世界文化的比较, 帮助学生理性认知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则进一步指出, 英语教学需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1]”, 这意味着英语课堂不应仅是语言技能的训练场, 更应成为传统文化对外表达的窗口。两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 在语言学习中筑牢文化根基, 让学生既懂“世界语”, 更讲“中国话”。

AI 的技术特性与上述教育目标形成了巧妙契合——它既能借助智能 AI 交互破解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水土不服”的难题, 又能通过个性化设计满足学生在跨文化语境中传播文化的实践需求。基于此, 本文结合笔者两年高中英语教学中运用生成式辅助文化教学的实践经验, 采用访谈法 (对 10 名一线高中英语教师进行深度访谈, 聚焦其在教学中融合传统文化与 AI 的痛点与经验), 聚焦 AI 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的现状, 探索可行路径 (如利用 AI 生成双语文化对比案例、搭建虚拟跨文化交际场景), 分析技术应用中可能存在的素材适配偏差、文化解读浅表化等问题, 为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有效渗透与学生文化传播能力提升提供系统性方案。

二、AI 赋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刘峻利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学科教学 (英语);

金 岚 (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学科教学 (英语)。

当文化传承遇见 AI，一场以技术解码文化基因、以智能重构教学模态的教育变革，正在高中英语课堂深度发酵。

（一）融合 AI 技术，推动传统文化创新传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关键价值。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而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AI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AI 能够使濒危的传统文化“复活”。通过 AI，能够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并将其应用到英语教学中。盐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科技企业开发了疍家文化数字资源库，通过 AI 影像记录、语音识别等技术，将已逐渐消失的疍家渔耕技艺、方言歌谣等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内容。在该区的高中英语教学课程中，教师将这一成果积极应用于课堂中，以“用英语讲述疍家故事”为核心任务，设计了三阶段 AI 辅助教学模块，实现了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设计。

另一方面，AI 可以让传统文化焕发出不一样的色彩。通过这一技术，可以让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将研学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故宫、敦煌等旅游景区采用穹游扫码讲解系统，通过 AI 技术将固态的文化形式转化为动态的歌曲、影像等形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给研学的学生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二）融入文化元素，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把优秀历史文化基因注入时代精神发展之中，既是主体文化精神建构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文化强国的必由路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能够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学生接触中国故事，能领略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认同与自豪感^[3]。英语学习过程中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对中国故事，也就是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

作为数字科技的受众，AI 在学生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较高，因而 AI 赋能传统文化是提升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比如上海大学市北附属中学承办的静安区“数字化赋能高中英语教学”系列教研活动，学校教师以“饮食文化”单元为基础，将教材文本转化为多维互动场景，带领学生走进虚实融合的“文化元宇宙”，还分享了 AI 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虚拟数字人 Hannah 生成动态饮食地图，学生们通过对相关文化的学习，增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文化自信。

（三）丰富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AI 赋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育，能够满足新课标中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对学生的要求。AI 能够代表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教学中融入这一技术学生能够迅速适应时代的要求，帮助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必备技能。第一，能够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通过在英语课程中学习传统文化，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英语词汇量和表达能力，如节日、饮食等专有词汇；第二，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通过学习传统文化，能够丰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形成对独特文化的文化意识，提升文化自信；第三，能够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通过在英语课程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如卧薪尝胆、毛遂自荐等，可以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最后，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学习使用 AI 技术，能够拓宽学生的学习思维，从而提升整体核心素养。

这场智能赋能的文化教学革命，正使学生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蜕变为主动的文明转译者——在 AI 构建的“文化认知-解构-再创造”闭环中，他们以英语为舟楫，载中华智慧驶向世界文明的星河。

三、AI 赋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的挑战

AI 赋能传统文化对于高中英语教学具有非凡意义，但是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掣肘着更深程度的发展。

（一）技术赋能不足,文化解读浮浅

技术赋能传统文化方面，尽管 AI 在问世以来发展的速度较快，但是还尚不成熟。理想中的 AI，可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虚拟场景对话）、智能化的个性学习路径（根据学生兴趣推荐），然而，现实中的 AI 却在进行英语教学存在技术赋能不足的问题，AI 生成的传统文化内容解读重复率高，且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过浅，未挖

掘生层次文化内涵。一方面, AI 根据同一关键词生成的内容总是大同小异。以敦煌壁画为例, 当输入“敦煌飞天象征什么”时, 不同 AI 工具 (ChatGPT、文心一言、Claude) 给出的答案都集中于“自由超脱”“极乐世界使者”等, 内容存在高度的重复性; 另一方面, AI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停留在表面, 深层次解读缺乏。AI 对话对于问题的解答知识局限于问题本身, 而不会对深层次的内涵进行思考。

(二) 教学形式固化, 智能应用浅表化

2024《全国智能教育白皮书》中指出许多学校的 AI 文化课陷于“PPT+视频”模式, 停留在传统多媒体教学阶段, 以播放预制视频、展示 PPT 为主, 缺乏互动性和实践性, 如在以传统节日春节为主题的课上播放预先设计好的视频, 播放完成后讲解知识点, 智能教育技术未深度融入教学, 仅作为展示工具, 未能实现个性化教学或动态反馈。教学形式依旧大部分停留在老师讲授、学生接受的模式, 这导致学生被动学习, 丧失学习的主动性, 学习动机下降, 同时老师采取这种模式也容易导致忽视个体差异, 无法适应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三) 教师融合能力薄弱, 双项素养欠缺

教师群体在智能教育转型中面临双重能力短板: 一方面, AI 技术操作能力薄弱, 表现为过度依赖生成式工具输出浅层内容 (如直接套用 AI 课件未作教学适配)、忽视伦理风险 (如误用未审核的 AI 作业批改结果)、缺乏学科融合创新 (如历史教学仅展示 AI 复原古建筑动画却未解析文化内核); 另一方面, 传统文化储备弱化, 导致教学中出现文化符号化解读 (如端午节教学停留于龙舟图片展示, 未结合 AI 模拟楚文化迁徙)、经典阐释空洞 (如讲解《论语》时仅机械翻译文本, 未调用数字博物馆资源实证春秋礼制)、价值传承脱节 (如用 AI 生成孝道案例却脱离当代青少年语境)。教师素质的不足导致在使用 AI 工具讲授涉及传统文化的课时, 无法正确使用 AI 讲授传统文化, 从而不利于学生传统文化的吸收, 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AI 赋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面临挑战的原因

(一) 技术底层逻辑与文化特性的错位, 导致对文化基因的系统性解读不足

AI 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存在局限, 核心症结在于技术底层逻辑与文化特性的错位。一方面, 其训练数据多依赖公开文本, 对传统文化的收录偏向大众化内容, 缺乏对小众化、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挖掘, 尤其难以系统整合文化符号、行为模式与价值逻辑构成的完整文化基因链条。以敦煌壁画为例, 常见解读多来自通用资料, 而壁画中蕴含的宗教哲学、艺术流派演变等深层信息未被充分纳入训练数据, 使得不同工具输出结果趋同; 即便是节日文化这类常见主题, 训练数据也往往侧重表面符号, 难以覆盖“符号—行为—价值观”的完整文化基因架构。另一方面, AI 缺乏人类的文化感知与思辨能力, 无法像研究者那样结合历史语境、社会背景对文化符号进行深度解构。“算法通常采用基于统计的方法, 通过对大量文本中词语的共现频率等信息来确定语义, 这种方式对于传统文化中复杂的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理解能力十分有限”^[4]。这种简化处理导致算法在面对传统文化语料时易产生认知偏差, 既难以突破既定数据框架展开深层次解读, 也无法准确把握文化语料的内在含义, 自然无法构建起对文化基因的系统性认知。正因如此, 其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始终停留在表面, 难以触及深层内涵, 更无法实现对文化基因链条的完整呈现与精准阐释。

(二) 教师教育理念滞后与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导致智能技术教学应用浅表化

教学中智能技术应用的浅表化, 主要源于教育理念滞后与教师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的双重制约。部分教师仍固守“PPT+视频”的传统模式, 将智能技术仅视为辅助展示的工具, 未能认识到其推动教学模式变革、创设沉浸式学习场景的核心价值, 这种理念上的局限直接限制了技术应用的深度。同时, 教师对 AI 的功能认知存在明显短板, 多数仅掌握播放预制内容等基础操作, 难以充分发挥其个性化交互、动态场景生成等高级功能的教学价值。正如在春节主题教学中, 因教师不熟悉 AI 的虚拟场景构建与实时互动功能, 只能沿用播放视频后讲解的固定模式, 无法让学生在虚拟情境中参与节日活动, 既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与多样化学习需求, 也未能实现技术与教学场景的深度融合, 难以达成通过情境赋能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

(三) 教师文化知识素养不足与融合能力欠缺, 限制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深度渗透

多数教师存在文化知识素养不足的问题,正如聂鑫琳和李梦所指出的,“多数教师自身文化知识素养不足,母语文化知识储备有限,对其内涵理解不到位,文化敏感性低,且受制于课时、授课环境等,无法及时使用多模态资源增补与教学语篇主题相关的中国文化知识^[5]”,这种素养短板直接导致其在教学中难以深入挖掘教学语篇主题背后的中国文化意蕴;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教师培养体系的局限性,师范教育阶段传统文化课程占比不足,难以奠定扎实的文化基础,在职培训中又缺乏将传统文化与英语教学、AI 技术相结合的专项内容,导致教师的文化储备与跨领域融合能力均无法满足教学需求,而在教学实践层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案例参考与支持,教师在面对“AI+传统文化+教学”的复杂场景时,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融合路径,只能对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化解读或机械阐释,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使得教师的文化素养与技术融合能力均无法得到有效提升,进而限制了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深度渗透。

五、AI 赋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的策略

(一) 技术赋能图谱构建,文教协同增效

在新时期的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学程度不断加深,在全球化语境下,传统文化面临“符号化”解读危机,而 AI 可以为这一困境的破解提供新的路径。构建文化基因知识图谱,能够有效的将英语课文中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有效的整合,从而更有逻辑、更有深度的呈现在学生面前。AI 可以在构建知识图谱时更加系统的整合各类资源,从而使得产生的效果更好。

以外研版必修 2 Unit2 Let's celebrate 为例,可利用 AI 系统解构课文中文化基因的三层架构:符号层、行为层和价值观层。首先, AI 通过语义分析提取教材中的节日核心符号,如红包“red envelopes”、饺子“dumplings”,自动生成可视化符号网络;其次利用行为模式识别算法,聚类节日活动逻辑链,如中秋“赏月—吃月饼—思想”的情感为序列;最后通过情感分析模型,解析文本中隐含的文化逻辑,如春节的家庭团聚以及其背后的儒家文化。此外,可以通过 AI 设计相关模型,如 AI 模拟国际学生提问,如“Why Chinese eat dumplings not cakes on New Year's Eve?”,驱动学生用知识图谱中的饮食基因链,如饺子像元宝,代表财富祈愿,并由 AI 在对话完成后生成对话效果评估报告,反馈难点,帮助学生进一步学习,同时加强学生内心的传统节日认同。

AI 赋能的节日文化基因图谱,在英语课堂中融入传统文化,通过 AI 与老师的协同,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去记忆单词,而是在知识图谱中去记忆单词,并学习其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二) 丰富教学形式,情境赋能增效

AI 在创新高中英语教学方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打破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6]。文秋芳教授提出了四要素新课程模式,在传统三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 AI,这不仅加强了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为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注入了新动力,开辟了新空间^[7]。在英语教授授课过程中,教师们会采取视频导入,设问等方式来引起学生对于新授课的感知或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编排各式各样的小组活动,往往需要耗费大量备课时间和精力。而在 AI 的帮助下,通过 AI 创设独特的教学情境或相关的项目作业,在减轻教师的备课压力的同时增强学生的课堂体验感,能够真实地参与到对应的文化情境中,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以外研版必修二 Unit1 Food for Thought 为例,可以创设 AI 原生文化情境。以 A Child of Two Cuisines 为例,创设一个对话模型。由 AI 轮流扮演其中一个角色,由学生扮演另外的两个角色,进行对话,从对话中体会文化差异;由教师讲解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向老师或者 AI 提问,进行更深程度的学习;此外,根据给定情境或自创情境编写对话,体现饮食文化差异,每组选取代表与 AI 虚拟角色进行模拟对话演练。通过这一途径,学生可以设身处地地感受到 AI 带来的情境,加深对于饮食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加强文化的传播。

(三) 提升教师教学素养,三力协同共进

在 AI 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将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对教师的教学素养提出了新要求。教师需从技术应用、文化理解、教学创新等多维度提升自我,以适应“AI+传统文化+教学”的新型教学模式。

首先,教师要强化 AI 技术应用能力。一方面要掌握基础的 AI 教学工具,如 AI 课件生成工具、AI 翻译工具、AI 情境创设工具等,以 AI 为工具,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将 AI 的逻辑同自身的教学逻辑融合起来,在理解 AI 逻辑的基础上,将 AI 当作是一个“辅助者”而非决策者”。

其次,教师要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一方面要加强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梳理与高中英语教材相关的传统文化主题,深入研究其历史渊源、象征意义,确保在教学中传递准确的文化内涵。例如,讲解“端午节”时,不仅要让学生掌握“zongzi”“dragon boat race”等词汇,还要通过 AI 展示的龙舟竞渡影像、屈原故事动画,结合英语文本让学生理解其“纪念屈原、祈求安康”的文化内核;另一方面要培养跨文化对比思维,在利用 AI 工具的基础上,明确文化的异同以及翻译的准确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对比思维。

最后,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一方面利用 AI 数据分析优化教学策略,通过 AI 收集学生在“传统文化英语表达”中的学习数据(如高频错误词汇、难以理解的文化概念),针对性调整教学重点。另一方面平衡 AI 与传统教学手段的关系:避免过度依赖 AI 技术而忽视师生互动。例如,在使用 AI 展示京剧的视频时,教师要向学生传递正确的知识,如红脸代表忠诚等,通过小组合作、教师点评,深化学生对文化与语言结合的理解。

AI 赋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要求提升技术应用、文化融合、教学设计等核心素养。通过持续学习、实践反思,教师才能将 AI 技术的优势转化为教学实效,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既提升语言能力,又增强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42 页
- [3] 孙剑波,唐欣,王子涵.高中英语教学中中国故事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J].试题与研究,2025,(12):128-129.
- [4] 赵秋静,孙健.AI 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践阻滞与创新范式[J/OL].学术探索,1-9[2025-07-25].
- [5] 聂鑫琳,李梦.融入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5,48(01):60-65.
- [6] 刘莹.AI 赋能高中英语教学的路径探索[J].英语教师,2024,24(12):92.
- [7] 文秋芳.AI 时代的外语教育会产生颠覆性革命吗?[J].现代外语, 2024, 47 (05) : 722-731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Empowered by AI

Junli Liu¹, Lan Jin¹

¹ Tai Yuan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Jin 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I. By integrating policy requirements with practical teaching cases,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eaching and the challenges confronted, and elaborates on the unique value of AI in advancing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Three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constructing a knowledge graph of cultural genes, diversifying teaching forms, and 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mpetence. Furthermore, with reference to specific teaching examples, it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AI in various links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verifies its remarkable effects in facilit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eaching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thus provides methodologies and approach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Keywords: AI; Traditional Cultur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eaching Strategies

基于 PERMA 理论的高校心理育人路径研究

刘楷文 方媛 周祉木

(南通理工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2)

摘要: 随着大学生心理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与多元化, 传统以“问题修复”为主导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PERMA 理论作为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框架, 涵盖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与成就五个维度, 为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本文基于 PERMA 理论, 结合当前高校心理育人现实困境, 从情绪培育、心流引导、关系构建、意义赋能、成就激励五个方面, 构建基础性、全员性、互动性的心理育人路径, 以促进学生心理发展、心理韧性提升与幸福感受增强, 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从“疾病干预”向“积极建构”转型。

关键词: PERMA 理论; 心理育人;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积极心理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69

一、引言

心理健康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 关乎个体成长成才、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稳定。大学阶段是个体从青年期向成年早期过渡的关键时期, 面临着自我认同、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生涯规划等多重发展任务, 心理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其学习效能、生活品质与未来社会适应。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亦强调“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然而, 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实践中仍面临现实挑战: 一方面, 教育模式存在“医疗化”倾向, 过度聚焦于心理问题的筛查、诊断与危机干预, 工作重心置于“从-1到0”的修复, 忽视了广大学生“从0到1”的积极心理品质培养与发展性需求; 另一方面, 教育资源分散、协同不足, 教育方式较为单一, 难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发展性心理需求, 导致育人成效有限、学生主体参与感不强。

在此背景下, 积极心理学尤其是 PERMA 理论为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范式革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框架。PERMA 理论由塞利格曼提出, 认为实现蓬勃人生 (Flourishing) 取决于五大要素: 积极情绪 (Positive Emotion)、投入 (Engagement)、关系 (Relationships)、意义 (Meaning) 与成就 (Accomplishment)^[1]。该理论超越了传统病理导向的视角, 强调通过系统培育积极体验、促进全心投入、构建支持性关系、引导生命意义、激励成就获得, 从而全面提升个体的心理资本与幸福感。将 PERMA 理论应用于高校心理育人, 有助于推动工作重心从“问题干预”转向“优势建构”, 从“被动补救”转向“主动预防”, 从“单一供给”转向“系统赋能”, 对于构建发展性、全员化、协同式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本文旨在基于 PERMA 理论, 结合高校心理育人现实, 系统探索其应用路径与实践策略, 以为提升心理育人科学性、实效性提供参考。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分析

2.1 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面临的挑战

作者简介: 刘楷文(1997—),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方媛(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周祉木(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通讯作者: 刘楷文

当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普遍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大多数院校设立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配备了专兼职教师队伍,开设了心理健康必修或选修课程,并建立了心理测评、咨询干预与危机应对机制。表面上看,一个包含课程教学、宣传活动、咨询服务和危机干预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已初步形成。然而,深入分析即可发现,其实践模式仍存在显著局限。一方面,工作重心呈现明显的“治疗性”偏移,大量资源向少数存在显性心理问题的学生倾斜,筛查、评估、诊断与危机管理成为核心任务,形成了以“心理问题”为焦点的“类医疗”路径^[2]。另一方面,教育内容与方法较为单一,常以普适性讲座、个体咨询和被动式活动为主,缺乏对积极心理品质的系统性培育与深度体验设计,难以有效激发学生内在成长动力。

这一模式的不足,导致了三重主要困境:其一,教育对象的窄化,使得心理健康教育被视为针对“有问题者”的补救性服务,多数处于“亚健康”状态或寻求发展的学生被边缘化;其二,教育关系的疏离,教师容易扮演“专家”或“评估者”角色,学生则成为被动接收者甚至被“标签化”的对象,双方难以建立信任、平等的育人同盟;其三,教育成效的表浅化,工作停留于问题暂时缓解或知识灌输,未能有效转化为学生持续的心理资本积累与生命品质提升。

2.2 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真实需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真实需求,本质上是基础性、全员性与互动性的^[3]。基础性意味着心理健康是学生完成学业、适应生活、实现发展的根本支撑,其需求如同“阳光与空气”,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育人”,心理健康教育能强健学生之灵魂,是人才培养中非智力的重要成分。全员性指所有学生,无论其当下心理状态如何,均存在发掘优势、提升韧性、追求意义与幸福的成长性诉求,心理健康教育应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应惠及每一位学生而非仅为少数人补缺。互动性则强调学生并非被动接受的“容器”,而是具有主体意识和体验能力的参与者,他们渴望在安全、尊重的关系中,通过对话、体验、实践与反思,实现内在认知与外在行为的积极建构。现有模式与这种深层需求之间的错位,正是推动高校心理育人体系向积极、发展、系统方向转型的根本动因。

三、PERMA 理论的内涵及其在心理育人中的重要意义

3.1 PERMA 理论的内涵

PERMA 理论不仅关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更强调通过五大要素的协同作用,促进个体在认知、情感、行为与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全面发展^[4]。在高校心理育人中,PERMA 理论具有以下适用性:积极情绪是心理健康的润滑剂,能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拓展认知资源,增强应对压力的能力;投入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沉浸体验,有助于提升专注力、自我效能感与内在动机;关系强调人际支持与社会联结,是心理安全感与归属感的重要来源;意义关乎生命价值与目标感,能引导学生超越自我,增强责任意识与使命感;成就体现为目标达成与能力认可,有助于增强自信、激发持续成长动力。

这五个维度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共同构成高校心理育人的系统性框架,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从“干预少数”转向“赋能全体”。

3.2 PERMA 理论丰富高校心理育人的内涵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常被简化为“心理问题的预防与干预”,而 PERMA 理论则将其拓展为“基础性、全员性、互动性的心理发展与幸福促进”。它要求育人工作不仅关注学生心理状态的“减负”(减少负面情绪与问题行为),更重视“赋能”(增强积极情绪、心流体验、意义感等)。这意味着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应从帮助学生“免于心理疾病”升级为助力学生“获得蓬勃人生”。具体而言,PERMA 框架将育人内涵从狭窄的“问题修复”,系统扩展至积极情绪管理、专注力与投入品质培养、支持性关系网络构建、生命意义与价值观探索、

成就动机与自我效能感提升等五大发展性领域，使心理健康教育真正与学生的全面成长和终身幸福相联结。

3.3 PERMA 理论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PERMA 理论为提升育人工作的针对性、吸引力与可持续性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首先，它倡导从“说教诊疗”到“体验建构”的范式转换^[5]。基于 PERMA 的干预措施，如正念训练、优势识别工作坊、心流挑战任务、意义日志、成就故事分享等，均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深度体验与积极反思，能有效激发其内在动机，改善传统模式下学生被动接受、参与度低的问题。其次，它推动资源从“单向供给”转向“系统协同”。PERMA 的五个维度天然关涉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师生互动、家庭支持、社会实践等多个育人场景，促使心理健康教育超越咨询中心的单一阵地，与思政教育、专业教学、管理服务、校园文化及家庭教育深度融合，形成育人合力。最后，它提供了多维度的成效评估框架。育人效果不再仅以危机事件减少为指标，而是可通过测量学生在积极情绪频率、学习投入度、关系满意度、意义感水平、成就感体验等方面的变化，进行更为全面、发展性的评估，从而引导工作持续优化。

四、基于 PERMA 理论的高校心理育人路径构建

4.1 积极情绪培育：构建情绪赋能系统

高校应通过课程、活动与环境建设，系统培养学生的情绪觉察、表达与调节能力。可开设“积极情绪训练”“正念减压”等选修课程，开展情绪主题团体辅导、心理戏剧、艺术表达等活动，营造温暖包容的校园心理氛围。同时，利用数字化平台开发情绪自助工具，帮助学生记录情绪变化、学习调节策略，增强情绪韧性。

4.2 心流引导与投入促进：提升学习与生活的沉浸感

通过教学设计、活动策划与环境优化，引导学生进入“心流”状态。教师可采用项目式学习、探究式教学等方式，增强课堂吸引力；开展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实践、兴趣社团等活动，让学生在挑战与技能匹配的任务中获得沉浸体验。同时，指导学生进行时间管理与目标设定，减少干扰，提升专注力与投入品质。

4.3 支持性关系网络构建：强化人际联结与心理归属

构建“家庭—学校—同伴—社区”四维支持系统，增强学生的社会联结与归属感。推行“导师制”“朋辈互助计划”，建立师生常态化交流机制；开展宿舍关系建设、团队拓展训练等活动，提升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加强家校沟通，引导家长成为学生心理成长的重要支持者^[7]。

4.4 意义赋能与价值引领：深化生命教育与社会责任感

将意义教育融入思想政治课程、专业教育与第二课堂，引导学生思考生命价值、树立远大理想。通过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国情考察等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参与感与责任感；开展“人生意义工作坊”“价值观澄清团体”等心理育人活动，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人生叙事与目标体系。

4.5 成就激励与能力认可：建立多元成长评价体系

构建以“成长为导向”的成就认可机制，不仅关注学业成绩，更重视学生在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艺术体育、志愿服务等方面的表现。设立“心理成长之星”“积极品质榜样”等荣誉，开展成果展示、经验分享活动，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成就体验。同时，提供个性化发展指导，帮助学生设定阶段性目标，积累成功经验。

五、结语

PERMA 理论不仅为高校心理育人注入了积极的价值观与发展观，更提供了一套系统、可操作的方法论，有助于推动其从“防治问题”的被动状态，转向“培育优势、赋能成长”的主动建构新阶段。为高校心理育人提供

了从“修复问题”到“建构幸福”的系统化路径。通过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与成就五个维度的协同推进,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心理资本与心理韧性,更能促进其全面成长与幸福体验。未来,高校应进一步深化 PERMA 理论在心理育人中的实践探索,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向更加积极、发展、整合的方向转型,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的心理支撑。

参考文献:

- [1] SELIGMAN M E P.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 [2] 周肃军, 常扩, 周详.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范式革新及体系建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4(11):120-128.
- [3] 霍胤睿.“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22.
- [4] 高群.基于 PERMA 模式积极心理干预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青海师范大学,2022.
- [5] 曹瑞, 孙红梅. PERMA——塞利格曼的幸福理论新框架[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14(2):10-12.
- [6] 田旭, 张广峰, 潘伟. 基于 PERMA 理论的高校新生适应性教育策略探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24(11).
- [7] 高洁.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积极就业心理品质培养路径研究——以运用 PERMA 模型助力大学生积极就业为例[J].西部素质教育,2025,11(06):111-114.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based on PERMA theory

Kaiwen LIU, Yuan FANG, Zhimu ZHOU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t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and diversifying mental health need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traditional “problem-solving” model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inadequate. PERMA theory, as a core framewor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encompassing positive emotion, engagement, relationships, meaning, and accomplishment, provides systematic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university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Based on PERMA theory and current challenges i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basic, overall, and Interactiv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pathway from five dimensions: emotion cultivation, flow guidance, relationship building, meaning empowerment,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is approach aims to promot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nd well-being, promoting a shift from “disease intervention” to “positive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Keywords: PERMA theory;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ositive Psychology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策略探究

代浩美 岳瑞玲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存在教材文化素材失衡、教师文化素养与教学能力不足以及学生文化输出能力薄弱等现状问题。本文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Unit 5 阅读语篇为例, 从整合多模态教材资源挖掘传统文化、组织课堂实践增强学生文化输出、开展跨学科教学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等维度探究具体策略, 旨在助力高中英语教师优化教学, 帮助学生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输出能力, 增强跨文化交际素养和文化认同感, 培养成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中英语; 阅读教学策略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0

1.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语言能力的提高应与文化意识的形成同步, 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融合统一的特点, 应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实现其学科育人价值(聂鑫琳、李梦, 2025)。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明确指出:“(让学生)使用英语简述中华文化基本知识, 主动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运用中外典故和有代表性的文化标准表达意义和态度, 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 感悟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教育部, 2020)。”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英语作为一门国际通用语言, 其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 既是落实新课程标准的内在要求, 更呼应了时代对培育兼具文化底蕴与国际交流能力人才的使命召唤。

本文结合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实践案例, 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阅读教学的现状、必要性与策略, 旨在为高中英语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教学范式, 优化英语阅读教学, 帮助学生在英语阅读课上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输出能力, 成为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人才。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现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当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以下将从教材素材、教师教学、学生输出三个维度, 深入剖析其融入现状, 明晰问题所在, 为后续探寻优化策略奠定基础。

2.1 教材文化素材失衡

“英语教材是学生文化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祝爱华、高凤江, 2019)。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中, 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素材数量少、覆盖面窄(宋增韵、范姣兰, 2023)。教材编写受多种因素限制, 在文化内容选取上,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不够全面深入。反而教材多聚焦于西方文化主题, 如欧美历史发展(如讲述西方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内容)、经典文学作品选段(如莎士比亚戏剧片段、狄更斯小说章节)、西方生活习俗(圣诞节、感恩节等节日的庆祝方式)等主题频繁出现。而像中国传统节日、哲学思想、艺术形式(书法、戏曲等)等中华文化元素, 在阅读文本中鲜少系统呈现。这种情况下, 难以让学生借助英语阅读, 构建起对本土文化全面、深入的认知体系, 建立起文化认同感。

作者简介: 代浩美(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岳瑞玲(1979—),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通讯作者: 代浩美

2.2 教师文化素养与教学能力不足

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是否深厚,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对最终的教学质量有直接影响。长期以来高中英语教学深受应试教育模式的束缚,教学评价体系以分数为核心导向,教师的教学目标设定、课堂活动组织,都围绕高考英语题型。部分高中很多英语教师不具备较强的文化意识,并且对文化指导也不够重视,这些对我国传统文化在英语课堂中的传播都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仍把精力放在写作训练、听力训练以及语法学习上,侧重于学生的语言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而对于学生在文化融入方面的表现和成长缺乏有效的评价标准和手段(王一琦, 2025)。因此,教师难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准确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无法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降低了传统文化的教学价值。

同时,教师培训体系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英语教学融合的专项培训较少,教师缺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阅读教学的方法与策略指导,制约教学实践。

2.3 学生文化输出能力薄弱

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程度的不足,导致学生文化输出能力较为薄弱。有研究指出,当前英语教学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张静、梁盛楠, 2021),学生无法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

受此影响,在英语表达方面,学生针对中华文化相关内容难以做到精准且地道的表述。在跨文化交流场景中,他们通常仅能对如日常饮食、生活习惯等简单的中华文化内容进行介绍,一旦面临像传统艺术独特魅力、哲学思想价值这类深层话题时,由于英语表达储备的匮乏以及对文化理解深度的不够,学生往往难以有效输出。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使得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难以让世界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在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现存问题后,探究其重要性也尤为关键。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弥补教材与教学短板,还能从跨文化交际、文化自信构建等维度,为英语教学赋予更深层价值,推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实现文化与语言育人的双重目标。

3.1 丰富教学内涵,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其中包含了诗词、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及传统节日、习俗等丰富的文化元素。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大大地丰富高中英语教学素材,使学生在学英语的同时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到更丰富多彩的内容,获得更全面的知识体系。

教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通过讲解西方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将两种不同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学会用辩证眼光看待中西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鉴别力,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加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有助于在文化交流中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3.2 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树立学生文化自信

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的引导下,高中英语课程教学要凸显对学生文化意识、素养的培养,同时帮助他们增强家国情怀,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祖龙、胡列娟、唐英成, 2024)。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心的关键举措。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如儒家思想和礼仪文化等,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文化美德、传统精神等相关内容的了解,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内涵,帮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激发他们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更主动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地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通过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学生成为兼具国际视野与文化传播能力的使者,进而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上,积极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独特力量,让不同文化在交流

互鉴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彩。

3.3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提升学生思维品质

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承载着语言能力培养与思维品质塑造的双重使命。《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将批判性思维纳入学科核心素养体系，明确指出英语教学应成为学生认知世界、发展思维的重要场域（李兵仁，2025）。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着众多深刻且多元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以及文化现象，这些内容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例如，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常常呈现出对人性、道德、社会现象等多方面的探讨，学生在阅读与之相关的英文翻译或解读内容时，会思考背后所反映出的文化价值观与当下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异同点，从而锻炼批判性思维能力，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内涵，促进自身的深度思考与学习。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策略探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融合，需依托具体教学场景与文本载体，通过有效的策略实现文化与语言学习的深度衔接。本章节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Unit 5 阅读语篇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围绕汉字书写系统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价值展开）为实践案例，从教材资源挖掘、实践活动、跨学科教学等维度，阐述教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阅读教学的具体路径，提高学生文化输出能力，让策略既扎根文化与教学理论，又能直接指导课堂实践。

4.1 整合多模态教材资源，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多模态英语教学是一种融合多种感官模态与教学资源的教学模式，借助视觉（图像、视频）、听觉（音频、口语）、触觉（实践活动）等多元符号模态，促进学生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培养多元识读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英语教学模式。教师要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用多模态资源，如音频、视频、图画、符号等文字资源和非文字资源所承载的文化知识和文化内涵（教育部，2020），多重感官联动，帮助学生拓宽文化视野。

教材是文化融入的核心载体，本阅读语篇涵盖汉字书写系统的历史脉络、文化功能，教师不应局限于对文本的单一解读，而要充分通过多模态资源整合，深度挖掘其中的中华文化元素，利用文字、图像、音频等形式，让学生更深层次地理解文章内容、感知汉字承载的文化基因。

在视觉资源运用上，教师在课堂上可以依托教材中的插图（如甲骨文示例、书法作品图片），整合多模态图像资源，在教学课件中补充系列图片（楷书的规整、行书的灵动、草书的奔放），搭配英语解说“*The beaut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lies in its combination of form and spirit*”，引导学生感知汉字美学；在讲解汉字字体演变时，教师可以依次展示从甲骨文到金文、篆书、隶书，再到楷书、行书、草书的演变过程图片，让学生清晰地看到汉字形态在历史长河中的逐步变化，感受其背后深厚的文化积淀。

在听觉资源引入层面，教师可摘录汉字故事音频，比如用英语讲述“仓颉造字”的奇妙传说，以及“秦始皇统一文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华文化遗产与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等内容，让学生在聆听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了解汉字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听完音频后，教师可趁热打铁，要求学生用英语复述关键情节，如“*Cang Jie created characters inspired by the footprints of birds and animals,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ese writing system.*”这样不仅强化了学生的听力理解，更锻炼了他们用英语进行表达的能力。

4.2 组织课堂实践，增强学生文化输出

语言学习的本质是实践运用。教师作为课堂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的有效策略之一，便是通过精心组织课堂实践活动，切实增强学生的文化输出能力，让学生能够用英语自信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师在规划教学环节的过程中，要摒弃传统教学那种将知识割裂开来的做法，要敏锐地洞察到知识与能力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把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同文化内容有机融合起来，进而打造出综合性的学习活动，让

学生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为文化输出积累充足的“养分”。

在课堂的读中或读后环节,教师可以通过创设真实或模拟的文化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汉字文化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提升用英语进行沟通表达和文化传播的能力。比如,教师可以模拟一场“国际文化交流盛会”,将教室变成文化交流的舞台。一部分学生扮演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友人,他们带着对汉字文化的好奇,提出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如“Why do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different forms and what do they represent?”或者“How do Chinese characters reflect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等等。而其余学生则扮演中国文化的传播小使者,运用自己所学的英语知识,为“外国友人”答疑解惑。这一环节不仅巩固了学生的语言知识,而且在合作中锻炼了语言运用和迁移能力,打破了“哑巴英语”状态,缓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英语教学中的失语现象,引导学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再如,教师还可以布置文化创意展示任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感兴趣的汉字文化主题(如“汉字中的吉祥如意”“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等),制作英文手抄报或者录制英文短视频,要求在作品中运用丰富的英语表达方式,生动地呈现汉字文化元素以及其承载的深厚内涵,以此提升学生运用英语进行文化传播的能力,切实增强学生的文化输出效果。

4.3 开展跨学科教学,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英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涵盖了诸多丰富的内容,如历史与遗产方面的英语国家发展脉络、文化传承印记;风俗习惯与社交礼仪里的多元文化差异体现;节日与传统蕴含的独特文化寓意等。将英语教学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机融合,能让教学过程变得更加鲜活有趣,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更为关键的是,开展跨学科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都有着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以本课为例,首先,在课程导入环节,教师可以通过精心设置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调用已有的学科知识来开启话题:

(1) Throughout the long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which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ts evolution?

(2) Compared with other ancient writing systems in the world, such as the hieroglyphics of ancient Egypt and the cuneiform of ancient Babylon, what unique features does the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system have in terms of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通过这样的问题设置,让学生积极回顾历史知识,快速进入学习情境,聚焦到汉字书写系统的历史演变这一主题上来。

在这样的跨学科教学过程中,学生需要不断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分析问题、思考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各种信息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和甄别,从而有效锻炼了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学生也能深刻认识到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进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激发他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使其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做积极传播中华文化的新时代人才。

5. 结语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意义重大且势在必行。尽管当前面临着教材、教师以及学生等多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但通过对其融入的必要性深入探究,以及采取如整合多模态教材资源、组织课堂实践、开展跨学科教学等切实可行的策略,能够有效弥补现存不足,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知识的同时,深入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切实提升文化输出能力与综合素养,进而自信且出色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朝着更优质、更具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需教师不断探索、实践与反思,持续优化教学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教学需求和学生特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高效的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聂鑫琳, 李梦. 融入文化意识培养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5, 48(01):60-6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3] 祝爱华, 高凤江. 英语教学中文化自信的培育路径[J]. 教学与管理, 2019, (24):101-104.
- [4] 宋增韵, 范姣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实践探究[J]. 海外英语, 2023, (09):188-190+197.
- [5] 王一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英语教学的策略研究与实践[J]. 中学生英语, 2025(30):85-86.
- [6] 祖龙, 胡列娟, 唐英成.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案例研究——以 Unit 3 Celebration Lesson 1 Spring Festival 为例[J]. 英语教师, 2024, (8):111-114.
- [7] 李兵仁.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策略与实践探索[J]. 基础教育论坛, 2025, (14):98-100.
- [8]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9] 梅德明, 王蔷主编.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组编写.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解读[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 [10] 赵海燕. 中国近现代基础英语课程发展的文化路径及启示[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36(01):73-81.
- [11] 张虹, 李晓楠. 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2, 5(04):42-52+92.
- [12] 张静, 梁盛楠. 高中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研究[J].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32(02):99-103.
- [13] 邹为诚. 英语课程标准研究与教材分析[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87-92):128.

An Exploration of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Dai Haomei, Yue Ruiling

(Tai 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 zhong, Shanxi,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TCC) into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However, current practice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cultural materials in textbooks, teachers' insufficient cultural literacy and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students' weak cultural output capacity. Taking the reading text in Unit 5 of PEP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mpulsory 1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specific strateg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tegrating multimodal textbook resources to excavat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organizing classroom practices to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output, and conducting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to foster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The research aims to assist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n optimizing their teaching,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output capacity of ETCC, strengthen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ivate them into active disseminator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TCC);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技术采纳行为研究现状及启示

李远航 王丽萍

(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特征之一, 有关信息技术的接受与采纳业已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八本核心期刊中相关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教育领域中技术采纳研究的发展脉络、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四个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 发现目前国内教育领域中关于新技术接受的研究呈现出平缓上升的研究趋势, 包含单一模型和整合模型两种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 形成了“使用者-技术-关系-环境”影响因素模型。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应更关注整合模型的应用以及将研究方向从初始接受扩展为过程性的持续性采纳研究两个方面的研究启示。

关键词: 技术采纳; 元分析; 技术接受模型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双减”政策背景下基础教育师资核心能力重构与提升路径研究(SD2022101); 2025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课程群建设研究》(2025GJJG552)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1

一、研究背景

唐·伊德说:“从遥远的过去开始, 遍及世界文化的各个角落, 人类活动总是通过技术加以实现”^[1], 教育也不例外。21世纪以来, 长久依赖于教师口传心授、板书呈现的面对面教学形态开始发生变化, 多媒体计算机、博客、移动学习、慕课、网络学习空间等一批来自于外部的新技术, 通过加工改造成为“教育的技术”^[2], 改变着人们对于教学过程的理解、设计与实践。2018年4月, 为了满足和响应国家互联网+、大数据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战略的任务安排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 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推动教育观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3]。当新技术以一种具备“创新”属性的新物种角色进入原已达到平衡状态的教育生态系统时, 它们是否能够被使用者接受与采纳, 是其是否能够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 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与教学需求的匹配度、技术功能与教学过程的贴合性与适切性;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在技术和教学不断融合的过程中, 教师和学生两类主体对于新技术所持有态度与使用意向。本研究以八本核心期刊中关于新技术接受与采纳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采用内容分析法, 对我国教育领域中新技术接受研究中所呈现出的研究脉络、研究方法、理论基础以及影响因素做一次梳理, 以期了解该领域研究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二、研究样本获取及基本分析框架制定

(一) 研究样本获取

本研究选取《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开放教育研究》等八本核心期刊作为取样源刊, 在CNKI数据库中, 通过“技术接受”“技术采纳”作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 在剔除无关文献后, 最终获得用于分析的样本文献共107篇。

(二) 研究方法与基本分析框架确定

作者简介: 李远航(1976—), 男,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化资源开发;

王丽萍(1980—), 女,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通讯作者: 李远航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确定分析对象、建立分析表格以及统计描述等核心步骤对所获取的文献进行整理⁴⁻⁵,以期对文献内容作客观、系统的量化处理,目的在于清晰了解教育领域中新技术接受问题的本质性事实和趋势,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内容,并对其发展趋势加以预测。同时,为了对教育领域中新技术采纳研究的现状做出有效的综合归纳与分析,本研究以 Choudrie&Dwivedi (2005) 和 Jeyaraj (2006) 等人的研究工作为基础⁶⁻⁷,建立了包含时间维度、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影响因素体系四个部分在内的元分析框架。在完成样本文献的搜集与获取之后,由研究者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对以上四个部分的内容进行判定,并通过 Excel 数据库进行最终分析数据的整理和呈现。

三、文献分析结果

(一) 教育领域中新技术采纳行为研究的基本时间脉络及趋势

在生态学视野中,教育是一个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媒体所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当教育进入信息化发展脉络,以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成为了教育生态系统中最显眼、变化最明显和迅速的生态因子。正是由于技术更加广泛而普遍的使用,人们在追寻利用技术优化教育教学理念的关照下开始从单纯地关注技术性能的不断提升,逐渐过渡为寻求技术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技术领域技术接受研究的相关成果开始出现。本研究以两年为一个计量单位,对获取的文献进行整理,其时间分布及发展趋势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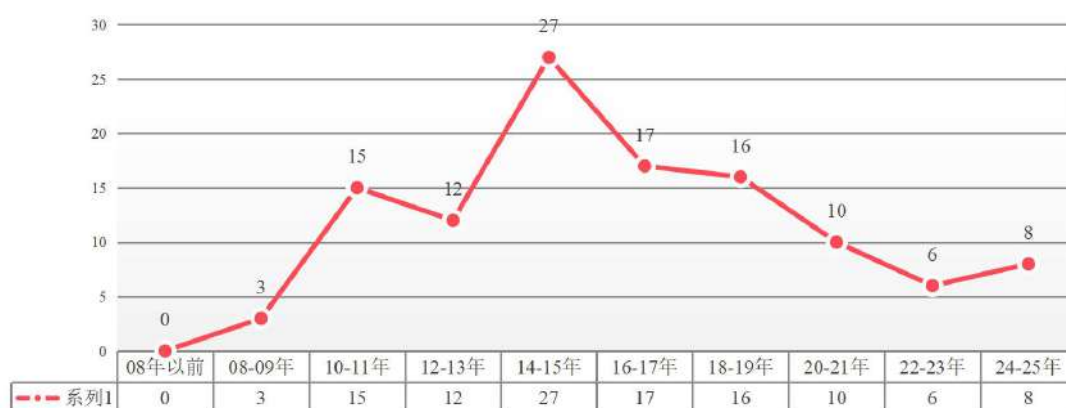


图 1 样本文献的时间分布及发展趋势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教育技术领域对于新技术接受的研究始于 2008 年,在随后的十年中呈现出平缓上升的研究趋势,并在 2011-2012 年以及 2014-2015 年期间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研究高点。进一步整理样本文献所关注的研究主题时,可以明显看出研究焦点集中在网络教学平台⁸⁻¹¹、信息技术¹²⁻¹³、移动学习¹⁴⁻¹⁵、混合学习²⁰、MOOC¹⁸⁻²¹等热门领域。随着教育技术领域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其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开始由早期的行为主义过渡为建构主义和联通主义,受此影响,对于学习的观照也开始从单纯地关注媒体这一外部因素逐渐过渡为关注教与学的完整过程。媒体技术作为教学中的一个因素,必然要与其他要素达到协调状态,方可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其次,近二十年间,教育所处的技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 2000 年以后,大量新型信息技术层出不穷,它们所具有的更新周期短、种类繁多、功能强大、使用灵活等特点,使得人们在进行选择和应用时开始反思何种技术才是教育中“合适的”技术²²。利用技术接受理论从使用者(教师&学生)视角展开对此类问题的论述,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二) 教育领域中新技术采纳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

技术接受研究始于 1989 年 Davis 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²³,用于探讨新技术被接受和采纳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并致力于分析不同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与路径结构,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基础。本研究将获取的样本文献中涉及的常用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归类后,并按照所用理论的提出时间作为线索,形成如图 2 所示的以社会心理学和信息技术为主线的两条理论脉络主线;同时在研究样本中,对于理

论基础的选择出现两种主要趋势：一是选择单一模型作为研究基础，二是将不同模型相互整合形成理论基础。研究篇样本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理论及代表性文献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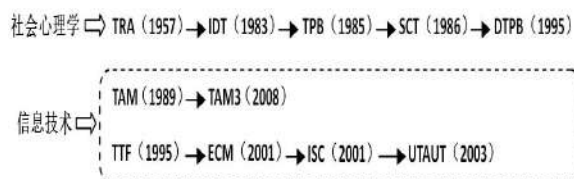


图2 常用理论基础及其发展脉络轨迹示意图

	理论基础	代表文献
单一模型	TAM及扩展	【9】【15】【24】【25】【26】
	UTAUT	【17】【27】【28】【29】【30】
整合模型	TAM&TTF	【12】【31】【32】
	TAM&IDT	【8】【33】【34】

图3 高频理论基础及代表文献示意图

1.单一模型作为理论基础

在样本文献中，TAM和UTAUT模型是最常用的描述新技术接受的理论来源，均从用户-技术角度解释个人意愿和信念是如何影响信息技术采纳决定的形成的。TAM模型吸纳了期望理论模型、自我效能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于解释外部变量对于技术使用者的使用态度、行为意图等方面的影响，用于解释和预测个体对信息系统及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UTAUT作为TAM的衍生模型，整合了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TAM、计算机使用模型、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 SCT）、TAM与TPB整合模型（C-TAM-TPB）、动机模型以及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IDT）八种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形成了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促成因素四个核心因素，以及性别、年龄、经验和自愿性是个调节变量，对信息技术用户接受和采纳行为的解释力接近70%，被广泛用于预测和解释个人或组织接受信息技术的基本路径。以UTAUT作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多见于2014年以后的文献，是对TAM作为单一理论基础的不断充实与扩展。

2.整合模型作为理论基础

在样本文献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开始通过整合不同模型，构建符合研究需求的理论框架，其中采用较多的包括TAM与任务技术匹配模型（Task-Technology Fit, TTF）及TAM与创新扩散理论的整合。TTF模型由Goodhue和Thompson于1995年提出，以感知合适理论为基础³⁵，通过对个体认知心理和行为的分析来揭示信息技术作用于个体的任务绩效的机理，包含任务特征、技术特征、任务技术匹配、使用绩效等变量，反应了信息技术和任务需求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³⁶。将TAM与TTF整合进行新技术接受的探索，一方面弥补了TAM模型由于缺乏对任务的关注所造成的对技术有用性与技术对某特定任务有用之间相互混淆的局限，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从任务技术适配到技术使用之间的桥梁，形成了“技术-使用者-任务”的统合。IDT理论认为新技术的创新特征是影响用户使用意向和接纳的决定因素，将其与TAM理论整合使用，可以较好地弥补TAM对使用者动机分析缺乏的不足，更好地提高整合理论模型解释能力和使用范围³⁷。

（三）教育领域中新技术采纳行为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

1.常用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Alavi和Carlson（1992）提出的研究方法分类系统³⁸，从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两个角度对获取的文献进行研究方法的分析，有72篇文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占文献总量的91.3%），通过问卷调查的手段获取研究数据；有8篇文献同时使用了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且访谈多针对调查问卷的设计与修订而展开。这一结果与信息系统学科近年来采纳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94.3%）的现状一致³⁹，实证方法也被认为更具严密性，有利于从实践中提炼理论。此外，在文献中可以看到，调查研究均采用截面数据的静态模型进行分析，而作为个体新技术接受和采纳行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而言，研究方法的单一性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此，可以参照纵向研究的方式，通过多阶段模型，在新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不同阶段针对同一被试群体展开调查，获得新技术被接受的完整过程和关键转折点。

2.数据分析工具与统计方法

在对样本文献中呈现出的研究过程进行进一步分析时可以看到，几乎所有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献都依据“基于已有理论建立分析模型—依据分析模型建立研究假设—根据研究假设设计/制定/修订调查问卷—通过调查获取研究数据—根据数据分析验证假设—建立影响因素路径模型”的基本思路展开具体工作，最频繁使用的数据统计工具包括：SPSS、AMOS和LISREL⁴⁰⁻⁴²。其中，SPSS多用于完成调查问卷的修订、信效度检验以及相关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而AMOS、LISREL、PLS⁴³⁻⁴⁵则多用于探讨建立的模型中各因素之间的主效应及调节效应。相比而言，AMOS和LISREL采用以协方差为基础的极大似然法完成分析，需要回收数据呈现正态分布；而PLS则对数据分布的要求相对较低，可最大限度减少内生变量的残余差异，应用范围更广，更适用于复杂的模型测试。

(四) 教育领域中新技术采纳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新技术被接受的因素的多样性是采纳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2006 年, Jeyaray 等人对技术采纳研究中常见的 135 个自变量和 8 个因变量以及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的 505 对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⁴⁶。本研究在对样本文献中所呈现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 重点参考 Jeyaraj 等人的研究框架⁴⁷, 提出教育领域中新技术接受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如图 4 所示), 从使用者、系统/技术、关系以及环境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工作。

维度	类别	影响因素	代表文献	类别		影响因素	代表文献
使用者	认知特征	感知有用性	【41】【25】【50】	期望		绩效期望	【27】【29】【49】
		感知易用性	【31】【21】【26】			努力期望	【28】【29】【30】
		感知价值	【48】【49】	规范信念		主观规范	【21】【44】【45】【50】
		感知乐趣	【A】【19】【49】			客观规范	【21】
	感知行为控制	自我效能感	【31】【26】【50】			群体规范	【30】【19】【52】
		社会经济地位	【51】	用户特征		相关经验	【19】【49】【52】
		知觉行为控制	【21】			个体创新性	【13】
		工作相关性	【46】			个体特征	【19】【50】【53】
维度	类别	影响因素	代表文献	维度	类别	影响因素	代表文献
系统/技术	技术特征	灵活性	【51】	环境	便利条件	便利条件	【28】【53】
		兼容性	【8】【21】【25】		促成条件	促成条件	【27】【30】【54】
		相对优势	【8】【21】	关系	满意度	满意度	【14】【54】
		技术匹配度	【12】【14】【31】				

图 4 使用者维度上主要影响因素及典型文献

在使用者个体维度方面, 个体认知特征中来自于 TAM 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影响因素出现最频繁, 感知有用性反应了个体使用具体系统或技术对工作业绩提高的程度; 感知易用性指个体认为容易使用具体系统或技术的程度。在所获取的样本文献中个体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均多次被验证对个体技术使用态度和意图具有显著性影响, 并通过态度作用于技术使用行为^{21、25、26、50}。以期望作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以 UTAUT 模型作为理论模型, 关注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在个体新技术采纳研究中的作用。绩效期望是指个体通过使用系统/技术希望能够获得多少成效的主观感受, 而努力绩效则指个体在使用系统/技术过程中要付出的能力程度, 多受个体对技术易用性感知的的影响, 这两者都会对个体使用新技术的态度和意向产生正向影响作用^{27、29、30}。在文献中可以看到, 个体在决定是否接受某种新技术时往往要预见使用技术后所产生的效果, 并对应用新技术是否会提升工作效率做出预判, 形成“工作相关性—感知有用性—个体接受意向”的显著影响模式。主观规范、客观规范和群体规范构成了个体新技术接受中的规范信念, 集中体现在来自于个体对来自于外部支持的感知, 其中来自与同伴的影响形成了对新技术接受的主观规范^{44、45}, 直接作用于个体的新技术使用意愿²¹; 来自于各种信息媒介, 如广播、电视等的影响表现为客观规范, 给个体提供了替代性经验; 而来自于与所处群体成员的目标和价值保持一致的需要形成了新技术接受的群体规范^{19、30}, 同样对个体新技术使用意愿具有明显正相关作用。在感知行为控制方面, 个体具有的自我效能感出现频率最高。自我效能是一个来自于社会认知心理学的概念, 特指个体对自己能够利用所游泳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在新技术接受的过程中, 个体自我效能水平高的个体将倾向于接受并使用新技术。

在技术特征方面, 人们的关注点多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本身所具备的特性, 如灵活性、兼容性以及相对优势; 另一方面则集中体现在技术与所需完成任务的适配程度上。作为一种新技术而言, 只有当它具备不可替代的相对优势时, 才会对个体的使用意向具有正向相关作用; 而兼容性则是指新技术与个体已有的相关技术操作经验、个体需求之间的已执行程度, 会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以及技术持续使用的意向产生直接影响¹³。技术与任务的适配程度反应了技术应用和任务需求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 会影响个体对新技术有用性的感知。从这个角度看, 任何新技术在进入教育领域时, 依然需要遵循从发现教育问题出发寻求技术解决方案的路径, 站在需求的角度探索技术有效应用。

环境和关系是影响个体新技术接受的主要外部因素。在样本文献中, 环境维度主要体现在便利条件和促成条件上。便利条件是 UTAUT 模型中的核心变量, 指个体觉察组织和技术设备支持及其使用新事物的程度⁵⁵, 在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到, 便利条件正向影响教师信息技术使用行为, 并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和学校间差异²⁸。促成条件指个体认为所处的客观外部条件能够支持新技术应用的程度, 个体在促成条件方面的感知会正向影响教师的新技术接受意向²⁷, 当个体认为外部条件 (如费用、支持系统等) 对于新技术应用有支持作用时, 更容易产生明显的技术接受与采纳行为^{17、30}。对于关系维度的描述上, 样本文献多集中于满意, 即个体接受一项服务而愉快地完成后的感受, 受信息质量、系统质量以及服务质量的影响, 同时又会个体体系技术的使用意向、使用态度产生正

向影响⁵⁴。

综上,通过对教育技术核心八本期刊中79篇与新技术接受与采纳为主题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本研究得到如下四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第一,教育领域中对于新技术接受和采纳的研究自2008年出现后,呈现稳步的增长趋势,是当前教育与技术相互融合背景下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第二,目前教育领域中新技术接受研究中,常采用的理论基础以TAM为主,并出现了将不同模型相互融合以满足研究需求的整合模型;

第三,在研究方法使用和数据分析工具的选择上,调查研究依然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SPSS和AMOS是最常用的数据分析工具;对影响因素的路径进行建模成为该领域研究的趋势;

第四,通过对样本文献中呈现出的个体新技术接受影响因素的整理可以看到,虽然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基础模型不尽相同,但基本形成了从早期单一的以TAM为基础的“技术-用户”单维度架构扩展为“技术-使用者-环境”多维度架构,形成了“使用者-技术-环境-关系”四个角度分析问题的研究脉络,其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自我效能、期望以及促成条件等是最频繁的分析要素。

四、思考与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种类的不断丰富、功能不断完善、更新速度不断提升,将新技术与传统教育进行深度融合,构建基于技术环境的教育生态已经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态势。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作为最主要的技术使用者,是否认可与接收新技术,是其能否顺利进入教育生态的前提条件。在通过对教育技术领域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新技术接受研究已逐步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形成了相对规范、完整的研究体系,但也存在着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给予关注与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将研究理论从单一模型基础拓展为整合模型基础。在现有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研究会采用单一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其中又多以TAM模型为主,尝试将TAM应用于不同的技术应用情境中。TAM作为技术接受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预测各种信息技术的接受问题,对全球范围的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提供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参考与指导⁵⁹。但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方面,TAM系列研究的因变量选择过于单一,尽管在样本文献中有学者将自我效能感、工作相关性等因素与TAM相整合,但是这些因素多直接指向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没有增加人们对于新技术采纳的理解;另一方面,以TAM为主的研究更关注个体对于新技术的主观感受,但是在实际中这种感受因人而异,缺少客观的来自于技术功能/特性方面的指导性建议。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根据研究需要将不同理论模型相整合,实现不同模型之间的优势互补,从更宽泛的视角考察个体是如何使用新技术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适应性、学习以及重造等与技术相关的因素,为技术接受研究构建更全面、客观的分析框架。

第二,将研究阶段从新技术的初试接受扩展为过程性的持续性采纳研究。新技术与个体的适应、与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Kwon&Zmud将信息技术导入描述成由“启动、采纳、适应、接受、使用和融合”6个阶段组成;Cooper&Zmud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提出了更完整的包括“启动、采纳、调适、接受、惯例化与内化”6阶段的信息技术实施模型。尽管初始接受是决定性技术能否进入教育过程的先决条件,但是技术的长期、稳定使用才是其最终成功的标志。但是在样本文献中看到的相关研究多将关注点置于初始接受状态的研究,对技术持续性使用的关注较少。但是在实际中,随着个体与新技术之间互动频率的增加、交互层次的加深,其对新技术所持有的信念和态度在信息技术采纳前后不断发生着变化⁶⁰。因此,本研究认为只有对个体在接触新技术的初始状态和采纳后续使用行为都进行深入研究,完成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对比分析,才能对个体所处不同阶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指导建议,为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 IHDE D. Technology and the lin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ersity Press, 1990:27, 72-112.
- [2]叶晓玲,李艺.论教育中技术的生存历程及其发展指向[J].电化教育研究,2017(2):19-25.
- [3]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DB/OL].
http://laws.ict.edu.cn/laws/new/n20180416_49471.shtml, 2018-9-27.
- [4]张一春.教育技术研究方法[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5]张屹.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6]Choudrie J, Dwivedi Y K, Investigating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for examining technology adoption issues[J].Journal of Research Praeticee, 2005,1(1):1-12.

- [7]Jeyarsj A, Rottman J W, Laeity M. A review of the predietors, linkages, and biases in IT innovation adoption researh[J].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ehnology, 2006,21(1):1-23.
- [8]胡勇.在线学习平台使用意向预测模型的构建和测量[J].电化教育研究,2014 (9): 71-78.
- [9]詹海宝,张立国.理解大学生对网络教学平台的采纳——基于 TAM 的实证研究[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5(3): 53-59.
- [10]季志.大学生网络学习行为模型与实证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3(5): 59-63.
- [11]周华丽,焦婧,韩忠强.高校教师网络教学平台用户体验行为的实证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4(4): 57-61.
- [12]任秀华.基于 TAM 和 TTF 模型的教师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09(9): 64-67.
- [13]高峰.教师的个人特质与教育信息技术的采纳——基于高校网络教学背景的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 2011(12):25-31.
- [14]顾小清,付世容.移动学习的用户接受度实证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1(6):48-55.
- [15]刘鲁川,孙凯.M-Learning 用户接受机理:基于 TAM 的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1(7): 54-60.
- [16]赵英,杨阁,罗萱.大学生对 MOOC 接受与使用行为的调查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5(8): 37-44.
- [17]王钱永,毛海波.基于 UTAUT 模型的 MOOC 学习行为因素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6(6): 43-48.
- [18]张哲,陈晓慧,王以宁.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 2018(1):118-125.
- [19]方旭,杨改学.高校教师慕课教学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6(4):67-76.
- [20]赵国栋,原帅.混合式学习的学生满意度及影响该因素研究——以北京大学教学网为例[J].中国远程教育,2010(6):32-38.
- [21]刘梅.高校教师混合式学习接受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创新扩散的视角[J].现代教育技术,2018(11): 54-60.
- [22]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育技术领域新界定”的再解读——对 AECT05 教育技术定义的理解和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5(1):39-44.
- [23]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 MIS Quarterly, 1989,13:318-319.
- [24]牟智佳,张文兰.电子书包使用意向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4(3):67-71.
- [25]张海,肖瑞雪,王以宁,樊峰伟.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师范生 TPACK 发展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5(5):111-117.
- [26]权国龙,王华文,顾小清.图示工具在协作学习中的影响——基于协作学习项目的调查[J].远程教育杂志, 2015(4):59-66.
- [27]张汉玉,钱冬明,任友群.推进电子书包教学应用:教师接受度的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5(1):92-97.
- [28]李毅,吴思睿,廖琴.教师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因素和调解效应的研究——基于 UTAUT 模型[J].中国电化教育,2016(10):31-38.
- [29]张思,刘清堂,黄景修,武鹏.中小学教师使用网络学习空间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UTAUT 模型的调查[J].中国电化教育,2016(3):99-106.
- [30]方旭,张新华,李林.教师 STEM 网络教育平台行为意向影响因素——基于华南师大 Wise 平台的调查[J].开放教育研究,2018(6):59-67.
- [31]任秀华,翟娜.高校课堂教学中教师信息技术接受行为调查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2(2):84-90.
- [32]缪蓉,李琳.教育资源网站的评价研究:使用者角度[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1(2):65-70.
- [33]张哲,陈晓慧,王以宁.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1):118-125.
- [34]朱少英,申国昌.精品课网络资源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5(11):51-56.
- [35]Goodhue D L,Thompson R L. Task-technology fit and individual performance[J]. MIS Quarterly.1995,19(2): 213-236.
- [36]Ghasemaghaei M, Hassanein K. Online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contextual factors-A meta-analysis[J].Information&Management,2015,52(8):965-981.
- [37]周蓓婧,候伦.消费者微博营销参与意向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TAM 和 IDT 模型[J].管理学家(学术版),2011(12):22-40.
- [38]Alavi M, Carlson P. Areview of MIS research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1992,8(4):45-62.
- [39]Claver E, Gonzalez R, Llopis J L. Analysis of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ystems(1981-1997)[J].

Information&Management,2000,37(4):107-119.

[40]张纲要,安涛.基于 TAM 的高校网络课程接受度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5(5):73-77.

[41]杨丽,陈卫东.体验视域下移动学习资源用户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4):89-96.

[42]马凌,陈娇,漆颖.国家精品课程网站用户使用意向影响因素及实证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4(4):45-49.

[43]张长海,焦建利.地方高校大学生慕课接受度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5(6):64-68.

[44]杨根福.MOOC 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6(2):100-111.

[45]刘禹,陈玲,余胜泉.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使用意向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12(8):57-61.

[46]闵庆飞,刘振华,季绍波.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元分析: 2000-2006[J].信息系统学报,2008(2):22-32..

[47]Sabherwal R, Jeyaraj A, Chowa C.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J].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12):1849-1864.

[48]马如宇.影响移动学习用户使用态度的前置性和潜在性因素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09(7):47-51.

[49]许玲,郑勤华.大学生接受移动学习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3(4):61-66.

[50]路兴,赵国栋,原帅,李志刚.高校教师的“混合式学习”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北大教学网为例[J].远程教育杂志,2011(2):62-69.

[51]张荣,曾凡斌.互联网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及其模型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1(5):54-59.

[52]谭光兴,徐峰,屈文建.高校学生网络教学行为意向影响因素与模型[J].电化教育研究,2012(1):47-53.

[53]王雨,李子运,陈莹.大学生数字化阅读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4(8):57-64.

[54]王耀莹,王凯丽.面向教师教育远程网络培训平台的技术接受扩展模型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5(7):96-100.

[55]Venkatesh V, Morris M G, Davis G B, et al. User ass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ward a unified view[J]. MIS Quarterly,2003,(13):425-478.

[56]杜世纯,傅泽田.混合式学习接受度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6):123-128.

[57]顾小清,朱元锟.教育用户对技术产品的接受度研究:师生群体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2012(8):21-27.

[58]徐恩芹,张景生,任立春.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精品课程推广应用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1(3):68-71.

[59]高芙蓉,高雪莲.国外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研究述评[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1(4):95-105.

[60] Karahanna 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cross time: a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 of pre-adoption and post-adoption beliefs [J]. MIS Quarterly, 1999, 23(2).

Research Status and Enlightenment of New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 Yuanhang, Wang Liping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Abstract: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acceptance and adop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aking relevant literatures from eight core journals as research samples, this study adopt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four aspect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cluding its development context, theoretical basis, research methods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domestic research on new technology acceptance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shows a gently upward research trend, has two theoretical bases of single model and integrated model, mainly adopts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forms an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user-technology-relationship-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wo research enlightenment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models,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should be expanded from initial acceptance to procedural continuous adoption research.

Keywords:Technology Adoption; Meta-analysi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价值内涵的同异及其启示

廖一鸣¹ 王琳琳²

(1.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2, 2.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在“第二个结合”的视野下,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的价值内涵有着高度契合性与融通性。这种契合性与融通性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哲学关联。通过比较两者的共通性、区别性,可以更为透彻地了解党性修养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并对这些文化因子作历史性地回溯与反思;同时亦能考察,君子之道中的终极价值理想,如何在党性修养的过程中得到深度延续与广泛发展。这些认识对于党性修养的深层次价值理解,以及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创新诠释,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关键词:党性修养;君子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

基金项目:广西区委党校校级课题(2025RC08)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2

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浸润其中,并不断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智慧。这些浸润我们的精神力量和智慧,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产生效果的,这是文化发挥作用的天然形式。随着对“第二个结合”论述、研究、实践的逐渐深入,我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层次与作用形式的认识也到达了新的阶段。优秀传统文化,由“日用而不觉”的被动作用形式,开始转向理解、运用、信仰的主动认识模式。简而言之,这是文化自觉开始逐步转变为文化自信的体现。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根脉”,这一称谓不仅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特征,而且还体现出这一优秀文化的时代特征。受上述认识启发,我们可以提取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中具有高度契合性、融通性的重要主题进行比较,以加深对优秀文化的理解和自信,同时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力量。

一、对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作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

经初步研究,笔者认为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两者具有较强的比较必要性与意义。

首先,某一特定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其价值内涵,因此进行“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路径便必然先对两者的核心价值观作出提炼,这项工作的成果虽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等系列文献与相关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但更为具体的价值内涵与逻辑还可以进一步开发。笔者认为,最能体现两者各自核心价值内涵与实践形式的,莫过于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当前,结合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党性修养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②,研究的侧重点多集中在君子人格、儒家道德修养、党员作风修养、理论修养、纪律修养等方面。研究主要围绕儒家文化如何在党性修养过程中发挥作用这类问题展开,虽然也涉及到君子仁义道德价值内涵的论述,但对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的价值内涵的比较研究,似乎较为少见。另外,对党员与君子这两个不同实践主体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理想内涵的同异探讨也并不多见。因此,有必要对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两者的价值内涵作比较研究。

其次,党性修养的实践主体是党员,党员中有相当数量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君子之道的实践主体一般是古代具有一定官职,系统接受过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士大夫。尽管这两个实践主体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身份差异与时代差异,导致了两者的价值追求在内涵与形式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区别性,但两者的终极价值取向却仍有着高度的

作者简介:廖一鸣(1988—),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琳琳(1989—),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② 相关成果可参考李丽、石冬、张茂泽、任广峻、余秀娟、李曰春、郭颖等人的研究成果。

契合性与融通性。因此,两者具有能够进行比较的价值前提,并且,党员中的公职人员,也能够与君子这一群体形成对照,这两点表明了研究的可行性。

再次,在历史语境下,党员与君子各自作为最能代表时代价值取向的两大实践主体,比较党员修养与君子之道的价值内涵能够更好地回顾与审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依据与实践规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自信和智慧力量,开辟出新时代的党性修养境界。这是对两者作比较的历史因由与时代意义。

综上,笔者认为,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之间存在着文化意义上的重要关联,党性修养中的关键价值内涵,能够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重要历史与思想依据。诚然,君子这一政治文化群体,虽已随着时代的改易而落幕,但君子之道的理想精神仍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革新,在时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理清两者的关键内涵、重要联系与区别,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自身的文化使命与历史职责。本文将以“第二个结合”为考察视角,先对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的价值内涵作出界定,并比较两者的共通性与区别性,从中归纳出党性修养的一些新启示。

二、对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价值内涵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性有着明确的解释和规定,主要包括党的性质与党员的性质两个方面,本文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党员的性质这一面。对党性问题的早期讨论,列宁、刘少奇、陈云等皆有陈说。《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对党员的性质作了如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党员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①可见,党性是对一名党员的品德与行为准则的根本要求,党性需要在始终不断的锻炼中增强。党性修养,就是党员巩固提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提升党性,首要的一步是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这是一股战胜一切困难,勇于与自我、与敌人作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

所谓君子之道,就是君子时刻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以达到安身立命、兼济天下的目的。君子以此道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与人格自信。简而言之,对于被称作君子的古人而言,这种修身立德的涵养方式体现着他们的人格尊严与生命价值。我们看到,古代君子的道德涵养,与中共党员的党性修养有着许多共通性,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对道德内涵与价值的思考和践行。首先,两者都对践行道德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其次,尽管两者的道德践行在形式和内涵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十分重视对践行过程与结果的反思。最后,两种道德践行都各自指向了一个终极的共同理想愿景。

三、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价值内涵的共通性

在世界范围内,似乎少有一个政党,会把党性修养与修身立德联系起来,并看作是对成员的一项核心考核标准,也似乎少有其他政党的成员,会坚持不懈地自觉把对自身德行的要求,与其所在政党的最高理想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共党员为何如此特殊?笔者认为,其根本答案,在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实践与发展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历史证明。因此,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自然具备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德行的思想基因,并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基因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融合,铸就了广大党员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集体信仰、信念与信心,同时形成了对党性修养的深刻认识和实践方法。近年来,依托于广大党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积极践行,这种集体信仰、信念与信心得到了更深度诠释与强化,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党性修养的文化内涵。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党性修养关系最为密切、意义最为相似的思想范畴,应该是君子之道,两者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密切联系,因此可作比较。随着孔子对君子一词所作的大量与道德教化相关的诠释,君子的涵义便从“低级贵族”转向为“有德之士”。我们现在称呼品德端正的人为“正人君子”,是对涵义已经发生转变的君子称谓的沿用。所谓君子之道,就是君子时刻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以达到安身立命、兼济天下的目的。君子以此道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与人格自信。简而言之,对于被称作君子的古人而言,这种修身立德的涵养方式体现着他们的人格尊严与生命价值。我们看到,古代君子的道德涵养,与中共党员的党性修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两者都对践行道德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其次,尽管两者的道德践行在形式和内涵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十分重视对践行过程与结果的反思。最后,两种道德践行都各自指向了一个终极的共同理想愿景。

中共党员党性修养的共同理想与信仰前文已述,宋代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则可谓对君子之道核心意义与理想价值的高度归纳与总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张载认为,君子应当确立一种至善之心,这是一种心怀万物的胸怀。君子以此胸怀践行仁义,能够使万民的性命得到妥善安置、继承过往圣贤的仁爱精神、开拓千秋万代的太平盛世。这是张载对君子毕生使命的最高概括,也是对中华精神文明价值的最佳诠释。张载告诉我们,君子并非只为自己而活,因为这只是个人的小我,而非与天下万物一体同流的宇宙大我。张载认为,在天地大化的洪流中,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其命运都紧密连结为一体,因此君子应当建立一种宇宙大我的意识担当,尽生命的最大限度关爱天地万物与众生,从而实现一种恒常而终极的善的价值。

^①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69页。

①可以注意到,张载的横渠四句,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两者所蕴示的终极价值内涵是高度契合的,这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精神内核具有高度一致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得的历史成就并非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极具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新形态。从道德修养与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这一角度看,党性修养蕴含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内涵的追求。因此,进行党性修养以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是党员对自身的重要要求,这项工作所关注的不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提升,更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现实关切。

我们从一个宏观的文化与历史视野理解了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的核心联系,这一联系表明,党员的核心价值追求,与君子的价值理想,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而恰恰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两者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追求相通,对实现人类大同的共同理想相通,因此党性修养的工作便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纵深意义。这启发我们,党员的信仰,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之间存在着共通的理想价值追求,这是两者最为根本的联系。这一共通理想价值追求,其具体内涵可以进一步展开为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共同理想愿景、其二是德行日新的内在修养要求。这两个层面,一从群体愿景出发、一从个体德行出发。相互补充。

(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共同理想愿景

我们的入党誓词有这么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共党员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句誓言与两个使命,不是空话,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一直努力践行着的座右铭。从过去来看,已经有无数党员用一生践行了这一初心使命,从现在来看,正在有千万党员为此初心使命和理想不懈奋斗,展望未来,依旧会有无数个党员前赴后继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愿景而奋斗一生。在中国古代,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与之相呼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理学家张载,对君子之道核心意义与理想价值的归纳与总结。

其实,在中国古代,张载并非这种远大理想的最早提出者,在《礼记·礼运》中,早已有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振聋发聩之声,其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

这是说,万物的运行自有其道,其中以天下万物共同遵循之道最为宏大。这一大道表明,天下并非由某一人或某一事物私自享有,而是由万事万物共同享有。当这一大道顺畅运行,贤能之人能得到任用,人人能诚信和睦地交往。因此人不仅能亲善自己的亲人,爱护自己的孩子,也能亲善别人的亲人,爱护别人的孩子,使得老人能颐养终老,壮年人能堪其用,幼年人能顺利成长,鳏夫、寡妇、无父母、无儿女之人皆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顾,男子有着安稳的差事,女子能找到理想归宿。这段文字,是《礼记》作者对描述上古时代大同之世的描述,实际上,也很可能反映着他对于未来大同之世来临的理想盼望。大道,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普遍法则,也可以理解为世界向前发展的必然性。天下为公,不仅是一种理想追求,更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同之世这一理想终将实现的坚定信仰。我们知道,《礼记》属于《礼经》,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天下的根本依据,亦是后世君子行事所奉行的圭臬。天下为公的思想,一直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信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亦以其为民主革命成功的最终期盼。

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的理想愿景对于人类这一族群命运的终极关怀是共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深层思想表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开花结果的根本思想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相结合、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革命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系列伟大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拥有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时代在发展,这个“魂”始终没丢,这个“根”始终没变,变的是与时代相适应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形式。

(二) 德行日新的内在修养要求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主题教育是党性修养的重要环节,在对这次主题教育的学习中,我们明白到,党性修养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工作,也并非努力一时就能取得一劳永逸的效果。它是一件需要时刻保持学习状态、时刻在清醒认识自身和外界形势的前提下,不断作出努力和进步的工作。而且,要把所学和所思所用贯通,所知与所信所行统一,做到与党同思想、同步调、共进步。从党性修养的角度看,要做到这一要求,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德与行要合乎党的时代步伐与核心领导精神。这种德行日新的进取要求,其实也属于我们民族自身的重要优秀传统文化。

据《礼记》记载,中国的商朝建立者成汤在自己的盥洗盘上刻了这么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自己每天都要取得一点进步,而且无论是多小的进步,都要一直坚持下去。这是一种踔厉奋发的精神,伴随着的是终身不倦地为追求某事、某种目标而努力的行为。这种态度,和努力的方法,往往又被引申至德行的修

① 王新春,《“横渠四句”的生命自觉意识与易学“三才”之道》,《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42—43页。

养上。《周易·文言》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孟子所说的“心勿忘、勿助长”;王阳明所说的“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些往哲留下的文辞,都是在阐述通过不断地努力践行,精进自身的德与行,从而到达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正因为我们看到了古代有这样的优秀传统,所以对党的上述要求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四、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价值内涵的区别性

需要说明的是,探讨上述两者的联系,并非要找寻党性修养的古代对应物,而是为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理解党性修养所包含的价值理想与崇高精神,同时凸显出党性修养的文化特征和时代意义。因此,在充分理解两者的共同性之余,也应注意到两者的区别。首先,在古代被称君子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功名或官职。换言之,并非所有有德之人都可称君子。其次,君子的群体不是一个政治派别,一般不具备独立明确的政党属性,所以君子的操行表现往往依靠个人的道德感悟和践行能力,及其所处的大时代背景与阶层利益,而非有着明确的行动纲领和依据。可能会有反驳意见认为,君子以五经或伦常纲领为准则,怎能说没有明确的行动依据呢。一方面,经书的解释复杂而繁冗,往往没有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伦常纲领亦不能全面覆盖现代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复杂境遇,因此两者对于人的实际生活指导能力有限。所以君子即便结成政党,这一群体的道德观往往仍极易受到来自时代变化的冲击。最后,虽然君子以仁义礼智信五德为最高价值取向,但现实中则经常面临忠君、爱国、爱民三者难以协调的困境,因此,一个道德涵养水平卓越的君子在面临复杂的现实境遇时,实际上依然难以招架,未必能从根本上维护顾及国与民的核心利益。这一现象在我国近代史中比比皆是。

与传统的君子之道相比,党性修养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信仰与使命担当,又具有与时俱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时代先进性。从文化的角度看,党性修养植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吸收了君子之道中的核心价值理念,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为对党员自我革新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实际上,尽管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有所区别,但两者的核心价值内涵并非南辕北辙,而是高度契合的。

进行上述比较,不是为了批判传统文化的不合时宜,也不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对应物,而是通过这样的比较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作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看到,君子之道中的价值理想与实践智慧,并未因时代语境的不同而减损其价值,相反,其理想与智慧因应时代的变化亦转进新的含义。

五、从君子之道中汲取文化自信与智慧,开辟党性修养新境界

通过阐明党性修养与君子之道的共通性与区别性,我们理解了两者的深刻文化关联,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之间的深入联系。因此,以“第二个结合”为视角,在哲学语境下,可以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君子之道的哲学思想进行转化性解释,从而汲取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自信与智慧,开辟出党性修养的新境界,以下举出具有突出代表性的两例。

(一) 汲养君子之道中的“浩然之气”,筑牢坚韧党性与奋进精神

“浩然之气”一词,源出于《孟子·公孙丑上》,指的是正大光明的品格与行事气质,可进一步理解为具有仁义品格之人所具有的刚毅不屈精神气质与踔厉奋进的精神品格。这是一个极具中国哲学特色的语词,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视品德修养与气质养成的实践倾向。孟子认为,“浩然之气”可通过修习而得到不断的增强,最后可形成一种刚毅不屈、一往无前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是一种出于对仁义的信仰而形成的理想品格。党性修养可以此为借鉴,党员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往往能培养出一种坚毅品格与奋进精神,这一品格与精神,不仅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其实还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历史称颂和感召呼唤。笔者认为,“浩然之气”正是由坚定信仰激发而来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能够在一次次的面对困难与诱惑时发挥作用,使党员作出不违背初心信仰、责任使命的正确选择。

(二) 体会“君子不器”的实践智慧,培养适应时代的应变能力

“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原义应该是指君子不拘泥于某一种职位或者能力,能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境遇,作出适宜的应对与选择。这对于党性修养而言或许具有启发式的实践意义。我们知道,成为党员只是党员生活的正式开始,在此之后,还要经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挑战,每一名党员随着其自身能力、资历等增长,可能会走向不同的岗位、面临不同的挑战,工作职能的调整、社会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对党员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以“君子不器”为启发,党员可根据新的职能与社会身份的要求,结合自身所处的工作系统与社会环境,培养建立一些新的工作能力和认识视野,以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

对于中共党员而言,党员不仅是一种政治身份,而且还代表着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如何在具体的情境和不同场域里,作出符合党员身份职责与道德标准的行为,是每个党员需要长期思考的重要课题,这并不是一个有着标准答案的题目。“君子不器”,在时代发生巨变的当下,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这句古老格言提醒着我们,要对情况的变化时刻保持敏锐,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践履形式,以合理的应变维护党员的信念。

以上两个例子,只是极为有限地论述了如何从君子之道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以对党性修养起到相应的辅助和提升作用,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但即便样本再小,也管中窥豹式地展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智慧,这些智慧不仅能为中国历代哲人贤士所吸收采用,也同样能为现今的党员所学习领悟,从而化作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澎湃动力。

（三）结合传统智慧与“六个必须坚持”，开辟党性修养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①这一观点启示我们，应当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与世界视野下进行党性修养，同时应当把六个必须坚持作为党性修养的根本指导方法。笔者认为，对于党性修养而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最为核心的立场方法和价值导向。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并非一句空话，而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的伟大实践和承诺。习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②上引关于“党性”的论述，虽然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的属性而言，并非单指党员的党性，但是这实际上也规定并包含了党员自身的党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的总结^③，也是对我国民本思想的科学总结和客观实践。

虽然我国自古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价值理想呼召，但在实际的治理中，能切实回应这一价值呼召的历史朝代可能不多，实现的水平亦较为有限。尽管如此，这一价值理想仍然是历代君子甘愿为之奋斗追求的终极愿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在满目疮痍的旧时代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秉持了这一终极理想愿景，从民主革命走到了今天，以一系列的伟大实践成就和理论创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的政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现有的理论创新，提出了包括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在内的六个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原则。笔者认为，这六个必须坚持体现出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党性修养内涵。首先，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党性修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信仰准则，这一点前文已充分论述。其次，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的“信”，既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同时也应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而自信自立中的“立”，则不仅指中国所走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且还应该包括每个共产党员与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再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中的“正”的首要含义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其“新”的首要含义是指对新生事物与新理论的勇于实践。^④其实，守正创新也蕴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继承与理想开新。最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心怀天下，共同反映出了党性修养所必须具备的时代视野、科学认识方法与世界格局。目前，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霸权格局正面临崩溃，这不是世界人民所需要的全球化，霸权主义也不能带来世界和平，新时代的中国正提供着一个新的和平发展路径，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谋求真正独立的新方法，也是发达国家摆脱历史兴衰律的新途径。面对这些新时代带来的变化，这种新的时代视野、科学认识方法与世界格局，应当是新时代党性修养所要练就的眼光和本领，也应当把这种修炼出来的眼光和本领，自觉运用到生活中和对党的宣传工作中。

因此，六个必须坚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高度提炼，而且更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优秀传统文化之魂的现代开新。这种高度提炼和现代开新，对党性修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些更高标准和要求体现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更深入理解和实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更精准深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对党和国家、人民乃至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深沉的热爱。作为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一环，党性修养具有着“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重大战略意义。国家的心、民族的魂要凝结为一体，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根脉所提供的理论推动力，同时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魂脉所提供的文化凝聚力。根脉与魂脉的相互贯通，使得当代中国这艘巨轮，产生出一往无前的澎湃动力。党员作为巨轮上的一员，与人民同为巨轮乘客，彼此心连心、共命运。因此，党员亦能在对根脉与魂脉相贯通的理论学习与创新中，在向人民学习、依靠人民的实践过程中，汲取无尽的精神力量以及丰富日新的理论与实践智慧，从而开辟出党性修养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 [2] 习近平. 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N]. 人民日报, 2012-11-20(1).
- [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 [4] 中国共产党章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 列宁. 怎么办？[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6] 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 [7] 陈云. 陈云文选（1956-1985）[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0]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1] 礼记[M]. 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①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②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4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5页。

- [12] 孙中山. 三民主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3] 王阳明. 传习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4] 孟子. 孟子[M]. 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15] 论语[M]. 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16] 周易[M]. 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17] 尚书[M]. 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18] 金冲及.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9] 楼宇烈. 中国文化精神[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0] 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21] 张岱年, 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2] 杨国荣. 儒家哲学与现代性[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3] 朱汉民. 儒家文化与现代性[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5-15.
[24] 韩震.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思考[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5): 5-16.
[25] 陈卫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2): 4-22.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Value Orientations between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and the Way of the Gentlema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Liao yiming¹, Wang linlin²

¹Party School of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angxi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Nanning, Guangxi, 530021, China

²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53002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e value connotations of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and the Way of the Gentleman exhibit a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and interconnectedness. This compatibility and interconnectedness indicate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y comparing their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can be gained of the elements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mbedded within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Such an approach also allows for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se cultural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enables an examination of how the ultimate value ideals of the Way of the Gentleman are deeply continued and widely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These insights hold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as well as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the Way of the Gentleman;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value connotations

文化治理视角下城市市集空间重构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苏州双塔市集为例

张梦月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零售业态的出现,网上购物和连锁超市带给人们极大的便利,逛菜场似乎和年轻人渐行渐远。而本文研究的双塔市集原本是苏州古城区一个濒临拆迁的老旧菜市场,通过前期政府支持与投入、相关行业的设计改造与社区居民参与协助,现在其不仅发挥农贸交易的功能,更成为集艺术展演、文化体验、生活社交、休闲娱乐的特色市集,在古城社区实现空间重构与场景营建。本文将从文化治理视角下,探究双塔市集设计改造对城市更新与社区营造的作用机制,为未来历史城区社区空间的治理与市集空间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研究方向。

关键词:文化治理;双塔市集;空间重构;城市更新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3

苏州市在 2021 年作为全国第一批城市更新的试点工作城市为古城区双塔市集的改造提供政策导向和支持。双塔菜场位于苏州姑苏区古城中心,社区密集度较高,古城历史文化悠久,人文底蕴深厚,是苏州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本文从文化治理视角出发,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公众基本物质需求的前提下,为公众提供文化共享与文化服务,在城乡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立足于城市公共空间发展,通过对双塔市集的重新定位,以策展的理念对双塔市集进行设计与改造,将菜市场空间变成开放式文化聚集地和生活艺术策展地,将人们在日常接触的食材、遇见的人与事作为“展品”,在满足市民物质生活需求之外,可以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展现出城市背后的市井文化和人文情怀,进一步焕发古城发展活力。

一、文化治理视角下双塔市集空间重构的背景

(一) 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需求

双塔市集位于苏州古城区核心地带,毗邻千年历史的罗汉院双塔及定慧寺巷历史文化街区。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传统市集设施老化、功能单一,与周边历史文化氛围脱节,亟需通过空间改造和重构平衡市井生活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对历史文物周边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进行修缮与治理,同时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人民生活改善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双向奔赴。

(二) 城市更新与空间再生的推动

近五年来政策导向上也开始对城市更新更加关注,政策升级的背后意味着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城市建设注重把握资源利用与生态治理、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文化挖掘与创新转化、民生需求与价值导向等多个维度。我国城镇化进程已从过去的“粗放式发展”进入“精细化运营”时代,未来城市建设将不再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城镇化方向也将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变。苏州作为试点城市,率先开启了城市更新行动。

作者简介:张梦月(2000—),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化管理。

通讯作者:张梦月

（三）文化治理与社区参与的综合考量

古城区菜市场经历了从农民自产自销，农副产品种类单一，供购买者选择的较小的马路市场或大棚市场到政府实施了统一管理，逐渐形成了标准化的菜场，再到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商场的普及，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代的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三个时期。虽然老旧的菜市场承载了一代人对于烟火气的回忆，但是存在的问题突出，发挥功能单一。为了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和满足精神娱乐需求，并进一步推动社区文化治理，将市集改建为集农副产品交易区、百姓饭桌、生活长廊、文化休闲驿站和百姓小茶馆于一体的苏州特色市集，从功能及审美两方面进行提升，助推传统菜场更新迭代。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文化治理

关于文化治理理论，最初受到福柯提出的“治理术”思想的影响，认为治理的对象是“人”，即引导社会公众的行为方式，实现有效地国家公共管理^[1]。在我国有两种研究导向，一是以文化为治理对象，二是依靠文化进行治理，需要考虑到治理主体（政府、居民、企业）、治理对象（居住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手段（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社会-国家的治理。吴理财（2014）^[2]认为文化治理拥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面孔，在不同的侧重情境下认识文化治理并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从而实现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的治理目的。总之，对于文化治理学术界多围绕乡村文化振兴^[3]、城乡规划^[4]、公共文化服务^[5]等方面展开研究。双塔市集的文化规划与改造实践是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等相关利益者对文化政策反思与创新的结果，是文化治理模式在我国现代化转型应用的表现。

（二）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主要对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功能业态进行改善与提高，城市的更新正是反映在社会群体和个体的生活体系当中。关于城市更新的研究，目前学术界集中在城市文化建设^[6]、城市发展演变^[7]、城市发展转型^[8]等方面。本文研究的着重点是以文化导向的城市社区空间更新。一方面，城市更新使社区居民更加关注共同生活的社会公共空间，积极挖掘空间内的文化底蕴和资源，传承地域文化习俗，推动政府及市民对于市集空间的设计与改造。另一方面，从菜市场饮食等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方面出发进行转型，不仅使更多文化艺术被大众认可与接受，也为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价值盈利空间。双塔市集的成功转型在于功能混合、业态多元，以组合呈现特有的生活方式为宗旨。

三、文化治理视角下双塔市集空间重构的发展现状

（一）改造设计：从传统菜场到文化复合体

双塔市集从上世纪90年代开业，是一个主营生鲜、蔬菜、杂货充满人间烟火的古城老市场。经过此次专业团队的策展与改造，在市集内部空间布局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菜市场入口从三个增加到了七个，部分围墙得以拆除，通过专业的设计方式对室内进行合理规划，划分出室内展览区与摊位区。展览区采用将艺术表达还给生活、还给生活空间的“生活策展”思路打造商业品牌，融合了古典意象、文化符号、新潮元素等，在菜市场内小食区旁边有一个固定的舞台定期上演小剧场，通过舞台设置为来往居民和游客不定期上演特色节目。在摊位区增加了洗手池等公共卫生设施切实改善菜场环境。在集市外打通内外空间后更加注重周边居民的休憩娱乐和游客的停车出行，通过推出夜游项目、鼓励地摊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休闲娱乐场所。同时通过合理设置与规划非机动车停车位，在增加便民服务的同时鼓励人们绿色出行。此外，在双塔市集入口处有全国第一家建在社区的可移动智能零售书店，会定期推出新的书展，如开业展览“可以吃的书”展览。生活市集中有关手工作品、画作展示的地方，也有文创展览的摊位，甚至还有乐队表演，实现了从“功能市场”到“综合市集”的转变，完成了从

“功能场所”到“体验场所”的转变。

（二）符号嵌入：地方记忆的再生产

双塔集市在重构过程中注重对苏州文化符号的提取和运用，将苏州传统古典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发展。在室内装饰上使用苏州传统木板年画中桃花坞形象与色彩，积淀苏州古典文化韵味。同时在设计中也提取了苏州历史悠久的花码——这是苏州古代盛行的民间商业数字，脱胎于我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选取在菜市场内部的平面设计则可以清晰地展现苏州商业文化发展脉络。在市集外保留日常生活服务类的小商店，为社区居民提供缝纫、修补、零售等基本生活用品供应与服务。市集也恢复苏州特色手工和美食老字号，通过传统精细的技艺制作出来的工艺品和美食，契合与满足了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此外，在策展过程中将市集内部和外部沿河区域进行优化，吸引手工艺人、原创设计师、表演艺人、小众收藏家等来到这里，或成为摊主，或成为游客，带给市集人民多样化的观感与体验，使双塔市集新业态新产业在此聚集与发展。

（三）社区参与：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

双塔市集内在重构过程中主要利用菜市场内部的空间进行展览，菜市场内部设置了三个艺术装置和摄影展，以大众普遍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彰显出展览艺术走入人民社区生活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市集策展以“家的方向”作为设计理念，进入双塔市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摊位周边的立牌，这是对集市内摊位经营者进行的艺术形象插画设计，并把暖心的文字话语放在人们能够看见的地方。通过这种独特设计可以进一步拉近商贩与周边社区消费者的距离，既创收了市集的经济价值，又能满足居民的情感价值，促进邻里关系更加和谐。同时在展览区会放置一些具有年代感的老式菜篮子、自行车等，与菜场整体环境相契合。在室内设计中也更加注重灯光照明、提示语等细节，使人们进入菜市场内明细产品分区，向居民真实展示菜市场生鲜果蔬的原貌与新鲜度，激发民众的消费欲。不仅增进了社区居民与服务人员的交流与互动，同时也为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区生态空间作出贡献，双塔市集成为社区居民生活的互动场所和情感纽带。

四、文化治理视角下双塔市集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

（一）社区协同共治

双塔市集通过“政府规划引导、社会资本运营与居民参与自治”的治理模式，以策展思维介入城市空间更新立面，社区成员自上而下共同参与双塔市集的改造与监督过程中，市集空间在重构的过程中不仅满足社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购物和交易的需求和功能，而且以舒适的交互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为社区居民和外来游客提供休闲娱乐性的公共空间和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效能。在社区协同共治的过程中，以家的方向进行的策展设计与空间重构展现出在追求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同时保留更多具有人文情怀的生活理念，不仅能够借助双塔市集打造氛围力社群空间，探索更多关于苏州古城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方案，而且实现市集与时代共生共长，为社区发展带来长久的发展效益。

（二）空间更新叙事

通过政策协同、空间设计、技术加持、文化挖掘、创意展览、体验互动六大方面实现市集空间叙事，空间重构的前提得益于城市更新的时代要求与政府文化治理的政策驱动。此外，在空间设计上，更加关注细节，比如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市集标识和标语当中，围绕市集创作的形象插画、日历、明信片、围裙等让居民和游客更加深入了解到关于整个市集的前世今生，营造富有烟火气与生活气的空间。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关注到市集摊位垃圾、污水等环境治理，引入地方短供应链以品质保证让人们吃上干净健康的食物，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同时促进整个市集零售产业链的发展。此外，在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市集不再局限于传统静态的空间展示，通过创意展览的引入、小型舞台的搭建增进人与食物、居民与经营者、居民与游客的体验互动，助力城市更新、文化传承，提升

文化发展活力与治理效能。

（三）经济文化共生

双塔市集通过策展形式被进行空间重构，在保留基本生活消费功能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升级改造零售模式与产业生态，实现市集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通过举办常态化社区活动，关注到不同年龄段社区居民加入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当中，引入知名文化品牌与非遗展示，开展系列创意文化活动，不仅带动当地文化旅游的融合与，不仅吸引外来游客的为市集文化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更实现市集客流量的增长与知名度的提升，为当地文化经济创造更大的收益。市集空间将文化艺术实践在空间范围内落实为社会实践，真正实现社区公共空间的经济文化共生。

五、文化治理视角下未来市集空间发展的实践路径

当然，在对苏州古城双塔市集的空间重构中也存在过于突出市集的艺术性、摊位设置不合理、节假日客流量超出可容纳空间、网红直播打卡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消费等隐存问题。基于双塔市集策展的启示，从文化治理角度可以探究未来市集持续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一）空间微改造，保留在地性文化基因

在市集改造中要注意充分融合当地生活习俗，打造拥有记忆点的空间，保留市民能切身感受的烟火气。注重对市集整体环境、卫生质量的保证，保留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市集采购中具有年代感的老物件，通过主题策展在市集中进行陈列展出，进一步提升居民和游客的感知作用力。在微改造的策展设计下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加深居民地域归属感，让更多人体味到往日纯粹的烟火气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归菜市场。

（二）创新功能形态，构建多元共治的空间场景

传统菜市场突出的是“以物易物”的单一商品买卖功能，摊位设计传统简单，吸引力较少。在保证市集继续发挥生活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利用现代技术监测市集人流量和消费热点，通过引入非遗、手工、话剧、表演等多种业态实现场景互动，打造室内室外多功能复合空间，吸引不同年龄群体的居民和游客聚集市集，在空间上打破年龄壁垒，实现代际互动，从而让城市社群更加充满活力。

（三）深化文化内涵，激活艺术实践的社会价值

艺术来源于艺术家对生活实践的思考与观察，也应当积极寻求一种创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通过动态展出式融入实践，将更多本地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的行为之中，一方面可以引起他者的思考与共鸣，让艺术文化更加生活化、大众化、普及化，渗入居民和游客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当中，能够提升社区市集和文化艺术的价值持续力。另一方面，城市文化治理应与城市化发展进程相适应，从微观层面关注提升社群文化，可以在社区规划当中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充足的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服务设施，延续城市文化基因。

（四）增值体验空间，挖掘商业美学的文化潜力

将文化艺术的策展形式运用于商业空间，激活市集商业空间美学，为居民和游客打造体验空间，能够进一步提升市集的多功能复合价值。比如苏州本色东西桥市集，通过结合楼阁、古桥意象，设置茶道、香道，与美术馆、艺术机构联动，实现东方美学的创新表达，结合现代技术上演非遗技艺展示，不仅让传承人创造展示空间从中获益，而且带动市集周边民宿、餐饮等业态发展。

六、结语

现代文化业态与文化空间的治理与服务,需要融入现代文化实践方式与创新管理手段,并且实现从国家权利引导到多方主体参与文化治理。作为个案研究的双塔市集在经历策展形式的空间重构为苏州古城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提供实践方案。今后在市集空间重构中,也需要注意对展出的内容和服务进行动态检测与评估,而不是停留在空洞的内容展示与形式上的氛围营造,不仅需要满足居民与游客的物质需求,同时也需要满足其精神享受。市集的发展与产品的零售最终也需要考虑持续的运营与成效,在获取短期流量的基础上构建深层的情感链接,推动城市文化、旅游与商业的一体化协同发展,塑造城市文化新地标。

参考文献:

- [1] (法) 福柯著; 钱翰, 陈晓径译. 安全、领土与人口 1977-1978[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09.
- [2] 吴理财. 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3(01): 58-68.
- [3] 顾海燕. 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治理视角[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01): 52-57.
- [4] 黄瓴, 李昊昱.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城乡规划研究述评: 理论源流、主要论域与展望[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4, 39(06): 1-9.
- [5] 毛太田, 陈忠达, 洪芳林. 公共文化共同体赋能基层文化治理的组态路径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25, (05): 38-52.
- [6] 张玉栋, 余日季.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框架下近现代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武汉市为例[J].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2(04): 64-74.
- [7] 马晨曦, 阳建强, 李震. 1995—2024 年城市更新研究回顾与发展——基于知识图谱分析[J/OL].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1-11[2025-11-26].
- [8] 刘修岩, 张蕊, 倪克金. 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 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路径研究[J]. 浙江学刊, 2025, (06): 182-191+236.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Market Sp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Shuangta Market in Suzhou

Zhang Mengyu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China)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retail formats, online shopping and chain supermarkets have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to people, making visits to traditional markets seem increasingly distant from young people. The Double Tower Market, which was originally an old and dilapidated market in the ancient urban area of Suzhou on the verge of demolition, has now not only retained its function as a place for agricultural and trade transactions but also transformed into a distinctive market integrating art performances, cultural experience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Through the early support and investment by the government, the design and renovation by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he participation and assistanc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t has achieve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scene construction in the ancient urban community.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design and renovation of the Double Tower Market in promoting urban renewal and community buil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providing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spaces in historical urban area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ket spac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Double Tower Market; Spatial Reconstruction; Urban Renewal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里海 ——伏尔加河流域渔业工人卫生医疗体系的探讨

龚嘉乐¹

(1.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 江苏 215011)

摘 要: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期, 尽管俄国存在官方批准的卫生规章, 但渔业工人实际上无法获得专业医疗服务, 相关职责被转嫁给私人渔业资本家。卫生监管失效源于医疗人员配置不足、卫生辖区幅员辽阔而交通设施匮乏导致卫生医师巡查困难、渔猎业管理局与地方行政机关及渔业资本家间的官僚协调障碍等因素。同时, 阿斯特拉罕省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气候条件, 叠加卫生医疗体系的缺陷, 致使各类流行病大规模蔓延。由于缺乏国家免费医疗保障体系与专业医务人员, 传染病防控机制形同虚设, 最终造成渔业工人死亡率居高不下。因此, 渔业工人卫生医疗体系的建立符合俄国当时的社会需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这一时期里海-伏尔加河流域渔业工人卫生医疗保健体系的形成。

关键词: 俄罗斯帝国; 里海; 医疗服务; 卫生设施; 渔业工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4

随着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 尤其是实践经验的来临, 取代了中世纪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的保守思想, 取代了 18 世纪的因循守旧和死板的公式, 为俄国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俄罗斯帝国地域辽阔, 各个地区卫生系统的建立进程不同, 导致医疗机构的分布不均。医疗服务水平取决于人口、地理位置、气候特征以及居民的物质福祉水平。但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特定的群体, 他们的医疗保障在立法文件中总是没有能够得到充分考虑。这些群体之一便是俄国的渔业工人, 对于他们而言, 国家层面的医疗保障系统和卫生医生监管的建立, 要比省级和县级居民的医疗服务安排要晚一些。本文主要探讨的是 19 世纪种后期至 20 世纪初, 在俄罗斯帝国最大渔业区——里海-伏尔加渔业工人医疗保障体系的形成历史。

一、里海-伏尔加渔业的区域与特点

20 世纪初, 里海-伏尔加渔业主要集中于阿斯特拉罕省和萨拉托夫省两省和乌拉尔、特兰克和扎卡斯比三个地区, 总面积约为 2276 千平方公里。根据 1911-1912 年的数据显示, 该区域拥有 416 个渔业, 其中有 183 个河流渔业和 233 个海洋渔业, 以及众多渔民营地(渔民的临时居住地)、渔场(使用网具捕鱼的河段, 并有渔民的临时停靠地), 总人口达到 6.5 万左右。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伏尔加河河口的渔业区, 这里是俄国最大渔业生产基地。

渔业区的人口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常年工人, 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渔业区, 渔业是他们的主要职业。另一类是临时工人, 他们按照合同在特定时间内工作, 且此类工人的人口数量占据渔业人口的大多数。临时工人的数量会根据季节变化而波动, 通常在 3 月 1 日到 5 月 15 日和 8 月 15 日到 11 月 1 日, 也就是春秋两季的捕鱼季节期间达到最大值。

在这一时期, 临时工人的季节性流动是当地传染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工人们在阿斯特拉罕省及相邻省份与地区间的周期性迁徙, 使得该区域的流行病毒得以扩散至俄国南部及伏尔加河流域全境。而阿斯特拉罕边疆区特殊的地理区位与气候条件本就易于疫病滋生, 再加上这一地区作为来自东方、中亚、波斯等地的商队的交汇地, 是欧亚贸易的枢纽, 更增加了疾病输入的风险。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 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刺激了劳务移民潮。来自中央工业区及乌拉尔地区的务工者大规模涌入里海渔业产区, 这种跨地域的人口流动网络最终将

作者简介: 龚嘉乐(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俄国历史与文化。

传染病传播范围扩展至整个俄罗斯欧洲部分。

而该省特殊的人口构成也是疫病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阿斯特拉罕省的人口比例中,卡尔梅克草原游牧族群与布克依斡耳朵人口占显著比重。这些群体深度参与里海渔业生产体系,他们自身游牧特性构成了防疫薄弱环节,移动式毡帐聚落的居住形态、季节性转场的生产模式以及传统医疗体系的局限,使得天花与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在该群体中长期呈地方性流行态势。

二、里海-伏尔加渔业工人卫生医疗保障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里海-伏尔加渔业工人医疗体系的规范性法律基础开始构建。该阶段的核心制度举措体现为双重进程:制定并核准医疗救助组织规范标准与卫生要求;推行渔场工人居住条件优化方案,其法律效力通过1887年《渔区卫生管理条例》及1892年《工人医疗救助章程》得以确立。

里海沿岸渔区医疗制度的开始,表现为地方行政当局向国家资产部提请后颁布的个别性地方规章。1844年外高加索总督呈请“经枢密院决议,在庫拉河河口的萨利扬渔场设立常驻医师职位,其薪资标准比照县级医师,由渔场收入专项拨付,具体包括600卢布的年薪和180卢布的住房津贴”。当国家渔场实施租赁经营后,国营渔场医院运营、医护人员薪酬等支出通常转嫁至承租人。1851-1855年间,萨利扬与克孜勒-阿加奇渔场的医院及药房管理权移交予渔场承租人——荣誉市民米里马诺夫与阿尔沙库尼,由其承担全额的医疗设施运营费用,而国库原定每年拨付的3,720卢布卫生经费则“从应缴租赁款中核减”。

1865年5月25日,里海渔业捕捞业章程获得批准。该章程规定了捕捞和渔业加工企业的工作规则以及罚款制度。渔业的管理职责由阿斯特拉罕的管理机构承担,管理机构包括理事会、委员会和渔业警察。然而,这份文件中并未涉及工人医疗保障或确保渔业中卫生规范的措施。

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一些地方性的社会倡议提出在渔业区建立完整的医疗部门的必要性。1881年11月14日,阿斯特拉罕医师协会在会议上讨论了在阿斯特拉罕省和红星区的渔业区设立医院的提议。提议中设想将建立两种类型的医院——常设医院和流动医院,并完全交由在医院工作医生的管理。该提案已提交给省政府办公室审议,但仅停留在项目阶段。

到1880年代,国家上层逐渐意识到应当关注渔业区的医疗状况,以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尤其是传染病的威胁。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开始制定措施,旨在建立渔业医疗部门。在为通过新的《里海-伏尔加渔业捕捞业章程》做准备时,提出了在章程中增设一个专门的部分,专门讨论医疗卫生问题。该项目由农业与乡村工业部特别成立的委员会负责制定。准备好的方案被送往阿斯特拉罕,提交给里海渔业委员会,以供审阅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和补充。1887年,内务部卫生部门派遣斯塔布罗夫斯基医生前往阿斯特拉罕,研究阿斯特拉罕渔业区的卫生状况;1889年,为了同样的目的,卫生监察员M.I.阿鲁斯塔莫夫也被派遣到阿斯特拉罕。

医疗条款草案中医生存在的职责重叠问题引起了阿斯特拉罕医师协会多次讨论,因为同一位医生既要负责病人的门诊治疗,又要负责医院的管理,还要监督渔业区的卫生状况,这显然不合理。根据农业与乡村工业部的提案,所有渔业区计划划分为三个医疗区,但阿斯特拉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将医疗区的数量增加到五个。然而,考虑到渔业区位于从卡梅申市到伏尔加三角洲的广阔区域,涵盖了多个支流和分支,以及里海,在一个医疗区配备至少一名医生的前提下,不论是三位医生还是五位医生都无法在捕捞季节期间巡视所有渔业区。尽管如此,这一决定还是相较于之前的情况有了进步。讨论结果中,医疗界对最为密集的渔业区进行了分析,计算了每个渔业区的病人数量与总人口的比例等。最终,确定了五个卫生区的地理范围,每个区配备一名医生,由高级卫生医生负责管理。医疗责任分配层面,当局决定援引现行工厂立法基础,由工厂主承担其工人的医疗服务责任。

经过长期协商,1902年6月3日《里海-伏尔加渔业捕捞业章程》终获核准。在地方上,渔业管理由渔业捕捞委员会、渔业管理局监督负责。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监督渔业的医疗卫生工作。在讨论卫生状况和医疗保障问题时,委员会可以临时邀请渔业的高级卫生医生、阿斯特拉罕省的省级卫生监察员以及阿斯特拉罕哥萨克军队的首席军医作为临时成员。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制定、讨论和发布关于保护渔业工人生命健康以及保护渔产品消费者的特别规定。根据地区的不同,决议草案需与省长、地区领导或阿斯特拉罕哥萨克军队的指挥官进行协调,然后提交给农业和国有财产部部长批准。渔业和捕捞管理局在维护渔业区卫生和健康方面的职责包括任命卫生区医生,并采取措施预防渔民在工作期间发生水上死亡事故。渔业捕捞委员会及管理局负责渔业区医疗卫生工作的任务,包括对渔业区的卫生状况进行监督,确保鱼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符合卫生标准。总体监督由高级卫生医生负责,该职务由农业和国有财产部部长根据与内务部长协商任命。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省的省级卫生监察员、特兰克地区的区域医生、乌拉尔地区的区域卫生监察员、扎卡斯比地区的军事医学监察员以及阿斯特拉罕哥萨克军队的首席军医负责对所属地区的渔业区进行卫生检查,并在发现问题时向高级卫生医生报告。

根据相应规定,各渔区被划归为若干卫生监察区,由区域卫生医师负责管辖。区域卫生医生由渔业捕捞管理局根据与高级卫生医生以及相关省级、区域性和军事卫生监察员及医生的协商任命。区域卫生医生的职责包括检查工人住所、渔业区的面包房和厨房、浴室、食品储备;检查工人的食品质量、鱼类产品及其生产和存储地点的卫生状况;审查为工人提供医疗服务的组织情况,检查医院和诊所是否符合卫生规定,确保药品和消毒用品的充足供应,检查医院设备等。在每个设有医院的渔业区,必须配备传染病科,可以是独立的房间或建筑,其床位

数应不少于渔业医院床位数的一半。所有渔业区的医院必须由医生领导,并且至少配备一名卫生员。渔业区工人急救医疗服务由渔业业主承担,当发生意外事故时,渔业经营者还负责提供门诊和住院治疗。如果渔业区没有医院,则需要设立诊所,诊所应由两个房间组成:一个用于病人检查并配有床位,另一个用于存放药品、敷料和消毒用品。诊所内需有一名常驻卫生员。渔业区卫生员的职责包括每日巡视工人住所,必需探访因病未能上班的人员,提供急救服务,照料床上病人,进行天花疫苗接种,监督医院、诊所、厨房、厕所等场所的卫生,进行病患住所和衣物的消毒,按照医疗卫生监督部门的要求,做好医疗记录和统计工作。渔业医生不仅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医疗服务,还负责监督渔业区的卫生状况,向卫生员下达病人治疗指示,并在每个捕鱼季节结束时向渔业管理局提交工作报告。

1904年,里海-伏尔加流域渔业猎捕业卫生设施建设专项法令正式颁布。最初,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位于阿斯特拉罕省的渔业区,但在1905年经过与军事部长和内务部长的协商后,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萨拉托夫省、特列克省、扎卡斯比省和乌拉尔地区。这些规定在许多方面重复或具体化了1902年《里海-伏尔加渔业捕捞业章程》中专门关于渔业医疗卫生部分的条款,涉及住房和附属设施的要求,以及渔业区工人日常生活组织等问题。根据规定,要求对所有渔业工人进行年度和临时登记。渔场的业主、管理者或监督员必须准备一本关于渔业人口流动的记录簿,用于记录每天渔业区工人及其家庭的总数,以及生病和未能上班的人员数量。在这本记录簿中,负责医疗服务的医生还需要标明每次访问的日期以及有关病人的信息。渔业经营者必须在每年的3月1日和8月1日,即春季和秋季捕鱼季节开始前向卫生医疗监督部门报备他们的医生和卫生员,并提供医生的身份证明文件。那些因工人数量少而没有医院和医生的渔场,业主则需要提供与其他渔场签订合同的公正副本,与医生、卫生员共享医疗服务的信息。

由于渔业区人口密度极高,特别是渔汛期间,加之恶劣的生活环境及水体作业、鱼类加工与熏制车间等危害健康的劳动条件,渔业医生与卫生员需重点监测工人及其家属罹患烈性传染病的情况,如天花、麻疹、猩红热、白喉、伤寒、霍乱及鼠疫。发现上述病例后,医疗人员须立即填写专用疫情报告卡呈交渔区高级卫生医生。若出现霍乱或鼠疫疑似症状,除常规上报外,渔业医生或卫生员还须通过电报或渔场主出资派遣专使,紧急联络阿斯特拉罕省医疗监察局。

规定中还首次提到了对于渔业工人生活的基本保证。渔场工人若因患病而丧失劳动能力且需住院治疗,无论病程长短,只要是在整个受雇合同有效期内,均有权在渔场医院接受救治。禁止在感染性疾病未治愈之前将病人送到渔业区。在渔业医生或卫生员确认病情属实的情况下,渔业经营者不得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因病未能工作的天数。但对于慢性病的治疗,工人不能在渔业医院接受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渔场主有责任及时将工人转送到其他医院接受治疗。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初,里海——伏尔加渔业区的渔业工人医疗保障和卫生监督系统已经在法律上得到了完善。然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任存在诸多困难。

三、里海-伏尔加渔业捕捞业的卫生医疗状况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保障人们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是俄国各地所面临的一大问题。直到1913年,最好的指标是“每万人配备一个医疗区”,而在一些偏远的省份,一个医疗区的服务人口超过了5万人,这显然没能达到俄国的预期。

而渔业区的情况要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医疗服务被交由私人承包,这点在1902年法规中再次得到确认。国家医疗机构并未为渔业区提供服务,所需的医疗人员由渔业经营者自行聘请。因此,渔业工人通常只能得到卫生员所提供医疗服务,少数情况下才能获得医生提供的服务。1902年,在阿斯特拉罕管理局负责的渔业区,仅有一名常驻医生,另外两名医生则在捕鱼季节期间被聘请来提供短期服务。但随着1902年《里海-伏尔加渔业捕捞业章程》的实施,卫生区医疗人员的配置情况稍有好转。阿斯特拉罕管理局辖下从卡梅申市至里海克拉斯诺沃茨克市的整个渔业区被划分为5个卫生区。每个卫生区都聘请了一名专门的医生,其中三名医生常驻阿斯特拉罕市,一名常驻克拉斯诺夫,另一名常驻察里津市。而整体卫生事务的管理则由常驻阿斯特拉罕的高级卫生医生负责。高级卫生医生组织传染病防控措施、签发渔业作业卫生许可、在渔猎业管理局提供医疗咨询,并主持管理局医疗卫生局的统计工作——包括居民发病率与死亡率统计、渔区人口流动统计等专项数据采集分析。

卫生监管至关重要对于疫情频发的阿斯特拉罕省而言十分重要,卫生医生则是监管的主要负责人,其工作通常是在春季和秋季捕鱼季节进行的,在履职时须遵循1902年的规定、1904年渔业区建设的规定以及卫生医生的工作指南。卫生医生在渔业区巡查需依赖管理局提供的蒸汽船只,这导致出诊次数与时长受到严格限制。由于交通工具不足,管理局经常将多项监督工作合并,如蒸汽船被交给渔业监管委员会使用,而医生则必须根据渔业监察员的工作调整自己的巡视计划。根据卫生医生和高级医生的官方报告,医生年均仅能巡查辖区内约半数渔场、十分之一的捕捞点及四分之一渔工营地,且这种情况年复一年持续存在。此外,卫生区医生的编制总是存在空缺。在1914年的医疗卫生报告中,高级卫生医生提到,由于“没有人愿意接受”,其中一个卫生区的医生职位在一年内一直空缺。同时,卫生医生在渔场工作中感染致死的情况时有发生。1905年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阿尔加林渔场工人中爆发鼠疫疫情;1914年阿斯特拉罕县别祖比科夫渔场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阿加巴博夫渔场相继

出现伤寒与斑疹伤寒疫情。1909年5月,第四卫生区医师Ф.И.马尔捷米亚诺夫因斑疹伤寒去世;其继任者С.П.西特金于1914年春在斑疹伤寒基础上并发急性败血症身亡。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卫生医生的实际人数与预期完全不匹配,对渔区并未能起到实际的监管作用。

渔业区在组织抗击疫情蔓延的措施时,仍存在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尽管成立了由皇帝批准的委员会负责预防疫情的爆发和传播,但资金来源于进行防疫工作的地区。城市的防疫措施由城市预算资助,水路运输的防疫由交通部资助,而省级地区的防疫则由地方政府资助等。渔业区的防疫措施由卫生医生和渔业经营者负责,渔业经营者支付医生和卫生员的薪水,用于为工人提供医疗服务,且这些措施由阿斯特拉罕里海-伏尔加渔业捕捞管理局进行监督。值得注意的是,该防疫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展现出有效性,1907年霍乱疫情防控即为典型案例。7月3日接获萨马拉市出现霍乱疫情通报后,所有区域卫生医生立即进入防疫预警状态。7月下旬,管理局向渔业主书面下达《渔场防疫措施清单》,要求提前落实预防性举措及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卫生医生巡查频次显著增加,管理局增派驳船与蒸汽船保障定期巡检、疫情监测与快速响应能力。巡查期间,卫生医生向各渔场分发有关霍乱的宣传册,并解释了渔业区卫生改善的规定,介绍了隔离、消毒和治疗霍乱病人的方法。此外,管理局还为所有的船只和渔业监督员的驻地配备了药品和消毒用品。

1907年夏季,阿斯特拉罕出现了霍乱病例,累计203人感染,其中108人死亡,死亡率超50%。尽管死亡率极高,但由于防控措施及时,疫情未发展为大规模流行。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霍乱传入渔场时间较晚,二是前期准备充分且药品与消毒物资储备充足。截至1913年,233处海上渔场中仅有10处配备可收治普通病患与传染病人的正规医院,53处设有临时诊疗室。河岸渔场情况稍好,阿斯特拉罕省66处河岸渔场中有45处设医院,15处设诊疗室。但就医疗资源配比而言,海上渔场约每80人共享1张床位,河岸渔场每51人共享1张床位,这在疫情频发背景下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1913年,阿斯特拉罕省所有渔业区及其众多的渔民营地和渔场由15名医生和97名卫生员提供医疗服务,其中56名卫生员常驻渔业区的医院和接诊室。15名医生中仅1人常驻渔场,2人仅在春秋渔汛期到岗,另有1人虽常驻阿斯特拉罕市但仍需每日接诊门诊患者并监护住院病患。其余医生每人需负责管理12处甚至更多渔场,且这些渔场往往彼此相距甚远。由此导致非驻场医生与卫生员在渔汛期每周最多巡查1次,非渔汛期则更为罕见。工人数量小于一百人的小型渔场医疗资源尤其匮乏,正如记录所述:"这类渔场每年能见到卫生员一次已属难得,更遑论医生诊疗"。渔场卫生员队伍大多数由退役的连队军人组成,其中几乎没有军事卫生学校的毕业生,他们的医学知识主要来自医院的实践经验。尽管渔场建立了病患登记与医疗统计制度,然而,由于大量统计材料是由卫生员提供的,这些资料无法客观反映渔业区真实的疾病流行情况。基层误诊频发与缺乏科学可信数据常引发灾难性后果:鼠疫、霍乱等疫情通报严重滞后,往往在大量人口感染、疫情扩散至邻近渔场及居民点后,最佳应急处置时机已然丧失。

实际上,要求小型渔业区的业主联合建立医院并聘请医生的措施并未得到有效实施。阻碍因素包括节省开支、渔业经营者缺乏个人主动性、相邻渔业区业主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渔业区之间的距离。医疗保障的组织由卫生监督负责,但实际上,卫生检查员到渔业区巡视的次数相当少,这也未能激发业主承担额外的医疗设施建设费用。自该决定实施以来的10年内,仅有两次渔业区联合建立医院的情况,而且都发生在靠近省会的渔业区。这两个案例分别是:位于博尔德河附近的郊区渔业区,由11名渔业经营者联合投资建立医院;以及在前哨的13个渔业区联合建立医院,并且医院内有常驻医生。前哨的渔业区是渔产品的主要仓储和中转站,接收来自整个里海和部分河流渔业的渔获。该地区有大量临时工人,其中包括来自阿斯特拉罕的工人,因此常驻医生的存在不仅关系到特定渔业区的福祉,也关系到省会的健康状况。

要求小型渔业区的业主联合设立医院并聘请医生的政策在实践中收效甚微,主要受制于资金短缺、渔业主缺乏主动性、邻近渔场主复杂的关系以及渔场分布零散等因素。尽管卫生监管部门名义上负责监管医疗组织工作,但其实际巡查频次极低,难以激励渔业主增加医疗投入。该政策推行十年间,仅有两例成功案例且均位于省会近郊:一是博尔达河沿岸11个渔场主合资建立的郊区医院;二是福尔波斯托地区13个渔场组成的联合体,其医院配备常驻医师。福尔波斯托渔场作为里海全域及部分河岸渔场的核心仓储与转运枢纽,雇佣大量临时工,包括来自阿斯特拉罕的流动劳工,因此常驻医生不仅关乎渔场运营,更直接影响省会公共卫生安全。

因此,即使在颁布了医疗卫生规定之后,名义上虽然有了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但在部分渔业区,无论是河流渔业区还是海洋渔业区,特别是那些人口稀少、远离卫生监督和居民点的渔业区,以及众多的渔业营地,医疗服务要么几乎不存在,要么由卫生员负责。

参考文献:

- [1] Мышкин М.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помощи рабочим на рыбных промыслах Волго Каспийского района // Извес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астраханских врачей. 1913. № 4. С. 244.
- [2] Виноградов С В, Ещенко Ю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истемы санитарно-медицинского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рабочих Каспийско-Волжских рыбных промыслов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начале XX в[J].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23, 22(4): 573-586.

- [3]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Закавказского края «Об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врача к Сальянским рыбным промыслам в Каспий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т 28 марта 1844 г. // ПСЗРИ. Собрание второе (1825–1881). СПб., 1845. Т. 19. Отд. 1. № 17778. С. 224.
- [4] Именной указ «Об отдаче в ведение откупщиков Сальянских и Кизил-Агачских рыбных промыслов больницы и аптеки, при тех промыслах устроенных» от 12 июня 1851 г. // ПСЗРИ. Собрание второе... СПб., 1852. Т. 26. Отд. 1. № 25296. С. 407–408.
- [5] Деминский И.А. Очер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а астраханских врачей за 40 лет (1869–1909) // Извес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астраханских врачей. 1909. № 8. С. 8.
- [6] Медико-санитарный отчет по Волго-Каспийским рыбным промыслам за 1914 г. Астрахань, 1915. С. 5.
- [7] Обязательны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 санитарному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у Каспийско-Волжских рыбных и тюленьих промысло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в пределах Астраханской, Саратовской и Сама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й и Терской, Закаспийской и Ураль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территории Уральск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йска, и охранению здоровья рабочих на сих промыслах // Законы и инструкции,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в Каспийско-Волжском рыболовном районе. 2-е изд. Астрахань, 1913. С. 112–113.
- [8] Корноухова Г.Г. Заболеваемость, смертность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1920–1930-х г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страх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08. № 2. С. 52.
- [9] Протокол экстренного заседания Общества астраханских врачей от 25 ноября 1905 г. // Извес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астраханских врачей. 1908. № 1 (прил.). С. 3–6.

The Healthcare System for Fishery Workers in the Caspian-Volga River Basin, Late 19th–Early 20th Century: A Discussion

Jiale Gong¹

¹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Suzhou 21501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officially approved sanitary regulations in Russia, fishery workers in practice had no access to professional medical servic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was shifted to private fishery capitalists. The ineffectiveness of sanitary supervision stemmed from factors such as insufficient medical personnel allocation, the vast expanse of sanitary districts combined with a lack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which hindered sanitary inspections by physicians, and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obstacles among the Fisheries and Hunting Administration, local administrative bodies, and fishery capitalists. Furthermore,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climate conditions of Astrakhan Province, exacerbated by defect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led to the large-scale spread of various epidemics. Due to the absence of a state-funded free medical care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medical personnel,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were virtually non-existent,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persistently high mortality rates among fishery workers.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ealthcare system for fishery workers aligned with the social needs of Russia at the time. This paper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for fishery workers in the Caspian-Volga River Basin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Russian Empire; Caspian Sea; medical services; sanitary facilities; fishery workers

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李中华¹

(1.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蓬勃发展,各类安全事故与风险隐患日益凸显,引起了社会对青少年户外营地教育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青少年户外体育营地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及其成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构建了包含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管理的全过程风险管理体系,并从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政策保障与标准体系、技术应用与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路径,旨在为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的安全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青少年; 户外营地; 风险防范机制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户外营地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25年度项目(项目名称: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WYD2025B15)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5

1 前言

2025年8月9日,患有自闭症的8岁男童一凯在大理苍山参加“独立营”时,于当日11时40分左右在小岑峰山脚区域走失。13日晚,搜救工作组发文:2025年8月13日17时许,救援人员在大理镇清碧溪北侧山涧发现走失男童,已无生命体征。一凯的悲剧引发了人们对于自闭症“独立营”及户外营地教育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1]。户外营地作为我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开展的重要场所,以其特有的体验式学习和户外教育理念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成为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作为学校体育的有效延伸和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其在促进青少年身心发展、培养团队协作与综合素养方面,发挥着独特且关键的育人作用。《2024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行业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共有728家青少年户外营地,2024年服务青少年655万人次,营业额为17.9亿元^[3]。然而,蓬勃发展的背后也伴随着诸多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对青少年户外营地教育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青少年户外营地活动因其环境开放性、活动体验性、项目挑战性等特点,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各种安全风险。青少年户外营地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不仅可能对青少年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还会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和法律纠纷,影响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系统研究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机制,对于保障青少年人身安全、促进青少年户外营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类型与成因分析

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涉及多方面风险因素,包括环境风险、装备风险、人员风险、管理风险以及社会风险,这些风险因素相互交织、动态变化,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风险系统。

2.1 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主要指由自然环境和场地设施引起的风险因素。自然环境风险包括极端天气(如暴风、暴雨、雷电、高温、严寒)、地质灾害(如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水文灾害(如洪水、溺水等)以及动植物危害(如蚊虫叮咬、毒蛇咬伤、有毒植物)。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建设规范》指出:规划选址应避开地质不稳定、易发生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的危险区域,应避开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易遭到破坏和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4]。

作者简介:李中华(1988—),男,硕士,研究方向:休闲体育、体育旅游、户外运动。

场地设施风险包括场地设计不合理（如坡度陡峭、排水不畅）、设施设备安全隐患（如护栏不牢固、材料老化、安装不当）、危险区域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等。此外，户外营地基础设施如排水系统、电气线路、卫生设施、消防设施等如果设计不当或维护不足，也可能成为潜在风险源。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建设规范》指出：污水排放达到 GB 8978 的规定，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 15630 和 GB 13495 的要求^[4]。

2.2 装备风险

装备风险主要指由青少年户外营地所需的各类装备质量和装备使用引起的风险因素。装备质量风险包括采购的装备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存在设计缺陷或制造瑕疵、老化磨损未及时更换等；装备使用风险表现在参与者未掌握正确使用方法、未按要求佩戴防护装备、使用前未进行检查调试、装备保管和维护不当等方面。

2.3 人员风险

人员风险主要指由青少年户外营地营地服务人员、参与者以及后勤保障人员等多个主体引起的风险因素，是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系统中的核心因素。营地服务人员风险主要包括专业资质不足（如无证上岗）、素质不高（缺乏专业培训、安全意识淡薄）、经验缺乏（如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足）、责任心不强（如疏忽大意、管理不到位）等。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建设规范》指出：营地服务人员需持证上岗或经过专门培训，人数能满足营员需要；攀岩、水上等项目必须配备专职安全保护人员^[4]。

参与者风险主要体现在身体状况不佳（如患有不适于户外运动的疾病）、行为失误（如不听指挥、冒险行为）、心理素质差（如过度恐惧、恐慌情绪传染）以及缺乏安全知识和自救技能等方面。青少年群体正处于身心发育阶段，好奇心强但风险意识不足，自我控制能力和应急能力相对较弱，更易发生安全事故。

后勤保障人员风险包括医疗救援人员配备不足、专业技能欠缺、应急反应速度慢等。

2.4 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主要指由组织策划、安全管理制度、监管评估等涉及组织管理的各个环节引起的风险因素。组织策划风险包括活动方案设计不合理（如难度超过参与者能力范围）、线路选择不当（如选择未开发或高风险区域）、时间安排不佳（如在不适宜天气开展活动）等，安全管理制度风险表现为安全责任不明确、安全检查流于形式、应急预案缺乏可操作性、安全培训不到位等，监管评估风险包括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安全评估机制缺失、事故处理不当等。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建设规范》指出：需有高峰期和特殊情况的安全处置应急预案，至少每个月进行一次演练^[4]。

2.5 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主要指由突发事件、社会治安、公共卫生事件等外部环境引起的风险因素。突发事件风险如森林火灾、交通事故、群体性事件等，可能直接影响青少年户外营地的安全运行；社会治安风险包括盗窃、打架、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恐怖袭击、暴力冲突等极端事件，需要营地具备相应的防范和应对能力。

公共卫生风险在近年尤为凸显，包括传染病疫情、食物中毒、饮用水污染等。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建设规范》指出：饮用水、生活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卫生标准，食品卫生符合 GB 16153 的要求^[4]。青少年群体聚集性特点使得青少年户外营地容易成为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场所，需要采取严格的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措施。

3 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机制构建

3.1 全过程风险管理体系

构建青少年户外体育营地风险防范机制，需要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管理的全过程风险管理体系。事前预防阶段重在风险识别与评估，包括全面排查潜在风险源、科学评估风险等级、制定针对性预防措施等；事中应对阶段强调应急响应与处置，要求快速启动应急预案、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减少伤害损失等；事后管理阶段注重恢复与学习，包括妥善处理善后事宜、深入分析事故原因、系统改进风险管理等。

风险识别与评估是事前预防的核心环节。应采用系统化的方法识别各类潜在风险，如安全检查表法、故障树分析、事件树分析等；风险评估则要考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确定风险等级，为后续应对策略提供依据。

应急响应与处置是事中应对的关键。应建立分级分类的应急预案体系,明确不同级别事件的响应流程和处置措施。健全政府主导、专业救援机构、活动主办方、社会团体及志愿者协同参与的应急联动救援机制,建立“政府购买救援服务、组织者主体责任、被救援人适度承担、保险公司风险转移”的多渠道费用分担模式,完善救援经费保障制度。此外,还应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实战能力。

恢复与学习是事后管理的重要内容。事故发生后,应及时开展救援和医疗救治、家属沟通与安抚、事故调查与责任认定、保险理赔等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组织学习机制,深入分析事故原因,系统查找管理漏洞,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将教训转化为组织记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3.2 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

健全的组织架构和清晰的职责分工是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应建立“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三级责任体系,明确各方安全职责,落实“谁举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的要求。

营地内部应设立安全管理委员会,由主要负责人、部门主管、安全专员、医疗人员等组成,全面领导安全管理工作。下设风险评估组、安全教育组、应急响应组等专门小组,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此外,还可设立安全顾问委员会,邀请行业专家、法律顾问、家长代表等参与,提供专业建议和监督指导。

表1 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

责任主体	主要职责	工作要求
主办单位	提供资源保障、审核活动方案、监督安全运行	选择合格承办方、确保投入到位、建立监督机制
承办机构	制定安全制度、组织实施活动、落实防范措施	资质完备、专业团队、规范管理、全面保障
协办单位	提供专业服务、协助应急处置、参与评估改进	专业资质、协同配合、及时响应、共享信息
政府部门	制定法规标准、加强监督管理、提供公共服务	完善政策、有效监管、支持发展、保障安全
参与人员	遵守安全规定、学习安全知识、配合安全管理	提高意识、掌握技能、自律行为、积极参与

3.3 政策保障与标准体系

完善的政策保障和标准体系是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国家层面应加快出台专门的青少年户外营地安全法规,明确各类主体的法律责任和安全要求;地方层面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如《吉林省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管理办法(暂行)》(吉体科字〔2021〕16号)、《浙江省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创建办法》(浙体青〔2015〕289号)。

标准体系建设应包括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等多个层次。目前已实施的《T/CNCCT 001-2024 泛营地教育活动组织服务规范》、《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4部分:青少年营地》(GB/T 31710.4-2015)、《青少年户外营地等级划分及评定》(T/CMAST 0001—2024、T/CSSS 012—2024)等为青少年户外营地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但仍需要进一步制定和细化完善,特别是要加强对开展攀岩、游泳、滑雪、潜水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标准制定。

保险保障机制是风险转移的重要手段。应建立健全涵盖组织者责任险、领队责任险、参与者意外险、救援人员保险等多险种的保险体系。

3.4 技术应用与创新

科技创新为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智能监控技术如视频监控系统、无人机巡逻、电子围栏等,可实现对大范围活动区域的实时监控和异常情况自动预警;气象地质灾害预警技术可及时获取恶劣天气和地质灾害信息,基于位置服务的应急救援系统、智能穿戴设备、移动医疗站等技术的应用,可活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风险防范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收集和分析历史事故数据、环境监测数据、人员行为数据等,可以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实现风险的早期识别和智能预警。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青少年户外体育营地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及其成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构建了包含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管理的全过程风险管理体系,并从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政策保障与标准体系、技术应用与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路径。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参与者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协同治理机制。政府应加强法规标准建设和监管指导,行业组织应发挥自律协调作用,营地组织者应落实主体责任,参与者应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4.2 建议

4.2.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加快制定专门针对青少年户外营地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责任和法律义务,为风险防范提供法制保障。同时,鼓励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2.2 加强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涵盖场地建设、设备配置、人员资质、活动组织、应急救援等各个环节的标准体系,为行业提供详细的技术指导和规范要求,特别是要加强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标准制定。

4.2.3 强化监管评估机制

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组织自评”的多层次监管体系,对青少年户外营地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和动态评估,促进安全水平持续提升。

4.2.4 推动科技创新应用

鼓励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和应对能力,打造“智慧营地”风险防范系统,提高管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4.2.5 加强人才培养培训

建立健全青少年户外营地指导员职业资格制度和继续教育体系,提高专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完善参与者的安全教育体系,强化对参与者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养,全面提高其安全防范意识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

4.2.6 完善应急救援体系

健全由政府主导,专业救援机构、活动主办方、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联动救援机制,形成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提升整体救援效能,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

参考文献:

- [1] 马秀婷,李睿逸,朱雅文,等. 8岁自闭症男童走失在“独立营”[N].解放日报, 2025-08-15 (005).
- [2] 吕璐露.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教育的发展历程、阶段特征与未来展望[J].体育教育学刊,2022,38(03):61-66.
- [3] 卢明文.提出“双百万”目标: 2025年全国青少年登山户外运动发展大会综述[EB/OL].(2025-04-02)[2025-11-17]. https://mp.weixin.qq.com/s/Z5SRjgHwvuh0nX6N_HZHbw
- [4] 青少年体育司.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建设规范及器材目录》的通知[EB/OL].(2018-04-18)[2025-11-17].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0028154/content.html>

Research on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for Outdoor Camps in China

Li Zhonghua¹

¹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youth outdoor camps in China, various safety incidents and potential hazard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rawing widespread societal attention to safety concerns within youth outdoor camp education.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primary risk types and their causes faced by China's youth outdoor sports camps. Drawing upon advanc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t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encompassing pre-event prevention, in-event response, and post-event management.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re proposed across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duty allocation, policy safeguards and standards systems,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afe 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youth outdoor camps.

Keywords: Young people; Outdoor camps;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指导下当代青年工作的实践路径探析

宋美祺

(锦州医科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马克思主义需要观为社会中独立个体需求的演进至新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并为其创新发展、螺旋式上升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 个体需求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 这种植根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需求, 作为思想意识与精神层面的上层建筑, 不仅对经济基础产生相应的反作用, 还在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及稳定中展现出不可小觑的理论导向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青年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计划的实施效果。在新时代背景下, 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需要观, 将其理论精髓应用于青年工作实践, 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现实意义的重要途径。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为马克思主义需要观于当代社会的应用赋能有力支撑与依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需要观; 青年工作; 青年观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6

一、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概述

需要, 是指有机体因意识到自身某种物质或意识的缺失, 而产生渴望得到满足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通常在特定条件下以欲望、希冀、好奇等形式表达, 是有机体对外部客观现实在自我意识上的反映, 反映了人类自诞生以来, 基于生存与发展对生活条件的基本诉求, 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缺乏状态, 是生存活动的重要动力源泉。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著作中均有体现, 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作品。马克思于《手稿》里就“必要需要”做出明确概述: “必要需要是自然主体即独立个人的自然生成且发展的需求, 它完全基于自然必要性”。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他将“必要需要”界定为“人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 也是全部历史的必要条件”, 即人类要创造历史, 首先需具备维持生存的物质条件。“必不可少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而“在已有必要需要条件实现后的‘还应需要’”则属于应然判断, 是在满足基本需要后人们还应追求、渴望的其他需求。在任何社会生产体系下, 工人阶级在满足生存“必然需要”的基础上, 还会有休闲、娱乐、精神提升等多种“还应需要”。

需要构成人性的本质, 人们追求满足需要的方式则将个体紧密相连, 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网络。由于需要是现实个体间相互联系的纽带, 任何个体都无法完全割裂与社会的联系。因此, 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 其任何需要都无法被社会或他人满足。更重要的是, 需要具有阶段性。《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构成物质资料生产的两个方面”, 其中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 进而驱动社会形态的转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乃至未来必将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力的增长、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方式的调整均会导致经济基础的变革与演进, 人的需要也将随之变化, 人们会根据历史性需要进行相应的生产活动。基于此, 需要作为人类生存及生产活动的中介, 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核心价值, 更体现在对需要结构的辩证划分上, 其中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两大范畴, 直接契合当代青年的需求矛盾与选择逻辑。从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辩证关系来看, 物质需要是青年生存发展的基础, 涵盖衣食住行、就业收入等基本生活资料诉求; 精神需要则是在物质需要得到一定满足后, 对认同归属、自我实现、文化体验等更高层次的追求, 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物质需要的保障为精神需要的提升提供前提, 精神需要的觉醒又会推动物质需要向品质化、合理化方向发展。从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的递进关系来看, 生存需要是青年对稳定就业、生活安全、社会保障等底线诉求的追求, 是个体存续的基础; 发展

作者简介: 宋美祺(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通讯作者: 宋美祺

需要则指向能力提升、职业成长、价值实现等进阶目标,是青年全面发展的核心动力,二者共同构成青年在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等领域决策的核心维度。同时,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结合历史发展进程对人的需要进行了全面考察。从最初的以满足生存为目的的基本需要,到追求享受的阶段性需求,再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需要,三个阶段均展现出人的奋斗精神及人的活动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导向。

二、党的青年工作的概述

(一) 党的青年工作的概述

青年工作是一种社会性工作,它涵盖在现代社会里以青年群体作为主要活动对象的各类事务。在中国近代史上,青年工作真正意义上的形成可追溯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在之后救亡图存的社会革命中出现的青年集体性行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引领青年群体无畏投身于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伟大征程。党自成立之初便深刻认识到青年的力量,明确青年群体所应承担的时代责任,并有效地将青年团结在党的旗帜下。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青年运动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1]。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关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进一步强调,“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2]。1936年11月,《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将“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视为最核心宗旨^[3]。在党的领导和时代的召唤下,青年群体所蕴含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爱国力量被充分激发。无论是传播时代新思想,还是推翻军阀、再创共和,无论是抗击法西斯日寇,还是在国统区开辟第二条战线,青年群体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行,作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自强、民众解放的先锋力量,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党引领青年群体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伟大征程。1949年5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周恩来于会中发表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指出“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4]。无论是抗美援朝、经济政治改革等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英勇斗争,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科教文卫建设等艰苦卓绝的奋斗,青年们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党的领导和共青团的指导下作为生力军贡献力量,形成了“青年突击队”等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一线工作体系,创造了科教文卫领域的众多历史纪录。

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党紧密团结并汇聚广大青年的力量,引导青年群体昂首阔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新时期带来新使命,青年群体秉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青春的力量挥洒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战场上,展现出高度的建设热情。与此同时,一系列品牌项目如“西部计划”、希望工程等持续发挥作用,至今仍焕发生机活力;“净滩行动”和“美丽中国,青春行动”为守护绿水青山贡献青春力量;“青年文明号”、“挑战杯”和“创青春”等竞赛激发青年创新创业热情,以青年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激励着更多青年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在时代的呼唤和党的深切期望下,众多青年茁壮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新鲜血液。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5]。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着历史性决心,基于确保党的事业稳定、民族永恒昌盛的深远考量,从整体层面精炼概括新时代我国青年运动的特质及现状,有效强化了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力,召开首次中央级别群团工作会议,出台首份“青年发展规划”,发行首个以党中央名义的少年先锋队工作文件,高效推进共青团组织改革与创新……一系列举措共同铸就青年工作领域的历史性、时代性重大成就^[6]。习近平总书记凭借其伟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智慧及雄阔宽广的战略视野,于全党全国高效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历程时,高屋建瓴地指明在新时代党要如何明晰认知青年工作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能发挥的作用、青年群体的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深刻阐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塑造路径、青年培养模式,以及共青团的建设目标与实践路径等涉及战略方向、全局性的核心议题,将党对青年群体、青年工作以及青年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推向崭新阶段,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蓬勃推进确立核心指导原则。

从五四运动响彻云霄的“拳拳爱国之声”,到党的二十大、团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0多年发展历程中,党始终引领广大青年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砥砺奋进,携手绘就出无产阶级壮阔史诗。无论历史时期如何变迁,党都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深切关爱、充分信任青年,团结领导青年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与此同时,中国青年运动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党始终围绕青年、代表青年、

依靠青年，以“与祖国共成长、与人民同命运”的创业态度赢得青年的衷心拥护。在不断深化的青年工作实践中，党与青年并肩前行、面向未来，逐步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青年工作体系，于百年党史里书写青年运动璀璨一页。

（二）党的青年工作的价值意义

无产阶级青年群体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框架下，深入探究青年群体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引领下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深刻内涵。在当代中国，党的青年工作实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持续深化，党的青年工作内涵亦随之进行阶段性地丰富与创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工作的领域已从传统的群众工作层面拓展至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深层次参与中。基于党领导的全面性，无论任何行业、任何主体的青年工作均可纳入党的青年工作范畴。我国现行特有的社会制度属性与历史传承，赋予了青年工作双重特性：它既蕴含政党群众工作的本质，又融合了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体系中关于青年群体的内容^[7]。因此，从根本上讲，党的青年工作实际体现出对青年群体的高度重视，它跨越了单纯的政党群众工作范畴，涵盖政府及社会等多个维度，凝聚成一个综合性青年工作体系。

党的青年工作核心宗旨就是夯实并加强党执政的青年基础，在党的领导下把青年群体培养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里着重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8]。后继有人本质上就是能否进行良性的代际传递，能否与青年群体建立传承的阶梯，教育并引导好党和国家“未来接班人”。正因如此，党的青年工作应立足现在，承载历史，展望未来，从始至终关联到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与未来命运。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离不开青年群体的支撑，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依赖于青年的不懈努力。想要确保党和国家持续向前发展，首要任务便是通过有规划、有目标的引导培养青年，稳步构建青年与政党、国家、民族及社会的全方位紧密联系，确保事业后继有人。只有从全过程、链条式的视角深入审视党的青年工作，才能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青年工作的内涵及延伸。青年群体是党和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党的青年工作必须始终围绕引导青年群体坚持党的领导、投身党的事业这一核心目标与价值展开，培养青年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坚实后盾，这是党的青年工作的核心目标与价值意义^[9]。

三、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指导青年工作的理论源头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深刻揭示了人的本性，指出“人的需要映射其本性，而追求满足需求的方式则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强调，于历史进程中活动的是那些掌握自我意识、能够思索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实践的人。人的目的性始终是在人的全部认识与实践里控制行为的内在要素。人的活动均带有预期目的，这赋予了人的需要一种高度自觉性，将当下与未来、个体与社会、生存与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是主体基于社会与人的发展，对其存在及发展条件的补充，也是一种发于希冀的概念性总结。人的需要是社会性的，其形成、发展及满足均受特定社会关系与条件的影响。人的需要是在个体自身状况与社会条件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既体现了个体的自我意志，也满足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价值需求。

人的需要结构并非单一的，而是全方位的立体网络。在自然与社会演变及文明历史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人与动物之间必然存在某种特殊关联。然而，人作为具有思维与意识的主体，其需要能深刻体现人的本性。此外，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秉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能够辩证分析人与动物的区别与联系，指出“人是具有思维与意识的社会性动物，而动物的行为则主要基于生存本能的生理反应”。同时，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结合历史发展进程对人的需要进行了全面考察。从最初的以满足生存为目的的基本需要，到追求享受的阶段性需求，再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需要，三个阶段均展现出人的奋斗精神及人的活动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导向。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契合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并紧紧贴切时代发展核心宗旨，对当代青年群体所处外部社会环境及青年工作的内在要义进行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于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强调：“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10]；又于2023年9月于黑龙江考察时指出：“年轻一代成为奋斗拼搏、振兴中华的一代，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充满希望”^[11]；并于2024年5月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五四青年节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时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

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12]。从相关概述中能够得出结论：即人的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是存在着契合性以及内在的协调性，社会发展和每一代人的需要皆遍布关联。综上所述，当前青年工作要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中汲取智慧与价值意义，铸牢当代青年为党为国贡献热血的初心使命。核心理念就在于呼吁广大青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里大力发扬奋斗精神，加速实现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命。

四、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指导党的青年工作的高度适配

（一）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和党的青年工作核心目标实现具有一致性

人的需要在相互关联与全面发展的框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状态。个体的实际需要可通过他人的劳动成果得以实现，进而构建人际间的相互关联与依存关系。人的这种需要成为了推动社会属性相关联的催化剂，而建立这种人际社会属性关联正是人的本质特征所在。青年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通过利用外部政策环境的优势激发青年的内在积极性，推动青年群体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全面发展。青年工作的范畴广泛，涵盖了保障青年受教育权利、促进青年生理与心理健康的平衡、关注婚恋问题、助力职业规划与就业，以及激发创新与创业活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社会适应力等多个方面。为此，需要健全一系列法规体系，以保护青年合法权益。同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全时段、多维度的法治教育，提升青年群体的法治意识，确保青年群体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助力青年群体个人权益的充分实现。

（二）马克思主义需要观与青年工作实践方式呈现趋同性

人的需要展现出一种动态特征，即“产生需要、达成需要和在此过程中工具的改良催生新需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此定义为“首次历史活动”。人的需要的积极性源自外部客观条件，人类不仅从多个角度创造需求对象，还不断革新和完善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从某种角度看，个体与外界对象的联系与融合，满足了人类的内在需求。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核心在于实践性需求，但并未忽视理论与实践的和谐统一，认为人的需要本质上是一个转化为实践活动的过程。在现代语境下，需要观更强调奋斗精神，这一精神成为连接马克思主义需要观与青年工作的桥梁。它要求将青年的生存与发展置于现实社会生活及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进行审视，倡导以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视角来认识青年，促使这两者在实践层面展现出协同融合的特点。

五、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指导青年工作的价值意义

（一）创新优化思政教育的现实需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7 年联合颁布我国首个青年发展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对我国青年事业具有划时代意义，提出“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深入探讨青年意识形态觉醒的重要性，强调个人理想信念须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紧密融合^[13]；将青年群体的全面发展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创新并发展青年工作理论，为我国青年工作事业提供坚实的思想与制度支撑。《规划》详细阐述了针对青年群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特征与实际成效，并倡议将青年发展议题全面融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规划蓝图中。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理念的核心内涵。人的发展理念融合了自然与社会属性、个体与集体特性的统一，并展现出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的动态特征。青年工作问题在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大潮中凸显，且与“国家—政党—青年”这一复杂框架紧密相连。人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主体，其实现途径及成效的客观性源于主体与客体间需求满足的协同作用，并在此过程中构建起双方的意义关联。从价值观角度看，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明显，如青年群体中流行的过度追求即时享乐和金钱崇拜，以及“00 后独特思维方式”逐渐在社会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这些亚文化环境的蛊惑影响下，部分青年对社会发展前景感到忧虑，对社会进步的信心不足，甚至有人丧失了理想和信念的指引。更为严重的是，国内外诸多因素的交织影响，导致部分青年的爱国主义信念出现松动，脱离了“国家—现实社会—个体”的传统运行模式。

（二）满足青年合理需要及应对现实挑战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以发展的眼光观察青年群体，并非将其视为纯粹的自然实体，而是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强调以发展的视角审视青年群体，着重从未来的维度评估青年群体的重要性。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首届代表大会撰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里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工业吸纳青年参与社会生产活动，表现着进步且积极且符合历史发展的状态”；同时，他深刻总结道：“最进步

的工人绝对懂得，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处于成长的工人一代的培养引导”。从广义上讲，青年象征着未来，这是自然界新陈代谢法则的生动体现。然而，若要青年成为工人阶级未来的代表，则需在遵循这一自然法则的基础上融入教育与引导的力量，确保青年群体接纳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及理想信仰。

想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青年群体中的关键作用，就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青年群体的特性和需求，紧密贴合青年群体实际需求。若教育过程与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脱节、仅侧重于单向灌输，可能会引发青年的逆反心理，从而阻碍教育目标的实现及既定工作的顺利完成。因此，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在针对青年群体的教育领域更应凸显其核心价值；我们应在切实满足青年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构建和完善教育体系，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施策。

（三）重构青年良好形象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促使劳动力队伍中工程师与技术工种的比例持续上升，同时也降低了某些岗位的技术门槛。然而，从长远的时代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的规模不断扩大及其应用领域的日益拓宽，正不断提升劳动者在科技生产中的能力和效率。基于生产资料的属性考量，将科学技术界定为首要生产力的原则无疑是准确的。科学技术在机械化大生产中的运用，实质上是“知识力量的物化”，利用科技提升效率已成为创造财富最为关键的手段。

当代青年未曾亲历社会制度的剧变，难以形成鲜明的直观感受对比。在和平时期，缺乏严峻战争考验的经历，面对剧烈反差的新挑战，青年的理性认知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认知盲点。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其重要性体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高效结合与共同发展之中。青年群体作为衔接现在与未来的桥梁，青年群体综合素质的展现无形中映射出国家的风貌。然而，当代青年面临多重挑战：身体孱弱及心理健康问题多发；继续教育与劳动实践教育的地位亟待提升，发展继续教育品质的任务任重道远；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持续困扰青年，实现就业公平的障碍需深入清除；投身经济发展的热情待有效激发；人口结构新变化导致压力日益提高。维护青年权益需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因此从战略全局出发、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应将青年发展置于核心战略地位，精心规划顶层架构，高效推动各项措施落地实施，为青年群体成长成才奠定坚实基础。

六、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指导青年工作的实践路径

（一）基本原则

1. 坚持主旨鲜明与主体多元的协调一致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深化与丰富其思想内核，将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在新时代背景下融入青年工作应致力于保持核心思想的鲜明性与参与主体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围绕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当代宗旨，应引导更多青年群体在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指导下，促进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高度契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

2. 坚持理论发展及实践导向有机融合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蕴含着鲜明的国家属性、政党属性及制度特性，其价值追求深刻贯穿于国家建设、政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协同之中，是理论价值思维与实践导向原则的辩证结合。在将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新时代背景下融入青年工作实践，就需要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执行力并重。从思想指导层面来看，青年群体需要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精神实质，避免陷入“马克思主义缺乏实际意义”的认知误区，应着重强调在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指引下，青年群体作为社会主体，在服务国家、参与社会及实现自我价值三个维度上的紧密联系与内在统一。

3. 坚持唯物观与时代进步协调统一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应展现出融合历史深度与时代鲜活性的特质：既要凸显其随历史进程而积累的验证性、蕴含的民族精神及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又要体现与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及其强大的实践价值^[14]。把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结合青年工作的关键在于有效引领青年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需要观随时代完善创新的逻辑与背景，抵制历史虚无思想。同时，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应紧密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发展与完善，教育引导青年群体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在新时代的定位，对其进行科学且时代化的阐释，确保个人需要与国家发展需要达到有机统一。

4. 坚持秉持理想信念和挖掘全球视野并重

马克思主义旨在阐释社会发展，随着时代进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写照。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们

应更加重视构建青年群体的全球化视野,加深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培养青年的时代使命感,将青年个体的前途与国家的未来紧密相连,促进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有机融合,赋能青年群体在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引领下积极拓宽认知边界,深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与把握。

(二) 方法措施

1. 构建一套话语体系,增强青年对正当需要的接纳性

马克思主义需要观通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构建关于需要的内在逻辑论述奠定坚实基础,进而在理论思维与社会实践中引领青年群体的价值导向。我们应在构建马克思主义需要观话语体系时重点关注青年群体的内心感受,超越单纯外显的自我认知层面,从而更好引起青年的价值共鸣。此外,还需将复杂的理论表述灵活转化为青年群体易于接受并愿意践行的叙述方式,采取叙事演绎的手法,在实际工作中融入典范人物及实例进行启发,增强表达的感染力,有效提升青年群体对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接纳程度,成为引领青年群体的成长导航。

2. 构建客观的传播框架,使青年群体切实感受到被认同

当前,新媒体技术正迅猛发展,实现了时间上的全天候覆盖与空间上的全面渗透,依靠深度整合全球资源构建高度开放的信息交流平台。关于青年群体合理需求观念的培育,应在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指导下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共享的特性,突破传统媒介单一传播模式的局限。我们可以采用影视作品等富有趣味性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进行多元化展示,从而吸引青年群体的浓厚兴趣;不仅能够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需要观与青年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从个体到群体、从点到面的全方位引导策略,还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在青年工作中的实际指导意义,为马克思主义需要观的实践探索和创新提供全新路径。

3. 强化理论依据,增强青少年合理需要的厚重感

思想政治课作为贯穿大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应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一平台,担当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的主力军角色,通过系统化的教学提升青年群体的思维能力构建。在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任务中深化青年群体对合理需要的认知,确保理论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于日常生活里不断夯实、不断赋能。具体而言,应通过剖析马克思主义需要观在生产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逐步引导至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运用贴近青年群体实际需求的案例,将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深度融入其精神世界,从而实现青年群体成就感的全面充实以及对国家深层次情感的强烈归属感。

七、结论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实现在一国的程度,与其满足该国需要的程度紧密相关”。当前,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被视为一项兼具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的时代议题,其核心逻辑在于这一目标与人民群众本质需求的高度契合。具体来说,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象征着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推动人民群众精神层面共同富裕,实质上也是充实人民群众精神世界、强化精神力量、对应多元精神需要的过程,不仅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在精神渴望,也激发并引导着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15],明确总结新时代青年工作的运行措施与基本原则。青年工作核心在于聚焦青年需求,依据青年群体特性与偏好实施。党的青年工作概念,实质上特指说明在党的群众工作框架内青年部分的极端重要性。据此,秉承“代表青年、赢得青年支持、倚重青年”的原则,青年工作核心宗旨即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政治要求则在于夯实并提高党的青年群众基础^[16]。党的青年工作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需要观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指引青年群体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及实践。开展内容涵盖组织、引导、服务及动员青年的实践活动,核心宗旨在于党的意识形态传承、情感联结构建及倡导行为的内化。

就青年工作的关键命题而言,最根本在于深化与青年群体的联系,细致洞察青年群体需要并予以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倾注极大热忱研究青年成长规律和时代特点,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17]。党的青年工作是一个立体系统,“三个人”的角色定位实质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掌握有效的青年群众工作方法,达成紧密联系青年、真诚服务青年,并有效帮助青年成长。同时,我们应遵循人民群众事业发展需要的导向,确保青年群体能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紧跟党

的步伐不断前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党为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始终坚守初心、牢记历史使命,以实际行动感召青年,以科学理论启迪青年思维,为青年提供广阔实践舞台,促进青年群体成长成才,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奋斗。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53.
-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65.
-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0.
- [4]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40.
- [5]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7.
- [6]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J].中国青年,2021,(13):10-12.
- [7] 田杰.改革开放30年青年工作的发展过程与趋势[J].中国青年研究,2009,(07):29-35.
- [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9] 陆士桢.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中的青年工作[J].人民论坛,2023,(10):98-101.
-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共产党员,2017,(21):4-25.
- [11] 新华社.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1).
- [12] 新华社.习近平寄语新时代青年强调 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N].人民日报,2024-05-04(1).
- [13] 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人民日报,2017-04-14(1).
- [14] 杨杰.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融入青年工作的逻辑理据与价值实现[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08):20-23.
- [1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1.
- [16] 刘长军,刘洁.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与新时代青年工作的逻辑生长点[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9(05):14-24+123.
- [17]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2.

Exploring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ntemporary Youth Work Guided by the Marxist Concept of Needs

Song Meiqi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Abstract: The Marxist theory of needs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demands in society to a new stage, 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i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spiral-like advanc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essential attributes, individual need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social practice. These needs, rooted in human social practice and functioning as the superstructure at the ideological and spiritual level, not only exert a corresponding counteraction on the economic base but also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value for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youth work directly impa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 and state's development pla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era, deep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Marxist theory of needs, and applying its theoretical essence to youth work practice, is a crucial pathway to realizing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t provides robust support and justific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Marxist Perspective on Youth; Youth Work; Youth Perspective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双重逻辑

王飘怡

(海南大学,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深刻体现出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理论逻辑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 强调开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更是推动创新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理论逻辑演进的历程背后能够体现出我国通过对外交往和合作, 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要素有效聚集。而现实逻辑则是结合全球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 梳理我国如何实现资源与要素的有效聚集, 这一系列的探索如何形成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为中国利用外部经济环境、应对国际挑战提供了清晰的理念指引与清晰路径, 指引我国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寻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深入讨论这一重要论述的双逻辑必要性在于, 这不仅有利于理解我国开放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还清晰地梳理了我国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把握机遇与挑战, 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对外开放; 习近平; 理论逻辑; 现实逻辑; 一带一路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7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 是一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不断演进的严密、详实的思想体系。讨论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要建立在时代背景之下, 实践路径的基础之上, 需要着重考察背后的历史哲学、辩证思维以及系统观念的演变过程。

(一) 开放理论的形成: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对世界历史形成规律的深刻洞察, 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梳理与重新定义。这背后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形成不仅是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 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实践探索其背后开放本质的哲学回归, 包含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的契合、对世界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顺应、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需求匹配。就开放理论形成的现实性而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的起点侧重于对现实中“为什么要开放”与“开放的历史方位”等问题的解答, 之所以说是对“必然性”的重构, 并非是对以往对外开放实践道路的否定, 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对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核心逻辑、实现路径和制度体系进行优化、升级与完善。

第一, 中国的开放是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自觉。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总结历史经验, 提出“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导致落后”的重要认识。在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中表示, 纵观中华经济发展史, 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我们要在开放中学习, 尽可能防范和化解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 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道路。这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下我国面对封闭与落后的因果律作出的经验总结。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演进, 将历史地总结的经验上升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趋势, 提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逻辑起点承认了开放的重要性同时, 向世界否定了任何形式的“孤立主

作者简介: 王飘怡(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通讯作者: 王飘怡

义”，确立了我国开放政策的长期性与根本性。

第二，中国的开放是内部需求与外部环境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整体展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逻辑转向过程，从被动开放转向内因驱动。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要素驱动难以为继，中国的开放不仅是为了获取外汇、学习先进技术，更是为了倒逼国内改革、破解发展瓶颈。针对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在逻辑上确立了“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2]的双向互动观。其逻辑起点、核心在于开放下的“生存与发展”，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生存规律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

（二）开放理论的丰富：基于辩证法的“主动性”与“共生性”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的逻辑体系体现的是以辩证法的“主动性”突破局限，以“共生性”拓展边界，最终形成更具系统性、包容性的开放逻辑，这一逻辑与辩证法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就开放理论丰富的现实性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丰富过程回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我国怎么开放”与“开放的价值指向”问题。其理论逻辑由“为内向外”的单向需求扩展为“内外联动”的系统布局，重点在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从被动适应规则转向主动布局与全球治理。这一实践过程中开放基本理念的变化与实践探索的进步，从逻辑上讨论表现出基于辩证法的“主动性”“共生性”双重特性。

第一，辩证法强调事物发展的内因是根本动力。开放逻辑的“主动性”指的是我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顺应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主动求变、破局升级，推动开放逻辑不断丰富，并将开放理念指导于现实实践。我国主动回应“大而不强”的发展瓶颈、国际逆全球化的外部压力，提出“制度型”开放，将开放从商品要素流动层面，拓展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层面，丰富开放的内涵维度。“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以开放主动破解发展质量难题，让我国开放逻辑更具深度。除此之外，我国主动引领发展方向，主动优化内在结构。我国提出全球倡议，从“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主动搭建合作平台、完善全球治理，将开放逻辑从“单向收益”拓展为“双向赋能”，丰富了我国开放的实践道路。我国针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待升级等问题主动调整开放布局与格局，主动对接国际标准与国际规则，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将开放逻辑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协调”，在空间和制度上丰富了开放内涵和具体内容。

第二，开放逻辑的“共生性”是指以辩证法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去看待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提倡打破孤立思维，以“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联系观拓展开放边界，让开放逻辑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辐射力。我国突破国际社会“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单一思维，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合作主张要素互补，将开放逻辑从“单向的输出或输入”丰富为“多元共生、利益共享”。我国建立起“内外联动”的系统思维，改变“国内”与“国际”的割裂视角，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国际循环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活力，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让开放从“外部补充”升级为“内外协同”，丰富了开放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我国拓展“多元合作”的合作思维，突破以往侧重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开放局限，主动与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拓展新兴市场；同时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领域开辟开放赛道，形成“传统领域深化、新兴领域拓展”的多元开放格局，对合作对象、领域的拓展，让开放逻辑从“单一维度”丰富为“多元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演进中逐步涵盖更加广泛的利益支撑点，即现实中的利益相关方。

总体来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理论丰富的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工作从空间布局与价值共生两个逻辑维度展开，贯穿辩证法的内在要求，表现出“主动性”与“共生性”双重特性。这种双重维度表现为：一是从“点线面”到“全方位”的立体思维。我国突破简单的区域线性布局逻辑，建立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立体逻辑；二是实现利益共同体和零和博弈的对立统一，对义利观的重塑在理论上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逻辑，提出“正确的义利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确立“互利共赢”的逻辑前提，与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开放过程中谁受益的伦理问题。在理论丰富的过程中，理论逻辑的演变核心在于开放中的主动与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理论论证了开放不是被动接

[2]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20-11-11(01).

受规则，而是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的处理不是独善其身，而是美美与共。

（三）开放理论的发展：基于系统观点的“制度型”与“安全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持续发展，从逻辑变化而言本质上是系统观点的“制度论”与“安全性”的深度融合、动态适配的过程。系统观点强调有机整体的有序运转与风险防控并重，“制度型”开放为开放发展的道路提供结构化的升级路径，“安全性”则是为开放发展的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二者相互支撑、同向发力，其背后展现出我国开放发展逻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被动适应”向“主动驾驭”演进。

第一，“制度型”是我国开放发展的结构化动力。哲学的系统观点认为，系统的发展离不开清晰的规则框架与协同机制。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中，“制度型”开放通过构建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解决了我国以往开放中“碎片化”“短期化”问题，让开放逻辑更具有系统性、稳定性与扩展性。我国推动开放发展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升级，形成整体合力。新时代“制度型”开放聚焦规则、规制、标准等核心，通过外商投资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制度创新构建起崭新的制度框架，推动我国开放从“临时的红利政策”转向“长效的制度保障”，使开放更具有持续性。我国强化开放系统的“内外协同”逻辑，认准开放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核心实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效衔接，比如对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等等，这种协同性推动我国开放从“单纯的对接外部”发展为“内外规则互融互促”，让开放更加高效，为开放发展拓展空间、深化层次。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深化，我国在开放发展的路径探索上逐步实现制度的“可推广性”，让开放发展逻辑突破地理的边界，从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点上创新”，推广为全国范围内的“面上实践”，逐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与此同时，我国主张制度型开放从商品要素流动层面、深入到制度供给层面，让开放发展从“浅层次”向“深层次”延伸，覆盖更多核心领域。

第二，“安全性”是开放发展的底线支撑。哲学系统的观点重视“整体稳定”，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风险防控是开放系统持续发展的前提。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理论发展的整体演变中，“安全性”贯穿开放发展的全程。我国确保开放在扩大规模、深化层次的同时不偏离国家安全底线，为开放发展提供稳定环境。我国破解“开放与风险”并存的逻辑矛盾，开放程度越高，系统面临的内外风险就越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核安全”，将安全性纳入开放的实践逻辑中，推动我国开放发展从“重发展速度”转向“发展与安全并重”，实现安全前提下的有序开放。我国筑牢开放系统的“内部韧性”，系统的稳定依赖内部核心要素的安全可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国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守住关键领域底线，比如在科技开放中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在能源、粮食等领域保障供应链安全，避免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这种内部韧性的培养使我国开放发展从“依赖外部资源”转向“内外资源互补互保”，确保我国开放系统不因外部动荡而失衡。

总体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呈现出极强的系统观点和底线思维，表现为制度深化、安全底线等方面的逻辑深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深入实践，我国的开放逻辑已实现了关键的跃升，发展为稳固安全的制度型开放；在高质量开放发展的同时，向安全开放发展要成效，实现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理论逻辑随着理论实践更加深化，分化出安全风险意识的支撑点，在逻辑上厘清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只有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才能在全球开放浪潮中站稳脚跟。在开放理论深化发展的过程中，理论发展的逻辑核心在于“高水平与安全”，论证了开放的深度与开放制度的紧密联系，开放的底气在于国内大循环的持续健康发展，开放可持续性在于开放发展的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表现出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升华路径，其起点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开放的“合法性与必然性”的问题，中间点在于基于全球视野与辩证法回答开放的“路径与价值”问题，至高点在于基于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解决开放的“质量与保障”问题。这一过程的探索，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策运行与发展，而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学观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家安全学说在内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不仅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指向。开放论述的现实逻辑的本质在于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如何通过开放这一“关键一招”来解决内部结构性失衡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现实逻辑在开放实践探索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动力重

构、路径跃升以及格局重塑三个维度。

（一）动力重构：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内生动能

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起点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精准把握。过去我国的开放发展依赖“两头在外”，即资源和市场在外，以及低成本要素驱动的传统开放模式，并且面临着边际效应递减的现实困境，因此，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起点是一场开放体系的动力变革与重构。

首先，我国积极面对当前国际背景中的复杂因素，以开放探索全新的合作模式，明确了以开放促改革。针对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现象频发的现实状况，我国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应国际经济合作，促成双边、多边合作的开放道路；以问题意识拓宽开放空间，深化国际经济合作，主动面对当前阻碍开放合作的风险因素，以开放促改革；从拓宽内部空间，优化内部环境到加强对外合作，我国在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始终保持问题意识，发挥比较优势。针对国内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和市场分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外部竞争压力，打破利益化的藩篱。在实践探索上，我国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举措不仅为了平衡贸易收益，更是为了引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对于光电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而言，这种开发实践的逻辑意味着我国必须与全球经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锻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破要素制约。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发展的核心要素已从土地、劳动力转向数据、技术与高端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明确当前国内经济转型，我国经济从速度向质量的转变需要我国从单纯的“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智”。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我国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聚集，从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现实跨越。

（二）路径跃升：从“政策洼地”迈向“制度高地”的改革探索

自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之后，如何提高开放的水平，提升对外开放工作的质量以推动发展是新时代对外开放要解决的现实难题，因此，从“政策洼地”向“制度高地”的改革探索是我国开放发展现实逻辑中最具操作性的部分。在过去，我国的开放实践逻辑往往依赖优惠政策，以此构成“洼地效应”，将政策、资源、市场等汇聚出国内独特优势，制造集聚收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3]”，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逻辑强调通过规则、管理标准的现代化提升，构建国际合作的高地，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国全面探索高水平开放道路，一步步打造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首先，我国在制度型开放上实现实质性的突破。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逻辑要求开放政策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国际竞争的焦点已经转向营商环境的竞争，因此，我国为建设更具效能更有前景的营商环境作出了实践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从上海自贸区的的第一张“负面清单”到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这一实践标志着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这并非我国对外开放实践探索的政策微调，而是行政权力与市场边界的重新界定，旨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 CPTPP（全面与进步太平洋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准则。

其次，我国加大服务业与资本市场的深度试水。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开放已趋向成熟，服务业与金融领域逐步实现现实增量，但是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仍需在对外开放的服务业、资本市场深入探索。这一层面的开放不再停留于货物贸易的通关便利化，而是深入到金融牌照、电信业务许可等深水区，体现了开放路径向产业链高端、价值链核心的延伸。从开放的实践逻辑上来说，我国突破了传统开放的表层局限，深入到市场规则、行业核心资质等领域。一方面是从“流程便利”到“资质平等”，为电信等领域服务资质扫清障碍，使外资不再是“边缘者参与”，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核心领域竞争。一方面是“从政策优惠”到“制度公平”，我国在金融领域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跨境服务领域不再通过正面清单限定外资经营范围，这种制度设定避免了政策依赖带来的要素流动不稳定问题，是我国开放从“政策红利型”转向“制度优势型”的关键。

（三）格局重塑：在大国博弈中构建“韧性与安全”的战略闭环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的严峻外部环境，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必须回答“如何在开放中生存”的问题。

首先，我国通过多元化布局以及和平协商的友好交往方式化解风险。为了规避单一市场依赖带来的风险，新

[3]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时代对外开放发展的现实逻辑表现出开放空间的多元平衡。“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多元化布局的有力实践，其逻辑底色是通过“空间、伙伴、领域、规则”的多元拓展，打破以往单一化的开放格局。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成功开辟了新兴市场，优化了贸易结构。“以他人之优势补我之劣势”^[4]，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状态下优化布局，统筹资源，以主动作为构建多元支撑，开辟发展新空间。中欧班列的逆市增长、RCEP的生效实施，都在现实层面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构建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战略回旋空间。除此之外，“越是开放，越要注意安全”^[5]。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我国始终坚持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在安全的基础上追求开放的可持续性，在开放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原则，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6]。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的发展必将寓于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因此我国将以更加强大、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11-11(01). [2] NAGARAJAN V, PONYAVIN V, CHEN Y, et al.
[2]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88.
[4] 习近平.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J]. 求是, 2025 (14).
[5] 习近平. 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N]. 人民日报, 2015-10-23(002).

The Dual Logic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Opening Up

Wang Piaoyi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opening up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is grounded in the reform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emphasizing that opening up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 crucial pathway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nation's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this theoretical logic reveals how China,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has formed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outcomes, achieving 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effective aggregation of innovative factors. The practical logic, meanwhile, addresses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intensify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y outlining how China has effectively aggregated resources and factors, and how these explorations have forged a distinctive Chinese path of opening-up practi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opening up provides clear conceptual guidance and a distinct path for China to leverage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s and address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guiding the nation toward higher-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necessity of thoroughly examining this dual logic lies not only in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ope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ut also in clearly mapping how China navigat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ithin globalization. This discourse offers robus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n open world economy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88.

[5] 习近平.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J]. 求是, 2025 (14).

[6] 习近平. 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N]. 人民日报, 2015-10-23(002).

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推民族复兴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遵循

王凡¹ 段嘉莹¹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房山区 102488)

摘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是民族复兴的文明表达,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崭新的时代蕴含对民族复兴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深刻理解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推民族复兴的内在逻辑, 必须从历史性角度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文明蒙尘”“文明自觉”“文明互鉴”“文明崛起”阶段的历史沿革, 基于此, 从现代性角度把握其在助推民族复兴事业中所具有的文明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及时代逻辑, 进而以不同的逻辑关系为依托探寻在新时代条件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民族复兴; 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思政专项青年项目“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叙事体系建构研究”(24SKSZ06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 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从民族复兴的高度上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求历程, 并从现代性角度把握其助推民族复兴事业所具有的内在逻辑, 进而提供新时代条件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方法。

一、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求历程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类文明迎来历史性重构的契机。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寻历程展现出民族复兴的历史前景。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 民族与文明的发展会呈现出一种衰退状态, 而“复兴”即是改变这种衰退状态, 并对历史文明荣光的创造性再现。这在社会历史发展史上就表现为长时间的坚守与探索。

(一) 文明蒙尘中探索: “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到积极学习西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来, 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其丰富和完备程度,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1840 年鸦片战争后, 让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也逐步式微, 长时间处于被贬低、被破坏的境地。面对西方侵略者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双重践踏以及中国文化重构与重建的需要, 中国仁人志士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救亡图存道路, 探索民族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历史走向。但由于早期其过于理想化及教条化, 并没有真正地联系中国根本问题, 最终也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在这一阶段的文明探索中, 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习阶段, 而是要结合中国自身发展实际“如何改造社会、为我所用”, 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作出铺垫。

(二) 文明自觉中学习: “以俄为师”“以苏为鉴”到“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 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 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是经得起历史与实践考验的科学性结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当时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华文明也带来了新的发展生机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得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开始重建, 这一点可以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得以验证。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社会百废待兴, 各项社会事业需要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重振发展。中国

作者简介: 王凡, 女, 汉族, 陕西省安康市,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段嘉莹, 女, 汉族, 河南南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王凡

共产党以苏为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后发展“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从“以苏为鉴”到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的文明自觉在这一过程中越加明显地呈现出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被创造推进并不断发展起来。

(三) 文明崛起中超越:以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

人类文明是在危机与挑战的双重夹击下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并落实在具体政策上进行统一部署与安排,进而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具有更加深刻的认知。“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与国际关系发生深刻调整,影响国际发展的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我国国内也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因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有世界胸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指明发展方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这场时代之变驱动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基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生成,蕴含着利于全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性单维度文明,具有鲜明的国际意义。

二、深刻领悟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推民族复兴的内在逻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面向未来,符合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的复兴,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成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因而,应当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展现出的文明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及时代逻辑为起点,认识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所具有的更深层次积极意义。

(一) 文明逻辑:阐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次文明蕴含

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本质上是文明的复兴,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其现实与历史基础,并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紧密相连。它从文明的历史维度丰富并拓展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内涵,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层次的文明蕴含。

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指向文明国家的复兴。文明的繁荣与发展应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具有积极意义、在各国的发展之间应是具有互惠性质的,更应该反映着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发展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崭新意义的创造。

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指向文明精神的复兴。精神文明通过价值性的注解与阐释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独特的文明意蕴。内在包含着与中华民族价值取向一致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等精神元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这些精神元素在新时代条件下加以时代性的注解,通过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得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从而担当起文化复兴历史使命的重任。

最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指向文明生活的复兴。美好生活是指富有丰富的文明底蕴及拥有崇高文明追求的生活。创造出的文明生活复兴的历史局面以现实的每一个人为出发点,通过有机统一结合真实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和谐的美好生活,将文明生活所体现的“真”“善”“美”受益每一个人,体现在每个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逐渐实现每个人对文明的追求。

(二) 价值逻辑:构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与文化体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整体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现代化发展的文明成果,内在蕴含着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等精神元素,承担着“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的历史使命,构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与文化体系。

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推中华民族实现精神上的政治自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文化新形态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样态就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文化使命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引领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发展,为新时代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共同的精神家园。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进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构筑“大一统”的观念基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寓于中华文明整体之中,是中华文明创新创造发展的文明成果总和,因而也具有包容性等突出特性。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全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增进各民族交流与互鉴,增强各民族团结的必由之路,从而使得各民族人民坚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强,体现出强大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通过文明发展的角度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可见中华文明在民族统一发展以及凝聚民族精神力量中的文明意义。而在新征程上,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仍需统一的文明价值基础强化政治统一的中华民族整体力量,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即是对这一需要的价值满足。

(三) 实践逻辑:为国家、民族及政党在新阶段的形象建构提供文明支撑

立足于统筹“两个大局”的历史高度,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把握好世界发展格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命题,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型,彰显了中国共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定的政治站位与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发展、国家富强的战略目标与实践价值。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文化强国目标的锚定，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性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的丰富的文明基因来源于悠远悠长的中华文明，并提供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明自信。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现代中华文化的精髓，潜移默化地增强民族间的政治互信。一方面来讲，政治互信可以指在本国范围内各民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另一方面来讲，政治互信又可以指在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贴合，具备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与精神因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基础来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超越，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受益全人类，加速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其广泛的世界意义。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历史使命的创造性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考量与政治自觉，凸显了其对新的文化使命的创造性锚定。

三、从民族复兴战略高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径遵循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实践创造。因而要站在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主动，汲取中华文明建设智慧，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拓展现代文明建设领域，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文明基础。

（一）挖掘中华文明历史底蕴，借鉴中华文明建设智慧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有充分了解中华文明的悠远历史，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汲取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有力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首先，贯通中华文明历史文脉，充分挖掘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贯通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文明精华，坚定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增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信心进而在深厚的历史底蕴上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更新与创新发展。

其次，科学借鉴中华文明建设智慧，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诸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可以汲取的历史智慧，也蕴含着当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深刻立场观点与方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把握好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在文化自信自立自强中推进现代文明的创新发展。

最后，立足于历史及当代实践，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实践成果的结晶与精华所在，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需要的诸多元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践并总结好中国经验，不断加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知并将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系统工程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坚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更能支撑其未来的蓬勃发展。

（二）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统筹推进“两个结合”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给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厚沃土壤，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与经验中汲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智慧，统筹推进“两个结合”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首先，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系统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本国国情创造的现代化，彰显着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所独有的形式与逻辑，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中华文明更新与升华的文明成果开辟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建设新路径。

再次，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统筹推进“两个结合”建设。“两个结合”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实践，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最根本的遵循。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与人类发展的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共同统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进程中，夯实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基因，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辉煌。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与前途命运。因而立足于国内国外发展大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定位，继承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为政以德、以人为本等治国理政智慧，坚持执政与为民相结合。

其次，坚定文化自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动力来源于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因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实践，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并且在文化自信中增进文化认同，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因而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激发文化创新活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 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四) 拓展现代文明建设视域, 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统一性特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从全球视野审视, 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优秀成果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影响力, 拓宽现代文明建设视域。

首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向时代、面向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 因而必须要批判继承与辩证扬弃人类文明成果。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 其现代转型昭示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明发展智慧。“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 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仍需保持战略定力, 积极融入世界文明体系之中,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再次,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视通万里, 以博大胸怀拓展现代文明建设的全球视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增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国家文明的交流互鉴, 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必须要做好中华文明宝贵财富的当代运用与创新发展, 把中华文明中最具有未来价值、世界意义的精髓提炼出来, 在发展中继承中华文明的血脉, 在继承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 铸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机生命体, 保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蓬勃生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力量。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 [8]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 [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 [10]项久雨:《创造美好生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0期.
- [11]辛向阳,吕耀龙:《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9期.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athways Through Which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Advances National Rejuvenation

Wang Fan¹, Duan Jiaying¹

¹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the civilizational expre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s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fresh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provide strong guidance for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logic through which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drives national rejuvenation requires examining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cross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 obscured,” “civilization awakened,”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nd “civilizational rise.” Building on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one can grasp the civilizational logic, value logic, practical logic, and temporal logic that shape its role in advanc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se interconnected logics further point towar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building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Keywords: National Rejuven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长征红色文化场馆的记忆建构 ——以贵阳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为例

罗竞腾 窦文博 徐英杰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红色文化场馆是融合历史记忆、文化传承、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的复合型社会文化空间。然而, 以长征文化为核心的场馆, 其记忆生产的内部机制与游客记忆的建构路径, 目前尚缺乏深入探讨。为此, 本文以贵阳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为个案, 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内容分析及扎根理论等方法展开研究。主要发现包括: (1) 该馆的记忆场域由“物理场”与“心理场”共同构成: 物理场依托时空叙事进行记忆编码与生产, 而心理场则源于游客记忆的生成及其与物理场的双向互嵌。(2) 在心理场中, 游客的记忆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集体记忆、在场记忆与重构记忆。

关键词: 红色文化场馆; 记忆建构; 红飘带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红色旅游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究》(项目编号: 202502000307); 湖南省高校辅导员综合发展工作室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25FDYGZS02); 湖南省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交互叙事视角下红色记忆空间功能建构与育人机理探究》(项目编号: 202516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9

1 引言

近年来, 红色旅游作为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正受到广泛关注。在红色文化蓬勃发展与政策扶持的双重推动下, 越来越多民众主动走进红色旅游景区, 通过参观寻访、沉浸体验与主题教育等形式, 重温革命历史, 接受精神洗礼。作为红色旅游的核心场所, 红色文化场馆不仅是游客到访的重要节点, 更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播主流价值的关键媒介。这些场馆不仅通过丰富的文物、图片、影像等媒介再现历史场景, 还通过精心的展览设计和叙事策略, 引导观众穿越时空, 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在这个过程中, 红色文化场馆成为了一个集历史记忆、文化传承、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于一体的综合性场域。目前学界对场馆的关注聚焦于场馆文化资源、空间生产等领域, 鲜少有研究关注到红色场馆的时空叙事与记忆建构, 而红色文化场馆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何通过具体的文化空间建构观众的记忆、认同是其核心价值所在。

本文旨在探讨红色文化场馆的记忆建构机制,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案例, 分析红色文化场馆如何构建记忆场域, 以及观众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巩固红色记忆。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红色文化场馆的理解和认识, 还能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作者简介: 罗竞腾(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会展传播、红色场馆传播;

窦文博(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徐英杰(2004—),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旅游与文化、红色文化。

通讯作者: 罗竞腾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项目与贵州段的引领工程,对贵州推进此项国家文化工程起到了开局与示范的关键作用。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总占地 80 亩,总建筑面积达 5.3 万平方米。场馆群由《红飘带·伟大征程》主题展演所涵盖的“三馆两剧场”,以及新时代新长征裸眼 3D 展厅、红飘带飞行影院等七大核心设施构成,共同形成一套完整的展演矩阵。其中,《红飘带·伟大征程》主体叙事分为“无名英雄、血火洗礼、伟大转折、砥砺征途、胜利丰碑”五大篇章,作品融合历史全局、军事战略、领袖决策等多维叙事视角,全景式地再现了长征这一伟大史诗。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实地搜集和半结构访谈收集数据资料,首先对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中的历史事件描述以及展品进行了实地搜集和整理,本研究系统采集了馆内所有原始的展示与解释材料(包括文字、图片及场景装置等)。随后,将全部文本资料作为质性分析的基础,导入 Nvivo 12 软件进行文本分析。通过逐级的开放式编码,最终凝练并归纳出场馆的核心叙事主题。接着对游客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收集数据,有效访谈数量为 45 个,同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然后进行分析。网络搜集资料主要选取携程网和马蜂窝两大主流在线旅游网站,手动收集网络评论和游记用作补充性资料。

2.3 研究方法

2.3.1 叙事分析法

叙事分析法指出,社会实在建立在话语各方持续协商与共同建构的基础之上。该方法旨在阐释叙事者如何通过叙述行为来构建历史与现实,并揭示其中隐含的默会知识与决策逻辑。叙事分析的核心价值,在于解读接受者如何依据自身对叙事内容的理解,重构出一个内含时间脉络与意义指向的叙述事件。

2.3.2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建构实质理论,其核心在于保持研究的开放性与理论敏感度,注重在材料与编码之间进行持续比较。该方法依托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的递进过程,逐步实现对原始资料的概念提炼、范畴归纳与理论升华。

3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记忆建构

3.1 物理场:叙事生产与记忆编码

3.1.1 历史叙事的数字还原与沉浸场域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以长征历史为基点,致力于相应的红色记忆生产。相较于传统博物馆,其展陈模式呈现出两大典型特征:其一在于数字化叙事。该馆在全息影像等现代技术的赋能下,将传统历史叙事与前沿科技相融合,实践了“科技+艺术”的中国文化记忆建构路径,通过技术语言生动讲述“中国故事”,以动态化的数字展陈使革命文化焕发新生。其二在于沉浸式场域。艺术馆内部构建了多层次的叙事空间,其精妙的空间布局引导观众逐步深入历史情境,在具身体验不同历史片段的过程中,获得深度沉浸且富有情感震撼的观展体验。

3.1.2 场景叙事的时空建构与体验生成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的场景是承载特定时空的叙事场域,引导着参观者与叙事主体的互动。其空间构造依循时间轨迹展开,具备明确的叙事功能:第一,以线性叙事勾勒历史脉络。场馆严格遵循长征历史进程,通过“无名英雄”到“胜利丰碑”六大篇章的序列化展陈,为观众构建了清晰的历史发展框架。第二,以空间情境深化具身体验。通过差异化的场景设计,场馆构建出多层次的时空感知。例如,草地区域将广袤的自然景观与艰苦的斗争情境相融合,使观众得以具身体验红军将士以信念对抗极端环境的历程,从而在沉浸参与中深化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3.2 心理场：游客记忆的生成与互嵌

本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旨在解析游客在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中，其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机制。基于所收集的一手数据，研究首先进行了高频词分析。词云图显示，游客的文化印象可归纳为两个维度：其一为“体验核心”，相关高频词如“体验”、“科技”、“场景”等，反映了游客在跨越场馆阈限后，通过多感官沉浸所获得的独特体验；其二为“文化核心”，高频词如“长征”、“精神”、“历史”等，表明游客在该文化空间内理解了红色事件，体悟了革命意义，从而参与了对文化记忆的承接与建构。继而，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从心理场视角阐释游客记忆场域的生成过程。通过对概念符码的逐步聚类，最终提炼出认知记忆、体验记忆与重构记忆三个主范畴。这三个范畴清晰地揭示了旅游者从进入场馆前、到游览过程中、直至参观结束后，完成其个人记忆场域建构的完整动态过程。

表1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访谈开放式编码示例

主范畴	范畴化	概念化
集体记忆	事件记忆	长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大渡河、反围剿
	人物记忆	毛主席、周恩来、贺龙、朱德
	情感记忆	悲痛、感动、敬仰、敬畏
	价值记忆	伟大转折、挽救党和国家、研学地点、重要事件
在场记忆	身体阈限	身临其境、参观、拍照、互动、看视频
	精神感受	震撼、庄严、伟大、神圣
重构记忆	未来启示	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珍惜现在、感恩先辈
	历史反思	牢记历史、居安思危、正确路线、正义必胜
	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党认同

3.2.2 在场记忆

在场记忆指游客在场馆空间内通过与展陈环境、文物及他者互动所形成的体验记忆。在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中，此类记忆可区分为身体阈限与情境融入两种类型。身体阈限体现为游客通过具身沉浸所获得的阈限性体验，即以生物性与物理性的身体为中介，在空间移动中构建地方性感受，成为在场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入场馆后，全域沉浸式的数字科技让游客获得了非同一般的身体体验，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建立了一个阈限空间让游客全身心投入到其中，“自己在参观中完全被带入历史中，犹如身临其境，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冲锋、一起爬雪山，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场馆中很多科技元素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长征历史和长征文化，感觉非常的沉浸，非常好的一次体验”（R7），其二是精神感受，在场馆中，游客的情感经由身体中介的投射与红色记忆空间产生意义联结衍生出了多元的精神感受，“看到这些历史，看到他们用脚步走了大半个中国，就让人觉得非常震撼，他们为新中国牺牲了太多，他们太伟大了”（R21），游客的心理伟大、震撼等词汇体现了游客在场记忆的精神感受层面。游客通过具身体验和情感投射形成了游客的在场记忆，这是游客记忆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3.2.3 重构记忆

在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中，在在场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集体记忆在外部文化空间的刺激下被唤醒，游客自身偕行的集体记忆与游客在具身体验、情感投射中所获得的在场体验互相嵌入形成了独特的重构记忆。重构记忆包括未来启示、历史反思与国家认同。其一是未来启示，“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要走独立自主道路，现在的我们要学习这种态度”（R7）。其二是历史反思，“长征是地球上的红飘带，我们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R1）其三是国家认同“长征这段历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韧劲，我们党太了不起了！”（R5）。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场域理论，本研究对贵州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进行了实证考察。通过实地调研、内容分析与扎根

理论的综合运用,研究揭示:该场馆的记忆场域由“物理场”与“心理场”二元构成。前者借由时空叙事执行记忆的编码与生产;后者则依赖于游客的具身实践,通过记忆的生成及其与物理情境的互嵌而动态生成。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心理场记忆具体呈现为集体记忆、在场记忆与重构记忆三种类型。其建构遵循一个递进逻辑:游客带入的先在集体记忆,在场馆的具身体验中被激活、投射并转化为强烈的在场记忆;二者持续交织互嵌,最终促成个人记忆的重构与完整记忆场域的成型。本研究为理解红色文化场馆中记忆的复杂生产与传承机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照,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其与身份认同、文化传播等深层社会心理过程的关联。

参考文献:

- [1]武洪滨.博物馆叙事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36(01):183-192.
- [2]ZIEGLER M J, PEREZ V J, PIRLO J, et al. Applications of 3Dpaleontological data at the Florid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J].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0, 8: 1-20.
- [3]谢彦君. 旅游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8: 368.
- [4]邹润琪,孙佼佼,陈盛伟,等.红色博物馆的时空叙事与记忆场域建构——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J].*旅游学刊*,2023,38(07):36-51.
- [5]HALBWACHS M, 1992.On collective memor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HUTTON P H, 1993.History as an Art of Memory [M] .Hanover: University of Vermont.
- [7]KIM Y, RIBEIRO M A, LI G, 2022.Tourism memory, mood repair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93: 103369.
- [8]刘起林, 2015.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9]谢辉基,杨振之.论旅游体验研究中的“身体”现象及其认知[J].*旅游学刊*,2020,35(07):117-132.
- [10]曹善,许嘉轩. 博物馆文化传播创新实践研究——以广东省梅州市叶剑英纪念馆为例 [J]. 采写编, 2025, (10): 55-57.

Memory Construction of the Red Culture Venues of the Long March: A Case Study of the Red Ribbon Long March Cultural Digital Art Museum in Guiyang

Luo Jingteng, Dou Wenbo, Xu Yingjie

(Tourism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Abstract: Red culture venues represent complex socio-cultural spaces that integrate historical memory, cultural transmission,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identity formation. However,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memory production and the pathways of memory construction among visitors in venues centered on Long March culture remain underexplored.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study 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Guiyang "Red Ribbon" Long March Digital Art Museum, employing a mixed-method framework includ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content analysis, and grounded theory. Key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memory field of the venue is composed of both a "physical field" and a "psychological field"—the former encodes and produces memory through spatiotemporal narratives, while the latter arises from the formation of visitor memory and its b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with the physical field. (2) Within the psychological field, visitor memor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stinct types: collective memory, on-site memory, and reconstructed memory.

Keywords: Red Culture Venues;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Red Ribbon

消防救援外骨骼助力装备发展与应用研究

张小飞¹ 李渊^{2*} 于晟伟^{2*}

(1.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消防救援大队, 江苏 南通 226400, 2.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102202)

摘 要: 国际随着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型升级, 消防员面临的救援场景日益复杂, 单兵负荷持续增加, 职业损伤风险居高不下。外骨骼助力装备作为一种融合机械工程、材料科学、生物力学等多学科技术的人机协同系统, 通过结构支撑与动力辅助, 可有效缓解消防员的体力负荷、提升作业效率并降低运动损伤风险。本文系统梳理外骨骼助力装备的分类体系与技术特征, 重点分析其在消防救援中的负重搬运、破拆作业、水枪操作等典型场景的应用现状, 探讨当前存在的能源供给、人机协同、环境适应性等瓶颈问题, 并结合智能材料、柔性传感、人机共融等前沿技术, 展望其在未来消防救援体系中的发展趋势与应用前景, 以期为我国消防救援装备的智能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消防救援; 外骨骼; 助力装备; 人机协同; 职业防护

基金项目: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5 年科研预研项目(XFKYY202513)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0

一、概述

消防救援作为社会应急体系的核心构成, 常需在高温、浓烟、坍塌等极端环境下开展高强度作业。据相关统计, 消防员单兵防护装备与救援工具的总负荷常超过 30kg^[1], 且随着任务复杂化, 负荷呈持续增加趋势。长期负重作业易引发肌肉骨骼疾患, 突出表现为腰背劳损、膝关节损伤等职业性疾病^[2]。这不仅削弱了队伍持续作战能力, 也直接影响到救援效率与人员安全。因此, 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减轻消防员生理负荷、提升单兵机动性与作业耐力, 已成为消防科技创新的重要课题。

外骨骼助力装备源于军事与康复领域, 是一种可穿戴的机电一体化辅助系统。其通过机械结构传递或驱动装置输出助力, 增强穿戴者的力量、耐力与负重能力。早期外骨骼研究以军事应用为主导, 如美国伯克利仿生科技公司开发的 HULC (Human Universal Load Carrier) 系统, 可实现士兵负重 90 kg 条件下的长途行军^[3]。随着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 外骨骼逐渐向工业、医疗、民用等领域拓展。在工业场景中, 上肢外骨骼已用于汽车装配线, 降低工人肩肘关节负^[4]; 在康复医疗领域, 日本 HAL-5 系统通过肌电信号感知实现瘫痪患者的步态重建^[5]。近年来, 消防救援作为高风险、高负荷的特殊场景, 逐渐成为外骨骼技术落地的重要方向, 国内外研究机构相继推出针对消防作业的专用外骨骼原型系统。

尽管外骨骼技术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 但其在消防救援中的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 火场环境具有高温、高湿、复杂障碍等特点, 对装备的耐候性、灵活性与可靠性提出极高要求; 另一方面, 消防作业动作多样且非结构化, 如攀爬、破拆、拖拽等, 要求外骨骼具备良好的人机协同性与场景适应能力。未来消防救援外骨骼的发展, 将趋向于轻量化、智能化、高可靠三个维度: 通过复合材料与拓扑优化实现结构减重; 集成生物信号感知与自适应控制算法提升人机融合度; 发展高能量密度电源与多模驱动技术以保障长时间作业需求。此外, 外骨骼与消防防护服、通信设备、环境感知模块的系统集成, 也将成为构建“智能单兵作战系统”的关键路径。

二、分类与特点

作者简介: 张小飞 (1979-), 男, 研究方向为消防救援、救援装备;

李 渊 (1996-),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消防训练;

于晟伟 (1995-),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复杂网络、人工智能、高等数学教育。

通讯作者: 李渊, 于晟伟

外骨骼助力装备可按结构设计、驱动原理、功能应用等多种维度进行分类。如图 1 所示,按结构可分为上肢外骨骼、髋关节、下肢外骨骼与全身外骨骼;按驱动方式则主要分为无源(被动式)与有源(主动式)两大类;按功能则涵盖负重助力、运动辅助、康复训练等不同应用导向。在消防救援场景中,以上肢与下肢外骨骼最为常见,分别用于缓解手臂持械负荷与增强下肢搬运能力。



图 1 外骨骼助力装备按结构分类

无源外骨骼不依赖外部能源,通过机械结构(如弹簧、棘轮、连杆)实现人体运动能量的储存与释放,具有结构简单、质量轻、可靠性高的特点。例如,如图 2 所示,湖北工业大学团队研发的无动力髋关节助力外骨骼,通过三维铰接机构与扭力弹簧实现搬运作业中的腰部助力^[6];重庆牛迪科技公司推出的“普力(PULLE)”下肢外骨骼,采用偏心轮与高分子材料实现站立时 50%的负荷转移,整机质量仅 4.5 kg^[7]。这类装备虽助力效果有限,但在断电、高温等恶劣环境下表现出良好的环境鲁棒性,适用于消防员长时间穿戴与基础负荷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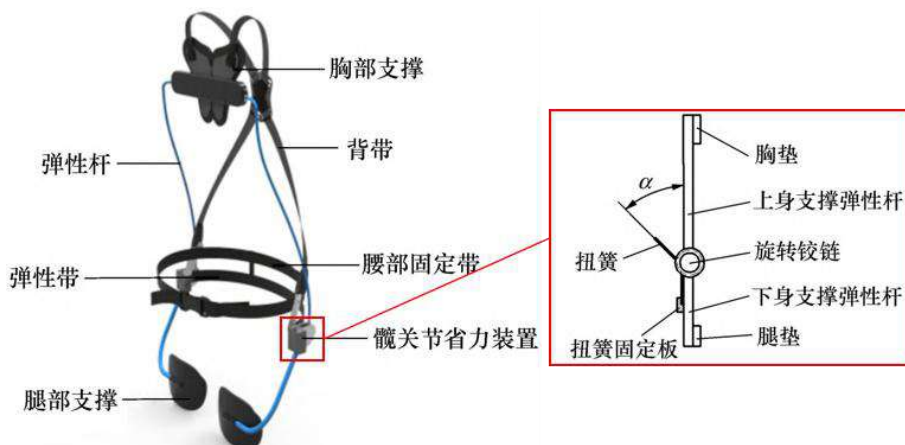


图 2 无动力髋关节助力外骨骼及其省力关节结构示意图

有源外骨骼则依赖电机、液压或气压驱动,通过传感器实时感知人体运动意图,并提供主动助力。其助力效果显著,可控性强,但结构复杂、质量大、依赖持续能源供给。法国 RB3D 公司开发的 HERCULE 外骨骼采用液压驱动与运动感知技术,可承载 100 kg 以上负荷,适用于消防员重装备搬运^[8]。中国科学院研制的 EXOP-1 下肢外骨骼则集成 22 个传感器与 6 个驱动器,虽自重达 20 kg,但可提供 70 kg 的负重助力^[9]。值得指出的是,现有有源外骨骼在火场高温环境下电池安全性与驱动系统可靠性仍待进一步验证,其实际应用尚处样机测试阶段。

三、在消防救援中的应用

消防救援外骨骼主要应用于高层建筑负重救援、破拆作业、训练评估、水枪辅助支撑三大场景,旨在通过外力辅助降低消防员关键肌群与关节的负荷强度,提升作业持久力与操作精度。

在负重救援场景中,消防员常需搬运呼吸器、液压破拆工具、救援担架等重型装备。下肢外骨骼通过将负载传递至地面,有效缓解腰背与膝关节压力。王正斌^[10]设计的消防下肢外骨骼采用拓扑优化与 7075 铝合金框架,在实现 19.6%轻量化的同时,满足 1700 N 载荷下的强度要求;其 ADAMS 仿真显示,穿戴后髋关节力矩显著降低,步态协同性良好。此类装备尤其适用于地震、山岳等车辆无法抵达的救援现场,可增强单兵物资输送能力。



图3 消防下肢外骨骼助力方式、结构及其设计渲染图

传统破拆工具操作空间受限,且长时间维持弯腰、跪姿等非标准姿势易导致腰部损伤。浙江消防总队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发的可折叠上肢外骨骼,采用铰链式连杆结构,可在宽度不足80cm的空间内展开作业^[1]。该装备肩关节设计具有5个自由度,肘关节采用可变传动比机构,在狭小空间内仍能提供最大 $180\text{N}\cdot\text{m}$ 的输出扭矩。实验数据显示,在模拟坍塌救援任务中,穿戴外骨骼的消防员完成混凝土板破拆任务的时间缩短约25%,腰部竖脊肌的表面肌电信号幅值降低约35%。但研究也指出,当前系统的力反馈精度在高温环境下会下降约18%,这暴露出传感器耐候性的技术瓶颈。

破拆作业依赖于上肢爆发力与持续施力能力,易导致肩肘关节疲劳甚至损伤。上肢外骨骼通过机械臂增强力矩输出,使消防员可更轻松操作液压剪、扩张器等工具。李艳志等^[12]针对消防水枪后坐力问题研发的上肢外骨骼,采用碳纤维支撑板与尼龙背心结构,AnyBody生物力学仿真显示,穿戴后肩部三角肌激活度下降约19.36%,且双侧肌肉负荷趋于均衡。该研究表明,外骨骼不仅可降低肌电活动水平,还能改善单侧施力导致的姿态代偿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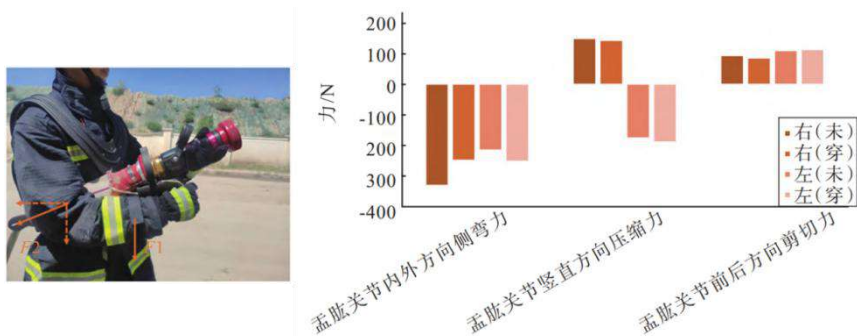


图4 未穿与穿戴消防外骨骼时工作状态下的肩关节反作用力

水枪辅助支撑是灭火战斗中的典型负荷场景。消防水枪在高压射水时产生持续后坐力(通常超过250N),长时间把持易导致上肢疲劳。李艳志等^[13]设计的消防水枪外骨骼通过L形合金支架与背部承载结构,将水枪重力与后坐力分散至躯干,ABAQUS应力分析表明其最大形变仅 $4.835 \times 10^{-3}\text{mm}$,具备良好的结构可靠性。实际测试中,消防员反馈穿戴前后臂负荷明显减轻,且双侧肩部受力更均衡。这为长时间持枪灭火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

在化工火灾、核生化事故等特殊救援场景中,消防员需穿戴重型防护服,活动能力严重受限。南京消防科研所研制的耐腐蚀外骨骼框架,采用钛合金表面等离子喷涂陶瓷涂层,可在腐蚀性环境中连续工作4小时以上^[14]。该设计的一个关键突破是无润滑轴承系统,所有转动副均采用自润滑复合材料,避免了传统润滑油在高温下挥发或凝固的问题。

总体而言,外骨骼在消防救援中的应用已从概念探索走向原型验证,在降低生理负荷、改善作业姿态方面展现出积极效果。然而,现有系统多针对单一场景设计,缺乏多任务适应性,且在实际火场环境中的耐久性与可靠性仍有待大规模实战检验。

四、应用不足与展望

尽管外骨骼助力装备在消防救援中展现出潜在价值,但其实际推广仍面临三方面突出瓶颈:一是能源与动力系统制约,有源外骨骼依赖电池或液压动力,存在续航短、高温安全性差等问题,而无源外骨骼助力效果有限;二是人机协同性能不足,现有系统多基于预设步态或固定轨迹,难以适应消防员跨越、蹲伏、攀爬等非结构化动作,易产生运动干涉;三是环境适应性与穿戴舒适性欠缺,外骨骼在高温、潮湿、多尘环境中易出现故障,且刚

性结构长期穿戴易导致局部压迫与皮肤损伤。

消防救援外骨骼将朝轻量化集成、智能自适应与多场景通用三个方向深化发展。一方面,随着碳纤维复合材料、柔性驱动技术(如气动人工肌肉)的成熟,外骨骼在重量、舒适性与环境适应性上将有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基于肌电、惯性等多模态传感的人机交互算法,可实现更自然、更精准的运动意图识别与助力控制。此外,模块化设计将使同一外骨骼平台能够通过快速更换组件,适配负重、破拆、射水等不同任务需求。长远来看,外骨骼将与智能头盔、生命体征监测、环境感知终端深度融合,构成消防员“数字孪生”作战系统,实现体能增强、状态监控与指挥调度的全方位提升,从而推动消防救援向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向演进。

参考文献:

- [1] 陈昱兴, 刘鸣, 王博崇, 等. 智能消防外骨骼的材料研究[J]. 今日消防, 2021, 6(6): 34-35.
- [2] 焦爱红, 蔡创生. 消防员常训科目训练致伤分析[J].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15, 34(3): 379-383.
- [3] Robert B. Robotic exoskeletons: a review of recent progress [J]. Industrial Robot, 2015, 42(1): 5-10.
- [4] Spada S, Ghibaudo L, Gilotta S, et 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pplicability of a Passive Upper-limb Exoskeleton in Automotive Industry[J]. Procedia Manufacturing, 2017, 11: 1255-1262.
- [5] Sankai Y. Leading Edge of Cybernetics: Robot Suit HAL [C]// SICE-ICASE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2006: 225-229.
- [6] 王艺澜, 涂细凯, 徐一鸣, 等. 一种无源髋关节助力外骨骼设计与人机工程研究[J]. 机械科学与技术, 2022, 41: 43-48.
- [7] 李强, 周加永, 赵文彬, 等. 无源被动外骨骼系统研究现状与关键技术分析[J]. 机床与液压, 2021, 49(5): 156-161.
- [8] 周加永, 莫新民, 张昂, 等.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研究现状与关键技术分析[J]. 兵器装备工程学报, 2016, 37(10): 99-104.
- [9] 中科院研制意念控制外骨骼: 可一拳打穿墙体[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4(20): 22-25.
- [10] 王正斌. 消防下肢外骨骼设计与优化[D]. 天津科技大学, 2024.
- [11] 陈涛, 王勇, 刘洋. 狭小空间救援上肢外骨骼机构设计与实验研究[J]. 机械工程学报, 2023, 59(11): 205-213.
- [12] 李艳志, 王建敏, 庄延杰, 等. 消防水枪外骨骼的生物力学分析[J].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23, 42(6): 799-803.
- [13] 李艳志, 白小龙, 王建敏. 消防水枪辅助支撑外骨骼的设计与可靠性分析[J].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24, 43(10): 1459-1464.
- [14] 王建国, 孙磊, 陈旭. 耐腐蚀消防外骨骼设计与环境适应性研究[J]. 材料科学与工艺, 2022, 30(3): 88-95.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xoskeleton Assisted Equipment for Fire Rescue

Zhang Xiaofei¹, Li Yuan^{2*}, Yu Chengwei^{2*}

¹ Rudong County Fire and Rescue Brigade, Jiangsu, Nantong 226400, China

²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towards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sponse and major emergency management," firefighters are increasingly facing complex rescue scenarios, with continuous increases in individual loads and persistently high risk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As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system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 such a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and biomechanics, exoskeleton assistive equipment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firefighters' physical burdens, enhanc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musculoskeletal injuries through structural support and power assist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technical features of exoskeleton assistive equipment, with a focus on analyzing their application status in typical fire rescue scenarios such as load carrying, breaching operations, and water hose handling. It explores existing bottlenecks in energy suppl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while incorporat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smart materials, flexible sensing, and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to envision their development trend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future fire rescue systems.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fire rescue equipment in China.

Keywords: National Fire and Rescue; Exoskeleton; Assistive Equipment;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桨板热”的时代动因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李中华

(成都大学 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近年来, 桨板运动在中国迅速走红,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量爱好者, 形成了“桨板热”现象。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 探析“桨板热”的时代动因、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高质量发展路径。时代动因: 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环境因素、法律因素。存在的问题: 安全隐患与管理问题、专业人才短缺、品牌建设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路径: 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强化品牌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 桨板; 时代动因; 高质量发展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1

1 前言

桨板运动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夏威夷的威基基海滩, 由冲浪运动演变而来[1]。英文称 Stand Up Paddle, 简称 SUP。这是一项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风靡的水上运动, 有静水、冲浪、白水、竞速、桨板瑜伽等多种参与方式。由于其高参与度和易上手性而成为越来越多水上爱好者的选择[2]。2009 年, 国内冲浪运动机构“冲浪中国”首次将桨板引入国内[3]。近年来, 桨板运动在中国迅速走红,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量爱好者, 形成了“桨板热”现象。2024 年 10 月 26 日晚, 在云南大理举行的 2024 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开幕式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鸪发布了《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4)》, 指出: 全国冲浪、桨板项目消费人群超过 100 万, 整体消费规模超过 10 亿元[4]。在“桨板热”的现象下, 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如安全事故频发、行业不规范、专业人才短缺、品牌建设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等, 本研究旨在探究“桨板热”的时代动因, 厘清其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高质量发展路径。

2 “桨板热”的时代动因 (PESTEL 模型)

2.1 政策因素 (Policy)

我国桨板运动已初步建立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管理体系, 对其快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5]。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水上运动的发展, 陆续出台了《水上运动产业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25 年)》、《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与服务提升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关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指导意见》等相关的政策, 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施, 都为桨板运动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2 经济因素 (Economy)

2025 年 2 月 28 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95749 元, 比上年增长 5.1%。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314 元, 比上年增长 5.3%,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227 元, 比上年增长 5.3%^[6]。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均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对体育消费的需求日益旺盛。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后, 更加注重追求健康、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愿意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体育健身、休闲旅游等领域。桨板运动作为一种新兴的时尚户外运动, 融合了运动健身、亲近自然、社交娱乐等多种元素, 正好契合了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同时, 桨板运动的消费门槛相对较低, 一套入门级桨板器材价格在 500-2000 元左右, 一次桨板体验课程或租赁服务费用在 50-100 元之间, 大多数消费者能够接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升

作者简介: 李中华(1988—),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休闲体育、体育旅游、户外运动

通讯作者: 李中华

级为“桨板热”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市场需求支撑。

2.3 社会因素 (Society)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临的工作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对缓解压力、放松身心的需求愈发强烈。户外运动成为人们释放压力、亲近自然的重要选择。桨板运动在水面上进行,参与者能够远离城市喧嚣,沉浸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享受宁静与放松。同时,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运动锻炼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各类体育运动。桨板运动作为一项全身性的运动,能够有效锻炼核心肌群、上肢力量与身体平衡能力,满足了人们的健身需求。此外,桨板运动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通过参与桨板俱乐部活动、赛事等,爱好者们能够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展社交圈子,增强人际交往。这种社交娱乐功能进一步推动了桨板运动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与普及,成为“桨板热”形成的重要社会因素。

2.4 技术因素 (Technology)

桨板装备制造技术的不断革新,为桨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材料方面,新型复合材料的应用使得桨板更加轻便、坚固、耐用。碳纤维材料的桨板相比传统塑料桨板重量减轻了30%以上,同时强度大幅提升,有效提高了桨板的性能与使用寿命。充气桨板技术的成熟,解决了传统硬板携带不便的问题。现在的充气桨板采用高强度PVC材料,配合电动充气泵,几分钟内即可完成充气,放气后可轻松收纳进背包,方便携带与运输,极大地提高了桨板运动的便捷性,降低了桨板运动的参与门槛。

2.5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

我国拥有丰富的江河湖泊水域资源,全国大小河流总长达43万公里,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多条,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约1580条,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大江河有79条;全国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581个,总面积68671.58平方公里;面积在1-10平方公里的湖泊约3000个左右,这些都为桨板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各地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质不断提升,为桨板运动创造了更加优良的环境。例如,北京通过实施河长制、水污染治理等措施,城市内河水质明显好转,北京水务部门持续加大河湖空间开放共享力度,不断满足市民亲水需求,左安门护城河、南长河等水域已成为市民参与桨板运动的热门地点。

此外,各地积极建设水上运动中心、码头、更衣室、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为桨板爱好者提供了便利的配套服务,进一步促进了桨板运动在不同环境下的广泛开展。

2.6 法律因素 (Law)

在桨板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也在不断完善,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22年7月19日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心为进一步规范冲浪(桨板)项目全民健身专业技能的培训工作,促进冲浪(桨板)项目有序、健康的开展,制定了《全国冲浪(桨板)项目专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对桨板项目全民健身教练员技能培训内容、考核和组织管理,申办流程,讲师选派与管理,场地设施与安全管理,教练员技能培训班承办单位,学员技能培训机构开展爱好者运动水平等级培训,培训学员,监督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要求。在赛事管理方面,出台了《桨板比赛办赛指南》、《桨板比赛参赛指引》,确保桨板赛事公平、公正、有序进行。同时,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水域使用、水上交通安全等相关法规,明确了桨板运动在不同水域的准入条件、活动范围与安全要求,加强了对桨板运动的监管,保障了参与者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法律规范的逐步完善,为“桨板热”的持续升温提供了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3 “桨板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安全隐患与管理问题

桨板运动在开放水域进行,面临诸多安全风险。部分桨板爱好者安全意识淡薄,参与活动时不按规定佩戴救生衣,据调查,约30%的业余爱好者在非赛事活动中存在不规范佩戴救生衣的情况。一些桨板俱乐部为追求经济效益,在教学培训过程中简化安全知识讲解与技能培训环节,导致学员对桨板运动安全风险认识不足。同时,由于桨板运动发展迅速,相关管理规范与监管机制尚未完全健全,部分水域存在管理混乱的现象,如无资质经营的桨板俱乐部随意在公共水域开展活动,桨板、皮划艇、摩托艇、动力冲浪板等不同水上运动项目在同一水域交叉作业,缺乏有效的安全隔离与管理措施,容易引发安全事故。近年来,因桨板运动导致的溺水、碰撞等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如2025年5月24日贵州一名叫杨玲的女子带着二十多岁的儿子到贵州凯里舞阳河上游的一段支流划桨板,为救儿子遇难。桨板事故给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桨板运动的健康发展。

3.2 专业人才短缺

桨板运动的专业人才包括高水平教练、裁判、赛事组织者等。目前,我国桨板运动专业人才严重短缺,无法满足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在教练方面,专业桨板教练数量有限,且部分教练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目前全国桨板初级教练员共计2200名,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求。许多教练缺乏系统的教学培训和专业知识,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服务,影响学员的学习效果和运动体验。在裁判和赛事组织方面,专业人才同样稀缺,导致赛

事组织不够规范,裁判执裁水平参差不齐,影响赛事的公正性和专业性,制约了桨板运动竞技水平的提升和赛事品牌的打造。

3.3 品牌建设不足

我国桨板运动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品牌建设相对滞后。在装备制造领域,国内品牌大多集中在中低端市场,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特色。与国际知名品牌相比,国内桨板品牌在设计研发、产品质量、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在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在赛事品牌方面,除了少数国家级赛事有一定知名度外,多数地方赛事影响力较小,缺乏品牌包装和市场推广,难以吸引赞助商和观众,赛事商业价值难以充分挖掘。此外,桨板俱乐部等服务机构也普遍缺乏品牌意识,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无法形成品牌效应,不利于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3.4 区域发展不均衡

桨板运动在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态势。沿海地区凭借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发达的经济条件,桨板运动起步早、发展快,产业规模较大,基础设施完善,赛事活动丰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生态。而内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水域资源相对有限,经济基础薄弱,对桨板运动的宣传推广不足,民众认知度较低,桨板运动发展相对缓慢,产业规模较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专业俱乐部和赛事活动数量较少。这种区域发展不均衡不仅影响了桨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也不利于实现桨板运动产业的整体高质量发展。

4 “桨板热”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4.1 构建安全保障体系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桨板运动的安全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明确桨板运动的安全管理责任主体和管理规范。建立健全水域使用管理制度,划定桨板运动专用区域,设置明显的安全标识和警示标志,加强对水域环境的监测和管理,确保运动区域的安全性。同时,加大对无资质经营俱乐部的整治力度,规范市场秩序。

桨板俱乐部要强化安全管理意识,将安全培训纳入教学课程体系,增加安全知识讲解和技能培训时长,确保学员掌握基本的安全常识、自救互救方法和桨板操作规范。严格要求学员在活动过程中规范佩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并配备专业的安全保障人员,在运动区域进行实时巡逻和安全指导。此外,可引入智能安全管理系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桨板运动进行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提高安全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4.2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在高校体育专业中增设桨板运动相关课程和专业方向,构建完善的桨板运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高校可与桨板俱乐部、赛事组织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践机会,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素养。

完善桨板教练、裁判等专业人才的培训和认证体系,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或行业协会组织开展专业培训课程,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授课,确保培训内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培训课程应涵盖桨板运动理论知识、教学方法、安全管理、竞赛规则等方面,培训结束后进行严格的考核,考核合格者颁发专业资质证书,提高专业人才的整体水平。同时,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提高专业人才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人从事桨板运动相关工作。

4.3 强化品牌建设

桨板装备制造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计理念,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质。注重产品创新,开发具有特色和差异化的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加强品牌营销和推广,通过参加国际体育用品展会、举办新品发布会、开展线上线下营销活动等方式,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树立品牌文化和价值观,增强品牌的情感共鸣和市场竞争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桨板品牌。

赛事组织者要注重赛事品牌的打造,提高赛事的专业性和观赏性。加强赛事策划和包装,引入专业的赛事运营团队,提升赛事的组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通过与媒体合作,扩大赛事的宣传推广范围,提高赛事的曝光度和影响力。积极吸引赞助商和合作伙伴,开发赛事商业价值,实现赛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鼓励各地结合本地特色,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桨板赛事品牌,如结合当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举办特色赛事,提升赛事的独特性和吸引力。

桨板俱乐部要树立品牌意识,加强服务标准化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注重客户体验,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加强品牌宣传,利用社交媒体、口碑传播等方式,提高俱乐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形成品牌效应,吸引更多客户。

4.4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政府部门应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加大对内陆地区桨板运动发展的支持力度,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倾斜。鼓励内陆地区因地制宜开发水域资源,建设桨板运动基础设施,打造桨板运动特色项目和品牌赛事。

同时,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产业协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例如,沿海地区可以为内陆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内陆地区可以为沿海地区提供市场拓展空间,共同推动桨板运动产业的均衡发展。

加强对内陆地区桨板运动的宣传推广,提高民众对桨板运动的认知度和参与度。通过举办桨板运动体验活动、公益讲座、校园推广等方式,普及桨板运动知识,培养民众的运动兴趣。同时,结合当地旅游资源,开发桨板运动旅游产品,将桨板运动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以旅游带动桨板运动发展,以桨板运动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实现区域经济和体育事业的协同发展。

5 结论

综上所述,“桨板热”在我国的兴起是政策、经济、社会、技术、环境和法律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桨板运动的快速发展为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安全隐患、专业人才短缺、品牌建设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通过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强化品牌建设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高质量发展路径,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促进桨板运动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入推进,桨板运动有望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于桨板运动发展的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入,持续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及时发现新问题、提出新对策,为桨板运动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American Canoe Association.Types of courses[EB/OL].(2024-01-28)[2025-04-29].<https://americancanoe.org/education/types-of-paddling-clusses-and-courses/>.
- [2]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水上运动课程组.桨板[EB/OL].(2021-08-20)[2025-04-29].<https://tyjxb.xmu.edu.cn/info/1817/11546.htm>
- [3] 百度百科.2009冲浪中国嘉年华[EB/OL].(2009-10-05)[2025-04-29].<https://baike.baidu.com/item/2009%E5%86%B2%E6%B5%AA%E5%98%89%E5%B9%B4%E5%8D%8E/10012419>.
- [4] 李映青.《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4)》发布[EB/OL].(2024-10-27)[2025-04-2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4066927054839684&wfr=baike>
- [5] 白志坚,薛昭铭,胡永红,等.我国桨板运动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25,(03):39.
- [6]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02-28)[2025-04-29].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Study on the Era's Motivation of 'Paddleboard Fever' and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 Zhonghua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addleboarding has rapidly gained popularity in China, attracting a large following with its unique appeal and sparking a 'paddleboarding craze'.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ontemporary drivers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of this phenomenon, while proposing pathway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Drivers: Policy guidance, economic impetus, societal dem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optimisation, and legal safeguards. Existing Challenges: Safety hazards and management issues, shortage of specialised personnel, inadequate brand development, and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ways: Establishing a safety assurance system, enhancing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strengthening bra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paddleboard; epochal mot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香港期货交易所人民币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 ——基于 VECM 模型

冯鹏龙¹ 张菡²

(1.庆南大学, 韩国 昌原 51767, 2.灵山大学, 韩国 釜山 48015)

摘 要: 本文以香港期货交易所 (HKEX) 上市的人民币期货为研究对象, 选取了 2014 年 1 月 2 日至 2025 年 8 月 18 日的期货主连合约价格和离岸、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作为样本, 构建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实证结论表明: 香港人民币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中起主导作用, 贡献度达 44.8%, 高于在岸 (35.4%) 和离岸市场 (19.8%), 具备价格引领功能。本研究证实了香港人民币期货市场具备有效的价格发现功能, 其在离岸人民币汇率定价中发挥着关键的先导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市场参与者利用期货价格进行预测和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对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及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人民币期货; 汇率; VECM; 价格发现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2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与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 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全球金融格局演变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进程中, 建立一个高效、成熟的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至关重要。香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其人民币产品生态系统的完善性与有效性, 直接关系到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与影响力。其中, 香港期货交易所 (HKEX) 推出的人民币期货合约, 作为标准化的衍生品工具, 不仅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汇率风险管理手段, 更被寄予厚望——在人民币汇率价格发现机制中扮演引领角色。

价格发现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 它指的是市场通过交易活动将分散信息汇聚并形成均衡价格的过程。相较于即期市场, 期货市场因其高杠杆、低交易成本、前瞻性交易等特点, 理论上应能更快地吸收新信息, 从而在价格发现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受到在岸货币政策与离岸市场力量的双重影响, 其价格发现过程更为复杂。因此, 在香港人民币期货市场的实际运行中, 离岸人民币期货是否确实有效地发挥了其理论上的价格发现功能? 贡献度究竟如何? 对这一问题的实证检验, 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更对政策制定与市场实践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尽管已有部分文献探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价格发现, 但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即期市场或远期市场, 针对标准化期货合约的深入研究, 尤其是在采用更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 尚存探索空间。有鉴于此, 本文聚焦于香港期货交易所的人民币期货, 旨在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系统地实证检验该期货品种的价格发现功能。本文期望能为准确评估香港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坚实的经验证据, 并为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

2、文献综述

中国国内关于商品期货价格分析方面的文献比较多, 多集中于农产品、铁矿石、石油和煤炭等方面, 而货币期货的研究文献比较少。张文龙等 (2014) 通过对国际上煤炭期货与现货价格进行 VAR 模型实证分析, 认为国际上煤炭期、现货价格之间在长期关系上呈现现货引导期货的现象。韦立坚和大卫等 (2022) 通过利用 2010

作者简介: 冯鹏龙(1995—),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人民币国际化、期货、汇率;

张 菡(1999—), 女, 本科。

通讯作者: 冯鹏龙

年4月16日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到2015年9月2日股指期货受限前的毫秒级别高频数据分析发现,高频交易对股指期货的永久价格冲击的影响显著为正,促进了价格发现。潘冬涛、马勇和刘云涛(2023)分别以我国沪深300、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和现货收益率作为样本,探究我国股指期货和现货的跳跃自刺激行为以及相互之间的跳跃交叉刺激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股指期货在跳跃上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期货价格的跳跃能够引导现货价格发生跳跃,而现货价格跳跃对期货价格跳跃的引导作用则不明显。Wang、Yang和Fei(2024)在研究人民币离岸汇率与股指期货的关联时,间接揭示了人民币衍生品市场定价的重要特征。通过VAR-GARCH与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发现CNH汇率对期货市场的波动具有显著的预测性与主导性,说明离岸人民币价格不仅反映外汇市场预期,也在更广泛的衍生市场中承担价格发现功能。高辉和高文玉(2025)采用协整相关理论及GARCH类模型研究国际化商品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与价格影响力,实证研究发现,五种国际化期货(原油、20号天然橡胶、低硫燃料油、国际铜、集运指数(欧线))均具有较强的价格发现功能。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商品期货定价及价格发现的文献比较多,但是关于人民币期货价格发现的文献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采用VECM模型研究香港期货交易所的人民币期货价格发现功能。

3、数据及模型的构建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期货价格选取来自HKEX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合约的结算价格,交易数据来自HKEX官方网站(<https://www.hkex.com.hk>)和wind数据库,离岸人民币现货价格(CNH即期汇率)来源香港金融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s://www.hkma.gov.hk>),在岸人民币期货价格(CNY即期汇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即期汇率。

在论文研究中,使用主力合约和使用主连合约进行分析的结论会有差异。主力合约的缺点是样本期较短(最多半年到一年),不够支撑长期的统计建模。而主连合约(连续合约,主力换月)能得到比较长的连续价格序列,适合做长期回归、协整、GARCH这类需要足够样本的模型。所以需要用移动调整法(Ratio/差值调整)对主力合约的离岸人民币期货价格数据进行处理,把新合约的价格平移或按比例调整,使其与旧合约衔接,得到主连合约的数据。这样才能消除跳跃,得到平滑的“连续价格”。

3.2 模型构建

$$\Delta P_t = \alpha \beta' P_{t-1} + \sum_{i=1}^{k-1} \Gamma_i \Delta P_{t-i} + \mu + \varepsilon_t$$

三个变量展开式(人民币期货、在岸人民币汇率价格、离岸人民币汇率价格):

$$\begin{cases} \Delta p_{f,t} = \alpha_f ECT_{t-1} + \sum_{i=1}^{k-1} \gamma_{f,i} \Delta P_{t-i} + \varepsilon_{f,t} \\ \Delta p_{cny,t} = \alpha_{cny} ECT_{t-1} + \sum_{i=1}^{k-1} \gamma_{cny,i} \Delta P_{t-i} + \varepsilon_{cny,t} \\ \Delta p_{cnh,t} = \alpha_{cnh} ECT_{t-1} + \sum_{i=1}^{k-1} \gamma_{cnh,i} \Delta P_{t-i} + \varepsilon_{cnh,t} \end{cases}$$

其中:

$$ECT_{t-1} = \beta' P_{t-1}$$

4、实证结果

4.1 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从下面检验中得出ADF统计量分别约-2.11、-2.19、-2.45, p值分别约0.239、0.211、0.128的结果,ADF检验值大于各个显著水平临界值,且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大于0.1,三个水平价是非平稳I(1)序列,均不拒绝单位根,说明不能拒绝原序列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假设。而收益序列中ADF统计量分别约-9.21、-9.74、-8.77, p值约0.00000,三个水平价是强平稳I(0)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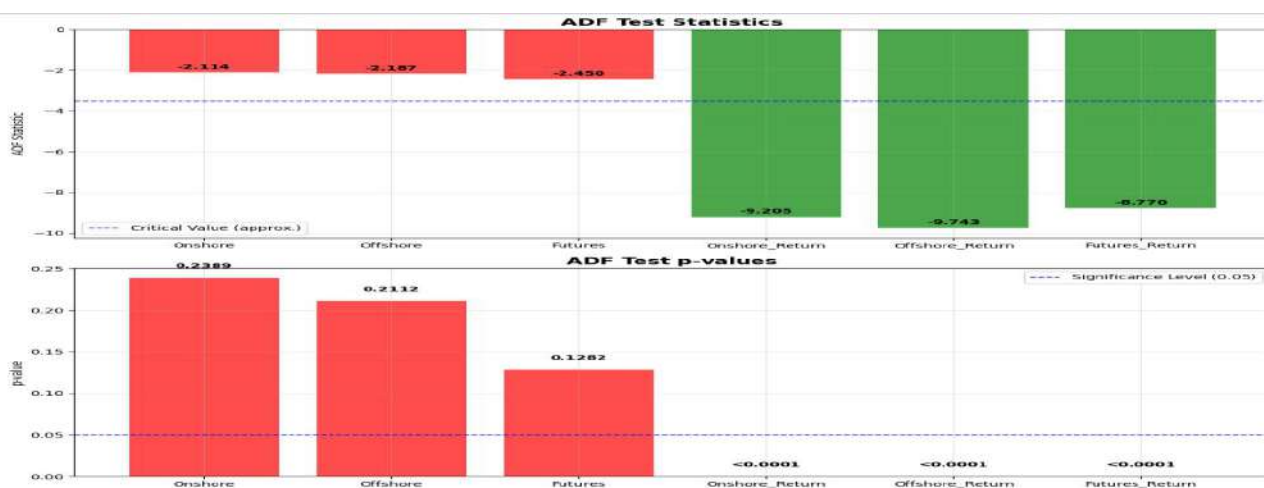


图 1 ADF 检验结果图

4.2 Johansen 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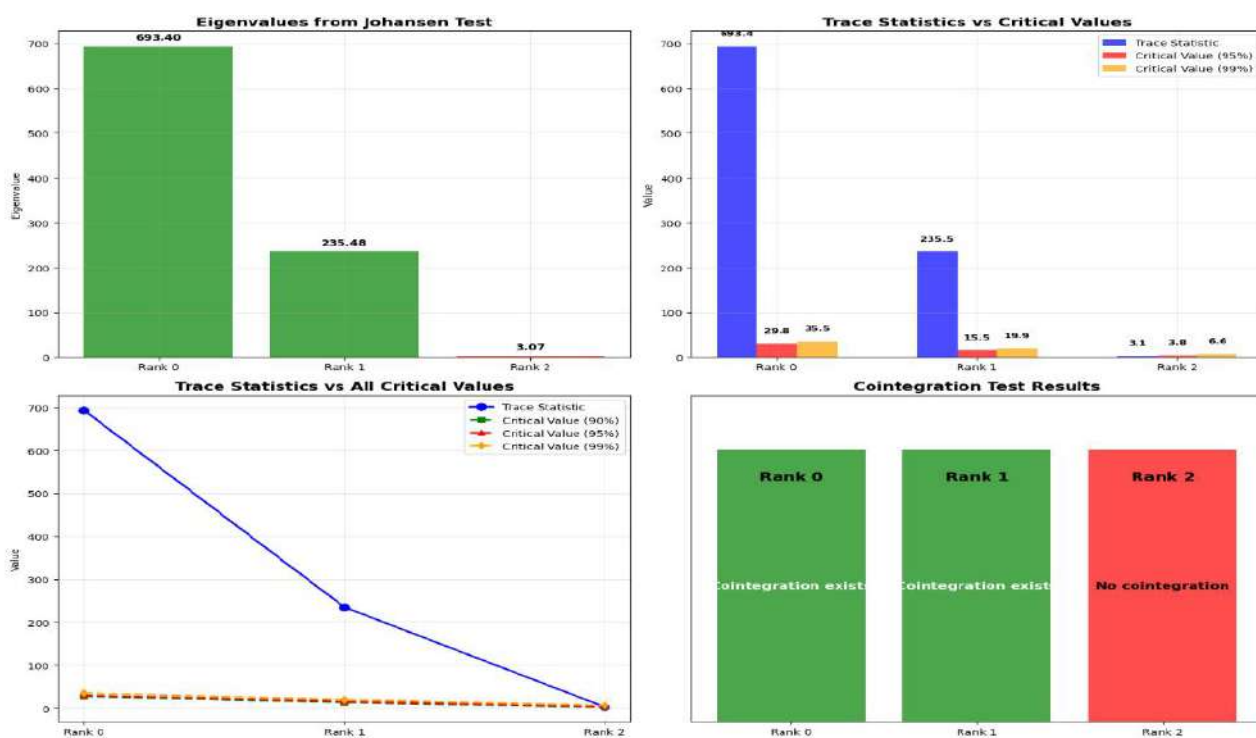


图 2 Johansen 检验结果图

表 1 Johansen 检验

Rank	Trace Statistic	Critical 95%	Critical 99%	Result
Rank 0	693.40	29.80	35.46	Cointegration exists
Rank 1	235.48	15.49	19.93	Cointegration exists
Rank 2	235.48	3.84	6.63	No cointegration

特征根分别为 693.4、235.5、3.1；数值越大，说明对应的协整关系越显著；从数值看，第一个和第二个非常强（远大于临界值）。

可以看出，存在两个显著的协整关系（在岸人民币与人民币期货，离岸人民币与人民币期货），表明在这三个变量（期货、在岸人民币、离岸人民币）之间存在两个长期均衡约束关系，三个市场（在岸、离岸、期货）价格长期上是相互联动的。

4.3 VECM 模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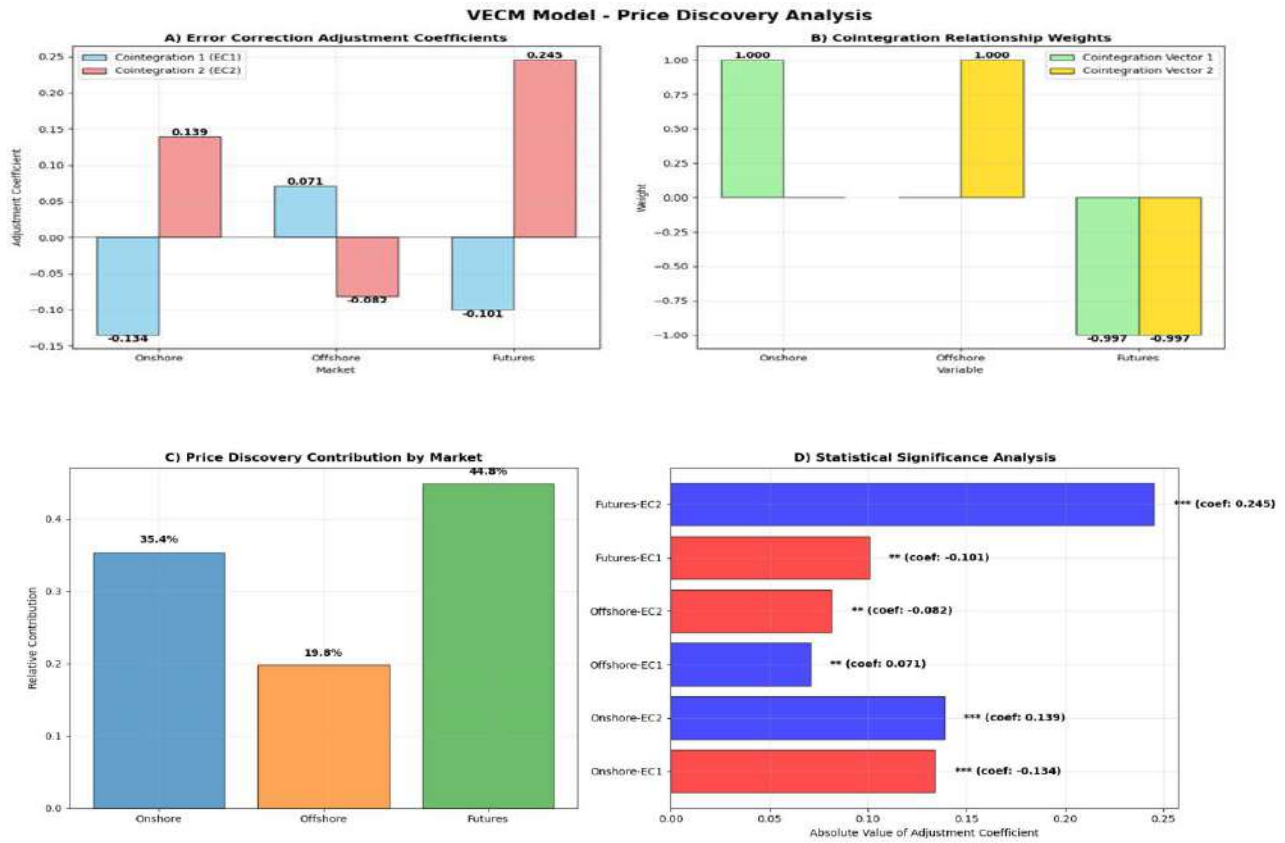


图 3 VECM 模型实证结果图

VECM MODEL-PRICE DISCOVERY ANALYSIS RESULTS

- ADJUSTMENT COEFFICIENTS(Error Correction Terms)
Onshore: EC1=-0.1341***,EC2=0.1388***
Offshore:EC1=0.0708**,EC2=-0.0818***
Futures:EC1=-0.1007**,EC2=0.2453***
-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S(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1: 1.0000×Onshore -0.9966×Futures
Relationship 2: 1.0000×Offshore -0.9972×Futures
- PRICE DISCOVERY CONTRIBUTION:
Onshore:35.4%
Offshore:19.8%
Futures: 44.8%
-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Significant at 1% level($p<0.01$)
**:Significant at 5% level($p<0.05$)
- KEY INTERPRETATIONS:
 - Futures market shows strongest price discovery role
 - All markets respond significantly to equilibrium deviations
 - Two distinct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s identified
 - Model confirms valid long-run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kets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实证检验了在岸人民币市场、离岸人民币市场与人民币期货市场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价格发现机制。首先，模型确认了三个市场之间存在两个显著的协整关系，这表明尽管受到不同市场环境及监管政策的影响，在岸、离岸及期货人民币价格之间存在着稳定、可靠的长期均衡关联。这种内在的均衡力量是市场套利和行为趋同的基础。其次，在价格发现贡献度的分析中，人民币期货市场扮演了主导角色，其贡献度高达 44.8%。这表明期货市场在吸收新信息和形成新价格方面最为高效，是整个人民币价格体系中的“价格领导者”。这很可能源于期货市场更高的流动性、更透明的交易机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参与者基础。相比之下，在岸市场虽受一定管制，但仍表现出重要的价格影响力（贡献度为 35.4%），体现了其作为人民币定价基准的核心地位。而离岸市场的贡献度相对最低（19.8%），其价格更多表现为对在岸及期货市场价格跟随与调整。最后，误差修正项的结果显示，所有市场都对偏离长期均衡的状态做出显著且迅速的调整。特别是期货市场表现出最强的调整力度，这进一步佐证了其在价格发现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是恢复和维持系统均衡的关键力量。

综上所述，人民币的国际化定价已形成一个以期货市场为引领、在岸市场为基石、离岸市场为补充的多元动态体系。决策者在关注在岸汇率稳定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以更全面地理解和预判人民币汇率的整体走势。

参考文献:

- [1] 张文龙, 裴卓英, 沈沛龙. 国际煤炭现货与期货价格关联性研究[J]. 生产力研究, 2014(11): 133-136, 160.
- [2] 韦立坚, 张大卫, 骆兴国, 张洋锋. 股指期货市场的高频交易与价格发现[J]. 管理科学学报, 2022, 25(01): 95-106.
- [3] 潘冬涛, 马勇, 刘云涛. 跳跃视角下的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23, 32(12): 124-130.
- [4] Wang, J., Yang, Z., & Fei, Z. (2024).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change rate of offshore RMB and the stock index futures. *Mathematics*, 12(5), 695.
- [5] 高辉, 高文玉. 国际化商品期货价格发现及影响力的实证研究[J]. 中国证券期货, 2025(05): 4-21.

Research on the Discovery Function of RMB Futures Prices on the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 Based on the VECM Model

Feng Penglong¹, Zhang Han²

¹ Kyungnam University, Changwon 51767, South Korea; ² Youngsan university, Busan 48015, South Kore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RMB futures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HKEX) and constructs a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based on the main contract prices and offshore/onshore RMB spot exchange rates from January 2, 2014, to August 18, 2025. Empirical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the Hong Kong RMB futures market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price discovery, contributing 44.8%, which is higher than both onshore (35.4%) and offshore markets (19.8%), and possesses price-leading functions.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Hong Kong RMB futures market possesses effective price discovery capabilities and plays a crucial leading role in offshore RMB exchange rate pricing. This conclusion not on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rket participants to use futures prices for predi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but also offers important policy insights for deepening RMB exchange rate marketization reform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offshore RMB center.

Keywords: RMB futures; exchange rates; VECM; price discovery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的系统分析

陶彦岑¹ 张文馨¹ 桂于婧¹ 陈颖洁¹

(1.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河西 300222)

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其 2025 年封关运作的战略部署正逐步落地,为跨境物流领域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其中,“零关税”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红利之一,凭借对进口商品关税的大幅减免、通关流程的简化优化以及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为航空快递枢纽的规划建设与高效运营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政策支撑与发展机遇。本文以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系统为核心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政策分析法与数据归纳法,系统梳理国内外跨境物流枢纽建设的相关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深入解读海南自贸港“零关税”及配套政策的核心内涵与实施路径,并基于大量行业数据与企业调研信息,从政策红利释放、系统构成维度、实践成效显现、国际对标分析及优化路径建议五个核心维度展开全面且深入的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系统通过构建“政策支撑-技术赋能-运营协同”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在提升通关效率、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扩大跨境贸易规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关时效较传统模式压缩 40% 以上,跨境物流企业综合运营成本平均降低 15%-20%,吸引了大量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电商平台入驻布局。然而,该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小跨境企业对“零关税”政策的适配性不足,存在政策理解不深、申报流程不熟悉、合规成本较高等问题;绿色物流转型进程相对滞后,航空运输环节的碳排放控制、包装材料的环保化应用以及循环物流体系的构建仍有待加强;枢纽配套服务体系不够完善,跨境金融、法律仲裁、物流信息共享等支撑服务的覆盖面与专业性不足;与国际一流航空快递枢纽相比,在航线网络布局、枢纽运营效率、智能化水平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结合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定位与产业需求,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一是强化政策精准赋能,搭建中小企业政策服务平台,简化申报流程,降低合规成本;二是加快绿色物流体系建设,推广环保包装与低碳运输技术,建立碳排放核算与激励机制;三是完善枢纽配套服务生态,整合跨境金融、法律、信息等服务资源,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四是对标国际先进经验,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提升枢纽智能化运营能力,加强国际物流合作与互联互通。本研究旨在为海南自贸港航空快递枢纽系统的持续优化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助力自贸港打造国际化、便利化、绿色化的跨境物流枢纽,推动我国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海南自贸港; 零关税; 航空快递枢纽; 跨境物流; 政策协同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3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加速融合,跨境电商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核心引擎。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势头迅猛,2024 年交易额突破 15 万亿元,航空快递凭借高效快捷的优势,在跨境物流市场占比达 35% 以上^[1],成为支撑行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家试验田”,2025 年进入封关运作关键期。其“零关税”

作者简介:陶彦岑(2004—),女,本科,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

张文馨(2005—),女,本科,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

桂于婧(2005—),女,本科,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颖洁(2006—),女,本科,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通讯作者:陶彦岑

核心政策打破传统跨境物流壁垒，为打造国际航空快递枢纽创造了独特条件⁴。2025 年海口美兰机场“航空快件保税通道”正式启用，整合机场枢纽、物流龙头企业及海关特殊监管区的“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系统实现规模化运行，成为政策红利转化的重要载体。

1.2 研究意义

理论上，当前自贸港物流研究多分散于政策解读、技术应用等单一维度，缺乏对 2025 年枢纽运行后最新实践的系统整合。本文聚焦“零关税+航空快递”交叉领域，完善自贸港物流系统综述框架，补充该领域研究空白，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实践意义上，研究成果可为枢纽运营方提供效率优化路径，为海关等监管部门提供政策落地参考，帮助跨境电商企业更好利用政策红利，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竞争力。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聚焦新加坡、迪拜等自贸港，重点关注政策设计与运营模式⁹，提供了国际参考，但缺乏对中国自贸港特殊环境的针对性分析¹²。国内研究多集中于政策解读、智能技术应用、单一环节优化等维度⁶，尚未形成“政策-技术-实践”三位一体的综合分析，且在绿色发展、中小企适配等痛点上研究薄弱¹¹。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研究内容围绕五个维度展开：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核心红利与落地现状、航空快递枢纽系统构成与运行逻辑、实践成效与现存问题、国际经验借鉴、优化建议与发展趋势。

研究方法采用三种：一是文献研究法，梳理 15 篇核心中外文献奠定理论基础¹⁵；二是政策分析法，解读 2023-2025 年核心政策，提炼政策红利²；三是数据归纳法，整合海口海关及枢纽公开数据，通过量化分析支撑结论，确保研究客观性¹³。

2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核心红利与落地现状

2.1 核心政策背景

海南自贸港已构建起以“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为核心，以“五自由便利—安全有序流动”为支撑的政策制度体系，为航空快递枢纽建设筑牢制度根基。截至 2025 年，已有 18 项税收政策落地实施，形成“3 张核心清单+14 项早期收获+4 项增量政策”的税收支持矩阵——包括原辅料、自用生产设备、交通工具及游艇 3 张“零关税”清单，加工增值免关税等 14 项早期收获税收政策，以及 4 项针对性增量税收政策，实现了对物流全链条的政策覆盖。

税收政策层面，关键突破在于《“零关税”进口商品清单》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型²。封关运作后，征税目录外的“零关税”商品达 6637 项，较封关前提升 53 个百分点，覆盖跨境电商核心品类如美妆、智能家电、日用品等。这意味着除少数列入进口征税商品目录的商品外，绝大多数货物进入海南自贸港可直接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更有加工增值超过 30% 的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的叠加红利，从源头降低了跨境电商企业的物流与生产成本。

通关政策创新成为效率提升的核心引擎¹。《封关运作后海关监管办法》推出“航空快件保税通道”“两步申报”“径予放行”等定制化模式，针对性解决跨境快递批量大、时效要求高的痛点。其中洋浦海关创新的“区外查验+智慧监管”模式，通过大数据精准布控实现“靶向监管”，为企业节约通关成本超 40%⁷；“附条件提离”“区外查验”等模式则避免了传统口岸多次拆装箱造成的货损和耗时问题，在保障监管安全的同时实现通关流程“瘦身”。

配套政策形成全方位支撑体系：《临空经济区扶持政策》为枢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土地供应倾斜和智能分拣设备、物联网感知设备等购置补贴³；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政策明确订单、物流轨迹等核心数据的自由传输路径，破解跨境物流信息互通瓶颈¹⁴；第七航权开放试点持续拓展国际航线资源，为枢纽接入全球航空货运网络提供保障¹⁰。此外，海南通过规范行政检查流程、减少不必要行政干扰，从制度层面为企业经营“松绑减负”，营造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2 政策红利量化分析

政策落地五年以来，海南自贸港外向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并形成量化成效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年均增速分别超过 25%，累计吸引外资 174 亿美元，超过此前 30 年总和；经济外向度从 2018 年的 17.3% 跃升至 2024 年的 35%，枢纽经济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显著。

企业成本降低成效尤为突出。截至 2025 年 6 月,原辅料、自用生产设备和交通工具及游艇等“零关税”清单累计进口货值达 226.9 亿元,为企业减免税款 43.2 亿元²;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累计内销货值 87.95 亿元,减免关税 6.89 亿元,双重税收优惠直接缓解了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对航空快递枢纽入驻企业而言,关税及税费平均降低 35%,大型企业单位通关成本低至 58 元/单,中小型企业单位成本虽仍达 142 元/单,但较政策实施前下降 28%,成本优势逐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通关效率实现质的飞跃。洋浦海关通过“智慧监管+模式创新”,使通关效率较预期提升 40%⁷;海口新海港创造了货物通关时间不超过 2 分钟、旅客通关不超过 1 分钟的高效纪录,而“航空快件保税通道”启用后,跨境快递平均通关时间从传统模式的 24 小时压缩至 8 小时,压缩率达 67%,低风险货物“秒放”率持续提升¹。效率提升直接带动枢纽业务规模扩张,2025 年 1-6 月,海南自贸港航空快递枢纽包裹吞吐量达 50 万件,同比增长 40%,入驻跨境电商企业 85 家,较 2024 年增长 32%¹³。

产业集聚与人才虹吸效应同步显现。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占 GDP 比重达 67%,较五年前提高 13.7 个百分点,为跨境物流提供了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个人所得税 15%优惠政策累计惠及 3.9 万人次,吸引各类人才超过 93 万人,其中物流管理、跨境电商运营等专业人才占比达 18%,为枢纽高质量运行提供人力支撑;离岛免税“即购即提”“担保即提”政策购物总金额超 70 亿元,间接带动跨境电商相关消费物流需求增长。

2.3 落地不足

尽管政策红利显著,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仍存在三类突出不足,影响政策效能的充分释放:

一是中小企业政策适配不足问题突出:部分中小企业因缺乏专业政策解读团队,对“零关税”清单适用范围、加工增值核算标准等关键规则理解不透彻,导致未能充分享受税收优惠²;补贴申请流程涉及多部门审批,材料要求复杂、办理周期长,进一步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参与积极性,目前享受政策红利的中小企业占比仅 35%,远低于大型企业 80%的占比。

二是绿色转型与清单覆盖存在短板:可降解包装材料成本较传统塑料高 30%-50%,而绿色包装补贴政策标准不明确、申请门槛高,企业转型意愿不强,当前枢纽可降解包装使用率仅 30%;部分跨境电商热门品类如智能穿戴设备、环保产品等尚未纳入“零关税”清单,限制了枢纽服务范围的拓展,也难以满足市场消费升级需求。

三是跨区域协同与监管细节有待完善:与国内鄂州、郑州等航空枢纽的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不通畅,复运出境货物需重复申报,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部分监管流程存在衔接漏洞,如循环包装跨境使用的报关流程、查验标准不明确,导致循环包装回收利用率不足 20%;行政检查虽已规范,但跨部门监管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偶尔存在政策执行标准不一致的情况,给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

3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系统构成与运行逻辑

3.1 核心功能

系统构建“基础功能-支撑功能-延伸功能”三级体系,聚焦政策转化与效率提升,协同保障运转效能。

基础功能是政策赋能的核心载体。“零关税”快速通关与核销功能依托“航空快件保税通道”,实现“保税暂存-订单核销-免税放行”闭环:符合清单的快件入枢纽后暂存保税仓,订单生成后自动核销免税[1],打破传统“先税后放”壁垒。柔性化保税仓储功能支持企业前瞻性备货,通过动态库存调整实现“库存前移”,为“当日达”“次日达”服务筑牢基础[5],目前保税仓备货满足率超 85%。

支撑功能以技术驱动规模化运营。智能分拨与转运功能部署自动化分拣线、AGV 机器人,结合运筹学算法,分拨效率达 2 万件/小时,高效适配多流向物流需求;全链路状态追踪功能基于 RFID、5G 与物联网技术,在关键节点采集数据,形成可视化数字轨迹,既提升客户信任度,又为运营调度提供实时依据。延伸功能兼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嵌入式智能风险管控构建四级风险体系,通过大数据与 AI 精准布控,高风险货物 100%彻查、低风险“秒放”,当前低风险货物“秒放”率达 70%;绿色包装适配功能响应“双碳”目标,明确可降解包装验收标准(降解率 $\geq 90\%$ 、重金属含量 $\leq 0.1\text{mg/kg}$),试点循环包装保税通关[14],单次使用成本较传统包装降低 40%。

3.2 构成要素

系统高效运转依赖五类要素协同联动,形成完整运行基础。实体要素是物理支撑,包括美兰机场 5 万 m^2 货站、1 万 m^2 海关监管区、容量 10 万件的保税仓库等基础设施,以及自动化分拣线、智能卡口、X 光查验设备等,其中自动化分拣线扫码准确率达 99.9%,智能卡口核验时间 ≤ 3 秒。

技术要素是智能化核心,硬件涵盖 5G 网络、物联网感知设备、边缘计算服务器;软件整合海关“金关工程”

系统、企业 WMS 仓库管理系统等，通过 API 接口实现海关、机场、企业三方数据互通[7]，数据交互延迟 ≤ 500 毫秒。

规则要素是制度保障，包括《封关运作后海关监管办法》《零关税清单》等政策文件、行业标准及风险判定细则，规范各环节操作边界。

主体要素是运营核心，涵盖海口海关、自贸港管理局（监管方），美兰机场、菜鸟网络（运营方），跨境电商企业、报关行（参与方），协同效率直接影响系统效能。

数据要素是核心资产，包括商品编码、订单信息等基础数据，物流轨迹、库存状态等动态数据，以及运营统计、政策评估等衍生数据，目前数据资源池累计存储超 1000 万条数据。

3.3 运行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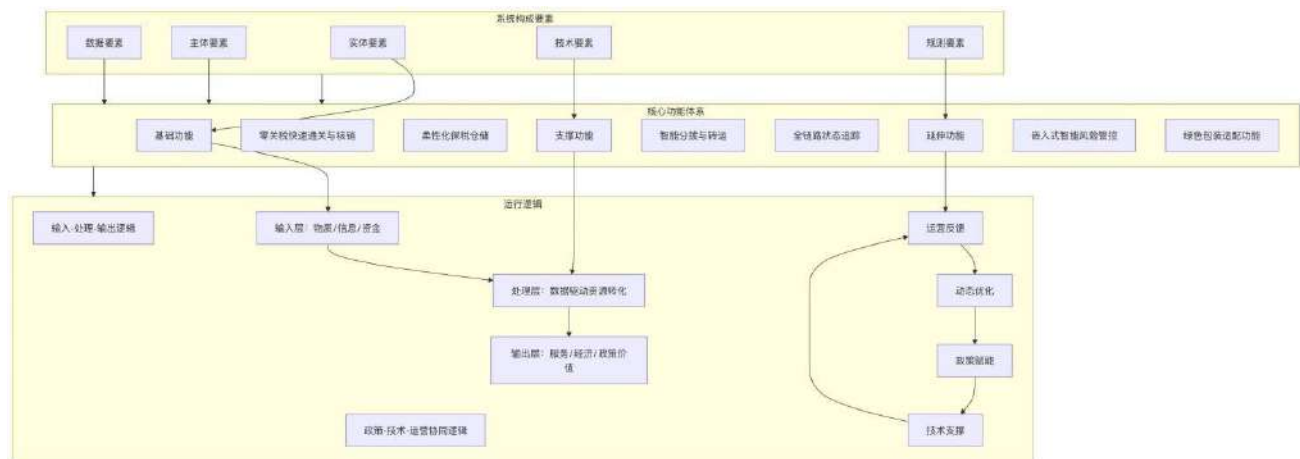


图 3-1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运行逻辑图

如图 3-1 所示，系统运行遵循“输入-处理-输出”基础逻辑与“政策-技术-运营”协同逻辑，双重逻辑交织保障高效运转。

输入 - 处理 - 输出逻辑构成运行框架：物质输入含跨境包裹、绿色包装、航空燃油等；信息输入涵盖订单、舱单、政策指令等²；资金输入包括企业投资、政策补贴及关税节省资金³。处理环节通过“数据层驱动技术层、技术层支撑功能层、规则层规范全流程”实现资源转化，最终输出三类价值：服务输出（通关、仓储、配送）、经济输出（成本降低、贸易增长）、政策输出（制度创新经验）⁶。

政策-技术-运营协同逻辑推动动态优化：“零关税”“两步申报”等政策明确规则边界，5G、AI 等技术破解效率瓶颈，运营中反馈的清单适配不足、绿色成本过高等痛点，反向推动政策调整与技术迭代，形成“赋能-支撑-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

4 实践成效、国际对标与现存问题

4.1 实践成效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系统自 2025 年规模化运行以来，在效率提升、经济带动与社会价值创造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政策红利与技术赋能的叠加效应充分释放¹。

效率层面实现质的飞跃，跨境物流流转速度大幅提升。通关时效较传统模式压缩 67%，从原来的 24 小时缩短至 8 小时，低风险货物“秒放”率达 70%，核心得益于“航空快件保税通道”“两步申报”等政策创新与智能监管技术的融合应用。分拨环节依托自动化分拣线与 AGV 机器人，处理效率达到 2 万件/小时，较人工分拨提升 10 倍，且分拣准确率稳定在 99.9%以上。时效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海南本岛“当日达”服务覆盖率达 60%，海口、三亚等核心城市实现“上午下单、下午收货”；国内其他地区“次日达”覆盖率达 45%，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的物流时效已比肩国内主流航空快递枢纽。

经济层面带动效应显著，形成“政策-产业-贸易”的良性循环。入驻企业直接受益于“零关税”政策与效率提升，物流综合成本平均降低 25%，其中关税成本下降 35%、通关环节成本下降 22%。成本优势有效吸引跨境电商企业集聚，2025 年上半年海南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38%，较政策实施前提升 20 个百分点；临空经济

区产值同步增长 22%，形成以航空快递为核心，仓储、分拣、包装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枢纽自身业务规模快速扩张，2025 年 1-6 月包裹吞吐量达 50 万件，同比增长 40%，已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跨境航空快递中转节点。

社会层面实现多重价值，兼顾就业保障与绿色发展。枢纽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300 个，涵盖分拣操作、物流调度、海关协管等多个岗位，间接带动临空经济区配套产业就业超 1000 人。绿色转型初见成效，可降解包装使用率达 30%，循环包装试点项目累计减少包装废弃物 15 吨，相当于节约传统塑料原料约 8 吨；枢纽运营中采用节能分拣设备、光伏供电辅助系统，单位包裹能耗较传统枢纽降低 18%，为跨境物流绿色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

4.2 国际对标

为进一步优化系统运行效能，选取新加坡樟宜机场航空枢纽与迪拜自贸港物流系统两大国际标杆，从政策设计、技术应用、运营模式等维度展开对标，提炼可借鉴经验。

新加坡樟宜机场航空枢纽以“政策灵活、技术领先、绿色低碳”为核心优势。政策层面实行零关税清单每季度动态更新机制，企业可通过线上平台申报新增品类，经专家评估后快速纳入清单，适配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极快；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绿色转型专项补贴，按绿色包装使用比例给予最高 5% 的物流成本补贴，降低企业转型压力。技术应用上全球领先，部署数字孪生枢纽系统，实现全流程仿真优化与预测性维护，全流程自动化分拣效率达 3 万件/小时，较海南枢纽高出 50%；区块链溯源技术覆盖全链路，商品从海外发货到终端签收的所有信息不可篡改，大幅提升跨境贸易信任度。绿色实践方面实现 100% 可降解包装使用，建立循环包装租赁体系，企业可按需租赁环保箱，由枢纽负责回收、清洁与循环利用，包装综合成本降低 30%。

迪拜自贸港物流系统凭借“政策开放、模式创新、区域协同”脱颖而出。政策上采用“零关税+低税率”组合拳，除货物进口零关税外，企业所得税仅为 5%，且无个人所得税；与中东地区 12 个国家实现海关政策互认，跨境货物无需重复申报查验，区域流转效率大幅提升。运营模式上创新“物流枢纽+产业园区”融合模式，在枢纽周边布局跨境电商产业园、加工制造区，货物可实现“保税仓储-加工增值-跨境配送”的一站式流转，备货准确率达 92%。技术层面聚焦 AI 动态风险管控，通过分析全球贸易数据、物流轨迹数据，实时调整风险判定模型，既保障监管安全，又最大化通关效率，低风险货物“秒放”率达 85%。

综合对标分析，可提炼四大借鉴要点：一是建立清单动态更新机制，参考新加坡季度更新模式，简化企业申报流程，提升政策适配性；二是完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借鉴新加坡专项补贴经验，降低绿色转型与政策使用门槛；三是推广绿色技术与循环包装模式，引入租赁体系与数字孪生技术，提升绿色化与智能化水平；四是强化跨区域政策协同，参考迪拜区域互认经验，推动与国内枢纽及 RCEP 成员国海关的数据互通与规则互认。

4.3 现存问题

尽管枢纽系统运行成效显著，但对照国际标杆与实际运营需求，仍存在运营适配、技术协同、政策完善三大类突出问题，制约系统效能的充分释放。

运营层面存在明显短板，资源配置与主体适配不均。中小企业政策适配不足问题突出，由于缺乏专业政策解读团队与资金支持，享受政策红利的中小企业占比仅 35%，远低于大型企业 80% 的占比；部分中小企业反映补贴申请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影响政策参与积极性。资源配置不均衡，高端自动化分拣线在电商促销旺季利用率达 90% 以上，但平峰期不足 40%，设备闲置率较高；保税仓空间分配不合理，大型企业占用优质仓位资源，中小企业面临仓储成本偏高、仓位紧张的问题。绿色转型进展缓慢，可降解包装使用率仅 30%，循环包装回收体系不完善，回收网点不足、物流成本高导致企业参与意愿不强。

技术层面协同不足，数据互通与动态响应能力欠缺。海关、机场、物流企业三方数据互通存在 5 分钟延迟，部分数据标准不统一（如商品编码、物流轨迹字段定义差异），导致订单信息与货物状态不同步，影响调度效率。风险指标体系为静态设定，未建立实时更新机制，面对市场新品类涌现、政策调整等变化时，无法快速适配，可能出现“高风险漏判”或“低风险误查”的情况。智能化技术应用深度不足，未部署数字孪生、AI 预测性维护等前沿技术，设备故障响应与修复依赖人工，平均停机时间达 2 小时，影响系统稳定性。

政策层面细节不完善，清单覆盖与跨区域协同不足。“零关税”清单覆盖存在盲区，智能穿戴设备、环保智能家居等跨境电商热门品类尚未纳入，限制了枢纽服务范围的拓展；绿色包装补贴政策标准不明确，未区分企业规模与转型难度，补贴力度难以满足中小企业需求。跨关区政策协同不畅，与国内鄂州、郑州等航空枢纽缺乏数据互通与规则互认，复运出境货物需重复申报、查验，流程繁琐且增加企业成本；与 RCEP 成员国海关的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国际中转包裹的通关效率有待提升。

5 优化建议与发展趋势

5.1 优化建议

针对现存问题,结合国际经验,从政府、运营方、企业三方提出精准优化建议,推动系统效能升级。

政府层面聚焦政策完善与协同赋能。2026年前完成智能穿戴设备、环保智能家居等热门品类的“零关税”清单扩容,建立企业申报-专家评估-快速纳入的动态机制。简化中小企业补贴申请流程,推出线上一键申报系统,实现3个工作日内办结,降低政策使用门槛。搭建“单一数据共享平台”,统一数据标准,实现海关、机场、企业数据实时互通,同时推动与国内重点航空枢纽及RCEP成员国海关的政策互认与数据互联¹²。

运营层面强化服务升级与资源优化。设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提供政策解读、技术指导、申报代办等一站式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充分享受红利。推出绿色包装租赁服务,整合PLA+PBAT混合材料等成熟环保包装资源,按使用频次收费,降低企业转型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平峰期设备与仓库共享机制,通过错峰调度提高高端分拣线、保税仓等资源利用率,减少闲置浪费。

企业层面主动适配与转型提升。积极参与“零关税”清单申报,结合市场需求提出品类扩容建议,同时主动申请绿色转型补贴。优先采用符合标准的绿色包装材料,与枢纽签订循环包装租赁协议,降低包装成本与环境影响。升级自身ERP系统,实现与枢纽数据平台直连,接入全链路追踪系统,提升运营协同效率与客户服务质量。

5.2 发展趋势

未来,枢纽系统将围绕政策、技术、运营三大维度呈现清晰发展趋势:政策层面,“零关税”清单扩容将常态化,持续覆盖跨境电商新品类²;跨区域协同深化,与RCEP成员国海关规则对接,推动通关标准互认¹²;绿色政策进一步强化,“零关税+绿色包装”联动机制将逐步建立,碳减排考核将纳入政策支持条件¹¹。技术层面,智能化升级加速,数字孪生全流程仿真、AI预测性维护、无人化分拣配送将广泛应用¹⁵;绿色技术深度融合,可降解包装材料实现低成本化,光伏供电、碳足迹数字化追踪成为标配¹⁴。运营层面,“零关税+跨境直播电商+即时配送”融合模式兴起;枢纽将从单一物流节点升级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新增报关、融资、退税等增值服务⁶;依托RCEP区域合作,逐步成为东南亚跨境航空快递中转枢纽,辐射范围与影响力持续扩大¹²。

6 结论

6.1 总结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航空快递枢纽系统构建了“政策-技术-运营”三位一体的协同体系,通过“零关税”清单扩容、通关便利化等政策赋能¹,结合智能分拨、全链路追踪等技术支撑⁷,实现了显著成效:通关时效压缩至8小时,企业物流综合成本降低25%,2025年上半年海南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38%¹³,同时带动就业与绿色转型起步¹¹。但系统仍存在短板,中小企业政策适配不足²、绿色转型滞后¹⁵、数据共享不畅⁷、“零关税”清单覆盖不全²等问题,制约了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数据仅覆盖2025年上半年,缺乏长期动态追踪,对政策长效影响分析不够充分¹³;二是侧重宏观系统梳理,对中小企业适配等微观痛点的深度剖析不足²。未来可延长数据追踪周期,构建动态评估模型⁶;聚焦微观痛点开展企业案例研究;拓展研究边界,分析枢纽与RCEP区域物流枢纽的协同机制¹²,为其打造全球自贸港物流创新标杆、支撑区域跨境贸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 海关总署.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海关监管办法[Z]. 2025.
- [2] 财政部. “零关税”进口商品清单(2024版)[Z]. 2024.
- [3] 海南省发改委. 海南自贸港临空经济区扶持政策[Z]. 2024.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Z]. 2020.
- [5] 赵刚, 吴桐. 海南自贸港航空物流枢纽建设路径研究[J].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24(12): 78-80.
- [6] 张锦, 陈坚.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自由贸易港物流系统仿真与优化[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4(3): 789-798.
- [7] 周阳, 吴敏. 智慧海关建设与跨境物流效率提升[J]. 中国海关, 2024(8): 68-71.
- [8] 李艳华, 陈明. 我国专业航空货运枢纽运营效率评价——以鄂州、郑州为例[J]. 民航管理, 2025(3): 56-61.
- [9] 刘敏, 张强. 国际航空枢纽临空经济产业布局研究——基于新加坡樟宜机场的经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23(9): 101-110.
- [10] 王浩. 第七航权开放对海南航空物流枢纽的影响[J]. 中国民航大学学报, 2025(2): 34-39.

- [11] 陈明, 李娟. 跨境电商绿色通关实践与优化[J]. 对外经贸实务, 2024(6): 90-93.
- [12] 孙悦, 李明. 国际自贸港物流系统比较研究——新加坡、迪拜与海南的对标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24(4): 78-86.
- [13] 海口海关. 2025 年上半年海南自贸港跨境电商监管统计报告[R]. 2025.
- [1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数字物流产业深度观察 (2025 年) [R]. 2025.
- [15] Smith J, Johnson L. Green Customs Practice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2023, 34(2): 78-92.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Zero-Tariff" Air Express Hub i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uthoTao Yancen¹, Zhang Wenxin¹, Gui Yujing¹, Chen Yingjie¹

¹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xi District,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s a pivotal front of China's opening-up strategy, is steadily advancing its strategic plan for island-wide customs operation by 2025, injecting robust momentum into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cross-border logistics. Among its key policy incentives, the "zero-tariff" policy stands out as a cornerstone benefit, offering substantial tariff reductions on imported goods, streamlined customs procedures, and enhanced trade facilitation. This creates a uniqu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y for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an air express hub. Focusing on the "zero-tariff" air express hub system in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this study adopt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incorporating literature review, policy analysis, and data synthesis—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cross-border logistics hub development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t provides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re implic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the "zero-tariff" policy and its supporting measures. Based on extensive industry data and enterprise surveys, the research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om five key dimensions: policy dividend realiz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 practical outcomes, 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and optimization recommendat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zero-tariff" air express hub system i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through its trinity development model of "policy support–technology empowerment–operational synerg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enhancing customs clearance efficiency, reducing logistics costs for enterprises, and expanding the scale of cross-border trade. Specifically, customs clearance times have been reduced by over 40%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models, while the overall operational costs for cross-border logistics enterprises have decreased by an average of 15%–20%, attracting numerous promin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firms and e-commerce platforms to establish a presence. Nevertheless, the system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often struggle to fully adapt to the "zero-tariff" policy due to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unfamiliarity with declaration procedures, and relatively high compliance costs; the transition towards green logistics remains sluggish, with inadequate progress in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s in air transport, adopting eco-friendly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establishing circular logistics systems; supporting service ecosystems are underdeveloped, lacking sufficient coverage and professionalism in cross-border finance, legal arbitration, and logistic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mpared to world-class air express hubs, gaps persist in route network plann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intelligent capabilit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aligned with Hainan Free Trade Port's developmental positioning and industrial needs: first, enhance precise policy empowerment by establishing dedicated service platforms for SMEs, simplifying declaration processes, and lowering compliance costs; seco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green logistics system by promot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and low-carbon transport technologies, and establishing carbon accounting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third, improve the hub's auxiliary service ecosystem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in cross-border finance, legal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o elevate professional service standards; and fourth, benchmark against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to optimize route networks, enhance smart operations,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ooperation and connectivity.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Hainan's air express hub system, supporting the Free Trade Port i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nvenient, and green cross-border logistics hub,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growth in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logistics industries.

Keywords: Hainan Free Trade Port; zero-tariff; air express hub; cross-border logistics; policy coordination.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

李宝硕¹ 薛珂¹ 石琳¹ 汪敏翼¹ 刘栩¹

(1.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本文以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为背景, 实证考察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 2010–2024 年中国 A 股农业上市企业, 研究发现: (1) 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2) 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降低企业风险两条中介路径促进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3) 该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及成熟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相关研究, 并为推动涉农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关键词: 供应链金融; 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融资约束; 企业风险; 新质生产力

基金项目: 获 2025 年四川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S20251062601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4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农业企业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微观主体, 其科技创新活动却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现实困境, 这已成为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堵点”。在此背景下,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基于产业链生态的新型融资模式, 为破解农业企业融资困境、赋能科技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围绕农业企业科技创新与供应链金融及二者关系, 现有学者已从概念界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层面开展了丰富研究, 但仍存在若干亟待补充与深化的研究缺口。关于供应链金融与农业企业科技创新二者关系的结论仍未统一, 供应链金融在赋能农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困难。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 丰富了农业企业科技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体系。第二, 拓展了供应链金融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边界。第三, 完善了供应链金融影响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理论。该研究不仅为供应链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供参考, 也为各方决策提供了实证支撑。

二、文献综述

供应链金融凭借产业链协同优势与资源整合能力, 为农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适配性金融服务, 成为破解农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配置的重要工具。供应链金融核心功能是通过资金融通、风险分担和信息共享, 系统性缓解农业企业融资约束,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Xia 等, 2022)。

在传统融资模式中, 企业往往依赖固定资产抵押获取资金, 而供应链金融通过盘活流动性资产, 降低了企业的融资门槛, 缓解了融资约束 (Wuttke 和 Schütt, 2016)。供应链金融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与资源, 减少信息不对称, 优化资金流向高价值环节 (Chakkuu 和 Oke, 2019)。Deng 等 (2024) 的研究表明, 供应链金融在风险分担机制下能够显著降低农业企业的经营风险, 尤其是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时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企业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现有研究表明, 企业科技创新受到多重因

作者简介: 李宝硕 (2005-), 女,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在读;

薛 珂 (2005-), 女,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在读;

石 琳 (2006-), 女,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在读;

汪敏翼 (2004-), 女,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在读;

刘 栩 (2004-), 女,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在读。

素的综合影响。税收优惠与研发补贴等政策工具通过降低创新风险，激发企业研发积极性。然而，相比于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农业企业科技创新面临更为复杂的因素条件。例如，农业企业绿色信贷获取难度是普通企业的3.2倍（郭捷和谷利月，2022）。谢玲红等（2016）发现，部分农业企业缺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推进。亟需从资源获取机制与政策适配性角度开展专项研究。

现有研究为后续探讨奠定了基础，但在供应链金融与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适配路径及农业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实践策略等方面仍需深化。未来研究需以农业弱质性特征为切入点，系统解构供应链金融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路径，关注融资约束与风险协同防控机制，为二者协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更扎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聚焦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展开系统性分析。第一，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农业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资金保障。农业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农业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物、经营信息透明度较低，导致金融机构面临较高的信贷风险，进而抑制了其放贷意愿（宋华等，2017）。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引入核心企业的信用背书、整合物流与信息流等关键数据（邵娴，2013），有效降低金融机构与农业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农业企业的信用状况与还款能力，从而提升了信贷供给的可得性。同时，供应链金融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形式，配合灵活的还款周期与还款方式，能够更好地匹配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特点。第二，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提升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效率与风险承担意愿。风险的降低使得企业能够进行更长期的创新规划，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保障创新活动的连贯性，避免因短期风险冲击导致创新项目中途停滞，进而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郭晔和姚若琪，2024），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与成功率。

综合上述分析，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风险两大路径，能够为农业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资金保障与环境支撑，进而推动农业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基本假设和中介假设：

H1a:供应链金融能够促进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H1b:农业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风险推动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24年中国A股农业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按照我国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选择全部A类“农、林、牧、渔业”，C类制造业中选择“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中主营业务涉及农业、农业机械、农药、植保、肥料的企业视为涉农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和处理：剔除ST/ST*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类行业公司样本；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公司样本；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排除极端值的影响。

农业企业科技创新数据来自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供应链金融数据来自于上市农业企业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无法直接从现有数据库获取到的数据，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或借助Python工具进行采集。项目用到的计量分析工具为Stata18.0。

（二）相关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农业企业科技创新（*Patent*）：本文以农业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科技创新。

2. 解释变量

供应链金融（*SCF*）：参考姚王信等（2017）的做法，本文用企业年末短期借款额与应付票据之和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测度供应链金融。该比值越大意味着企业通过供应链上下游关系获得的融资越多，其供应链金融应用程度与发展水平越高。

3.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SA_J*）：本文采用SA指数的绝对值测度农业企业的融资约束。

企业风险（*Risk*）：借鉴周德良等（2022）的研究采用企业盈余波动率 *ProfitsVolatility* 指标衡量企业的风险水平。

4. 异质性分析变量

企业性质 (*SOE*) : 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性质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属于国有还是民营企业, 实际控制人性质来自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

企业年龄 (*Age*) : 以企业的当年年份减去上市年份的值作为衡量变量。

地理位置 (*RD*) :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包含的省份以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为准。

5.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 (*Size*)、净资产收益率 (*ROE*)、资产负债率 (*Lev*)、资产周转率 (*Ato*)、现金比率 (*Cr*)、账面市值比 (*BM*)、固定资产占比 (*Tan*)、经营净现金流 (*Cf*)、董事会规模 (*Board*)、机构持股比例 (*Ins*) 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见表 1 变量定义表。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或衡量方法
解释变量	<i>SCF</i>	供应链金融	(短期借款 + 应付票据) / 总资产
被解释变量	<i>Patent</i>	科技创新	专利申请数加 1 的自然对数
中介变量	<i>SA_J</i>	融资约束	SA 指数的绝对值
	<i>Risk</i>	企业风险	采用企业盈余波动率衡量
	<i>SOE</i>	企业性质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性质
异质性变量	<i>Age</i>	企业年龄	当年年份 - 上市年份
	<i>RD</i>	区域差异	按企业注册地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i>Size</i>	企业规模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i>ROE</i>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 股东权益平均余额
	<i>Lev</i>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
	<i>Tan</i>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净额 / 总资产
	<i>Cf</i>	经营净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总资产
	<i>Ato</i>	资产周转率	总收入 / 总资产
	<i>Cr</i>	现金比率	货币资金 / 流动负债
	<i>BM</i>	账面市值比	总资产 / 市值
	<i>Board</i>	董事会规模	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
	<i>Ins</i>	机构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持有股份 / 企业总股份

(三) 模型构建

本文将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捕捉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驱动机理。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Patent_{it+1} = \alpha_1 + \beta_1 SCF_{it} + \gamma_i Control_{it} + \delta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Patent_{it+1}$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农业企业 i 在 $t+1$ 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和研发投入; SCF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 β 是 SCF_{it} 的待估系数, 代表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 $\beta > 0$ 说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对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具有积极作用, 此时假设 H1a 成立; $Control_{it}$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γ_i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δ_i 为公司固定效应; θ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α 为常数项,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呈现了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企业科技创新指标 (*Patent*) 均值 1.372, 标准差 1.384, 最小值 0, 最大值 6.234, 说明样本企业间专利数量存在明显差异。供应链金融指标 (*SCF*), 均值 0.122, 标准差 0.124, 最小值 0, 最大值 0.774, 说明样本企业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程度上差异显著, 个体间波动较大。

表 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Max
Patent	3964	1.372	1.384	0.000	6.234
SCF	3964	0.122	0.124	0.000	0.774
Size	3964	22.182	1.032	18.120	26.420
ROE	3964	0.083	0.085	0.000	1.000
Lev	3964	0.396	0.199	0.001	1.000
Tan	3964	0.260	0.143	0.000	0.773
Cf	3964	0.063	0.082	-0.662	0.784
Ato	3964	0.640	0.231	0.003	1.000
Cr	3964	0.520	0.346	0.000	1.000
BM	3964	0.797	0.783	0.045	20.965
Board	3964	2.228	0.283	0.000	3.258
Ins	3964	0.347	0.227	0.000	0.945

(二) 基准回归

为考察供应链金融如何影响农业企业科技创新，表 3 呈现了基于模型 (1) 的基准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知，随着企业供应链金融能力的提升，农业企业拥有了更加便利的资金来源，减轻了财务压力，促使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这种良性循环会激励企业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使创新项目能够顺利稳定进行，表明本文的假设 H1a 得到实证支持。

表 3 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

VARIABLES	(1) Patent	(2) Patent	(3) Patent
SCF	0.721*** (4.48)	0.525*** (3.21)	0.736*** (3.73)
Size			0.129*** (4.16)
ROE			0.123 (0.50)
Lev			-0.368** (-2.46)
Tan			-0.171 (-0.97)
Cf			-0.739*** (-3.28)
Ato			0.181* (1.69)
Cr			-0.057 (-0.86)
BM			-0.046* (-1.78)
Board			0.002 (0.03)
Ins			0.122 (1.33)

Constant	1.284*** (53.75)	1.308*** (54.42)	-1.452** (-2.02)
Firm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3964	3964	3964
Adj. R2	0.613	0.624	0.627

注：（1）括号中报告值是 T 统计量；（2）“*”、“**”和“***”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构建 SCF_T 替换原来的被解释变量 SCF 。参考韦施威等（2023）的做法，依据供应链金融的业态特征和“应收”“预付”“存货”“综合”等主要业务模式，并参考政策文件的规范指引和相关文献的概念界定（凌润泽等，2021），归集形成由 22 个供应链金融相关关键词构成的词库。基于此，通过上市公司公告对关键词词频进行匹配与分类加总，本文以关键词词频数量加 1 的自然对数衡量供应链金融，以避免数据“右偏”分布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4 第（1）列所示，其中 SCF 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5%统计显著性水平下仍保持正向显著，验证了本研究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2. 延长观测窗口

考虑到供应链金融的价值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本文将核心被解释变量（ $Patent$ ）前置一期进行回归。研究发现，本文延长了供应链金融影响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时间考察窗口后， SCF 变量的回归系数仍在 1%统计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正向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3. 剔除部分样本

为了避免研究结论可能受外在冲击的影响和干扰，参考卜君和朱悦（2024）的做法，本文选择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 2015 年股市暴跌作为样本剔除的时点并考虑了其影响后果。具体地，首先，本文将样本限制在 2010 年之后以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其次，剔除 2015 年的样本。结果显示，在剔除样本的过程中，供应链金融提高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1) 替换解释变量 $Patent$	(2) 延长观测窗口 $F.Patent$	(3) 剔除部分样本 $Patent$
SCF_T	0.067** (2.21)		
SCF		0.680*** (3.00)	0.738*** (3.6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3,964	3,551	3,733
Adj. R2	0.661	0.680	0.660

注：（1）括号中报告值是 T 统计量；（2）“*”、“**”和“***”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四）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检验。核心逻辑是通过匹配使处理组（使用供应链金融的农业企业）与控制组（未使用供应链金融的农业企业）在可观测协变量上达到平衡，进而剥离混淆因素干扰，识别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净效应。匹配后，协变量的组间差异均得到有效消除：变量的 t 检验 p 值均大于 10%，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这表明 PSM 方法成功平衡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可观测特征，两组企业具备了可比性，为后续处理效应估计奠定了可靠基础。

表 5 倾向得分匹配 (PSM) 结果

VARIABLES Matched	Unmatched	Mean		%bias	t-test	
		Treated	Control		t	p>t
ProfitsVolatility	Unmatched	0.034	0.038	-9.500	-1.73	0.08
	Matched	0.034	0.035	-1.000	-0.15	0.88
TobinQ	Unmatched	2.219	2.178	2.500	0.50	0.62
	Matched	2.175	2.170	0.300	0.04	0.96
SA_J	Unmatched	3.879	3.860	8.000	1.56	0.12
	Matched	3.880	3.888	-3.100	-0.44	0.66
RD_num	Unmatched	1.560	1.608	-6.000	-1.14	0.25
	Matched	1.563	1.579	-2.000	-0.30	0.77
Age	Unmatched	10.428	11.350	-11.900	-2.34	0.02
	Matched	10.458	10.209	3.200	0.46	0.64
Risk_score	Unmatched	0.948	0.851	9.900	1.87	0.06
	Matched	0.944	0.973	-2.900	-0.39	0.70
SOE	Unmatched	0.245	0.401	-33.800	-6.25	0.00
	Matched	0.247	0.253	-1.500	-0.24	0.81
Board	Unmatched	2.235	2.222	4.500	0.87	0.38
	Matched	2.235	2.233	0.800	0.11	0.91
Indep	Unmatched	38.688	39.508	-8.000	-1.59	0.11
	Matched	38.697	38.980	-2.700	-0.40	0.69
Top10	Unmatched	0.618	0.577	27.800	5.19	0.00
	Matched	0.617	0.622	-3.600	-0.55	0.59
Tan	Unmatched	0.226	0.266	-29.500	-5.47	0.00
	Matched	0.226	0.224	1.400	0.22	0.82
Ins	Unmatched	0.350	0.345	2.200	0.43	0.67
	Matched	0.350	0.335	6.300	0.88	0.38
Cf	Unmatched	0.067	0.061	6.900	1.37	0.17
	Matched	0.067	0.066	0.700	0.09	0.92
ROE	Unmatched	0.092	0.084	9.400	1.80	0.07
	Matched	0.092	0.095	-3.700	-0.56	0.57
Size	Unmatched	22.304	22.097	20.200	4.06	0.00
	Matched	22.291	22.332	-4.000	-0.60	0.55
FC	Unmatched	0.478	0.493	-5.200	-1.03	0.31
	Matched	0.480	0.490	-3.600	-0.53	0.60
Cr	Unmatched	0.548	0.512	10.20	1.99	0.05
	Matched	0.548	0.554	-1.900	-0.28	0.78
BM	Unmatched	0.782	0.767	1.600	0.36	0.72
	Matched	0.783	0.755	3.100	0.44	0.66
Lev	Unmatched	0.382	0.393	-5.800	-1.10	0.27
	Matched	0.382	0.373	4.500	0.68	0.50

比较 PSM 匹配前后的回归结果, 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更贴近实际情况, 还修正了部分控制变量的结论偏差, 丰富了对农业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客观认知。

表 6 psm 匹配回归前后结果

VARIABLES	Patent
SCF	0.181*** (-2.68)
控制变量	Yes
Firm	Yes
Year	Yes
N	3255
Adj. R ²	0.172

注：（1）括号中报告值是 T 统计量；（2）“*”、“**”和“***”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五）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 SA 指数测度融资约束，同时参考周德良等（2022）的研究，采用企业盈余波动率 (*ProfitsVolatility*) 作为企业风险水平的代理变量。将上述两个指标作为供应链金融影响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中介变量，分别对应融资约束缓解机制与企业风险管控机制，系统揭示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内在影响路径。

表 7 SA 指数中介效应检验

	(1)Patent	(2)SA_J	(3)Patent
SCF	1.499*** (-6.67)	-0.317*** (-7.47)	1.226*** (-5.49)
SA_J			-0.862*** (-10.37)
Constant	-7.146*** (-13.46)	3.353*** (-33.41)	-4.257*** (-7.17)
Firm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3964	3964	3964
Adj. R ²	0.123	0.061	0.146

注：（1）括号中报告值是 T 统计量；（2）“*”、“**”和“***”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表 8 企业风险 Risk 中介效应检验

	(1)Patent	(2)Risk	(3)Patent
SCF	1.499*** (-6.67)	-0.035*** (-4.66)	1.398*** (-6.23)
Risk			-2.876*** (-6.14)
Constant	-7.146*** (-13.46)	0.131*** (-7.28)	-6.771*** (-12.72)
Firm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3964	3964	3964
Adj. R ²	0.123	0.054	0.131

注：（1）括号中报告值是 T 统计量；（2）“*”、“**”和“***”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 7 汇报了融资约束 (*SA_J*)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说明，融资约束在供应链金融影响农业企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表 8 展示了企业风险 (*Risk*)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 (3) 在引入 *Risk* 变量后，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且 *Risk*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风险承担部分中介效应。综合表 7 与表 8 可知，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的中介效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

新的促进作用，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降低企业风险这两条中介路径得到有效解释，假设 H1b 得到验证。

(六)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供应链金融 (*SCF*) 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Patent*) 的影响在不同企业属性和区域特征下的差异，本文从企业产权性质、区域分布、生命周期阶段三个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

表 9 异质性分析

VARIABLES	(1) 国企 Patent	(2) 非国企 Patent	(3) 东部 Patent	(4) 中西部 Patent	(5) 成长型 Patent	(6) 成熟型 Patent
SCF	0.839*** (2.98)	0.761*** (2.63)	0.642** (2.35)	0.862*** (2.73)	0.681** (2.09)	0.683*** (2.75)
Size	0.038 (0.71)	0.139*** (2.98)	0.108** (2.46)	0.181*** (3.08)	0.093* (1.89)	0.189*** (3.30)
ROE	0.391 (0.80)	0.029 (0.11)	-0.097 (-0.32)	0.323 (0.94)	0.400 (0.89)	0.196 (0.74)
Lev	0.097 (0.43)	-0.646*** (-3.10)	-0.493** (-2.31)	-0.142 (-0.60)	-0.701*** (-2.58)	0.087 (0.47)
Tan	0.084 (0.32)	-0.182 (-0.73)	-0.169 (-0.69)	-0.233 (-0.85)	-0.093 (-0.30)	0.009 (0.04)
Cf	-1.650*** (-4.43)	-0.332 (-1.36)	-0.691** (-2.37)	-0.720** (-2.30)	-0.571* (-1.94)	-0.888*** (-2.86)
Ato	0.085 (0.51)	0.181 (1.24)	0.197 (1.37)	0.096 (0.58)	-0.100 (-0.51)	0.031 (0.23)
Cr	-0.210* (-1.82)	-0.026 (-0.31)	-0.173** (-2.07)	0.087 (0.75)	-0.064 (-0.62)	-0.038 (-0.40)
BM	-0.037 (-0.96)	-0.099 (-1.40)	-0.036 (-0.92)	-0.066 (-1.27)	0.005 (0.12)	-0.072* (-1.69)
Board	-0.053 (-0.55)	0.037 (0.47)	0.023 (0.30)	-0.023 (-0.23)	-0.042 (-0.49)	0.008 (0.10)
Ins	0.053 (0.33)	0.222* (1.82)	0.220* (1.78)	0.028 (0.18)	0.285** (2.10)	0.089 (0.63)
Constant	0.397 (0.32)	-1.550 (-1.46)	-0.967 (-0.96)	-2.586* (-1.95)	-0.184 (-0.16)	-3.125** (-2.43)
Firm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468	2496	2426	1538	2009	1955
Adj.R2	0.650	0.621	0.585	0.680	0.592	0.696
Chow-p	0.000***		0.061*		0.000***	

注：(1) 括号中报告值是 T 统计量；(2) “*”、“**”和“***”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1. 企业维度异质性：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

将样本企业按产权性质分为国企与非国企两组。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839 且 t 值为 2.98，在 1%水平上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SCF* 的系数为 0.761，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t=2.63)。Chow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为 0.0000 (1%水平显著)。

2. 空间维度异质性：基于区域分布的视角

企业地理位置的差异也可能影响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作用。在地区划分上，以是否为东部地区

为界,将全样本界分为“东部地区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两个组别,并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东部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影响系数为 0.642 ($t=2.35$),在 5%水平上显著;中西部地区该系数为 0.862 ($t=2.73$),在 1%水平上显著。Chow 检验 p 值为 0.0607 (10%水平显著)。

3. 生命周期维度异质性:基于企业年龄的视角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本文以样本企业年龄的中位数作为截断点,将样本分为成长型企业与成熟型企业。成长型企业样本中供应链金融对科技创新影响系数为 0.681 ($t=2.09$),在 5%水平上显著;成熟型企业样本中该系数为 0.683 ($t=2.76$),在 1%水平上显著。Chow 检验的 p 值为 0.0000 (1%水平显著),说明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技术的创新效应在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存在显著异质性。成长型企业虽处于扩张与技术突破的关键阶段,但受限于企业规模与抗风险能力,效应强度略低于成熟型企业。

综上,供应链金融对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在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成熟型企业中表现出更突出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为后续针对性地优化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差异化推动农业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实证依据。

六、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供应链金融机构、政府、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供应链金融机构应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增强农业创新适配性。针对农业企业的特点和需求,开发个性化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农业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农业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研究投入和创新动力。此外,供应链金融机构还应加强与农业企业、科研机构等的合作,共同推动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其次,政府应该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完善供应链金融支持政策,加大力度鼓励和规范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推动金融创新。政府应健全供应链金融风险防控与信用体系。通过搭建农业供应链信息共享平台,整合企业研发数据、供应链交易数据、信用信息等,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降低金融机构对农业企业设定的风险溢价水平,保障供应链金融业务稳定开展。

最后,农业企业应提高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农业企业应加强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整合资源,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企业要聚焦科技创新与企业价值的转化。将供应链金融支持的资金优先投向核心技术研发,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建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加快专利技术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进程,依托供应链金融驱动的产业链协同效应,将企业创新优势转化为核心市场竞争力,最终实现“创新投入-企业价值-再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循环。

参考文献:

- [1]Xia,Y.,Long,H.,Li,Z.,&Wang,J.Farmers'Credit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Finance for Green Agriculture[J].Sustainability,2022,14(19):12836.<https://doi.org/10.3390/su141912836>
- [2]Wuttke,D.,&Schütt,J.Supply chain finance: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2016,27(2):417-438.<https://doi.org/10.1108/IJLM-04-2015-0053>
- [3]Chakuu,J.,&Oke,A.Supply chain finance: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019,22(3):217-238.<https://doi.org/10.1080/13675567.2018.1558749>
- [4]Deng,L.,Cao,C.,&Wang,S.Spillover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s under risk-sharing mechanisms[J].RAIRO-Operations Research,2024,58(1):881-908.<https://doi.org/10.1051/ro/2023185>
- [5]郭捷,谷利月.农业供应链金融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涉农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证研究[J].运筹与管理,2022,31(3):112-117.DOI:10.12005/orms.2022.0086.
- [6]谢玲红,毛世平.中国涉农企业科技创新现状、影响因素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05):87-96.DOI:10.13246/j.cnki.iae.2016.05.011.
- [7]宋华,王强,张磊.供应链金融的信用多级流转机制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7,20(4):1-15.
- [8]邵娴.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以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08):62-68+111.DOI:10.13246/j.cnki.iae.2013.08.012.
- [9]郭晔,姚若琪.中国企业协同创新中的金融角色——基于供应链关联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4,(09):89-108+206-207.

- [10]姚王信,夏娟,孙婷婷.供应链金融视角下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04):105-110.
- [11]周德良,蔡雪玲,杨雪.衍生工具使用、公司治理与企业风险[J].投资研究,2022,41(09):39-53.
- [12]韦施威,杜金岷.供应链金融如何影响企业创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23(2):62-74.DOI:10.13546/j.cnki.tjyjc.2023.02.006.
- [13]凌润泽,李彬,潘爱玲,等.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债务期限选择[J].经济研究,2023,58(10):93-113.
- [14]卜君,朱悦.供应链金融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J].财经问题研究,2024,(05):89-104.DOI:10.19654/j.cnki.cjwtyj.2024.05.007.
- [15]周德良,蔡雪玲,杨雪.衍生工具使用、公司治理与企业风险[J].投资研究,2022,41(09):39-53.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Li Baoshuo¹, Xue Ke¹, Shi Lin¹, Wang Minyi¹, Liu Xu¹

¹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A-share agricultural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10 to 2024, the study finds that: (1) Supply chain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higher level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the more patent outputs of enterprises; (2)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supply chain finance promote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hrough two intermediary paths: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ing enterprise risks;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matur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mechanism research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empower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related enterprises and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Supply chain fin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Enterprise risk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SG 表现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影响研究

黄逍遥¹

(1.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形势动荡, 汇率风险凸显, 环境、社会、治理 (ESG) 表现已成为衡量企业整体健康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的关键指标, 对企业管理汇率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 2012 年至 2022 年的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 A 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 评估了 ESG 表现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其面临的汇率风险, 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 ESG 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两条路径对汇率风险产生影响。此外, 在不同企业类型中, 国有企业和盈利企业通过提升 ESG 表现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更为显著。从 ESG 的三个分项指标来看, 环境 (E) 维度和治理 (G) 维度对企业汇率风险的解释力更强, 而社会 (S) 维度的影响相对有限。本文的研究为理解 ESG 表现与企业汇率风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并为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关键词: ESG 表现; 汇率风险; 融资约束; 盈利能力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5

一、引言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伴随着美国国债超发、欧债危机爆发、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和美国的关税政策等因素, 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 导致了全球汇率波动频繁, 国际金融和贸易市场面临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上升。这些情况对企业的影响日益显著, 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愈发复杂多变。其中, 汇率波动导致的经营风险逐步上涨, 这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财务风险不断上升。以中国为例, 近年来,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 使得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大, 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愈发突出。根据 He 等 (2021)^[1]的测算, 受到显著汇率风险影响的中国企业由 2015 年前的 12.1% 上升至 2015 年后的 20.7%。因此, 当前如何有效应对汇率风险, 成为中国企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企业汇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波动导致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或现金流量受到影响的可能性, 包括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 (张策和何青, 2022)^[2]。Bartram 和 Bodnar (2007)^[3]指出, 该现象是企业层面运营与金融对冲的内生性结果。此外, 研究发现汇率风险暴露可能与研究窗口有关, 对该问题的研究应该着眼于较长周期。蒋海等 (2023)^[4]指出, 短期汇率变动仅反映利率效应, 而长期变动需结合现金流效应, 因此短视研究可能低估暴露水平。Bartram (2007)^[5]对 6917 家美国企业的分析也证实, 长期下显著暴露的企业比例更高。综合来看, 现有关于企业汇率风险的研究已形成两大重要方向。一方面, 在风险应对策略上, 明确了外汇衍生品的运用与跨国生产布局、定价策略等运营对冲手段, 是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 在风险暴露的差异特征上, 研究揭示出企业的跨国程度、海外收入占比以及所处经济体类型等因素, 会显著影响其汇率风险暴露水平, 具体表现为跨国程度高、海外收入占比大的企业, 以及高进出口依赖度的新兴经济体企业, 往往面临更显著的汇率风险暴露 (Omar, 2017)^[6]。然而, 这些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 其多集中于特定策略的效果或部分影响因素的作用, 对于更长周期内可能影响企业汇率风险的多元因素探讨尚有不足, 这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可深入挖掘的方向。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下, 环境、社会、治理 (ESG) 表现的关注度持续攀升, 其对企业自身发展及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已不容忽视。学界已针对 ESG 表现展开大量研究, 诸多成果证实了企业提升 ESG 水平可带来多方面益处, 具备研究的必要性。有研究指出, 中小企业的 ESG 表现与数字化转型存在强关联性 (Wang & Esperança, 2023)^[7]; 在创新领域, 供应链核心企业的 ESG 表现提升能在行业内产生显著的绿色创新

作者简介:黄逍遥 (2000—),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企业汇率风险

溢出效应 (陈锐和李金叶, 2022) [8]; 就企业绩效而言, ESG 对资产回报率具有积极影响, 且相较于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 治理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更为突出 (Velte, 2017) [9]; 此外, 提升 ESG 绩效还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绿色创新, 进而推动企业价值提升 (Qian, 2024) [10]。不过, 现有文献对 ESG 表现与企业风险的研究, 多聚焦于企业自身业务层面, 例如探讨 ESG 表现能否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Song, 2024) [11]、能否降低企业破产风险 (冯乐乐和马志强, 2025) [12]等。这意味着, 关于 ESG 表现与外部风险的关系, 目前相关研究极为匮乏, 而这正是亟需填补的研究空白。基于上述逻辑, 企业或许可通过提升自身 ESG 表现来降低汇率风险, 这一方向值得深入探索。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文聚焦于 ESG 表现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影响, 旨在为企业更好地管理自身风险以及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我们利用 2012 年至 2022 年的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评估了 ESG 表现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其面临的汇率风险, 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 ESG 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两条路径对汇率风险产生影响。此外, 在不同企业类型中, 国有企业和盈利企业通过提升 ESG 表现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更为显著。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是引言, 阐述了研究动机、结论、因果识别以及研究贡献; 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计量经济学模型、变量和数据, 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 第四部分经验结果和分析, 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 包括机制分析; 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总结了研究的主要发现, 并从政策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ESG 表现与企业汇率风险研究

根据企业风险管理理论, 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风险管理策略是降低外部冲击的关键。ESG 表现好的企业通常建立了更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能够提前识别汇率波动对跨境业务、原材料成本、海外资产的潜在影响, 并通过调整业务布局降低风险敞口。

假说 1: ESG 表现能够降低汇率风险

(二)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良好的 ESG 表现是企业向市场传递“管理稳健性”的积极信号, 这种信号效应可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与风险溢价, 间接稳定企业面对汇率波动的财务表现。ESG 表现通过信号传递效应向债权人展示环境合规性、治理规范性的低风险特征, 降低贷款违约风险预期, 部分银行对 ESG 表现优异的企业提供利率优惠, 企业可以获得更低利率贷款、更高信贷额度, 地方政府通过贴息、担保等方式降低绿色项目融资门槛, 从而缓解融资约束。融资约束缓解后, 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外汇衍生品的使用来增强外汇风险对冲能力。如企业可通过银行信贷、债券发行等渠道获取资金, 用于购买外汇远期合约、货币掉期、期权等金融工具, 直接对冲汇率波动风险。例如,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 使用外汇衍生品的企业汇率风险暴露水平可降低 39.25%。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第二个假设。

假说 2: ESG 表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汇率风险

(三) 盈利能力的中介效应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需平衡股东、员工、消费者、政府等多方利益。ESG 表现好的企业通过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 增强客户忠诚度与供应链稳定性, 进而提升收入可持续性, 即品牌溢价与市场竞争力提升。除此以外, 随着可持续消费趋势兴起, ESG 表现好的企业更易获得消费者信任, 形成品牌差异化优势。例如, 全球 40% 以上消费者愿为环保产品支付 10% 以上溢价, 这种溢价直接转化为企业营收, 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调整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 实现收入与支出的自然对冲。例如, 在收入和支出使用相同货币的地区进行生产和销售, 能够减少汇率波动对利润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第三个假设。

假说 3: ESG 表现通过增强盈利能力从而降低企业汇率风险

三、研究设计

(一) 计量经济学模型

为验证上市公司 ESG 表现与汇率风险的关系, 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ER_RISK_{i,t} = \alpha_0 + \alpha_1 ESG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1)$$

在上述模型中, $ER_RISK_{i,t}$ 指企业 i 第 t 年的汇率风险, $ESG_{i,t}$ 企业 i 第 t 年的 ESG 评分, $Controls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为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 $\sum Industry$ 和年份固定效应 $\sum Year$, $\varepsilon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若假说 1 成立, 则企业汇率风险 (ER_RISK) 的回归系数将显著小于零, 表明上市公司 ESG 表现与汇率风险负向相关。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描述性统计

由于北上广深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众多且集中，国际业务往来频繁，这些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往往更为规范和详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北上广深上市公司的国际化特征使其与国外企业的可比性更强，可以为后续开展跨国比较研究奠定基础，故本文选择北上广深四市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区间自 2012 年至 2022 年。企业 ESG 表现数据选用华证 ESG 评分。人民币汇率指数以及市场收益率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其它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和 Wind 数据库。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删除金融类企业样本；（2）剔除 ST、*ST 和 PT 类样本；（3）剔除变量中数据缺失的样本。

核心解释变量为 ESG 表现 (ESG_{it})。目前较多学者选取由第三方评级机构通过调研分析得出的评分，而华证的 ESG 评级数据集成多种数据源，包括传统财务数据、新闻报道等，数据按季度进行更新，频率较快，能够更及时系统地评估企业的 ESG 表现，结合中国国情和资本市场特点，评级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市场情况，因此选取该机构数据来衡量企业的 ESG 表现。华证 ESG 评级从高到低分分别为 C、CC、CCC、B、BB、BBB、A、AA、AAA 并进行 1-9 范围的赋分。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汇率风险 (ER_RISK_{it})。企业汇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波动而使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或现金流量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一般采用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进行计算。计量层面上体现为控制了市场收益率后，企业股票收益率的变化对汇率风险变化的敏感程度，以此来测度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系数 δ_i 为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 R_{it} 为企业的股票收益率， R_{mt} 为市场收益率， R_{St} 为汇率变动率。测算的模型如下：

$$R_{it} = \delta_i + \beta_1 R_{mt} + \delta_i R_{St} + \epsilon_{it} \quad (2)$$

为控制其它可能影响企业汇率风险产生的因素，参考其它学者的研究（张策等,2024）^[13]。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上市年限（Listage）用当年年份-上市年份+1 的对数来衡量；公司成长机会（Chance）用市值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速动比率（Quick）用流动资产减存货的差值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来衡量；总资产增长率（Assetgrowth）用本年总资产与上一年总资产的比率减一来衡量；现金流比率（Cashflow）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独立董事比例（Indep）用独立董事与董事人数的比率来衡量；股权性质（Soe）当为国有企业时为 1，反之为 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总股数的比率来衡量。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汇率风险 (ER_RISK) 的最小值为 0.1001，而最大值为 11.0979，不同企业之间面临的风险差异巨大，说明可能由于企业类型或所处行业不同，存在异质性差异；企业 ESG 表现的均值与中位数都在 74 左右，说明 A 股上市企业综合评分都处于中上水平，多数企业都在生态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和提高治理水平上付诸行动，积极承担责任；KZ 指数平均值为 0.0403，而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值为 23.897，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差距较大，说明企业可能由于自身财务状况、融资方式或者风险管理水平不同，受融资约束程度也各不相同。

表 1 描述性统计

VarName	Obs	Mean	SD	Min	Median	Max
ER_RISK	9834	2.9551	3.0135	0.1001	1.8763	11.0979
ESG	9823	73.8795	4.4522	64.9300	74.0780	81.7800
Listage	9996	1.9876	0.9713	0.0000	2.0794	3.2581
Chance	7467	2.0163	1.0533	0.9371	1.6862	4.8610
Quick	9663	2.1753	1.9675	0.4158	1.4223	7.8865
Assetgrowth	9994	0.1914	0.2814	-0.1317	0.1042	0.9997
Cashflow	9996	0.0424	0.0603	-0.0773	0.0421	0.1565
Indep	9986	0.3803	0.0512	0.3333	0.3636	0.5000
Soe	9983	0.3548	0.4785	0.0000	0.0000	1.0000
Top1	9996	0.3409	0.1463	0.1358	0.3043	0.6359
KZ	8536	0.8972	2.4731	-10.2342	1.1142	13.6628
ROE	9996	0.0403	0.1366	-1.2759	0.0392	10.0322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企业 ESG 表现对汇率风险的影响，我们首先对方程（1）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 2 中第（1）列和第（2）列显示。根据表中的回归结果所示，无论是否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ESG）对企业汇率风险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系数，变量 ESG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200 和 -0.0183，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当 ESG 增加一个单位，企业汇率风险平均降低 0.0183 个单位，这可能是因为 ESG 表现良好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和长期战略规划，从而减少了汇率波动对其财务表现的影响；变量 Listage 的回归系数为 -0.7669，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上市公司年限越长，汇率风险越低，这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年限较长的企业通常具有更成熟的管理体系、更稳定的客户基础和供应链，因此可能对汇率波动更具韧性；变量 Chance 的回归系数为 0.6225，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公司成长机会

多的企业可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市场,从而增加了其汇率风险暴露,因为成长型公司可能更频繁地进行跨境交易,导致更高的汇率风险;变量 Assetgrowth 的回归系数为 0.7871,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总资产增长率高的企业可能在扩张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国际业务和汇率风险暴露,快速增长的公司可能需要更多的跨国投资和融资,从而增加了汇率风险,上述结果证明了本文的假说 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ER_RISK	ER_RISK
ESG	-0.0200** (0.0091)	-0.0183* (0.0096)
Listage		-0.7669*** (0.1873)
Chance		0.6225*** (0.0580)
Quick		-0.0348 (0.0372)
Assetgrowth		0.7871*** (0.1655)
Cashflow		-0.2741 (0.6274)
Indep		1.0709 (0.9878)
Soe		0.3077 (0.2464)
Top1		-0.2432 (0.3673)
Constant	4.4596*** (0.6753)	4.1230*** (0.9089)
Firm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ervations	9,684	7,334
Adjusted R-squared	0.214	0.219

注: ①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②***、**、*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二) 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检验。参考 Cai 和 Hao (2025)^[14]的方法,使用省内同行业其它上市公司同年度 ESG 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使用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合理且有效,ESG_AVE 值与 ESG 表现可能存在相关性,但与企业汇率风险无直接关联,并且满足弱工具变量条件,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我们分别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和广义矩估计 (GMM)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表 3 中第 (1) 列为 2SLS 结果,其中 ESG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 ESG 表现可以降低企业汇率风险。表 3 第(2)列为 GMM 结果,其中 ESG 系数仍显著为负,这表明基础回归结果仍旧可信。

表 3 工具变量模型结果

VARIABLES	(1)	(2)
	2SLS	GMM
ESG	-0.0532** (0.0207)	-0.0684*** (0.0101)
Constant	5.2506*** (1.4850)	6.612*** (0.800)
Control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ervations	7,334	7,334

注: ①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②***、**、*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五、进一步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 ESG 表现对企业汇率风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说 2 和假说 3, 从融资约束和盈利能力两条路径探讨 ESG 表现对企业汇率风险敞口的影响机制, 我们构建以下中介模型:

$$KZ_{i,t} = \beta_0 + \beta_1 ESG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3)$$

$$ROE_{i,t} = \gamma_0 + \gamma_1 ESG_{i,t} + \gamma_2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4)$$

(一) 融资约束机制

为了研究融资约束在 ESG 表现和企业汇率风险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 我们参考(Zhou 等,2022)^[15]的做法, 将 KZ 指数作为机制检验变量。该指数用于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标, 指数越大, 上市公司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KZ = \sum_{i=1}^5 KZ_i (1\{KZ_i < median(KZ_i)\}) \quad (5)$$

五个指标分别是当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期初总资产、当期现金股利/期初总资产、当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初总资产、资产负债率和托宾 Q 值; 采用逻辑排序回归, 以 KZ 为因变量, 对 KZ1-KZ5 进行回归, 估计各变量回归系数, 最终计算出每一家上市公司年度 KZ。

它的优点在于从多维度的财务指标出发综合考虑了企业的现金流、股利分配、现金持有、负债水平和资产市场价值等因素, 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企业面临的财务约束状况, 构建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

在表 4 第 (1) 列为实证结果, ESG 的系数为 -0.0261,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ESG 表现越好, KZ 指数越低。企业融资约束得到缓解, 能降低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 验证了假说 2。这可能是因为 ESG 表现更好能够增强信息透明度与信任度、提升企业声誉与品牌价值、降低经营风险与不确定性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企业因此拥有更强的汇率风险对冲能力, 更能够在汇率波动时积极减少汇率风险暴露, 形成了“ESG↑—融资约束↓—汇率风险↓”的传导路径。

(二) 盈利能力机制

为了研究盈利能力在 ESG 表现和企业汇率风险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 选择权益净利率 (ROE) 作为机制检验变量。该变量是衡量公司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它反映了公司利用股东权益创造利润的能力, 高 ROE 可能意味着公司有更高效的资产利用方式或更低的成本结构, ROE 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公司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盈利水平, 其计算公式是公司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市值, 因此本文选择该指标反映财务绩效。

在表 4 第 (2) 列为实证结果, ESG 的系数为 0.0033,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ESG 表现越好, ROE 越高, 即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企业获利能力增强有利于降低了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 验证了假说 3。这可能是由于 ESG 表现还可以使企业获取品牌溢价、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营运效率与稳定性, 因此企业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最终增强企业风险缓冲与应对灵活性, 提高企业信用资质, 最终实现汇率风险降低, 形成了“ESG↑—盈利能力↑—汇率风险↓”的传导路径。

表 4 机制检验

VARIABLES	(1) KZ	(2) ROE
ESG	-0.0261*** (0.0051)	0.0033*** (0.0008)
Constant	1.5936*** (0.4957)	-0.1540** (0.0746)
Control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ervations	7,334	7,330
Adjusted R-squared	0.839	0.326

注: ①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②***、**、*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六、结论

本文利用 2012 年至 2022 年的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评估了 ESG 表现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ESG 表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机制分析表明, ESG 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强盈利能力以降低汇率风险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虽首次构建 ESG 与企业汇率风险的关联框架, 为理解非金融因素对跨境风险的影响提供了突破性视角, 但在学术探索维度仍存在多维度拓展空间。样本方面, 可从北上广深 A 股上市公司扩容至全国多区域、多行业, 纳入专精特新企业及跨境业务占比差异显著群体, 并开展新兴与发达经济体跨国对比, 捕捉不同制度环境下 ESG 作用的异质性; 方法上, 可引入随机森林、梯度提升等机器学习模型及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等因果推断算法, 突破传统线性回归局限, 精准刻画关系; 机制分析可进一步探索供应链韧性、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及动

态机制差异；跨国比较可深化制度差异的微观传导，对比欧盟 SFDR 与美国 SASB 标准下 ESG 披露质量对汇率风险管理的影响，为中国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依据；还可融入环境经济学、国际商务学、复杂系统理论等跨学科视角，以深化理论认知并为实践与政策制定提供更普适的指导。这些拓展不仅能深化对 ESG 在全球风险治理中作用的理论认知，更能为企业跨境经营的风险管理实践与政策制定提供更具普适性的指导。

参考文献:

- [1] He Q, Liu J, Zhang C. Exchange rate exposure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 65: 101579.
- [2] 张策, 何青. 上市企业汇率风险暴露及影响因素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 2022, (07): 41-54.
- [3] Bartram S M, Bodnar G M. The exchange rate exposure puzzle[J]. *Managerial Finance*, 2007, 33(9): 642-666.
- [4] 蒋海, 吴文洋, 赵安然. 逆周期因子、汇率波动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J]. *世界经济研究*, 2023, (01): 70-85+135. DOI:10.13516/j.cnki.wes.2023.01.007.
- [5] Bartram S M. Corporate cash flow and stock price exposures to foreign exchange rate risk[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7, 13(5): 981-994.
- [6] Omar A, Taufil Mohd K N, Ahmad N. Exposure to foreign exchange rate risk: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s[J]. *Journal of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7, 2(5): 79-91.
- [7] Wang S, Esperança J P. 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market and ES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SM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3, 419.
- [8] 陈锐, 李金叶.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汇率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资产价格与流动性错配的中介效应[J]. *金融监管研究*, 2022, (01): 58-78. DOI:10.13490/j.cnki.fir.2022.01.004.
- [9] Velte P. Does ESG performance have an impact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Germany[J]. *Journal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2017, 8(2): 169-178.
- [10] Qian S. The effect of ESG on enterprise value under the dual carbon goa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green innovatio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93: 318-331.
- [11] Song B. The ESG Performance and Business Operational Risk[J]. 2024.
- [12] 冯乐乐, 马志强. ESG 表现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耐心资本的传导机制分析[J]. *调研世界*, 2025, (11): 3-14. DOI:10.13778/j.cnki.11-3705/c.2025.11.001.
- [13] 张策, 梁柏林, 何青.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03): 58-76.
- [14] Cai T, Hao J. The Influence of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n Enterprises' Export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5: 103917.
- [15] Zhou G, Liu L, Luo 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G performance and company market value: Mediating effect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2, 31(7): 3371-3387.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SG Performance on Enterprise Exchange Rate Risk

Xiaoyao Huang¹

¹*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mid volatile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and heightened exchange rate risk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performance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indicator for assessing corporate health and growth potential,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managing exchange rate risk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SG performance on exchange rate risk us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from 2012 to 2022.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enhanced ESG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reduces exchange rate risks, with this conclusion remaining valid after rigorous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tically, ESG performance mitigates exchange rate risks through two pathways: eas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boosting profitability. Notabl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ofitable firms show more pronounced risk-reduction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y types. Among ESG sub-indicators, environmental (E) and governance (G) dimensions demonstrate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while social (S) dimensions exhibit relatively limited influe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SG performance and exchange rate risks, offering micro-leve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corporate exchange rat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ESG performance; exchange rate risk; financing constraints; profitability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三大机制的研究

聂曼琪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0000)

摘要: 面对农业生产分散、集约化水平偏低、基础设施滞后及劳动力素质不足等挑战, 传统劳动密集型模式已制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 数字普惠金融为破解农业融资约束、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在厘清相关概念基础上, 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度了 2012—2022 年全国城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并从时空维度分析了地区差异。研究发现: 第一, 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呈上升趋势, 但东部与省会城市发展较快, 西部地区相对缓慢;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稳步增长, 技术进步贡献突出。第二, 数字普惠金融、地方财政支持、城镇化与工业化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而外商投资作用不显著。第三, 农村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中介渠道; 基础设施的中介作用尚不充分, 需进一步加强建设以释放其潜能。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覆盖广度; 数字化程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6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 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此战略背景下, 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已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核心路径。

数字技术的兴起为普惠金融的深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拓宽触及范围, 有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约束, 优化资源配置, 并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动能。然而, 受区域数字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及用户素养等因素影响,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面临显著的“数字鸿沟”, 制约了其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 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之间存在动态互促关系。TFP 的提升意味着在既定要素投入下获得更高产出, 能够推动农业向集约化、可持续方向转型。同时, 乡村振兴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融合与人力资本积累, 为农业 TFP 的增长提供了制度与环境基础。

鉴于此, 本文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与实证效应, 旨在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助力农业效率变革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学理依据与政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 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1.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 ATFP) 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通过投入各种生产要素 (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 所获得的产出效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Solow (1957) 开创性地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概念, 揭示了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后超越其基本贡献的产出差额。这一差额源自于技术进步的推动, 因而 TFP 又被称为技术进步速度。Griliches (1957) 首次将 TFP 的概念引入美国农业领域, 研究显示, TFP 对美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 聂曼琪(1996—),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通讯作者: 聂曼琪

用。自此,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开始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Jorgenson and Gollop (1992) 通过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农业和私人非农业生产部门农业 TFP 的表现,发现 82% 的农业经济增长来源于农业 TFP 的提升。从理论层面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应直接反映在经济学中,具体表现为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与资金、劳动力增长速度之差(陈西晨, 2020)。农业 TFP 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发展模式的关键。因此,科学地测算中国农业 TFP 的变化趋势并探究其驱动因素,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2.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的形成机制在理论层面可归纳为三个系统的影响路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基础设施网络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产业集聚外部性构建基础性支撑体系;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技术诱导机制和资源配置优化机制驱动绿色转型,但其效应受区域制度环境的调节;对外经济关系则依托技术溢出和市场引致双重路径发挥作用,其传导效率取决于本地吸收能力与制度适配性。

现有研究从五个理论维度对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性阐释。其时变效应分析表明,制度变迁与生产率提升之间存在动态耦合关系,不同制度变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李谷成等, 2018)。空间异质机制研究揭示了集聚效应、政策响应等机制均存在区域门槛特征,其效能与地区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薛蕾等, 2020)。在交互传导机制方面,学者发现财政支出、产业政策等变量往往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中介渠道间接作用于生产率(叶初升等, 2016)。效率分解框架进一步厘清了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在影响机制中的差异化作用,例如农业保险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而非改善技术效率来推动生产率增长(李燕等, 2018)。系统耦合研究则构建了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互馈模型,揭示出耕地多功能与农业 GTFP 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及滞后效应(张丝雨等, 2022)。

在具体要素层面,劳动力通过流动重置效应与素质提升效应形成双重驱动,其中人力资本积累直接影响技术吸纳能力(郑晶等, 2021; 刘成坤等, 2021)。技术要素依托知识溢出与创新转化两条路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技术扩散,而科技人力资本则直接推动前沿技术进步(张恒等, 2021; 传喜等, 2021)。基础设施通过硬件效率改善与软件服务优化协同发挥作用,水利和机械化设施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配套服务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张永强等, 2017)。金融支持体系则通过风险分散与流动性供给双重机制缓解生产约束,农业保险降低创新风险,农业信贷促进规模经营(金绍荣等, 2022)。这些研究从多维度揭示了农业绿色转型的复杂机制,构成了理解农业 GTFP 演进的理论基础。

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测度受数据选取、时间跨度与计量方法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细微差异可能导致结果产生较大偏差。当前研究主要采用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分析 (SFA)、数据包络分析 (DEA) 及 Malmquist 指数等主流方法。

基于 DEA 框架的研究中,姚长林等 (2020) 测度了 2006—2017 年重庆市农业 TFP,并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探讨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肖琴等 (2020)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 (DDF) 模型,对 2004—2018 年中国 30 个省市的农业绿色 TFP 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分析了要素利用潜力与产出结构。

在采用 Malmquist 指数的研究中,张杨等 (2020) 以贵州省为例,测算了 2010—2017 年农业 TFP 并分解其构成,发现该省农业 TFP 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的改善。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 (SFA) 的研究则侧重于生产函数的构建与区域差异分析。高齐圣等 (2021) 基于 SFA 方法测度农业 TFP,发现其在我国区域间分布不均衡,部分省份呈现极化特征,并证实农业 TFP 增长与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提升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综上所述,尽管研究方法视角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共同指出技术进步是推动农业 TFP 提升的关键动力,这为理解农业效率演进提供了一致的经验依据。

(二)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

1.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

普惠金融自 2005 年在中国推行以来,持续获得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2015 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明确其以机会平等、商业可持续为原则,旨在通过政策引导与金融体系优化,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适当、有效、可负担的金融服务。Simon Neaime (2018) 指出,金融资源向富裕群体的过度集中会削弱金融包容性,阻碍城乡协调与共同富裕进程;普惠金融则有助于缓解金融排斥,提升对弱势群体的服务覆盖,推动建设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

作为现有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普惠金融亦是促进社会公平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郭峰等 (2020) 将其界定为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支撑、面向社会各阶层的金融服务制度。何文秀 (2020) 则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构建方法,对中国各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展开系统评估,相关研究既揭示了

区域间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也为政策制定与规划实施提供了实证依据。

2. 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借助移动支付、互联网银行等技术手段,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与便捷性,尤其在传统金融覆盖薄弱的区域表现突出。它不仅拓宽了小微企业及个人的融资渠道,也通过增强市场竞争降低了服务成本。

现有研究围绕其经济与社会效应展开多方面探讨。任碧云与李柳颖(2019)基于京津冀乡村多源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与数字化投资、信贷等因素共同推动乡村经济包容性增长。熊德平等(2019)运用非平衡效应与Gonheit效应等计量方法,证实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黄倩等(2019)进一步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人群的影响显著大于富裕群体,凸显其在减贫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微观层面,郭华、周利(2020)等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影响;杨波等人(2020)发现其能显著提高农户的正规信贷意愿,且在乡村与中西部地区影响更为突出。陈宝珍等(2020)的研究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增强农户金融信息获取能力,缓解金融排斥。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张林(2021)基于贫困县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其对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葛和平(2021)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了其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机制。谢汝宗(2022)以广东城市为样本,运用PVAR模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短期内可能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但长期有助于推动产业转型与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王晶晶(2021)进一步指出,在信用体系支撑下,资金向规模化与前瞻性行业流动,可促进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链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三) 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表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与数字普惠金融各自作为独立研究方向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将二者结合、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TFP机制的文献仍较为有限,尤其在农业大省及地市级层面的实证研究尚处初步阶段。根据现有理论基础与研究缺口,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H1: 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融资可得性,有助于缓解农户与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约束,支持农业技术采纳与生产规模扩大,从而直接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郭锐欣、陈艳, 2024; 赵辰泽, 2024)。

H2: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信息化水平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实时市场信息、加强数据分析和优化资源配置,能够改善农业生产决策效率,推动农业生产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型,从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H3: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村教育与培训资源获取,缓解农村家庭的教育融资约束,支持人力资本积累(晏晓钰、黄永兴, 2024)。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增强技术吸收能力与经营管理效率,进而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H4: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水利、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降低农业生产与流通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物质基础。

以上四个假设系统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框架,为后续实证检验提供了明确的研究方向。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数据与来源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携手蚂蚁集团研究院,共同推出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它不仅成为了当下使用最广泛的衡量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更是具备卓越的代表性。本文因此选取此指数作为主要的度量工具,来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本文基于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 变量定义

在核心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采用了北京大学互联网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ndex)的对数形式,以全面反映2011-2021年间的动态变化。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并综合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从业

人口数、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灌溉有效面积、农药实际施用量以及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等作为投入变量。通过运用 DEAP2.1 软件，本文精确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表 1 变量的选取与计算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计算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index	
控制变量	财政支出水平	gov	各地市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城镇化水平	urb	各地市非农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
	工业化进程	indu	各地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经济发展水平	cd	人均 gdp
	信息发展水平	id	邮电业务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机制变量	农业人力资本水平	edu	初中毕业生人数取对数
	农业电力基础设施	agif	农村用电量取对数

(二) 模型构建

首先构建基本模型，如下公式：

$$TFP_{it} = \beta_0 + \beta_1 \ln index_{it} + \rho \lambda n X_{it,n} + \epsilon_{it}$$

上式中 TFP_{it} 表示城市 i 在 t 时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ln index_{it}$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X_{it,n}$ 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影响因素，即控制变量， n 为因素种类，主要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进程、外资投入水平，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避免遗漏变量引起结果不准。计量模型最终如下：

$$TFP_{it} = \beta_0 + \beta_1 \ln index_{it} + \beta_2 gov_{it} + \beta_3 urb_{it} + \beta_4 indu_{it} + \beta_5 cap_{it} + \epsilon_{it}$$

上式中， gov 表示财政支出水平， urb 表示城镇化率， $indu$ 表示工业化进程， cap 表示外商投入水平。 β_0 表示常数项， ϵ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β 表示待估参数。

(三) 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

研究涉及了 330 个样本，这表明研究覆盖了相对较大的数据集，有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可靠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最小值为 61.47，最大值为 460.69，平均值为 262.394，标准差为 92.241。这说明在研究样本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好，而有些地区则较差。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最小值为 88.3，最大值为 114.3，平均值为 103.792，标准差为 2.992。这表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不大，整体上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330	61.47	460.69	262.394	92.241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330	88.3	114.3	103.792	2.992
人力资本水平	330	0.008	0.042	0.02	0.006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235	9.5	12.94	11.712	0.83
信息化水平	250	0.02	2.52	0.073	0.165
财政支持力度	220	0.11	0.76	0.268	0.127
城镇化水平	250	0.36	0.9	0.586	0.109
工业化进程	253	0.06	0.54	0.319	0.091
经济发展水平	330	263.4	12130.7	3919.698	2638.766

2.单位根检验

想要进行面板多元回归，就需要保证全部数据是平稳的。基于此，本文以单位根方法进行检验。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 LLC 检验中，全部变量均显示平稳；在 HT 检验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变化、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财政支出水平、外资投入水平、农业电力基础设施显示平稳；IPS 检验中，全

部变量均显示平稳；在 ADF-Fisher 检验中，仅效率变化、城镇化水平、外资投入水平未能通过检验；在 PP-Fisher 检验中，仅信息化水平和农业电力基础设施未通过检验，综上实证检验，可以认为所选变量均是平稳序列。

表 3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	LLC 检验	HT 检验	IPS 检验	ADF-Fisher	PP-Fisher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13.1243***	-0.2583***	-5.4395***	59.2482*	177.4187***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17.7275***	0.2546**	-3.9279***	58.7369**	541.4179***
财政支出水平	-3.2281***	0.1706***	-2.7336***	126.8738***	50.9457**
城镇化水平	-17.0828***	0.4273	-9.0876***	39.437	45.6367*
工业化进程	-3.8830***	0.5028	-6.4778***	139.5271***	43.5378*
经济发展水平	-11.3767***	-0.1258***	-3.2987***	3.7087	63.0368***
信息化水平	-9.8604***	0.6678	-2.4352*	61.733**	19.0071
农业人力资本水平	-4.8679***	0.3409	-3.0377***	34.0494	161.199***
农业电力基础设施	-3.2936***	0.3158*	-2.7961*	106.8096***	7.6735

注：***、**、* 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

四、Robust 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 0.005，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加 0.005 个单位。t 值为 4.822，用于检验回归系数是否显著不为零。通常，如果 t 值的绝对值大于 2（在统计学中这是一个常用的临界值），则认为该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在这个案例中，t 值为 4.822，远大于 2，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统计上显著的。Robust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4 Robust 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p	95% CI	2	调整 R ²
常数	105.294	0.284	370.208	0.000**	104.736~105.851	0.0031	0.0028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005	0.001	4.822	0.000**	0.007 ~ 0.003		

五、机制分析

在构建的经济模型中，本文引入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严谨的统计分析发现，该指数的系数为 0.006，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p<0.01)，这一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它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我们还考虑了人力资本水平这一因素。研究显示，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 88.415，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 (**p<0.01)，这说明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高人力资本水平意味着农业工作者拥有更好的知识和技能，这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创新。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其水平的系数为 0.803，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 (**p<0.01)，这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提高市场流通效率，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业经济的繁荣。

最后，信息化水平的系数为 0.100，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 (**p<0.01)，这说明信息化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信息化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还能够帮助农民及时获取市场信息，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六、结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连接数字技术与农村金融体系的关键纽带，对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信息化建设、人力资本积累与基础设施改善三条路径实现。研究同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效果受地方数字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环境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

影响。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实施差异化区域推进策略，重点加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着力弥合“数字鸿沟”；第二，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与管理各环节的深度融合；第三，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特点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体系，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与数据安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数字金融服务在不同农业经营模式中的作用差异，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绿色转型的长期动态效应，为完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提供更丰富的理论参考。

表 5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水平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信息化水平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常数	109.376** (88.823)	0.019** (7.148)	12.105** (41.878)	0.069** (0.547)	117.415** (29.927)
财政支持力度	2.447 (1.769)	-0.021** (-6.871)	-4.058** (-12.498)	0.020* (0.138)	1.012 (0.505)
城镇化水平	-14.676** (-9.374)	0.002 (0.575)	-0.769* (-2.093)	-0.193* (-1.195)	-15.486** (-10.179)
工业化进程	3.459* (2.437)	0.003 (0.834)	1.706** (5.119)	0.182 (1.247)	4.620** (3.159)
经济发展水平	0.000 (0.770)	-0.000** (-3.096)	0.000** (6.249)	-0.000** (-1.168)	0.000* (2.405)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006** (3.485)	0.000** (5.630)	0.001 (1.638)	0.000 (1.860)	0.005* (2.585)
人力资本水平					88.415** (2.802)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0.803** (2.755)
信息化水平					0.100** (0.158)
样本量	220	220	220	220	220
R 2	0.44	0.422	0.78	0.023	0.492
调整 R 2	0.427	0.409	0.775	0	0.473
F 值	F(5,214)=33.6 20,p=0.000	F(5,214)=31.296 ,p=0.000	F(5,214)=152.05 4,p=0.000	F(5,214)=1.021,p=0.0 06	F(8,211)=25.542,p=0 .000

参考文献：

[1]Solow, Robert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

[2]Jorgenson D. W, Gollop F. M.Productivity growth in U. S. agriculture. a postwar perspective.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2,74(3):745-750.

[3]Sun Yongchu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gricultur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2022.

[4]Sheng Yu,Ball V. Eldon,Erickson Kenneth,Mesonada Carlos San Juan. Cross-country agricultural TFP convergence and capital deepening: evidence for induced innovation from 17 OECD countries[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22,58(2-3).

[5]Lili Gao,Dianshuang Wang.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J]. A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Business and Accounting,2022, 77 (8) .

- [6]Cheng Chen,Li Siming,Han Jiajun. Origin matters: How does institution imprint affect family business TFP?[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22,83.
- [7]Li Zhao,Lv Bingya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evidence from 2007 to 2017[J]. Applied Economics,2021,53(60).
- [8]Shanwen Tan,Wenzhe Zheng,Yehui Wang. A Study on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Urban House Price Rising on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2021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2021,37.
- [9]郭峰,王靖一,王芳,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 (季刊),2020,19(4):1401-1418.
- [10]葛和平,张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财会月刊,2021(09):135-141.
- [11]张林.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21(06):51-59.
- [12]王晶晶.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青岛大学,2021.
- [13]谢汝宗,杨明婉,白福臣.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广东省地级面板数据的 PVAR 动态分析[J].调研世界,2022(02):59-70.
- [14]申云,李京蓉.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空间分异[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22(4):82-95.
- [15]武佳藤.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21.
- [16]王晶晶.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青岛大学,2021.
- [17]康超. 农村普惠金融、资源错配与城乡经济融合 ——兼论数字新基建的调节效应[J]. 中国流通经济,2022,36(12):102-113.
- [18]刘艳.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1,37(21):123-126.
- [19]葛和平,高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财会月刊,2021(24):144-151.
- [20]顾晟景,周宏.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影响路径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43(03):106-116.
- [21]金绍荣,任赞杰,慕天媛.农业保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J].宏观经济研究,2022(01):102-114+160.
- [22]任健华,雷宏振.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J]. 社会科学家,2022(6):86-95.
- [23]甘天琦,杜建国,李波.中国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J].经济问题,2022(04):101-107.
- [24]邹玉友,丛亿,韩苗等.东北黑土区数字普惠金融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4:1-12.
- [25]郭锐欣,陈艳.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 279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浙江学刊,2024(02):142-147.
- [26]赵辰泽,刘玥岷,陈池波.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生产力研究,2023(12):124-128.
- [27]晏晓钰,黄永兴.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常州工学院学报,2024,37(02):47-54+94.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 Study Based on Three Mechanisms

Manqi Ni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fragment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ow intensification, lagging infra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labor quality, traditional labor-intensive models have constrained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ffers a new pathway to alleviate agricultur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enhanc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relevant concept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to measure agricultural TFP across Chinese cities from 2012 to 2022 and analyzes regional disparities from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1)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xhibits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developing faster in eastern and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while progress is relatively slower in western regions; agricultural TFP shows steady growth, wi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king a prominent contribution. (2)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local fiscal suppor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 agricultural TFP, whereas foreign investment shows no substantial effect. (3)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serve as important mediating channels through which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nhances agricultural TFP;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frastructure remains incomplete, necessitating further construction to fully realize its potential.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overage breadth; Degree of digitization

越权代表与公司担保的规范与法理研究评述

任奎均¹

(1.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天津 300000)

摘要: 本文通过梳理本土法文献, 揭示论争演进脉络。本土法历经“合同无效主导”“规范性质争议”“越权代表路径统一”“规则完善与反思”四阶段, 当前已形成“代表权法定限制+相对人合理审查”的主流框架, 《担保制度解释》明确相对人善意时担保合同对公司生效, 非善意时对公司不生效, 责任分担需结合过错认定。现有研究虽达成规范属性、审查义务、效果归属三大共识, 但在特殊主体审查义务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后规则体系化适用、比较法本土化适配方面仍存不足, 现实意义不足, 未能给法院裁判思路, 担保相对人, 企业合规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议, 未来研究应细化差异化审查义务标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体系化解释、强化比较法本土化改造与实证研究, 并关注公司治理与交易安全的动态平衡, 通过完善内部治理、引入保险机制、探索数字化审查等路径, 实现规范逻辑与商事实践的精准对接。

关键词: 越权代表; 公司担保; 相对人善意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8

一、问题之所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3号)第20条尽管区分代表权意定限制和法定限制两种情形来评判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法律效力, 并规定代表权属于法定限制类型的, 相对人应尽合理审查义务, 但依然没有针对性地回应现有争论焦点, 而且对代表权意定限制下相对人的审查义务未予以明确, 产生了新的困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 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 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17条、第18条、第20条仅针对诸多越权代表行为类型中的越权担保加以规定, 不具有普适性, 且存在些许含糊甚至是有待商榷之处, 也未能有效澄清司法适用中的困惑。同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不得不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5条(修改前16条)的规范性质与法律效果展开, 其本质是公司内部治理程序限制与外部交易安全保护的价值冲突。具体而言, 该问题可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 构成当前理论与实务争议的“靶心”。

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范属性界定。该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 但其性质究竟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管理性规定”还是“代表权法定限制规范”, 直接影响担保合同效力的判断逻辑。若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违反则合同无效; 若为管理性规定, 其效力仅及于公司内部, 不约束善意相对人; 若为代表权法定限制规范, 则需结合相对人善意恶意判断行为效果归属, 而非直接判定合同效力。这一争议自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增设该条以来始终存在, 成为后续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²

其二, 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标准与审查义务边界。在越权代表路径下, 相对人善意与否是决定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的关键, 但“善意”的判断标准长期模糊。司法与学界曾就相对人应承担“形式审查义务”³“实质审查义务”还是“合理审查义务”⁴展开激烈争论: 形式审查仅要求核对决议文件的形式完整性(如是否有签字盖章),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制定了《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

作者简介: 任奎均(2004—),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²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J], 《法学研究》, 2011, (6): 126-135。

³参见李金泽: “《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新规定的质疑”, 《现代法学》, 2007年1期, 第84—89页; 梁上上: “公司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审查义务”, 《法学》2013年第3期, 第21—31页。

⁴在《民法典》颁布以后,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提出了合理审查标准。

意见稿)》并于2019年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8条确立了该标准,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银行工作人员不是笔迹鉴定专家,银行也缺少进行实质审查的技术能力,银行对决议仅负有形式审查的义务,即银行的审查义务仅限于从表面上审查董事会决议的形式要件是否符合规定,而对决议实质真伪则无审查义务。”;实质审查要求核实决议的真实性、表决程序合法性及签字真伪;合理审查则介于二者之间,强调“审慎的形式审查”。此外,审查对象是否包含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不同主体(如金融机构与自然人)的审查义务是否存在差异,亦为争议焦点。⁵

其三,相对人非善意时的法律效果与责任分担。若相对人明知或应知法定代表人越权(即非善意),担保合同的效力状态(无效、效力待定或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及责任分配规则尚不统一:有观点认为合同无效,公司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有观点主张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无权代理规则,合同效力待定,公司不追认则由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按过错分担损失;还有观点认为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公司可能因内部管理过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一争议直接关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平衡。⁶为了回应这些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1条第3款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4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这些立法规范虽然将相对人主观心理状态纳入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法律效力的判断体系,以保护法人财产安全,兼顾交易秩序与相对人的信赖保护,但并未全面回应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诸多争议。上述问题不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体系衔接,更关乎公司治理安全与商事交易效率的动态平衡,亟须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厘清争议脉络与法理逻辑。

二、论争之由来及其发展

立法、学说与司法的互动演进我国关于越权代表与公司担保的论争,随立法修订与司法实践逐步深化,可分为四个关键阶段:

第一阶段(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期):担保能力限制与合同无效主导(1993—2004年)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0条仅限制“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未明确公司整体的担保能力,且未规定法律效果。此时学界与司法实践均以“合同无效说”为主,认为违反该条的担保合同因缺乏合法授权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中福实业公司借款担保纠纷案”最高(2000)经终186号民事判决书中指出,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⁷。彭万林在《民法学》中主张,该条旨在保护公司资产安全,若认可合同有效,将纵容董事滥用职权。⁸

第二阶段(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至《九民纪要》前):规范性质争议与裁判分歧(2005—2018年)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增设公司担保决议机制,区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但规范性质认定分歧加剧,形成三派观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说:李金泽认为,该条涉及公司资产安全与中小股东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则担保合同无效⁹;部分法院在早期裁判中采纳此观点,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苏民二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管理性规定说:梁上上主张¹⁰,该条仅规范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属于管理性规定,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案”(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民事判决中明确,公司内部决议瑕疵不影响外部合同效力。

代表权法定限制说:钱玉林在《法学研究》中首次提出,该条本质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而非直接调整合同效力的规范,合同效果需结合相对人善意恶意认定;¹¹杨代雄进一步指出,该条的核心是“划分代表权边界”,相对人需审查决议以证明善意。¹²此阶段司法裁判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在“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案”(2015)民提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中采“代表权限制说”,而在“中国建材集团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

⁵王利明:论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以《合同编解释》第20条为中心[J].中外法学,2024,(1):84105.

⁶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J].现代法学,2021,43(6):1834.

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经终字第186号.

⁸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89.

⁹李金泽:《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新规定的质疑[J].现代法学,2007,(1):8489.

¹⁰梁上上:公司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审查义务[J].法学,2013,(3):2131.

¹¹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J].法学研究,2011,(6):126135.

¹²杨代雄:公司为他人担保的效力[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1):3747.

(2011)民提字第307号民事判决中仍采“管理性规定说”，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¹³。

第三阶段（《九民纪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期）：越权代表路径统一与规则细化（2019—2020年）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确立“越权代表”裁判路径，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为代表权法定限制，以相对人善意认定合同效力：相对人善意（对决议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则担保合同有效，非善意则无效¹⁴。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进一步细化规则：将相对人审查义务从“形式审查”升级为“合理审查”，明确“合理审查”需包括决议机构适格性、表决比例合规性、签字主体与登记信息一致性¹⁵；区分“合同效力”与“效果归属”，规定相对人非善意时“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而非直接认定合同无效¹⁶；明确公司责任分担规则：非善意相对人不得主张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但公司有过错（如公章管理不规范）的，需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¹⁷。学界对此路径广泛认同，高圣平主张“合理审查”本质是“审慎的形式审查”，无需鉴别签字真伪¹⁸；王利明则强调审查义务需满足“法定性、公开性、效率性”三大要求，即审查对象限于法定公开文件（如章程、工商登记信息），避免过度增加交易成本¹⁹。

第四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至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规则完善与法理反思（2021年至今）。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后，第15条延续担保决议机制，但进一步明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担保金额限制”等规则，文献争议聚焦于三方面：相对人审查义务的范围：吴越主张，相对人需审查公司章程中“担保限额”条款，超出限额部分对公司不发生效力²⁰；而蒋大兴认为，章程中的担保总额限制属于内部信息，相对人无审查义务²¹；公司责任的归责原则：高圣平、王建文等主张，相对人非善意时，公司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应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由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按过错分担损失²²；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则认为，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选任与监督存在天然过错，需承担过错推定责任²³；无权代理规则的类推适用：潘运华指出，越权代表与无权代理在“效果归属”逻辑上具有同质性，相对人非善意时可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1条，赋予公司追认权，未追认则由法定代表人承担责任²⁴；谢鸿飞则反对类推，认为代表与代理存在本质差异，法定代表人行为视为公司行为，不得类推适用代理人责任规则²⁵。

三、简要评析

当前文献已形成三大共识：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范属性为“代表权法定限制”，而非效力性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一共识统一了裁判路径，避免了“合同效力二分法”的僵化；二是相对人审查义务的核心为“合理审查”，介于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间，既保护交易安全，又避免过度增加相对人成本；三是相对人非善意时，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需区分“合同效力”与“效果归属”，这一区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范意旨，实现了法理逻辑的自治²⁶。

争议与不足。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特殊主体审查义务差异研究不足，文献多聚焦一般相对人，

¹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26号;(2011)民提字第307号.

¹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718条.

¹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7条.

¹⁶同上，第7条第1款.

¹⁷同上，第17条.

¹⁸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J].现代法学,2021,43(6):2728.

¹⁹王利明.论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以《合同编解释》第20条为中心[J].中外法学,2024,(1):9293.

²⁰吴越、宋雨.公司担保合同中相对人审查义务的边界[J].甘肃社会科学,2020,(4):153.

²¹蒋大兴.超越商事交易裁判中的“普通民法逻辑”[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2):910.

²²高圣平.试论公司担保中的无权代理——基于裁判分歧的展开和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2,(5):6465;王建文.《民法典》框架下公司代表越权担保裁判规则的释论[J].法学论坛,2022,(5):31.

²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138.

²⁴潘运华.越权代表行为效力规范释论[J].政治与法律,2024,(7):169170.

²⁵谢鸿飞.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缔约行为的法律评价[J].法学杂志,2024,(6):3334.

²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7条;王利明.论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以《合同编解释》第20条为中心[J].中外法学,2024,(1):95.

对自然人相对人（如民间借贷中的个人）、金融机构（如银行）的审查义务差异探讨较少。例如，自然人是否可因“非专业主体”降低审查义务，金融机构是否因“专业能力”需承担更严格审查义务，尚未形成统一观点²⁷；第二，《公司法》修订后规则的体系化适用欠缺。2024年《公司法》第十五条新增“担保金额限制”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规则，但文献未充分探讨这些规则。第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的衔接存在不足，如章程中“单项担保限额”是否属于相对人审查范围²⁸；

四、未来研究展望

1. 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体系化解释。针对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的新增规则，需进一步明确：一是章程中“担保限额”的审查义务，可规定“单项担保限额”属于相对人审查范围，“担保总额限额”因相对人难以知悉而豁免审查；二是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审查义务，相对人需审查决议中是否排除关联股东表决权，否则构成非善意²⁹。同时，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二条（法定代表人责任追偿）的衔接，明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全额追偿³⁰。

2. 细化特殊主体的审查义务规则。未来可结合交易主体类型与交易场景，构建差异化审查义务标准。对自然人相对人，可降低审查义务至“形式审查”（如仅需核对决议文件是否存在）；对金融机构，需课以“实质审查”（如核实股东身份、表决程序合法性），因金融机构具备专业能力，且涉及金融风险防控³¹。此外，可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商事合理性”标准，结合交易金额、交易频率等因素动态判断审查义务强度³²。

3. 现实意义不足，随着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对“担保金额限制”“关联股东回避”等规则的新增，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商事登记电子化”“决议信息公示”等实践创新，现有研究仍需回应新的挑战：例如，自然人相对人与金融机构的审查义务差异化标准如何细化，公司章程中“担保限额”的公开性与相对人审查范围如何界定，公司内部治理缺陷与法定代表人过错的责任追偿如何衔接，这些问题既需要学说层面的体系化解释，也依赖司法实践的实证总结。结合代表权限制等法理基础和我国的裁判文书大数据，应该推动出更多实务建议，在促进本土化的同时，发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与时俱进的品质，强化实证研究，通过裁判文书大数据分析“合理审查”的司法认定规律，为相对人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其三，关注制度协同，探索通过“担保决议公示平台”“法定代表人责任保险”等机制，降低公司治理风险与相对人审查成本，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法院提供可参考的裁判思路，为担保相对人提出可操作建议，以及在企业合规方面提出具体的合规建议。

参考文献：

- [1]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J].法学研究,2011,(6):126135.
- [2]王利明.论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以《合同编解释》第二十条为中心[J].中外法学,2024,(1):84105.
- [3]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J].现代法学,2021,43(6):1834.
- [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第二版）[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29.
- [5][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M].于敏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50.
- [6]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89.
- [7]李金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新规定的质疑[J].现代法学,2007,(1):8489.
- [8]梁上上.公司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审查义务[J].法学,2013,(3):2131.
- [9]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J].现代法学,2021,43(6):2728.
- [10]高圣平.试论公司担保中的无权代理——基于裁判分歧的展开和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2,(5):6465;
- [11]王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框架下公司代表越权担保裁判规则的释论[J].法论坛,2022,(5):31.

²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01民终10658号;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0民终2934号.

²⁸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5条第1款.

²⁹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5条第2款.

³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2条第2款.

³¹袁碧华.论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中善意相对人的认定[J].社会科学,2019,(7):8586.

³²《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由美国法学会与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于1952年联合起草，旨在统一美国各州商事法律规范。该法典共设10编406条，涵盖买卖、商业票据、信用证、担保交易等核心商事领域，其条款设计体现英美法系商事原则，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部分条款效力，同时依赖普通法原则进行补充解释。

[12]潘运华.越权代表行为效力规范释论[J].政治与法律,2024,(7):169170.

[13]谢鸿飞.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缔约行为的法律评价[J].法学杂志,2024,(6):3334.

A Review of the Norms and Jurisprudence of Ultra Vires Representation in Corporate Guarantees

Ren Kuijun¹

¹Tianjin University Renai College, Tianjin, 30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octrinal evolution of ultra vires representation in corporate guarantee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d domestic legal lens. The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law has progressed through four distinct stages: the initial dominance of the "contract nullity" doctrine, subsequent debates on the nature of regulatory norm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approach under the "ultra vires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 and finally, a phase of rule refinement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A mainstream framework has now crystallized, centered on "statutory limit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authority" coupled with the "counterparty's duty of reasonable review."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Guarantee Systems definitively establishes that a guarantee contract is binding on the company if the counterparty acted in good faith. Conversely, if the counterparty was not in good faith, the contract is not binding on the company, and liability is apportioned based on fault. While scholarly consensus has emerged on three core issues—the normative character of the rules, the extent of the review obligation, and the attribution of legal effects—significant gaps remain. These include a lack of differentiation in the review standards applicable to special types of counterparties, insufficient analysis of the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rules following the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adequate adaptation of comparative law insights to the local legal context. Furthermore, existing research often lack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ailing to provide concrete guidance for judicial reasoning, the decision-making of guarantee counterparties, or corporate compliance.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refining differentiated standards for the review obligation, promoting a coh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alongside the Civil Code, strengthening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comparative law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ransaction security. Ultimately, a more precise alignment of normative logic with commercial practice can be achieved by improving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introducing insurance mechanisms, and exploring digitalized review processes.

Keywords: Ultra Vires Representation; Corporate Guarantee; Counterparty's Good Faith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影视制作实践教学的路径探索与实践创新

钟文豪¹

(1.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419)

摘要: 本文聚焦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影视制作实践教学转型路径的探索, 旨在解决当前教学与行业需求脱节的问题。研究分析了这一赋能模式在提升学生 AI 工具应用能力、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精准对接行业技术需求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 当前实践中仍存在 AI 能力培养体系缺失、教学资源未融入 AI 元素以及教学流程与行业实际脱节等困境。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构建分层培养模块、整合 AI 教学资源库、建立行业对接机制等针对性策略, 并结合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 旨在为影视制作实践教学的高质量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技术; 影视制作实践教学; 转型路径; 能力培养; 实践教学平台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89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制作领域的广泛应用, 行业生产模式正在加速重构。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突破 10 亿, AI 驱动的短视频智能化创作也成为行业发展的新生态。作为高等教育中影视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视制作实践教学的转型已成为适应行业需求、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路径。然而, 当前影视制作课程体系更新滞后, 难以跟上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 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偏差。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影视制作课程的深度融合, 创新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 已经成为高校影视教育改革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影视制作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能够有效解放学生在影视制作中的重复性劳动, 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于创意叙事与风格探索。例如, 在“短视频创作”课程中, 学生可以利用 ChatGPT 生成剧本初稿, 进而推动创意的快速迭代和优化。通过反复调试 AI 工具的参数, 学生能够在实现特定艺术效果的过程中, 培养基于技术的创新思维。AI 赋能并非是创作者的替代品, 而是作为“创作者的全新工具箱”, 帮助学生通过人机协作深化创作过程, 最终将创意落实为具体作品。

传统的影视制作课程教学通常聚焦于软件操作和设备使用的技能训练, 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多偏重于工具和技术的操作。然而, 本课程的革命性在于, 它将 AI 作为强大的前置创意实验室。学生可以利用 AI 进行海量创意孵化和分镜可视化, 大大提升创作效率与创新能力。在此过程中, 教学的核心环节也转变为“创意决策工作坊”, 即引导学生围绕 AI 生成的多种创意方案展开批判性讨论。学生将探索: “为什么这个剧本结构比那个更能打动人心? 为什么这个镜头语言比另一个更具表现力? 如何将 AI 生成的多个创意碎片融合成一个独特的表达?” 这种方法促使学生在创作中不仅依赖 AI 工具, 而是通过人类审美与 AI 生成内容的不断迭代, 创造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作品。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技术讲解者转变为引导学生进行审美判断和原创性验证的“仲裁者”。

目前, 在高校影视制作课程的课堂上我们使用的 AI 平台, 如 DeepSeek、豆包、Kimi 等, 已为学生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创作支持。这些平台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便捷的素材处理和创意生成工具, 更重要的是, 它们使得学生可以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运用 AI 来提升创意表达的效率和质量。通过这种“人机协同”的工作流程, 学生能够将创作中的每一步都经过 AI 的优化和反馈, 逐步培养出既有技术能力, 又具备创意思维的综合素质。

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影视制作实践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

传统的影视制作课程教学通常聚焦于软件操作,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制作实践教学中具有巨大潜力, 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仍面临着若干现实困境, 特别是在高校的影视制作课程中。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当前大多数高校的影视制作课程缺乏系统性的 AI 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体系。尽管一些院校已经开设了 AI 相关的独立课程, 或介绍了 AI 工具的基础使用, 但这些内容通常与影视制作的整体教学流程脱节, 未能全面嵌入到制作的各个环节中。学生往往学会了使用 AI 工具, 却未能掌握如何将这些工具融入到创意的实际制作过程中。例如, 学生可能会使用 AI 视频生成工具, 但却缺乏对其在影视概念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流程的理解, 这导致技术学习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割裂, 造成了“技术与创作脱节”的问题。

其次, 影视制作实践教学资源尚未充分融入 AI 技术和行业应用案例。传统的影视教学资源大多集中于摄像

作者简介: 钟文豪(1990—), 男, 东莞城市学院助教。

机操作、传统剪辑流程和手工特效制作等内容,而对于AI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尤其是智能剪辑、AI特效生成和虚拟场景搭建等实际案例的整合严重不足。目前,虽然一些高校已经尝试将AI工具引入课堂,但大多仍停留在工具的表面介绍,缺少更深入的教学资源,如AI驱动的自动化剪辑、智能化场景设计等行业现行应用实例。这使得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无法接触到最前沿的AI技术应用,无法通过教学资源提升自己在AI应用方面的实践能力,造成了教学内容的滞后和资源的短缺。

最后,影视制作课程与行业AI制作流程及技术标准之间存在显著脱节。尽管行业已逐步形成包括AI辅助预演、智能素材管理和AI驱动后期合成等标准化流程,高校的教学内容仍以传统制作流程为主,未能及时更新以适应行业的AI应用标准。这种脱节使得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技术与行业实际操作存在差距,毕业后往往需要额外花费时间适应行业的AI制作模式,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

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影视制作实践教学的转型策略

(一) 构建适配影视制作场景的学生AI技术应用能力分层培养模块

针对当前影视制作实践教学在AI技术应用方面存在的培养体系零散、教学资源滞后、与行业流程脱节等困境,高校应采取系统性、分层次的策略推进教学转型,构建以实际场景为核心、教学资源为支撑、产教融合为保障的现代化实践教学体系。

高校应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发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澳门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大学生广告节等重要赛事。通过赛事实践,学生能够在实际操作中提升创作能力,积累实践经验,增强就业竞争力。近年来,我校学生在这些赛事中已斩获十余项荣誉,充分体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与效果。

以我所在本科院校的影视制作实践课程为例,我所教授的《短视频创作》、《短视频运营》、《微电影创作工作坊》、《新媒体创新创业实践2》等课程,核心目标是将AI技术视为创作全流程中的共创伙伴,而非单纯的工具。教学重点不在于教授学生操作某一特定的AI工具,而是帮助学生掌握一套适应AI时代的全新影视创作工作流。AI的作用不仅是创意的加速器,更是创意的“放大器”,能够帮助学生将他们天马行空的创意付诸实践。

这一新的创作工作流遵循“人机协同,迭代循环”的原则:人类创意→AI生成/执行→人类审美判断与调整→AI再次优化。在这个过程中,AI成为学生创作的有力助手,学生不仅不再依赖单一的技术工具,而是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意决策,最终创造出具有个人特色的原创作品。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角色从单纯的技术传授者转变为审美判断和原创性认证的“引导者”,引导学生将AI作为灵感源和参考库,而非单纯的创作工具。

这种教学框架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提出伟大创意的能力、驾驭AI工具的智慧以及最重要的——人性的洞察与审美判断力。通过实践课程,学生不仅学会了如何与AI工具对话,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持创作的独立性与原创性,最终成为能够独立创作并驾驭AI技术的现代影视创作者。

(二) 整合包含AI技术的影视制作实践教学案例与工具资源库

高校应整合包含AI技术的影视制作实践教学案例与工具资源库,遵循实用化、体系化和动态化的原则,成立由影视专业教师、AI技术专家和行业资深从业者组成的资源整合小组,确保资源库能够覆盖从基础教学到综合实训的全阶段实践需求,并支持影视制作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各个环节。这些资源应直接支撑课堂教学,同时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有效支持。

在工具整合方面,高校应从教学适配性和行业通用性两个维度筛选AI工具,优先选择行业内广泛应用、操作门槛适配的智能剪辑、AI视觉创作、虚拟制片及智能辅助等工具。这些工具将为学生提供创作流程的全方位支持,涵盖从素材处理到特效合成与视频优化的各个环节,帮助学生提升创作效率并掌握现代影视制作的最新技术。

在案例整合环节,高校应积极收集并整理真实的AI应用案例,确保所收集的案例不涉及商业机密。例如,可与影视企业合作,获取去除商业机密后的AI应用片段,或整合国际电影节获奖的AI技术作品,将其拆解为具体的教学任务,提炼出核心知识点,供学生学习和借鉴。此外,本校学生的优秀AI影视作品也可作为学习案例,进一步丰富资源库内容。所有案例需经过授权,避免版权纠纷影响学生的学习进程。

在资源库的建设与维护上,高校应利用线上平台,根据影视制作的不同环节、AI技术类型和资源形式,将工具与案例按三维度进行分类,并设置精准检索功能,确保学生能够快速找到所需资源。这种基于AI生成素材和平台化管理的资源整合方式,不仅能够提高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还能有效缓解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推动影视制作实践教学的创新与发展。

(三) 建立影视制作实践教学与行业AI制作流程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高校应建立影视制作实践教学与行业AI制作流程的常态化对接机制,以双向融合、持续互动为核心,打破传统教学闭环,构建教学与行业的双向反馈生态体系。首先,学校应主动拓展合作资源,筛选那些AI技术应用成熟并具备人才培养意愿的影视制作公司、特效公司、虚拟制片工作室以及短视频平台等行业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企业应提供最新的AI制作流程、技术标准以及真实的项目资源,而高校则将行业需求转化为教学内容,并组织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的实践。

在实训环节,高校可以与合作企业共建AI影视制作实训基地。该基地依托企业的生产环境和项目资源,要求高校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寒暑假实习或学期中的阶段性实习,确保学生能够直接参与到企业的AI制作项目中,

实践具体的任务，如影视素材初筛、AI 特效初步合成、调试以及 AI 项目管理流程等。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学生将通过真实工作场景的沉浸式实践，直观了解行业对 AI 技术应用的效率要求、质量标准与协作规范，从而避免单纯的理论学习和“纸上谈兵”。

此外，企业与高校之间应建立常态化的沟通与成果反馈机制。每学期，高校可以组织 1-2 次校企对接会议，讨论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的适配性、学生实习表现以及行业岗位需求的变化，以便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课程设置。同时，学生的课程项目和毕业设计成果应反馈给合作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学生的作品挑选优秀毕业生提前录用，这样不仅能够形成“教学—实践—就业”的闭环，也能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并为企业输送符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这种校企合作、双向反馈的常态化机制，影视制作实践教学将与行业 AI 制作流程深度融合，推动教学内容的不断优化与更新，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具有实际价值的教育体验，确保学生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变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影视制作实践教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AI 技术不仅能够加速创作过程，提升创作效率，还能够作为创意的“放大器”与“加速器”，推动学生在影视创作中实现更高的创新性和效率。尽管当前教学体系存在 AI 应用能力培养体系不完善、教学资源不足以及与行业标准脱节等问题，通过构建分层次的 AI 应用能力培养模块、整合 AI 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库、以及与行业 AI 制作流程的常态化对接，能够有效推动影视制作实践教学的转型与创新。在实践中，校企合作、双向反馈机制和真实项目的参与，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行业需求，提升其创新思维和行业适应能力。最终，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还成为影视教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为培养符合未来行业需求的高素质影视创作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刘子淳. 数智化赋能高校传媒人才培养路径探析——以“短视频创作”课程为例[J]. 教育科研, 2025(08): 72-73.
- [2] 刘恋. 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创作教学中的应用[J]. 影视产业, 2024(05): 83-85.
- [3] 陈培波. AI 赋能的创意生成在短视频创作教学中的思考[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 2024, 24(09): 12-14.
- [4] 郭怡然.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戏剧影视文学实践教学的路径研究[J]. 电影研究, 2024(07): 186-188.
- [5] 程曦, 何越, 鞠茜. 人工智能助力“新媒体运营”课程差异化教学探析[J]. 传媒教育, 2025(08): 83-86.
- [6] 陈跃, 杨璐妃, 朱净孺. 人工智能时代新质影视人才培养策略研究[J]. 传播与版权, 2024(21): 90-93.
- [7] 平凯磊. 人工智能背景下影视制作课程教学方式探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4(08): 51-54.
- [8] 韩天应, 张逸. 人工智能驱动的影视制作流程自动化应用路径研究[J]. 信息与电脑, 2025, 37(18): 26-28.
- [9] 赵乃平, 李清, 白云霞.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 AI 赋能高校影视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J]. 匠心, 2025(07): 14-16.

Path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AI Technology Empowerment in Film Prod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Zhong Wenhao¹

¹Dongguan City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 52341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transforming film prod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through the empower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aim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isconnect between current teaching and industry need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empowerment model in enhancing students' AI tool application abilities,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ecisely aligning with industry technical demand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such as the lack of a systematic AI skills training framework, the absence of AI elements in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processes and industry practic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such as constructing layered training modules, integrating AI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ies, and establishing industry connection mechanism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of film prod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ilm Prod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Path; Skill Development;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s

从流量红利到产业深耕：AI 漫剧对传统动画行业的长期影响与未来趋势

张鹏菲¹ 张 晴¹ 侯心如¹

(1.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在 AI 技术爆发与移动互联网流量生态重构的双重驱动下, AI 漫剧以其“低成本、高效率、强适配”的核心优势迅速崛起, 成为动画产业中新的增长极。作为设计专业视角下的新兴内容形态, AI 漫剧不仅重塑了动画生产的技术流程与成本结构, 更对传统动画的视觉美学体系、设计创作逻辑及人才培养标准带来深远变革。本文基于对设计学的创意表达、技术应用与产业生态理论, 系统分析 AI 漫剧的技术特征与发展现状, 重点探讨其设计效率、视觉语言、创作范式等方面对传统动画行业的冲击与重塑, 揭示当前行业面临的风格同质化、创意浅表化、版权模糊化等核心问题, 并从技术优化、创意深耕、人才转型、生态构建四个维度, 提出动画行业从流量依赖走向产业深耕的发展路径。研究认为, AI 漫剧并非传统动画的替代者, 而是推动行业实现“技术工业化、创意个性化、产业生态化”的重要引擎, 未来动画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将聚焦于“AI 技术工具化+设计创意内核化+文化价值深度化”的融合创新, 为设计类人才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 AI 漫剧; 传统动画; 设计创新; 产业转型; 视觉语言; 人才培养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0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随着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在视觉设计领域的深度渗透, 动画产业正经历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机协同型”的范式革命。^[1] AI 漫剧作为这场革命的典型产物, 凭借文生图、图生视频、智能分镜等核心技术, 将动画制作周期从数月压缩至数周, 成本降低 60% 以上, 2025 年上半年市场供给量月复合增长率高达 83%, 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 200 亿元, 成为继真人短剧之后的又一流量风口。这种爆发式增长背后, 是移动终端观看习惯的变迁与内容消费“即时满足”需求的升级——AI 漫剧以竖屏构图、特写主导、高饱和色彩的视觉设计, 精准适配手机端碎片化观看场景, 在 3-5 秒内即可抓住用户注意力, 形成与传统动画截然不同的传播逻辑。

从设计类专业视角来看, AI 漫剧的崛起不仅是技术迭代的结果, 更是设计语言与产业生态的系统性重构。传统动画设计强调“全身叙事”的完整性与构图精致度, 依赖原画师、动画师、特效师等多岗位的精细协作, 而 AI 漫剧通过算法优化实现“面部情绪场”的高效传递, 将设计焦点从整体场景转向核心情感表达。这种转变对动画设计的创意方法、技术应用、审美标准产生连锁反应, 既为设计类学生提供了更便捷的创作工具, 也对其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立足设计学视角, 构建 AI 漫剧与传统动画的对比分析框架, 揭示技术变革对动画设计范式的影响机制, 丰富数字媒体设计与产业转型的相关理论, 为动画行业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

实践意义: 针对 AI 漫剧发展中存在的设计同质化、创意不足等问题, 提出兼具技术可行性与设计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为传统动画企业的转型提供参考; 同时为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方向指引, 帮助学生明确核心竞争力培养重点, 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作者简介: 张鹏菲(2003—),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影视动画设计;

张 晴(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绘画设计;

侯心如(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创意设计。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实践意义：针对 AI 漫剧发展中存在的设计同质化、创意不足等问题，提出兼具技术可行性与设计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为传统动画企业的转型提供参考；同时为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方向指引，帮助学生明确核心竞争力培养重点，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对比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通过梳理 AIGC 技术、动画设计、产业经济学相关文献，构建理论基础；以“巨日禄 AI”工具制作的头部漫剧、《哪吒 2》等传统动画代表作作为案例，对比分析两者在设计流程、视觉语言、创作逻辑上的差异；最终形成“现状分析—影响解构—问题诊断—趋势展望”的研究框架。

二、AI 漫剧的技术特征与设计逻辑

（一）AI 漫剧的核心技术支撑

AI 漫剧的设计与生产建立在成熟的生成式 AI 技术栈之上，形成了模块化、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管线。其核心技术包括四大模块：一是剧本与分镜生成模块，通过 GPT-4 等大语言模型与 Midjourney 等文生图工具，实现从文本到分镜的快速转化，解决传统分镜设计周期长的痛点；二是核心资产生成模块，利用 Stable Diffusion+ControlNet 组合，结合 LoRA 模型微调技术，保障角色形象在跨场景、跨动作中的一致性，提升设计资产复用效率；三是动态视频生成模块，通过 Runway Gen-2、Pika Labs 等图生视频工具，将静态画面转化为动态影像，实现打斗场景与情绪表达的可视化；四是音频与后期合成模块，借助 ElevenLabs 等 TTS 工具生成自然语音，配合 AI 辅助剪辑优化节奏，形成完整作品。^[2]

这些技术的协同应用，使 AI 漫剧实现了“80%流程自动化”的生产效率革命——一个 5-8 人的设计团队可在 1-1.5 个月内完成 60-80 集漫剧的设计与制作，而传统动画同等规模作品的制作周期通常需要 6 个月以上。技术工具的平民化也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设计类学生仅凭一台高性能电脑与 AI 工具订阅权限，即可独立完成漫剧创作，打破了传统动画对专业团队与昂贵设备的依赖。

（二）AI 漫剧的设计逻辑与视觉语言

移动端优先的构图设计逻辑：AI 漫剧彻底颠覆了传统动画“大屏适配”的构图思维，以手机竖屏为核心设计载体，形成“特写主导+情绪聚焦”的视觉体系。其画面中人物面部占比达 60% 以上，通过放大眼神、嘴部等关键表情区域，配合智能分镜系统自动规划特写密度，确保用户在滑动浏览中快速捕捉核心情绪，这种“面部情绪场”设计比传统动画的“全身叙事”更具传播效率。例如，“巨日禄 AI”工具内置的竖屏优化算法，可根据剧情情绪爆点自动调整画面元素排布，在小屏中实现视觉平衡与情感穿透力的统一。

高适配性的视觉表达策略：为应对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洪流”竞争，AI 漫剧采用“高饱和色彩+符号化造型”的设计语言——通过鲜明色块与清晰轮廓提升画面识别度，避免传统动画中复杂场景细节在小屏中丢失；同时以平面化、简化的造型设计降低制作难度，确保在不同配置手机上流畅播放，这种视觉策略使 AI 漫剧在抖音等平台的传播效率提升 30% 以上。此外，AI 漫剧强化特效与打斗场景的设计，通过炫目视觉冲击触发用户多巴胺分泌，形成“3 秒沉浸”的观看体验，弥补了短时长剧情的叙事局限。

算法驱动的个性化设计能力：生成式 AI 技术使 AI 漫剧具备动态调整设计风格的能力，通过算法分析用户偏好数据，可快速生成不同风格的视觉方案——从日系二次元到国潮水墨，从写实风格到卡通质感，无需设计团队重新绘制基础资产，仅通过 Prompt 优化即可实现风格切换。这种个性化定制能力，满足了当前年轻用户对“小众审美”的追求，也为设计类学生提供了更多创意实验空间。^[3]

三、AI 漫剧对传统动画行业的多维影响

（一）设计效率与成本结构的颠覆性变革

传统动画行业长期面临“高投入、慢产出、高风险”的困境，设计环节的人力成本占比达 70% 以上，仅角色原画设计就需要多名原画师耗时数月完成，且修改成本极高。AI 漫剧通过技术替代实现了成本结构的重构：一方面，AI 工具承担了角色草图、场景搭建、基础动画等重复性设计工作，使设计团队从繁琐的执行层面解放出来，人力成本降低 50%-70%；另一方面，AI 生成的设计资产可通过 LoRA 模型沉淀复用，后续作品仅需微调即可适配新剧情，进一步降低边际成本。^[4]

这种变革对传统动画企业形成双重冲击：中小型动画工作室面临“不转型即淘汰”的压力，若继续坚守传统设计流程，将在成本竞争中处于劣势；大型动画公司则需重新调整设计团队结构，减少基础绘图岗位，增加 AI Prompt 工程师、设计效果调优师等新型岗位。但从行业整体来看，成本降低激活了更多创意需求——以往因预算限制无法落地的小众题材动画，如今可通过 AI 漫剧形式实现，为动画设计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二）创作范式与设计主权的转移

从“线性协作”到“人机协同”的创作范式：传统动画设计遵循“编剧→分镜→原画→动画→特效→合成”的线性流程，各岗位分工明确、依赖度高，创意调整需跨部门沟通，效率低下。AI 漫剧则构建了“创意主导+AI 执行”的并行创作模式，设计人员的角色从“执行者”转变为“指挥者”与“筛选者”——通过 Prompt Engineering 指导 AI 完

成基础设计，自身聚焦于创意策划、风格定义与效果优化，这种模式使创意迭代速度提升 3-5 倍。例如，设计类学生在创作 AI 漫剧时，可同时生成多种分镜方案进行对比，无需重新绘制即可快速调整，极大提升了创意实验效率。

设计主权的“去中心化”趋势：传统动画的设计风格由资深原画师与导演主导，新人设计师的创意空间有限，而 AI 漫剧降低了创意表达的技术门槛。设计类学生即使缺乏扎实的手绘功底，也可通过 AI 工具将创意转化为视觉作品，使设计主权从“技术权威”向“创意主体”转移。这种去中心化趋势打破了传统动画行业的层级壁垒，为年轻设计师提供了更多展示机会，但也导致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出现大量缺乏设计思考的“AI 拼凑”作品。

（三）视觉美学与文化表达的双重挑战

视觉风格的同质化困境：AI 生成技术的“算法趋同性”使 AI 漫剧面临严重的风格同质化问题——多数作品依赖公共训练数据生成，缺乏独特的设计语言，呈现出“高饱和、强对比、符号化”的单一审美，与传统动画中《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水墨风格、《大鱼海棠》的东方奇幻风格形成鲜明对比。^[1]这种同质化不仅降低了用户的长期黏性，也削弱了动画设计的艺术价值，使行业陷入“流量至上”的审美内卷。

文化表达的浅表化问题：AI 漫剧的“快节奏生产”模式导致其文化表达缺乏深度——多数作品聚焦于“爽点剧情”，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停留在表面符号堆砌，如简单将汉服、古建筑作为背景元素，未能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而传统动画注重文化符号的设计转化，如《哪吒 2》采用动态水墨渲染引擎，将传统水墨艺术与现代动画技术融合，实现了文化价值与视觉美感的统一，这种深度表达是当前 AI 漫剧难以企及的。

（四）设计类人才需求与培养体系的重构

AI 漫剧的发展对动画设计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动画设计人才强调手绘功底、运动规律掌握等“硬技能”，而 AI 时代的动画设计师需要具备“技术工具应用+创意策划+审美判断+数据洞察”的复合能力。具体来看，设计类学生需掌握 Prompt 优化、AI 模型微调、设计资产管理等技术技能，能够高效运用 AI 工具实现创意；同时需强化文化素养与创意能力，避免被 AI 工具主导设计；此外，还需具备市场洞察能力，能够根据平台用户数据调整设计策略。

这种需求变化对高校动画设计专业的培养体系形成冲击：传统以手绘、软件操作为核心的课程设置已无法满足行业需求，需增设 AI 设计工具、数字资产管理、交互设计、文化符号转化等课程；实践教学方面，应从“模拟项目”转向“真实商业漫剧创作”，鼓励学生参与 AI 漫剧的全流程设计，培养人机协同创作能力。但目前多数高校的课程改革滞后于行业发展，导致设计类毕业生面临“传统技能用不上、新型技能不会用”的就业困境。

四、AI 漫剧时代传统动画行业的

（一）技术应用的“双刃剑”效应

尽管 AI 技术为动画设计带来效率提升，但当前 AI 漫剧的技术应用仍存在明显短板：一是角色一致性难题，尽管 LoRA 模型可一定程度保障角色形象统一，但在复杂动作、极端角度下仍易出现面部变形、特征丢失等问题，影响设计质量；二是动作逻辑失真，图生视频技术在处理连贯运动时存在卡顿、闪烁等问题，物理规律表达不准确，难以达到传统动画的动作流畅度；三是技术依赖导致的创意退化，部分设计团队过度依赖 AI 生成，放弃基础设计训练，导致作品缺乏独特的设计语言与艺术个性。

（二）版权与伦理的模糊地带

AI 漫剧的设计与生产涉及大量训练数据的使用，导致版权归属问题成为行业争议焦点：AI 生成的角色、场景设计是否侵犯原画师的著作权？设计人员通过 Prompt 生成的作品，版权应归个人、平台还是 AI 工具提供商？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尚未明确界定，导致侵权纠纷频发。此外，AI 漫剧的“高效生产”也引发伦理争议——部分团队为追求流量，利用 AI 快速生成低俗、暴力内容，冲击动画行业的审美底线与社会责任感，对青少年用户产生不良影响。

（三）产业生态的失衡与重构压力

AI 漫剧的爆发式增长导致行业生态出现短期失衡：一方面，流量向 AI 漫剧倾斜，传统动画的市场份额受到挤压，部分中小型传统动画企业因资金短缺、转型困难陷入经营困境；另一方面，AI 漫剧行业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与行业规范，作品品质参差不齐，播放量过亿的头部分作品凤毛麟角，多数作品因设计粗糙、剧情单薄被市场淘汰。此外，传统动画的衍生品市场也受到冲击——AI 漫剧的快速迭代导致其 IP 生命周期缩短，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衍生品开发基础，而传统动画依赖 IP 长线运营的产业模式面临挑战。

五、从流量红利到产业深耕的发展路径

（一）技术优化：推动 AI 工具的“设计化”升级

聚焦核心技术瓶颈突破：针对角色一致性、动作流畅度等问题，加强 AI 模型的专项训练——通过扩充多样化的动画设计数据集，优化 ControlNet 的动作控制精度，提升 LoRA 模型对角色细节的捕捉能力，使 AI 生成的

设计资产更符合动画设计的专业标准。设计类企业可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动画 AI 实验室，开发针对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如国产动态水墨渲染引擎在 AI 漫剧中的应用，实现技术与文化的融合。

构建“人机协同”的设计工具链：AI 工具应定位为设计人员的“创意助手”而非“替代者”，开发更符合设计逻辑的交互功能——如实时预览 Prompt 调整效果、智能推荐设计优化方案、支持手动修改 AI 生成内容等，使设计人员能够深度参与创作全过程。例如，在分镜设计环节，AI 可生成基础方案，设计人员通过手绘调整构图与节奏，实现算法效率与人工创意的结合。^[6]

（二）创意深耕：强化设计的“文化内核”与“个性表达”

挖掘文化符号的深度设计转化：动画设计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创意与文化价值，AI 漫剧应摆脱“符号堆砌”的浅表化表达，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设计类人才可将传统美学元素（如书法笔法、剪纸工艺、水墨意境）融入 AI 漫剧的角色造型、场景设计中，通过 Prompt 优化实现“技术还原+艺术创新”，如将京剧脸谱的色彩体系与现代卡通造型结合，打造具有文化辨识度的视觉形象。

鼓励个性化风格的实验与探索：针对同质化问题，行业应建立“创意保护机制”，鼓励设计人员开发专属风格的 AI 模型——设计类学生可通过训练个人风格 LoRA 模型，将自身手绘风格、创意理念融入 AI 生成过程，形成独特的设计语言。^[7]平台可设立“AI 漫剧创意设计大赛”，激励小众风格、实验性作品的创作，丰富行业的视觉美学生态。

（三）人才转型：构建“技术+创意+文化”的培养体系

高校课程体系的迭代升级：动画设计专业应重构课程结构，增设“AI 设计工具应用”“数字资产管理”“文化符号设计”“交互叙事设计”等核心课程，减少纯技术操作类课程的比重；实践教学，引入真实商业漫剧项目，组织学生以团队形式完成“创意策划→AI 生成→人工优化→作品发布”的全流程训练，培养人机协同创作能力。同时，加强跨学科教学，融合文学、传播学、心理学知识，提升学生的创意策划与市场洞察能力。^[8]

行业在职人员的技能更新：传统动画设计师应主动学习 AI 工具应用技能，从“技术执行者”向“创意主导者”转型——原画师可聚焦角色风格定义与 AI 生成内容的优化，动画师可专注于动作逻辑调整与节奏把控，特效师可利用 AI 工具提升特效设计的效率与质感。行业协会可组织 AI 设计技能培训、workshops 等活动，促进传统设计师与 AI 漫剧创作者的交流合作。

（四）生态构建：打造“质量优先+版权清晰+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建立行业质量标准与评价体系：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头部企业、高校制定 AI 漫剧的设计质量标准，涵盖角色设计一致性、视觉表达准确性、文化表达深度等指标，引导行业从“流量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型。平台应优化推荐算法，增加“创意评分”“设计质量”等权重，减少对低俗内容的流量倾斜，扶持优质作品传播。

完善版权保护与利益分配机制：明确 AI 漫剧的版权归属——将设计人员的 Prompt 创作、人工优化等创造性劳动纳入版权认定范围，AI 工具提供商仅享有技术使用权，不参与作品版权分配。建立 AI 训练数据的授权机制，规范训练数据的采集与使用，保护原画师的知识产权，避免侵权纠纷。

推动传统动画与 AI 漫剧的协同发展：两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可以形成互补——传统动画可借助 AI 工具提升生产效率，缩短制作周期，降低 IP 孵化成本；AI 漫剧可作为传统动画 IP 的“预热载体”，通过短平快的内容形式扩大 IP 影响力，为后续长动画、衍生品开发积累用户。例如，传统动画企业可先通过 AI 漫剧测试市场反应，根据用户数据调整长动画的设计方向，实现“短内容引流+长内容深耕+衍生品变现”的产业闭环。^[9]

六、结论与展望

AI 漫剧的崛起标志着动画行业进入“技术赋能创意”的新时代，其对传统动画的冲击本质上是生产关系与创作范式的革新，而非简单的技术替代。从设计类专业视角来看，AI 漫剧不仅带来了生产效率的革命，更重构了动画设计的视觉语言、创作逻辑与人才需求，使行业面临“流量红利”与“产业深耕”的关键抉择。^[10]当前 AI 漫剧存在的风格同质化、创意浅表化、版权模糊化等问题，根源在于行业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与对创意核心价值的忽视，未来只有实现“技术工具化、创意内核化、文化价值深度化”的融合，才能推动动画行业从短期流量依赖走向长期产业深耕。

对于设计类人才而言，AI 技术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它降低了创作门槛，扩大了创意表达的边界，但也要求设计师具备更强的文化素养、创意能力与技术应用能力。未来的优秀动画设计师，既需要懂 AI 工具的“技术逻辑”，也需要懂设计的“艺术逻辑”，更需要懂文化的“价值逻辑”。高校、企业与行业协会应协同发力，通过课程改革、技能培训、生态构建，为设计类人才提供成长土壤，推动动画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优化与行业生态的不断完善，动画行业将形成“人机协同创作、文化个性彰显、产业生态共生”的新格局。AI 漫剧与传统动画将在竞争中融合，共同推动动画设计从“视觉产品”向“文化载体”升

级, 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视听体验, 为文化传播提供更高效的路径。对于设计类学生而言, 把握这场行业变革的机遇, 将个人创意与技术工具、文化价值深度结合, 才能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占据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 [1] 周保兴. 基于生成式 AI 的动画场景风格化设计研究[J]. 数字通信世界, 2025(5):13-15.
- [2] 贺京华, 姜皖. AIGC 驱动下的动画创作: 技术变革、融合路径与风险挑战[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24,32(5):68-72.
- [3] 贾豁然.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对动画创作的影响[J]. 绥化学院学报, 2024,44(11):48-50.
- [4] 张登峰. 人工智能艺术的美学限度及其可能的未来[J]. 江汉学术, 2019,38(1):86-92.
- [5] 陶锋. 人工智能视觉艺术研究[J]. 文艺争鸣, 2019(7):73-81.
- [6] 王亚辉, 余隋怀, 陈登凯, 等.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设计决策模型[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19,25(10):2467-2475.
- [7] 王晓慧, 覃京燕, 全烘辰. 基于 AI 画作生成的个性化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方法[J]. 包装工程, 2020,41(6):7-12.
- [8] 刘润静, 肖颜, 张瑜烨. 央视 AI 微短剧的创新构建、风险探析与优化路径[J]. 新闻前哨, 2025(3):24-26.
- [9] 夏枫. 影像叙事与艺术表现: 电影中的文化象征与视觉隐喻[J]. 电影文学, 2025(3):56-60.
- [10] 王毅, 王伟. 跨越零和博弈: 论人工智能对动画创作的革新与挑战[J]. 电影评介, 2018(8):88-91.

From Traffic Dividends to In-depth Industrial Cultivati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AI Comics-Dramas on The Traditional Animation Industry and Future Trends

Zhangpengfei¹, Zhangqing², Houxinru³

¹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impetus of the AI technology boom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mobile Internet traffic ecosystem, AI comics-dramas have risen rapidly with their core advantages of "low cost, high efficiency, and strong adaptability", emerging as a new growth driver in the animation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majors, as an emerging content form, AI comics-dramas not only reshape the technical processes and cost structure of animation production, but also bring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visual aesthetic system, design creation logic, and talent training standards of traditional animation.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reative expression, technical applic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y in design scie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AI comics-dramas,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ir impact and reshaping effects on the traditional animation industry in terms of design efficiency, visual language, and creative paradigm, and reveals the core issues currently facing the industry, such as stylistic homogeneity, superficial creativity, and ambiguous copyright. Furthermore, from four dimensions—technical optimization, in-depth creativity cultivation, talent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the paper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animation industry to shift from traffic dependence to in-depth industrial cultiv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I comics-dramas are not a replacement for traditional animation, but rather a crucial engine driving the industry towards "technical industrialization, creative person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icalization". In the futur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nimation industry will focus on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AI technology as a tool + design creativity as the core + in-depth cultural value", present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design talents.

Keywords: AI Comics-Dramas; Traditional Animation; Design Innov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Visual Language; Talent Cultivation

线性材料在纤维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力探索

陈嘉欣¹

(1.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材料是影响纤维艺术作品面貌的关键。线性材料在纤维艺术中的应用来源已久。在传统和现代纤维艺术创作中尤为常见,因其可塑性好,艺术表现力强,深受艺术家们的喜爱。通过分析和研究各种线性材料的特性,形状,颜色和工艺,探索线性材料在纤维艺术作品中表现形式。通过使用合适的工艺,来改变线的形状,探索更多线性材料不同的表现。

关键词:线性材料; 纤维艺术; 编织; 装置艺术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1

引言

纤维艺术作为一种以材料为核心的艺术形式,其表现力与材料的特性密不可分。线性材料作为纤维艺术中的重要载体,凭借其独特的形态语言和可塑性,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出丰富的表现力。从传统编织中的经纬线到现代装置艺术中的金属丝、发光纤维,线性材料不仅承载着艺术家的观念表达,更通过其物理特性与空间环境产生互动,创造出多维度的视觉与触觉体验。本文旨在探讨线性材料在纤维艺术中的表现力,通过分析其材质特性、造型语言及空间应用,来探索线性材料在纤维艺术中的不同表现力探索。

一、线性材料的特征

(一) 纤维艺术的理念

纤维艺术的理念核心在于以“材料”为语言,以“触感”为媒介,打破实用与艺术的边界。纤维艺术作为以物质性为核心的艺术形式,其创作无论是平面表达还是空间装置,都建立在材料语言的深度对话之上。艺术家通过解构、重组等创作手法突破材料的物理属性与固有形态,在物质转化过程中植入观念表达,使麻绳、织物或合成纤维等载体既保持原始质感又承载隐喻象征。这种材料再创作并非简单的物性叠加,而是通过光影、肌理、密度的精准把控,构建出具有生命力的视觉叙事系统。

(二) 纤维艺术中线材的定义与属性

线性材料在每个领域都有着不同的意义。纤维艺术中的“线”指的是任何具有柔韧性和可以改变形状的细长体。现代纤维艺术就是起源于壁毯编织,从最初的利用经纬线编织,到后来多变的纬线造型。艺术家们对线材的使用也很多样化。纤维艺术实际上是以材料命名的艺术形式,因此材料对于纤维艺术而言非常关键,可以说材料是纤维艺术的第一语言^[1]。

传统纤维材料是利用棉、麻和丝等天然材料形成粗细一致的线材。主要用于高比林的编织。现代纤维材料可归纳为有粗细变化的人造纤维以及各类条状带有韧性可折叠弯曲编结的材料,制作工艺也随之从编织多种工艺并存。比如衍纸与编织工艺。材质的差异和分散的纹理使作品更加生动逼真,使人们能够体验到创作者更丰富的情感表达。有研究者曾说:“材料从一定角度上来说可以决定纤维艺术作品的表现手法、表现形式和作品最终的表现力^[2]。”在线性纤维材料的艺术创作中,不同材质会带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官体验。麻纤维表面粗糙,能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原始力量,当光线照在麻绳交错的结节上时,会产生深浅不一的阴影变化;棉纤维触感温暖柔软,用它编织出的结构会形成令人放松的视觉效果;丝绸纤维细腻光滑,半透明的质地能让作品呈现出空灵的美感。这些天然材质不仅通过触觉传递信息,更因为长期的文化积累,成为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

作者简介:陈嘉欣(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研究、环境设计专业室内设计方向研究。

（三）线性材料的分类体系

线性材料中有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化学纤维、有机合成纤维。这些线材都是通过编织、缝纫、缠绕、粘贴等技法来丰富作品方式进行表现,线性材料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技巧在其他艺术品中是无法获得的,这就是她的独特之处。例如,纤维艺术的线性材料具有独特的吸引力,通过表达情感来强调各种艺术感受,并使整个作品更加兼容和亲密。纤维艺术家感兴趣的是材料的美感,以及他们想要在作品中表达的含义。材料特征的不同也决定了视觉感受的差异,线材具有很好的创造性,造型表现力很丰富。也可以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它可以利用线材重复堆积,形成面,还可以通过叠、卷来形成点的效果,既可以形成平面,也可以形成立体作品。线材的种类很多,我们可以运用卷叠折等各种方法来展现不同的效果。

（四）线性材料的造型语言特征

纤维艺术包括古代手工艺品。在纤维艺术中,编与织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表现形式。纤维艺术中的“线”作为整幅作品的主要内容,具有极强的造型丰富能力。除了平织,种植绒毛和人字形图案外,传统编织是一种丰富的编织方法,结合了色彩调节功能,可以产生细腻的纹理和丰富的色彩。从传统的编织到刺绣,线材料都在一步步地进步。

纤维艺术作品,材料在一个作品中占据着主导作用,也是整个设计、创作的基本立足点。天然材料可以表达简洁、简朴、淳朴的概念;合成纤维更适合柔软和优雅的概念。材料是纤维艺术的关键,纤维艺术以材料为依托,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表现^[3]。一个好的作品,它的创作过程就是合理选材表现的过程,材料是完成创作的物质保证也是交流情感的媒介与自我意识的外显。

二、线性材料在纤维艺术作品的应用

（一）传统表现形式与工艺

纤维艺术起源于古老的挂毯艺术。传统纤维材料包括羊毛、棉、线、丝、毛等。纤维艺术材料包括三大类:动植物纤维材料、合成纤维材料和物理材料。线性材料的形状大多都是可以弯曲,可以任意曲折的,线性材料的统一特性就是线条本身带有的垂感,可以形成自然垂落的状态,自然线性给人一种放松、神秘感。每种材料构成不同的心理线索。它们都具有柔韧性之美,以及不同质地的美。

在编织壁挂创作中,线性材料通过编结、穿插、层叠等基础手法,以经纬交织的结构构建出丰富的空间语言。艺术家通过经线与纬线的规律性排列,将简单的线性单元转化为具有节奏感的视觉系统——横向线条的重复形成稳定的基底,纵向穿插的异色纤维打破单调性,而斜向交错的编织法则在平面中暗示立体维度。这种创作逻辑既追求整体结构的统一性,又通过局部材质的对比制造戏剧张力,最终在“秩序”与“变化”的平衡中实现艺术表达。

著名的纤维艺术家基维一生对高比林的工艺充满不懈的热情,从小就一直在深入研究。自1965年以来,基维已经创作了200多幅高比林作品。在他的概念中,纺织艺术家需要了解纺织材料的独特性,即编织感,并在创作过程中运用这种独特感进行编织。纤维艺术家是一位纺织工匠也是手工艺人,在纤维艺术的生产中,绘画技术和工匠编织技术都用于完成作品中。画家融入工匠是很自然的。基维的作品完全融合了高比林的编织,因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而被称为高比林之王,这与传统的高比林挂毯艺术有着很大的差别。

（二）现代表现形式与工艺

1、综合材料

传统纤维艺术是现代纤维艺术的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纤维艺术作品中可应用的材料也愈加的多样化,越来越广泛,从传统的线、麻绳、丝绸等演变到现代纤维艺术的金属线、吸管、衍纸、天然线、人造线、铁丝、皮筋儿等。而且还丰富变化,毛线,色彩丰富,质地柔软,细细密密的排布形成色块空间,不同材料表现出的效果也有着很大的差异^[4]。天然线和人造线通常用高比林编织和刺绣等作品,通过经纬线交织以及线的缝纫。传统的高比林的作品处于表达其自然形式的水平,现代的毛线在工艺以及肌理上有了新的创新。它可以进一步显示毛线的属性。

现代纤维材料打破了传统材料的死板,将可以进行缠绕、捆绑的各种材料都运用在纤维艺术作品中。迄今为止,纤维材料也越来越丰富。材料的扩展也会逐渐的完善,未来更会有无限的发展空间。线性材料的可塑性也非常强,我们可以产生超越触觉的直接反应,并将材料属性的肌理转换成审美属性。每一种材料都具有视觉美感,线性纤维也不例外,而且有着美丽的质感。同时,由于纹理和体积的表达方法以及纹理和体积的表达方法不同,效果也有所不同。水平和垂直重叠会在纹理中产生富有同情心的浮动和权重。它还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质感和美感,尤其是线性纤维艺术。必须牢牢把握材料的纹理及其表现技术。只有简单的材料才能反映出不同艺术技巧的质感和美感。

2、装置艺术

纤维材料装置艺术是以纤维材料为主的艺术展现形式^[5]。在纤维装置艺术中,线性材料的应用让作品充满了

动态的生命力。艺术家们不仅用毛线、麻绳这些传统线材，还会尝试金属丝、塑料管甚至发光纤维来创造空间魔法。比如中国艺术家林天苗用白色棉线缠裹整个房间，从天花板垂下的线帘随着人的走动轻轻摇晃，像是被冻结的白色瀑布突然活了过来。而美国艺术家珍妮特·艾克曼用彩色尼龙线编织出巨型漂浮装置，这些比头发还细的线在城市上空组成流动的彩色云团，阳光穿透时会在建筑表面投下彩虹光斑。装置艺术带来的自然韵律和运动节奏，是有力而优美的，纤维材料在自然环境中形成的质朴美感和独有张力更是超乎人们的想象^[6]。

三、当代纤维艺术的发展趋势

当前纤维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两个鲜明趋势：一方面，传统工艺与现代表现手法持续交融，手工编织的秩序感与自由创作的表现力在碰撞中寻找平衡；另一方面，材料的物理属性与精神象征不断深化，线材的弯曲、层叠、交错不再只是视觉游戏，而是转化为承载文化记忆的载体。这种转变提醒我们，材料的价值不在于新奇程度，而在于其能否搭建起观者与作品之间的情感桥梁。现代纤维艺术在展现形式上多元化、创作风格多样化，在空间上也从二维空间逐渐走向四维空间^[7]。

总的来说，当代艺术观念与纤维艺术的融合是一种全维度形式艺术创新，通过与不同材质、工艺的巧妙结合，将纤维艺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作语言和表现形式，为现代视觉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艺术风貌^[8]。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线性材料的探索越来越广泛，线性材料的种类也在不断的扩大，艺术家也正在慢慢释放新材料，以尝试新的表达方式。线性材料是艺术家们最喜欢的材料之一，在平面纤维作品中，不同的线性材料结合不同的技法表现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线的造型变幻多样。在平面纤维艺术作品中，我们要充分了解不同线性材料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更要进行创新，让更多的线性材料运用到平面纤维艺术作品当中，探索不同的表现手法。

在纤维艺术的创作长河中，线性材料始终是沟通物质与情感的无声语言。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到多元化的形态演变，线材的每一次突破都折射出人类对艺术表达的深层探索。当代创作者既需理解麻绳的粗粝质感，也要体会丝绸的细腻触感，这种对材料本真的尊重让平凡的线材焕发出独特魅力。当艺术家的双手与材料的特性产生共鸣时，再简单的线条也能编织出直抵人心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翁郁婷.传统线性纤维材料的艺术造型语言分析[D].天津美术学院.2021.
- [2] 孙晔.论纤维艺术中材料的表现性[D].苏州大学.2008.
- [3] 王雅楠.现代纤维艺术材料语言探析[J].西部皮革,2020,42(14):6-7.
- [4] 李莉.现代纤维艺术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研究[D].河北大学.2007.
- [5] 赵慧婷,侯东昱.传统手工艺创新基点浅析[J].西部皮革,2022,44(07):25-27.
- [6] 魏彩芸.浅析纤维艺术的展示形态与材质表现[J].美术教育研究,2020(21):32-33.
- [7] 王兰珍.纤维艺术创新设计新思考[J].美与时代(中),2011(12):79-80.
- [8] 向明锐.当代艺术观念下的纤维艺术多元化表现[J].辽宁丝绸,2024(01):57-58+10.

Exploration on the Expressiveness of Linear Materials in Fiber Art Works

Chen Jiaxin¹

¹ 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Materials are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appearance of fiber art works. The application of linear materials in fiber ar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particularly common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iber art creation. Due to their excellent plasticity and strong artistic expressiveness, linear materials are deeply favored by artists. By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shapes, colors, and techniques of various linear material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of linear materials in fiber art works. Furthermore, by adopting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alter the shape of threads, more diverse expressions of linear materials are explored.

Keywords: Linear Materials; Fiber Art; Weaving; Installation Art

从文化自信到制度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艺术政策逻辑

宋詹杰

(东国大学, 韩国 首尔中区 04574)

摘要：本文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艺术政策的发展逻辑，强调文化自信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文化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思想，是推动文化繁荣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通过梳理文化自信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意义，结合文化现代性的多维特征，文章系统分析了文艺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和体制机制改革中艺术政策的现实实践，指出制度创新是文化自信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路径。文章进一步总结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进展与制度经验，提出未来艺术政策应在法治保障、多元参与、数字治理与文化产业融合等方面持续深化创新。研究认为，文化自信提供价值引领，制度创新提供结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治理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注入持续动能。

关键词：艺术政策；文化自信；制度创新；中国式现代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2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文化自信不仅是“四个自信”的灵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路径，其显著特征之一是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和制度保障。正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在此指引下，如何将文化自信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成为新时代艺术政策研究的关键议题。艺术政策作为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文化自信为引领，通过制度创新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将围绕文化自信如何引领艺术政策、制度创新如何保障文化发展的主线展开论述。首先阐释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意涵；其次探讨文化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体现；然后分析文化自信对我国艺术政策实践的引领作用，结合文艺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案例加以说明；最后总结艺术政策领域制度创新的进展与经验，并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动艺术政策创新发展的思路。

一、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意涵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坚定信念。这一理念源自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文化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3]。文化自信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了精神之“钙”，标志着中国人在精神上重拾了主体性。

文化自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一，它是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为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3]；其二，它提供道路选择的定力，使中国能够坚定走自己的现代化文化发展之路，不盲目照搬西方模式[4]；其三，它转化为制度创新和政策实践的内在动力，推动破除文化发展体制障碍、完善文化治理体系（如2011年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5]。归根结底，文化自信赋予制度创新价值引领，制度创新保障文化自信落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激发全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宋詹杰(2001—)，男，韩国东国大学影像大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管理。

通讯作者：宋詹杰

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这体现了以文化自信提振精神、以制度创新激发活力的统一要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现代性

文化现代性是指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表现出的现代特质，包括思想观念和制度形态的创新转型[6]。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既不照搬西方、也不固步自封，而是选择“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道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保持文化主体性又开放包容[3]。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践行“全球本土化”，既积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又坚持文化自主，努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7]。

三、文化自信引领下的艺术政策实践

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在文艺创作领域推出无愧时代的精品力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作出与伟大时代相契合、与民族复兴相呼应的优秀文艺作品，以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激发全民族文化自信[8]。艺术政策据此加大对现实题材和传统题材创新创作的扶持，引导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凝聚人心。近年来《只此青绿》《哪吒》等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艺精品纷纷涌现，在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下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艺术创新与文化自信形成良性循环。

文化自信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和精神风貌的提升上。正如王一川所言，文化自信不能停留在政府和精英层面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建设上[9]。为此，艺术政策着力完善基层文化设施网络，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使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并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当每个普通人都能享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并从中受益时，民族文化自信才有最坚实的基础。不仅高雅艺术要繁荣，大众文化也应蓬勃发展——我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7]。

艺术政策的实施还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支撑和经济条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探索符合国情的艺术管理体制和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在艺术管理方面，一批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公益性文艺院团通过内部改革增强活力，同时政府继续支持其公益演出和传统艺术传承，从而兼顾了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率。这体现了对自身制度优势和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信心。文化产业方面，2002年以来文化产业被纳入国家经济规划并上升为国家战略[5]，我国在大力扶持影视、出版、演艺、数字内容等产业发展的同时严格把关内容导向，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产业方向。这种“双轮驱动”模式源自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使命意识：我们相信文化产业不仅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更能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民素质，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文化产业大国，国产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充分说明文化自信与制度创新的结合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根基和广阔空间。可见，文化自信贯穿于我国艺术政策实践始终，并为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的制度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

四、艺术政策的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

要让文化自信真正落到实处，必须以制度创新和治理现代化作保障。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升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到战略高度。回顾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实践（在文艺出版等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但总体上文化事业仍由国家包办）、2003年后的全面改革（经营性文化单位推向市场、文化产业纳入国民经济规划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提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现代化深化（政府转变职能，运用法律规范和财政政策支持文化发展，减少行政干预，2018年文化部与旅游局合并体现管理创新，文化立法密集出台，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化建设，2019年明确要求完善文化治理体系）。经过多年实践，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根本前提，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效益优先是价值原则，统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手抓”是中国特色，循序渐进、试点先行是有效方法。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改革没有终点，需要根据时代条件不断调整深化——如面对互联网技术发展，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版权和内容审核制度；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

要提供更高品质、更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近年来,我国在艺术政策相关制度创新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健全。国家加快文化立法步伐,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补齐文化领域法治短板,提高文化治理法治化水平[5]。二是文化管理机制更加创新开放。政府大力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共同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公共文化供给效率,公众由被动接受转为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三是文化投入和评价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建立文化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探索符合文化规律的评价体系,例如引入专家评审、社会评价和群众满意度等指标。这些举措极大调动了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使有限的文化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一些地方将文化发展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12],使各级政府更加重视文化工作,推动文化建设在基层得到落实。通过以上制度创新,我国文化治理能力显著提升,艺术政策的制度基础更加牢固、执行更加高效。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新征程中,艺术政策的制度创新仍需在多个方面持续用力,以更好满足人民新期待、实现文化强国目标。要继续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建设智慧文化管理平台,加强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的政策统筹和监管创新;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式处理文化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坚持正确导向前提下,扩大文化领域的社会协商和公众参与,凝聚各方共识。进一步完善文化法治保障。需及时制定出台文化产业促进法、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条例、网络文化管理条例等法规,为新兴文化领域提供法律依据,并强化执法和司法力度,严厉打击侵权盗版、整治低俗有害内容,保护文化创作者合法权益,让法律成为保障文化健康发展的坚实后盾。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能。应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精准的文化服务,深化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引入理事会等治理机制增强活力;大力发展数字文化服务,利用5G、VR等技术拓展优质文化资源的覆盖面;健全基层文化志愿者和协管员网络,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城乡群众都能方便参与高质量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构建更具竞争力和引领力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升内容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扶持原创IP、民族品牌和精品创作;完善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布局,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体育等跨界融合,培育新产业形态;健全文化金融服务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并防范产业资本无序扩张,确保文化产业在实现规模增长的同时提升质量和影响力,使中国文化产业在创意水平和品牌影响上跻身世界前列。加强文化政策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也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应深入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经验规律,积极参与国际文化政策研究交流,借鉴各国有益做法;同时培养一批既懂文化又通政策、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管理专才,提高各级文化治理者的专业化水平。通过以上举措,制度创新将更加科学、理性、富有前瞻性,为中华文化自信的持续深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为我国艺术政策制度创新提供了广阔舞台和明确目标。只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保持改革创新精神,与时俱进完善体制机制,我国文化治理能力将不断提升,艺术政策的效能将持续增强。届时,一个运行高效、充满活力、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将全面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提供坚实保障。文化自信在制度护航下,也将绽放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彩。

五、结语

从文化自信到制度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主线和内在逻辑。坚定的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而配套的制度创新则将这种动力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文化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本文结合国内外理论与中国实践,阐释了文化自信与艺术政策制度创新如何相互促进。

在理论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1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14]、罗伯逊的全球本土化论[7]等揭示了文化在社会发展和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启示我们文化自信的落实有赖制度保障;而李泽厚[4]、张国祚[12]等强调要立足中国实际,走符合自身特点的文化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上,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繁荣成就证明:只有坚持文化自信、不断革新体制,才能收获文化发展的累累硕果。无论艺术创作的繁荣、人民文化生活的丰富,还是文化产业的崛起、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离不开文化自信的引领和制度创新的驱动。正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扩大优质文化供给,让人民享有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2],揭示了文化自信与制度创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

展望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任重道远。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中,我们的文化自信将更加坚定,制度创新的步伐也将更加稳健。我们将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之魂,吸纳人类文明之光,不断完善文化治理体系和政策机制,以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期待。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政策工作者肩负着守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新时代文化创新的使命。只要我们不忘本来、坚定自信,又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就一定能谱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发展篇章。届时,一个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人民高度文化自信的现代文化强国将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新华社, 2022-10-25.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Z]. 北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 2022-08-16.
- [3] 张志丹. 顺应实践逻辑 增强文化自信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6-14(02).
- [4] 李泽厚, 秦晓. “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令人担忧 [J]. 财经, 2010(12 月下).
- [5] Hu Huilin. Chinese Cultural Policy: History,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J]. Journal of Forensic Legal & Investigative Sciences, 2019, 5(1): 30.
- [6] 牛学智. 我为什么以“文化现代性”为价值尺度? [J]. 文学自由谈, 2021(01): 43-47.
- [7] 罗兰·罗伯逊, 梁光严译. 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P.39-42).
- [8] 袁汪洋.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艺术创新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8-01(07).
- [9] 杨雪. 王一川: 文化自信需尊重中国现代型艺术 [N]. 人民政协报, 2016-08-29(012).
- [10] 奉清清. 让中国文化软实力更硬、更强、更精彩 [N]. 湖南日报, 2017-06-13(004).
- [11]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11.
- [12] 张国祚. 做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三个关键环节 [J]. 红旗文稿, 2014(12): 24-26.
- [13] Bourdieu P.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M]//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Routledge, 2018: 71-112.(P. 71-112).
- [14] 尤尔根·哈贝马斯, 蓝江译.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中信出版集团, 2025.01 (P.53-56).

From Cultural Confidence to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Logic of Art Poli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ong Zhanjie

(Dongguk University, Seoul Jung-gu 04574)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rt policy unde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rounded i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t draws on class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Habermas's concept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Robertson's theory of glocalization to construct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Em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hina's contemporary art policies. The key areas of analysis include: the conceptual origin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features of cultural modernit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guiding rol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supporting art policy developm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jointly supporting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Art Policy; Cultural Confidenc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从创作主体性到审美独特性： AI 绘画无法替代人类绘画的双重维度

张晴 侯心如 张鹏菲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并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绘画与人类绘画之间的本质区别及其深层含义。从创作的主体性、审美的独特性, 以及艺术价值的内涵等多个理论层面出发, 论证了在当前技术条件下, 乃至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可预见时期内, 人工智能绘画难以从根本上取代人类绘画这一核心观点。研究进一步表明, 尽管 AI 绘画在技术效率与图像生成速度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 能够高效、批量地生成多样化视觉内容, 但其创作机制本质上仍建立在对海量现有数据的学习、模仿与重组之上, 缺乏真实的情感投射、深刻的生命体验以及具有原创性与突破性的艺术思维。反观人类绘画, 其核心价值不仅仅体现于画面本身的视觉构成, 更深深植根于人类独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情感表达与精神追求中, 体现在艺术家“心手相应”的创作实践与不可复制的审美意蕴中。因此, 本文主张, 应当将 AI 绘画视为辅助人类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有力工具, 强调其在与人类艺术共存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协同与补充作用, 而非试图替代人类的艺术创造。艺术的本质始终关乎人的主体性、情感深度与精神境界, 这是技术迄今尚未能跨越的根本性界限。

关键词: AI 绘画; 创作主体性; 审美独特性; 艺术本质; 人类情感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3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AI 绘画已成为艺术领域不可忽视的现象。从 2018 年佳士得拍卖 AI 画作《埃德蒙·贝拉米肖像》以 43.25 万美元成交, 到 2024 年《AI 之神》在苏富比拍出 108.48 万美元高价, AI 绘画在艺术品市场的表现引人瞩目。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文生图”变得轻而易举, 人们只需输入简单的提示词, AI 便能快速生成各种风格的图像, 这一变革重构了传统创作流程, 大大缩短了创作周期。然而, 这种技术革新也引发了艺术界的深刻忧虑: AI 是否将取代人类画家? 艺术的本质是否会因技术的介入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当下艺术界对 AI 绘画评价两极分化。部分“革新者”认为, AI 绘画能获著作权、生产效率优于人类绘画, 必将取代传统绘画; 更多艺术家和理论家则认为, 其缺乏创作主体性和审美独特性, 无法替代人类艺术创作本质价值。全国政协委员贺晗指出, AI 可模仿《千里江山图》笔触, 却无法重现作画者的生命体验, 这种情感共振是代码难及的“在场感”。本文认为, 从创作主体性到审美独特性, AI 绘画有无法逾越的界限, 创作主体性关乎人类创造性思维等源头动力, 审美独特性涉及艺术作品历史积淀等本质价值, 二者构成人类艺术创作核心特征, 也是 AI 绘画无法替代人类绘画的根本原因^[1]。华东师范大学魏劭农教授强调, 能打动人心作品剖析人性复杂,

作者简介: 张 晴(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绘画设计;

侯心如(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创意设计;

张鹏菲(2003—),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影视动画设计。

通讯作者: 张晴

这是机器无法达到的。本文将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论述，分析 AI 与人类绘画本质差异，探讨 AI 在艺术创作中的可能与局限，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艺术本质提供理论参考^[2]。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深化与重构艺术创作中的“主体性”内涵，在 AI 绘画的冲击下，传统艺术哲学中关于“作者”、“天才”和“创造力”的概念受到挑战。本研究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简单捍卫，通过辨析 AI 的“算法执行”与人类的“意向性创作”之间的本质差异，深入探讨意识、情感、身体经验与自由意志如何在创作中构成不可化约的“主体性”，这不仅是对康德“天才论”等经典理论的当代回应，更是在技术哲学视域下对“创作主体”进行一次重要的理论重构。构建人机关系在艺术领域的辩证框架，本研究避免陷入“技术乌托邦”或“技术敌托邦”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双重维度”的剖析，旨在建立一个更具建设性的理论框架。它明确了人类与 AI 在艺术创作中的角色边界与功能互补——人类负责定义价值、注入意义与进行元创作，AI 则作为强大的风格化工具与灵感催化剂。这为未来艺术理论在“人机协作”模式下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

实践意义：为艺术创作者提供身份认同与战略方向，面对 AI 带来的效率碾压，许多艺术家陷入存在性焦虑。本研究通过清晰地界定人类在意图生成、价值判断与情感深度上的不可替代性，帮助创作者重拾信心，找准核心竞争力，它指引艺术家从技术竞赛转向生命体验的深度挖掘、个人风格的哲学探索以及观念表达的锐度，从而在“后 AI 时代”找到独特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为 AI 艺术的法律与伦理规范提供核心判据，AI 绘画引发的版权争议、作品原创性认定等问题亟待解决。本研究对“创作主体性”的深入剖析，直接关联到法律上对“作者”身份的认定；对“审美独特性”的界定，则为判断一件作品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还是“纯粹的风格模仿”提供了美学上的标尺。因此，本研究能为司法实践、行业公约和伦理委员会的裁决，提供至关重要的学理支持^[3]。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采用案例比较研究法、跨学科交叉研究法、历史与文献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纵向梳理艺术理论史上关于“模仿”、“表现”、“创新”等关键概念的演变，考察“艺术家”角色从工匠到天才的历史建构过程，通过文献梳理，揭示“主体性”和“独特性”如何成为现代艺术观念的核心，从而在与 AI 的对比中，凸显其作为历史产物的特定人文价值。再选取东西方艺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如梵高的《星月夜》体现的强烈情感与生命挣扎，徐冰的《天书》体现的文化观念与巧思），与主流 AI 绘画工具（如 Midjourney, Stable Diffusion）根据相似主题或风格提示词生成的作品进行精细化对比。通过并置分析，从意图的清晰度、情感的饱和度、形式的偶然性与控制力、文化符号运用的深度等维度，使抽象的理论论证获得具体、直观的视觉支撑。最终借助跨学科交叉研究法，这种交叉视野将确保研究不仅停留在人文社科内部，更能与前沿科技对话，增强结论的全面性与时代性。

二、创作主体性的本质差异

（一）人类绘画的创造性思维与情感表达

艺术创作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高度体现，它融合了艺术家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真正的艺术创作不是对现有元素的简单组合与模仿，而是基于对未知事物的想象与创造，正如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军平所言：“人工智能所做的是对旧有数据的学习和遵循，但是对不存在事物的想象，人工智能远不如人类。简而言之，人类拥有机器所不具备的‘创造性思维’。”人类艺术家的主体性体现在他们能够将内心情感、思想观念和生命体验转化为艺术形式^[4]。民盟中央美术院副院长何军委以中国水墨画为例指出，艺术家在创作中需要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表达，并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把握一个平衡点——达到这个点，就在一瞬间，这种微妙的平衡是 AI 难以捕捉的。中国画的笔墨传达的精神内涵、生命力及其传递的能量是独特的，画家在画一根线条时会注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使其成为有生命力的线条。艺术创作的本质在于“表达什么”与“为何表达”，这始终是人类的主体性命题，无法被算法复制。电视剧《人世间》《山海情》等优秀作品的成功，正是源于对普通群众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真实再现，“脚要踩在泥土里”，这些正是创造力的源泉，而 AI 的“创造力”受限于

既往训练数据的关联性，难以突破既有范式。

（二）AI 绘画的技术本质与算法局限

相比之下，AI 绘画缺失创作主体性。本质上，AI 艺术以人类主体意识为主导，以人工智能为代理产出。AI 绘画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学习分析海量现有图像数据，按预设规则和模式生成新图像，虽然有一定随机性和变化性，但本质是对现有数据的重组和模仿，缺乏真正的自主意识和情感体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长波指出，目前技术无法让 AI 实现情感和美感，AI 能模仿绘画风格，却无法像人类一样在创作中产生灵感、表达情感，其生成的图像缺乏触动人心的“灵魂”^[5]。

从生成机制看，AI 绘画有局限性。它既受制于人类主体意识，又依赖算法程序，如《千秋诗颂》设计角色时，依据人类上传的参考图和关键词，借助算法程序，AI 绘画的“自主性”依靠机器学习等手段，对大量人类艺术数据深度学习后实现，并非源于有意识的创作行为。

更深层的是，AI 绘画缺乏人类艺术创作的历史性与时间性。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受民族、地区、风俗及历史时代影响，而 AI 艺术是“文化工业产品”的极致，已从艺术范畴转变为技术范畴，时间性在“同一性”原则中被消解。

三、审美独特性的不可通约性

（一）审美体验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深度

人类绘画的审美独特性建立在丰富物质体验和精神深度之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陈孟昕讨论工笔画创作时指出，画家崇尚个性艺术语言，忠实于自身生命进程，呈现心灵独白与感受，创造有“意味”的形式并形成有“意味”和自性“温度”的作品，这是艺术家创作区别于 AI 制作的关键，其审美独特性源于对手工材料的直接感知和创作的不可预测性^[6]。中国传统绘画对材料质地有特殊审美追求，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院长丘挺表示，水墨画笔墨意蕴的“松”“糯”“毛”等审美感觉，是 AI 创作目前难以生成的，这些审美品质源于艺术家与宣纸、毛笔、墨等材料的互动^[7]。生宣吸水性和渗水性强，用其作画有不可预知性，吸引书画家创作，AI 生成的绘画常有不真实的科技感，如许多有电子生成塑料感的作品。在精神层面，人类绘画蕴含深刻历史文化积淀和生命体验，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所所长方向认为，有修为的艺术家不停留在画面，好作品独一无二、生动鲜活，充满生命精神。艺术创作是抒发自我、放松身心去发现内心审美的过程，包含时代文化气息和作者生命状态，这些因素构成完整艺术作品，而 AI 绘画基于现有数据的技术化处理，难以达到这种精神深度^[8]。

（二）审美独特性的历史性与时间性

人类艺术审美独特性有深刻历史维度与时间性。艺术作品生成后现身于时间才成其为艺术，时间性是其重要条件。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副研究员谭斐称，随着 AI 绘画发展，我们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国画传承、发展与创新充满自信。中国画价值体系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历史连续性是其审美独特性重要基础。AI 绘画生成机制是复制，靠自主学习系统模仿艺术形象和风格，是“技术复制”。随着“技术复制”在艺术创作中延伸，人们对艺术作品界定和认知转变。斯蒂格勒称 AI 艺术特性为“超复制性”，即建立在模拟上的高度仿真，在此特性中，艺术作品历史性与时间性消解，代之以无历史、平面化技术产出^[9]。

（三）审美共通感的形成机制

人类审美活动基于“共通感”，即人类共有的情感理解与沟通基础，在艺术领域，这种“内心感觉的普遍能力”是审美活动的基础。人工智能艺术以可计算性为基础，诉诸技术理性，难以与人类感性审美经验形成共通感^[10]。AI 艺术消解情感后，失去艺术的感性一面，成为技术理性的附庸，服务于特定目的，排除了自律和自由；而艺术以非理性方式唤起感性审美体验，释放被理性压抑的本性，在无用性中蕴含特殊有用性。因此，技术理性与感性体验的对立，使欣赏者与人工智能艺术难以形成真正的审美交流，真正的艺术是人类生活实践的表达和生命体验的书写，构筑的意象世界是人工智能艺术无法比拟和替代的。所以，就审美欣赏性而言，人工智能艺术被区隔

在生命体验之外。

四、AI 绘画的艺术价值与定位

（一）AI 作为艺术创作工具的辅助价值

尽管 AI 绘画在创作主体性和审美独特性方面存在局限，但我们不应完全否定其艺术价值。当下 AI 绘画更适合定位为一种辅助工具，为人类艺术家提供创意启发和技术支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指出，AI 与绘画的关系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 AI 如何帮助我们完成一个视觉任务；还有是否可以以 AI 的方式做创作”。在第一个方向上，AI 具有显著优势，AI 绘画为艺术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便利，利用 AI，艺术家可以快速获取海量素材，并借助其强大的运算能力进行分析和处理。AI 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多个创意方案，大大提升了创作效率。艺术家可以在 AI 生成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AI 的“算力”与艺术家的“笔力”结合，可能开辟新的艺术空间。在动画、设计等领域，AI 的辅助价值尤为明显。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刘轶卓认为，在艺术创作领域，真正的艺术家是无可替代的；从产业层面来看，AI 的效率则是人力所不能及。事实上，目前动画、设计行业的部分岗位已经开始用 AI 取代人工作业了，对于商业美术而言，AI 可以提供高效、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二）AI 绘画在艺术生态中的特定位置

AI 绘画在当代艺术生态中应有其特定位置，但这一位置不应是取代传统绘画，而是作为一种新兴艺术形式与传统绘画形成互补关系。民革中央画院副院长罗翔认为，AI 绘画和架上绘画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AI 绘画以其强大的生成能力和对创作思维的启发作用，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而架上绘画则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情感表达和艺术教育价值，继续在艺术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艺术接受的角度看，AI 绘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观众群体和社会影响力，近年来，AI 艺术展览的频频举办吸引大众关注，一些艺术家利用 AI 进行创作，探索 AI 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如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舒勇实践“每日一画”，利用生成式 AI 技术完成作品，探索 AI 绘画与传统绘画的平衡点，这种探索有助于丰富艺术表现手段，拓展艺术边界。然而，AI 绘画的价值应当建立在与传统艺术形成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上；原北京画院执行院长袁武指出，AI 不是绘画的全部，不能说不用 AI 就是保守。世界绘画中，真正有价值的是大师和艺术家的手稿，AI 算手稿吗？齐白石的许多草图和手稿都是作品，是很好的藏品，AI 生成物能作为收藏品吗？这些提问启发我们思考：艺术价值并非仅在于视觉呈现，更在于其背后的创作过程、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11]。

（三）人文精神的坚守与技术的批判性反思

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坚守艺术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对技术保持批判性反思。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副院长李传真指出，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我们需清醒认识到：当 AI 绘画以每天百万张的速度生产“美”，真正的艺术反而可能湮没于信息洪流。文艺创作要平衡技术工具与人文精神，避免陷入“高效但空洞”的陷阱。技术本身并非价值中立，它承载着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取向。正如独立学者刘墨所言，在虚拟的图像里面如何去碰触到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当这些做理工的人认为他们就是“艺术家”的时候，“艺术家”还能做什么？在技术发达的时代，画家如何给自己一个定位？这些提问直指 AI 时代的艺术本质问题^[12]。我们需要认识到，AI 技术的应用应当以艺术价值为导向，而非本末倒置。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院长丘挺指出，去年六月底在伦敦看到基弗以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人》为母题创作的个展，这种震撼人心的视觉场域，执拗、苦涩，完成了对乔伊斯诗性精神的再生产，只有具备悲悯情怀和历史感知的艺术家才能触及灵魂的深处。这种让观者沦肌浹髓的人性表达与叙事力量，会令我们反思目前 AI 在介入艺术在精神层面的局限性。

五、结论与展望

从创作主体性到审美独特性，AI 绘画无法替代人类绘画这一结论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在创作主体性层面，人类艺术家的创造性思维、情感表达和生命体验是 AI 难以企及的；在审美独特性层面，人类艺术

的历史积淀、文化内涵和审美共通感是 AI 绘画无法复制的。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人类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也是 AI 绘画无法替代人类绘画的根本原因。AI 绘画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工具，在提高创作效率、拓展表现形式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但其本质仍是基于数据与算法的计算产物，缺乏人类艺术的灵魂与温度。中国画家强调的“心手相应”创作状态，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体验。AI 可以模仿风格，但难以理解深层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意境。未来 AI 与艺术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互补共生而非简单替代。正如舒勇所言，这就像汽车被发明以后，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脚，但可以帮助人类走得更远^[13]。AI 也一样，AI 创作意味着一个新的视角，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艺术将焕发新的生命力，可以不断拓展思考的维度。我们需要在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坚守艺术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独特性，实现科技与艺术的良性互动。在 AI 时代，艺术创作更需要回归人的本质，强调创作的主体性和审美独特性。全国政协委员贺晗指出，AI 时代，文艺何为？答案或许就在技术与人文的共生中——科技为艺术提供基础工具，而人类以不可替代的生命经验和思想为作品注入灵魂。这种共生关系或许是人类艺术在 AI 时代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保持开放而批判的态度，既积极拥抱技术创新，又坚守艺术本质，在 AI 时代重新确认人的价值和艺术的意义。只有这样，艺术创作才能在技术浪潮中保持其独特的人性光辉和审美价值，为人类精神世界提供永恒的滋养。

参考文献：

- [1] 李栋.数智丹青焕新韵 ——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国风绘画创作 [N]. 光明日报, 2025-07-06 (09).
- [2] 魏劭农.艺术作品的人性剖析与机器的不可逾越性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20-126.
- [3] 王迁.AI 绘画著作权归属的法律辨析 [J/OL]. 著作权研究, 2025 (1):45-52.
- [4] 张军平.人工智能对“不存在事物的想象”局限研究 [J]. 计算机科学, 2024, 51 (5):1-6.
- [5] 王长波.AI 绘画的“灵魂”缺失与情感表达困境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4 (2):34-40.
- [6] 陈孟昕.工笔画创作的“意味”形式与自性“温度” [J].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报, 2024 (2):67-73.
- [7] 丘挺.水墨画“松”“糯”“毛”审美感觉的物质基础 [J]. 中央美术学院学报, 2024 (3):89-95.
- [8] 方向.山水画的生命精神与时代文化气息 [J]. 中国国家画院院刊, 2024 (1):56-62.
- [9] 谭斐.中国画价值体系的历史积淀与 AI 绘画的挑战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4 (3):78-84.
- [10] 阮佳.“画像师”大战 AI: 人类情感与创造力的不可替代性 [EB/OL]. 新华网, 2024-12-17.
- [11] 高峰.人工智能临摹传统国画的技术探索 —— 以齐白石游虾为例 [J]. 艺科融合研究, 2024 (4):15-21.
- [12] 侯百川.AI 绘画无法取代人类绘画 [EB/OL]. 光明网 (文艺报), 2025-09-19.
- [13] 舒勇.AI “每日一画” 实践与传统绘画的平衡点探索 [J].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学报, 2024 (1):37-43.

From Creative Subjectivity to Aesthetic Uniqueness: The Dual Dimensions of AI Painting and Human Painting

Zhang Qing, Hou Xinru, Zhang Pengf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AI-generated art and human painting, demonstrating that AI cannot replace human artistic creatio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while AI painting excels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mage generation speed, its creation relies on algorithmic learning and existing datasets, lacking life experience, emotional depth, and creative thinking. The value of human painting lies not only in visual presentation but also in cultural accumulatio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harmony between mind and hand." The paper argues that AI painting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an auxiliary creative tool, complementing human art rather than replacing it. The essence of art lies in human expression of subjectivit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a boundary that technology cannot transcend.

Keywords: AI painting; creative subjectivity; aesthetic uniqueness; essence of art; human emotion

墨韵新生：传统水墨动画在新媒体艺术语境下的教学解构 与实践重构

杜智雪¹ 张蕊¹

(1.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430)

摘要: 在全球文化多元碰撞的背景下, 传统水墨动画作为中国动画史上的璀璨明珠, 面临着新媒体艺术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深入剖析了传统水墨动画教学在新媒体艺术语境下的现状与问题, 指出当前职业院校在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与新媒体技术脱节、课程体系不完善、师资队伍缺乏新媒体技能等问题。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和新媒体艺术教育理论, 构建了传统水墨动画教学重构的理论框架, 提出了从教学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到实践教学体系的全面重构路径。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主题创作实践、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创新实践, 培养兼具传统艺术素养与新媒体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推动传统水墨动画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为传统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传统水墨动画; 新媒体艺术; 教学解构; 职业院校

基金项目: 2024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校级课题 (24CY2007)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4

在全球文化多元碰撞的当下, 传统水墨动画作为中国动画史上的璀璨明珠, 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自1961年中国首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问世以来, 水墨动画凭借其独特的笔墨韵味与虚实相生的意境, 开创了动画艺术的新境界。然而, 随着新媒体艺术的爆发式增长, 尤其是VR、AR、AI等新兴技术的出现, 传统水墨动画教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职业院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阵地, 肩负着传承与创新传统艺术的使命, 但目前普遍存在与新媒体技术脱节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剖析新媒体艺术语境下传统水墨动画教学的现状, 探索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培养既精通传统技艺又能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推动传统水墨动画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一、传统水墨动画教学的现状解构

(一) 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

传统水墨动画教学目标聚焦于传承传统艺术技法与文化内涵。通过教学, 使学生掌握水墨画的基本技法, 如笔法、墨法、构图等, 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审美观念、哲学思想在水墨动画中的体现, 培养学生对传统艺术的热爱与敬畏之心, 致力于将传统水墨动画的技艺与文化代代相传。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注重引导学生感悟水墨画中“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艺术追求, 以及道家“天人合一”、儒家“中庸之道”等思想在动画创作中的体现。

教学内容主要围绕水墨动画基础理论、绘画技法展开。基础理论涵盖水墨动画的发展历程、艺术特点、文化渊源等知识, 帮助学生构建对水墨动画的宏观认知。绘画技法方面, 着重教授学生水墨画的各种笔法, 如中锋、侧锋、逆锋等, 以及墨色的运用, 包括焦墨、浓墨、淡墨等不同层次的表现, 同时指导学生进行水墨人物、山水、花鸟等元素的绘制练习, 以提升学生的绘画技能。例如, 在《山水情》的赏析教学中, 教师会详细讲解影片中如何运用水墨技法表现山水的意境与神韵。

作者简介: 杜智雪 (1994—), 女, 硕士学位, 新媒体艺术;

张蕊 (1989—), 女, 硕士学位, 戏剧美学、动画。

通讯作者: 杜智雪

教学方法多采用课堂讲授、临摹练习、作品赏析相结合的方式。课堂讲授由教师系统讲解水墨动画的理论知识与技法要点,使学生形成初步认知。临摹练习环节,学生通过临摹经典水墨动画作品或水墨画范本,加深对技法的理解与掌握,培养绘画手感。作品赏析则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水墨动画作品,引导学生从艺术风格、表现手法、文化内涵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但这种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

(二) 新媒体艺术语境带来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的数字技术、虚拟制作等给传统水墨动画教学手段带来巨大冲击。传统水墨动画制作依赖手工绘制,工序繁琐、效率较低。一部10分钟的水墨动画,手绘制作可能需要数月时间。而当下数字绘画软件,如Photoshop、Clip Studio Paint等,具有便捷的绘图工具与丰富的材质效果,能大幅提高绘画效率;动画制作软件如Toon Boom Harmony、Adobe Animate等,在动画角色设计、动作制作、后期合成等方面功能强大,与传统制作方式截然不同。此外,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为动画创作带来沉浸式体验与交互性创新,传统教学手段难以满足学生对这些新兴技术的学习需求。例如,VR动画可以让观众360度全方位体验动画场景,这是传统水墨动画难以实现的。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信息传播迅速,受众接触到的艺术形式日益多样,审美需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动画的审美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风格,更追求新颖、独特、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作品。他们对动画的叙事方式、角色设计、画面效果等方面有了更高要求,注重作品的趣味性、互动性与个性化表达。传统水墨动画相对内敛、含蓄的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在吸引新观众群体方面面临一定挑战,这也对教学内容的更新提出了迫切需求。如网络上流行的“国潮”动画,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结合,更受年轻人喜爱。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差异巨大。传统水墨动画主要通过电视、电影等渠道传播,传播范围与受众群体相对有限。而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平台成为艺术作品传播的重要阵地,如视频网站(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社交媒体(微博、抖音等),传播具有即时性、广泛性、互动性等特点。学生创作的水墨动画作品若想获得更多关注与认可,需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掌握作品在新媒体平台的发布、推广技巧。传统教学在这方面缺乏相应内容,导致学生作品难以在新媒体环境中有效传播。例如,抖音上一些优秀的动画短视频,通过巧妙的剪辑和话题标签,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百万级播放量。

(三) 职业院校教学现存问题

部分职业院校在传统水墨动画教学中,教学理念未能及时跟上新媒体艺术发展步伐。过于注重传统技法与理论的传授,忽视了新媒体技术在水墨动画创作中的应用价值,未充分认识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跨学科能力的重要性。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上,未能将新媒体技术相关课程与传统水墨动画课程有机融合,导致教学内容与行业发展脱节。

课程体系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传统水墨动画课程与新媒体技术课程各自为政,缺乏相互衔接与融合。例如,学生在学习了传统水墨绘画技法后,未能及时学习如何将其运用到数字动画制作中。另一方面,实践课程薄弱,实践教学环节缺乏真实项目的支撑,学生实际操作机会有限,难以积累丰富的项目经验,无法满足企业对实践能力强的人才需求。某职业院校动画专业学生表示,在校期间参与的实践项目多为虚拟课题,与企业真实项目差距较大。

职业院校传统水墨动画专业的师资队伍,大多在传统水墨艺术领域具有深厚造诣,但普遍缺乏新媒体艺术相关技能。许多教师对数字绘画软件、动画制作软件等掌握不够熟练,无法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在新兴技术,如VR、AR、AI等应用于水墨动画创作方面,教师的知识储备与教学能力更为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与教学改革的推进。

当前教学评价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作为评价依据,侧重于对学生知识与技能掌握程度的考核。评价过程中,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团队协作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与评价。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与能力水平,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创新精神。例如,一些具有创新想法但绘画基础稍弱的学生,在传统评价体系中难以获得认可。

二、教学重构的理论基础与框架构建

(一) 重构的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与知识建构。在传统水墨动画教学中,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在教师引导下,通过自身的探索、实践与思考,主动构建对水墨动画知识与技能的理解。例如,在新媒

体技术辅助下,学生利用数字绘画软件进行水墨风格创作时,需自主探索软件功能与传统水墨技法的结合方式,从而加深对水墨动画创作的理解与掌握。教师可以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和成长。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备多种智能,如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等。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不同智能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在传统水墨动画教学重构中,可针对学生在绘画(空间智能)、动画制作(身体运动智能与逻辑数学智能结合)、团队协作(人际智能)等方面的不同优势,设计差异化的教学内容与项目,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例如,对于空间智能较强的学生,可以引导其进行动画场景设计;对于人际智能突出的学生,可安排其负责团队协作项目的沟通协调工作。

新媒体艺术教育相关理论为传统水墨动画教学重构提供了重要指导。该理论强调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与跨学科素养。在教学中,应引入新媒体技术,拓展艺术创作的边界与表现形式。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水墨动画创作环境,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水墨动画角色设计与情节生成,使学生在传统水墨动画学习的同时,掌握前沿的新媒体艺术创作理念与技术。通过将新媒体艺术教育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实现传统水墨动画教学的创新发展。

(二) 教学重构框架

教学目标从单纯传承传统艺术转向培养兼具传统艺术素养与新媒体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学生精通传统水墨动画的技法与文化内涵,还需熟练掌握数字绘画、动画制作软件等新媒体技术工具,具备运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水墨动画创新创作的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审美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艺术传播与推广能力。例如,学生应能够运用 AI 技术生成水墨动画素材,并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作品推广。

在基础课程方面,保留并强化水墨动画历史文化、传统绘画技法等课程,同时增设新媒体艺术概论、数字技术基础等课程,为学生后续学习奠定基础。技术课程中,开设数字绘画、动画制作软件、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在动画中的应用等课程,使学生掌握新媒体时代水墨动画创作所需的技术手段。实践课程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主题创作实践、作品展示与推广等环节,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项目经验,提升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竞争力。课程体系采用“基础-技术-实践”三位一体的模式,确保知识的连贯性与实用性。

采用项目式、混合式等新型教学方法。项目式教学以实际水墨动画项目为载体,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布置“基于新媒体平台的水墨动画短片创作”项目,学生需从选题策划、脚本编写、角色设计、动画制作到后期推广,全程自主完成。混合式教学则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利用在线课程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学生可自主学习理论。

三、职业院校教学实践的重构路径

(一) 课程体系创新

在基础课程中深入挖掘中国水墨动画自 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以来的发展脉络,以《小蝌蚪找妈妈》《山水情》等经典作品为切入点,剖析其背后“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美学追求。结合当下“国潮”文化复兴的热点,如河南卫视《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节目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探讨水墨动画在当代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引入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合作推出的“数字故宫”项目,展示如何通过新媒体技术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引导学生思考水墨动画与现代文化传播的结合点。

在教学中,除了常规的笔法、墨法训练,增加对传统绘画工具特性的研究。例如,通过对比不同产地宣纸(如安徽泾县宣纸、四川夹江宣纸)在吸水性、柔韧性上的差异,让学生理解材质对水墨效果的影响。引入现代水墨艺术家的创新实践,如徐冰的《天书》《地书》,引导学生突破传统技法的局限,培养创新意识。同时,结合数字化工具,利用高分辨率扫描仪将学生的传统水墨画作品转化为数字图像,进行后期处理与再创作,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初步融合。

紧跟时代步伐,介绍当下热门的新媒体艺术形式,如 NFT 数字艺术、元宇宙艺术等。分析 Beeple 的 NFT 作品《每一天:前 5000 天》以 6934 万美元成交的案例,探讨新媒体艺术在创作、传播、交易模式上的变革。引入中央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的课程体系,展示其如何培养学生在交互设计、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艺术等领域的能力,为职业院校课程设置提供参考。

在专业必修课程中以 Ps 软件为例,详细讲解其针对数字绘画设计的功能,如自定义画笔、涂抹液化工具、动画辅助功能等。开展“水墨风格数字插画创作”项目,要求学生将传统水墨元素与现代设计风格相结合,创作

出适用于文创产品（如手机壳、明信片）的作品。组织学生参加站酷网、AIGC 等设计平台的主题设计大赛，通过实战检验学习成果，提升学生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是抓牢动画制作软件的学习例如在 Adobe Animate 教学中，结合微信表情包、H5 页面动画等新媒体传播形式，让学生掌握动画在移动端的应用技巧。开展校企合作项目，由企业提供实际的动画广告、产品演示动画制作需求，学生分组完成从前期策划到后期制作的全流程工作。利用 HTC Vive、Pico 等 VR 设备，搭建沉浸式水墨动画创作环境。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推出的“数字供养人”VR 项目为例，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现传统文化场景。开展“水墨山水 VR 体验”创作项目，学生使用 Unity 3D 引擎结合 VR 设备，创作具有交互性的水墨山水虚拟现实作品，让观众可以通过手柄操作在虚拟山水间“漫步”。介绍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即梦等 AI 绘画生成工具在动画角色设计、场景概念图绘制中的应用。开展“AI 辅助水墨动画创作”项目，学生先用 AI 生成动画的初始画面，再通过后期加工赋予其水墨风格与独特创意。引入迪士尼利用 AI 技术辅助动画角色表情设计的案例，探讨人工智能在提升动画制作效率与创意水平方面的潜力，同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创作中保持人类的主体地位与艺术个性。

最后是实践课程的应用。与头部动画企业（如追光动画、完美世界）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开发“非遗主题水墨动画短片”项目。例如，以地方非遗项目（如青神竹编、崇州皮影）为题材，学生在企业导师指导下，完成从前期调研、故事脚本创作，到中期动画制作，再到后期宣传推广的全流程工作。作品完成后，通过企业的发行渠道在各大视频平台上线，并参加中国国际动漫节、东布洲动画展等专业展会。借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腾讯游戏学院合作的“游戏美术人才培养计划”模式，建立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学生作品企业认购的长效合作机制。结合社会热点与节日主题，组织“春节水墨动画创意大赛”“环保主题水墨动画创作”等活动。鼓励学生运用新媒体技术，创作具有互动性的水墨动画作品，如通过微信小程序实现观众与动画角色的互动。邀请行业专家、媒体人担任评委，优秀作品在学校官网、官方公众号、短视频平台进行展播，提升学生的创作积极性与作品影响力。在校内建设“数字艺术展厅”，利用全息投影、互动大屏等技术展示学生的水墨动画作品。与 B 站、爱奇艺等视频平台合作，开设“职业院校水墨动画作品专区”，定期推送学生优秀作品。举办“水墨动画创作分享会”，邀请企业代表、行业大咖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搭建作品推广与人才对接的平台。同时，指导学生建立个人自媒体账号，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分享创作过程，积累粉丝与行业资源。

（二）教学方法改革

利用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等在线平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建设“传统水墨动画与新媒体艺术”精品在线课程。课程内容包括理论讲解视频、软件操作教程、经典作品赏析、拓展阅读资料等。学生通过线上平台自主学习理论知识，完成在线测试与作业。线下课堂则以实践操作、小组讨论、作品点评为主，教师针对学生在线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集中讲解与指导。开展“线上线下联动创作”活动，学生在线上进行创意构思与素材收集，在线下课堂完成作品制作，最后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作品展示与交流。

创设多样化的教学情境，如模拟动画工作室、新媒体艺术展现场、网络直播带货等场景。在“模拟动画工作室”情境中，学生分别扮演动画导演、原画师、动画师、后期剪辑师等角色，按照企业的工作流程完成水墨动画项目。

（三）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建设“水墨动画数字创作中心”校内实训基地，配备专业的动画制作设备，如高配置工作站、数位绘图板、动作捕捉系统、虚拟现实设备等。设立不同功能的工作室，包括传统水墨画室、数字绘画工作室、动画制作工作室、后期合成工作室、虚拟现实创作室等。与软件厂商（如 Adobe、Autodesk）合作，建立授权培训中心，学生在实训基地完成学习后可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

与动画企业、文化创意园区、新媒体平台等建立校外实践基地。邀请企业技术骨干到学校举办讲座、开展工作坊，将企业的实际项目引入课堂教学。与地方文旅部门合作，参与地方文化旅游宣传动画的制作，如为景区制作水墨风格的 VR 导览动画。建立“产学研用”合作联盟，共同开展课题研究、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实现学校、企业、社会的多方共赢。组织学生参加国内外重要的动画赛事，如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等。鼓励学生参与行业展会与交流活动，如中国动画学年会、56 个月亮电影节动画展映单元。

（四）师资队伍建设

制定教师新媒体艺术培训计划，每年选派教师参加国内外专业的培训课程与学术会议。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课程开发，对在新媒体艺术教学改革中取得突出成果的教师给予奖励。建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定期组织教学研讨活动，共同探索传统水墨动画与新媒体艺术融合的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从动画企业、新媒体公司聘请具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项目指导、实训基地建设等工作,将行业最新技术与实践经验引入课堂邀请企业技术专家担任学生毕业设计导师,指导学生完成与企业实际需求相结合的毕业设计作品。定期组织校企教师联合备课、教学观摩与交流活动,共同开发课程资源、编写教材。建立校企师资培训资源共享机制,利用企业的培训平台与设备,为学校教师提供技术培训;学校为企业员工提供艺术理论、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培训,实现校企师资的共同成长与发展。

四、结语

传统水墨动画在新媒体艺术语境下的教学解构与实践重构,不仅是对传统艺术的传承,更是对创新发展的积极探索。通过深入剖析传统教学的现状与问题,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和新媒体艺术教育理论,本研究构建了系统的教学重构框架,从教学目标、课程体系到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体系,全方位推动教学改革。校企合作项目的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开展以及师资队伍优化,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了坚实保障。未来,我们应持续探索传统艺术与新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让传统水墨动画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文化传承与创新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唐红平.多维视野下无纸化水墨动画的诗意建构[J].电影评介,2020(10):71-75
- [2] 刘麟霄,付衡.虚实结合:水墨动画的数字化发展研究——以《深海》为例[J].传播与版权,2025(6):38-40
- [3] 苗蕾,孔曼璐.多感官体验下三维虚拟交互式水墨动画的设计与制作[J].黄山学院学报,2024,26(1):112-117
- [4] 胡馨月,倪子雯,徐菊红.动画教学中水墨意象的构建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2(13):122-124
- [5] 杜庆磊.从可行性到应用:水墨元素在动画场景设计与教学中的应用探索[J].美术教育研究,2024(19):156-158
- [6] 钟伟,李丹苓.“互联网+”背景下 GIF 动画与传统水墨结合教学实践[J].美化生活,2025(2):0046-0048

The Rebirth of Ink Rhythm: Reconstructing the Pedagogy of Traditional Ink Wash Animation Through New Media Art

Du Zhixue¹, Zhang Rui¹

¹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ichuan, Chengdu 61143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multicultural convergence, traditional ink wash animation, a shining jewe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imation, fac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new media ar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ink wash animation teaching within the new media art context. It points out common issu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from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 underdeveloped curriculum system, and a lack of new media skills among faculty.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and New Media Art Education Theor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ink wash animation teaching. It proposes comprehensive reconstruction paths encompassing teach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ystems, 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s. Through innovative practices such as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projects, thematic creation practices, and online-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this approach aims to cultivate versatile talents equipped with both traditional artistic literacy and new media technical capabilities. The goal i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ink wash anim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rt educ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Ink Wash Animation; New Media Art; Teaching De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AI 辅助平面设计人机协同创作模式研究： 协作机制与效率优化策略

侯心如¹ 张鹏菲¹ 张 晴¹

(1.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 正推动平面设计领域从“人工独立创作”向“人机协同共生”转型。AI 工具在创意发散、基础执行等环节展现出显著优势, 但人机协作逻辑模糊、效率提升路径不明等问题, 制约了设计价值的最大化释放。本文以 AI 辅助平面设计的协同创作模式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分析法构建理论框架, 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实证研究。核心研究发现: AI 在协同中呈现“灵感源—执行助手—协作伙伴”的三重定位, 形成角色互补的协作机制; 基于此构建的“流程重构—工具整合—能力升级”三维优化策略, 可有效突破效率瓶颈。研究成果既补充了人机协同设计的理论体系, 又为设计产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平面设计; 人机协作; 创意流程; 效率优化; 协同创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5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已渗透至平面设计全流程, 生成式 AI 工具的应用重构了传统设计范式。Midjourney 可通过自然语言指令生成多元视觉方案, Adobe Sensei 实现了色彩搭配与版式布局的自动化, Canva AI 则将批量海报制作效率提升 80% 以上。AI 辅助设计工具已实现平面设计基础环节的自动化替代, 其中批量排版与色彩优化效率提升尤为显著。新一代 AI 工具通过深度学习算法, 已能实现从“单一功能执行”向“多环节协同支撑”的跨越, 推动设计范式从线性流程向网状协同转型。据《2024 年全球设计产业报告》显示, 67% 的专业设计团队已常态化使用 AI 工具, 但其协同效率仅为预期值的 42%。部分设计师陷入“AI 生成—无序筛选—反复修改”的恶性循环, 人机角色冲突、创意控制权分配等问题凸显, 技术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设计价值。这一现象体现了技术优势向设计价值的转化受阻, 核心症结在于人机协作边界模糊与控制权分配失衡。

人机协同为平面设计带来了创意激发与效率提升的双重潜力。AI 的大数据处理能力可突破人工经验局限, 快速输出多风格创意方向; 设计师则凭借策略思维与审美判断, 赋予作品情感温度与品牌调性。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具有双重意义: 理论层面, 聚焦平面设计领域的特殊性, 构建针对性的人机协同理论模型, 弥补现有研究对创意类协作关注不足的缺陷; 实践层面, 明确高效协同的运作逻辑与优化路径, 帮助设计企业重构 workflow, 助力设计师提升 AI 应用能力, 推动设计产业从“规模生产”向“价值创造”升级。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核心围绕两大研究问题展开: 一是 AI 辅助平面设计中, 人机协作机制的核心逻辑与典型模式是什么? 二是如何通过机制优化与策略构建, 突破当前协同效率瓶颈? 基于此, 研究内容涵盖四部分: 梳理人机协作理论与设计流程变革, 解析平面设计人机协同的内在机制, 构建效率优化策略体系, 通过案例实证验证策略有效性。

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其一, 文献分析法, 系统梳理人机交互理论、设计流程

作者简介: 侯心如(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创意设计;

张鹏菲(2003—),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影视动画设计;

张 晴(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绘画设计。

通讯作者: 侯心如

理论及 AI 设计应用相关文献, 重点研读分布式认知理论、角色分配模型等成果, 构建研究的理论基础; 其二, 案例对比法, 选取品牌视觉设计 (全流程协同) 与社交媒体海报批量制作 (自动化场景) 两类典型项目, 根据设计公司的实际操作过程, 对比传统流程与 AI 协同流程的耗时、方案质量及用户反馈, 结合设计师深度访谈, 验证协作模式与优化策略的实践价值。

2 人机协作的理论框架与设计流程变革

2.1 人机协作理论核心

平面设计领域的人机协同并非简单的“人工+AI”叠加, 而是基于角色优势互补的有机融合, 其核心在于明确协作定位与关键要素。从协作深度划分, AI 在设计中的角色呈现三级递进特征: 初级定位为“灵感激发器”, 基于大数据分析生成多元创意草案, 为设计师提供突破思维定式的参考; 中级定位为“执行助手”, 承接排版、配色、素材处理等重复性工作, 聚焦效率提升; 高级定位为“协作伙伴”, 可响应设计师的参数调整需求, 实现方案的交互式迭代, 形成“决策—执行—反馈”的闭环。

实现高效协同需把握三大关键要素: 一是控制权分配, 设计师应主导创意策略、品牌调性等核心决策, AI 聚焦技术实现环节, 避免“技术主导创意”的异化; 二是信任建立, AI 工具需提升输出的可预测性, 通过优化算法降低“无效生成”比例, 同时设计师需建立对技术的合理认知, 避免过度依赖或排斥; 三是透明度需求, AI 应明确标注生成内容的素材来源与逻辑依据, 为设计师判断提供支撑, 这也是解决后续版权争议的重要前提。

2.2 AI 对设计流程的重构

传统平面设计多遵循“调研—发散—聚焦—执行”的双钻模型, 各环节衔接依赖人工传递, 流程周期长且创意局限于团队经验。AI 技术的介入打破了这种线性流程, 构建了“全流程渗透、多节点互动”的增强型模式, 核心变革体现在三个关键节点:

灵感获取阶段, AI 替代传统的素材搜集与头脑风暴, 通过“关键词拓展+风格迁移”快速生成创意方向。例如为新消费品牌设计 LOGO 时, 设计师输入“国潮+极简+年轻化”, Midjourney 可在 10 分钟内生成 20 组不同风格的草案, 覆盖传统纹样重构、几何图形组合等多元思路; 方案迭代阶段, 人机交互式优化替代人工反复修改, Figma 的 AI 插件可根据设计师标记的“色彩饱和度提升”“字体层级强化”等需求实时生成修改方案, 支持即时反馈与调整; 技术实现阶段, 自动化工具完成基础工作, Adobe Sensei 的智能排版功能可根据内容优先级自动调整版面, Canva AI 则能批量生成统一风格的系列海报, 将传统 1 天的工作量缩短至 2 小时内。这种重构实现了“创意价值最大化、执行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3 平面设计人机协同创作机制分析

3.1 角色互补性分析

人机协同的核心价值源于角色优势的精准匹配与互补, 这种互补性贯穿设计全流程。设计师的核心优势集中在三个维度: 策略思维, 能够基于品牌定位、目标用户需求等宏观因素确立设计方向, 如为母婴品牌设计海报时, 可精准把握“安全、温馨”的核心调性, 避免 AI 陷入“形式化创意”; 审美决策, 具备对色彩搭配、版式平衡的主观判断力, 可从 AI 生成的多元方案中筛选符合设计理念的内容, 并进行情感化优化; 情感表达, 能够将品牌文化、人文关怀等抽象内涵融入设计, 使作品具备情感共鸣力, 这是当前 AI 难以复制的核心能力。

AI 的优势则体现在数据驱动的高效性与客观性上: 其一, 数据处理能力, 可快速分析近 3 年的设计流行趋势、同类品牌案例, 提炼符合需求的设计元素, 为创意提供数据支撑; 其二, 快速生成能力, 短时间内输出多风格、多形式的方案, 突破人工创意的思维局限; 其三, 批量处理能力, 在系列化设计、多尺寸适配等重复性工作中表现突出, 如将单张海报快速适配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不同平台的尺寸要求, 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人机角色的互补形成“1+1>2”的协同效应, 既保留设计的人文价值, 又提升生产效率。

3.2 典型协作模式

结合 AI 的角色定位与实际应用场景, 平面设计领域的人机协同模式可划分为三类, 其应用场景与典型工具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模式类型	应用场景	案例工具
AI 灵感激发器	设计初期的创意发散、概念草稿生成, 帮助设计师突破思维定式, 拓展创意边界, 尤其适用于陌生风格或新兴领域的设计任务	Midjourney、DALL·E、Adobe Firefly
AI 设计执行助手	设计初期的基础执行工作, 如自动化排版、配色优化、素材抠图、格式转换等, 聚焦降低重复性劳动强度	Adobe Sensei、Canva、AI、Figma 自动布局功能
人机协同伙伴	设计全流程的交互式协作, 支持设计师通过参数调整、需求描述实现方案迭代, 适用于高精度、个性化的设计任务	Figma+AI 插件、Photoshop AI、Sketch A

不同模式并非相互孤立, 在实际设计项目中往往形成组合应用。例如品牌视觉设计项目中, 先通过 Midjourney

(灵感激发器)生成 LOGO 创意草案,再利用 Adobe Sensei (执行助手)完成 VI 系统的标准化排版,最后通过 Figma+AI 插件(协同伙伴)实现与客户的实时修改互动。

3.3 协作效能影响因素

人机协同效能的提升受多重因素制约,核心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工具性能,包括 AI 生成内容的质量(创意独特性、风格匹配度)与可控性(是否支持精准参数调整、修改反馈速度),这是协同的基础保障。AI 工具的“指令匹配精度”与“迭代响应速度”是影响设计师使用意愿的核心指标。例如 Midjourney V6 版本通过优化算法,使生成内容与文本指令的匹配度提升至 85%,显著降低了人工修改成本;二是设计师 AI 素养,核心是提示工程能力与 AI 输出评估能力,优秀的设计师可通过精准的指令描述引导 AI 生成符合要求的内容,同时快速辨别输出的可用性;三是流程整合度,即 AI 工具与设计流程的衔接机制,若 AI 生成的内容需手动导入设计软件,或修改反馈存在延迟,将严重影响协同效率,因此工具间的 API 接口互通至关重要。

4 效率优化策略体系构建

4.1 流程重构策略

流程重构的核心是将 AI 深度嵌入设计全流程,实现“人机无缝衔接”。具体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节点整合,打破传统流程中“创意—执行—优化”的独立边界,将 AI 工具嵌入创意发散、方案深化、成果输出等关键节点。例如在创意发散阶段,同步启动 AI 灵感生成与人工头脑风暴,通过“AI 多元拓展+人工聚焦筛选”提升创意质量;在方案深化阶段,采用“AI 初步优化+人工精准调整”的模式,由 AI 完成基础色彩、版式优化,设计师聚焦情感表达与细节打磨。

二是建立闭环迭代机制,构建“AI 生成—人工筛选—反馈调整—AI 再优化”的循环流程。设计师将筛选后的优质方案及修改意见转化为精准指令,反馈给 AI 进行二次生成,通过多次循环提升方案质量。以海报设计为例,首次 AI 生成 10 组方案,设计师筛选 3 组并提出“增加暖色调、强化标题层级”的修改需求,AI 基于反馈生成 6 组优化方案,最终设计师通过微调确定终稿,该模式较传统流程可减少 50%的修改时间。

4.2 工具整合策略

工具整合的目标是构建“功能互补、数据互通”的 AI 设计工具链,避免“工具碎片化”导致的效率损耗。首先是工具链设计,根据设计流程需求,组合“生成类工具+优化类工具+协作类工具”,形成完整的协同生态。例如品牌视觉设计项目中,采用“Midjourney (创意生成)+Photoshop AI (细节优化)+Figma (团队协作与客户反馈)”的工具组合,实现从创意到落地的全流程支撑;其次是数据互通,通过 API 接口打通各工具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设计素材、参数设置、修改记录的实时同步。例如 Adobe 生态通过统一账号体系,使 Firefly 生成的素材可直接导入 Photoshop、Illustrator,且修改记录自动同步,避免了手动传输与格式转换的麻烦。

此外,可搭建定制化工具平台,针对特定设计场景整合 AI 功能。例如电商平台可开发专属设计工具,集成“AI 商品图抠图+智能排版+多平台尺寸适配”功能,设计师只需上传商品图并输入促销信息,即可快速生成符合各电商平台要求的海报,大幅提升批量设计效率。

4.3 设计师能力升级策略

设计师能力升级是实现高效协同的核心保障,重点提升两大核心能力:一是 AI 提示工程能力,通过系统训练掌握精准指令的构建方法,包括明确设计目标、细化风格要求、补充场景信息等要素。例如将模糊指令“设计一张科技感海报”优化为“设计一张面向年轻群体的手机发布会海报,科技蓝为主色调,抽象电路纹理为背景,标题采用粗体无衬线字体,风格参考苹果发布会视觉”,可显著提升 AI 输出质量;二是批判性评估能力,设计师需建立“技术输出—价值判断”的思维模式,从创意独特性、品牌匹配度、情感表达等维度评估 AI 输出,避免盲目采纳技术生成内容。

提升路径包括企业内部培训与行业交流合作:企业可定期开展 AI 工具应用培训,邀请资深设计师分享提示工程技巧与案例经验;行业协会可搭建交流平台,组织 AI 设计竞赛,通过实践提升设计师的协同能力。同时,设计教育应将 AI 协同纳入课程体系,培养具备“设计思维+技术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明确了 AI 辅助平面设计人机协同创作的核心机制与效率优化路径,主要结论包括:其一,人机协同的核心逻辑是角色互补,设计师主导创意策略、审美决策与情感表达,AI 聚焦数据驱动的创意激发、高效执行与批量处理,形成“人控方向、AI 增效能”的协作关系,AI 在其中呈现“灵感源—执行助手—协作伙伴”的三重定位,可根据任务需求灵活切换;其二,协作效能受工具性能、设计师 AI 素养、流程整合度三大因素制约,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协同效率;其三,构建“流程重构—工具整合—能力升级”的三维优化策略体系,可有效突破效率瓶颈,其中流程重构是核心框架,工具整合是技术支撑,能力升级是人力保障,三者协同形成闭环。

5.2 未来展望

从技术发展方向来看,多模态 AI 工具的融合将成为未来趋势。当前 AI 工具多聚焦视觉生成,未来将实现“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的多模态协同,例如设计师通过语音指令即可完成海报设计,并同步生成配套的短视频推广素材,进一步提升设计全链路效率。同时, AI 的个性化学习能力将增强,可通过分析设计师的风格偏好自动调整输出特征,实现“专属 AI 协作伙伴”的构建。

伴随技术发展,伦理挑战也日益凸显,核心集中在版权归属与设计原创性界定两大问题: AI 生成内容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版权归属设计师还是工具平台,目前法律界定尚不清晰;设计原创性判断标准面临重构,需区分“AI 复制现有作品”与“AI 基于学习生成新内容”的边界。未来需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行业规范(如 AI 生成内容溯源机制)、提升设计师原创引导能力等方式,实现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的平衡。

参考文献:

- [1] 赵慧蓉. AIGC 技术在艺术设计类专业中的应用和挑战[J].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04): 50-53.
- [2] 高一鸣. AI 辅助设计工具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J]. 玩具世界, 2024, (05): 154-156.
- [3] 人工智能辅助设计迭代研究——以平面设计为例[J]. 周楚轶; 柴春雷; 杨程. 包装工程, 2021(18)
- [4] 王惠蓉, 张瑜. 人工智能潮下 AI 设计的应用与挑战[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4, 15(01): 21-30.
- [5] 刘燕. AI 技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新通信, 2025, 27(06): 77-79.
- [6] 赵永涛, 高经纬.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J]. 包装工程, 2024, 45(04): 226-234
- [7] 吴琼. 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设计思维[J]. 装饰, 2019, (11): 18-21.
- [8] 王楠, 郭莉玲. 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 现状与未来趋势[J]. 明日风尚, 2025, (13): 182-184.
- [9] 孙文倩.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下的图像生成艺术创作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23.
- [10] 刘志毅, 张贵明. 浅析 AI 赋能设计艺术的应用研究及发展[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0(06): 93-97.

Research on AI-Assisted Graphic Desig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Creation Mod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nd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Strategy

Hou Xinru¹, Zhang Pengfei¹, Zhang Qing¹

¹ 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siv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aphic design field from "manual independent creation" to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symbiosis". AI tools have shown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creative divergence, basic execution, and other aspects, but problems such as vagu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logic and unclear efficiency improvement paths have constrained the maximization of design valu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llaborative creation mode of AI assisted graphic desig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typical cases. Cor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I presents a triple positioning of "inspiration source executive assistant collaborative partner" in collaboration, form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with complementary roles; The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process reconstruction too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upgrad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is can effectively break through efficiency bottlenecks.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supplem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design, but also provide a practical path for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sign industry,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aphic desig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creative process;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collaborative creation

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的数字化品牌传播策略研究

廖珣玥¹

(1.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会计系, 四川 成都 610400)

摘要: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构成, 其传承传播对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泸州作为川南红色文化重镇, 拥有四渡赤水遗址、朱德旧居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 “三进工程”是推动红色文化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当前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面临传播形式单一、青年参与不足、品牌影响力薄弱等现实困境, 难以适配数字化时代传播需求。本文以数字化传播理论、品牌管理理论与文化认同理论为支撑, 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 系统梳理泸州红色文化资源谱系与“三进工程”传播现状, 深入剖析其数字化传播的核心制约因素, 构建涵盖品牌定位、内容生产、渠道整合、互动参与与效果评估的数字化品牌传播策略框架。研究成果可为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数字化转型提供实践指导, 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向品牌价值转化, 助力“红色泸州”城市IP建设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红色文化协同发展。

关键词: 泸州红色文化; 三进工程; 数字化传播; 品牌策略; 文化认同

基金项目: 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泸州市文化建设研究中心项目 (项目编号: WH202515)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6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红色文化传承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将红色文化传播提升至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在数字化技术全面渗透的背景下, 传统场馆参观与故事宣讲的红色文化传播模式逐渐显现受众流失、效能弱化等问题, 如何借助数字技术创新传播路径, 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为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 也为区域红色文化“三进工程”创新发展指明方向。

泸州作为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发生地, 拥有红色文化遗址遗迹 20 余处, 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 处, 形成以“四渡赤水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体系。为推动红色文化深度传播, 泸州市启动红色文化“三进工程”, 通过进校园开展思政教育、进社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进企业强化党建引领, 构建全方位传播格局。但实践中, “三进工程”仍以传统传播模式为主, 内容同质化严重、互动性不足, 青年群体参与意愿不强, 品牌辨识度较低, 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传播需求。与此同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共建红色文化旅游走廊”, 泸州作为川南红色文旅枢纽, 其红色文化传播与品牌建设不仅关乎地方文化自信提升, 更对区域红色文旅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数字化品牌传播成为连接红色文化资源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关键纽带。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文聚焦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与品牌管理的交叉领域, 突破传统红色文化传播研究的线性思维局限, 整合 SIPS 模型与 AISAS 模型, 构建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理论框架, 揭示区域红色文化“三进工程”中文化符号、数字媒介、用户行为的互动规律。研究填补了区域红色文化数字化品牌策略系统性研究的学术空白, 为同类区域红色文化传播研究提供跨学科理论参考, 推动红色文化传播研究从“资源导向”向“品牌驱动”转型。

作者简介: 廖珣玥(199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旅游营销、消费者行为。

1.2.2 实践意义

本文针对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的现实痛点，开发适配学校、社区、企业不同场景的轻量化数字传播工具，形成可操作、可复制的数字化品牌传播方案。通过精准化传播策略设计，预计有效提升“三进工程”参与率及红色场馆游客转化率，助力“红色泸州”城市品牌IP塑造。同时，研究成果可向川南红色文旅联盟推广，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红色文化资源的协同开发与品牌共建提供实践样本，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良性互动。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数字化传播的现状诊断为起点，在系统梳理红色文化资源谱系与传播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开展理论框架构建，结合不同场景受众需求进行数字化品牌传播策略开发，通过试点单位应用开展实证检验以验证策略有效性，最终提炼可复制的标准化模式并形成面向区域推广的应用方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2.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的研究主要围绕技术应用与路径创新两大方向展开。在技术应用层面，学者们普遍关注VR/A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红色文化呈现中的实践价值，刘伟（2021）提出云展馆赋能短视频融合策略，强调通过抖音、B站等平台实现红色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为区域红色文化的社交媒体传播提供方法论支撑；石影（2024）以四渡赤水纪念馆为案例，探讨数字化展陈技术的应用实践，指出虚拟展厅存在交互设计不足的问题，为泸州红色文化数字化体验优化提供研究切入点。

在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研究领域，现有成果多聚焦实践模式与优化建议。李旭、王孟李（2022）通过提出泸州需要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创新+企业驱动+社会组织赋能+高校协同+民众参与”六方联动机制，通过资源整合、多维宣传、教育融合等举措，补齐开发短板；王兆峰、吴银峰（2022）从协同传播视角出发，提出构建学校、社区、企业联动网络，但未涉及数字化手段在协同机制中的应用，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传播需求。

在区域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研究方面，詹伟佳（2025）在构建涵盖传播效果、文化认同、产业转化的品牌价值评价框架，为区域红色文化品牌建设提供评估工具；徐梦辉（2025）以沂蒙红色文化为案例，探讨区域红色文化品牌的定位与传播策略，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国家级红色教育基地，对地方级红色文化资源的品牌化传播关注不足，尤其缺乏针对泸州等川南地区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的数字化品牌策略研究，难以直接指导泸州红色文化品牌建设实践。

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与品牌管理领域，为本文提供方法借鉴与理论参考。在技术应用层面，Hulusic等（2023）通过数字叙事框架验证交互式H5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情感唤醒效应，发现交互度与受众文化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r = .62, p < .01$ ），为泸州红色文化互动内容设计提供实证依据；Checa & Bustillo（2020）的VR教育元分析指出，沉浸式体验使历史知识留存率平均提升34%（ $g = 0.76$ ），为VR在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中的效能评估奠定量化基准。

在受众参与机制研究方面，Nguyen & Tong（2023）基于21万条Instagram带地理标签帖子的机器学习研究显示，UGC可将文化遗产地的社群参与度提高42%，其提出的“触发-共创-扩散”三段式运营模型已被多地文旅部门采纳，为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用户互动活动提供可直接套用的策略模板；Mortara等（2014）提出“轻量化文化品牌”概念，论证低成本移动应用可在4周内将品牌触达范围扩大3倍，其设计原则与泸州红色文化场景化、低成本、高适配的传播需求高度契合，为轻量化数字工具开发提供操作指南。

但国外研究存在明显局限：一是聚焦西方历史文化语境，对中国红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价值体系适配性不足，其成果需结合中国红色文化特性进行本土化转化；二是缺乏对“三进工程”这类特定传播场景的针对性研究，难以直接应用于泸州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的实践中，需结合泸州本地场景进行创新调整。

2.3 文献述评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现有成果已为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提供技术路径与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泸州市内研究集中于红色资源保护与传统传播模式，对数字化品牌策略的系统性研究尚属空白，难以指导“三进工程”的数字化转型；其二，国内研究多聚焦国家级红色基地，对地方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的场景适配性与品牌化运营关注不足，缺乏针对川南地区红色文化特性的创新策略；其三，国际研究的本土化转化机制尚未建立，缺乏结合中国红色文化特性与区域传播场景的实践探索。基于此，本文立足泸州红色文化资源与“三

进工程”实践，融合数字化传播与品牌管理理论，构建场景化、精准化的传播策略体系，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3. 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发展现状与传播困境

3.1 泸州红色文化资源谱系与“三进工程”实践基础

泸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且特色鲜明，形成以“四渡赤水”为核心的军事文化、以朱德旧居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川南游击区为载体的革命文化三大体系。其中，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二郎滩渡口遗址、朱德旧居、川南游击纵队纪念馆等核心资源，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承载着“坚定信念、团结协作、灵活机动、勇毅果敢”的红色精神内核，为“三进工程”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

从“三进工程”实施现状来看，进校园方面，泸州市中小学普遍开展“红色故事进课堂”“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泸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开设红色文化选修课，但传播形式仍以课堂讲授、场馆参观为主，数字化教学资源匮乏，难以激发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兴趣；进社区方面，社区通过宣传栏、文艺汇演、讲座等形式传播红色文化，但内容更新周期长、互动性不足，青年群体参与率不足 20%，传播效果有限；进企业方面，泸州老窖、郎酒等企业将红色文化融入党建工作，开展“红色主题党日”活动，但传播形式单一，多为会议宣讲，未形成品牌效应，难以实现红色文化与企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3.2 泸州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现状

泸州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现有实践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虚拟展厅建设，四渡赤水纪念馆推出 360° 线上展厅，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线上呈现，但展厅缺乏交互设计，用户仅能被动浏览，2023 年访问量仅 1.2 万人次，传播效能较低；二是社交媒体传播，泸州市委宣传部在抖音、微信公众号开设“红色泸州”账号，发布红色故事、遗址介绍等内容，但短视频更新频率较低，内容形式单一，播放量多在 1 万次以下，缺乏话题性与传播力，难以形成规模化传播效应；三是研学数字化，部分学校开发红色研学小程序，但功能局限于路线导航与讲解服务，未实现互动参与，难以满足学生群体的体验需求。

整体来看，泸州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呈现“三低”特征：传播效能低，现有数字化内容未形成规模化传播，难以覆盖广泛受众；用户粘性低，互动参与机制缺失，用户难以深度参与，文化认同难以形成；品牌认知低，未建立统一的红色文化品牌形象，各传播主体的宣传物料、内容风格不一致，难以形成品牌记忆，品牌影响力局限于本地。

3.3 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数字化传播的核心困境

3.3.1 内容生产同质化，场景适配性不足

“三进工程”的红色文化内容多为历史事件复述与革命故事宣讲，缺乏针对学校、社区、企业不同场景的定制化设计。面向青少年的内容缺乏趣味性 with 知识互动性，难以适配青少年的认知特点；面向社区居民的内容缺乏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难以激发居民参与意愿；面向企业职工的内容缺乏与职业发展的结合，难以实现红色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融合，导致各群体参与意愿普遍较低。

3.3.2 传播渠道分散化，协同效应未凸显

学校、社区、企业的数字化传播渠道各自为战，未形成整合传播网络。微信、抖音、B 站等平台账号缺乏统一运营策略，内容重复发布，未根据不同平台的受众特性进行分众化投放，传播效率低下；同时，线下场景与线上渠道脱节，未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线上分享的闭环传播，导致传播链路断裂，难以扩大传播覆盖面。

3.3.3 互动体验单一化，参与机制不健全

有数字化传播多为内容推送、用户接收的单向模式，缺乏互动设计与沉浸式体验。未充分利用 VR/AR、互动游戏等技术手段，用户难以深度参与红色文化传播过程，文化认同难以形成；此外，UGC 机制缺失，用户缺乏内容创作与分享的渠道，难以形成自发传播，传播链路难以持续延伸。

3.3.4 品牌建设碎片化，辨识度与影响力薄弱

泸州红色文化缺乏统一的品牌定位与视觉形象，各传播主体的宣传物料、内容风格不一致，难以形成品牌记忆；品牌价值提炼不充分，未将“四渡赤水精神”等核心内涵转化为易于传播的品牌符号，品牌辨识度较低；同时，品牌传播缺乏系统性规划，未形成持续的传播节奏，导致品牌影响力局限于本地，难以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红色文化品牌体系。

4. 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数字化传播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资源因素：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不足

泸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资源转化效率较低。一方面，核心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加工不够深入，多停留在简单的线上展示层面，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创意呈现；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与数字技术的融合程度不高，未充分利用大数据、VR/AR 等技术实现资源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难以满足当代受众的体验需求。

4.2 技术因素：数字化传播工具应用滞后

泸州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工具的开发与应用相对滞后。现有数字化工具功能单一，缺乏互动性与创新性，难以吸引受众深度参与；同时，轻量化数字工具的开发不足，部分技术应用成本较高，难以在学校、社区、企业等不同场景中广泛推广，限制了数字化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4.3 受众因素：需求差异与参与意愿分化

泸州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差异对数字化传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青少年群体更倾向于趣味性、互动性强的传播内容与形式，而中老年群体则更偏好传统、庄重的传播方式；社区居民关注红色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企业职工则重视红色精神与职业发展的结合。受众需求的多样化与现有传播内容的同质化形成矛盾，导致参与意愿分化，传播效果不佳。

4.4 政策因素：支持体系与协同机制不完善

泸州市虽对红色文化传播给予一定支持，但针对“三进工程”数字化传播的专项政策不足。一方面，政策支持多集中于红色资源保护与传统传播模式，对数字化传播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支持不够；另一方面，缺乏跨部门、跨场景的协同机制，学校、社区、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合作不足，难以形成数字化传播的合力。

5. 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数字化品牌传播策略构建

5.1 品牌定位与视觉形象统一策略

立足泸州红色文化资源特性，将“四渡赤水精神”转化为“勇毅创新”的时代价值，将“朱德革命历程”提炼为“家国情怀”的精神内核，由此形成红色基因与时代价值的品牌核心，既确保红色精神的传承延续，又能贴合当代受众的认知与需求。在此基础上，设计统一的红色泸州品牌 LOGO，以赤水河流域地图为视觉基底，融入红军军旗元素，选用象征革命精神的红色与象征生态泸州的绿色作为主色调，打造具有鲜明辨识度的视觉符号。

针对不同传播场景制定适配的传播标语，如进校园场景采用“红色润心·强国少年”，进社区场景使用“红色邻里·幸福家园”，进企业场景则以“红色领航·实干兴企”为导向，实现品牌传播与场景需求的深度契合。此外，发布《泸州红色文化品牌传播手册》，对各传播主体的内容风格、视觉应用规范、渠道运营标准进行统一界定，保障品牌形象在不同场景中的一致性，进一步提升“红色泸州”的品牌辨识度。

5.2 精准化内容生产策略

结合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三大场景的受众特性，构建差异化内容体系。进校园场景以趣味化、知识化内容为核心，开发相关数字教材，将四渡赤水战役、朱德革命故事等核心素材转化为动画短片、互动绘本，在内容中融入历史知识点与价值观引导，增强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兴趣；设计 H5 互动游戏让用户通过扮演红军指挥员、选择战役策略的方式，在沉浸式互动中理解历史背景与革命精神；发起红色故事创编大赛以鼓励学生以短视频、漫画等形式演绎红色故事，优秀作品纳入品牌传播内容库，提升学生的参与感与创作积极性。

进社区场景侧重生活化、便民化内容创作，制作与红色社区相关系列短视频，既讲述社区老党员的革命经历与红色家风故事，又结合社区治理、便民服务等日常议题，实现红色文化与社区生活的融合传播；开发红色邻里圈微信小程序，整合红色文化知识问答、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功能，将红色文化传播与社区共建实践紧密结合；举办线上活动，邀请居民上传家中的红色老照片、老物件，分享背后的红色故事，共同构建社区红色文化记忆库，强化居民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

进企业场景聚焦职业化、赋能化内容开发，制作案例视频，展示泸州本地企业传承红色精神的实践经验，例如泸州老窖将红色党建与质量管控相结合、郎酒以红色文化培育工匠精神的具体做法，为其他企业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开发 VR 党建体验舱模拟四渡赤水战役中的关键场景，并融入团队协作、决策力培养等企业培训元素，助力企业党建工作创新；开展红色创新实践征集活动，鼓励企业职工将红色精神融入工作创新过程，推动红色文化与企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5.3 多渠道整合传播策略

构建线上线下协同联动的立体化传播网络，形成覆盖广泛、衔接顺畅的传播格局。线上聚焦主流社交平台与短视频传播矩阵的功能互补，打造场景化传播账号体系，依据不同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推送适配性内容，构建闭环式传播服务模式；开发集成核心传播功能的数字化工具，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一体化服务入口；结合重大节点策划主题化传播活动，通过互动设计激发用户主动分享意愿，形成社交裂变传播效应。

短视频传播矩阵遵循分众化传播逻辑,针对不同平台的受众特性与传播规律,差异化布局内容类型,兼顾生活化表达与深度知识传播,既强化品牌的大众化传播广度,又提升品牌的专业形象与青年群体认同度;本地传播渠道聚焦区域受众需求,及时传递红色文化传播动态,依托社交网络的强连接属性扩大本地影响力。

线下场景注重数字化活化升级,推动核心红色文化场所的数字化改造,构建线上预约、线下体验、线上反馈的完整服务链条,提升场景体验的沉浸感与便捷性;在重点传播场景设立数字化体验载体,配备适配性互动设备,定期组织线下互动活动,打通线上线下传播链路,实现传播场景的全面覆盖与深度渗透。

5.4 互动参与机制优化策略

从用户内容创作、社群构建、反馈迭代三个维度,搭建系统化、全流程的互动参与体系。用户内容创作体系覆盖多平台与多场景,通过主题化活动设计,鼓励受众主动参与红色文化内容生产与传播,挖掘多元主体的传播潜力,丰富红色文化传播内容供给;建立专业解读机制,提升用户创作内容的文化价值与传播质量,形成专业引导、大众参与的良性传播生态。

社群建设按受众群体特征进行细分,构建精准化、高粘性的线上交流平台,通过常态化线上分享、话题研讨等活动凝聚受众共识,增强品牌归属感;邀请专业领域学者、行业资深人士等担任社群指导,引导互动方向,提升社群交流的专业性与深度,促进受众间的思想碰撞与经验分享。

反馈迭代机制依托多渠道意见收集渠道,全面捕捉受众需求与传播效果反馈,建立定期传播效果评估与策略优化机制,基于数据驱动持续调整内容生产方向与渠道投放策略,确保传播策略与受众需求、传播环境的动态适配,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5.5 品牌价值评估策略

围绕传播效果、品牌认知、文化认同、产业转化四个维度构建评估体系。传播效果维度通过监测各渠道内容的播放量、点赞率、转发率、用户停留时长等指标,评估传播覆盖面与实际影响力;品牌认知维度借助问卷调查,测量受众对“红色泸州”品牌的知晓度、辨识度与美誉度;文化认同维度采用深度访谈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评估受众对红色精神的理解程度与情感共鸣强度;产业转化维度通过监测红色场馆游客量、研学活动参与人数、红色文旅产品销售额等数据,衡量品牌的经济价值。通过多维度协同评估,持续优化传播策略与内容设计,推动红色文化品牌价值稳步提升。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数字化传播现状的系统梳理,识别出内容生产同质化、传播渠道分散化、互动体验单一化、品牌建设碎片化等核心困境,深入分析了资源、技术、受众、政策等关键影响因素。基于数字化传播理论、品牌管理理论与文化认同理论,构建了涵盖品牌定位、内容生产、渠道整合、互动参与与效果评估的数字化品牌传播策略框架。

研究表明,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的数字化转型需以品牌建设为核心,通过精准化内容生产适配不同场景需求,借助多渠道整合扩大传播覆盖面,依托互动参与机制提升用户粘性,通过科学评估确保传播效果持续优化,最终实现从“资源导向”向“品牌驱动”的转型。其中,轻量化技术工具的应用是破解传统传播困境的关键,能够有效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互动性与体验感;分场景、分受众的定制化内容是提升参与意愿的核心,通过贴合受众需求的内容设计,激发不同群体的参与热情;线上线下协同的传播网络是扩大品牌影响力的保障,通过打通线上线下传播链路,形成闭环传播,提升品牌传播效能。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点范围仅覆盖泸州部分学校、社区与企业,样本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升,难以完全反映泸州全域“三进工程”的实际情况;二是未对策略实施的长期效果进行跟踪监测,品牌传播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有待验证,难以全面评估策略的长期价值。

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向展开:一是扩大试点范围,将策略应用于川南其他城市,检验跨区域推广的可行性,形成区域协同的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体系;二是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传播,进一步提升传播效能;三是加强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拓展品牌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推动红色文化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泸州红色文化“三进工程”的数字化品牌传播,不仅是红色基因传承的时代要求,更是地方文化品牌建设的战略选择。通过数字化手段激活红色文化资源,构建具有辨识度、影响力的“红色泸州”品牌,既能推动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有效传播,也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红色文化协同发展提供实践样本。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陈晓键,鲁岩,刘欣怡.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释-织”路径[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56(03):322-328.
- [3]石影.四渡赤水纪念馆:持续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N].遵义日报,2024-10-23(001).
- [4]李旭,王孟李.文化振兴视域下红色资源开发路径——以泸州“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传承带为例[J].新传奇,2025,(13):34-36.
- [5]王兆峰,吴银峰.红色文化融入旅游管理类研究生教育的效果评价——基于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法[J].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4(04):83-90.
- [6]詹伟佳.文旅融合背景下广州市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D].广西师范大学,2025.
- [7]徐梦辉.乡村振兴背景下“沂源红”数字赋能的融合机制研究[D].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25.
- [8]Checa D, Bustillo A. A review of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serious games to enhance learning and training[J].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 2020, 79(9): 5501-5527.
- [9]Hulusic V, Slavic S, Pistoljevic V, et al. Interactive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cultural heritage: a systematic review[J]. ACM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 2023, 16(2): 1-23.
- [10]Mortara M, Catalano C E, Bellotti F, et al. Learning cultural heritage by serious games[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 2014, 15(3): 318-325.
- [11]Nguyen T H, Tong V V. Leveraging user-generated content for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 marketing: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 2023, 62(4): 897-914.

Research on Digital Br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or Luzhou's Red Culture “Three-in-One Initiative”

Liao Yuyue¹

¹ *A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Hope College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400, China*

Abstract: As a core compon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holds irreplaceabl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fostering national spirit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Luzhou, a major hub of red culture in southern Sichuan, boasts ric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Four Crossings of the Chishui River site and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Zhu De. The “Three-in-One Project” serves as the core vehicle for promoting the deep-rooted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e. Currently, Luzhou's “Three-in Project”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limited dissemination formats, insufficient youth participation, and weak brand influenc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communication demands of the digital age. This paper, grounded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ory, brand management the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employs big data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o systematically map Luzhou'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asses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Three-in Initiative.” It delves into the core constraints of its digital dissemination and constructs a digital br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ramework encompassing brand positioning, content production, channel integration, interactive engagement, and impact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uzhou's Red Culture “Three-in-One Project,” driving the convers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brand value. This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d Luzhou” city IP and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red culture with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Keywords: Luzhou Red Culture; Three-Pronged Outreach Initiative; Digital Communication; Brand Strategy; Cultural Identity

低碳语境下天然纤维的工艺创新与当代艺术实践

赵中怡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在全球“双碳”目标推动下, 低碳理念已深度渗透艺术设计领域。天然纤维(麻、竹、蚕丝、棉、羊毛等)凭借可再生、可降解的生态优势, 成为连接低碳伦理与艺术创作的核心载体。本文从天然纤维的低碳属性出发, 探讨传统工艺的低碳化改良、新技术与天然纤维的融合创新路径, 结合当代艺术家的实践案例, 分析天然纤维在装置艺术、公共艺术、跨界设计中的表达形式, 揭示其在材料叙事、生态传播、美学革新中的核心价值, 为低碳时代艺术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低碳设计; 天然纤维; 工艺创新; 当代艺术; 生态美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7

一、引言: 低碳转型下的天然纤维艺术价值重构

全球气候危机引发的生态反思, 推动艺术设计领域从“形式美学”向“生态美学”深度转型, 低碳、环保、可持续不再是附加诉求, 而是成为创作的核心准则与价值导向。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 全球艺术设计行业相关材料生产、加工及展览活动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2%, 其中化纤材料、不可降解装饰材料的使用是主要碳排放源。在此背景下, 天然纤维作为与自然共生的传统材料, 其生长过程中的碳汇功能、使用后的自然降解特性, 恰好契合当代设计的生态诉求, 成为破解行业高碳困境的重要路径。采用再生纸和植物油油墨打印海报、广告或包装, 既能减少碳足迹, 保材料来制作广告道具或展示板, 从而提升设计作品的可持续性^[1]。

传统天然纤维工艺多依赖手工劳作, 本身具备低能耗、低污染的基因——如传统麻织工艺的单位能耗仅为化纤织造的12%, 苗族蜡染的废水排放量不足化学染色的5%。但同时, 传统工艺也存在效率偏低、形态表达受限、规模化应用困难等问题, 难以满足当代大型艺术创作与多元场景的需求。当代艺术实践中, 天然纤维已超越单纯的物质媒介属性, 成为传递生态理念、链接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沟通艺术家与公众的文化符号。重新审视天然纤维的材料潜力, 通过工艺创新激活其艺术表达边界, 既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也是艺术设计回应时代生态议题的必然选择, 更是推动艺术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实践。

二、天然纤维的低碳属性与材料价值内核

1. 天然纤维的生态优势与低碳逻辑

天然纤维的低碳性贯穿全生命周期, 且不同品类的低碳表现存在显著差异, 其生态优势可通过量化数据进一步佐证: 生长阶段: 麻类植物(亚麻、苎麻)每公顷年固碳量达15-20吨, 是树木固碳量的2-3倍, 且生长过程无需灌溉、不施化肥农药, 水资源消耗仅为棉花的1/8; 速生竹材3-5年可成材, 比木材生长周期短80%, 每公顷竹林年固碳量达12吨, 同时能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有机棉花的种植过程可减少91%的农药使用量, 单位面积碳排放量比常规棉花低46%。使用阶段: 天然纤维无有毒有害物质释放, 触感温和且具备透气、抑菌、吸湿等天然特性, 其中羊毛纤维的天然阻燃性可减少防火涂层的使用, 蚕丝的生物相容性使其成为室内艺术装置

作者简介: 赵中怡(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时尚产品设计。

通讯作者: 赵中怡

的理想材料,避免了化学合成材料可能引发的健康隐患。废弃阶段:天然纤维在自然环境中可完全降解,降解周期通常为 3-12 个月(棉、麻纤维约 3 个月,羊毛、蚕丝约 6-12 个月),降解过程中可释放有机养分,回归生态循环;而聚酯纤维等化纤材料的降解周期长达 200-400 年,且会分解为微塑料污染土壤与水源。

与化纤材料相比,天然纤维的碳足迹显著更低——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2 年发布的《天然纤维可持续发展报告》数据,棉、麻等天然纤维的单位碳排放量仅为聚酯纤维的 1/5,羊毛纤维的单位碳排放量为尼龙纤维的 1/8。这种量化的生态优势,使其成为低碳艺术创作的理想材料,既满足创作的物质需求,又能让艺术家通过材料本身传递生态立场,实现“创作即发声”的表达诉求。

2. 天然纤维的文化基因与艺术可塑性

天然纤维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的工艺文明,不同地域的天然纤维工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中国侗族的竹编工艺蕴含“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埃及的亚麻织造工艺沉淀着古文明的审美智慧,秘鲁的羊驼毛编织承载着印第安人的民族记忆,麻织的质朴、蚕丝的温润、竹编的坚韧、椰壳纤维的粗犷,不仅是材料特性的体现,更成为地域文化的视觉载体。

同时,天然纤维具备极强的艺术可塑性,为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可通过编织、缠绕、鞣制、黏合、毡化、针刺等多种工艺实现形态塑造;可与金属、木材、生物基材料等进行复合,拓展质感层次;可通过植物染色、矿物染色实现丰富的色彩表达,且颜色会随时间自然变化,形成独特的“时间美学”;部分天然纤维(如竹纤维、椰壳纤维)还具备良好的结构稳定性,可用于大型装置与公共艺术创作。这种“材质韧性+文化厚度+形态多样性”的综合优势,使其成为当代艺术创新的重要媒介。在设计理念上采用简约原则,简约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的选择,更是一种理念,力图通过最简洁的构图、最直接的视觉传达方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设计过程中的环境负担。它要求设计师在创作中不断思考如何在不牺牲设计质量和表达力度的情况下,精简和优化每一处细节^[2]。

三、天然纤维的工艺创新路径:传统改良与技术融合

1. 传统工艺的低碳化优化

传统天然纤维工艺虽具低碳基因,但在当代语境下仍需通过技术改良突破局限,实现“低碳性”与“实用性”的平衡:

简化流程减耗:对传统织造、染整工艺进行精简优化,如将苗族蜡染的“三次染色、三次脱蜡”传统流程,简化为“一次蜡绘、分层染色”工艺,水资源消耗降低 40%;采用植物染料低温染色技术(40-60℃),替代高能耗的化学染色(80-100℃),不仅能降低 50% 以上,还能保留天然纤维的原有质感,同时解决植物染料上色率低的问题——通过添加天然媒染剂(如明矾、草木灰),上色率从传统的 65% 提升至 85%。

手工工艺规模化适配:将侗族竹编、彝族毛织等传统手工技艺与模块化生产结合,设计标准化的基础构件,由手工艺人完成手工制作后,再进行工业化拼接组装。如某艺术家团队将侗族“十字编织法”转化为 3 种标准化模块,通过 120 名手工艺人协作,仅用 2 个月便完成了高 10 米、占地 30 平方米的大型装置,既保留了手工肌理的温度,又提升了生产效率,解决了传统手工编织难以适配大型艺术创作的难题。

废料再利用工艺:建立天然纤维废料的分级回收体系,将生产中的边角料按材质、形态分类处理:蚕丝下脚料通过“开松-梳理-针刺”工艺制成纤维毡,用于装置艺术的填充材料;麻纤维碎屑与生物基黏合剂混合,经高压低温压制成为装饰板材;废旧棉麻织物拆解后的纤维条,可用于编织、缠绕工艺,实现资源循环。这种废料再利用工艺,可使天然纤维的资源利用率从传统的 75% 提升至 92%,显著降低材料浪费。

2. 新技术与天然纤维的跨界创新

数字化设计工具的普及与发展为平面设计领域带来了更加智能化和环保的创新机遇。在低碳设计的过程中,数字化工具使设计师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设计的每个细节,减少了设计过程中对传统物料的依赖,进一步推动了设

计工作流程的优化与环保化^[3]。

数字化辅助工艺：借助 3D 建模、参数化设计、数控编织机等数字化工具，实现天然纤维的精准创作。艺术家可以先通过算法设计编织纹理与结构形态，再将数据输入数控编织机，可完成传统手工难以实现的复杂几何结构。有的艺术家采用“算法编织”技术，将竹纤维编织成不规则的双曲面结构，误差控制在 0.5 厘米以内。这种“数字 + 手工”的融合模式，既保证了大型装置的结构稳定性，又通过手工完成细节处理，保留天然纤维的肌理温度。但数字化工具与传统工艺的适配性仍需优化，部分复杂纹理的数字化转化存在失真问题。

复合工艺创新：将天然纤维与生物基树脂、可降解薄膜、碳纤维（生物基）等低碳材料复合，提升材料的结构稳定性与形态表现力。如将亚麻纤维与玉米淀粉基树脂复合，经高压成型制成的板材，强度达到传统木质板材的 1.2 倍，而碳排放量仅为其 1/3；将棉纤维与可降解聚乳酸（PLA）薄膜复合，可制成透光性好、韧性强的装饰材料，适用于公共空间艺术创作。复合工艺的核心难点在于界面相容性，需通过表面改性技术（如等离子处理）提升天然纤维与复合基质的结合力，避免使用过程中出现分层现象。

四、当代艺术实践中的天然纤维表达与低碳叙事

1. 装置艺术：以材料肌理传递生态思考

天然纤维的柔软质感、自然肌理与生态属性，使其成为装置艺术中传递低碳理念的核心媒介。艺术家通过工艺创新，让材料本身成为叙事主体，将生态议题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体验，引发观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反思。

奥诺拉·奥尼尔《纤维森林》（2021）创作背景：该作品是为“2021 年威尼斯双年展·生态主题展”打造的核心装置，回应“生物多样性丧失”议题，展览结束后被威尼斯生态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低碳艺术标志性作品。材料选择与低碳逻辑：以亚麻纤维和竹丝为核心原料，亚麻来自法国诺曼底有机种植基地，生长无需灌溉、不施化肥农药，固碳能力强；竹丝来自中国四川速生竹林，生长周期短、可自然再生。创作未用化学黏合剂、防腐剂，通过天然纤维缠绕、编织固定结构，展览结束后可完全降解，碳排放量低。工艺创新亮点：将传统手工编织与数字化建模融合，先通过算法设计不规则网格结构，计算竹丝受力点与编织密度，再邀请中国贵州侗族手艺人团队搭建竹丝骨架，融入传统竹编技巧，最后将亚麻纤维附着其上形成“森林层次”，实现跨文化工艺融合。低碳叙事表达：作品悬挂于美术馆中央，形成“虚实交织”视觉效果，亚麻垂坠隐喻自然温柔，竹丝韧性象征生态坚韧，两者编织关系代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观众可进入内部触摸纤维，将低碳理念从“视觉认知”转化为“感官体验”，传递“人与自然共生”生态观。展览吸引超 12 万人次参观，相关话题传播量达 500 万次，推动低碳艺术理念传播。传统天然纤维工艺有低碳基因，但当代仍需技术改良突破局限，实现“低碳性”与“实用性”平衡。

2. 公共艺术：链接社区与生态的低碳媒介

天然纤维成为公共艺术中激活空间、凝聚社区的重要载体，且创作过程多具备低干预、可参与的特点。如某城市社区公共项目中，艺术家组织居民收集废旧棉麻织物，拆解后重新编织成大型墙面装置，既实现了材料的循环利用，又通过集体创作强化了社区联结。

还有艺术家以竹纤维为原料，在城市公园创作可降解的公共座椅、景观雕塑，作品使用周期结束后可自然降解，避免了公共艺术作品的废弃污染，践行“用完即回归自然”的低碳逻辑，低碳设计理念的核心在于通过简约、环保的设计语言传递品牌的核心价值，减少资源消耗。通过优化品牌视觉形象的元素，品牌形象更加符合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健康、绿色的消费体验^[4]。

3. 跨界设计：突破边界的低碳美学实践

天然纤维的工艺创新推动其跨界融合，在时尚、建筑等领域实现低碳美学表达。时尚设计师将改良后的亚麻织造工艺与可持续设计结合，推出零浪费服装系列，利用天然纤维的透气性与挺括感，打造简约且环保的服饰风

格。

建筑领域中,设计师将天然纤维与可降解混凝土复合,用于小型建筑的外墙装饰与室内隔断,既降低了建筑的碳排放量,又通过纤维的肌理丰富了空间的视觉层次。这种跨界实践打破了艺术与设计的边界,让低碳理念渗透到生活场景的各个维度。可持续设计不仅关注设计过程中的低碳排放,更调整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从设计的初期到最终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须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设计过程中选择可回收材料,减少不必要的生产环节,甚至在设计方案中考虑到最终产品的回收与再利用问题。可持续设计的新方向促使设计师在创作时更加注重环保,不仅关注设计本身的美观性和实用性,还要注重其对社会和环境的积极影响^[5]。

五、结语

天然纤维的低碳艺术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部分天然纤维(如蚕丝)的规模化生产仍存在资源消耗问题,低碳工艺的成本较高,材料的耐久性与稳定性有待提升。未来,需从三方面推进发展:

一是深化材料研发,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培育更具低碳属性、更易加工的天然纤维品种;二是构建低碳工艺标准,降低创新工艺的推广成本,推动传统手工艺人的技术升级;三是拓展艺术表达维度,结合数字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让天然纤维的低碳叙事更具时代性与传播力。

参考文献:

- [1] 王勇.谈平面设计中的低碳艺术设计理念[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4,4(3):159-161.
- [2] 毛晓煜.平面设计中的低碳艺术设计理念[J].上海服饰,2023(10):179-181.
- [3] 孟宪航.论品牌与视觉传达设计趋势[J].艺术大观,2020(9):39-40.
- [4] 刘绍勇.品牌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0.
- [5] 曾艳.企业品牌设计中的视觉传达设计理念的更新应用[J].福建茶叶,2020,42(4):128.

Process Innovation and Contemporary Art Practice of Natural Fibers in the Low-Carbon Context

Zhao ZhongY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global "dual carbon" goals, the low-carbon concept has deeply permeated the field of art and design. Natural fibers (such as hemp, bamboo, silk, cotton, and wool) have become the core carrier connecting low-carbon ethics and artistic creation, thanks to their ecological advantages of renewability and degradability. Starting from the low-carbon properties of natural fib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ow-carbon improvement of traditional crafts and the innovative path of integrating new technologies with natural fiber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cases of contemporary artists, it analyzes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natural fibers in installation art, public art, and cross-border design, and reveals their core values in material narration,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and aesthetic innovation.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rt and design in the low-carbon era.

Keywords: Low-carbon Design; Natural Fiber; Craftsmanship Innovation; Contemporary Art; Ecological Aesthetics

从“长叙事”到“微瞬间”：短视频时代纪录片的美学重构与叙事转向

叶伟¹

(1. 吉利学院, 四川 成都 641423)

摘要: 短视频的流行不仅改写了媒介生态, 也触动了纪录片这一传统形态的美学根基与叙事方式。在短视频语境下, 纪录片正由经典的“长叙事”转向以“微瞬间”为核心的新范式。文章指出, “微瞬间”范式是技术、文化与消费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在推动纪录片知识普及及文化传承年轻化的同时, 也伴随深度被稀释、真实被侵蚀及算法干预等风险。研究呼吁, 在拥抱新语法的同时须坚守纪录片的本体价值, 探索“于微处见深广”的创作路径。

关键词: 微纪录片; 短视频; 美学重构; 叙事转向; 媒介融合; 参与式文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8

移动化与智能化已重塑媒介生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 截至2025年6月, 短视频用户达10.68亿, 渗透率95.1%^[1]。这种“微”语境不仅改变了信息接收方式, 也对以宏大、深沉、线性叙事为美学标志的经典纪录片传统提出根本挑战。自格里尔逊提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到比尔·尼科尔斯总结纪录片“诗学”模式, 创作者一直试图在绵延的时间轴中呈现整体真实与社会深描。

碎片化传播与即时审美催生了“微纪录片”这一新形态。学界已勾勒出它的多重轮廓: 有人提炼出“微叙事、微视角、融传播”的共性; 有人锁定个案, 拆解移轴摄影、CG动画等技术手段, 或故事化、拟人化等叙事策略, 甚至关注声音层面的创新; 也有人从宏观视角追踪其审美取向与传播路径的变化。这些成果提供了大量现象级观察, 却大多停留在局部特征或单点创新的描述, 尚未把短视频语境下纪录片的本体美学与叙事范式转型整合为系统的理论框架。

短视频时代的微纪录片并非把传统纪录片在时长和发布渠道上简单“压缩”, 而是经历了一场由“长叙事”到“微瞬间”的范式革命。它的核心价值不再执着于历时性的整体真实与思想深度, 而是转向共时性的瞬间真实、感官沉浸与情感共鸣。本文将理论梳理与个案细读结合, 从美学体系的重构与叙事范式的转向两条主线, 系统剖析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表现形式、文化意义及潜在风险, 为纪录片理论在数字语境下的更新提供线索。

一、美学体系的重重重构

在短视频语境下, 纪录片的美学转向最先体现在感知方式、时空结构与文本形态, 三者交汇, 奠定了“微瞬间”范式的基础。

(一) 感官美学: 从“视觉主导”到“视听通感”与“多感官沉浸”

传统纪录片把影像放在中心, 解说词或现场同期声只是陪衬, 整体框架服务于理性认知。微纪录片里, 听觉被抬到与画面平起平坐, 甚至抢先一步, 感官重心随之从“看”滑向“沉浸”。《听起来很好吃》(第二季)把声音直接推到叙事最前线: 重庆小面铺里混杂的点单喊声、蒸汽翻滚的嘶嘶声, 一下子把市井烟火拉满; 岭南师傅落刀的脆响与武馆练拳的呼喝同拍共振, 用“声”托“道”, 讲出手艺的传承。这种对声音的精修与再造, 再叠加快切、强节奏配乐等网络语法, 为的是瞬间击穿屏幕, 让观众产生“我就在现场”的身体感; 它不再追求客观证据式的真实, 而转向由感官冲击带来的“体验真实”。

(二) 时空美学: 从“线性深描”到“碎片化聚集”与“模型化认知”

传统纪录片惯于沿物理时间铺展, 借线性流动对空间与社会做纵深描摹, 如《话说长江》对流域文明的史诗式呈现。微纪录片则把时空表达彻底重构:

作者简介: 叶伟(1982—),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

1.时间被切成“瞬间”：漫长的历史或过程被压缩成几个“高光”或“情感峰值”。叙事遵循“黄金三秒”原则，开场就要抛出最强烈的视觉或情感刺激；在5-10分钟的篇幅里，几乎没有缓慢铺垫的空间。

2.空间的“碎片化”与“模型化”：宏大场景不再被完整呈现，而是拆成一组剥离语境的精致视觉片段——《早餐中国》里对各地厨房与食物的特写便是典型。更进一步，前沿影像技术把庞然巨物“模型化”，以贴合小屏时代的观看习惯。《奇妙中国》第二季用移轴摄影把超级工程压成玩具般的微缩景观，消解了视觉压迫；三维动画将百米风电叶片按等比例缩小，观众仿佛俯视沙盘，一眼看清运转逻辑。经此“模型化”，原本遥不可及的宏观存在变得可触、可感、可理解，视角也由“仰望”转为“把玩”。

（三）文本美学：从“闭合作品”到“开放节点”

传统纪录片往往自成一体，文本封闭、结构完整；微纪录片却主动拆掉这层外壳，在融媒环境里化作一个鼓励互动与再创作的开放接口。它的意义不再由片方单独决定，而是随着用户的每一次转发、剪辑、弹幕逐步补全。B站上，《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弹幕就是典型场景：文物亮相时满屏“已查收”，金句一出又被观众逐字拆解刷屏，这些即时评论早已成为观看本身的一部分。实时、共时的交流让文本边界持续晃动，微纪录片不再是供人瞻仰的成品，而是一场邀请所有人共同续写、共享阐释的“文化仪式”起点。

二、叙事范式的系统性转向

在新美学规则的引导下，微纪录片的叙事逻辑已从结构到接受实现全链条转向。

（一）叙事结构：从“金字塔式”到“钻石型”与“单元化”

传统纪录片惯用的起承转合被大幅压缩，甚至扭曲。微纪录片转而采用“钻石型”或“糖葫芦串式”框架：一上来就把情绪或认知推到高点，比如直接抛出关键问题或最震撼的画面；随后在短短几分钟内密集输出核心信息或情感；结尾则尽量轻盈，一句点睛或干脆留白。整季被拆成高度独立的单元，每集只盯一个具体对象或知识点——像《如果国宝会说话》的“一集一文物”^[4]——方便观众随时点开，随时看完。

（二）叙事视角：从“上帝之眼”到“人格化代入”与“主观沉浸”

在微纪录片里，曾经统摄一切的“上帝之眼”被大幅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主观视角。人格化叙事成了最管用的手段：文物自己开口讲述岁月，例如《如果国宝会说话》里宋徽宗的自白；科技设备也被起了昵称、赋予性格，《奇妙中国》把3D扫描仪叫作“长得像电话听筒的家伙”。第一人称Vlog、亲历者的口述实录更是随处可见。视角一旦内嵌，观众与题材之间的心理距离瞬间被抹平——他们不再“观看”对象，而是被邀请“成为”或“陪伴”对象，情感由此直接相连。

（三）叙事动力：从“问题驱动”到“情感/趣味驱动”

传统纪录片往往从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或科学议题切入，叙事围绕“寻找答案”展开。微纪录片的叙事动力则更多来自情感与趣味。《了不起的匠人》把镜头对准师徒间的情感碰撞与手艺传承；《早餐中国》用清晨的烟火气唤醒乡愁与市井温情。即便是硬核科普的《奇妙中国》，也以“人类为何非要造出8万吨的力？”这类感性提问开场，把冰冷的原理变成一场充满悬念的探险。观众点下播放键，不再是为了“求解”，而是被共情、好奇与猎奇的本能迅速拉入故事。

（四）叙事与接受：从“单向传播”到“参与式叙事”

传播方式的改变最终改写了叙事的底色。微纪录片的讲述不再是导演一个人的事，观众在互动里一起把它“写完”。这种共同书写落在两处：一是播放时，弹幕和评论像实时旁注，左右旁人如何理解；二是播放后，原片被剪成片段、重新拼贴或戏仿，在社交平台上掀起新一轮转发。更有《她的故事，“触”处动人》这类互动微纪录片，让观众用点击决定情节走向，把一部分叙事权交到他们手里。于是叙事变成一场“参与仪式”，在来回互动中加固群体认同，也拼合出新的集体记忆。

三、转型的动因、价值与隐忧

（一）转型的深层动因

这场范式转移由技术、文化与消费逻辑共同驱动。移动拍摄与便携剪辑工具拉低了制作门槛；CGI、VR、高清音频等技术为美学实验提供了新手段；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则把“瞬间抓眼”写进创作规则。与此同时，青年亚文化对趣味、个性与情感的高扬，以及注意力经济对用户时长的争夺，迫使纪录片顺势而变。

（二）积极价值与文化意义

首先，短视频让创作门槛降低，题材随之丰富，非遗匠人、街头早餐、个体叙事得以被更多人看见。其次，它将高深的科技知识与厚重的历史故事拆解为直观画面，实现高效而低门槛的传播。最后，它以情感共鸣和互动体验连接传统文化与年轻群体，使遗产不再是展柜里的标本，而成为可分享、可参与的“活”资源，从而强化文化认同^[2]。

范式转向并非没有代价。首先，当“瞬间”压倒“深度”，对即时快感的追逐容易磨平历史的褶皱、社会的多重张力，也压缩了批判思考得以展开的缝隙。其次，若“趣味”凌驾“真实”，过度的人格化与戏剧化叙事可能把现实削成易于消费的形状，让情绪真实悄悄顶替事实真实。再次，算法虽隐形，却通过流量逻辑为议程排序：题材越趋同，风格越奇观化，那些缺乏视觉冲击的“平凡真实”便更难被看见，也更难被讲述。

因此，需要明确的是，“微瞬间”范式与“长叙事”传统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一种互补与对话。未来的纪录片创作，既要熟练运用短视频语法以精准触达受众，又应自觉延续纪录片关注现实、追求深度的核心精神，探索在“微”形式中承载厚重内涵、在“瞬间”里窥见永恒的创新路径。

四、结语

短视频时代的微纪录片正在重塑自身：美学根基与叙事方法同步转向，以“微瞬间”为轴心，形成感官沉浸、时空压缩、文本开放的新美学，并采用单元结构、人格视角、情感驱动和互动参与的叙事策略。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共振催生了这一变化，使纪录片的形态、受众范围与社会功能随之大幅扩展。

本研究把当下零散的微纪录片特征讨论收拢到“美学—叙事”范式转型的层面，为数字时代的纪录片提供一套新的分析框架。创作层面，它提示制作者既要主动吸收新的视听语法与传播逻辑，也要警惕被流量裹挟；在“小切口”里做出“大格局”仍是关键。影视教育则需同步更新课程，在训练微纪录片技艺的同时，强化媒介伦理与美学思辨，培养能驾驭“微瞬间”并理解“长叙事”的复合型人才。

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入受众的认知心理、算法与创作伦理的张力，以及微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效果。只有让技术与人文保持动态平衡，纪录片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媒介环境中，既守住记录时代、启迪思考的初心，又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传媒论坛,2025,(15):121.
- [2]田爱莲.微叙事微视角融传播——自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的创新实践[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5,(07):51-54.
- [3]姜博.硬核科技与视听语言的有效衔接——融媒体系列微纪录片《奇妙中国》第二季叙事创新[J].电视研究,2024,(09):51-53.
- [4]袁媛,刘明.微纪录片的传播特色与创新表达——以《如果国宝会说话》(第四季)为例[J].电影评介,2023,(16):86-89.
- [5]王志,张翼鹏.微纪录片的听觉表达创新研究——以总台《听起来很好吃》(第二季)为例[J].电视研究,2024,(07):79-81.
- [6]安立国,王欣杨.融媒体语境下微纪录片的创作、审美与传播新趋势研究[J].电影文学,2024,(05):58-62.

From "Long Narrative" to "Micro-Moments": The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and Narrative Turn of Documentary in the Short-Video Era

Ye Wei¹

¹Geely University of China, Sichuan, Chengdu 641423,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short videos has not only reshaped the media landscape but is also fundamentally reshaping the aesthetic foundations and narrative approaches of documentary as a traditional form. Within the context of short videos, the documentary is undergoing a paradigmatic shift from the classic "long-form narrative" towards a new paradigm centered on the "micro-mo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micro-moment" paradigm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forces of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nd consumer logics. While it promot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documentary, it also carries inherent risks, including the erosion of depth and authenticity, alongside pervasive algorithmic influences. The study calls for upholding the core value of documentary while embracing its new grammar, advocating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reative pathways that achieve "profound meaning within the mini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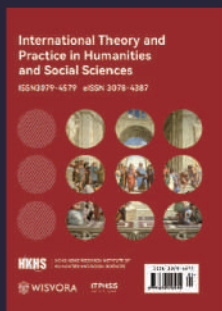
Keywords: Micro-documentary; Short video;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Narrative turn; Media convergence; Participatory culture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

学术赠阅